

唐 诗 本 事 研 究

余才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序	李剑国 1
导论	1

第一编 源流篇

第一章 本事的渊源流别	
第一节 汉代诗学的回响	13
第二节 文言小说的支流	25
第二章 本事的体制类型	
第一节 本事类型的划分	40
第二节 本事类型的特征	45
第三节 本事类型的转换	53
第三章 本事的漫衍分化	
第一节 本事的余绪	72
第二节 本事的学术化	81
第三节 本事的小说化	105

第二编 体制篇

第一章 本生的故事生成	
-------------	--

第一节 本事的来源	118
第二节 本事的生成形式	125
第二章 本事的故事类型	
第一节 本事类型举要	146
第二节 本事类型的形成和影响	158
第三章 本事中的感妓故事	
第一节 感妓故事的形态	166
第二节 感妓故事的原型及形式转换	170
第三节 感妓故事的文学蕴含	176
第四章 本事的文本构成	
第一节 以人立目	180
第二节 以类相从	183
第三节 因词链接	186
第四节 因文衍生	189
第五章 本事对诗歌的影响	
第一节 本事与诗歌文本	193
第二节 本事与诗歌意旨	197
第三节 本事与诗之归属	200
第四节 本事与诗题	203

第三编 诗艺篇

第一章 本事的诗歌解评方式	
第一节 交代诗作背景	209
第二节 表现诗歌意境	215
第三节 叙说写作状态	220
第四节 欣赏名篇佳句	223
第二章 本事诗评的思维方式	
第一节 运用直感语言	229

第二节 借助个性形象	233
第三节 采用寓言故事	237
第三章 本事中的文学习尚	
第一节 崇尚气象	244
第二节 专注境界	253
第三节 追求趣味	270
第四节 推尊学问	291
第四章 本事中的诗学观念	
第一节 诗歌的本质	299
第二节 诗歌的功能	310
第三节 诗歌的法则	325
第四节 诗歌的创作	339
第五节 诗歌的解读	349

第四编 考证篇

凡例	359
正文	360
附表一《唐诗纪事》诗歌类编情况一览表	441
附表二《唐才子传》以诗考事情况一览表	443
参考文献及征引书目	448
后记	461

序

“本事”一词先秦早已出现,含义亦众。撇开其他意义不谈,接近“唐诗本事”这样含义的,大约较早的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小序所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是粗略的大事记,左氏为其作传,传文详述其“本事”——这“本事”就是一段史实。

“本事”者,事之本来面貌,非得有“事”不可。此其一。其二是既曰“本事”,必有匹配对象,就是有所针对地揭示或展示与对象相涉的事情。《左传》的“本事”是匹配《春秋》经文的,《毛诗》小序是匹配《毛诗》的,许多小序就是揭示陈说《诗》的“本事”,以帮助读者了解诗意。配《诗》作传的还有流传至今的西汉韩婴所作《韩诗外传》。

可见“论本事”原本是汉代经学的概念,它和训诂都是解经的重要方式,属于学术范畴。应当说左氏说《春秋》本事不会走样,事情摆在那里嘛,掌握文献就可以了。但说《诗》本事就不好说了,毛小序说《周南》统统扯到后妃和文王那里,实在都是主观臆测。至于《韩诗外传》,乃是所谓“引《诗》以证事”,与毛小序“引事以明《诗》”大不相同,其所说之“事”并非《诗》之“本”,其事实算不上是“本事”。

比如《周南·汉广》,毛小序说是“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这话过于笼统,不涉具体事件,但背景是清楚的,就是文王之化。《韩诗外传》解释开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四句,则扯出一段故事,就是孔子南游到楚国阿谷,遇女子临水浣衣,孔子先后抽觯、琴、絃以授子贡,让他上前搭话,都遭到这位恪守礼仪的女子的冷遇和拒绝。《外传》最后说:“《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此

之谓也”可有两解,一是说《汉广》所写就是孔子这件事,一是说孔子这件事恰好如同《汉广》所写的“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当然韩婴的意思是后者,他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在说明《汉广》产生的原委。这不仅因为汉人普遍认为《诗》是孔子删过的,孔子之前已有《诗》,而且韩婴解《汉广》还有另一说。《韩诗外传》有条佚文(《文选》卷四《南都赋》李善注、《初学记》卷七、《太平御览》卷六二引)记郑交甫在汉皋遇二女而向之请佩的故事,而《列仙传·江妃二女》也正是这个故事,末云:“《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韩诗》是解《诗》的,讲郑交甫之事必然及《诗》,李善注等所引肯定不是全文。而《列仙传》当本《韩诗外传》,末引“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必是《韩诗外传》原文如此。同样一章诗弄出两个“本事”,这显然引《诗》证事。

从文本结构和“本事”形态看,《韩诗外传》虽说所叙并非真正“本事”,但显然更接近唐诗本事的形态,就是由一个生动形象的故事引出诗句。而且故事常常具有程度不同的虚构性,因而其品格也就带上小说的特征。

《左传》的史本事,据纲言事,只是一个特殊的著作方式,不可能由此产生一类文体。而汉人说《诗》则衍生出盛行于唐代的“诗本事”。但唐人说本事,已从治经转变为文学行为,包含着对诗人的诗歌创作背景、缘由、过程及流传的具体描述,也包含着对诗作的评品等。

在各类文学样式中,显然由于诗歌言志抒情的特殊性,其本事最为隐蔽。因而探求诗歌本事本来就为谈诗者所关注。吴兢《乐府古题要录》卷上《乌生八九子》云:“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他对不言本事感到遗憾,因为只有从本事中才能探究诗意。唐代是诗歌王国,士林人人作诗言诗,因而探求本朝诗人的诗歌本事更是文人兴趣所在。此中包含着诗人的阅历、经验、情感和隐秘。诗本事不要说对说诗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即便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十分有趣的话题。我相信这后者更是诗本事产生、流传乃至被人记录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明人胡震亨曾说过:“唐人作诗本事,诸稗说所载,资解颐多矣。其间出自傅会,借盾可攻者,盖亦有焉。”(《唐音癸签》卷二九《谈丛五》)我们看唐诗本事常常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传闻性,就知道它们大抵

是被好事者所传播的,在传播中不断经过好事者的演绎。其产生和流传过程,与其他类型的故事——如神仙故事、鬼怪故事、民间故事、名人逸事、历史遗闻等——并无多大差别。

这样,唐诗本事就具有了史料与小说的二重性质。它的史料性,使之成为治唐诗者取资的重要文献来源。而他的小说性,又被小说研究者纳入研究范围。诗本事处于真伪之间,诗人自然是真实的,诗常常也是真实的,但本事往往不是凿空虚造就是虚实参半。无论是治唐诗,还是治唐稗,都需要对这些本事材料下一番考辨功夫,弄清事实的真伪。作为研究对象,这也正是唐诗本事的魅力所在。

唐代的诗本事专门著作有《本事诗》、《云溪友议》、《抒情集》等,在其他小说和笔记中也有大量诗本事记载,可以说触目皆是。诗本事确实是唐代文学中一个耀眼的现象,有着丰富的内容,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它在产生和流传中所折射的文人心态和审美取向,它的事实和传闻并存的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史料辨伪,它的文本结构形态和艺术特性,它的小说价值和文献价值,它的说诗方式,它的渊源和流变,它对后世诗话的深远影响,如此等等,都值得研究。

尽管无论是治唐诗还是治唐稗都不能不涉及唐代诗本事著作和资料,尽管也会利用诗本事这个概念论述一些问题,但将唐诗本事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展开研究,余才林博士的《唐诗本事研究》还是第一部,实有开拓发轫之功。而且,他的研究不是粗浅的,不是搭个架子,塞点材料,做点解说就完事,而是非常精细,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唐诗本事研究》建构起唐诗本事研究的完整体系,此中所包含的大量问题,作者都作出理论概括和具体分析,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

《唐诗本事研究》分《源流》、《体制》、《诗艺》、《考证》四编,开头是《导论》。全书结构稳妥完整。这里我不可能全面介绍和评价全书各章的论点,只就其中若干题目和论点作些扼要介绍,并谈谈我的看法。

《导论》讲了三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本事、文体和文本范围的界定、廓清和概括。这些都是关于诗本事的范式问题。对于本事的界定,没有单纯限定为诗歌的创作过程,而是确定为“本事是有关诗歌创作、品评、欣赏及诗歌流布的故事”。这是根据唐代诗本事故事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概括,

尽管诗歌创作故事是本事的主体,但由此扩大为也包括诗歌品评和传播在内,是合适的。否则《本事诗》、《云溪友议》中的许多故事都得被剔除,这点才林已经分析过了。对于诗本事的文体界定,才林将其与诗序、志怪传奇小说、讖语加以区分。至于文本形式,则是对诗本事文本中事、诗以及议论之间的复杂关系,对诗本事的特殊体制作了很好的说明。唐代和诗相关的材料多如牛毛,确定诗本事的概念、范围和体制无疑是首要任务。才林缜密的理论表达,就把唐诗本事这个研究对象高度清晰化了。

《源流篇》论析唐诗本事的两大历史渊源,一是汉代《诗序》和《韩诗外传》,二是唐前文言小说,它们对唐诗本事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说前者的影响主要是说诗形式,后者的影响尤为全面深刻,才林对此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得出唐诗本事是“文言小说的支流”的结论。事实上,六朝小说的说诗故事在唐代更为流行,唐代志怪、传奇、杂事小说中就含有大量诗本事故事。到晚唐五代,《本事诗》、《云溪友议》、《抒情诗》、《鉴诫录》相继出现,专门记录诗本事故事,它们实际都属于杂事小说集。基于这一认识,才林在划分本事类型时,从小说属性着眼,划分为传奇性、志怪性、杂录性本事三种,并分析各自的内容和艺术特征。

《源流篇》还用大篇幅细致梳理和论述了唐五代诗本事故事的流变状况。按照初盛唐、中晚唐和唐末五代三个阶段讨论,每个阶段都列举大量小说和笔记资料,非常丰富。在对本事故事的梳理中概括各阶段的基本状况和发展变化。中晚唐是唐诗本事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晚唐出现了专门记载唐诗本事的著作,有孟棻《本事诗》、范摅《云溪友议》和卢瓌《抒情集》。才林指出:“这三部专门著作的出现,说明唐诗本事从一般笔记中独立出来,这标志着唐诗本事的收集整理已走向自觉,其价值和意义已获得充分认识。”这一结论是非常正确的。我想强调一下,孟棻以“本事诗”名书,正式提出并确立了诗本事的概念。“本事诗”者,意为言诗之本事,诗是中心,本事是对诗的解说。以事明诗,这是“本事诗”结构的基本特征。但是“本事诗”的书写目的又是在诗之事上,它彰显的是关涉此诗的事件,因此“本事诗”也正是“诗本事”。孟棻创造性地提出“本事诗”概念,这一概念的确立,乃是对诗本事这一特别文体的确立。孟棻是僖宗时人,《本事诗》作于光启二年(886),已在唐末。唐诗本事经过260多年

的发展,终于获得独立地位和正式的文体名号。因此《本事诗》的出现,实在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无独有偶,同样在僖宗朝的陈翰编纂传奇小说总集《异闻集》,也成为传奇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唐诗本事中最多的是杂录一类,纪实性强,常被用作史料。但许多所谓“本事”,其真实性大有问题,需要进行考辨。《唐诗本事研究》最后的《考证篇》,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如《凡例》所说:“考证内容包括考订真伪,备录异说,校勘文字,钩沉索隐。文字校勘主要涉及与诗之作者、本事真伪及诗之归属等相关的文字。”考证一共 51 条。“窥一斑而知全豹”,这里只举关于白居易的一条为例。

《本事诗·事感第二》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才林辨析了这条本事的三个错误。一是白居易《杨柳枝词》云“永丰西角荒园里”,而非“东南角”。卢贞《和白尚书赋永丰柳》序云:“永丰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二是白此后还作有《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二诗同作于会昌五年。而卢贞于会昌四年至五年为河南尹,曾参加会昌五年三月的“七老会”,当时二人同在洛阳。卢序还云:“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言也。因此偶成绝句,非敢继和前篇。”可见本事所叙白作《杨柳枝词》、国乐唱是词、取柳植禁中,事在会昌五年,乃武宗之事,非在宣宗朝。三是《杨柳枝词》乃咏洛阳永丰柳,纯为咏物之诗,本事谓小蛮方艳,白居易因以此诗寄意,乃附会比兴,并不符合诗之原意。我这里只是概述,略去原考的许多资料引证。但也不难看出,才林的考辨思维缜密,熟悉文献资料,考证结论自然成立。

才林在此书《后记》中表示,他治学有意遵循熊十力的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的原则。这本 40 余万字的著作正体现了这种治学路径。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占有原始资料,仔细地爬梳整理,分析综合,从材料引发

出观点,由事实概括出理论,脚踏实地,凌空一鸣。这和那种套用理论、空疏不学的所谓“新方法”完全不同。治学必得其正,余于才林此书见焉。

才林早年师从郝世峰教授研读唐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是刘禹锡研究。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编辑出版方面的教学,但对唐文学研究从未辍手。1999年跟我读博士学位,五年之后以教学之余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唐诗本事研究》,实属难能可贵。论文通过后仍不断修改,又过五年才肯拿出来出版。整整十年呐!“十年磨一剑”,聪明人或许十年中已经开起刀剑铺了,但才林是个“笨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出版才林博士这部专著,他请我作序。写序过程中重新阅读才林这本书的电子本,经常生出赞赏之意。而眼前也常常浮现出才林的面容——那是一张笃实的面孔,一如他的书。

李剑国

2009年10月8日~10日于澳门大学

导 论

唐五代出现过大量的诗歌本事。中唐以前,这些本事零星产生和流传,散见于各种唐人笔记。到晚唐五代,本事流传渐多,于是出现了专门收集、记载唐诗本事的著作。从这些零星记载和专门著述看,讲说诗歌本事在唐五代曾经广泛流行,且逐渐走向自觉,实为唐人说诗的主要形式。唐代真是一个诗歌创作的辉煌时代,在后人看来,唐诗的辉煌不仅使同时代其他文体的成就黯然失色,也使这种流行的说诗故事显得不足挂齿。后人在盛赞唐诗恢宏的气象、深邃的境界、华美的词章以及严整的格律,甚而叹为观止时,似乎忘记了唐人对同时代诗歌的研讨和品评,以致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唐代是一个不言诗的时代。唐诗本事被忽略,正是唐诗的耀眼光芒所造成的雪盲效应。另一方面,唐诗本事是唐人小说的一部分,其小说形式和审美倾向具有特殊性,但因为介于小说和学术之间,唐诗本事作为小说的研究也尚未自觉。应该说,唐诗本事不仅是后人步入唐诗殿堂的路径,是解开唐诗之谜的钥匙,也是唐人小说的一畦花地。进入这一领地,进行专门开掘,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书拟对盛极一时的唐诗本事进行全面考察。在进入我们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本事的定义、本事的文体及文本形式作出澄清和规定。

一、本事的界定

何谓本事?这本来是一个已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似乎无需提出。唐人习惯将有关诗歌创作的故事称为本事。吴兢《乐府古题要录》卷上《乌生八九子》云:“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此之“本事”指诗之所本之事,即诗歌创作所依据的具体事件,诗歌

创作的缘起。孟棨编纂《本事诗》时引入了这一概念。《本事诗序》云：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

这一段话交代了《本事诗》编纂的缘由。据孟棨所言，本事诗为“触事兴咏”的抒怀之作，本事乃诗歌所咏之事，讲述本事在于追索作诗兴咏之由，揭示诗旨。可见，孟棨所说的“本事”是记载诗歌创作缘起、并能由此推原诗歌本意的一类故事。这一具有本事界定意味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权威性的影响。此后，人们普遍认为以《本事诗》为代表的唐诗本事是有关诗歌创作的故事。

《本事诗》是第一部载录唐诗本事的专著，“本事”作为唐人说诗故事的代称也是源于该书，应该说，后人沿用孟棨有关本事的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孟棨对本事的理解与他对本事的编纂其实是有矛盾的。《本事诗》中的一些条目在内容上早已溢出了他所理解的本事的范围。《事感第二》记载，天宝末年，玄宗尝乘月登楼，梨园弟子唱李峤诗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玄宗因谓：“李峤真才子也。”明年幸蜀，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高逸第三》记载，李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访时，请所为文。李白出示《蜀道难》。知章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为乐。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谓“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又《嘲戏第七》记载：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诩。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

“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祐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祐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祐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以上四则本事，前述两则为诗歌欣赏，后引两则为诗歌品评，均与诗歌创作无关。此外，《本事诗》中，德宗与官韩翃也是出于对韩翃《寒食》一诗的欣赏。孟棨在辑录《本事诗》时，根据自己对唐诗本事的理解，确定了如序中表述的编辑思想，意欲以此统摄全编，但是，这一编辑意图并未贯彻到底，其中无意收录了偏离本意的唐诗故事，因而出现这种名实不符的显例。其实，唐诗故事中有大量诗作品评欣赏的故事，同样是唐诗本事专书的《云溪友议》即多有载录，如“冯生佞”、“钱塘论”、“四背篇”及“买山讖”四条所载故事都出于对名篇佳句的欣赏。这些本事或诵美而近于谄媚，或品藻而间以排诋，或嘉赏而出以诙谐，或标举而杂以怪异，姿态横生，情趣盎然。与《本事诗》相比，《云溪友议》中此类故事尤多。欣赏名篇佳句，乃唐人风习，此类故事实为唐诗故事之一大类，《本事诗》不经意的收录并非偶然。

除以上有关唐诗创作、品评欣赏的故事外，唐诗故事中还有诗歌传播的故事。《云溪友议》及其他笔记多有载录：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

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

此外，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的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虽意在品评诗之高下，但诸人诗之流布亦可概见。唐代雕版印刷尚未普及，诗歌的传播主要不是通过书籍，而是借助寄赠、题留、传唱等形式，诗歌的传播于是成为唐人说诗的重要话题。

由此可见，《本事诗》、《云溪友议》及笔记中的唐诗故事至少包括诗歌创作、品评欣赏及诗歌流布。虽然有关诗歌创作的故事成为唐诗故事的主体，但其他故事也是唐人说诗的重要内容，诗歌创作故事和其他故事理应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入研究视野。确定本事的研究范围不能局限于《本事诗》，更不能囿于孟棻在《本事诗序》中狭隘的设定。既然记载诗歌创作缘由、推原诗歌本义的本事成为唐诗故事的主体，而事实上又约定俗成，作为唐诗故事的代名词，那么我们有理由借用这一名目，赋予它更为广阔的内涵，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本事是有关诗歌创作、品评、欣赏及诗歌流布的故事。

二、本事的文体规定

唐诗本事的划定，主要是从内容、题材着眼，与形式关系不大。唐诗本事常置身于其他文体的著作之中，《本事诗》、《云溪友议》等专集中的唐诗本事也大多采自其他文体著作。这些本事都有所源著作文体的特征，所源著作文体不同，本事文体也因之不同。可见，唐诗本事尚未从其他文体中分离出来，也远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文体。这种情况导致了人们对本事文体特征的不同认知。《本事诗》和《云溪友议》的编者在此问题上即出现歧异：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各以其类聚之。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

者,咸为小序以引之,贻诸好事。(《本事诗》序)

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弛驾踟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摭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傥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云溪友议》序)

前者关于本事诗性质的认识源出《诗大序》,其编排体例模仿《诗经》,诗之本事称为“序”,视唐诗本事与《诗》序为同一性质。后者对本事文体的理解则是典型的“小说”观念。

尽管本事文体不同,人们认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本事文体特征的把握。事实上,本事应该提出自己的文体要求,不能与其他文体混为一谈,而明确本事的文体要求是界定本事、确定研究范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应该将本事与诗序区分开来。诗序源出《诗》序,是交代诗歌创作缘起及诗歌本义的一种文体。通常在诗题之后,正文之前。唐诗多用诗序,著名的诗序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元结《舂陵行》序、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韩愈《石鼎联句诗》序、白居易《琵琶行》序及《燕子楼三首》序、杜牧《杜秋娘诗》序及《张好好诗》序,等等。这些诗序与正文相表里,成为整个诗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序”有时也称为“引”,如刘禹锡诗中有《九华山歌》引、《泰娘歌》引、《读张曲江集作》引、《再游玄都观》引,等等。“序”的文体特征及功能与本事相似,因而常被采为本事。《本事诗》中采用诗序的本事有两则,一是《事感第二》中元稹于褒城题黄明府诗事,二是《征异第五》中韩愈诸人联句诗事,前者采自元稹《黄明府诗并序》,后者采自韩愈《石鼎联句诗并序》。《云溪友议》中亦有此例,如《三乡略》、《钱歌序》几乎全用诗序,《南海非》前半也采择诗序。诗序与本事的这种交叉情况给本事文体的确定带来困难。

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在文体上区分本事与诗序仍是必要的。首先,一些交代写作缘起的诗序,其写作缘起虽有“事”为背景,但不定有“事件性”,甚至并非现实之“事”,而“事件性”、“现实性”是本事的基本要求。“序”与“引”的广泛运用是在中唐以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诗集中诗序尤多,可以体现唐人诗序的基本面貌。这些诗序,有一些缺乏明确“事件”。如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序,不过叙南地风土,并无事件。白居易《秦中吟》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刘禹锡《插田歌》引云:“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候采诗者。”均无与诗歌内容相关的具体事件。一些诗序即使叙“事”,有时也不过是一点小感触或细小的心理活动,如刘禹锡《九华山歌》引、《读张曲江集》引、元稹《种竹》序等等,缺乏本事必需的“事件性”。至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感发旧事,发思古之幽情,则更远离具有“现实性”的本事。其次,诗序在内容上与本事存在差异。不仅议论性诗序,如白居易《新乐府序》,与本事完全不同,即使叙事性诗序也与本事有别。如元稹《使东川》序,介绍组诗的编辑,刘禹锡《插田歌》引交代写作目的,《竞渡曲》、《采菱行》引不过解题,这些内容均已超出本事的范围。以上诗序与本事的对照是着眼文体本身,属于理论范畴。从研究范围的确立考虑,将诗序与本事分开也是必要的。诗序是对诗歌创作的交代介绍,或对相关内容的解释说明,其性质与功能与本事有别,作为一种固定的应用文体,自应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所以,即使是那些与本事相近的叙事性诗序,也不宜纳入本事的研究范围。

其次,应该将本事与志怪传奇小说区分开来。唐代传奇小说在叙写故事时常常穿插诗歌,诗是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诗与事的结合形式与本事颇为类似,所以有时难于分辨。特别是一些本事具有“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特点,极易相混。一方面,《本事诗》、《云溪友议》等书采录传奇小说为本事,如《本事诗》中韩翃、柳氏的故事采自许尧佐的《柳氏传》,《云溪友议》中《玉箫化》的主体部分,情节变幻曲折,全用传奇笔法,显然采自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另一方面,今人所编唐代传奇小说集亦采录本事故事,如张友鹤《唐宋传奇选》选录《本事诗》中崔护游都城南庄

故事。但是,本事与传奇小说的这种互相渗透关系只在一定范围,二者的区别却是明显的。

第一,本事以诗为中心,故事是对诗的说明。本事一般叙写诗歌写作缘起、写作过程、诗歌的品评欣赏以及诗歌的流布,或敷演诗意。事件的叙写围绕诗歌展开,从属于诗歌。一般来说,没有与诗歌无关的情节。传奇小说以叙说故事为主,诗歌只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在故事中起渲染烘托、交代说明、抒情言志等作用,服务于故事的叙述,在整个叙事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不同的主从关系成为本事与传奇最显著的区别。

第二,本事中的诗为诗人之诗,传奇小说中的诗多为故事作者所作。诗歌本事和传奇小说中的诗歌都是故事中人物所作,但性质不同。本事叙诗歌在创作、欣赏和流传中的故事,因而具备以下性质:其一,诗人为实有,而非虚构。其二,诗为诗人所作,而非出于依托。传奇中的诗多不具备以上性质。首先,故事中的诗作者多为虚构性人物,传奇中神仙鬼怪吟诗作赋者自不必说,一些采用现实描写的传奇小说中的人物也并非实有,如元稹《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张生等。人物既为虚构,则其诗作自当出于小说作者。其次,故事中诗作者虽实有,但诗歌实非其所作,志怪传奇多此类情况。如李景亮的传奇小说《李章武传》,小说叙李章武与王家子妇鬼魂相会,欢若平生,后各赠物赋诗,以志永诀。小说中李章武,实有其人。据《太平广记》卷三四一所引《乾膺子》,章武贞元中进士及第,曾在东平节度使李师古幕。又据《本事诗·事感第二》,大和末章武为成都少尹。这篇小说以真实人物为描写对象,但其中人与鬼魂冥合一节出于虚构,所谓李章武答诗,显非事实,诗乃依托,其“著作权”属传奇作者李景亮。本事故事虽也存在细节不真实的情况,但诗歌并不以不实细节为前提,而是与真实的情节相表里,因而部分细节的失实或虚妄并不影响诗作的真实性。如《本事诗》中崔护题都城南庄一事,其中村女因情而死、因感而生一节出于本事作者虚构,但诗歌并不涉及这一情节,不以此为背景,因而这一情节的虚拟性并不影响诗的真实性。该诗不过写两次郊游见到的不同情景,其事并无虚构之嫌,诗属崔护作。

唐诗本事中有很多记载鬼神怪异的故事,如《本事诗·征异第五》记幽州衙将亡妻孔氏显灵题诗及马植月夜闻吟而竟为诗讖的故事,《云溪友

议》卷上还记载王轩因题诗而与西施亡魂相会的故事。此类故事,就其文体而言,均可归入志怪小说。但是,这种具有志怪色彩的唐诗本事与诗事结合的志怪小说并不完全相同,并非所有诗、事结合的志怪故事都可算作唐诗本事。唐人相信鬼神怪异的存在,一般来说,本事是指那些虽是奇闻异事而作者信为实有的诗歌故事,那些着意好奇、情节荒诞的诗歌故事只能作为志怪小说,不能归入唐诗本事。牛僧孺《玄怪录》中《元无有》叙故杵、烛台、水桶、破铛幻化人形吟诗作赋的荒诞故事,因着意虚构而与一般志怪小说的记实态度有所不同。鲁迅曾就《玄怪录》的创作特色指出:“其文虽与他传奇无甚异,而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盖李公佐、李朝威辈,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至僧孺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①事既有意虚构,诗也显为依托,这种“不求见信”的志怪小说与本于写实态度的诗歌本事有所不同,因而此类诗、事结合的志怪小说不应纳入唐诗本事范畴。

以上标准虽然较为明确,但也只是一个近似的区分,落实到具体的唐诗本事和志怪、传奇小说,有时又难于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只能作全面的权衡和综合的判断,有时在确定本事的研究对象时还需考虑研究的需要。

与本事文体接近而又必须区分的第三类文体是谶语。《全唐诗》卷八七五专录谶记,很多是纯粹的谶语。这些谶语都是有事有韵语,在形式上与唐诗本事中的诗谶接近,有时甚至难于分辨,所以有厘清的必要。

一般来说,纯粹的谶语多寓天下的兴亡,社会的剧烈变迁,多与政治的顺逆有关。在形式上,谶语通常用隐语,它们利用汉语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和修辞上的特殊性,采用谐音、离合、双关等语言表达方式。《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安禄山古谶,文云:“逆胡将乱于中原,梁朝志公大师有语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三句谶语预见安禄山的叛乱及败亡,运用隐语,是纯粹的谶语。

与此不同,诗谶则直接叙事写景、抒情言志,运用诗歌语言。如马植

^① 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闻白衣人吟诗事^①,元载败亡诗讖^②,段文昌经兴元山寺诗讖^③。还有一些诗讖原是诗句,后附会成为讖语,如《本事诗·征咎第六》记载:“崔曙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试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本事中“夜来”两句本是诗句,初非讖语,后来经人附会才成为讖语。同样的情况还有高骈《风筝》诗讖^④,等等。

纯粹的讖语有时以民谣的形式出现。《全唐诗》卷八七八《谣》收录民谣,一些民谣,特别是其中的童谣,有的预示凶吉,是纯粹的讖语。此类民谣虽也大多有“事”为背景,但本书不拟归入唐诗本事的研究范围。

三、本事的文本认定

唐诗本事以不同的文本形式存在,这些文本形式不仅体现唐诗本事的体制特点,而且对宋人诗话、诗选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认识唐诗本事的文本形式是深入研究唐诗本事的前提。

唐五代最重要的诗歌本事专集是《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抒情集》今已散佚,虽保留一些佚文,但已不是原有的文本,只有《本事诗》和《云溪友议》基本保存了原有的文本形式,因此,本书以这两部本事专书中的本事文本为参照,对本事的文本形式作一考察。

本事的文本形式首先涉及诗与“事”的联系方式,即二者的对应归属关系。

唐诗本事中诗与“事”的对应归属关系是多样、复杂的,但归结起来,有两种情况:一是凡诗均有本事,二是部分诗有本事。第一种情况又有三种类型:一是一诗一事,二是一事数诗,三是数诗数事。

第一种类型是本事最基本的文本形式,《本事诗》收录本事 39 则,其中 26 则属于这种形式。

① 见《本事诗·征异第五》。

② 见《太平广记》卷三七引《玄怪录》。

③ 见《中朝故事》。

④ 见《北梦琐言》卷一。

第二种类型也较为普遍。属于此一类型的,《本事诗》中有顾况红叶题诗和刘禹锡游玄都观诗事。前者叙顾况与诗友于苑中流水上得梧叶题诗。明日,顾况题诗叶上,放于波中。后十余日,有人又于叶上得诗,以示顾况。后者叙刘禹锡自朗州召还长安,游玄都观,作《赠看花诸君子》诗,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诬其有怨愤,后出为连州刺史。大和二年入京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因作《重游玄都观》诗。这两则本事叙事均首尾一体,一事数诗。不同的是,后一则本事中的诗均为刘禹锡作,而前一则本事中的诗分别为宫女和顾况所作。

第三种类型数诗数事。如《本事诗·情感第一》“李相绅镇淮南”条记张又新感妓诗事及牡丹诗事。二诗分属二事,内容并无关联,因为诗事同属一人,故一体编排。这种情况在《云溪友议》中更为普遍,如卷上“襄阳杰”分别记载崔郊、戎昱感妓诗事,卷下“题红怨”收有顾况题红叶故事和卢渥得红叶题诗故事。这些诗事在流传过程中原是各自独立的,因为故事内容相近,或事涉一人,所以本事作者一体编排,成为一种重要的本事文本。

本事文本的第二种情况是文本内既有有“事”之诗,又有无“事”之诗。《本事诗·高逸第三》“杜(牧)为御史”一条,首记杜牧赴宴吟诗一事,后续记云:“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后又题诗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本事共收录杜牧诗三首,只有赴宴所吟一首有本事,自“杜登科后”以下,已脱离原有本事,纯为录诗。这种情况在《云溪友议》中也同样存在,卷下“和戎讽”一条记戎昱《咏史》诗事,后附录项斯《长安退将》诗及苏郁咏和亲诗。单独来看,“有诗无事”部分已不具备本事文体的基本特征,但这些部分均自本事主体部分衍生而来,在内容上与主体部分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因文衍生的形式在唐诗本事中较为普遍,到五代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后来对宋人诗话和诗选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衍生部分应该作为本事文本的组成部分。

本事的文本形式还涉及本事中与诗、事相关的议论文字。

本事是诗与事的结合体,就其文体而言,只能归入叙事一体。但是,

也有一些本事在叙说诗事、载录诗歌的同时还掺杂若干议论文字,这些议论文字与作为叙事组成部分的故事人物的议论有所不同,它们是本事作者的直接议论。通常情况下,本事作者只是一个叙事人,他居于幕后,对故事作客观冷静的描述,他的观点隐藏在故事的叙述之中。但是,有些本事作者对本事有独到的见解,他们已不能满足纯客观的叙事态度以及间接的发言方式,有时不免站到前台,对本事中的人物、事件、诗歌等直接发表议论。《本事诗》和《云溪友议》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议论文字:

贺(知章)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本事诗·高逸第三》)

昔张茂先谓陆机曰:“君家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又见褚生。”故知吴门之德不孤,川渎之珍不匿矣。予以宋、齐已降,朱、张、顾、陆,时有奇藻者欤?(《云溪友议》卷中“吴门秀”)

(张)祐、(崔)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畅此时之意也。(《云溪友议》卷中“薛雍氏”)

杜牧舍人云:“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带风。”滕郎中又云:“陶令门前胃接离,亚夫营里拂朱旗。”但不言“杨柳”二字,最为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旁亭子》诗云:“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道者杖藜归。”不谓“亭”,称奇矣。(《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黹”)

近日举场为诗清切,而鄙元和风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

以上引录乃其要者。这些议论文字,或资考证,或论人物,或辨诗法,或言诗风,通常因事感发,附事而行,多为点评式批评和随机性议论。这种内容广泛、形式灵活而又笔调轻松的议论性文字虽与叙事文字体制不同,但与叙事密不可分,通常成为本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本事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本事作者的学者化以及本事写作时作者主体意识的增强,本事的议论化倾向在唐末五代呈蔓延之势,并进而成为宋人诗话议论的萌芽

和先导。因此,将议论性文字作为本事文本的一部分,由此探讨议论的特征及其影响,应是本事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对本事的定义、本事的文体及文本形式作出澄清和规定之后,还需要对本书的任务及全书结构作一简要说明。

唐诗本事是唐人说诗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独特文体,唐诗本事有自己的体制特征,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对后世文体、著述的影响,因此,追索唐诗本事的文体来源、发展演变,揭示其体制特征,是唐诗本事研究的首要任务。唐诗本事兼具小说和诗评性质。作为小说,后世一直将唐诗本事作为唐代诗歌文献,用以考订诗人生平,辑录诗歌,解读诗作,等等。但是,作为诗歌文献,唐诗本事又真伪杂存,载述不一。因此,对唐诗本事作全面的文献考察应该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诗评,唐诗本事体现了唐人的诗评观念、诗歌创作习尚及诗学观点,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因此,开掘唐诗本事的诗学蕴含同样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本书以全面考察唐诗本事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上述唐诗本事研究课题均有涉及。《源流篇》考察唐诗本事的文体来源及其发展演变,《体制篇》考察唐诗本事的体制特点,《诗艺篇》探讨唐诗本事的诗学意义,《考证篇》考订唐诗本事的真伪异同。各篇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互为依托,实为首尾一贯的有机整体。

第一编 源流篇

本事从何而来,怎样演进变化,又走向何方?这一纵向审视和宏观把握,对于唐诗本事研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本篇拟从文体角度讨论本事的来源、演变及其对宋人诗话、诗选和小说的影响,从而力图回答上述问题。

第一章 本事的渊源流别

笼统地说唐诗本事的渊源,似有很多头绪,如《孟子》说诗,《左传》诗本事,《诗序》以及六朝诗歌故事,等等。但从文体角度而言,唐诗本事的直接来源无非有二:一是汉代诗学著作,二是唐前文言小说。前者为学术的一支,后者为文学的一支,正是这两大支流的交相融汇,对唐人说诗产生深刻影响,才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唐诗本事的独特景观。

第一节 汉代诗学的回响

清代钟骏声《养自然斋诗话》自序在探讨诗话起源时曾说:“诗话权舆于小序,滥觞于《韩诗外传》,其名则始于宋。”钟氏大约认为诗话最初多记载诗事,而此一体例,追根溯源,乃出于小序和《韩诗外传》。钟氏此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就记事性诗话而言,推求远源,其说不无道理。宋初诗话多记诗事,其体例直接源出唐诗本事。若将钟氏推求诗

话本源之说移之以言唐诗本事,倒不失为一种颇有灼见的确论。

汉人说诗,有鲁诗、齐诗、韩诗及毛诗四家,前三家为今文,汉时立于学官,故当时盛行于世。毛诗为古文,因为后出,未能立于学官,故当时不信。汉代以后,古文经学兴起,今文经学式微,三家诗逐渐亡佚,而毛诗独行于世。唐代初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于是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颁其所定之本行于天下,令学者研习。后孔颖达据颜师古《五经定本》撰成《五经正义》,对儒学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颜师古考定《五经》时,《诗经》取毛诗郑笺,毛诗有《序》,因而包括《诗序》在内的毛诗成为当时士人的必读书,对唐人的学术思想及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诗序》的作者,历来聚讼纷如,莫衷一是。郑玄《诗谱》认为大序为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王肃《孔子家语》注以为子夏所序诗即《毛诗序》,《后汉书·儒林传》载为卫宏作,至《四库全书总目》,又“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萇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①子夏序诗之说,后世信从者不多,其他观点虽多歧异,但一般认为《诗序》为汉人所作。所以《诗序》可以视为汉代《诗》学的代表著作。唐代除流行毛诗外,据《旧唐书·经籍志》,尚有《韩诗》二十卷、《韩诗外传》十卷流传。今文经学到唐时尽废,而《韩诗》及《韩诗外传》独存,毫无疑问,《韩诗》,特别是流传至今的《韩诗外传》,对唐人当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诗序》和《韩诗外传》对唐诗本事的影响既是潜在的,又是显明的,本事中诗与事的结合方式及文本结构均部分源出这两部汉代诗学著作。这种继承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实:

一、引事明诗

汉人解《诗》,按其体例,有故训,有传序,或释字词,或求意旨。阐释意旨的,有本义,有旁义,而序《诗》的目的,在于推求本义。《诗序》记载了大量的诗歌本事,按照《诗序》作者的理解,《诗经》中的诗篇多为感事而作,而明其本义,必先推原本事,因而引事明诗成为《诗序》解诗最重要的方法。这种方式在《国风》中运用得最为普遍,如下面一些《诗》序: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诗序》。

《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毛诗正义》卷二之一《邶风·击鼓》）

《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二之三《邶风·新台》）

《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毛诗正义》卷三之一《鄘风·柏舟》）

《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毛诗正义》卷三之一《鄘风·定之方中》）

《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三之二《鄘风·载驰》）

《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三之三《卫风·河广》）

《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三之三《卫风·木瓜》）

《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四之一《王风·黍离》）

《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毛诗正义》卷四之二《郑风·将仲子》）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四之二《郑风·清人》）

《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六之四《秦风·黄鸟》）

《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毛诗正义》卷七之一《陈风·株林》）

上引《诗》序都是叙说故事，说明诗作背景，交代写作缘由，从而揭示诗旨。《诗序》叙说诗歌本事，虽言之凿凿，却颇多穿凿牵强之处，所以后世学者多不相信《诗序》的解说，以为非其本义。但是，这是属于解《诗》内容的问题，并不改变《诗序》引事解诗的性质。

《诗序》的这一性质对唐诗本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本事诗》序云：“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贻诸好事。”认为本事中的诗都是“触事兴咏”的“抒怀佳作，讽刺雅言”，本事的目的在于“发挥”诗事，阐明“厥义”。该序还模仿《诗序》中“四始”的说法而将本事诗分为七类，又径称本事为“小序”。可见，《本事诗》的编者孟棨已经注意到唐诗本事与《诗序》在引事解诗这一功能上的一致性，并把二者联系起来。唐诗本事的內容形式都极为丰富，孟棨在文体上将本事完全纳入《诗序》的范畴，未免以偏概全；但他意识到本事的解诗功能，并追踪蹊迹，达于《诗序》，则无疑是敏锐的。唐诗本事中有很多这种引事解诗的例证，其中《本事诗》选录最为集中。如《情感第一》记载，宁王曼自恃贵盛，强取宅左卖饼者妻。后其妻见其夫，双泪垂颊，若不胜情。王命文士赋诗，王维于是作《息夫人》。《怨愤第四》记载，宋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因齿疾口臭，武后不许，于是作《明河篇》以见其意。吴武陵为刺史时，因赃罪而遭鞠讯，幕吏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借雀飞以讥刺。开元末，李适之因李林甫排诬罢相，门庭冷落，意愤而作《罢相》。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列，李林甫嫉之若雠，九龄作《海燕》诗以致意。贾岛因执政恶之而下第，怨愤已极，作蔷薇诗以泄愤。这些本事都是引事解诗的明证。

如果说那些具有叙事性质或直接抒情的诗歌需以本事明确事件细节、说明情感因由的话，那么，一些寓意深婉的咏史、咏物诗则需以本事揭

示诗中寓意。比较而言,后者对本事的依赖更为明显。在上述本事中,除李适之《罢相》诗外,其余几首诗或咏史,或咏物,若不交代本事,则诗意难以究诂,而本事则直接起到揭示诗旨的作用。类似情况如《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中,章孝标《归燕》诗及欧阳澥《燕》诗以燕飞喻士人辗转于科场功名,《鉴诫录》卷二“逸士谏”咏史以谏君王皇后,卷三“落韵贬”咏物以泄怨愤,卷五“因诗辱”借景以刺残暴。这些诗歌无不托讽深婉,寓意隐约,只有参照本事,才能明其诗旨。

《诗序》的说诗方法对唐诗本事的影响,还可从另一个侧面得到证实。《诗序》中引事明诗的方式与汉人注重诗的美刺讽谕的诗学观点密不可分。汉代诗学强调《诗》的政教作用,认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①。美刺讽谕既是汉人的诗学理想,又是汉人的解《诗》指向。前文引述的12则《国风》中的《诗》序,有8则主美刺讽谕,可见诗主美刺的观点对汉人说《诗》的巨大影响。在《诗序》中,美刺的观点通过引事明诗的解读方式体现。显然,只有推原本事,才能明确美刺的具体内容及其意义。这是引事明诗成为《诗序》说诗方式的重要原因。这种引事明诗从而揭示诗之美刺的倾向在唐诗本事中也有充分体现。《本事诗·怨愤第四》专门载录怨刺诗事,前之所述即该部分全文。这些故事虽受唐前小说中“忿狷”一类故事的影响,但其中诗歌颇涉政教,其渊源仍为《诗序》。此外,前引《鉴诫录》中的诗事也都隐含怨刺,与此性质相同。这类故事虽然在唐诗本事中只占少数,但毫无疑问,它们从一个侧面说明本事的解诗方式确实源出《诗序》。

二、引诗证事

明人王世贞曾就《韩诗外传》的说《诗》体例发表过极为中肯的意见,他说《韩诗外传》“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说至确”^③。那么,什么是“引《诗》证事”呢?《汉书·

① 见《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② 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二《读韩诗外传》。

③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韩诗外传》案语。

艺文志》曾对汉人说《诗》作过这样的说明：“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清代陈澧曾指出，“采杂说，非本义”盖专指《外传》而言。^①这一认识当是基于对《韩诗外传》的实际考察，因为“采杂说，非本义”正是《韩诗外传》的说《诗》特征。这一特征可从阿谷处女一事中窥见一斑。《韩诗外传》卷一记载，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有女子临水浣衣。孔子抽觴以授子贡，令“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向前乞饮，女子受觴挹流，坐置之沙上，谓“礼固不亲授”。孔子又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子贡对女子说：“于此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女子回答：“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后孔子抽絺纁五两，以授子贡，子贡想献给女子，女子厉辞以拒绝。文末云：“《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这段故事后来引起广泛的批评，其中洪迈诋之最甚：“观此章，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可乎？其谬戾甚矣！”^②洪迈批评此章事理悖谬，主要基于道德的判断，并未涉及此事的真伪问题。早于《容斋随笔》的《孔丛子》则揭示此事之伪：“平原君问子高曰：‘吾闻子之先君南游过乎阿谷，而交辞于漂女，信有之乎？’答曰：‘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是殆假其类以行其心者之所为也。’”^③可见此事出自假托，不足为凭。以此说《诗》，自非《诗》之本义。《韩诗外传》说《诗》多类此，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韩诗外传》提要谓“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

这种牵引说《诗》的方式在春秋时期极为普遍。此一时期，表情达意，陈说己见，常常援引《诗》句，引《诗》说事是常用的表达方式。《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引卢蒲癸之言说“赋诗断章”，《左传》所载当时君臣赋诗都是断章取义。这种说《诗》方法后来成为儒家说《诗》的正宗。《论语》就有两则这样的说《诗》片段：

① 见《东塾读书记》卷六。

② 《容斋随笔》续笔卷八“韩婴诗”。

③ 《孔丛子·儒服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前一章引《诗》句言精神境界的提升，后一章借《诗》句喻礼之成立。前者伪孔传云：“子贡知引诗以成孔子义。善取类，故然之。”^①后者包咸注云：“孔子言子夏能发明我意，可与共言《诗》。”^②都指出孔子弟子能引《诗》证义，为善言《诗》者。同样的说《诗》，在《礼记》的《坊记》、《中庸》、《表記》、《缁衣》、《大学》中也多有记载。可见孔门言《诗》，并不注重《诗》的本旨，只是把《诗》作为申述己意的载体，“赋《诗》明志，不自陈说”。^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④则直以《诗》为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孔门说《诗》的这种倾向至汉代仍有广泛影响，汉人说《诗》中的《外传》一体正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前人以《韩诗外传》说《诗》为“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⑤这一说《诗》旨趣与《诗序》完全不同，《诗序》虽也误执《左传》引诗之体，所采已多非本事，但其标举的说《诗》旨趣却是推求诗歌本旨。可见汉代出现了以《诗序》和《韩诗外传》为代表的两大说《诗》倾向，即王世贞所说的引事明诗和引诗证事。二者的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以诗为中心，事乃发明诗义；后者以事为主体，诗乃发挥事义。

以《韩诗外传》为代表的引《诗》证事的方式后来蔓延到小说领域，进而对唐诗本事产生深刻影响。南朝梁时任昉《述异记》中的二则故事沿

① 《论语注疏》卷一。

② 《论语注疏》卷三。

③ 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第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论语·季氏》。

⑤ 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第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用了这种诗、事结合的方式：

东北岩海畔有大石龟，俗云鲁班所作。夏则入海，冬复止于山上。陆机诗云：“石龟尚怀海，我宁忘故乡。”（卷下）

相州栖霞谷，昔有桥、顺二子，于此得仙，服飞龙一丸，十年不饥，故魏文诗曰：“西山有仙童，不饮亦不食。”即此也。（卷下）

《述异记》为小说，这两则故事当然以叙事为主体，诗句仅为故事提供佐证，因此合于引诗证事的体例。不过，两处引用的并非《诗》句，而是后世诗人的诗句，而且诗句为故事提供直接佐证，诗、事如一，这两点又与《韩诗外传》有所不同，因此，这两篇故事可视为从《韩诗外传》到唐诗本事的过渡环节。

唐诗本事引诗证事之例可略举如下数则：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中朝故事》）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唐摭言》卷一〇）

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餘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因话录》卷五）

昭宗之代，岐王茂贞、华州韩建、邠州王行瑜等始为乱阶，焚蕪官闾，动摇四海，斩刈百官。是时驾幸三峰，抛离九庙，诸侯悉罢贡职，各养强兵。天复初，车驾走幸石门，绝粮数日。左街沙门怀宝进荞面烧饼，奉宣赐紫。官人杨舞头进裹泪手帕子，奉宣加楚国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荞麦，人收食之，悉遭疫病。是岁，雷劈牛马，频扰官城，

拔出街西古槐，扬下殿东鸱吻。故昭宗御制诗曰：“祇解劈牛兼劈树，不能诛恶复诛凶。”（《鉴诚录》卷一“走车驾”）

以上本事都以叙说故事为目的，文本的意义在于故事本身，就是说，叙事是独立自足的，并不以诗歌的存在为前提。相反，诗歌从属于故事，引用诗歌是叙事的需要，是为故事提供证据。显然，这种引诗证事的本事与那些纯粹交代写作背景、以解读诗歌为目的的本事完全不同。属于这种证事体制的还有体近传奇小说的《苗夫人》^①和《陶岷》^②等。

引诗证事倾向在唐诗本事中的表现不完全相同，有的鲜明直接，有的隐约曲折，有的诗、事吻合，有的诗、事相悖。上引数条，以诗证事，诗、事吻合，意义明确。但也有一些本事，诗与事本无关联，本事叙述的诗、事关系出于穿凿或曲解，此类本事引诗证事的倾向较为隐约曲折。《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载：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随泪下。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与妓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本事诗·情感第一》）

文中所引戎昱诗又见《全唐诗》卷二七〇，题作《移家别湖上亭》。从诗题和诗中内容看，此诗与送妓一事毫无关联。《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也载有同一故事，但《本事诗》中之“韩晋公”（韩滉），《云溪云议》易为于

① 见《云溪友议》卷中。

② 见《甘泽谣》卷中。

頔。戎昱诗也完全不同,诗云:“宝钿香蛾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诗、事吻合。两处记载为一事两传,但在一种传说中,戎昱感妓诗曾一度失落无考,《本事诗》的故事作者当因《移家别湖上亭》诗中有“好去”、“离情”、“欲别”等语,附会穿凿,引以为据,并据诗题及诗意,又对有关故事细节预作设定,如“昱不敢留,钱于湖上”云云,企图自圆其说。但是诗与事本无关联,此一作法不能自掩其迹。可见,《本事诗》的记载是先有故事,后证以诗,属引诗证事之体。

此外,《北梦琐言》卷二记载:

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

本事所引温庭筠诗出自《李羽处士故里》,诗云:“柳不成丝草带烟,海槎东去鹤归天。愁断段处春何限,病眼开时月正圆。花若有情还怅望,水应无事莫潺湲。终知此恨销难尽,辜负南华第一篇。”^①则此诗乃伤友人李羽之作,尾联自叙感伤之情,实与问事对事一事无涉。除以上两例外,《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所载段成式诗“曾话黄陵事”四句本事也是诗、事不符的证诗之例^②。

以上三例本事均用引诗之体,但断章曲解,诗、事不符,代表了唐诗本事引诗证事的另一种类型。

① 《全唐诗》卷五七八。

② 本事引李群玉《黄陵庙》诗,述李群玉与娥皇、女英相会事。文中李群玉“题二妃庙诗二首”,《全唐诗》卷五六九及五七〇均题作《黄陵庙》,前一首为吊古之诗,写一时见闻;后一首写棹女轻舟,是即景即事之作,内容与二妃故事无关。第三首诗《全唐诗》题作《题二妃庙》,诗中“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两句写庙前景象触发的联想。本事中人神相遇故事当即由此附会而来,文中所谓“云雨之游”也当由“行云”等语化出。这本是一段荒诞不经的艳想故事,但本事作者欲坐为事实。文末引段成式诗云:“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诗中“黄陵事”已不可考,但决非本事所谓人神相遇之事,引此诗为证,似是而非。

三、诗歌后置

本事是诗与事的结合,从叙述角度看,在本事中,诗与事有其先后顺序,这种诗与事的叙述顺序,我们称为本事的文本结构。唐诗本事体制不一,形式多样,其文本结构并无一定体式。但是,一些本事采用诗歌后置的形式,成为唐诗本事文本结构的一大特征。

在有事有诗的叙事文体中,诗的位置通常取决于情节发展的先后顺序,根据情节的发展,诗歌自然在后,这是叙事文体的通例。而一些本事诗歌后置的形式与这种根据叙事需要采用诗歌自然在后的形式完全不同。如前引戎昱感妓诗本事,根据叙事文体的通则,感妓诗应置于“为歌词以赠之”之后,但其实置于文末。又《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载,太和初,有分司御史,其妓善歌,时称尤物。太尉李逢吉闻而延请,妓盛装而往。李命众妓与相见,既入而不复出。御史“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后引其诗。按照情节的发展和顺叙的要求,诗歌正文本应置于“为诗两篇投献”之后,现在诗歌后置,其叙述缺乏连贯性,显然偏离一般叙事文体的通例。除《本事诗》外,其他著作,如《云溪友议》、《鉴诫录》等,也多有此类本事:

慎氏者,毗陵庆亭儒家之女。三史严灌夫,因游彼,遂结婚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秋,无胤嗣。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诗凄感,遂为夫妇如初。云溪子曰:曹叔妻叙《东征》之赋,刘伶室作《诫酒》之辞;以女子之所能,实其罕矣。爰书薛媛之事,斯可附焉。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云溪友议》卷上“毗陵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邓仙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洎死,自京辇归,葬是山,是谓“尸解”也。然悉为丘垅,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姥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官?”(《云溪友议》卷上“灵丘误”)

雍使君陶典阳安日,送客至桥,离情未已。揖让既久,欲更前车。客将曰:此处呼为情尽桥,向来送迎,至此礼毕。陶下马命笔,题其桥楹,改为折柳。自兹送别咸吟是诗,简郡风情,不革义路矣。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从他离恨一条条。”(《鉴诫录》卷八“改桥名”)

此类本事,《鉴诫录》中还有卷七“贻旧诗”等。除《本事诗》外,《云溪友议》和《鉴诫录》是现存自觉收录唐诗本事且收录最为集中的两部著作,和《本事诗》一样,其中本事体现了唐诗本事的文本特点。上引四则本事不过略举一二,类似本事数量不在少数。可见,唐诗本事中诗歌后置的文体结构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这种诗歌刻意后置、偏离叙述通例的作法其实是受了《毛诗》的影响。传世的《毛诗》是序文在前,正文在后。但据郑玄说,诸序文原合为一编,毛公始分而置于篇首。按古之文法,诗文序必附于文末,《毛诗》超冠篇端,实为创体。毛公将《诗》序置于篇首,“引以入经”^①,因而序与正文浑然一体。但是,序文究竟不是正文内在的组成部分,而是附属文字,这样,序与正文之间出现明显的叙述断裂,文气也不连贯,未能形成血肉相连的有机整体。这种情况在《豳风·东山》序中表现得非常分明:

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也。说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东山乎。

此下乃诗之正文。序文除叙说诗作本原外,还概述诗作大意,事与诗之间有议论阻隔,从叙述角度而言,事与诗联系松散,缺乏首尾一贯的文气。

前文已经指出,唐诗本事因诗歌刻意后置,叙述缺乏连贯性。从上面对《毛诗》的解读可知,这一文本特征其实是《毛诗》文本结构的延伸,正

^① 朱熹《诗序辨说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是《毛诗》文本结构的惯性使唐诗本事偏离了一般叙事文体的叙述轨道，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一般叙事文体的文本结构。

第二节 文言小说的支流

如果说汉代诗学著作在诗与事的联系方式上成为唐诗本事的模仿对象，那么，唐前文言小说则是唐诗本事作为叙事文体的来源。

怎样认识唐诗本事的文体性质，这也许是这一研究领域涉及最早、关注最多的议题之一，前人对《本事诗》、《云溪友议》及《抒情集》的文体认定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这三部唐诗本事的专门著作中，《云溪友议》一直列入历代书目的小说类。《本事诗》和《抒情集》虽多列入总集类，但宋人编小说集《太平广记》和《类说》时，已收录《本事诗》，王说《唐语林》序目也列为小说家，明人胡应麟进而认定：“究其体制，实小说家者流也。”^①《抒情集》在《遂初堂书目》中已入小说类，葛立方《韵语阳秋》径称其为小说^②，胡应麟《诗数》外编卷三还说：“卢瓌有《抒情集》，亦《本事诗》类也。”应该说，前人对以《本事诗》等为代表的唐诗本事作为小说文体的认识是趋于一致的。这一认识后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本事诗》出于笔记小说”，这一说法可以视为对前人观点的回应和总结。

但是，对唐诗本事文体性质的认识，目前还停留在较为空疏的概念化阶段，缺乏深入的探讨和具体的分析，本文拟从本事的文体来源、文体特征及故事特质三方面作进一步探讨，以期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认识。

一、本事的另一来源

六朝有大量的说诗故事，它们后来成为唐诗本事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这类故事为数不少，现撮其要者引述如下：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

①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

② 《韵语阳秋》卷一九谓“小说卢瓌（当作‘瓌’）《抒情》”。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世说新语·文学》）

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嵇）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咨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世说新语·豪爽》）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世说新语·排调》）

《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钟嵘《诗品》卷中）

文惠太子在东宫，作“两头纤纤”诗，后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长王宰相相继薨，二宫晏驾。文惠太子作七言诗，后句辄云“愁和谿”，后果有和帝禅位。（《南齐书·五行志》）

柳恽字文畅，河东解人也。……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琊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梁书·柳恽传》）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颜氏家训·文章》）

同《诗序》和《韩诗外传》相比，这些说诗故事与唐诗本事更为接近，其渊源关系也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说诗内容接近。这些说诗故事在内容上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说明写作背景及写作缘起,揭示诗歌意旨,如曹植、嵇康、袁羊的咏诗故事。二是描述创作过程及其状态,如《诗品》所引《谢氏家录》中谢灵运梦得佳句的故事。此一故事虽未超出诗歌创作的范围,但也止于描述创作的进行,而不交代创作的发生,内容侧重于诗歌的构思,特别是字句的锤炼,而较少涉及诗歌意旨。三是记载诗歌的品评与欣赏,如王处仲对曹操诗歌的沉迷及时人对柳恽、王籍诗句的欣赏。此外,还有《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的袁宏月夜诵诗而为袁尚所知的文坛佳话。这类故事在六朝多有流传,反映了时人对诗歌的爱好和崇尚。一般来说,《诗序》解诗,仅限于说明写作缘起,揭示诗歌本旨,而并不涉及上述后两项内容。比较而言,六朝说诗故事与唐诗本事更为接近,内容也更符合前文对本事的界定。

第二,说诗范围相同。《诗序》序《诗》,揭示诗歌本旨,乃依据全篇,没有仅就个别诗句所作的解说。六朝说诗故事则完全不同,上引八则故事,有七则是片言单句的故事,并不涉及全篇。从《诗序》到六朝说诗故事,说诗范围大为扩展,说诗对象已由单一的全篇延伸到片言单句,前文引述具有代表性。唐人继承了六朝说诗的传统,也将片言单句纳入说诗范围,因而唐诗本事中出现大量有关诗句的故事,《本事诗》及其他唐宋笔记对此类故事多有载录。需要指出的是,《本事诗》对此类故事的文体特征的判断极易引起误解。序云:“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似乎此类故事源于《诗序》,属于《诗序》性质,但由前文例证可知,此类故事实自六朝说诗故事演变而来,与《诗序》并无关联。

第三,故事形态类似。在六朝说诗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唐诗本事的若干母题及故事形式。《本事诗·嘲戏第七》专记唐人以诗相谑的故事,而同类故事在六朝说诗中即已存在,如前文所引袁羊嘲戏刘恢的故事,还有孙皓戏晋武帝^①及何点、张融作诗互嘲的故事^②。《本事诗·征咎第六》记刘希夷、崔曙诗讖故事,而前引文惠太子诗讖事亦属同类。《诗品》引

① 见《世说新语·排调》。

② 见《梁书·何点传》。

《谢氏家录》记载谢灵运梦得文思故事,这段故事后来广为流传,成为钱起夜闻鬼谣故事的直接来源。可见,六朝说诗故事早已孕育了唐诗本事的重要母题和故事形式。唐诗本事不仅不断重复六朝说诗故事已有的母题,而且不自觉地复制前代故事中的重要情节。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记载,王湾词翰早著,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题诗堂壁一节与《梁书·柳恽传》记载的琅琊王元长书柳恽诗于斋壁的情节类似。

以上三点试图说明六朝说诗故事与唐诗本事的渊源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唐诗本事源于文言小说,但实际上六朝说诗故事与文言小说并不完全等同。以前引故事为例,这八篇故事,除出自小说者外,有的出自杂传,如嵇康故事出自《文士传》;有的出自正史,如柳恽故事出自《梁书》本传;有的出自子部杂家著作,如王籍诗故事出自《颜氏家训》。可见,六朝说诗故事的文体来源较为复杂,需作具体分析。但是,这种文体歧异并不妨碍我们对六朝说诗故事文体性质的总体把握。杂传、子部杂家著作以及六朝正史大多杂采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属于小说家言,因此,不能把出自这些著作的故事同小说对立起来。判断此类故事的文体性质,不能单纯依据故事直接的文体来源,还应考察其原始文本的文体性质。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说本事源出于小说,这是大致不错的。

二、本事的文体特征

唐诗本事来源不一,载录本事的著作性质不同,文体各异,这给唐诗本事的文体认定带来了困难。但是,只要找出唐诗本事出自哪些著作,并对这些著作的文体进行分析,就可以对唐诗本事的文体性质作出切实的考察。

前文已述及,唐诗本事专书《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属于小说。虽然《本事诗》和《抒情集》在历代目录著作中多归入总集类,但这种归类主要是从功能着眼,而不是从文体考虑,故考察这两部书的文体,不能以此为依据。《本事诗》多采录其他文献,或一事两传,为同期其他文献所采录。我们可以从分析这些文献的文体性质入手,考察《本事诗》的文体性质,下面是《本事诗》采录其他文献或另见其他文献的情况:

《本事诗》条目	采录或另见的其他文献
乔知之《绿珠篇》本事	《隋唐嘉话》卷下、《朝野僉载》卷二
顾况题叶故事	《云溪友议》卷下
戎昱感妓故事	《云溪友议》卷上
韩翃、柳氏故事	《柳氏传》
玄宗感李峤诗事	《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
许浑梦仙事 ^①	《逸史》
李白戏杜甫诗事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
张九龄《咏燕》诗事	《明皇杂录》卷下
李适之《罢相》诗事	《大唐新语》卷七、《明皇杂录》卷上
崔曙《明堂火珠》诗事	《明皇杂录》 ^②
刘希夷诗讖	《大唐新语》卷八、《刘宾客嘉话录》
长孙无忌、欧阳询互嘲	《隋唐嘉话》卷中、《大唐新语》卷一三、《乾膺子》 ^③
张元一戏武懿宗	《朝野僉载》卷四
沈佺期、崔日用撰词事	《景龙文馆记》 ^④
优人唱《回波词》事	《景龙文馆记》

可见,《本事诗》条目采录或另见的其他文献包括《隋唐嘉话》、《朝野僉载》、《云溪友议》、《柳氏传》、《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逸史》、《酉阳杂俎》、《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乾膺子》和《景龙文馆记》。这些著作中,《柳氏传》属传奇小说,其他著作的文体,可以参照历代书目分别加以考察。

① 许浑,《逸史》作许灏。

② 《太平广记》卷一九八引。

③ 见《绀珠集》卷七。

④ 见《唐诗纪事》卷九“李适”,《四部丛刊·初编》本。

书目 书名	《新唐书· 艺文志》	《崇文总目》	《郡斋 读书志》	《直斋书录 解题》	《宋史 艺文志》	《四库全书 总目》
《隋唐 嘉话》	杂 传 记 《国 朝 传 记》小说家 《 传 记》 ^①	传 记《国 朝 传 记》 三卷		小 说 家 一卷	小 说《传 记》三 卷 小说《隋 唐 嘉 话》 一卷 传记 《国 朝 传 记》三卷	
《朝野 僉载》	杂传记二 十卷	传 记 二 十卷	小说《补 遗》三卷	小 说 家 一卷	传 记 二 十卷	小说家杂 事六卷
《云溪 友议》	小 说 家 三卷	小说三卷	小说三卷	小说家十 二卷	小 说 十 一卷	小说家杂 事三卷
《明皇 杂录》	杂史二卷	杂史二卷	杂史二卷	杂史一卷	故事二卷	小说家杂 事三卷
《次柳氏 旧闻》	杂史一卷	传记一卷	杂史一卷	杂史一卷	故事一卷	小说家杂 事一卷
《逸史》	小 说 家 三卷	杂史三卷		小说一卷 又 传 记 一卷		
《酉阳 杂俎》	小说家三 十卷	小 说 三 十卷	小 说 三 十卷	小说家三 十卷	小 说 三 十卷	小说家琐 语三十卷
《大唐 新语》	杂 史 十 三卷	杂 史 十 三卷	杂 史 十 三卷	杂 史 十 三卷	别 史 十 三卷	小说家杂 事十三卷
《刘宾客 嘉话录》	小 说 家 一卷	传记一卷	小说一卷	小 说 家 一卷	小说一卷	小说家杂 事一卷
《乾馱子》	小 说 家 三卷	小说三卷	小说三卷	小 说 家 三卷		
《景龙文 馆记》	杂 传 记 十卷	传记十卷		传记八卷	故事十卷	

① 《隋唐嘉话》按其分合又称《传记》、《国朝传记》。

以上列表显示,这些著作在历代书目中属于小说、杂史、传记,收入《四库全书》的,一概归为小说,而且多入“杂事”一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小说家类”、“杂事之属”末案云:“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提要》对旧有的图书分类进行了调整,原来史部杂史中有关“朝政军国”的图书仍归入杂史,那些属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的图书则划入小说。应该说,这一调整是恰当的。

唐诗本事大多出自《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以外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种类更为繁多,文体也更为歧异。这些分散记载的本事占整个唐诗本事的大部分,其文体性质决定了整个唐诗本事的性质,因而必须全面具体考察。

唐代以后,采录唐诗本事最为繁富的著作是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该书基于诗人生平考订及诗作解读的需要,引录了大部分唐诗本事,到目前为止,这是一部收录最为广泛的著作。本书以《唐诗纪事》所收唐诗本事为依据,对散见各书的唐诗本事的文体性质作一全面考察。

本书参照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录出在《唐诗纪事》中有3篇以上本事引录的唐五代著作及正史24种,除正史《旧唐书》(《纪事》引录18条)、《新唐书》(《纪事》引录3条)及《续仙传》^①(《纪事》引录3条)外,其余21种著作在《唐诗纪事》中的引录数量及历代书目文体划分的情况可于下列表格概见^②:

① 《续仙传》,吴沈汾撰,传奇志怪集。《崇文总目》归入道书类,《新唐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归入道家类,《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归入神仙类。

② 有一文出自两种文献者,两处皆计入。

书 目 条 数 书 名		《新唐书· 艺文志》	《崇文总目》	《郡斋 读书志》	《直斋书录 解题》	《宋史· 艺文志》	《四库全书 总目》
《唐摭言》	67		小说 十五卷	小说 十五卷	小说家 十五卷	小说 十五卷	小说家杂 事十五卷
《北梦 琐言》	29			小说 三十卷	小说家 三十卷	小说 十二卷	小说家杂 事二十卷
《鉴诫录》	20			小说 十卷		小说 三卷	小说家杂 事十卷
《大唐 新语》	11	杂史 十三卷	杂史 十三卷	杂史 十三卷	杂史 十三卷	别史 十三卷	小说家杂 事十三卷
《酉阳 杂俎》	6	小说家 三十卷	小说 三十卷	小说 三十卷	小说家 三十卷	小说 三十卷	小说家琐 语三十卷
《朝野 僉载》	5	杂传记 二十卷	传记 二十卷	小说《补 遗》三卷	小说家 一卷	传记 二十卷	小说家 杂事六卷
《唐阙史》	5	小说家 三卷	杂史 三卷		小说家 三卷	小说一卷 (参寥子) 三卷 (高彦休)	小说家 异闻二卷
《杜阳 杂编》	5	小说家 三卷	传记 三卷	小说 三卷	小说家 三卷	小说 二卷	小说家 异闻三卷
《闽川 名士传》	5	杂传记 一卷	传记 一卷	传记 三卷	传记 一卷		
《景龙文 馆记》	4	杂传记 十卷	传记 十卷		传记 八卷	故事 十卷	
《隋唐 嘉话》	4	杂 传 记 《国朝传 记》三卷 小 说 家 《传 记》 三卷	传记《国 朝传记》 三卷		小说家 一卷	小说《传 记》三卷 小说《隋 唐佳话》 一 卷 传 记《国朝 传 记》 三卷	

《明皇杂录》	4	杂史二卷	杂史二卷	杂史二卷	杂史一卷	故事二卷	小说家杂事二卷
《国史补》	4	杂史三卷	杂史三卷	杂史三卷	杂史二卷	传记三卷	小说家杂事三卷
《玉泉子》 (玉泉笔端)	4	小说家五卷	传记五卷		小说家三卷 又别一卷	杂家一卷 小说五卷	小说家杂事一卷
《剧谈录》	4	小说家三卷	小说二卷	小说三卷		小说二卷	小说家异闻二卷
《卢氏杂说》	4	小说家一卷	小说一卷		小说家一卷	传记一卷	
《大唐传载》 (传载)	3	杂史一卷	传记一卷			小说一卷	小说家杂事一卷
《因话录》	3	小说家六卷	小说二卷	小说六卷		小说六卷	小说家杂事六卷
《刘宾客嘉话录》	3	小说家一卷	传记一卷	小说一卷	小说家一卷	小说一卷	小说家杂事一卷
《中朝故事》	3		杂史三卷	杂史二卷	传记二卷	故事二卷	小说家杂事二卷
《十国春秋》	3						载记 一一四卷

以上统计对照表明,这些著作的文体集中于小说、杂史、传记、正史和载记,除正史和伪史外,其他文体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一概归入小说家。属于正史和载记的,有《旧唐书》、《新唐书》和《十国春秋》,采入这些史著的唐诗本事就其文体来说其实与小说、杂史接近,甚至一些本事直接采自这些文体的著作。例如《旧唐书·李百药传》所载百药与太宗并作《帝京篇》事采自《大唐新语》;《旧唐书·崔善为传》所载时人嘲善为事亦见《大唐新语》;《旧唐书·钱徽传》所载钱起夜闻“鬼谣”事纯属小说家言。《新唐书·孟浩然传》所载浩然遇明皇诵“北阙休上书”诗事出自《唐摭言》和《北梦琐言》。《十国春秋》是清代吴任臣采择旧籍汇纂而成,《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云:“任臣以欧阳修作五代史,于十国仿《晋书》体例为载记,每略而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汇成是书。”其

中诗歌本事当出自杂史及小说。

以上分析证明,唐诗本事虽然出自不同文体的著作,但其基本文体属于小说,是唐代小说的一支。

三、故事的类型化倾向

唐诗本事中的故事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这是唐前志人小说和唐代杂事小说影响的结果。

南朝时期,小说开始出现以类编排的体例。南朝宋时刘敬叔《异苑》各卷大致以类编排,这一时期,刘义庆及其门下文士广事搜集,编成《世说新语》。该书按内容分类系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 36 篇。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类编方法不仅奠定了后世杂事小说的编辑体例,而且突现了这时志人小说的类型化倾向,为后世杂事小说确定了可资模仿的范型。唐宪宗元和时,刘肃采择唐 200 年间国史旧闻,撰成《大唐新语》13 卷。该书原名《大唐世说新语》,分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 30 个门类。书名既已沿用,体例亦有因袭,其中多数门类与《世说新语》类目近似,由下表可概见其对应分合关系。

《大唐新语》门类	《世说新语》分类
规谏 极谏	规箴
刚正 公直 清廉	方正
执法 政能 举贤	政事
忠烈 节义 孝行 友悌	德行
识量 知微	识鉴 雅量
聪敏	捷悟 夙惠
文章 著述	文学
隐逸	栖逸
褒锡	宠礼
谐谑	排调

类目的对应性体现故事的趋同性,唐人自觉以《世说新语》为范本,或从中吸取母题,借鉴形式,或以其中故事类型为参照,对流传的国史旧闻进行采择编录,经过不断模仿、复制,原有的故事类型进一步定型化。另一方面,唐人杂事小说中的一些内容又不能完全归入《世说新语》的故

事类型,唐人对其中一些内容相近,主题相同的故事作了新的归类,因而衍生新的故事类型,如《大唐新语》中的谏佞、惩戒、酷忍等门类,为《世说新语》所无。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化倾向在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及王谠的《唐语林》中有全面的展示。前者取宋、齐、梁、陈、隋唐五代事迹,分38类编排,和《世说新语》比较,不列“豪爽”一类,多出“直谏”、“邪谄”、“奸佞”3类。后者取有唐一代国史旧闻,模仿《世说新语》分35类,又新增17类,共52类。模仿的门类比《世说新语》少“捷悟”一类,余皆仍旧。新增门类有嗜好、俚俗、记事、任察、谏佞、威望、忠义、慰悦、吸引、委属、砭谈、僭乱、动植、书画、杂物、残忍、计策。这些分类或许有削足适履之嫌,但也说明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化是一种普遍现象。

唐前志人小说和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化倾向给唐诗本事带来深刻影响,本故事因此出现相应的类型化倾向,一些故事其实可以归入《世说新语》和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如《尚书故实》记载,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时宰招以好官,况以诗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洲叫一声。”此事可归入“栖异”类。《北梦琐言》卷七记载,令狐绹拜相以后,疏远李商隐,李商隐题诗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此事可归入“忿狷”类。《鉴诫录》卷七记载,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和白居易相聚论南朝兴废之事,请各赋《金陵怀古》一篇。刘禹锡诗先成,白居易叹服,诸人于是罢唱。此事可归入“品藻”类。《河岳英灵集》卷下记载,张说题王湾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两句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此事可归入“赏誉”类。《明皇杂录》卷上记载,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10岁,聪悟过人。贵妃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诗成。此事可归入“夙惠”类。《国史补》卷上记载,驸马郭暖集文士赋诗,李端《中宴》诗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请再赋一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此事可归入“捷悟”类。《唐摭言》卷一一记载,孟浩然遇明皇,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玄宗闻之忤然,因命放归南山。此事可归入“尤悔”类。《大唐传载》记载,太宗怒徐贤妃久召不至,妃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此事可归入“贤媛”类。《本事诗》中有嘲戏一类故事,可归入“排调”类。《云溪友议》卷上记载,冯道明因诵

雍陶诗名句而得雍陶青睐。此事可归入“奸佞”、“谀佞”类。前9则故事受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文言小说类型的影响,最后一篇则受唐代杂事小说类型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反映在具体本事的创作与流传中,也反映在唐诗本事专集的编纂中。《本事诗》将本事分为7类,其中“高逸”、“怨愤”、“嘲戏”3类与唐前志人小说及唐代杂事小说类型吻合,是此类小说影响的结果。

一般来说,故事的类型化是文体的显著特征,唐诗本事的类型化倾向再次显示唐诗本事的文体来源及归属。

四、故事的神异化色彩

唐前小说集有两大支流,一是志人小说(或称轶事小说),二是志怪小说。前者至唐代流为杂事小说,受其影响,唐诗本事呈现类型化倾向;后者至唐代进一步发展,成为志怪传奇,受其影响,唐诗本事呈现明显的神异化色彩。这种神异化色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事杂鬼神

唐诗本事多杂鬼神之谈,其中鬼神吟诗和人神相感的故事较为普遍。鬼神吟诗的故事,如《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载,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张姓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后妻悍怒狠戾,虐遇五子。五子不堪其苦,哭于母葬处。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题诗以赠张。又《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灵怪集》记载,唐太宗征辽,行至定州,路遇一鬼。遣使问之,答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言讫不见。问其处,乃慕容垂墓。此类故事还有武丘寺鬼题诗^①、九华山白衣丈夫吟诗^②及西川赵畚故相鬼魂显灵遣使传书^③等事。人神相感的故事,最著名的当属王轩昼遇西施的故事:

王轩少为诗,寓物皆属咏,颇闻《淇澳》之篇。游西小江,泊舟芭萝山际,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

① 《太平广记》卷三三八引《通幽记》。

② 《宣室志》卷六。

③ 《鉴诫录》卷二“鬼传书”。

浣纱人。”题诗毕，俄而见一女郎，振琼瑯，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官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既为鸳鸯之会，仍为恨别之词。（《云溪友议》卷上“苕萝遇”）

同类故事还有诗人许浑梦遇仙人^①、刘山甫题诗天王庙^②及李群玉因题诗黄陵庙而得遇二妃等事。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宣扬幽明实有，神道不诬，其思想理念及表现形式源于六朝志怪小说。干宝的《搜神记》是六朝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著作，集中卷四、卷五专记神灵感应之事，其中包括人神结合的故事。卷一五、卷一六则专记鬼事及还魂事，包括人鬼恋爱、人死而复生及鬼魂显验故事。此外，刘义庆的《幽明录》等其他志怪小说多记同类故事。这些故事形式成为唐诗本事此类故事的直接来源。

第二，趣尚怪异

除记鬼神事外，唐诗本事还有其他异闻怪录，这些故事更能体现本事的搜奇记异倾向。一般来说，这些本事具有不同的故事类型：第一、写物怪变化。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记载，郭元振尝中夜见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于是题其面颊云：“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其物遂灭。数日，见巨木上有白耳，上有所题诗句。第二、叙妖媚惑人。如《会昌解颐录》记载，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自称高侍郎。一日吟诗云：“危冠高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后得高僧解救。第三、记载幻觉。如《旧唐书·钱徽传》记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出自鬼谣。第四、记载异梦。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记载，曹州兵马使国邵南梦中书舍人崔暇弟崔暇妻李氏持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崔暇，暇因朗吟，梦后一岁，崔暇妻卒。就故事形式而言，这些本事与唐代及唐前志怪小说并无不同。同多数唐代志怪小说一样，它们只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延续。此类本事中的诗句，不论叙事还是写景，均本于写实，并无志怪内容。本事的怪异题材及怪异色彩出于本事作者的主观作用，是好奇尚异的结果。

① 见《本事诗·事感第二》。按：卢肇《逸史》作许灋事。

② 见《北梦琐言》卷九。

第三,诗关休咎

中国古代有神理为文的观念,这种观念的表述始于儒学对八卦及《周易》的论述。《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卦》亦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这些观点虽然只是对八卦及《周易》的看法,但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成为后世文学本质论及文学起源论的源头。神理为文观念在本质上是把文学看作神灵的启示。中国古代,宿命论普遍流行,人们相信生死祸福出自上天的安排,是神灵的意旨。既然神灵可借助文学传达天命,那么文学也就成为人类窥测神意、预知吉凶的神秘工具。

唐诗本事中有很多诗讖,诗讖的出现是建立在上述神理为文的观念之上的。这类故事大多神秘诡谲,具有怪异色彩: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候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载后竟破家,妻子被杀云。(《太平广记》卷三三七引《玄怪录》)

唐进士来鹏,诗思清丽,福建韦尚书岫爱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后不果。尔后游蜀,夏课卷中有诗云:“一夜绿荷风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识者以为不祥,是岁不随秋赋,而卒于通议郎。(《北梦琐言》卷七)

马相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本事诗·征异第五》)

此外,还有前文叙及的崔曙《明堂火珠》诗讖。这些诗讖或记凶兆,或记吉验,都宣扬具有神秘色彩的宿命论。六朝志怪小说多记休咎凶吉之事,

如《搜神记》卷六至卷九写妖祥之事,《异苑》卷四记吉验凶兆之事,这些故事成为唐代诗讖的重要来源。

志怪小说对唐诗本事的影响是全面广泛的。此类本事数量很大,《本事诗》序谓“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但集中《征异第五》和《征咎第六》均记具有怪异色彩的本事,可见此类故事的广泛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故事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本事,诗作者及诗歌是真实的,不是出于假托和臆造,只是故事出于附会和虚构,如前引李群玉诗、郭元振诗、钱起诗、元载诗及崔曙、来鹏诗。另一些本事,不仅故事虚妄,人物、诗歌也均出依托、臆造,如前引孔氏诗、慕容垂鬼魂诗及元载败亡故事中的讖诗。这后一类本事与志怪小说已难于区分了。

第二章 本事的体制类型

唐诗本事具有不同的体制类型,因此不同,有的本事属于文学的一部分,有的属于学术的一部分。初唐以后,不同体制的本事相继出现,此后或延续,或发展,或衰退,这一过程体现了本事的文学性与学术性的起伏消长。同时,具有学术特质的本事,其体制也在不断演变,并因此担当不同的学术功能。研究本事的体制类型及其发展演变对于把握唐诗本事的文学与学术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本事类型的划分

六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发展到唐代,已有显著变化。首先,志怪小说在唐人手里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继承的结果自然是志怪小说的继续存在,而发展的成就是孕育了一代足与唐诗交相辉映的唐人传奇。唐人传奇虽自六朝志怪小说发展而来,却具有与志怪小说完全不同的文学特质。鲁迅曾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①唐人传奇因而成为代表唐代小说最高成就的小说品种。同志怪小说相比,志人小说的变化似乎令人失望,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志人小说以其丰富传神的细节描写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成为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到了唐代,记人记事小说虽也不断出现,但文学色彩逐渐消褪。与此同时,志人小说原有的“备史阙”的功能却逐渐突现。因此,志人小说

^①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1页。

至唐代已沦为杂事小说。唐人小说的这种分化变异对唐诗本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唐诗本事因此出现传奇性本事、志怪性本事及杂录性本事这三种体式类型。

一、传奇性本事

传奇性本事是指故事性强、文辞华艳的诗歌本事。

唐诗本事中,有实属传奇小说者,如《本事诗》中韩翃、柳氏故事,《云溪友议》中的“玉箫化”、“苗夫人”、“窥衣帷”,《集异记》中的“王涣之”,《唐阙史》中的“杜舍人牧湖州”、“韦进士见亡妓”,《甘泽谣》中的“陶岷”、“红线”,等等。首先,这些本事有的本是作为传奇小说出现的。韩翃、柳氏故事又见于许尧佐的传奇《柳氏传》,《本事诗》不过采录当时广为流传的故事。《甘泽谣》为传奇集,其中篇章自属传奇小说。其次,这些本事情节委婉曲折,形象生动鲜明,语言丰富华美,完全具备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一般来说,这些本事以叙说故事、刻画形象为中心,而不以交代诗歌写作背景等为目的,与其他本事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唐诗本事专书的《本事诗》和《云溪友议》收录了这些故事,其他诗歌著作,如《唐诗纪事》也据以采摘,可见前人视为诗歌本事。而且,故事中的人物、诗歌均非虚构假托,这是符合前文对本事文体的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书仍将这些故事划归本事范畴。

以上本事是传奇性本事的典型形式。还有一些唐诗本事,虽以叙说诗歌写作背景为中心,但并不满足对诗事简单直白的交代,在故事叙述和语言运用上借鉴传奇笔法,因而具有传奇小说的特质。如下列两则本事: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睇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

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已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恻，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本事诗·情感第一》）

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悬。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给钱四十万，宠眄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于鹄座。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则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靳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于帏幌奩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

这两则本事的情节均围绕诗歌展开，虽然诗歌内容不能涵盖全部故事，但整个本事仍以诗歌为叙述中心，这是符合本事以事说诗的体例的。与一般本事有所不同，这两则本事有浓厚的传奇意味，第一篇以细致入微的刻画和丰富传神的语言见长，第二篇则以委婉曲折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悬念取胜。此类本事还有《本事诗》中的戎昱感妓故事、宋之问遇骆宾王的故事，《云溪友议》中的李涉夜遇豪客故事，等等。这些本事具有明显的传奇小说的特质，因而称为传奇性本事。

二、志怪性本事

志怪性本事是指具有明显的志怪色彩，但唐人信以为实的诗歌本事。

前文已经论及，唐诗本事受六朝及唐代志怪小说影响，带有明显的志怪色彩，这类本事可称为志怪性本事。志怪性本事大多叙说鬼神，称道灵

异,记载休咎。这些怪异事物,在崇尚理性和讲究科学的今天自然可一概斥为荒诞无稽,但在鬼神道炽、谶纬流行的唐代,人们是信为实有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讨论六朝志怪小说的产生及其特质时曾有精辟论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①

由此可知,中国人因受巫术、神仙之说及佛教思想的影响,大多相信鬼神的存在,因此认为记载鬼神之事与记载人间常事同为写实,并无“诚妄之别”。这是讨论六朝及隋代的情况,其实,唐代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唐代有大量的志怪小说,大抵沿袭六朝志怪小说模式,其产生背景及写作态度与六朝志怪小说也大抵相同。这一风习蔓延至于唐诗本事,因此,志怪性本事虽涉诬妄,但在唐人那里却是“秉笔直书”的。

这一判断,可在《本事诗》及其他材料中得到证实。《本事诗》记载鬼神怪异,如幽州衙将亡妻孔氏显灵题诗及许浑梦接神女故事,还记载休咎凶吉,如马植月夜闻吟而竟为谶言及刘希夷、崔曙诗句自谶的故事,这些故事皆虚而不实,属于志怪小说,但是,《本事诗》的编者孟棻在采录诗歌本事时是信以为实的:“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②可见,孟棻观念中的诗歌本事是本于“实录”的诗歌故事,他在采录本事时,把疑非事实、不可信据的诗事尽行舍弃,而收录的本事在他看来是信实可靠的,这种置信的态度当然也包括上述志怪性本事。

据《本事诗序》,孟棻在编撰《本事诗》时舍弃的部分出自“异传怪录”,则此一部分是指“作意好奇”、“尽幻设语”的志怪、传奇,这些志怪、

①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② 《本事诗序》。

传奇属于自觉的文学创作,是“有意为小说”,并不取信读者。属于这一类的唐代志怪故事,虽然也有诗、事结合者,但事出怪诞,诗属依托,如牛僧孺《玄怪录》中的《元无有》。此类故事我们已经排除在唐诗本事之外。

三、杂录性本事

杂录性本事是指记事简单而本于写实的诗歌本事。

明代胡应麟曾把小说分为六类,其中有“杂录”一类:“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①所谓《世说》、《语林》,是六朝志人小说,《琐言》、《因话》即唐代《北梦琐言》、《因话录》,属杂事小说。这一分类反映了六朝志人小说向唐代杂事小说的演变。但是唐代杂事小说的来源其实并非仅此一途。《北梦琐言》及《因话录》多记载唐人轶事传闻,在历代目录著作中列为小说,除此以外,唐代还有专记国史旧闻的所谓杂史、杂传记,如《朝野僉载》、《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国史补》、《明皇杂录》、《中朝故事》等,这些著作在历代目录著作中即列入杂史或杂传记。就文体而言,一般认为此类著作源出《西京杂记》,与小说实为二途。但到唐代,这种分别已逐渐模糊,小说与杂史、杂传记在内容上相互交叉,杂史、杂传记在体例上也向小说靠近,如《大唐新语》在书名及故事分类上均取法《世说新语》。唐代的杂事小说主要是这两大文体的汇聚。杂事小说中有大量的本事,出自这些杂事小说而又不带志怪色彩的唐诗本事,我们称为杂录性本事。

杂录性本事占了唐诗本事的绝大部分。以《本事诗》为例,属于杂录性本事的,《情感第一》中有“唐武后时”、“宁王曼贵盛”、“开元中”、“朱滔括兵”、“顾况在洛”、“李相绅镇淮南”、“刘尚书禹锡罢和州”、“太和初”诸条,《事感第二》中,除“诗人许浑”以外的其他条目,《高逸第三》、《怨愤第四》中的所有条目,《嘲戏第七》中有关唐诗的所有条目。这些本事一般记事简单,缺乏故事情节,本事中的时间、地点、事件等要素淡化,故事性不强。

杂录性本事记载现实的人和事,不搜奇猎异,无虚构增饰,不仅与虚构故事的传奇性本事不同,也与虚谈鬼神怪异的志怪性本事判然有别。

^①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九流绪论》下。

一般来说,杂录性本事与志怪性本事均本于写实精神,但前者依据现实,后者基于鬼神信仰和迷信观念,两类本事实有诚妄之别。这种分别在唐人观念中有时是明晰的。李肇《国史补》序在说明《国史补》的史料取舍时说:“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中“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指志怪故事,“纪事实,探物理”云云,则多指国史旧事、轶事琐闻,属杂录小说。这一选材原则自然也是本事选录的依据,《国史补》中选录的诗歌本事均本于“事实”,无志怪色彩,属杂录性本事。

第二节 本事类型的特征

不同类型的本事具有不同的文体特征,这些不同特征是我们对本事进行类型划分的依据。不过三种类型之间的文体差异实有远近之分,相对而言,志怪性本事与杂录性本事大同小异,传奇性本事与其他两类本事则相去甚远。本书拟从本事的行文特点、叙写目的、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将不同类型的本事进行对照,从而更深入地把握各自的文体特征。

一、行文特点

传奇性本事一般是自觉的小说创作的结果,讲究虚构和辞藻,具有明显的故事化倾向和文章化倾向。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则大多直白记事,注重写实。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唐传奇的文体特征曾作过一段堪称经典的说明: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①

指出唐传奇有两大特征,一是“叙述宛转”,二是“文辞华艳”,而且认为这

^① 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是唐人“有意为小说”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有意为小说呢?鲁迅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可见,有意为小说指自觉的艺术创造,即借助想象,虚构故事。鲁迅还指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①又将唐传奇的特征表述为“文采与意想”。其实,两种表述并不矛盾,因为“叙述宛转”,“扩其波澜”指故事情节的曲折委婉,迭宕起伏,而这一特征正是“意想”的产物。

传奇小说运用虚构、讲究辞藻的创作倾向对唐诗本事产生了直接影响。且不说那些原本属于传奇小说的唐诗本事,就是那些单纯的唐诗本事也因取法传奇小说,同样具有“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特征。前文已引录崔护题诗和崔郊感妓两则本事,并指出前者语言生动细腻,后者情节引人入胜,谋篇行文,有鲜明的传奇小说色彩。这些特点在《唐阙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中有集中表现:

杜舍人再捷之后,时誉益清,物议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裁之能。闻吴兴郡有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晚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惬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髻。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彩舟。欲与之语,母幼惶惧,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篋为质。妇人辞曰:“他人无状,恐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笔于纸,盟而后别。紫微到京,常意雪上。厥后十四载,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访。女适人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诘之。

^① 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其夫虑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谓曰：“且纳我贿，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复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紫微熟视旧札，俯首逾刻，曰：“其词也直。”因赠诗以导其志。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翌日，遍闻于好事者。

这篇故事的情节至少经历了三层转折：杜牧初至吴兴，专意寻访美女，然未有所得，此一层转折；后泛舟纵观，得遇民女，并以罗縠为质，此又一层转折；14年后，命人搜访，然民女已嫁人生子，此第三层转折。末一转折内部情节也环环相生，迥出意表。就其情节的丰富曲折而言，此一本事完全可与“叙述宛转”的传奇小说相媲美。当然，全篇语言清丽隽雅，即使置于传奇小说之林，也毫不逊色。

变幻曲折的故事情节往往出于自觉的艺术构思，是想象、虚构的产物。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只是叙写了两次春游的所见所感，事件细小，故事平淡，但在本事作者的笔下却化生出一段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动人故事，作者只取诗歌情事大体，一些情节出自联想虚构。杜牧牧湖州的故事历来作为杜牧的风流韵事而传为美谈，但是，这篇故事并不真实，其中情事与杜牧形迹及史事颇多乖舛，于情理亦有不合^①，只不过是好事者穿凿诗意的附会之谈。

与传奇性本事运用虚构、讲究文采不同，志怪及杂录性本事一般注重写实，叙事简单直白。志怪性本事虽涉及鬼神怪异，荒诞无稽，但出于“传录”，并非有意虚构，此点前文已有论及。杂录性本事大多为实录，一般以记载实事的面貌出现。当然，杂录性本事所记并非全为实事，其中也有乖误不实之处。这不实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误读与附会。本事作者误读诗句，并由此附会诗事，诗事情节的一部分或全部不真实。如《本事诗·高逸第三》记杜牧于洛阳李司徒席上吟酒赋诗、恣纵狂放的故事，其中一些细节不实，实误读所致^②。二是传闻之误，如贾岛“推敲”的故事在唐末

① 见缪钺《杜牧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4页。

② 见《考证篇》“30杜牧”条。

五代出现过不同的故事“版本”，其中情节多有不实者，这种不真实大多是流传中产生的。需要辨析的是，传奇性本事的虚构也有出自附会穿凿和传闻不实者，如上引杜牧牧湖州一事。但二者仍然呈现不同面貌。一般来说，虚构的情节在杂录性本事中不作艺术的放大，并以写实的面貌出现，此类本事通常简短直白，只有一个片段，并无“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特征。

二、叙写目的

传奇性本事与志怪性、杂录性本事的行文差异是由各自的写作目的决定的。概而言之，传奇性本事以叙述或敷演故事为目的，而志怪性、杂录性本事以说诗、传诗为目的。

一般来说，传奇性本事以叙述故事为中心，着力于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叙述故事既是本事写作的第一要务，又是其写作的目的，叙事本身完整自足。因此，在传奇性本事中，诗的地位和作用是次要的，它们或者成为故事叙述的一部分，正如传奇小说中的诗歌，或者成为故事内容的佐证，一些以诗证事的本事，如《云溪友议》中“苗夫人”，《甘泽谣》中“陶岷”等，均属于此类情况。

与传奇性本事不同，志怪性、杂录性本事以诗歌为中心，故事的意义以诗歌的存在及其与诗歌的关系为前提，说诗、传诗为第一要务。

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只是一个说诗的片段，最初仅为谈资，诗事围绕诗歌展开，或交代诗作背景，或揭示诗旨，或叙说诗作的流布与欣赏，并无独立于诗的叙事追求。这种篇幅短小、情节简单的说诗片段与《诗序》类似，后来，本事的收集、整理者由此引出本事的解诗功能。《本事诗》序云：“抒怀佳作，讽刺雅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说明本事意在“发挥”，揭示诗旨。该序径称本事为“小序”，认为本事与说《诗》、解《诗》的《诗序》性质相同，可见《本事诗》的辑录意在发挥本事的解诗功能。《本事诗》中的本事，体制不一，既有杂录性、志怪性本事，又有传奇性本事，但是，序文中本事解诗的表述显然是由与《诗序》体例相近的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引申而来，《本事诗》录入传奇性本事不过因类而及。其实，就体例和叙写目的而言，传奇性本事与说诗、解诗一体相去甚远。

本事由诗和事构成，如果说本事的说诗、解诗侧重于事的意义，那么，

本事的录诗、传诗则更侧重于诗的意义。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多著录名篇佳句,此类本事的流传和记载意在保存和流传篇什。这一倾向可以《大唐新语》卷八“文章”中的一些本事说明:

陆余庆孙海,长于五言诗,甚为诗人所重。性峻,不附权要。出牧潮州,但以诗酒自适,不以远谪介意。《题奉国寺》诗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风转凄。一磬竹林里,千灯花塔西。”《题龙门寺》诗曰:“窗灯林霭里,闻磬水声中。更筹半有会,炉烟满夕风。”人推其警策。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秣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鹄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为诗曰:“朝升照日槛,夕次下乌台。风竿一眇邈,月树几徘徊。翼向高标敛,声随下调哀。怀燕首自白,非是为年催。”郑繇少工五言。开元初,山範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範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白昼文章乱,丹霞羽翮齐。云间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鹭,陈仓拂野鸡。不知辽廓外,何处别依栖?”甚为时所讽咏。

《大唐新语》卷八“文章”录本事诗22首,明确说明为人传诵者10首。此外,其他卷中,上官仪洛水堤步月入朝诗,刘希夷《白头翁咏》诗句,都是流播人口的名篇佳句。可见,著中本事以保存名篇为目的。《大唐新语》的收录情况颇具代表性。与此相类而又集中收录本事诗者尚有《唐摭

言》、《鉴诫录》等,不同的是,其中所选录,《大唐新语》以咏物言志为尺度,《唐摭言》以科举应试为范围,《鉴诫录》则以政教风化为依归。此外,一些散见于唐人笔记的诗歌本事也多采录名篇佳句。概而言之,这些本事诗大多各具特色,或以风教,或以气骨,或以文采,或以境界,或以趣味,其文足有可传者,故作者采入笔记。这些存录名篇、流传佳句的诗歌本事,最能体现唐诗本事存诗、传诗的目的和功能。计有功编著《唐诗纪事》时,曾于唐人文集之外,广搜杂说、传记、遗史等,而唐诗本事是该书辑录的重要部分,那些并无文集传世的诗人及其诗作颇赖本事辑入该书,从而流传后世。

三、价值取向

传奇性本事与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完全不同的叙写目的是由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一般来说,传奇性本事追求文学的、审美的价值,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则追求历史的、文献的价值。

传奇性本事的主体是叙事,此类本事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主要是就叙事而言。同传奇小说一样,此类本事的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除表现于情节的安排和语言的运用外,还表现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除了那些原本属于传奇小说的传奇性本事,如《柳氏传》、《陶岷》、《红线》等,一般来说,传奇性本事中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刻画也不够精细。但毫无疑问,此类本事中的人物大多个性鲜明,生动可感。在这些本事中,有深情执着的女子,如《玉箫化》中的玉箫,崔护题都城南庄故事中的村女;有风流倜傥的才子,如《杜舍人牧湖州》中的杜牧,《本事诗》中的崔护;有明于道义的公侯,如戎昱感妓故事里的韩滉,《襄阳杰》中的于頔。还有附庸风雅的武将,如《剧谈录》“王侍中题诗”中的王智兴。此外,《本事诗·征异第五》中骆宾王的高逸隐僻,《云溪友议》卷下“窥衣帷”中王韞秀的倔强刚烈,《苗夫人》中张延赏的势利昏悖及苗夫人的明敏多识,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物形象进一步使此类本事进入审美领域,成为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叙事形式,甚至成为文学的一部分。

与传奇性本事不同,志怪性、杂录性本事追求历史的、文献的价值,因而成为文学史料的一部分。这两类本事在历史、文献方面的价值可以从《云溪友议》和一些载录两类本事的唐人笔记的序文中得到说明:

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驰驾踟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摭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傥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云溪友议序》）

自庖牺画卦，文字聿兴，立记注之司，以存警诫之法。传称左史记言，《尚书》是也；右史记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递兴，虽戢干戈，质文或异。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删落其繁芜，丘明掇拾其疑阙，马迁创变古体，班氏遂业前书。編集既多，省览为殆。则拟虞卿、陆贾之作，袁宏、荀氏之录，虽为小学，抑亦可观，尔来记注，不乏于代矣。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今起自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聊以宣之开卷，岂敢传诸奇人。（《大唐新语序》）

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玘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三纪收拾筐篋，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凡纂得事成三十卷。（《北梦琐言序》）

作者认为这些笔记属于史的范畴，或成为史的一部分。《云溪友议》序虽仅以为谈资，但又引述“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的先例，表明该著实有补史之意。自汉代以来，人们认为小说出于史官之流，为史官末事，这使小说成为正史的附庸。但另一方面，小说因此贯穿了史家意识，注重史料的价值。《云溪友议》以记本事为主，《大唐新语》、《北梦琐言》

也采择大量本事,序文中表述的著述目的及价值取向当然也包括本事在内。

小说既然属于史,在写法上必须取法史书,必须遵循“实录”和“传信”的原则。但是,不同小说作家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不同,具体作法也不尽相同。一些作者严守信实原则,如《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这就把志怪小说排除在史料之外。另一些作者的信实观念则较为宽泛,如《北梦琐言序》虽谓“未敢孤信,三复参校”,但书中却采录了部分志怪小说。这两种不同的史实观自然会影响到对唐诗本事史料价值的判断。那些具有怪异色彩的志怪性本事在一些作者看来,就不具有史料的价值。

传奇性本事因为讲求虚构,或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一般不作为史料。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笔记虽然收录传奇性本事,但并不表示作者已确认这些本事具有史料性。《云溪友议》中收有“玉箫化”、“苗夫人”、“窥衣帷”,《唐阙史》中收“杜舍人牧湖州”、“韦进士见亡妓”等具有传奇色彩的本事。前已述及,《云溪友议》有补史之意,《唐阙史序》也明言该书拾遗补阙之功,似乎把这些传奇性本事也纳入史料范围,但《云溪友议序》称该书乃步武何自然续《笑林》、刘禹锡(实为韦绚)的《嘉话录》。则体例依照此前的志人、杂事小说,补史之说也是针对此种体例小说而言。《唐阙史》序交代叙写缘起时也作过这样的说明:

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晋、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

作者取法的对象是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这里的“小说”应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类,即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是不包括唐人传奇的。可见作为史补的是杂史和杂事小说,所谓叙写也不过“捃拾”,

这与传奇这种“幻设”之文有所不同。据此,《云溪友议》、《唐阙史》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而提出小说的补史功能的,采录传奇性本事与这一著述目的并不完全吻合,属于体例不严,采择不精。

第三节 本事类型的转换

唐诗本事同唐人小说一样,在形式上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不同本事类型的转换及其中主要类型的形式变化。根据这一过程的发展特点,我们把唐五代诗歌本事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盛唐阶段、中晚唐阶段以及唐末五代阶段。

一、初盛唐本事

最早的唐诗本事,应该是孔绍安咏石榴的故事。《旧唐书·孔绍安传》记载:“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时夏侯端亦尝为御史,监高祖军,先绍安归朝,授秘书监。绍安因诗宴,应诏咏石榴诗曰:‘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时人称之。”可见唐诗本事的产生实与李唐的开国同步,因此,唐诗本事的开始应定于武德初年。

记载初、盛唐时期本事的著作主要有《隋唐嘉话》、《朝野僉载》、《景龙文馆记》、《大唐新语》和《明皇杂录》。《隋唐嘉话》记事“涉南北朝至开元”^①。《朝野僉载》主要记载武后一朝的事迹,今本有几条出自天宝以后,但该书作者张鷟卒于开元中,天宝以后条目当是它书误入。《景龙文馆记》专记唐中宗景龙时期君臣吟咏唱和之事。《大唐新语》记事“起自国初,迄于大历”^②,但所记诗歌本事则未有晚于玄宗以后者。《明皇杂录》多记玄宗一朝杂事,兼及肃宗、代宗二朝故事,所记诗歌本事最晚者当数高力士咏茅诗事,时间在肃宗上元时。根据上述本事出现及记载的情况,我们把此一阶段的下限定在唐肃宗末年。

《隋唐嘉话》原名《国朝传记》、《传记》、《国史异纂》,或称《小说》,为

① 《国史补》序。

② 《大唐新语》序。

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刘餗撰写。该书记载诗歌本事 10 条,其中隋诗本事 3 条,唐诗本事 7 条。唐诗本事包括李义府咏乌事,长孙无忌、欧阳询互嘲事,上官仪入朝行吟事,乔知之作《绿珠篇》,武后夺袍及李景伯、李日知讽谏事,起自太宗,迄于中宗。《景龙文馆记》是一部记录中宗景龙时期宫廷文学活动的文献。中宗曾将当时宫廷的重要诗人召入修文馆,任为修文馆学士,并经常举行集会活动,君臣唱和。该书作者武平一为修文馆学士,亲历集会及唱和之事。该书内容包括中宗初置学士以后馆中杂事及诸学士应制、唱和篇什、杂文之类,其中多记诗歌本事。《景龙文馆记》久已散佚,难见全貌,从后世相关文献可辑得诗歌本事 9 条^①。以上著作中,集中记载初、盛唐诗歌本事的是刘肃的《大唐新语》,该书不仅于各门类中杂录诗事,还辟“文章”一门专录诗事。全书载录诗事共 34 条,起自太宗,迄于玄宗,以太宗、玄宗两朝为多。以上三部著作就其文体而言属于专记朝廷及官僚之事的“记注”,其中的诗歌本事也仅限于宫廷和官僚间。与此不同,主要记载武后一朝事迹的《朝野佥载》在取材上则有所突破,记事范围已由朝廷延伸到民间草野,这一取材特点也反映在诗事的记载上,该书记载唐代诗事 21 条,其中多民间诗事:

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词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余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卷二)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枕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向月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卷三)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浼其饼,驼苦之。乃将钁斫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时

^① 陶敏有《〈景龙文馆记〉考》,文载《文史》第四十八期,第 221 ~ 236 页。贾晋华有《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景龙文馆记》,见《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81 ~ 278 页。

人语曰：“萧佺骝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卷五）

此外，还有泽州百姓嘲都督王熊，选人嘲高士廉木屐，广州人歌“三樵”，吴人咏“痴”，军中嘲懦将，选人嘲侍郎姜晦诸事，民间诗事数量近半。《朝野佥载》标志着唐诗本事由朝廷向民间延伸。这一转变可从两方面去理解。首先，高宗、武后以后，文学创作逐步突破宫廷的狭小范围，打破贵族、官僚的垄断，向民间发展。民间的诗歌创作成为整个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创作的兴起带动了本事的产生，这是《朝野佥载》记载民间诗事的基础。其次，《朝野佥载》摆脱了旧有的史家观念，突破了专记朝廷及官僚士大夫的“记注”体例，使史料笔记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朝野佥载》的这一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此后，这一记事倾向进一步发展，民间诗事成为本事的重要部分。

以上几部著作的文献记载可信度很高，这些著作，或当时人记当时事，耳目所接，较后人为近，如《景龙文馆记》、《朝野佥载》；或本于实录，慎重取舍，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因而其中的杂录部分一般可信可考，可资参证。与此不同，《明皇杂录》中的记载情况较为复杂。该书记载玄宗一朝杂事，也偶及肃、代二朝。作者郑处海，史载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皇杂录》作于大中九年（855），其记事年代去事已远，书中所记非耳目所见所闻，在记载上有轻信流俗、取舍不精、考核失实的缺憾。该书记载诗歌本事11条^①，其中三条属不实记载，包括杨贵妃令刘晏咏诗事^②，杜甫江南赠李龟年诗事^③，还有《傀儡诗》本事^④。这表明《明皇杂录》在体例上与其他几部著作有所不同。

初盛唐本事基本上是杂录性本事。《隋唐嘉话》全取杂录一体，《景龙文馆记》记载实事，自然属于杂录。《朝野佥载》除骆宾王和宋善威诗

① 中华书局整理本包括补遗、逸文、辑佚，此用中华书局整理本。

② 详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4页。

③ 详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9页。

④ 详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7～88页。

讖,《大唐新语》除刘希夷诗讖,属志怪性本事,其余均为杂录性本事。这些杂录性本事大多采用客观的叙述方式,并不掺杂叙述者的主观议论。叙事一般简洁概括,没有冗长的叙述和精细的刻画。一般来说,这时的本事以谨严、客观为特征。

除以上著作外,《本事诗》也采择了不少这一时期出现的杂录性本事,不见于上述著作的本事有“宁王曼贵盛”、“开元中,颁赐边军纁衣”、“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宋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⁵条。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数量有限的志怪性本事。除前文提到的几则诗讖、《本事诗》中载录的崔曙诗讖及幽州孔氏显灵题诗故事外,《灵怪录》等小说集中尚载录数条^①。应该说,在历时100余年的初唐和盛唐时期,这些志怪性本事是为数不多的,初盛唐志怪性本事有诗讖、鬼神、灵怪三类,志怪性本事的类型,这时已基本具备了。

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传奇性本事,传奇性本事的出现是中唐以后的事。

二、中晚唐本事

中晚唐是唐诗本事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段的确立主要与这一时期本事类型的演变发展相关联。中唐开始出现传奇性本事。在传奇性本事中,《本事诗》记载的韩翃、柳氏故事和《云溪友议》中的《窥衣帷》年代最早,都发生在唐代宗时期,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段的上限定在代宗初年,这一上限正好与前一阶段下限相衔接。在记载传奇性本事的著作中,康骅的《剧谈录》写作年代最晚,该书作于乾宁二年(895)^②,而在此之前,《本事诗》已于僖宗光启二年(886)编撰完成^③,《云溪友议》约于此前也已完成。因此,乾宁二年可以作为此一时段的下限。

① 1. 唐太宗定州见慕容垂鬼吟诗(《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灵怪集》); 2. 开元六年河湓鬼吟诗(《太平广记》卷三三〇引《灵怪集》); 3. 调露中巴峡鬼吟诗(《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纪闻》); 4. 开元末裴武公夜得鬼诗(《龙城录》卷上); 5. 武则天腊月宣诏幸上苑诗事(《广卓异记》卷上); 6. 郭元振题诗怪异面颊(《西阳杂俎》前集卷一四)。

② 《剧谈录序》:“乾宁二年建巳月池州黄老山白社序。”

③ 《本事诗序》云:“时光启二年十一月,大驾在褒中。”《本事诗》完成后有续补,说见胡可先、童晓刚《〈本事诗〉新考》,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一期,第78~80页。

中晚唐是唐诗本事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判断是基于下面的三个事实：

首先，这一时期的本事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时期。中晚唐和稍后出现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多记载诗歌本事，其中记载唐诗本事较多的16部笔记共记本事290余条^①。《隋唐嘉话》等五部著作及《本事诗》共记初盛唐本事80余条。中晚唐与初盛唐时间相若，而中晚唐本事是初盛唐本事的三倍以上。虽然以上统计并不完全，但也大致体现了两个时期唐诗本事的发展情况。数量的急增反映了时人对本事的喜爱和看重，也说明唐诗本事在此一时期获得长足发展。

其次，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记载唐诗本事的著作。唐诗本事的发展逐渐引起时人的关注，这一文体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也逐步获得确认，因此，晚唐出现了记载唐诗本事的专门著作《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

《本事诗》一卷，孟棻（一作启）撰。棻字初中。僖宗乾符二年（875）进士，仕至司勋郎中。据《本事诗自序》，该书成于光启二年（886）。全书共录文41条^②，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其中除宋武帝吟谢庄《月赋》、徐德言破镜重圆两条外，余皆唐事。《本事诗》所

① 这16部笔记包括《唐摭言》、《本事诗》、《云溪友议》、《抒情集》、《国史补》、《杜阳杂编》、《唐阙史》、《剧谈录》、《卢氏杂说》（据《太平广记》引）、《玉泉子》、《北里志》、《闽川名士传》（据《太平广记》引）、《酉阳杂俎》、《金华子杂编》、《刘宾客嘉话录》、《北梦琐言》。

② 今以《历代诗话续编》本为依据。《本事诗》篇目及内容，各处载录不一。《太平广记》卷二七五“李琦婢”条记杜牧《杜秋娘诗》本事，云出《本事诗》。《类说》卷五一《本事诗》所录“郎中员外”、“活剥生吞”、“陶隐居”、“马自然诗”、“白二十韦十九”、“登崖州城诗”7条，为《诗话续编》本所无。《绀珠集》卷九《本事诗》亦多出“金锁诗”、“红叶诗”（记卢渥事）、“张好好诗”、“剪水作花”、“米家荣诗”、“石头城诗”6条。《竹庄诗话》卷二〇亦以“白二十韦十九”条出自《本事诗》。然《类说》所录“马自然诗”出自《续本事诗》、《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六引《诗史》云出《续本事诗》， “白二十韦十九”及“登崖州城诗”两条出自《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赞皇勋”，并不出自《本事诗》。“郎中员外”、“活剥生吞”均出自《大唐新语》，是否亦见于《本事诗》，疑不能定。《绀珠集》中“金锁诗”出自刘斧《翰府名谈》（《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及《唐诗纪事》卷七八“僖宗宫人”，“红叶题诗”条出自《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这两条与《本事诗》中顾况题叶诗前后相接，疑因类而及。“剪水作花”条见于《云溪友议》卷中“吴门秀”。“米家荣”、“石头城诗”两条俱见《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则《类说》、《绀珠集》等所录已与《云溪友议》、《续本事诗》等相混，难以作为文本依据。

录诗事为初唐至晚唐本事,中晚唐本事 22 条,《云溪友议》则基本收录中唐以后本事。《云溪友议》三卷^①,作者范摅,僖宗时吴人^②,曾隐于会稽,自号五云溪人。此书或成于僖宗时。全书记事 65 条,诗事 50 条,中晚唐诗事 48 条。在《本事诗》和《云溪友议》之外,最重要的本事专书是《抒情集》。《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著录卢瓌《抒情集》二卷,作者卢瓌约为晚唐五代时人。原书已佚,《太平广记》引 19 条。《诗话总龟·前集》引 21 条^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引 1 条,今去其重复,可得 37 条。此外,重编《说郛》、《竹庄诗话》、《诗人玉屑》均有引文^④,然均未超出上述引文范围。诸书所引,或题为《抒情诗》、《唐贤抒情》、《抒情录》、《抒情诗话》。从现存佚文看,《抒情集》是专记中晚唐本事的。其所收录者均为《本事诗》及《云溪友议》所未收。这三部专门著作的出现,说明唐诗本事从一般笔记中独立出来,这标志着唐诗本事的收集整理已走向自觉,其价值和意义已获得充分认识。

第三,这一时期唐诗本事兼备众体。中晚唐是各种类型诗歌本事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杂录性、志怪性本事继续发展,并大量涌现,而且,受这时传奇小说的影响,传奇性本事开始出现,并充分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唐诗本事发展的重要标志。

传奇性本事主要见于《本事诗》、《云溪友议》、《唐阙史》、《剧谈录》及《甘泽谣》等几部著作。

① 商濬《稗海》本作十二卷。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云溪友议》提要云:“《唐书·艺文志》注称为咸通时人,而书中李涉赠盗诗一条,称乾符己丑岁客于雷川,亲见李博士手迹。考乾符元年为甲午,六年为己亥,次年庚子改元广明,中间无己丑,己丑实为咸通十年。疑书中或误咸通为乾符,否则误己亥为己丑。然总之僖宗时人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七子部八《云溪友议》以为“其误不在年号,而在干支”。

③ 另《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李翱女”条,注出《南部新书》,卷三六引“韦检”条,注出《胜说前集》,卷三八引“周颢”条,注出《南唐近事》。

④ 重编《说郛》卷二三收有《抒情录》,题宋代卢懷,“懷”当为“瓌”之误,谓卢瓌宋人,大误。文录八条,其中“江邻几”条实出宋代刘攽《中山诗话》。此引录之误,源出《诗话总龟》。《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三“伤悼门”即引该条,注出《唐贤抒情》。重编《说郛》误以卢瓌为宋人,盖出于此。重编《说郛》所引文字与《中山诗话》原本多有歧异,但与《诗话总龟》所引文字略同。又重编《说郛》所录《抒情录》各条全部见于《诗话总龟·前集》。可见该书辑自《诗话总龟·前集》,并非《抒情集》的原书残帙。

《本事诗》中传奇性本事主要有戎昱感妓故事、韩翃柳氏故事和崔护题诗故事。戎昱感妓故事又见《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条,但情节简单,为杂录体。《本事诗》中的故事显然是在传说基础上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曾失其本诗,本事作者误引戎昱《移家别湖上亭》,以诗证事,并对故事细节作了若干调整,以求首尾一致,情节更为合理。这一处理正是艺术创作的手段。韩翃、柳氏故事与《柳氏传》情节相同,仅文字有异。作者许尧佐生活年代略早于孟棨,本事记载源出《柳氏传》。就其故事的曲折、人物的生动和语言的华美而言,此一故事属于传奇小说,但后世一般认为事乃实有,非出虚构,所以对孟棨收为本事并无异议。崔护题诗故事乃据诗意敷演而成。前半春游及题诗的情节据诗意敷演,后半寻游及村女还魂事乃据诗意衍生,纯属虚构。全文情节跌宕起伏,描写细腻,与传奇小说无异。

《云溪友议》中的传奇性本事有“襄阳杰”、“玉箫化”、“苗夫人”、“衡阳遁”、“江客仁”、“窥衣帷”数篇。“襄阳杰”中的崔郊故事与戎昱故事类似,以情节的曲折跌宕见长。“玉箫化”主体部分是玉箫、韦皋相恋故事,当出自当时流传的传奇小说。故事前半叙两人分离,用写实手法,后半叙玉箫再现再生,出于虚构。文中诗歌以写实部分为基础,可视为实有,故全文仍属本事。此一故事以形象的鲜明、情节的变幻和想象的新奇为特色。“苗夫人”一篇为传奇文,注重人物刻画,巧于情节安排。文末引郭泗滨诗归结全篇,属引诗证事类型本事。“衡阳遁”叙徐安贞逃隐衡山岳寺故事,情节简单,但故事为虚构^①,叙事有悬念,具传奇色彩。文中所引诗句为徐安贞诗句,所以该篇属于本事。“江客仁”中李涉遇豪客一节是模仿《世说新语》而虚构的一段故事^②。后半韦思明说诗一节自前文引出,自属乌有。但全文所引诗为李涉诗歌,故亦属本事。“窥衣帷”写元载夫妻变泰发迹故事,不以情节取胜,以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见长。文中王韞秀寄诸姨妹诗实非王氏所作,乃本事作者杜撰,但其中元载诗歌,王氏其他诗歌,一般均归其名下,这就基本符合本事文体要求。

① 详见《考证篇》“3 徐安贞”条。

② 详见《考证篇》“22 李涉”条。

除《云溪友议》外,记载传奇性本事最多的当属《剧谈录》,其中有“王侍中题诗”、“李朱崖知白令公”、“玉蕊院真人降”及“广谪仙怨词”。王智兴题诗故事本于写实,但叙写细致,用铺张手法。“李朱崖知白令公”一条后半四相唱和事为本事,但此一本事叙事不实^①。“玉蕊院真人降”记神仙之事,化虚为实,极尽铺张,事虽虚妄,而诗则诸人所作。“广谪仙怨词”写词曲来源,叙述婉转,用传奇笔法。

《唐阙史》作于僖宗中和四年(884)^②,作者高彦休。书中“杜舍人牧湖州”、“韦进士见亡妓”及“卢左丞赴陕郊诗”3条属传奇性本事。杜牧湖州事,如前所述,与杜牧行迹及史事颇有牴牾,于情理亦有不合,是好事者附会比兴、穿凿诗意而虚构的故事。“韦进士见亡妓”故事与《汉书》所载武帝因方士少翁而与李夫人神魂相见故事类似,注重描写刻画,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卢渥赴陕郊故事情节简单,但场面的刻画渲染实传奇小说所特有。《甘泽谣》本属传奇小说集,但其中《陶岷》、《红线》两篇历来收入诗歌著作。《唐诗纪事》卷二四载陶岷诗事,本于此,红线故事收入《古今诗话》^③及《唐诗纪事》^④。可见,这两篇小说在宋代是作为唐诗本事的。

除以上著作外,薛用弱《集异记》中《王之涣》一篇还记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此事虽不真实^⑤,但诸人诗歌属实,非出依托,所以这篇传奇小说仍属本事。

以上介绍虽然不是这一时期传奇性本事的全部,但也大致见其概貌。

① 四相所咏为宣宗大中三年收复河湟事。据《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三年春正月丙寅,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朝廷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各出本道兵马接应。这年六月,“康季荣奏收复原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八月,“凤翔节度使李毗奏收复秦州”。四相中马植诗云:“四师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戡弓。”乃咏其事。《旧唐书·宣宗纪》虽记载白敏中于大中五年五月充邠宁节度观察、东面招讨党项等使,但并无统帅诸军收入河湟之事。因此,此一诗事不实。

② 《唐阙史》序云:“甲辰岁清和月编次。”

③ 见《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一。

④ 见《唐诗纪事》卷三〇“冷朝阳”,《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详见傅璇琮《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文载《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65页。

唐代传奇文与传奇集的兴盛在中晚唐^①,传奇性本事的发展与之大致同步,这种同步现象侧面反映出传奇性本事的产生与传奇小说发展的关系。一般来说,这种关系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事采用传奇笔法,在故事的叙写、人物的刻划、语言的运用上吸取传奇手法,如崔护题诗故事。第二,传奇运用或引用诗歌形式。在传奇小说中,诗歌或者成为情节的一部分,或者作为故事得以成立的证据。由于运用或引用诗歌,传奇小说成为传奇性本事,如《陶岷》、《红线》。这里的诗歌是诗人之诗,而非本事作者之诗。在诗与事的关系上,第一种情况以诗为中心,第二种情况则以事为中心。

这一时期杂录性本事仍然是本事的主体。除《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外,记载杂录性本事的著作有《国史补》、《杜阳杂编》、《卢氏杂说》、《酉阳杂俎》、《刘宾客嘉话录》、《北里志》、《闽川名士传》、《唐摭言》、《北梦琐言》等等。就内容而言,这些著作在本事记载上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民间诗事的记载。随着诗歌创作的普及以及说诗风气的蔓延,这时民间产生了大量的诗歌本事。与此同时,一些笔记已经突破专记朝廷及官僚行事的“记注”观念,虽然有时仍然打着补史的旗号,但记载的内容已不再受传统题材的限制。这一观念的变化使大量的民间故事记载下来。通过这些笔记,我们可以领略社会不同阶层诗歌创作的风貌,从而对这一时期的诗坛有更为全面的把握。第二,专题诗事的记载。中晚唐笔记向专题化发展,专题笔记专记某一题材,或某一范围,其中的诗事也多限于某一方面。王定保的《唐摭言》是专门记载科举制度及与此相关的逸闻琐事的,其中记载的诗事多与科举有关。唐代以诗赋取士,诗歌创作与科举考试有着广泛联系,因而有关科举的诗事十分丰富,这是《唐摭言》大量记载此类诗事的原因。另外,孙棨的《北里志》专门记载文士的狎妓生活,凡13篇,其中10篇为诗事,这10篇诗事多是文士、妓女以诗往还的故事。不管是《唐摭言》还是《北里志》,都是记载某一类题材,而黄璞的《闽川名士传》则专记特定地区的文士故事。《新唐书·艺文

^① 李剑国先生定传奇文兴盛期为约建中初至大和初,传奇集兴盛期为约大和中至乾符末。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7页。

志》杂传记类著录《闽川名士传》一卷,原书已佚,《太平广记》存佚文6条,其中“林杰”、“周匡物”、“陈通方”、“欧阳詹”、“薛令之”5条为诗事。专题性笔记一般对某一方面的诗事有较为全面的收集和载录,这不仅丰富了唐诗本事的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唐诗本事的面貌。

与内容的变化相比,中晚唐杂录性本事在形式上的演变或许更加引人注目,也更为重要。这种演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观议论的出现。初盛唐本事通常客观叙事,极少议论,即使有议论,也多以叙述的形式出现,绝少本事作者的主观色彩。这种情况到中晚唐出现很大改变,在《云溪友议》中,经常可以见到文末的“云溪子曰”之类,这是本事作者抛头露面的直接发言,相对于旁观的叙事而言,这是一种主观的议论。这些议论多是发明本事内容,或发挥本事题旨,其中也偶有诗歌艺术的探讨:

云溪子曰:汉署有《艳歌行》,匪为桑间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杂咏《杨柳枝》词,作者虽多,鲜睹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带风。”滕郎中又云:“陶令门前胃接篱,亚夫营里拂朱旗。”但不言“杨柳”二字,最为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旁亭子》诗云:“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道者杖藜归。”不谓“亭”,称奇矣。(《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黹”)

这一段话有明显的谈艺色彩,这一点很重要,它体现了本事作为诗歌批评所应有的内容,也代表了此一文体的发展趋势。

这种反复出现而又位置相对固定的“云溪子曰”当是源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唐代笔记注重补史功能,在文体上也模仿史著。《唐阙史》文末有很多“参寥子曰”、“参寥子云”之类,即属于这种模仿,《云溪友议》中的“云溪子曰”当然也属此例。如果说这种附于文末的议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带有史著的痕迹,那么,《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中的一些段落则扫除了这一痕迹:

中山公谓诸宾友曰:“……或有淡薄相于、緘翰莽卤者,每吟张博

士籍诗云：‘新酒欲开期好客，朝衣暂脱见闲身。’对花木则吟王右丞诗云：‘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则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旧人，名为异代，近日为文，都不惬。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壤洞庭宽。’……杨危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

这一段话，自《云溪友议》作者的角度，不失为客观的叙述，但就“中山公”刘禹锡来说，却是较为散漫随意的议论。这里，本事叙述的主体和议论的主体是分离的，而在《刘宾客嘉话录》中，两个主体合二为一。据《刘宾客嘉话录》原序，该书记刘禹锡的言谈琐语，因此一些本事纯以议论行文，本事叙述主体亦即议论主体，如：

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矜奇特语，至有“地瘦草丛短”句。明年秋卷成，呈之，曰：“有求色必赧，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四引）

此外，《刘宾客嘉话录》中讲究“饬”、“糕”及“老拳”的一段文字，亦属此例。这一形式的演变对唐末五代诗歌本事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附事录诗的普及。唐诗本事的文本形式各异，有的有诗有事，有的有诗无事。“无事”之诗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依附其他诗歌本事，这就是唐诗本事的附事录诗现象。在初盛唐本事中，诗、事关系较为单纯，一般有诗必有事，中唐以后，逐渐打破了这种单纯的对应关系，有诗无“事”成为普遍现象。在几种本事专著中，文本结构最为单纯的要算《本事诗》中收录的本事，但其中也有附事录诗的情况。《高逸第三》在记载杜牧放诞故事之后更有一段属于附记的文字：

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后又题诗曰：“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

“杜登科后”数字虽具叙事性质,但与其说是下引诗歌的本事,还不如说是上下文的连接语,这两首诗其实并无本事,是与前面故事在意旨上有关联并因此连缀的诗歌附录。这种录诗倾向在《云溪友议》中更为普遍,也更为鲜明。《云溪友议》中有“吴门秀”、“辞雍氏”、“和戎讽”、“祝坟应”、“温裴黜”、“蜀僧喻”、“杂嘲戏”等,皆附事录诗。“吴门秀”下4条尚以叙事为主,录诗为副,《温裴黜》下3条不惟录诗,且以录诗为主,诗事反而淹没不彰。这种录诗倾向在其他一些笔记如《唐摭言》的本事中也已出现,只是程度各不相同。注重录诗是中晚唐本事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不仅改变了本事的功​​能,也改变了本事的文本形式,对后来的本事及其他文体都发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以诗证事的运用。初盛唐本事均以诗为主,引事明诗,中唐以后逐渐出现引诗证事一体。此类本事是以叙事为中心,以诗歌为旁证。前文已引述《中朝故事》中张祜诗本事以及《因话录》卷五中“有人”嘲右威卫荒芜诗本事,此外尚可举出如下本事:

咸通中,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浣绣州,萧连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湘到任,愤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玉泉子》)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归。师老失据。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刘禹锡曰:“名场险巇如此。”^①

《本事诗》中无其例,《云溪友议》中却有数条,如“玉箫化”文末引雍陶诗,“云中命”文末引段成式诗“曾话黄陵事”4句,“赞皇勋”文末引“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两句,均属引诗证事一体,可见,这一体例在

① 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文史》第四辑,第91页。

中晚唐本事中已较为普遍。引诗证事在《韩诗外传》中是作为一种表达意义的方式出现的,后来的《述异记》虽沿用证事体例,但所引之诗对叙事起补充或印证作用,这种实证方式为唐诗本事所继承,并对宋以后诗话等产生重大影响。

同杂录性本事的多方面演变相比,志怪性本事更多显示其发展的延续性。

中晚唐的志怪性本事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统计有近40条^①。这就远远超出初盛唐的数量,说明这一时期志怪性本事的广泛存在。这些本事,除见于《本事诗》和《云溪友议》外,一般见于志怪传奇集,如陈劭《通幽记》、薛渔思《河东记》、佚名《会昌解颐录》、段成式《酉阳杂俎》等。本事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记鬼神。此类故事通常是鬼魂显灵吟诗,或神仙现身吟诗。鬼魂事如“苕萝遇”、李叔零《死后诗》事、虎丘山石壁鬼诗事、襄阳旅殡举人诗事、河中鬼《踏歌》诗事等,神仙事如酒肆布衣《醉吟》诗事、广陵道士《戏吟》诗事、樵夫《贻白永年诗》事等。此类故

① 1. 酒肆布衣《醉吟》(《太平广记》卷八三引《潇湘录》); 2. 广陵道士《戏吟》(《续仙传》卷中); 3. 樵夫《贻白永年诗》(《神仙感遇传》卷二); 4. 李公佐《留诗》(《云笈七签》卷九九); 5. 李叔零《死后诗》(《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引《广异记》); 6. 虎丘山石壁鬼《诗二首》、《祭后见石上诗》(《太平广记》卷三三八引《通幽记》); 7. 元载诗讫(《太平广记》卷一四三引《通幽记》、卷三三七引《玄怪录》); 8. 陆凭《咏浮云》(《太平广记》卷三三九引《通幽记》); 9. 韩愈《呈李续》(《太平广记》卷三四〇引《河东记》); 10. 襄阳旅殡举人诗(《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 11. 顾况丧子诗(《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 12. 河中鬼《踏歌》(《太平广记》卷三四六引《河东记》); 13. 张省躬《梦张垂赠诗》(《酉阳杂俎》续集卷二); 14. 商山客死书生《述怀》(《太平广记》卷三四四引《会昌解颐录》); 15. 安邑坊女《幽恨诗》(《太平广记》卷三四六引《河东记》); 16. 苏检妻《与夫同咏诗》(《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引《闻奇录》); 17. 高侍郎诗(《太平广记》卷四五四引《会昌解颐录》); 18. 石季武《梦中诗》(《太平广记》卷二七九“李愬”条引《续幽怪录》); 19. 卢献卿《梦中诗》(《本事诗·征咎第六》); 20. 国郡南梦崔暇妻诗(《酉阳杂俎》续集卷三); 21. 峡中白衣人《赠马植》(《本事诗·征异第五》); 22. 许浑梦中诗(《本事诗·事感第二》); 23. 兴元山寺老僧《示段文昌》(《中朝故事》); 24. 清僧《示赵宗儒》(《太平广记》卷一五五引《定名录》); 25. 武元衡诗讫(《郡斋读书志》卷一七); 26. 杜牧题汴河诗讫(《感定录》); 27. 卢骈诗讫(《唐阙史》卷下); 28. 苕萝遇(《云溪友议》卷上); 29. 宗兄悼(《云溪友议》卷上); 30. 买山讫(《云溪友议》卷中); 31. 李群玉题二妃庙诗(《云溪友议》卷中); 32. 赵嘏诗讫(《唐摭言》卷一五); 33. 章孝标题杭州樟亭驿诗讫(《云溪友议》卷下); 34. 曹唐诗讫(《太平广记》卷三四九引《灵怪集》); 35. 沈询诗讫(《南部新书》庚); 36. 庙中土偶咏诗(《诗话总龟·前集》卷五〇); 37. 元和士人见屏上妇人踏歌(《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

事数量最多。第二,记诗讖,如献元载诗讖、老僧《示段文昌》诗讖、卢骈诗讖、峡中白衣人诗讖、“买山讖”、赵畚诗讖等。这些诗讖,或寓生死,或寓政治命运,内容较初盛唐同类本事广阔。第三,记灵怪,如《太平广记》卷四五四《张立本》引《会昌解颐录》所记妖魅惑人吟诗之事^①。中晚唐小说中多记灵怪吟诗之事,但多以叙事为主,属志怪小说,志怪性本事并不多见。第四,记梦。此类本事叙梦境,多为魂灵托梦吟诗,在内容上也可归入第一、第二类,如陆凭死后托梦《咏浮云》,韩愈死后托梦呈诗李续事,可归入“鬼神”一类,而张省躬梦张垂赠诗事,卢献卿梦中诗事,国邵南梦崔暇妻诗事等,因诗预生死,实可归入诗讖一类。

应该说,中晚唐志怪性本事比初盛唐同类本事在内容上有所拓展,但是这一拓展十分有限,延续远远多于发展。这种情况更表现在形式上,中晚唐此类本事没有创造更多的形式,没有明显的不同于此前的形式特征,这大约因为此类本事仍然只是作为志怪小说的一支,而未被视为诗歌批评的手段。

三、唐末五代本事

这一时期的上限是乾宁之后的光化元年(898),下限即南唐灭亡的宋开宝八年(975)。

这一时期的本事是杂录性本事和志怪性本事。

这些本事大多保留在五代及宋初的笔记中,如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何光远的《鉴诫录》、郑文宝的《南唐近事》、龙衮的《江南野史》、潘若冲的《郡阁雅谈》等。

孙光宪主要生活在五代,后唐天成元年(926),为荆南高季兴掌书记,历事从海、保融、继冲三世,累官荆南节度副使。《北梦琐言》作于江陵为官时期,该书多记晚唐五代遗闻轶事,诗事47条,其中中晚唐28条,唐末五代19条。据《北梦琐言》序,该书的写作是鉴于晚唐以后史籍的散亡,是为垂言补史,因事劝戒。但是,这样一部补史的著作并不像《国史补》那样严格遵循“传信”的原则,其中收有志怪故事,言涉虚妄。唐末五代时,彭城人刘山甫著志怪传奇集《金溪闲谈》十二卷,《北梦琐言》引佚

^① 按:即“高侍郎诗”事。

文 16 条,多为志怪故事,其中有诗歌本事。这种杂取志怪小说的作法在唐末五代较为普遍,其他史料笔记,如《剧谈录》、《中朝故事》、《鉴诫录》等,大多如此。因此,唐末五代志怪性本事大多见于史料笔记,这与此前同类本事多见于志怪小说有所不同。《鉴诫录》的作者何光远为五代时蜀人,该书记唐末五代杂事,以蜀事为多。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以为该书辑唐以来君臣事迹可为世鉴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赵氏未睹其书,因名臆说。其实,《鉴诫录》是以补史为目的的史料笔记,书名取以史为鉴之义,类似于《大唐新语》、《国史补》、《唐阙史》、《北梦琐言》等序文中“警诫”、“劝戒”、“垂训诫”、“因事劝戒”的说法。《鉴诫录》记事 66 条,其中诗事 44 条,诗事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与《云溪友议》相近,因此也可视为唐诗本事的专著。

唐末五代诗坛有两大中心,一是前蜀和后蜀,二是南唐。前后蜀时期的诗歌本事大多收录在《鉴诫录》里,南唐的诗歌本事则主要记载于《江南野史》及《南唐近事》。《江南野史》十卷,宋龙衮撰。其书专记南唐事,用纪传体。今本《江南野史》存诗歌本事 18 条,又《诗话总龟·前集》收录龙衮《江南野录》诗事 26 条,其中 15 条见于《江南野史》。《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江南野史》提要指出:“陈陶、孟宾于诸人有传,而查文徽、韩熙载诸人乃悉不载。考郑樵《通志略》,载此书原二十卷,此本阙十卷。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凡八十四卷,而此本阙五十卷,殆辗转传写,佚脱其半。钱曾《读书敏求记》亦作十卷,则明以来已无完本。”则《诗话总龟·前集》所引《江南野录》中的诗事俱出《江南野史》,《江南野录》即《江南野史》,因今本《江南野史》残缺,故未能涵盖《江南野录》的收录范围。合两处收录,去重补缺,可得诗事 28 条。《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南唐近事》提要说:“其体颇近小说,疑南唐亡后,文宝有志于国史,搜采旧闻,排纂叙次,以朝廷大政入《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余丛谈琐事,别为辑缀,先成此编。一为史体,一为小说体也。”该书载诗事 11 条。又《诗话总龟》引《南唐近事》诗事 12 条,5 条与今见《南唐近事》互见,其他 6 条为其所无,可见今本《南唐近事》亦非完帙。合两处收录,共得诗事 18 条。

《郡阁雅谈》出自宋时潘若冲。《郡斋读书志》卷一三“郡阁雅言”云:

“皇朝潘若同撰^①。太宗时守郡与僚佐话及南唐野逸贤哲异事佳言,辄疏之于书,凡56条,以资雅言。或题曰《郡阁雅谈》。”该书早已散佚,《诗话总龟·前集》引佚文34条^②,宋代何汶《竹庄诗话》注明出自《郡阁雅谈》诗事有4条,其中3条见于《诗话总龟》,1条记繁知一闻白居易过巫山事,此事又见《云溪友议》,是《郡阁雅谈》复记此事,还是《竹庄诗话》误引出处,难以遽定。《诗话总龟》所引《郡阁雅谈》条目不专五代诗事,也涉及中晚唐诗事,即使是五代,也不限于南唐一朝。另有文中所记吴崇岳为宋人,其诗事不在五代范围,因此,《郡阁雅谈》的收录情况较为复杂。

唐末五代的杂录性本事沿着中晚唐同类本事的发展路径继续发展。

首先,本事更具谈艺色彩,议论更为普遍。这一时期有更多的本事具有只言片语的议论,或以议论贯穿全文,议论的内容包括诗歌意旨、艺术风格、著作考辨等。如《北梦琐言》中的一些本事: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僚,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吟此诗,有以见。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卷二“授任致寇”)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卷二“放孤寒三人及第”)

唐前朝进士陈咏,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弈棋。昭宗劫迁,驻蹕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又有乡人拓善者,属和韦诗,其略云:“让德已闻多士伏,沽名还得世人闻。”……谬称冯副使涓诗,以涓多谐戏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诗,假冯公之名也。

① 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公武避父讳改‘冲’作‘同’。若冲,太平兴国六年以右赞善大夫知扬州,官终桂林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83页。

② 《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录李白“醉吟诗”及“忆贺知章”诗,然该条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二〇一“李白”条引《本事诗》,文字略同。

（卷七“郑准讥陈咏”）

进士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卷七“高蟾以诗策名”）

第一则揭示诗旨，第二则比较诗风，第三则考辨诗作，第四则介绍诗风，剖析诗意。此外，卷七中“郑紫相诗”条追踪创作心态，“洞庭湖诗”条探讨诗风雅俗，均为谈艺之体。《鉴诫录》中也有这样的谈艺片段，如卷五“容易格”条讨论唐末五代诗人卢延让的诗格与诗境，以议论贯穿始终。卷四“轻薄谏”条谓冯涓“清苦直谏，比讽箴规，章奏悉干教化，所著文章，迥超群品”。卷九“削古风”条谓杜荀鹤诗“悉干教化，每于吟讽，得其至理”；“分命定”条称“是知诗者，陶人情性，定乎穷通”。无不由诗事个案上升为具有理论色彩的判断。作为史著或“史之余”的《江南野史》和《南唐近事》，也不乏谈艺色彩和议论倾向。《南唐近事》中，陈乔、张俄登高吟杜甫重阳诗条涉及诗歌欣赏，黄可好用“驴”字一条涉及诗歌创作，均属于谈艺范畴。《江南野史》所载江为、潘阆、夏宝松、孙鲂、陈颙等人的诗事也有这种有鲜明谈艺色彩的议论。

自中唐以后唐诗本事中出现的谈艺色彩和议论倾向愈来愈鲜明广泛，至五代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上面介绍的唐末五代的诗歌本事中，也表现在五代作者所收录撰写的中晚唐诗歌本事中，如王定保于后梁末帝贞明时编撰的《唐摭言》中就有很多关于诗歌本身的讨论。对于唐诗本事来说，这种谈艺色彩和议论倾向是重要的两翼，前者使唐诗本事逐渐从专记军国政教之事的史著中独立出来，后者使唐诗本事从单纯的叙事逐步向事、论结合的诗话过渡。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将诗话分为“论诗而及事”和“论诗而及辞”两大类，前者以记事为主，后者以评论为主，而唐诗本事实已具备“及事”、“及辞”两种形态。后人论诗话的起源，一般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标志，其实，诗话的基本形态早在唐诗本事中就已奠定下来了。

第二，录诗功能进一步强化。中晚唐本事中的录诗现象较为普遍。

唐末五代,这种现象进一步蔓延,除《南唐近事》外,上面列举的《北梦琐言》等四部著作中的本事均有录诗倾向。在这些著作中,《北梦琐言》、《江南野史》、《郡阁雅谈》的录诗还是零星的,偶然的,而《鉴诫录》则是大量的、自觉的。《鉴诫录》中具有明显录诗倾向的本事多达 22 条,占到全部本事的一半。有些本事注重录诗,甚至以录诗为主体,如卷五中“徐后事”、“高尚士”、卷八中“作者同”三条纯粹的录诗达 10 余首,成为本事的主体。随着本事的录诗功能的急剧膨胀,叙事因素和解诗功能逐渐萎缩,一些条目趋于极端,录诗取代叙事和解诗,取得独立地位,这时的本事已经蜕变为一种纯粹的存诗形式,如“作者同”条几乎忽略叙事,成为一个诗歌的链接体。前文已提及,《鉴诫录》体近诗话总集,在唐末五代,这是一部最能体现本事文本的著作,其中对录诗功能的强化可视为唐末五代本事的基本特征。

第三,以诗证事发展演变。这一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以诗证事的本事。这些本事有的继承了此前本事的证事特点,即本事中的“事”出于本事“诗”以外的传说和记载,有独立于“诗”的文献来源,“诗”不过印证这些传说和记载,这是以诗证事的通常情况。也有一些本事具有与此不同的证事特点,如下面两条本事: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唐摭言》卷一五)

竟陵人刘虚白擢进士第,嗜酒,有诗云:“知道醉乡无户税,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为孔门之徒,得无违告诫乎?(《北梦琐言》卷六“陆相公劝酒事”)

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还刘德仁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刘不能变态,乃陆(按:指陆龟蒙)之比也。(《北梦琐言》卷六“陆龟蒙追赠”)

第一则本事与史不符^①，显然出于对薛能诗句的解读，别无来源。刘虚白的生平，史载极少，除此之外，仅《唐摭言》卷四记载虚白试举日帘前献诗裴坦一事，诗也仅存一首及此一联。此所谓“嗜酒”，当出于后引“诗句”，别无文献依据。因此，引诗证事其实是“自证自”，在这里，“事”出于对“诗”的解读，“诗”是作为“事”来运用的，“诗”、“事”如一。下一条“讥刘不能变态”的叙述，显然出自前引诗句，证事特点与上一条相同。上述证事特点是此前本事所无，可视为以诗证事的变异形式。这种以“诗”为“事”的新形式为后世学者从诗中勾稽诗人生平事迹提供了方便法门，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这一时期的志怪性本事也大多出于上面几种著作。《鉴诫录》有5条：“鬼传书”（卷二）、“怪鸟应”（卷六）、“走山魃”（卷八）、“高僧谕”（卷十）、“鱼还肉”（卷十）。《北梦琐言》有4条：高骈风筝诗事（卷七）、“刘山甫题天王”（卷九）、“薛准阴诛”（卷十）、“杨鼎夫是盐里人”（《太平广记》卷一五八引）。《郡阁雅谈》有4条：范攄之子及欧阳彬之子诗讖、陈省躬见书生高咏、许鹄题歌上升、张嘏鬼魂咏蝴蝶。《江南野史》有2条：沈彬葬处冢中碑文事、卢绛梦白衣妇人咏诗事。其他笔记或文记，如陈纂的《葆光录》、王仁裕的《玉堂闲话》、郭廷海的《广陵妖乱志》等，也载有此类本事。本事的内容也是四类：一是鬼神。如“鬼传书”、“高僧谕”、“刘山甫题天王”、“薛准阴诛”等，其中有言及因果报应者。二是诗讖。如“怪鸟应”、高骈风筝诗事、范攄之子及欧阳彬之子诗讖等。三是灵怪。如“走山魃”、“鱼还肉”等。四是记梦。如卢绛梦白衣妇人咏诗事。唐末五代的时间仅70余年，但现存的志怪性本事多于初盛唐，成为本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志怪性本事在形式上没有变化，可以看作是此前同类本事的自然延伸。

应该说，唐末五代不是一个产生传奇性本事的时代，虽然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梁太祖伏侍文士”条记载的杜荀鹤诗事属传奇性本事，但这只是个别情况，这种偶然的特例不过是此类本事消亡之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① 详见《考证篇》“34 薛能”条。

第三章 本事的漫衍分化

作为一种文体,本事在五代以后并未遽然消失,而是凭借唐诗本事的发展惯性继续生存和演变。北宋中期以前,诗歌本事大致呈现出这一蔓延状态。中期以后,作为后来诗歌批评主要样式的诗话出现了,唐诗本事引导了诗话的产生,并因此对宋人诗话、诗选以及后来的诗人传记产生重要影响。在此演进过程中,唐诗本事的小说特质进一步强化,并直接影响了宋代文言小说的创作。因此,本事在宋代一方面向学术发展,另一方面向小说发展。

第一节 本事的余绪

前文已述,唐末五代本事的下限我们定在南唐灭亡的宋开宝八年。以此为标志,随着五代的终结,唐诗本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唐诗本事之后,由本事演化而来的诗话成为诗学史上最为重要、且运用最为广泛的诗评形式。作为诗话产生标志的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六一诗话》成于欧阳修晚年^①,时值北宋中后期。从唐诗本事的结束到诗话的正式产生历时百年,这一时期可视为从本事到诗话的过渡时期。开宝八年以后,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唐诗本事虽已完结,但诗事并未消失。此后的100年,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诗事,这些诗事以及由诗事演化而来的录诗、评诗等是唐诗本事的自然延伸,因而可视为唐诗本事的余绪。

这一时期,记载诗事的小说笔记主要有王举的《雅言系述》、张靓的

^① 《六一诗话》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郭绍虞《宋诗话考》卷上:“此书乃熙宁四年(1071)欧公致仕以后所作。”

《雅言杂载》、黄休复的《茅亭客话》、杨亿的《谈苑》、江休复的《江邻幾杂志》及文莹的《湘山野录》、《玉壶清话》。

《雅言系述》为宋初笔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十卷。原书已佚,《诗话总龟·前集》存佚文36条,《锦绣万花谷》存数条。作者王举事迹未详,《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雅言系述》云:“王操字正美,江左人。太平兴国上《南郊赋》,授太子洗马。”在佚文中,该条事出最晚,则该书当作于太平兴国以后,王举为宋初时人。现存该书佚文记五代末年至宋代初期的诗歌创作情况,其中载录诗人生平、诗歌唱和及诗歌本事,特别是存录了大量的雅什警句。与《雅言系述》的出现约略同时且内容、文体近似的是《雅言杂载》。《雅言杂载》原书已佚,也未见著录,《诗话总龟·前集》存佚文30条,文末出处又称《雅言杂录》。据《诗话总龟·前集》中《集一百家诗话总目》,该书作者为张靓,然生平不详。《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沈廷瑞”条引《雅言杂载》,谓陈智周“于端拱二年登第,授衡阳尉卒”。在佚文中,此条事出最晚,则该书当作于宋太宗端拱(988—989)以后,张靓生活年代与王举相近。现存该书佚文也多记五代末至宋初诗事及诗作,同样偏重存录佳什警句。

《雅言系述》和《雅言杂载》因已散佚,难窥全貌,但从书名及现存佚文看,这两部著作是有关诗歌的专题著作,主要记载诗人生平、诗歌本事,存录诗篇,这与一般对诗歌仅作涉猎的笔记有所不同。

此后出现的载有诗事的笔记主要有《茅亭客话》、《杨文公谈苑》及《江邻幾杂志》。《茅亭客话》十卷,作者黄休复,蜀中人。据书末宋元祐癸酉(元祐八年,1093)清真子后序,此书时已藏于笥中50余年,则书成于1040年以前。该著所记皆作者亲历见闻,均为蜀中事,起自前、后蜀,终于宋真宗朝,其中10条诗事均交代诗歌创作缘由,大多有较强的叙事性。《杨文公谈苑》的出现约与《茅亭客话》同时,该著是由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的一部笔记。杨亿是宋初著名文学家、诗人,也是西昆诗派的领袖,故谈说多及雅言。黄鉴笔录早已湮没无闻,宋庠删订的今名原本也已散佚,今有李裕民勾稽诸书而成的辑校本,辑本存有关诗的条目计43则,多为诗事,其中宋初诗事最多。《杨文公谈苑》之后,江休复的《江邻幾杂志》多记载诗事。该书或称《嘉祐杂志》、《杂志》。休复字邻

幾,工诗,曾与苏舜钦、欧阳修交游。据欧阳修所作江休复墓志,休复卒于嘉祐五年(106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嘉祐杂志》提要谓“是书屡记己亥秋冬之事,即休复未歿之前一年”。则该书成于休复晚年。书中有关诗的条目有28则,其中诗事14则,录诗9则,其余涉及诗评或考证。该书诗事叙述极为简括,常寥寥数语,无具体情节。

文莹《湘山野录》和《玉壶清话》的出现与《六一诗话》的纂集时间相近。文莹为北宋时吴僧,常出入贵官显宦之家,交游尽馆殿名士,曾与苏舜钦、欧阳修往还。据《郡斋读书志》,《湘山野录》撰于熙宁中^①。书中卷上“张乖崖成都还日”条有“质剂之法”“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等语,可见《郡斋读书志》所言不误。至于《玉壶清话》,其卷首自序云“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这两部书的完成虽略晚于《六一诗话》,但仍可作为诗话出现之前的笔记。《湘山野录》和《玉壶清话》主要记载五代后期及北宋前期的传闻轶事,其中多记诗事。《湘山野录》包括《续录》)记诗事59条,《玉壶清话》记诗事41条。

以上笔记中有关诗的条目继承并发展了唐诗本事的叙述体制,也强化了本事向诗选、诗评和考证的蜕变。

这一时期的本事基本承袭了唐诗本事的说诗、解诗方式,但具体形式却有所发展,如《雅言系述》中的两则本事:

蒋钧字不器,营道人,与刘洞、陈甫为诗友。寄柳宣云:“因借梦书过竹寺,学耕秋粟绕茅原。”戎昱诗有“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门外有芭蕉”,钧代答云:“芭蕉叶上无愁雨,自是多情听断肠。”(《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四)

陈文亮,闽人。少为浮屠,后入王氏幕下,终遇害。僧文或有诗赠之曰:“闻学汤休长鬓髭,罢修禅颂不披缁。龙孟虎锡安何处,象简银鱼得几时。宗炳社抛云一榻,李膺门醉酒千卮。莫言谁管你闲事,今日尘中复是谁?”文亮为僧尝为诗云:“谁管你闲事,尘中自有人。”故文或讥之也。及遇害,文或复吊之云:“不知冥漠下,今似鹧鸪

^① 《郡斋读书志》卷一三:“《湘山野录》四卷,右皇朝熙宁中僧文莹撰,记国朝故事。”

无?”为文亮尝《代迁客吟鹧鸪诗》云:“毛羽锦生光,江南是你乡。四山声欲合,迁客路犹长。相应隈丛竹,低飞近夕阳。就中汨罗岸,纤细断人肠。”(《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九)

这两则本事均属以事解诗,但与唐诗本事中的形式有所不同。首先,唐诗本事一般只是叙说故事,并无明确的解诗用意,解诗的功能隐含在叙述之中。此两本事中的叙事部分完全以解诗为目的,用意明确、直接。其次,作为诗歌写作缘起和意义本源的交代,唐诗本事一般针对全篇,而此两本事仅限于篇中诗句。唐诗本事中也有一些诗句的本事,但那些本事一般交代诗句的创作过程,介绍诗句为人鉴赏的情况,并不涉及诗句的意义来源。此两本事将唐诗本事中针对全篇的解诗方式移之诗句,为一大演变。不仅如此,唐诗本事中的写作缘起和意义来源均为现实之事,而上引本事第一条所引戎昱诗,实为事典,这又是一个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解诗形式后来成为宋代诗话诠释典故的先导。

同唐诗本事一样,这一时期的诗事仍以说诗、解诗为主,但同时也继承了唐诗本事以诗证事的体制。如《湘山野录》卷下“苏子美以奏邸旧有赛神之会”条,《续湘山野录》“嘉祐中仁宗自内阁降密敕”条,《玉壶清话》卷三“卢多逊相生曹南”条,均以叙事为中心,以诗证事,与唐诗本事中的证事体制并无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证事体制这时出现了重要变化,“证事”有时不是对事件的印证,而是对名物或典故的诠释,如下引诗事:

砌台即今之擦台也。王侯家多作砌台,以为林观之景。唐张仲素诗云:“写望临香阁,登高下砌台。林间见青使,意上直钱来。”即知唐来有之。太祖朝大王都尉家,其事曰承裕,幼时其父戏补砌台使。(《杨文公谈苑》“砌台”)

江南人多畚田,先炆炉,纵火燎草也;炉,火烧山界也。俟经雨乃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种艺。……刘禹锡谪连州,作《畚田》诗云:“团团纒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坼芽蘖。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白居易《子规歌》云:“畚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畚,《尔雅》云:“一岁曰蓄,二岁曰

新,三岁曰畬。”《易》曰:“不菑畬。”皆同音,凡三岁而不可复种,盖取畬之义也。(《杨文公谈苑》“畬田”)

岭南雷州及海外琼崖,山中多香树,山中夷民斫来卖与人。其一树出香三等,曰沉香,曰笏香,曰黄熟香。沉、笏皆二品,曰熟结,曰生结。……郑文宝诗曰:“沉檀香植在天涯,贱等荆衡水面槎。未必为槽饲鸡犬,不如煨炆向豪家。”(《杨文公谈苑》“沉香木”)

余杭能万卷者,浮图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风节,有奥学,著《典类》一百廿卷。……后诸生始敬此书。又有云松液入地为虎魄者。唐李峤《咏魄》诗有“曾为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蛟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覩”之句,未知孰是?余顷见虎魄中蛟蚋数枚,凝结在内,信峤诗不诬。(《湘山野录》卷中)

前三条诠释名物,引诗为证,且引诗不止一条。后一条引诗则具有考释名物典故的意义。此类以诗证事形式在唐诗本事中也偶有出现,如《中朝故事》记《阿滥堆》笛曲的来源,引用张祜诗歌,但这种形式的泛滥是在宋代,宋人诗话多用此形式,《诗话总龟·前集》中的《博识门》、《书事门》及《故事门》即多收录此类诗话。

录诗的倾向这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著作录诗的比重在增大。《雅言系述》和《雅言杂载》以录诗为主,不仅本事之后附录大量诗歌,而且很多条目纯为录诗,并无诗事。《江邻幾杂志》在体制上本属叙事,但说诗条目近三分之一是录诗,亦无叙事。一些笔记中的条目录诗功能急剧膨胀,如《续湘山野录》“王平甫安国奉诏”条录花蕊夫人诗30余章,《杨文公谈苑》中“雍熙以来文士诗”、“钱惟演刘筠警句”及“近世释子诗”条录诗句竟达百余条或数十条,这种变本加厉的录诗倾向使本事进一步向诗话和诗选转变。

说诗条目中的诗评一般继承了唐诗本事中诗评的形式和特点,这些诗评大多杂侧于诗事之中,有的评介诗人,如《玉壶清话》卷五评杨徽之诗云:“以天地浩露,涤其笔于冰瓯雪碗中,则方与公诗神骨相附焉。”卷七评魏野云:“其诗固无飘逸俊迈之气,但平朴而常,不事虚语尔。”有的评点诗歌,如《湘山野录》卷上谓陈亚诗句“皆不失风雅”,又谓欧阳修歌

词“飘逸清远，皆(李)白之品流”。还有一些条目以诗评贯穿全篇，诗评几已取代诗事，如《湘山野录》卷上评寇准诗作，《玉壶清话》卷七评徐东野、李宏皋诗文。这些诗评一般是作家作品的评述，但也偶有诗歌专题的讨论，如《杨文公谈苑》中“唱和联句”条专门探讨唱和联句的源流体制。可见，这时的诗评在形式上是丰富多彩的。

诗评之外，尚有考证一体，如下列几条：

李白诗：“君不见裴尚书，古坟三尺蒿棘居。”问修《唐书》官。吕缙叔云是崔，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检校官与李北海作对，非龊龊人也。”（《江邻幾杂志》）

王右丞济州诗云“汶阳归客”，司马君实云：“其地则唐济鄆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诗，初谓是僧名，乃寺名，近东阿覆釜村。（同上）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止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湘山野录》卷上）

舒州祖山因芟薙萝蔓，得一诗刻在峭壁，乃杜牧之《金陵怀古》也。曰：“《玉树》歌沉王气终，景阳兵合曙楼空。梧桐远近千家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翻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江山似洛中。”遍阅集中无之，必牧之之作也。又《薛许昌集》中见之。（《湘山野录》卷中）

第一条考证人名，第二条考定地名，第三、四条确定作品归属。第三条以词作属李白，为千古聚讼不已的一段公案。第四条定《金陵怀古》为杜牧诗，又谓亦见于薛能诗集，其实该诗乃许浑所作，许浑《丁卯集》卷六及《乌丝栏诗真迹》俱载此诗，并无疑义。此类考证文字，唐诗本事中已偶有出现，此后逐渐增多，至宋人诗话，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说诗内容。宋代许颢的《彦周诗话》在界定诗话时，以“正讹误”为诗话之一类，《诗话总

龟·前集》卷三一亦有“正讹”一栏。考证文字即属此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说诗继承了唐诗本事的体制特点,并有所发展,成为本事向诗话过渡的重要环节。

在此一部分,我们还必须讨论自本事而来的“续本事”问题。

重编《说郛》卷八〇收有题名聂奉先的《续本事诗》,该书录文 15 条,厘为一卷。已有学者指出,这里的书名其实是不确的^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记载:“《续广本事诗》五卷,聂奉先撰,虽曰广孟启之旧,其实集诗话耳。”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载相同,可见聂奉先所撰为《续广本事诗》。至于《续本事诗》,其实是另一部著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总集类著录《续本事诗》二卷,其提要云:“右伪吴处常子撰,未详其人。自有序云:比览孟初中《本事诗》,则搜篋中所有,依前题七章,类而编之。然皆唐人诗也。”据此,《续本事诗》的作者为处常子,乃五代时人,重编《说郛》以《续本事诗》属聂奉先,实为张冠李戴。

处常子的《续本事诗》今已散佚,但《诗话总龟·前集》有少量佚文存留^②。与《续本事诗》不同,《续广本事诗》并无散见的佚文,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15 条,其中 14 条又见于《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书事门”^③,这 14 条是“市语”、“禁酒”、“软红”、“冰厅”、“红曲酒”、“葡萄酒”、“芡实”、“酴醾”、“诗媒”、“海棠”、“笔管诗”、“白雁”、“簿尉”、“槐黄”,另一条“甘露事”出自葛立方《韵语阳秋》中有关杜牧的一段文字,这段文

① 见吴企明《唐集质疑四题·〈续本事诗〉书名和撰人姓名考辨》,文载《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13~216 页。

② 《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罗邕《牡丹》诗,卷二一载齐己《松》、《小松》诗,白居易、顾云《柳》诗,阴铿《石》诗及罗邕、郑谷、韩喜三人《水》诗。又卷四六引《诗史》,载道士马自然诗,并云:“《续本事集》更有二首诗。”下引两诗全文。此《续本事集》当即《续本事诗》,引文称马自然“广明中梓州上升”,乃晚唐人,诗作年代与《续本事诗》编撰年代吻合。今所见《续本事诗》佚文仅此 6 条。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引《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一白居易、顾云《柳》诗后小注,文作“《唐宋诗》云,罗隐作《续本事诗》”,以为《续本事诗》为罗隐所作。此说大误。按:注文应作“《唐宋诗》云罗隐作。《续本事诗》”——意谓《诗话总龟》所引顾云《柳》诗在《唐宋诗》中注为罗隐作,而《总龟》所引该条出自《续本事诗》。该条为《总龟》引录《续本事诗》的第二条,如《总龟》认为需要说明《续本事诗》的作者,根据该书体例,当于第一条出注,不应置于第二条。《续本事诗》所引顾云《柳》诗,罗隐《甲乙集》卷三、《才调集》卷八、《文苑英华》卷三四俱作罗隐诗,故《唐宋诗》注云罗隐作。

③ 《诗话总龟·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91~299 页。

字又见于《诗话总龟·后集》卷一四“评史门”。

《诗话总龟·前集》虽或有后人增补,但基本为阮阅原本之旧,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六所引阮阅《诗总》自序,原书成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韵语阳秋》的完成,据徐林《韵语阳秋序》,是在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既然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选录《韵语阳秋》中的文字,则该书的出现要晚于《诗话总龟·前集》的成书。可见,《诗话总龟·前集》14条时间在前,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14条时间在后。对照有关条目及文字,可以发现:第一、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14条的编序与《诗话总龟》卷二九中相应条目的顺序完全相同。第二、该书“甘露事”条引杜牧诗,有“铁锁朱殷几一空”一句,文字与《诗话总龟·后集》卷一四“评史门”引文相同,而与宋本《韵语阳秋》引作“铁锁朱殷几一空”有异。可见,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抄自《诗话总龟》。

关于《诗话总龟》前后集的纂集完成,元代方回的《桐江集》有下面一段记载:

《诗话总龟》前后续别七十卷,改阮阅休旧序冠其首。阅休《诗总》不可得,而阅休旧序全文在《渔隐丛话·后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阅休谓:“宣和癸卯官彬江,类得一千四百余事,分四十六门。”而《总龟》今序删去此语。如“栗炮烧毡破,猫跳触鼎翻”所引六联,即今序犹袭用之。按,今《总龟》又非胡元任所见闽本《总龟》矣。元任所见全去阅休旧序。今余所见序,乃间用阅休语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岁在屠维赤奋若,即当是绍定二年己丑书坊本也。书目引《南轩东莱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谓作序人华阳逸老者,书坊伪名;所谓集录益都褚斗南仁杰者,其姓字不芳。中间去取不当,可备类书谈柄之万一,初学诗者,恐不可以此为准也。(《续修四库全书》1322册集部别集类《桐江集》)

前已提及,《诗话总龟·前集》基本为阮阅《诗总》旧本,成于北宋徽宗宣

和五年。据方回的上述记载,后集乃书贾所为,成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①。一般认为,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的聂奉先《续广本事诗》的残帙^②。《直斋书录解題》完成的时间难以确考,但陈振孙卒于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③,《直斋书录解題》的完成在此以前。如果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确为《续广本事诗》的残帙,则该书只能出现在绍定二年以后,依据的是景定三年以前的《诗话总龟》版本。

但是,通过有关文字比勘和版本分析,我们发现,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的文本依据是元代以后的版本。该书“海棠”条记载:

东坡谪黄州,居于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而独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东坡为作长篇,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为得意诗也。”

这段文字与《四部丛刊》所收月窗本《诗话总龟》文字相同。月窗本之外,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藏有一百卷的明代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本于“东坡为作长篇”一语之后尚有一句:“其中最警策者‘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这20字当为原本文字,而月窗本脱漏。月窗本《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与一百卷抄本对照,缺《寄赠门》中、下两卷,其

① 郭绍虞《宋诗话考》上卷《诗总》以为当时有两种《诗话总龟》刊本:“一为乾道五年(1169)刊本,有华阳逸老之序。一为绍定二年(1229)刊本,为褚斗南仁杰集录之本。”这是误解了方回的原意。原文意谓《诗话总龟》前后续刊七十卷为褚斗南纂集,书首有华阳逸老所作序文,序尾称岁在屠维赤奋若,可见书成于己丑年,但不是乾道五年己丑,因为《总龟·后集》书目中的《南轩东莱集》成于乾道五年之后,因此,只能是此后的绍定己丑。可见原文只提到一个刊本。方回的推测还可进一步证实:《总龟·后集》书目中尚列王明清《挥麈录》,后集卷二又引《挥麈后录》文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挥麈录》提要云:“后录为绍熙甲寅(1194)武林官舍中所记,……第三录为庆元初(1195)请外时所记。”可见《挥麈录》的完成远在乾道五年之后,《总龟》后集不可能成于乾道五年。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宋诗话考》均为此说,吴企明《唐集质疑四题·〈续本事诗〉书名和撰人姓名考辨》、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及吴文治《五朝诗话概说·附录》因之。

③ 陈乐素《〈直斋书录解題〉作者陈振孙》(载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六期)以陈振孙卒于景定二年或三年。何广棣《陈振孙生卒年新考》(载《文献》2001年第一期)定于景定三年。

余卷目相同,可见月窗本属于一百卷本系统。据方回《桐江集》卷七《渔隐丛话考》及《诗话总龟考》记载,《诗话总龟》前后集最初以七十卷本流传。《桐江集》作于由宋入元以后,可见,至元代初年,流行的《诗话总龟》是七十卷本。一百卷本自七十卷本演化而来,其出现更在元代初年以后。从南京图书馆藏本的情况看,一百卷本原来并无前引 20 字的脱漏,脱漏是一百卷本后来出现的。由此推知,20 字脱漏是元代以后才出现的。据此,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源出元代以后的一百卷本《诗话总龟》,已经不是《直斋书录解題》所著录的聂奉先的《续广本事诗》,甚至与《续广本事诗》毫无关系。

所谓聂奉先《续本事诗》仅见于重编《说郛》,即宛委山堂本《说郛》,原本《说郛》未见。宛委山堂本《说郛》为清初顺治四年(1647)陶珽刊刻,而在此以前,月窗本《诗话总龟》已于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付梓问世^①,成为流行的著作。可以推测,《说郛》重编时,编者采择月窗本《诗话总龟》中的一些条目,又窃取《直斋书录解題》中聂奉先《续广本事诗》的名目,因以伪托。但因属事草率,不暇致详,将聂著与《续本事诗》混为一谈,致有书名之误。以上推测不足为奇。鲁迅先生《破〈唐人说荟〉》曾历举《唐人说荟》的种种欺人之处,以为重编《说郛》等小说丛书是“胡闹的下手人”^②。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附卷《伪书辨证》辨证唐五代志怪传奇中的伪书 50 余部,其中收入重编《说郛》者达 16 部。这些伪书大多采摭旧籍,妄拟书名,情形与《续本事诗》类似。可见,重编《说郛》本《续本事诗》不过是明人编造的一部伪书,聂奉先的《续广本事诗》早已散佚,今已无从见到了。

第二节 本事的学术化

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产生标志着本事的学术化。这样说基于下面两个原因:首先,《六一诗话》是一部独立的诗话专著。文莹《湘山野录》

① 月窗本跋语文末有“时嘉靖岁次乙巳春三月吉旦番禺后学程光谨识”。

② 《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6~108 页。

和《玉壶清话》的完成虽然与《六一诗话》的纂集约略同时,其中的本事与初期诗话性质相同,甚至后来书贾摘录《玉壶清话》中有关于诗者,别出《玉壶诗话》,但这些本事毕竟散见于笔记,未能成为独立的著作,不能视为诗话的开始。其二,《六一诗话》的纂集虽意在资闲谈,并无学术目的,但自此以后,诗话逐渐成为严肃的诗评文体,并引出其他学术文体,具备学术品格的诗话和其他文体著作也因此不断出现。因此,《六一诗话》可视为本事学术化的起点。

宋代许颢在其《彦周诗话》的开篇曾对诗话内容作过一段极为概括的归纳,他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所谓“备古今”指备录古今诗篇,“纪盛德”指记载诗歌名家,“录异事”指载述诗歌故事。这三个名目虽是概括诗话内容的,但移之以言本事,也是极为恰当的。事实上,它们不仅可以概括本事的基本内容,也能反映本事对宋人诗话、诗选及后来的诗人传记的影响,可用以说明本事学术化的具体内涵。

一、记载诗事

诗话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起于先秦及汉代的论《诗》,有的认为起于钟嵘《诗品》,也有的认为起于唐代诗格、诗式一类著作,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则认为诗话受《本事诗》的直接影响。这些意见虽有不同,但各家都不否认诗话这一名目是出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如果我们承认《六一诗话》是第一部本来意义上的诗话著作,那么,就诗话的发生而言,其直接渊源应是诗歌本事。《六一诗话》原名《诗话》,“话”即故事之意。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①诗中“听话”,即听《一枝花》话,就是听《一枝花》的故事。诗话之“话”,意义由此而来。因此,所谓“诗话”,即关于诗歌或诗人的故事。《六一诗话》说诗凡28则,其中21则是叙述故事的。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也认为《六一诗话》以纪事为本。

^① 《元稹集》卷一〇。

这种纪事体制正是诗歌本事的特征,毫无疑问,诗话是从诗歌本事演化而来。

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及刘攽《中山诗话》出现最早,这三部诗话体现了宋代早期诗话的面貌,可视为这一时期诗话的代表。这些早期诗话是在本事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因而在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承接性。

1. 体制格调的接近

诗话在名目上取自“说话”,具有叙事性,但在体制上与“说话”并不相同。元稹诗注谓“说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可见唐人“说话”是讲述一段内容复杂、情节曲折的故事,这类似篇幅较长的传奇小说。但是宋人诗话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只是一个事件片段,在体制上与笔记接近。我们将本事分为传奇性本事、杂录性本事和志怪性本事,诗话在体制上主要继承了后两类本事的特征。早期的三部诗话,凡叙事的条目,多是内容简短的片段,与杂录性本事和志怪性本事并无不同。

这种叙事简单的诗话最初是用以消遣的谈柄。《六一诗话》开卷交代:“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见诗话的写作纂集出于消遣目的,并非出于学问的研讨或史料的积累。这种消遣的态度也是一些记载诗歌本事的笔记的写作态度。如《国史补》序自谓采择标准之一是“助谈笑”,《刘宾客嘉话录》多记剧谈、新语,而写作目的也是“传之好事,以为谈柄”^①。《唐阙史》虽循补史之名,但内容多有“资谈笑者”^②。《云溪友议》主要记载本事,其序谓“僦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内容也多是饭后茶余用以消遣的闲谈。应该说,诗话的消闲态度正是出自笔记,特别是其中的诗歌本事。这种影响还延伸到诗话的行文风格。可以想象,既然诗话是用以闲谈的,那么也就不必一味庄重严肃,有时不妨轻松随意,甚至幽默诙谐,因为不受严谨刻板的学术规范的限制,随意而谈,所以诗话行文通常自由灵活,生动有趣。这一风格也大抵与诗歌本事相近。

^① 《刘宾客嘉话录》序。

^② 《唐阙史》序。

2. 叙事类型的趋同

唐诗本事受唐前志人小说和唐代杂事小说的影响,故事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这一特征也部分影响到诗话,早期诗话出现了与唐诗本事相同或相近的故事类型,这些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讥诮。如《六一诗话》中“仁宗朝”、“吴僧赞宁”、“吕文穆公”、“圣俞尝云”4条,《温公续诗话》中“惠崇诗”、“陈亚郎中”、“刘子仪”3条,《中山诗话》中“刘子仪赠人诗”、“王益柔胜之”、“李绚公素”、“祥符天禧中”、“王丞相”、“山东二经生”、“梅圣俞”、“太宗时”8条。(2)捷对。如《六一诗话》中“吴僧赞宁”条,《中山诗话》中“王丞相”条。(3)称赏。如《六一诗话》中“晏元献公”、“自科场用赋取人”两条,《温公续诗话》中“鲍当善为诗”、“林逋处士”、“寇莱公诗”、“陈文惠公尧佐”3条。(4)诗讖。如《中山诗话》中“黄觉仕宦不遂”条,与诗讖类似的语讖,如《六一诗话》中“郑谷诗名”条,《温公续诗话》中的“梅圣俞之卒”条。(5)苦吟。如《六一诗话》中“陈舍人从易”条。这些诗话类型无不源出本事中的相近或相同类型。宋代前期的诗歌本事虽也部分继承了唐诗本事的叙事风格和体制特征,但叙事类型相对模糊,早期诗话的类型化倾向主要还是远绍唐诗本事。

诗话与本事不仅有叙事类型的趋同,而且有故事形式的近似。读完唐诗本事,再读宋人诗话,一些故事会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我们不妨将这些诗话与本事作如下对照:

本 事	诗 话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牵船,见一老姬摇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旁河摇橹?”答曰:“丈夫不跨马挥鞭,因甚旁河牵船?”又尝与人草中同盘共饮,见一姬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以对。(《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九引《因话录》)	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亦自能撰述,而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有安鸿渐者,文词隽敏,尤好嘲咏。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六一诗话》)

<p>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著绿,逯仁杰著朱。闻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朝野僉载》卷四)</p>	<p>太宗时,同年数辈取名似姓者为句云:“郭郑郑东东野绛,马张张夏夏侯璘。”熙宁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陈陈君章,如以西门豹对东方虬也。王丞相云:“马子山骑山子马。”久之,人对曰:“钱衡水盗水衡钱。”人谢之曰:“正欲作对尔,实非有盗也。”(《中山诗话》)</p>
<p>陈羽秀才题破吴王夫差庙,汪遵先辈咏绝万里长城。程贺员外因咏君山得名,时人呼为“程君山”。刘象郎中因咏仙掌得名,时人呼为“刘仙掌”。(《鉴诫录》卷九)</p>	<p>鲍当善为诗,景德二年进士及第,为河南府法曹。薛尚书映知府,当失其意,初甚怒之,当献《孤雁》诗云:“天寒稻梁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薛大嗟赏,自是游宴无不预焉,不复以掾属待之。时人谓之“鲍孤雁”。(《温公续诗话》)</p>
<p>孙鲂、沈彬、李建勋好为诗什。鲂有《夜坐》诗,为时所称。建勋因匿于斋中,待彬至,乃问彬云:“鲂之诗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炉头之语,何足道也?”鲂闻而出,诮彬曰:“何诽谤之甚而比田舍翁,无乃过乎?”彬曰:“子《夜坐》句:‘划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炉上作而何?”阖坐大笑。(《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七引《江南野录》)</p>	<p>吕文穆公未第时,薄游一县,胡大监旦方随其父宰是邑,遇吕甚薄。客有誉吕曰:“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胡问诗之警句,客举一篇,其卒章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而去。(《六一诗话》)</p>

第一组记敏悟捷对,语言形式相近。第二组是机智幽默的反正话,均以名姓为嘲。第三组以雅号寓称赏。第四组以具象传达诗境,为诙谐的笑谈。应该说,这些近似是一种惯例的延续,并非偶合。这一延续最为鲜明地显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上分析只是揭示诗话与本事的相似性及其内在联系,从而明确诗话对本事的延续和继承,这是诗话与本事相通的一面。另一方面,早期诗话与唐诗本事已有很大不同,一些诗话已经偏离诗歌本事,具有明显的去本事化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证事的变异

以诗证事是唐诗本事的重要形式,同宋代前期诗歌本事一样,早期诗话也保留了这一形式,但具体形态与诗歌本事已有所不同。如以下条目:

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复,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盖在水北,去河南府十余里。岁时朝拜官吏,常苦晨兴,而留守达官简贵,每朝罢,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事实也。(《六一诗话》)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洞咸平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者是也。(同上)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同上)

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按唐韩偓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乘马必中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然后蹀躞嘶鸣也。”盖唐时方镇亦效之,因而名厅事也。(《温公续诗话》)

泗州塔,人传下藏真身,后阁上碑道兴国中塑僧伽像事甚详。退之诗曰:“火烧水转扫地空。”则真身焚矣。(《中山诗话》)

唐人饮酒,以令为罚,韩吏部诗云:“令征前事为。”白傅诗云:“醉翻襦衫抛小令。”今人以丝管歌讴为令者,即白傅所谓。(同上)

以诗证事形式在宋代以后已析之为二,诗不仅用以印证事件,也用来诠释名物典故。前者为本事的原有形态,后者为变异形态。诗话兼具以上两种证事形式,上引6条中,第一、二、三条属印证事件,第四、五、六条属诠释名物典故。在诗话中,第一种形态已向文献考证发展,如第二条,引诗实兼具两重意义:一是对前面的叙事作人物印证,二是通过引诗介绍人物生平,后者诗、事为一,属于“自证自”形式。后三条主要继承宋代前期本

事的证事特征,与本事不同的是,此类诗话也多具文献考证色彩。自唐诗本事发展而来的具有考证色彩的以诗证事形式后来蜕变成为一种“因诗求事”的人物纪考方式,因而为人物生平事迹的考证提供了方便法门。

2. 议论的提升

宋人对议论的偏好也反映在早期记事性的诗话里。郭绍虞《宋诗话考·绝句二十首》其二论《六一诗话》谓“论辞论事两难分”,可见诗论在诗话中的份量。记事而杂以议论,在中晚唐的杂录性本事中已经出现。随着本事作者的学者化以及本事写作中主体意识的增强,本事的议论化倾向在唐末五代呈蔓延之势。经过宋代前期本事的承接,这种偏离记事体制但为后世看重并逐渐成为诗话主流的诗评形式在早期诗话中即获得全面提升。这种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比重急剧增加。唐人记诗事多采取客观的态度,不重议论,本事中的议论一般是零碎的,无关宏旨,数量既少,份量也轻,因而不为人们所注意。到宋代早期诗话,这种情况出现很大改变,这主要体现在《六一诗话》和《中山诗话》中。《六一诗话》共28条,其中涉及诗论的有11条^①,《中山诗话》63条,其中诗论11条^②,诗考6条^③,议论在诗话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唐诗本事和宋代前期本事。就每一条目而言,本事均以记事为主,议论为辅。但在诗话中,有时议论主导全篇,如《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圣俞尝语余”、“诗人贪求好句”,《中山诗话》中“诗以意为主”等条目,以议论为中心,辅以诗句例证,大抵以论诗为主体。不仅如此,一些条目甚至摒弃记事诗体例,全篇议论。一些诗话超离具体的个案分析,演变成为一种诗学见解的阐述,如《六一诗话》中“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条,是对比梅尧臣、苏舜钦两人诗风,纯以议论。至此,诗话已经摆脱以记事为体的本事体例,成为此后诗话中议论一体的先导。

① 包括“梅圣俞尝于”、“郑谷诗名”、“孟郊贾岛”、“唐之晚年”、“圣俞尝语余”、“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圣俞尝云”、“王建宫词”、“诗人贪求好句”、“石曼卿”、“退之笔力”。

② 包括“刘子仪赠人诗”、“景祐中”、“人多取佳句”、“诗以意为主”、“潘阆”、“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张籍乐府词”、“白乐天诗云”、“唐诗废和”、“管子曰”、“江邻幾善为诗”。

③ 包括“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古诗云”、“史著”、“韩吏部集”、“曹参尝为功曹”、“词人以也字作夜音”。

其次,范围更为广泛。本事中的议论,份量既少,内容也有限,一般来说,本事中的诗评主要涉及作家作品的风格,对作家、作品的把握一般止于概括的、整体的印象。诗话则把诗评内容扩展到对作家、作品某一特征的强调,对诗学观点的阐述,对诗歌史的研究。如下列各条片段: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六一诗话》)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性,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同上)

江邻幾善为诗,清淡有古风。苏子美坐进奏院事谪官,后死吴中。江作诗云:“郡邸狱冤谁与辩?皋桥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当。尝有古诗云:“五十践衰境,加我在明年。”论者谓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浑厚,乃可言诗,江得之矣。(《中山诗话》)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六一诗话》)

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中山诗话》)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六一诗话》)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同上)

前三条从诗歌的选材造意、用韵用事方面着眼,属作家作品的专题性研究。四、五条表现诗话作者的诗学见解。后两条属于诗歌史的研究。可见,诗话中诗评的视野更为开阔。在考证方面,本事一般集中于作品的归属问题,诗话考证则范围广泛得多。除诗歌真伪辨析外,还有语言声调考订,如《中山诗话》中“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白乐天诗云”两条;有生平考索,如《温公续诗话》中“杜甫终于耒阳”条;有名物考释,如《中山诗话》

中“泗州塔”、“古诗云”两条;有事典辨证,如《中山诗话》中“曹参尝为功曹”条。这些考证内容多属学术研究中的命题。宋人博识多闻,诗话作者多身兼学者,考证一体的发达乃时代使然。

第三,见解渐趋高明。本事中的诗评多为鉴赏品评,一般来说,这种鉴赏品评是感性的,粗略的,甚至是浮光掠影的。诗话中的诗评则超越了粗疏的感性把握,以说理分析为主体,衡文论事,大多深入细致,充满思辨色彩,因而成为一种颇为精致的诗评形式。早期诗话中不乏见解精到的诗评。《四库全书总目》谓《温公续诗话》“品第诸诗,乃极精密”,并谓“其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及说杜甫‘国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诗话所及”,乃中肯之论。此外,《六一诗话》善于把握诗风,如比较苏舜钦、梅尧臣两家诗风:“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语极简短,而体察精微,洞彻妙理。早期诗话不仅品诗评诗渐趋精密,论诗也多具理论色彩。如《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论诗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其说涉及言意之辨,为重要诗学论题。又说:“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涉及诗歌创作中的虚实问题。而“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等语,已开欧阳修“诗穷后工”诗论之端倪。

考证的成就则略显逊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中山诗话》提要曾指出《中山诗话》的引证失误,并批评说:“其论李商隐《锦瑟》诗,以为令狐楚青衣之名,颇为影撰。其论‘赫连勃勃蒸土’一条,亦不确定。不但解杜甫诗‘功曹非复汉萧何’句,考之未审,为晁公武所纠,至开卷第二条所引刘子仪诗,误以《论语》‘师也辟’为‘师也达’,漫无驳正,亦不可解。”早期诗话大抵以资闲谈,作者的心态是散漫随意的,并不以诗话为严谨的学术著述。或缘于此,诗话中的考证有时难免疏误。

总而言之,早期三部诗话中的议论,较之本事,在质和量上都有空前进展,地位也因此大大提高。毫无疑问,这为后来以议论为体的诗话起到了引导和铺垫作用。

3. 诂事的扩展

所谓“诂事”,是指本事或诗话对诗中事典的诠释。唐诗本事中的解

诗一体原是交代诗作背景、创作过程、意义本原,记载诗歌的欣赏与流传,自唐初至于五代,内容和体制相对固定。但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宋代前期记载诗事的专书《雅言系述》中有专门诠释诗中事典的条目。这一创例为诗话所沿用,《六一诗话》中有两则这样的条目:

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词》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所谓三降王者,广南刘铤、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后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则误矣。太祖建隆尽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开宝。开宝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谢于西京。盖执玉祀天者,实四也。

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

第一条分别解释了两句诗所指称的历史事件,逐一说明,并有所辨证;第二条是对于诗歌涉及的地方风物人情的交代。这两则诗话,或解释有关词句,或交代有关知识,具有直接的诠释性,是为诗歌解读服务的。一般来说,唐诗本事虽有解诗功能,但并无直接明了的解诗目的,解诗的意义是凭借读者的阅读领悟的。直接的诠释目的是此类诗话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其区别于唐诗本事的标志之一。自宋诗本事而来的论事体制在宋诗话中既有沿袭,又有变异。所谓变异,是由以解释现实事件和历史掌故为主的“论事”向解释词语的“论词”转变。在早期诗话中,这种变异形态其实更为普遍: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六一诗话》)

元丰初,宦者王绅效王建作《宫词》百首献之,颇有意思。其《皇太后生日》诗云:“太皇生日最尊荣,献寿官中未五更。天子捧觞仍再拜,宝慈侍立到天明。”宝慈,皇太后官名也。(《温公续诗话》)

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木兰花》皆七言诗,有云:“重头歌咏响璁琤,入破舞腰红乱旋。”重头、入破,皆弦管家语也。(《中山诗话》)

宋次道《次西都》诗,以“野狐落”对“五凤楼”,言野狐落,唐人名官人所聚也。(同上)

以上各例均为名词解释,与诂事已有明显不同。早期三部诗话都运用了释词形式,可见这种形式在诗话产生时已获得广泛认同。由于早期诗话的运用,释词后来成为诗话的重要形式,《诗话总龟·前集》中“书事”和“故事”两类收录了很多此类诗话。《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卷一八“笺释”类亦当收录此类诗话^①。这些诗话和诂事类诗话后来成为诗歌解读的必要环节。

诂事释名形式虽与唐诗本事体制不同,但自后者发展而来,其中的演进变化是有迹可寻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变化的诱因当是经籍中的传注,特别是《诗经》传注。如果说唐诗本事与《诗序》相似,那么,诂事释词则与《诗经》传注相似。

以上是对早期诗话与本事复变关系的全面考察。不管是唐诗本事,还是早期诗话,均以记事为本,以上考察反映了本事中叙事因素的学术化发展。三部诗话出现以后,本事叙事因素的学术化进程其实还在延伸。三部诗话的出现,带动了北宋以叙事为主的诗话的发展。北宋诗话的体制基本上是叙事性的,郭绍虞先生在介绍诗话的演变时曾说“北宋诗话之风气,重在‘以资闲谈’”^②,即北宋诗话大致沿用了本事及早期诗话的叙事体制,这一判断是有依据的。北宋后期,先后出现了三部诗话总集,即《唐宋名贤诗话》、《古今诗话》和《诗总》。《唐宋名贤诗话》全称《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在中国本土早已散佚,仅见《古今诗话》、《诗总》等书称引,《宋史·艺文志》文史类著录二十卷。该书韩国奎章阁藏有朝鲜时代刊

① 按:该书十一至二十卷散佚,仅存卷目。

② 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6页。

本,今存前十卷^①。从今存内容看,该书所选多为诗歌本事和叙事性诗话。《古今诗话》一般认为是《宋史·艺文志》文史类中李昉的《古今诗话录》,该书七十卷,已佚。郭绍虞曾就诸书所称引辑得 440 余条,编入《宋诗话辑佚》。该书佚文与《唐宋名贤诗话》佚存内容大半相同,郭绍虞先生认为“大抵此书系就诗话述事之例加以泛滥”^②。阮阅《诗总》的原貌基本保存在《诗话总龟·前集》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茗溪渔隐丛话》前后集提要谓该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也是叙事性的。这三部诗话总集编于北宋后期到北宋末年,应该说,其中的收录体现了北宋诗话的面貌。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北宋诗话是以叙事为主的。大致来说,我们可以把北宋诗话的发展看作是本事叙事一体不断学术化的过程。南宋以后,诗话以议论为主,一些诗话虽仍然叙写诗事,但已不占主流。因此,北宋末年阮阅《诗总》的编写可视为本事叙事一体学术化的完成。

二、存录篇什

存录篇什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理解。就广义而言,任何本事和诗话,只要收载有关诗歌,或全篇,或只言片语,都可为后世提供阅读和研究之用的诗歌文本,因而具备存录功能,具有文献学的意义。就狭义而言,一些本事和诗话专门收载名篇佳什,作者有自觉、明确的文献保存意识,存录篇什成为本事和诗话写作的目的。这种有意识地保存诗歌文献的本事和诗话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叙事与录诗结合,但叙事通常只是交代录诗的因由或背景,作为录诗的引子,叙事一般简单,以录诗为主。有时,诗与事只在形式上结合,在内容上是分离的,就是说,本事或诗话虽然有诗有事,但叙事部分与诗歌内容并无关联。另一种是只有录诗,而无叙事。本事和诗话由诗题和诗歌正文构成,在形式上与诗选无异,这是一种纯粹的诗歌存录。

本事自中唐以后即具有明显的录诗倾向,至五代,录诗功能进一步强化,本事在形式上甚至一度发生蜕变,成为一种录诗的文体。这一演变的证据就是吴处常子的《续本事诗》。《诗话总龟·前集》收录《续本事诗》

① 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34 ~ 400 页。

② 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 166 页。

的部分佚文,卷六有罗邛咏牡丹诗,卷二一有齐己《松》诗、《小松》诗,白居易、顾云《柳》诗^①,阴铿《石》诗,罗邛、郑谷、韩喜《水》诗,卷四六有道士马自然两首诗^②。这些佚文均有诗无事,我们曾经怀疑这是《诗话总龟》征引时节略的结果^③,但是,《诗话总龟》的节略通常只是削繁就简,并不完全去掉叙事部分,如果这些诗歌原来有本事,节略以后不至于毫无叙事存留。而且,上引佚文中的咏物诗部分与以类编排的诗选无异,不太可能拥有本事。看来《诗话总龟》所录当是《续本事诗》原文。《续本事诗》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人们越来越把本事视为一种存诗录诗的形式,本事的存录功能这时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北宋前期的诗歌本事。北宋初期出现的《雅言杂载》和《雅言系述》以录诗为主,很多条目纯为录诗,并无诗事。此后《江邻幾杂志》、《谈苑》等书的一些条目也摆脱了本事原有的诗、事结合形式,将本事变成纯粹的诗歌选录。可见,本事录诗的观念在北宋前期是普遍存在的。

在诗话出现稍前和此后,这一观念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宋人对本事文体的认识曾出现歧异,在宋代的目录学著作中,同是本事,有时归入小说,如《云溪友议》在《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中均列于子部小说家类,《鉴诫录》在《郡斋读书志》中也列于小说类。但另有一些本事却列于总集类或诗总集类,并对后来的文体归类产生了影响。下面的表格反映了《本事诗》等本事著作在一些目录学著作中的归属情况:

本事 归属 目录学著作	《新唐书·艺文志》	《崇文总目》	《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	《通志·艺文略》	《宋史·艺文志》
《本事诗》	总集类		总集类	总集类	诗总集类	总集类
《抒情集》	总集类	总集类			诗总集类	总集类
《续本事诗》			总集类		诗总集类	总集类

① 按:应为罗隐诗。

② 云出《续本事集》。

③ 见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页。

《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的编撰在宋代中期,可见,自宋代中期开始,一些本事著作是作为诗集看待的。这一文体归类源于本事中越来越突出的录诗倾向,反映了宋人对本事录诗功能的看重和强调。这一认识和态度自然会对与本事文体相近的诗话产生影响。应该说,此后诗话中的录诗倾向与此不无关系。

宋代诗话中的录诗是非常普遍的。早期的三部诗话具有明显的存诗倾向的,《六一诗话》有3条^①,《温公续诗话》有9条^②,《中山诗话》有7条^③。上述情况大致能反映录诗在诗话中的比重和份量。整个北宋诗话是非常注重录诗的。《诗话总龟·前集》卷一〇、卷一一为“雅什”,卷一二、卷一三、卷一四为“警句”,录有大量唐五代至北宋的名篇佳句,其中多为北宋诗话中的录诗。这些材料说明北宋诗话中录诗现象的普遍存在。

本事和诗话中的录诗与一般选本的选诗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反映在取舍标准和编辑体制上。本事和诗话录诗一般采用两种形式:一是以诗系人,二是以类相从。所谓“以诗系人”,是指一则本事或诗话只载录一人诗作,诗作或一首,或多首,这是本事和诗话录诗的主要形式。就此一形式而言,本事、诗话与一般选本选诗并无不同,但在取舍标准上则完全两样。一般来说,选本选诗遵循一定的诗学标准,这一标准取决于选家的诗学观点和审美理想,因而选本是选家诗学观念的产物,选诗的意义在于宣传这种诗学观念,选本的价值因此取决于这种主观性极强的诗学观念的价值。唐代著名的选本,如《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篋中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等,莫不如此。与此不同,本事、诗话录诗多保存名篇佳作或鲜为人知的雅什,一般不以特定的诗学观念作为取舍标准。虽然一切选择都有标准,但这里的选择标准是潜在的、多样的,并无明确的主观色彩。如果说选本意在“选诗”,其意义在于所要表达的诗学理想,那么本事、诗话意在“存诗”,其意义在于文献的价值。

① 包括1.“西洛故都”,2.“闽人有谢伯初者”,3.“自科场用赋取人”。

② 包括1.“郑工部诗”,2.“科场程试诗”,3.“丁相谓善为诗”,4.“寇莱公诗”,5.“陈文惠公尧佐能为诗”,6.“唐之中叶”,7.“陈亚郎中性滑稽”,8.“杨朴”,9.“嘉祐中”。

③ 包括1.“景祐中”,2.“王元之”,3.“潘阆”,4.“洪州西山”,5.“孟蜀时”,6.“江州琵琶亭”,7.“自唐以来”。

以类相从则是本事、诗话特有的录诗形式。所谓“以类相从”，是指一则本事或诗话载录不同作者的同类诗作，这些诗作或题材相同，或主题相同，或形式相同，或风格相同，等等。以类相从的录诗方式始于唐诗本事，宋人诗话因之。宋代早期诗话中可举下列几例：

西洛故都，荒台废沼，遗迹依然，见于诗者多矣。惟钱文僖公一联最为警绝，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裴晋公绿野堂在午桥南，往时尝属张仆射齐贤家，仆射罢相归洛，日与宾客吟宴于其间。惟郑工部文宝一联最为警绝，云：“水暖凫鹥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人谓不减王维、杜甫也。（《六一诗话》）

科场程试诗，国初以来，难得佳者。天圣中，梓州进士杨谔，始以诗著。其天圣八年省试《蒲车》诗云：“草不惊皇辙，山能护帝舆。”是岁，以策用‘清问’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试《宣室受釐》诗云：“愿前明主席，一问洛阳人。”谔是年及第，未几卒。庆历二年，韩钦圣试《勋门赐立戟》诗云：“凝峰画旛转，交铄彩支繁。”……苏州进士丁偃，试《迹英延讲艺》诗云：“白虎前芳掩，金华旧事轻。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苍生。”有古诗讽谏之体。偃是岁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寻卒。滕元发甫，皇祐五年御试《律听军声》诗云：“万国休兵外，群生奏凯中。”以是得第三人，最为场屋所称。（《温公续诗话》）

江州琵琶亭，前临江，左枕湓浦，地尤胜绝。夏、梅诗最佳。夏云：“年光过眼如车毂，职事羁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涕泣满青衫。”梅云：“陶令归来为逸赋，乐天谪宦起悲歌。有弦应被无弦笑，何况临弦泣更多！”又有叶氏女诗曰：“乐天当日最多情，泪滴青衫酒重倾。明月满船无处问，不闻商女琵琶声。”（《中山诗话》）

自唐以来，试进士诗，号省题。近年能诗者，亦时有佳句。蜀人杨谔《宣室受釐》落句云：“愿前明主席，一问洛阳人。”滕甫《西旅来王》云：“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传闻汉都护，归奉万年觞。”（同上）

第一则记钱、郑两人咏西洛故都遗迹诗句，第三则记诸人咏江州琵琶亭诗篇，第二、四两则分别存录省试诗中的名篇佳句，均是以类存诗。这种情

况在北宋其他诗话中也时有出现。

本事和北宋诗话的录诗倾向及其形式对南宋诗选及诗话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唐诗纪事》、《竹庄诗话》和《诗林广记》的编撰。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作者计有功,南渡时人。该书不仅网罗有唐一代诗歌资料,而且开文学研究著述中的“纪事”一体。明代胡震亨说:“计氏此书,虽诗与事迹评论并载,似乎诗话之流,然所重在录诗,故当是编辑家一巨撰。收采之博,考据之详,有功于唐诗不细。”^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提要也说该书“采摭繁复,于唐一代诗人,或录名篇,或纪本事,兼详其世系爵里”。纪事录诗,原是诗歌本事的内容,宋代以后,议论风起,本事又流为诗话。《唐诗纪事》因为“诗与事迹评论并载”,所以胡氏以为体近诗话。该书名曰“纪事”,“或录名篇,或纪本事”乃其大端,因此,确切地说,胡氏所谓“诗话”,应指与本事相近的纪事性诗话。然而,《唐诗纪事》究竟与诗话不同,因为该书“重在录诗”,这很容易使人认为它是一部诗集或诗选,从而忽略它的纪事性质,甚至忘记它与本事、诗话的渊源关系。其实,《唐诗纪事》中的“录诗”是本事、诗话录诗功能单项发展以至急剧膨胀的结果。“纪事”虽为创体,但追根溯源,乃出自本事、诗话。这种渊源关系还可以从该书的录诗目的和编排形式看出。《唐诗纪事·序》在交代该书的编撰目的时说:

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余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敏夫闲居,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老矣无所用心,取自唐初首尾,编次姓氏可纪,近一千一百五十家;篇什之外,其人可考,即略纪大节,庶读其诗,知其人。

可见该书以保存一代诗歌文献特别是诗篇为目的,与本事、诗话录诗存诗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倾向一致。《唐诗纪事》的编排体例大致以事系诗,以诗系人,以人序时,然而也有例外,该书卷一、卷二专录帝王,卷三首列后妃,卷七二至卷七七及卷八一专录僧道,这多半受诗话总集编排体制的影响。《诗话总龟》卷一即首列“圣制”,卷三二列“道僧”,卷四六、四七列“神仙”;《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也于卷一六列“神仙”、“道释”,因袭关系依稀可见。此外,《唐诗纪事》也运用以类相从的编录方式,具体情况详见书末附表一《〈唐诗纪事〉诗歌类编情况一览表》。

类编的诗多为唱和诗,也有因题材相同而一体编排的,一些诗甚至直接取自唐诗本事,如《听盛小丛歌送崔侍御》和《三乡诗》录自《云溪友议》,《和周墀贺王起再举文柄》录自《唐摭言》。以类相从形式在《唐诗纪事》中较为普遍,从中不难窥见此种编排与本事、诗话录诗的关系。

《唐诗纪事》以后,陆续出现了《宋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明诗纪事》等著作,“纪事”一体甚至蔓延到诗以外的其他领域。只是这些著作纪事成份越来越少,而录诗存文越来越居于支配地位。

《竹庄诗话》二十四卷,何汶编撰。据方回《桐江集》卷七《竹庄备全诗话考》,原书名《竹庄备全诗话》,二十七卷,作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该书卷一分《讲论》、《品题》,摘引前人诗话,为全书总论。卷二至卷一〇选两汉、建安、六代及唐宋诗。卷一一至卷二〇为《杂编》,大致以题材或风格分类选编唐宋诗。卷二一、卷二二按《方外》、《空门》、《闺秀》三类选诗。卷二三、卷二四是《警句》,录历代名句。《诗林广记》前后集各十卷,作者蔡正孙。书前自序题岁在屠维赤奋若,乃己丑年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诗林广记》提要谓:“黄庭坚寄苏辙诗条引熊禾语,则当为元太祖至元二十六年,时宋亡十年矣。”虽然如此,人们通常仍把《诗林广记》作为宋人诗话。该书前集选晋、唐诗人30人,后集选北宋诗人29人,选诗和附诗677余首。《诗林广记》深受《竹庄诗话》影响,不仅内容多有因袭^①,体例也基本相同。关于这两部诗话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竹庄诗话》提要说:该书“遍搜古今诗评、杂录,列其说

^① 《诗林广记·后集》卷之三录苏轼诗《定惠院海棠》,正文后引诗题及所引诗话均出自《竹庄诗话》卷九苏轼同一首诗诗题及题后所引诗话。

于前,而以全首附于后,乃诗话中之绝佳者”。并指出该书与蔡正孙《诗林广记》体例略同,皆名为诗评,实如总集。而《诗林广记》提要云:“两集(按:指前后集)皆以诗隶人,而以诗话隶诗,各载其全篇于前,……体例在总集诗话之间。”应该说,这一文体认定是符合实际的。诗话著作兼具总集性质,这是诗话自身发展的结果,将诗话的录诗功能放大、突出,并凌驾于其他功能之上,因而使这一功能在诗话中居于支配地位,这是此种诗话发生变异并逐渐与传统分道扬镳的原因。这两部诗话虽然主要提供用以阅读和研讨的名篇佳作,体近诗选,但是,作为诗话著作,它们其实与诗话录诗具有更多联系,是诗话录诗这一观念极端发展的结果。

在诗的编排体例上,这两部诗话也受诗话和诗话著作的影响。《竹庄诗话》卷二一单列“方外”、“空门”,卷二三、卷二四专录“警句”,这是受《诗话总龟》的影响;卷二二单列“闺秀”,则是受《唐诗纪事》影响。卷一一至卷二〇虽名“杂编”,但其实多为分类诗选。其中的诗,有的按题材相同或相类编排,如卷一一选杜牧、郑嵎、元稹等人有关华清宫、津阳门、连昌宫的诗,卷一三选沈佺期等人《巫山神女祠》,杜牧等人宫词,贾至等人《早朝大明宫》诗,等等。有的因风格相近而一体编排,如卷一二把杜甫《北征》同韩愈《南山》编在一起,又将卢仝、韩愈、刘叉风格怪异的诗歌编在一起,将崔颢《黄鹤楼》与李白《登凤凰台》编在一起。此外,卷一三又有张祜、王维《观猎》诗,卷一五陈羽《湘妃怨》后选李远等人7首诗,诗题注云:“八首见睹物伤吊之事。”均以风格相近编排。《诗林广记》虽然以诗系人,以人序时,但一些诗后也附有题材、风格相类的诗歌。该书序云:“并集前贤评话及有所援据摹拟者,冥搜旁引,而丽于各篇之次。”所谓“有所援据摹拟者”,即指题材、风格相近的其他诗歌。《诗林广记》中附录的诗与《竹庄诗话》中类编的诗在关系上并无不同。

当然,《竹庄诗话》和《诗林广记》选诗与本事、诗话录诗毕竟有所不同。录诗意在保存文献,而选诗重在阅读和研讨,这一区别使这两部诗话越来越远离诗话传统,与传统的关系也越来越模糊了。

三、纪考诗家

唐诗本事本以记载诗事为中心,通常就诗歌创作的背景、缘起,诗歌的欣赏、流传等展开叙述,一般不涉及其他内容。但也有一些本事以内容庞杂

的诗事形式存在,这些诗事不仅包含诗歌本事,还涉及诗人生平事迹、文学创作等等,因而兼具纪考诗家的性质。这些诗事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一,一个诗事由某一诗人的若干本事片断连缀编辑,并穿插其他逸闻琐事、言谈论议等,这些本事条目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成为诗人生平事迹的系统介绍。属于此种情况的本事有《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李太白”条,《云溪友议》卷中“买山讖”、卷下“中山海”,《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鉴诫录》卷八“贾忤旨”、“钱塘秀”等,其中《鉴诫录》中“贾忤旨”条叙述最为明晰,体制也最典型。“贾忤旨”专记贾岛生平事迹,包括骑驴冲尹、诗刺公卿、钟楼忤旨以及谪授长江主簿、东川献诗感恩故事,中间穿插韩愈赠诗一节,全文虽是以本事为主体的若干故事片段,但已大致包举了贾岛生平的大事大节,可视为系统的传记资料。上述本事尚未脱离叙事,也有在叙事中杂以论议言谈者,如“李太白”条记有李白的诗歌主张。“中山海”条穿插刘禹锡的人物品评和诗歌鉴赏。这些条目内容更为庞杂,在体制上也更具兼融性。

第二,一些诗事在记录本事穿插逸闻的同时还介绍诗人的身世名里、仕宦交游、性情品貌、文学创作等情况,具有鲜明的人物传记色彩。此类诗事数量很多,如:

范阳卢献卿,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今谏议大夫司空图为之注。连不中第,薄游衡、湘,至郴而病,梦人赠诗曰:“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台榭,寂寞独归人。”后旬日而歿,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梦。(《本事诗·征咎第六》)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祇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为人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唐摭言》卷一〇)

唐吴郡陆龟蒙,字鲁望,旧名族也。其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侍御史,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博为吴兴、庐江二郡倅,著《吴兴实录》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泽丛书》五卷。丞相

李公蔚、卢公携景重之。罗给事寄陆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北梦琐言》卷六“陆龟蒙追赠”）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常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鉴诫录》卷四“斥乱常”）

唐人杂事小说多以补史为目的，在写法上也受正史传记及杂传等文体的影响，因此，纪人记事常以诗家生平为内容，以上诗事正是这一写作惯例影响的产物。上引诗事分别出自唐诗本事专集及唐人笔记，可见这种具有传记性质的诗事普遍存在。

唐诗本事的“纪人”倾向对宋代诗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彦周诗话》以“纪盛德”为诗话内容之一，可见“纪人”在宋代诗话中的重要性。宋代诗话记载诗家的情况可从早期诗话中窥见一斑。早期三部诗话中属于纪人的条目有十余条^①，这些诗话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唐代同类诗事并无二致，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唐诗本事中的“纪人”一般记载一些身份卑微、名声不彰的诗人，由此，那种介绍人物生平的传记写法能够更好地起到补史的作用，是必要而合理的。同样，宋人诗话中的“纪人”也大多记载那些不闻于世的中小诗人。这些记载使一些可传后世的诗人不至灭没无闻，这对保存一代诗歌文献起到了重要作用。

纪人一体对宋人著述的影响，除诗话之外，还有《唐诗纪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述及《唐诗纪事》的基本内容时指出，该书“于唐一代诗人，或录名篇，或纪本事，兼评其世系爵里”。其中“世系爵里”是一个指

^① 包括 1. “闽人有谢伯初者”（《六一诗话》），2. “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六一诗话》），3. “龙图学士赵师民”（《六一诗话》），4. “鲍当善为诗”（《温公续诗话》），5. “林逋处士”（《温公续诗话》），6. “魏野处士”（《温公续诗话》），7. “韩退处士”（《温公续诗话》），8. “刘概字孟节”（《温公续诗话》），9. “杨朴，字契玄”（《温公续诗话》），10. “江邻幾善为诗”（《中山诗话》），11. “道人张无梦”（《中山诗话》），12. “蜀人李士宁”（《中山诗话》）。

代性的说法,从《唐诗纪事》的实际内容看,“世系爵里”还兼指诗人生平等,是《唐诗纪事》中通常居于条目首尾、全面介绍诗人身世、生平等情况的传记性文字。《唐诗纪事》在每一个收录的诗人名下都有这样的介绍性内容,这些内容虽然多采自正史传记,在体例上也与传记相近,但是,作为著作整体,在体制上与本事、诗话接近。《唐诗纪事》内容由诗、事、传三部分构成,是本事、诗话中录诗、记事、纪人的系统整合。《唐诗纪事》“纪人”是把原混融于本事、诗话中的“纪人”独立出来,使之成为固定内容。如果说本事、诗话“纪人”还是零星的、随意的,那么《唐诗纪事》则是系统的、自觉的,因此,《唐诗纪事》给诗人“立传”,与其说是源于史传,不如说是出自本事、诗话。

《唐诗纪事》之后,全面系统地记载有唐一代诗人事迹的是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就文体而言,这部著作可能受多方面的影响:有史传的影响,有唐宋小说中非本事的纪人条目的影响,当然也有本事、诗话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本事未必起决定作用。本事对《唐才子传》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文体,而是以诗证事的纪考方式。

中国古代诗歌一般运用纪实手法,记事言怀,大抵本于真实,因而诗歌成为生活的记录,据此可窥见生活的真貌。就某一诗人而言,诗歌是其行事的记载,心迹的袒露,据此可概见其生平思想。如赠答诗见其交游,题记、行旅诗见其经历,纪事诗见其生平,咏怀诗见其喜怒哀乐。一部诗歌无异是一部诗人的自传,至于那些主要叙写他人的诗歌,其记录真实的性质和认识功能与自叙性诗歌并无不同。

比较而言,唐诗可能更具实录的性质。唐诗的诗题通常介绍诗作背景,交代写作原委等,有很强的叙事性。一些诗歌还有序、引,甚至注文,这些说明性文字也是叙事性的,而且比诗歌叙事更加完整细致。诗歌的这些组成部分与正文一起交织成为严密完整的信息之网,这为当时和后世采摭事迹、勾稽史实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资料。

唐诗的实录性质对唐诗本事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些本事或复述序文内容,或敷演诗歌故事。由此而来的以诗证事的实证方式和因诗求事的纪考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唐以后,诗歌本事中一直存在以诗证事的形式,这些本事总是借助

诗歌以证实诗事的真实性,这一点前文已有专门论述。以诗证事的逻辑前提当然是诗歌的实录性质,如果诗歌不是反映真实生活,而是表现虚幻世界,那就不具备实证功能。一般来说,在以诗证事的本事中,诗与事是统一的:有时诗、事同一,有时诗、事部分重叠,有时诗、事相关。这就是说,诗歌不仅能证实与诗歌内容相同的“事”,还能证实与诗歌内容相关的“事”,这种实证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以诗证事的本事,开始诗与事是各自独立的,事件有其独立于诗歌之外的文献来源。但是,到晚唐五代,以诗证事形式发生变异,本事中的所谓“事”其实出于对诗歌的解读,别无文献来源,因而“以诗证事”变成“自证自”,这种“自证自”的形式,自本事的生成角度而言属于因诗求事,即“事”出自本事作者的诗歌解读。这种因诗求事的形式极大拓展了诗事的范围,因为诗歌本身即隐含事件,可以说,凡是叙述性的诗歌都具备这一功能,都可以从诗歌的叙述中勾稽事迹。

因诗求事的方式在本事中常以解诗形式出现,按其实,则是本事作者运用这种方式撰构本事,铺张情节。如下列本事: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髻鬟梳头官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本事诗·情感第一》)

这是一则著名的诗歌本事,《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条亦有引录,而文本不同,内容歧异。此外,《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引《唐宋遗史》又将诗与事属韦应物。此诗及事的归属后来成为一大公案。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首诗既非刘禹锡作,也非韦应物作^①。本事将诗、事属刘、韦,是因为诗中有“江南刺史”一句^②,刘、韦皆历苏州刺史,苏州地处江南,诗与

① 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岑仲勉《唐史余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第173~175页,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05页。

② 《云溪友议》作“苏州刺史”。

刘、韦生平吻合。此诗仅见于诗歌本事，不见于诗集和其他著述，原作者早已失落无考，诗属刘、韦，纯属附会牵合。应该说，此一故事出于作者对诗歌牵强的解读。同样的误读和敷衍也表现在下引本事中：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抒情诗》）

本事记叙有误^①，文中卢储确曾状元及第，但考其登第时间，与本事不能吻合。本事作者坐实诗中“第一仙人许状头”一句，以为诗歌作者曾以状元及第，因以此诗归属卢储，并附会其事。上引本事均出自诗歌解读，而其中的误读最清楚地显示出因诗求事的轨迹。

唐诗本事中普遍存在的因诗求事现象对后世著述产生了影响，《唐诗纪事》在纪本事时也运用这种求事方式，如以下几例：

（杨）巨源以“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得名，故乐天诗云：“早闻一箭取辽城，相识虽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谁是敌？白须四海半为兄。贫家薤草时时入，瘦马寻花处处行。不用更教诗过好，折君官职是声名。”巨源后拜省郎，乐天复以诗贺云：“文昌新入有光辉，紫界官墙白粉闱。晓日鸡人传漏箭，春风侍女护朝衣。雪飘歌句高难和，鹤拂烟霄老惯飞。官职声名俱入手，近来诗客似君稀。”（卷三五“杨巨源”）

（崔）玄亮与元微之、白居易皆贞元初同年生也。玄亮名最后，自咏云：“人间不会云间事，应笑蓬莱最后仙。”后白刺杭州，元为浙

^① 详见《考证篇》“15 卢储”条。

东廉使刺越，而崔刺湖州，白以诗戏之曰：“越国封疆吞碧海，杭城楼阁入青天。吴兴卑小君应屈，为是蓬莱最后仙。”三郡有唱和诗，谓之《三州唱和集》。（卷三九“崔玄亮”）

（张）道古，临淄人。景福中进士，释褐为著作郎，迁右拾遗。播迁之后，方镇阻兵，道古上危难疏云：“只今刘备、孙权，已生于世矣。”责授施州司户参军。后入蜀，王氏闻而憾之。乃变姓名，卖卜导江青城市中。建开国，召为武部郎中。……后遇害，妻亦继亡，蜀主悯之，俾祔葬焉。郑云叟在华闻之，有诗哭之曰……（卷七一“张道古”）

第一则本事中白居易前一首诗诗题为《赠杨秘书巨源》，题下自注：“杨尝有《赠卢洺州》诗云：‘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由是知名。”^①后一首诗诗题为《闻杨十二新拜省郎遥以诗贺》^②，诗末自注云：“顷曾有赠杨诗，落句云：‘不用更教诗过好，折君官职是声名。’今故云‘俱入手’。”第二则本事所引白居易诗题为《得湖州崔十八使君书，喜与杭、越邻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诗末自注云：“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当时崔自咏云：‘人间不会云间事，应笑蓬莱最后仙。’”^③以上两则本事均出自诗题及诗歌注文。第三则本事中“后遇害，妻亦继亡”的记载实出《鉴诫录》卷四“危乱黜”条的载述：“又西岳僧贯休哭之（指张道古）曰：‘清河逝水大匆匆，东观无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载隔，镜中鸾影一时空。（原注：妻亦寻卒。）尘生苦雾苍茫外，门掩诸孤寂寞中。惆怅斯人又如此，一声羌笛满江风。’”本事记载也出于诗中注文。除以上三则本事外，卷三九“韦式”条误引王起、李绅、令狐楚、元稹等人一字至七字诗，以为送白居易分司东洛之诗^④。此一误引乃因诸人诗歌体制相同，题材相似，仍为因诗求事之误。

这种因诗求事的方式一直影响到《唐才子传》。首先，《唐才子传》继

① 《白氏长庆集》卷一五。

② 《白氏长庆集》卷一七。

③ 《白氏长庆集》卷二三。

④ 详见《考证篇》“16张籍”条。

续依据唐诗撰构本事,如卷二阎防隐居读书,卷三戎昱拒绝改姓等诗事即是。但是,唐诗本事对《唐才子传》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为本事的撰构,而是诗人生平事迹的纪考。元代去唐代已远,口头文献已不足征,可以利用的只有书面文献。在书面文献中,除正史、小说外,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文献就是诗歌。唐诗本事显示,诗歌具有实证功能和本事生成功能。由此延伸,对于《唐才子传》来说,诗歌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人物生平的纪考提供实证,二是为物生平事迹的勾稽提供材料。这两者在《唐才子传》中是完全统一的,这种统一以“因诗考事”的形式表现出来。本事是有事有诗的,但如果存事略诗,则“因诗求事”变成“因诗考事”,成为纯粹的人物事迹的考稽。《唐才子传》正是以此一形式继承唐诗本事“因诗求事”的本事生成方式,使之蜕变成为一种考事的方法,从而为人物生平的纪考提供了方便法门。

《唐才子传》以诗考事的情况见书末附表二《〈唐才子传〉以诗考事情况一览表》。通而观之,该书以诗考事的范围一般限于史籍少有记载的中小诗人,这从侧面说明这一考稽方式在诗人生平考订中的重要意义。《唐才子传》虽然在考察诗歌时出现一些误读,因而在人物事迹考订上存在若干失误。如由常建《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时宫人》诗推演常建入山采药遇毛女事^①,将张谓《同孙构免官后登蓊楼》中所述孙构事加之于谓^②,等等。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唐才子传》考订出大量隐而不彰的诗人事迹。而且,就整体而言,该书的考订是信而有征的。在各种文献中,诗歌究竟属于第一手材料,以诗考事就是将人物生平的考订建立在信实的材料基础上,在史料缺乏、诗人生平淹没无闻的情况下,以诗考事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又可靠的人物考订方法。

第三节 本事的小说化

本事的小说化是指两个各自独立的问题:一是宋代本事的小说化,二

① 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6~267页。

② 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8~140页。

是唐诗本事在宋代的小说化。

本事中的杂录一体在宋代以后走入诗话一途,从此成为最重要的诗评形式。除个别志怪故事偶尔采入诗话外,一般来说,宋代的志怪与传奇仅限于小说领域,通常不为诗话著作所接纳。但是,自阮阅编辑《诗总》以后,这种情况即完全改变。《诗总》在收录诗话、本事的同时,也采摭了为数不少的小说作品。《诗话总龟·前集》的一百家诗话总目中列有刘斧《翰府名谈》、《摭遗》、《青琐集》、《青琐后集》,钱易《洞微志》等,这些著作属于传奇志怪杂事小说集,《诗总》采自这些小说集的条目很多就是志怪传奇小说,其中具有明显的传奇特征的有以下条目:

1. 茜桃(《诗话总龟》卷二二引《翰府名谈》)
2. 王寂(《诗话总龟》卷三四引《青琐集》)
3. 周琬(《诗话总龟》卷三五引《洞微志》)
4. 侯复(《诗话总龟》卷三五引《翰府名谈》)
5. 郑獬(《诗话总龟》卷三六)
6. 陈希夷(《诗话总龟》卷四六引《青琐集》)
7. 崔存(《诗话总龟》卷四六引《摭遗》)
8. 陈纯(《诗话总龟》卷四七引《青琐后集》)
9. 韩湘(《诗话总龟》卷四七引《青琐集》)
10. 贾师雄(《诗话总龟》卷四七引《青琐集》)
11. 崔中(《诗话总龟》卷四七引《青琐集》)
12. 王谢(《诗话总龟》卷四八引《摭遗》)
13. 郑继超(《诗话总龟》卷四八引《洞微志》)
14. 王轩(《诗话总龟》卷四八引《翰府名谈》)
15. 张俞(《诗话总龟》卷四九引《青琐集》)
16. 隋炀帝(《诗话总龟》卷四九引《青琐集》)
17. 许周士(《诗话总龟》卷四九引《摭遗》)
18. 张孝和(《诗话总龟》卷四九引《洞微志》)
19. 李珣(《诗话总龟》卷四九引《翰府名谈》)

上列近 20 条,多出宋人传奇小说,如:“茜桃”出自《莱公妾蒨桃》^①,“王寂”出自《王寂传》^②,“郑獬”出自《白龙翁》^③,“陈希夷”出自《希夷先生传》^④,“陈纯”出自《桃源三夫人》^⑤,“韩湘”出自《韩湘子》^⑥,贾师雄、崔中出自《吕先生记》及《续记》^⑦,“王谢”出自《王榭》^⑧,“张俞”出自《温泉记》^⑨,“隋炀帝”出自《隋炀帝海山记》^⑩。其他各条虽收入《诗总》时或有删节,但据现有文本可判断亦属传奇作品。将传奇小说作为诗歌本事纳入诗话范畴,我们称为本事的小说化。

同《诗总》收录传奇作品类似,在此以前,唐诗本事专书也收录了一些唐人传奇,我们在前文将此一部分成为本事的传奇小说称为传奇性本事。就此而言,《诗总》收录传奇小说是沿袭了唐诗本事的固有作法,可见,所谓本事的小说化部分源于传奇性本事的影响。但是,同唐诗本事相比,《诗总》在以传奇为特征的小说化方面走得更远。唐代的传奇性本事虽然偶有虚构性情节,但就整体而言,仍以写实为主,或者借助写实手法。本事中的人物和诗歌通常信为真实,不是出于虚构和依托。但是,《诗总》在收录传奇作品时早已突破了唐人固有的本事观念,有时完全混淆了诗事与传奇小说的界线。一些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或出虚拟,或出伪托,虚构成为小说的主体。如“茜桃”故事,原是叙述神秘的梦境及灵魂转世;“侯复”条叙侯复梦入宫闱,与武后、杜夫人诗酒唱和之事。与此相类,“张俞”条叙张俞夜宿温泉,魂与杨妃相遇之事;“周琬”条叙周琬梦入南岳庙,与王相接的故事;“许周士”条叙许周士于淮阳庙与韩信魂灵相遇之事;“崔存”条叙崔存游王屋,与石曼卿、苏舜钦魂灵相遇之事;而“陈

① 按:篇题出《类说》卷五二《翰府名谈》。

② 见《青琐高议·前集》卷四。

③ 见《青琐高议·别集》卷七。

④ 见《青琐高议·前集》卷八。

⑤ 按:篇题出《类说》卷四六《续青琐高议》。

⑥ 见《青琐高议·前集》卷九。

⑦ 见《青琐高议·前集》卷八。

⑧ 见《青琐高议·别集》卷四。

⑨ 见《青琐高议·前集》卷六。

⑩ 见《青琐高议·后集》卷五。

“纯”条叙陈纯游桃源,夜遇玉源、灵源、桃源三夫人等。其他条目中,“李珣”条后半叙李珣死后显灵及复报之事,为故事主体;“韩湘”、“贾师雄”、“崔中”诸条多言神仙玄幻之事。总之,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叙写鬼神梦幻,情乖现实,事属不经。诗歌作者,或神或鬼,所作诗歌亦出依托。当然,这些传奇小说也并不完全虚幻飘渺,毫无依傍。一方面,一些小说具有明显的写实成份。如“侯复”、“许周士”、“张俞”、“李珣”诸条开篇的咏诗部分属于写实,“茜桃”故事中茜桃为诗进呈一节当为事实,虚构部分多为写实部分生发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小说事虽虚幻,诗则征实。如《王谢》、《韩湘》两条,故事出于虚构,但其中征引的刘禹锡、韩愈诗歌却是真实的。这种以诗证事、化虚为实的手法是小说家惯用的障眼法,有时也具有迷惑性,懵懂的读者甚至为其所瞒,将虚幻的故事引为典实^①,这是不足为训的。

《诗总》改变了传统的本事观念,将含有诗歌的小说毫无限制地纳入本事,使之成为概念宽泛模糊的诗话。正像唐代传奇性本事主要是本事专著收录唐人传奇的产物一样,宋代本事的小说化主要是《诗总》收录宋代传奇的产物。不同的是,唐人收录时以写实为标准,在本事与虚构性小说之间默默地划出了一条界线,《诗总》却将这条界线悄悄抹掉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本事的小说化其实是小说的本事化,是通过诗话著作对小说的收录实现的,并非另有一个由本事到小说的演化过程。这一点与唐诗本事专著收录唐人传奇并使之成为本事并无二致。

由传统意义上的本事向小说的演化主要是指唐诗本事在宋代的小说化。

唐诗本事中的杂录、志怪两体虽是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但一般本于实录,叙述直白,情节简单,与出于虚构、追求情节的小说有所不同。作为小说,这些本事的文学色彩和审美意味是不充分的。虽然如此,此类本事仍然吸引了宋人的目光。宋人不惟阅读唐诗本事,而且挹彼波澜,采其芬芳,并踵事增华,推陈出新,创作出情节更为丰富、文学色彩和审美意味更为浓厚的小说故事。此类小说故事主要收入张君房的《丽情集》和刘斧

^① 宋代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引《王谢》中的故事,以为典据。

的《青琐高议》和《翰府名谈》。

张君房生活在北宋前期,《丽情集》为传奇杂事小说,《郡斋读书志》卷一三小说类著录二十卷,称该书“编古今情感事”。原书明代犹存,今已散佚,佚文见《类说》卷二九,《绀珠集》卷一一及《文苑英华》、《绿窗新话》等书,佚文可考者42篇^①。刘斧生活的年代约在北宋中期,有小说集《青琐高议》和《翰府名谈》。《青琐高议》最早著录于《郡斋读书志》卷一三小说类,有十八卷。曾慥《类说》收《青琐高议》和《续青琐高议》,《诗话总龟·前集》也收录《青琐集》和《青琐后集》。可见原书分前后集。今存《青琐高议》有总集十卷,后集十卷,别集七卷,乃杂凑《青琐高议》前后集及刘斧《青琐摭遗》,为重编本。《翰府名谈》见于《通志·艺文略》和《宋史·艺文略》,著录二十五卷。原书不存,佚文见于《类说》卷五二、《诗话总龟·前集》及《新编分门古今类事》。这三部小说集反映了宋人对唐人诗事的偏好。首先,集中收录了为数不少的唐人诗歌及诗序,如《丽情集》中的“崔徽”、“灼灼”、“泰娘”、“张好好”、“杜秋娘”、“柳枝娘”、“琴客”、“瑶草春”、“沈真真归郑还古”九篇均出自唐人诗歌并诗序^②。第二,集中收录了部分唐诗本事。如《丽情集》中“蜀妓薛涛”、“周德华”、“湖州髻髻女”、“赠妓诗”、“崔护”、“赵嘏姬”、“韦检姬”、“真珠”8条,《青琐高议》中“广谪仙怨词”、“毗陵愤氏”^③、“李荃”、“遐周阿环”4条及《翰府名谈》中“开元宫人诗”条均为唐诗本事^④。第三,集中收录了自唐人诗序及唐诗本事演化而来的宋人小说。此类小说已经不是简单抄

① 李剑国先生《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81页。

② 原作为元稹《崔徽歌》并序、崔珣《灼灼歌》并序、刘禹锡《泰娘歌》并序、杜牧《张好好诗》并序及《杜秋娘诗》并序、李商隐《柳枝五首》并序、顾况《宜城放琴客歌》并序及《瑶草春》并序、卢仝《真真歌》并序。详见李剑国先生《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2页。

③ 按:“愤”当作“慎”,见《云溪友议》卷上。

④ 《丽情集》8条出处分别为范摅《云溪友议》中“艳阳词”、“温裴黜”,高彦休《唐阙史》中“杜紫微牧湖州”,黄璞《闽川名士传》、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五,卢瓌《抒情诗》,陈应行《吟窗杂录》卷四一。《青琐高议》4条分别出自康骕《剧谈录》卷下,《云溪友议》卷上及《抒情诗》。《翰府名谈》1条出自《本事诗·情感第一》。按:《青琐高议》“毗陵愤氏”、“李荃”2条,李剑国先生辑自《说郛》,见《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录唐人诗事,而是以唐人诗事为基础,或为背景、起点,进行新的小说创造,是与唐诗本事完全不同的新的小说。

此类小说体现了唐诗本事向小说的进一步演化。由于这些小说对唐诗本事的接受程度和吸收方式各不相同,本事的小说化因此呈现不同方式。一般来说,这些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

1. 取其因由,随意点染

一些小说虽采摭唐诗本事的情节片段,但不囿于原有故事的框架与逻辑,而是以本事情节为起点或背景,创造新的故事。新的故事仅与本事发生若干关联,内容是全新的,创造是自由的。下列两则故事即采用此种生成方式:

天宝十三年秋苦雨,上自兴庆宫登楼远望,见其淫潦尤甚,时惟贵妃、力士从上。上谓曰:“今水潦如此,疾于朕心,当传位于太子,使吾未没而付之,吾无忧也。”妃子不对。力士曰:“且待丰年。”上视太真曰:“若何?”妃对曰:“今秋霖雨水灾,烦劳圣虑,妾愿与圣躬共舍衣物于两街,建道场法事,庶拯生灵。”上从之。乃敕司衣阁出衣十袭,施左右街佛寺,货之以充供养。时沙弥常秀自庐岳来京师求戒法,见舍衣物,遂罄囊钵,赎得妃子袜一纲,持归江南,以与亲族。后隐香炉峰,乱而获存。其后中丞李远牧于湓城,多征故事,求诸遗物。或有言妃子袜事于远,遂求焉。僧不获已而献之,远以钱十万为直。仍藏诸篋笥,示诸好事者。会李群玉校书自湖湘来,过九江,远厚遇之,因诘其题《黄陵庙》事。群玉曰:“予尝梦之。”远曰:“仆自获妃子袜,亦常盼慕焉。”遂更相戏笑,因各赋诗一首。远曰:“坠仙遗袜老僧收,一锁金函八十秋。霞色尚鲜官锦勒,彩光依旧夹罗头。轻香为著红酥践,微绉曾经玉指钩。三十六宫歌舞地,唯君独步占风流。”群玉诗曰:“故物犹存事渺茫,把来忍见旧时香。拗连绮锦分奇样,终合飞蝉饮瑞光。常束凝酥迷圣主,应随玉步浴温汤。如今落在吾兄手,无限幽情付李郎。”是岁校书过豫章,端午浴兰之会,宴滕王饮筵,片时卒座上。客云:“得非黄陵嘉?”至今伤感悯之。(《青琐高议·前集》卷六“贵妃袜事”)

开宝中,贾知微遇曾城夫人杜兰香及舜二妃于巴陵。二妃诵李群玉《黄陵庙》诗曰:“黄陵庙前青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短棹唱歌去,水远天长愁杀人。”贾与夫人别,命青衣以秋云罗帕覆定命丹五十粒曰:“此罗是织女缲玉蚕织成,遇雷雨密收之;其仙丹每岁但服一粒,则保一年。”后大雷雨,见篋间一物如云烟,腾空而去。(《类说》卷二九《丽情集》录“黄陵庙诗”)

两则故事都与李群玉题《黄陵庙》诗有关。《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记载,李群玉经湘中,有题二妃庙诗,其一云:“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云:“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于是“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君乃悉具所陈,俄而影灭,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浔阳太守段成式郎中,素为诗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井”。对照宋人小说和唐诗本事,不难发现两者在事件情节上的承接与关联。上引第一则故事借用了本事中李群玉题庙遇妃、浔阳述事及“逝于洪井”等情节,甚至沿用了主客对话时的戏谑口吻。第二则故事中,二妃诵诗的情节,显然出自本事中李群玉因题诗得遇二妃一节。但是,这两则故事又是与本事完全不同的新小说。第一则故事只是借用了原有故事的躯壳,基本情节是全新的。不仅说袜赋诗为本事所无^①,而且移花接木,将段成式事迹移之李远,以至小说情节远离本事故事。第二则故事与本事的关系更为疏远,本事仅为小说提供故事生成的线索,对于小说来说,本事只是一种先导,一个潜在的故事背景,而不是故事本身,二者的关系是间接、隐晦的。可见,一方面,此类小说从本事中吸取情节,寻找故事的生长点,本事成为小说情节的母体和想象的平台,另一方面,小说并不遵循原有故事的基本框架,作者在自由发挥、自由想象的基础上赋予小说以全新的故事形态。

^① 说袜赋诗为虚构的故事,小说中李远、李群玉诗为故事作者拟作,实非李远、李群玉之诗。羊春秋《李群玉诗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据以收作李群玉诗,乃辨体之误。

2. 取其情理,再行创造

唐诗本事向宋代小说的演变还表现于同一题材的复制。虽然小说人物与本事人物完全不同,但故事题材类似,情理相同,类型相同。体现这一演变过程及其特点的莫过于红叶题诗及袍中得诗的著名故事。《青琐高议·前集》卷五载有张实的《流红记》。故事谓唐僖宗时,儒士于祐于禁衢御沟得一红叶,上题绝句一首,祐喜其句意新美,藏于书笥,终日吟味思慕,后复题两句于红叶,置御沟上流水中,使其流入宫中。祐后累举不捷,依河中贵人韩咏门馆,得帝禁所出宫人韩夫人。韩氏于书笥中见红叶,大为惊异,祐以实告。韩氏亦言曾于水中得红叶,开笥取视,乃祐所题之诗。夫妻惊叹感泣,以为姻缘前定。后僖宗幸蜀,祐为前导,韩氏以宫人得见僖宗。僖宗还西都,祐以从驾得官。韩氏生五子三女,终身为命妇。

红叶题诗故事在唐代曾是一个广为传播的故事类型,这些故事情节不一,形态各异,甚至出现不同的流传“版本”。唐人题叶故事计5则,为便于对照,现彙录如下:

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本事诗·情感第一》)

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尝书落叶,随御沟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或有五使之号焉。和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褰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官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篋。”

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

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官中之事。及绵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快怏。其夕,馆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竹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矣。(《太平广记》卷三五四引《北梦琐言》)

蜀尚书侯继图,本儒士。一日秋风四起,偶倚栏于大慈寺楼,有大桐叶,飘然而坠。上有诗云:“拭翠敛双娥,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意。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侯贮小帖,凡五六年,方卜任氏为婚。尝讽此事。任氏曰:“此是妾书叶时诗,争得在公处?”曰:“向在大慈寺阁上倚栏得之。即知今日聘君非偶然也。”侯以今书较之,与叶上无异。(《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玉溪论事》)

《诗话总龟》所引《玉溪论事》又作《玉溪编事》,为后蜀金利用撰。张实的《流红记》对上引本事均有不同程度的吸取。故事中,于祐见题诗红叶、蓄于书笥一节及叶上诗句本于《云溪友议》中卢渥的故事,于祐叶上题诗并置叶御沟一节则本于《本事诗》中顾况的故事,后于祐夫妻各见题叶,感慨“事岂偶然”、“莫非前定”者,显然出自《玉溪论事》中“即知今日聘君非偶然”一句。最后,于祐随僖宗幸蜀一节又与李茵、云芳子故事情节相似。这种杂取种种情节的典型化手法并不专主某一本事的故事框架,而是遵循此类故事的事理逻辑,另行确立故事的基本结构,可见,这是一种全新的小说创作。

除《流红记》外,宋代王铎的《补侍儿小名录》还记载了凤儿题叶的故事^①。据说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贾全虚春临御沟,见一花叶流至,叶上题诗云:“一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片叶上,寄与接流人。”全虚得花叶,悲想流涕。街吏白金吾,奏闻其事,德宗令中人细访,乃翠筠宫奉恩院王才人养女凤儿所为。德宗感恻,授全虚金吾卫兵营,以凤儿赐之。文中“贾全虚”,乃子虚乌有亡是公之类,可见故事出于虚构。这篇小说的部分情节采自《本事诗》和《流红记》,但主要情节出于自创,在同类故事中,别开生面。

与红叶题诗类似,唐宋时期还出现了袍中得诗一类故事。《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载:开元中,颁赐边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云:“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玄宗知其事,乃以诗遍示六宫,得一宫人。玄宗哀悯,以嫁得诗之人。同类故事在宋人小说中再次出现,《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翰府名谈》云:

唐僖宗朝,自内制袍千领,赐塞外吏士。神策将士马直于袍中絮得金锁一枚、诗一首,云:“玉烛制袍夜,金刀呵手裁。锁情寄千里,锁心终不开。”直货锁于市,为人告其将,并得诗奏闻。僖宗令马直赴阙,以官人赐直为妻。有情者为《金锁曲》流于世。

同一故事又见于《唐诗纪事》卷七八,《纪事》于文末还记载:“后僖宗幸蜀,真昼夜不解衣^②,前后捍御。”这一情节与刘向《说苑》中楚王绝缨故事相仿,颇有戏剧性,或自此化出。此一故事当出自宋人附会,是一篇虚构性小说。

3. 取其梗概,铺张增饰

唐诗本事中的杂录性、志怪性本事一般拘于实录,故事简单,叙述简略,文学色彩和审美意味较为淡薄。宋代一些采择本事的小说,往往依据

① 按:宋周守忠《姬侍类偶》卷下“凤儿题叶”引《小名录》,即据王铎《补侍儿小名录》。

② 按:《唐诗纪事》卷七八“僖宗宫人”,“马直”作“马真”。

旧事,铺张增饰,唐诗本事质朴无文的面貌因此大为改变。一般来说,这些小说情节更为丰富具体,故事更为曲折完整,因而文学色彩更为鲜明,审美意味也更为浓厚。

增饰篇幅较大的是王轩遇艳和韩湘展幻的故事。《云溪友议》卷上“苕萝遇”记载了王轩因题诗而得遇西施的故事:王轩少为诗,遇物属咏。曾泊舟苕萝山,题诗西施石,诗毕,见一女郎,吟诗致意,自称西施。两人“既为鸳鸯之会,仍为恨别之词”。后萧山郭凝素闻其事,每至浣溪,长吟题诗,然无所遇。进士朱泽以诗嘲之。这段故事又载于《翰府名谈》,但文有增饰。故事于西施吟诗致意一节之后又记二人以诗赠答,并谓二人于来日会于水滨,以诗往还,后留居逾月。显然,此一情节由“既为鸳鸯之会,仍为恨别之词”一语附会铺张而来。增饰部分,除以诗歌赠答外,还穿插人物语言、心理等描写,情节较为丰富。这样,经过宋人的演绎,王轩遇艳的故事由原来的志怪逸闻一变而为香艳动人的传奇小说。

韩湘展幻的故事见于《青琐高议·前集》卷九,题作《韩湘子》。这篇故事源于《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中的一段相关记载。“韩湘”原作韩愈从子侄,本事谓韩愈有从子侄自江淮来,令于学院伴读,而屡屡生事,韩愈责之,侄谓能令牡丹青紫黄赤。时维冬初,牡丹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诗一联,字色紫分明,乃韩愈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侄后归江淮,竟不愿仕。本事叙幻化之事,情节简单。至宋人小说,乃恣意附会,不仅添加了韩湘应机为诗的情节,而且据本事所引“云横”两句引入韩愈出官诗全文,据此诗敷衍韩愈贬潮州途经蓝关时与韩湘相会的故事,并由此生出讨论佛、道,离别赠答和供药预言等情节。同王轩遇艳故事相比,此一故事增幅更大,也更具传奇意味。当然,故事虽在情节上步步推演,环环相生,但仍大致遵循原有故事的框架,并未抛弃旧有故事,另择廊庑,自立门户,因而与前面两种本事演化及故事生成方式有别。

除上述由杂录、志怪向传奇演化的小说之外,另有一类增饰本事的故事,其增饰并不明显,甚至较为隐蔽,增饰并不改变原有的杂录、志怪体制,这就容易产生文本认定的错觉。下面两则故事属于此种情况:

三乡题云：“予家本若耶溪东，与闺中同志者纫兰佩蕙，趋闲之境，不得从人。不幸良人已失，邈然无依，命笔聊书绝句：姓二九，下父后，玉无暇，弁无首，荆山石，往往有。以笔墨非女之事，名姓故隐而不书。”诗曰：“昔逐良人西入关，良人身没妾东还。谢娘卫女不相待，为雨为云归旧山。”李舒解曰：“‘二九’，十八也，十加八，‘木’字。子为父后，‘木’下‘子’，‘李’字。‘玉无暇’，去其点也。‘弁无首’，存其‘卩’也。‘王’下‘卩’，‘弄’字也。‘荆山石，往往有’者，荆石多韞玉，当是姓李名弄玉也。”（《类说》卷二九《丽情集》引“三乡题”）

文宗与宰相谋诛宦官，事泄，翻为内官所杀。上登临游幸，未尝为乐，往往瞠目独语，因题诗殿柱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明日便殿观牡丹，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开者如笑，合者如咽。”吟罢，方省舒元舆词也，叹息泣下，命乐适情。官人沈翘翘舞《河满子》，词云：“浮云蔽白日”。上曰：“汝知书耶？此是《文选》古诗第一首，念君臣值奸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赐金臂环。翘翘善玉方响，以响犀为椎，紫檀为架。后出官，归秦城，奉使日东，翘翘将玉方响登楼撰一曲，名《忆秦郎》。（《类说》卷二九《丽情集》引“文宗诗”）

第一篇小说源出《云溪友议》卷中“三乡略”。故事取无名氏诗序，但原序无姓名隐语，也无李舒解说隐语一节。《丽情集》故事文本因增入隐语，语意晦涩，文气不畅，显示隐语为硬性楔入。原序谓“以翰墨非妇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隐而不书”，所谓“隐而不书”指略而不书，“隐”乃“略”之意。宋人小说以“隐”为作隐语而不显书，实为曲解。出谜解谜，隐约其事，以至故弄玄虚，这是小说家制造悬念时惯用的伎俩。此一故事虽依托原文，委曲附会，但难掩造作之迹。第二篇小说源出苏鹗《杜阳杂编》卷中。与本事对照，小说不仅多出沈翘翘出宫嫁秦城及撰《忆秦郎》等事，而且多出《河满子》歌词及文宗述解一节。舞《河满子》事，本事原作“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调声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不言歌唱。多出情节乃小说节外生枝。

这两篇故事虽有增饰,但增幅不大,并未突破原有的杂录体制。一般来说,经过增饰成为传奇的小说,其演变过程是明显的,小说文本不易误认为本事文本。但是,那些虽经增饰而仍为杂录的小说,增饰部分极易误作本事原有的阙文,小说文本容易误判为本事文本。这种文本认定的错觉只能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予以纠正。

本事小说化的三种方式是就整体而言的,这是一个相对的、理论性的划分。在具体的小说化过程中,不同方式有时同时发生作用,并不存在运用上的非此即彼关系。可以说,真正的小说化过程比我们理论的描述要复杂得多。

第二编 体制篇

本事的体制包括本事的文体特征、故事生成、故事形态及文本构成等。在第一编里,我们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本事的来源、演变及其影响,从而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对本事的文体特征进行了探讨。第二编我们将讨论本事的生成、故事形态、文本构成,并进而考察本事对诗歌的影响。

第一章 本生的故事生成

本事的体制与本事的生成密切相关,要把握本事的体制特征,必须追踪本事的生成过程,考察本事的生成方式。本事的生成途径不一,形式也千差万别。对此作微观考察和具体分析是本章的中心任务。

第一节 本事的来源

本事的来源即本事的生成途径。不同的本事生成形式具有不同的生成途径,因此,厘清本事的生成途径是正确理解各种本事生成形式的前提。一般来说,唐诗本事有三大来源:一是文献记载,二是口头传说,三是书面解读。

一、文献记载

所谓文献记载是指本生故事发生以后不久即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

来,本事并不经过长时间的口头传播,而以文字形式流传。记载此类本事的著作涉及下列不同文体类型:第一、传记,或杂传记。如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这是一部记录中宗景龙时期宫廷文学活动的文献,作者武平一为修文馆学士,亲历宫廷文学集会,参预君臣唱和,书中所记乃亲身经历。《景龙文馆记》的成书虽在中宗之卒的景龙四年(710)至武平一下世的开元末年(741)之间30年,但从该书以日月系事这一情况看,文献记载与故事发生大致同步。第二、部分小说。一些小说属当时人记当时事,耳目所接,较为亲近,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如张鷟的《朝野僉载》,主要记载武后一朝的事迹,其中的本事故事也多发生在武后时期。作者张鷟生活在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和玄宗前期,则书中所记,或为身之所历,或虽为耳闻,但时代相近,多属原始材料。同样,孙棨的《北里志》自叙频年随计、久寓京华时游历平康的所见所闻,所记多为亲身经历。此外,如《南唐近事》所记南唐旧事。该书为宋初郑文宝撰,据前自序,成于太平兴国二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书虽不尽详实,“然文宝世仕江南,得诸闻见,虽浮词不免,而实录终存”。可见虽王朝易代,但究竟时代相接,所记存实。第三、史著,包括正史和载记。正史有新、旧《唐书》,这两部著作也偶采小说、传闻,但史料的基本来源是历朝实录和国史、私家传状、谱牒、碑碣、诗文等原始材料。载记中有载录本事的《蜀梼杌》,该书为宋人张唐英撰,其书本于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史料来源与正史相同。第四、诗选和诗集序。前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后者如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等,均记诗歌本事。《河岳英灵集》收诗起于玄宗开元二年,讫于天宝十二载。殷璠生活于玄宗时期,所收乃当世诗歌,其中本事出于当时。《孟浩然诗集》是孟浩然故友王士源所编,集序中的本事自属原始材料。《河中鹳鹊楼集序》叙诸人继畅诸之后作《鹳鹊楼》诗一事,乃叙当时之事。唐人选诗或编集,对象多为同时代人,所以其中涉及的本事多为可靠的文献记载。第五,诗序。《本事诗》和《云溪友议》中收有自诗序转化而来的本事。《本事诗》如刘禹锡重游玄都观诗事,元稹遇黄明府诗事及韩愈等作石鼎联句诗事;《云溪友议》如“南海非”、“钱歌序”及“三乡略”。此外,《闽川名士传》记载的欧阳詹与太原妓的著名故事采自孟简《咏欧阳行周事》诗序。这种采自诗序的本事在

唐代较为普遍。

以上五种不同文体的著作,其记载本事的时间与本事故件发生的时间相去不远,本事以书面文献流传,属于文献记载。除此之外,尚有一种特例,一些本事记载的时间与本事发生的时间相去已远,但本事的记载又非出自民间流行的传闻。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记有玄宗闻歌李峤诗句而潸然出涕的故事。据该书序言,书中所记开元、天宝旧事乃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得之柳冕,柳冕得之其父柳芳,柳芳得之高力士。柳冕曾谓:“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该书作于文宗大和八年,本事的记载虽距故事的发生近80年,但其间流传出于私相授受,而非通常的民间传播。这样,本事记载时仍然保存了故事的本初状态,因此,此类本事,可以归入文献记载一类。

二、口头传说

所谓口头传说是指本故事在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之前经过了较长时间和较为广泛的口头传播。首先,从故事的发生到本事的记载历时较长,本故事非记载者亲历,而是得之传闻。其次,口头传播范围较广,甚至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与私相授受有所不同。此类本事占唐诗本事的很大一部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小说的题材特点和文体功能。早期的小说原是记载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此一特点在唐代并未根本改变。唐人笔记多记传闻之词,这在一些笔记的序言中是有所说明的:

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大唐新语序》)

余自髫髻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隋唐嘉话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唐国史补序》)

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泅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大唐传载序》)

宾护尚书河东张公,……博物自同于壮武,多闻远迈于臯臣。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

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尚书故实序》)

骈咸通中始随乡赋,以薄伎贡于春官,爰及窃名,殆将一纪。其间退黜羈寓,旅乎秦甸洛师,新见异闻,常思纪述。(《剧谈录》序)

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玘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他日渚官见元澄中允,款狎笑语,多符其说。……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北梦琐言序》)

上引序言均说明了笔记记录传闻的情况,有的笔记虽对传闻之词取舍慎重,但毫无疑问,一些内容仍得之传闻。以上序言涉及的小说均记载唐诗本事,一些本事,作者记载的年代已远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可以看出,这些本事经过了长时间的口头流传。如果说以上序言对本事传播形式的说明还只是隐含在对整个小说的说明之中,那么《云溪友议序》则对此作出了直接交代:

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摭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傥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

以传统小说观念为依归,以孔子采择风谣为范例,不避流俗,采录成文。同《本事诗》相比,《云溪友议》的采择态度更为宽容,一些可能被《本事诗》斥为“拙俗鄙俚”的本事,《云溪友议》多有采录。因此,《云溪友议》得之传闻者居多,就此而言,《云溪友议》较之《本事诗》其实更能代表唐诗本事的面貌。

本事在长期而又范围广泛的口头传播过程中常常发生改变,因为每一个传播者都有可能参与本事的创造,在此过程中,故事情节可能经过取舍增删,诗与事也可能归属不一,甚至一些故事如空穴来风,毫无依据。应该说,本事口头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进行本事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本事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记载的本事已远离真

实故事,本事在传播中逐渐走样。《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记载李涉与豪客的故事:传说李涉曾过九江,遇数十人江上劫掠,涉因赠诗豪首得免,遂与豪首相约聚于扬州。后涉至扬州,未见豪首,而遇湖州妓宋态,因有诗赠。后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闽越,因雨求宿,遇田翁韦氏,因与论当世诗,韦叟自言曾为豪客,得李涉赠诗,因追惋平生,歌李涉之诗。范摅谓此事得之李汇征,李汇征于韦氏处见李涉手翰,言之凿凿。其实,据李涉原诗,所谓李涉与豪客的故事不过是诗人夜宿江村偶遇豪首的一次略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并无赠诗及相约扬州之事,与赠诗、相约一事相关联的所谓扬州巧遇宋态及韦氏论诗感怀等事,更是无从谈起^①。这段捕风捉影式的故事未必成于一手,或经众口流传,屡传屡变,至范摅载录时,已与事实相去万里。

口头传播对本事影响的另一表现是,因传闻异词,记载各异,因而出现不同的本事文本。《本事诗》和《云溪友议》均记载戎昱感妓的故事,但前者以夺妓者为韩滉,后者指为于頔,故事情节各异,引诗也不相同。顾况题叶故事分别见于《本事诗》和《云溪友议》,但两处记载情节不尽一致,所引宫女题叶诗亦有不同。贾岛苦吟冲官的故事,据《鉴诫录》卷八“贾忤旨”记载,是因为锻炼“僧敲月下门”一句而不意冲撞京兆尹韩愈的车骑;但在《唐摭言》卷一一“无官受黜”条里,却是贾岛因搜求“落叶满长安”句下联而唐突京兆尹刘栖楚。以上各例,虽诗、事有异,但均属一人。此外,还有一事而分属两人或一诗而分具两事的情况。如《鉴诫录》卷二“鬼传书”条记宰相赵畚亡灵遣鬼传书及诗一事,但在《太平广记》卷三二八所引《灵怪集》中,其诗又为慕容垂鬼所作。同书卷四“蜀门讽”条所载向瓚嘲蒋炼师诗,《南唐近事》作处士陈沆嘲庐山道士,引诗大同小异。又《江南野史》卷七记伶人李家明苑中咏牛及皖公山吟咏两事,而杨亿《谈苑》作王感化对李璟事。还有《唐摭言》卷七记载王播重游扬州惠昭寺木兰院诗,《北梦琐言》卷三作段文昌诗,本事有异。如此之类,其例甚多。

口头传播对本事的影响,以上不过举其大端,实际的情形更为多样,

^① 详见《考证篇》“22 李涉”条。

也更为复杂。总之,口头传说作为本事传播的重要形式,对本事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是本事生成最为重要的途径。

三、书面解读

一些唐诗本事,既不是来自有案可稽的文献记载,也不是出于诗歌内容之外的民间传说,而是出于读者对诗歌内容的解读。这种解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诗歌本身具有叙事性,读者将诗歌内容演绎成为诗歌本事。此一诗事,原已发生,但解读以前以诗歌形式存在,解读以后以本事形式存在。二是本事内容并不存在,是出自读者对诗歌的误读。这两种情况有时同时出现在同一本事中,从而形成真伪杂存的情况。

在本事的形成过程中,读者对诗歌的解读是从不同方面着手的。这包括解读正文、解读诗题、解读注文。

首先是解读正文。一些诗歌具有叙事成分,或本来就是叙事诗,读者将正文内容加以改写,或扩充丰富,形成敷演诗意的诗歌本事。最能体现这一解读方式的是崔护题诗都城南庄的著名故事:故事前半记崔护题诗的缘起,其中题都城南庄诗虽为七言绝句,篇幅短小,却是一首叙述完整的叙事诗。诗的前半和后半分别叙述去年和今年春游都城南庄时的见闻遭遇,虽只勾画当时情景,但事件脉络分明,前后照应,具有叙事诗的明晰和完整。同时,诗以描画为主,具体情节较为朦胧隐约,这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本事作者正是遵循诗歌交代的事件脉络,在尊重诗歌文本的前提下,充分展开想象,从而将一个简单的事件断片演绎成为一篇情辞华美的传奇故事。此类以诗歌正文解读为基础的本事在唐诗本事中极为普遍。

其次是解读诗题。唐诗的诗题多为实题,诗题通常说明与诗歌内容相关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因由等,为正文内容作必要的背景交代,因而具有浓厚的叙事色彩。诗题为读者读诗提供了线索,也为本事作者叙写本事提供了依据,诗题中的事件要素往往成为本事的內容或叙写的基础。下列本事属于这种情况:

吴武陵虽有才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藉,敕令广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

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鹞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本事诗·怨愤第四》）

白乐天以正卿致仕，时裴晋公保厘夜宴诸致仕官，乐天独有诗曰：“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飘飘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临散更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唐摭言》卷一五）

吴武陵因罪而遭推问一事，因无其他史料可为佐证，其有无难以遽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事所引之诗与推问一事了无关涉。此诗《全唐诗》卷七二五又作于邺诗，题作《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可见，这是一首下第以后自抒怨愤的诗，作者为于邺，实与吴武陵事无关。本事作者在附会诗事时，抄袭了于邺诗题中的若干字句，其中“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云云，出自诗题。第二则本事记事有误。白居易致仕时间在会昌三年（843），此时裴度早已离世。文中所引白居易诗题为《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系于大和八年（834），本事所记乃据诗题附会。这种以附会穿凿方式解读诗题的本事还有《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一条中李涉在扬州巧遇宋态的故事，本文“考证篇”对此有考证，兹不赘述。

再次是解读诗注。唐诗诗题之下有时附有简短的小注，这些小注通常包括不便写入诗题但又为解读正文所必需的内容，在性质和功能上类似叙事性的诗题。因此，它们有时和诗题一起成为本事叙写的依据。如下列本事：

杜鹵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云（按：即温庭筠）诣韦曲杜氏林亭，留诗云：“卓氏垆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鹵公闻之，遗绢一千匹。（《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

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塘。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南部新书》戊）

第一则本事所引温庭筠诗诗题为《题城南杜鵑公》，题后有注，云：“时公

镇淮南,自西蜀移节。”^①本事中“杜幽公”即题中“杜邠公”,乃杜惊,杜佑之孙,京兆万年人,“韦曲杜氏林亭”在长安城南,杜氏家于此。本事出自诗题及注文,出处甚明。第二则本事中刘禹锡诗诗题为《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此引该诗后两句,原诗两句下自注云:“白君有妓,近自洛归钱塘。”^②则本事出自诗末注文。

以上讨论的三种本事生成途径还只是一个粗略的理论划分,对于具体的本事生成来说,情况往往较为复杂。有的本事虽可纳入文献记载一类,但记载以前可能经过短期的口头流传,还有一些本事起于诗歌解读,中间经过较长时间较大范围的口头传播,然后记载下来。因此,具体的本事生成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过程作动态的考察。

第二节 本事的生成形式

本事的生成途径,我们已在理论上划为三种。途径不同,生成情况也大不相同。对于文献记载一类的本事来说,所谓本事的生成其实是指故事的发生,故事的发生和本事的生成是同一的。在故事的发生之外,并不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生成过程。但是,对于口头传说和诗歌解读这两类本事来说,本事的最终完成,既要经过本事的发生阶段,又要经过本事的口头传播或书面解读阶段,因此,这两类本事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对原有故事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也有一些本事甚至本来并不存在,它们是在口头传播或书面解读过程中产生的,本事的生成过程是一个由无到有的创作过程。这两类本事的生成对唐诗本事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本节对本事生成形式的探讨也是建立在这两类本事的基础上的。

本事的生成形式,概而言之,有如下六种:

一、解读诗作

前文已经论及,诗歌解读是本事的重要来源。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这种阅读行为也是本事的生成形式,借助诗歌解读,形形色色的诗歌本事得

^① 《全唐诗》卷五七九。

^② 《刘禹锡集》卷三二。

以产生。作为本事的生成形式,解读诗作又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敷演诗意

一些诗歌具有叙事性,本事作者根据诗歌提供的人物、事件等要素,借助一定的想象,推演出与诗歌内容大致吻合的诗歌故事。《本事诗》中有两篇杜牧的诗歌故事即由此生成: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傍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同上)

第一则故事基本复述诗歌大意。在叙写中,虽然参杂想象成份,但基本情节自诗歌内容化出,并无超出诗歌内容的情节枝蔓。第二则故事亦据诗意敷演,只是与诗歌内容相比,情节更为曲折迭宕,描写也更为细腻丰富,因而想象的色彩更为浓厚。当然,作者在叙写故事时,对诗歌原文发生误解。文中所谓李司徒“以杜持宪,不敢邀置”云云,即是对“谁唤”一句的误读^①。在此类本事的生成过程中,这种误读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果说

^① 详见《考证篇》“30 杜牧”条。

以上两则故事仍然遵循诗歌提供的事实框架,那么,同是敷衍诗意,崔护题诗都城南庄的故事则明显溢出诗歌内容,超越了原有故事的框架。本事后半叙崔护题诗后数日复往寻访,闻有哭声,乃知女子久已属意于己,见所题诗,感恨而死。崔护请人哭之,女竟复活,遂结为夫妻。这段为情所感、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的浪漫故事在诗歌中并无情节依据,显然出于虚构。虽然如此,从故事情调和人物性格来看,衍生的情节是对原有故事的合乎情理的发展,整个构思仍不失为一种“合理想象”,这种以“合理想象”构筑故事情节的方式可视为对诗意的演绎。

第二,穿凿诗事

穿凿诗事是指本事作者对诗歌内容有严重误读和曲解,诗歌本事基本由误读和曲解附会而来。有时,这种误读和曲解涉及全篇诗歌,如下列两则本事:

渭南(按:指王建)先与内官王枢密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枢密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官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官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云溪友议》卷下“琅琊忤”)

兵部李员外约,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分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谔同弃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尤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尚书故实》)

第一则本事,故事与诗歌在内容上难以吻合。全诗不过叙说王守澄与帝王的亲密关系、宫中执掌及所受荣宠,流落企羡颂美之情。与故事中企图转嫁罪责以脱灾祸的情节毫无关联。诗歌本事当是误解诗歌原意并据诗歌尾联附会而来。第二则本事所引李约诗实为怀人之作:秋夜月中,诗人虽有心事,却不便向近邻韦况诉说,他想起好友张谔,但此时人分两地,无

由接谈,惟有月下相思而已。本事中李约与张谔每“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一节,情节怪异,与此诗意不符,显为穿凿附会。本事当据文末所引李约诗敷衍而来。

除误解全诗以外,另有一些本事拾掇诗中一二词句,歪曲原意,随意牵强附会,一些本事因此成为毫无依据的臆说。前文已述及《北梦琐言》卷二所载温庭筠诗“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两句故事,其实,两句出自温庭筠诗《李羽处士故里》,乃伤悼友人,兼以自伤,与令狐绹“以故事访于温岐”事毫无关涉。又如下引本事: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恤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骊珠掌内看。”(《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抒情诗》)

本事诗中“媚川”、“韶光”指山川风物,良辰美景,本事以为人名,实属无稽^①,据以附会故事,乃游戏笔墨。除以上两例之外,此类情况还有据薛能诗“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两句附会的薛能旧将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假端揆”的故事^②,有据李涉诗《遇湖州妓宋态宜二首》诗题附会李涉扬州遇宋态的故事^③。这些本事抛开解诗原则,其穿凿附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第三,附会比兴

唐代的咏物、咏史或咏事诗,常借助比兴手法,托物言志,借事抒怀。这些诗多因事感发,要理解诗歌深藏的内涵,就必须了解其事件背景,因而述说此类诗歌的本事应运而生。《本事诗》中有王维《息夫人》诗事,张

① 详见《考证篇》“44 李曜、吴圆”条。

② 详见《考证篇》“34 薛能”条。

③ 详见《考证篇》“22 李涉”条。

又新《牡丹》诗事,白居易杨柳诗事,吴武陵怨愤诗事,张九龄《海燕》诗事;《云溪友议》中有章孝标《归燕诗》、欧阳灏《燕诗》、朱庆余《闺意》诗本事。唐人笔记载录此类本事甚多。唐诗好用比兴,为此类本事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也为附会说诗之风大开方便之门。此类本事,有的确有其事,有的则是附会之谈,如下列本事即出自附会: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本事诗·事感第二》)

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凑,至寿阳驿,绝句云:“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盖有所属也。柳枝后逾垣遁去,家人追获。及镇州初归,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自是专宠绛桃矣。(《唐语林》卷六)

后唐明宗太子从荣,好作歌诗,高辇辈多依附之。……齐己《中秋》诗云:“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从荣果谋不轨,唱和者言涉嫌疑,皆就诛,惟齐己得荆帅高令公匿而获免。(《唐诗纪事》卷七五“僧齐己”)

第一则本事所引“杨柳之词”题为《杨柳枝词》^①。《全唐诗》卷四六三所载卢贞《和白尚书赋永丰柳》诗序云:“永丰坊西南角^②,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尚书曾赋诗。”则白居易诗不过咏物,别无深意。第二则本事的真实性,后世看法不一。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引寿阳驿出土诗石及唐人跋语,证其实有,而蒋之翘《韩昌黎集辑注》、方世举《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则力辨其无。此一本事其实自第二首诗《镇州初归》附会,所谓“柳枝后逾垣遁去”出自前两句,而“专宠绛桃”乃据后两句所叙。韩愈出

① 见《全唐诗》卷四六〇。

② 白居易诗“永丰”句原作“永丰西角荒园里”,见《全唐诗》卷四六〇《杨柳枝词》。

使镇州在长庆二年二月^①，自镇州归时，已在春末，此诗不过记故园景色，皆本于实。只是后两句用拟人手法，用语旖旎妩媚，故启说者艳异遐想，而造此附会穿凿之说。第三则本事是说齐己《中秋》诗句隐喻李从荣势如中天，但《中秋》诗全篇不过写一时风物，乃流连光景之作，并无寓意。所引“四海”句，原作“四海待看当午时”，纯为写景，远离隐喻，诗歌异文是因牵合本事而有意改动的。

附会比兴的本事还可举出吴武陵怨愤诗事、杜牧《叹花》诗事^②等。这些本事，有的本无其事，故事完全据诗歌附会而来，如韩愈诗事、杜牧诗事；有的虽有其事，但诗与事并无关联，本事乃牵合而成，如上引白居易诗事、齐己诗事及托为吴武陵诗之本事。因诗造事和因诗成事是此类本事的生成方式。

第四，坐实事典

唐诗用典极为普遍，有的明用，有的暗用，有的用其事，有的用其辞，或有读者熟视无睹，对于暗用或用其辞者，更是懵然而无知觉，因此，唐诗本事解诗常常误以用典为记实事。这种坐实事典的解读总是远离实事，有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下列本事：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大中中，赵公在内廷，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诗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离披。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学汉臣栽苜蓿，还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更重窥。”（《唐摭言》卷一一）

李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太平广记》卷二六五）

杜甫与严武世旧，武镇蜀，辟甫为参谋，待遇甚隆。甫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就江，纵酒笑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

^① 见《旧唐书·穆宗纪》。

^② 见《唐阙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

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故武诗云：“莫倚善为鹦鹉赋，何须不著鵷鷺冠。”其傲诞如此。（《续世说》卷五“任诞”）

李商隐诗本事，《北梦琐言》卷二载谓：“李商隐，绹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这一记载提示，本事自“郎君”两句解读敷演而来。句中“东阁”用汉代公孙弘为相时开东阁以延贤士的故事，两句是说，令狐楚在世时，引李商隐为门客，关怀备至，但令狐楚死后，令狐绹疏远了李商隐，使商隐不能再曳裾门下，得其恩顾。两句不过借事达意，望令狐绹汲引，并非真以未能再窥厅阁为憾。本事坐实“东阁”一语，而造此题诗厅阁故事。第二则本事所谓李群玉“性喜食鹅”乃依据卢肇诗“工书定得鹅”一句演绎。其实该句用王羲之为山阴道士书《黄庭经》而得鹅的故事，谓李群玉擅长书法，以王羲之“工书”为比，非真有“得鹅”之事。第三则本事前半出自《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后半所谓杜甫“不冠”之说又见《新唐书·杜甫传》：“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除此之外，本传还记有严武欲杀杜甫之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一般认为，这些记载是唐人自严武诗句附会而来。所谓杜甫“不冠”之说出自“何须不著鵷鷺冠”一句，而严武“欲杀”之说则出自“莫倚善题鹦鹉赋”一句，前者以诗中“不冠”为实事，后者以黄祖杀祢衡故事影指实事。宋代以后，学者多不信此类说法。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六以为杜甫之于严武，其情眷眷，必无“欲杀”之意。况严武必不肯以黄祖自比。杨伦《杜诗镜铨》卷九引朱鹤龄语，对“莫倚”两句作了全面解读：“今按：‘莫倚善题鹦鹉赋’，虑其恃才傲物，爱而规之也。‘何须不著鵷鷺冠’，劝之出而仕也。二语正见严、杜交情之厚。”所论颇为中肯。可见，“不冠”、“欲杀”二说的虚妄乃坐实事典、牵引附会之误。

第五，误用异文

唐诗在流传中产生了一些异文，这些异文往往给读者读诗造成误导，使诗歌解读偏离原有的题旨和诗意，好事者甚至据以敷演故事，立怪异之说。如下面两则本事：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唐国史补》卷中)

上(指宪宗)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辞焉。”(《云溪友议》卷下“和戎讽”)

韩愈登山一事怪异离奇,前人有信之者,有疑之者^①。信之者认为这是韩愈《答张彻》诗中记载的实事,但是,说者引以为据的“悔狂已咋指,垂诚仍镌铭”两句文本并不可靠,其中“狂”字,诸本亦作“往”^②,从诗句偶对及上下文意推断,“往”字为其本字。既然“狂”字为误改的异文,那么,本事中由此生成的“发狂恸哭”一节即于诗无据,是无中生有的妄谈,由此情节衍生而来的韩愈作书、县令援救等事,则近于梦中说梦。上引第二则本事亦据诗中异文附会而来。文中戎昱诗题为《上湖南崔中丞》^③,是一首酬赠湖南观察使崔瓘的诗,其中“千金”两句原作“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自谓誓志以身报答崔瓘知遇之恩,一诺而重于千金。本事依据的文本,“性”改作“姓”,好事者据此异文,创为改姓之说,又曲解“千金”一词,以指“女子”^④,从而附会出嫁女改姓的离奇故事。这种郢书燕说式的故事虽失之毫厘,但与事实相较,何啻千里。

依据异文生成的本事有时极具迷惑性,因为从表面看来,这些本事均有文本依据。如果原始文本易见,则虚假的故事易于揭破;但如果原始文本稀有,或散佚无考,则谬说易于惑众,以讹传讹,莫之能察,这或许是考

① 详见《考证篇》“12 韩愈”条。

②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③ 见《全唐诗》卷二七〇。

④ 按:唐人已将“千金”作为女子的称呼,如毕耀《古意》云:“璇闺绣户斜光入,千金女儿倚门立。”(《全唐诗》卷二五五)李群玉《赠妓人》云:“谁家少女字千金,省向人间逐处寻。”(《全唐诗》卷五七〇)

察唐诗本事时需要格外小心的。

二、套用事典

一些唐诗本事远离诗歌本来故事,而接近旧事或典故,故事实自旧有事典演化而来;还有一些本事,本无其事,其事自旧事典故移植而来。这些本事刻意模仿旧事典故,与旧事典故类型相似,描写趋同,本事与事典之间具有明显的同构关系。这种套用事典的情况在本事中较为普遍,归纳起来,有下面两种情形:

第一,因诗意附会旧事

一些本事并不遵循原有诗事的框架,而是依据诗歌的有关内容附会旧事,用旧事改造诗事,或将诗事纳入旧事的框架,这样的本事已不完全符合原有诗事的面貌,成为与旧有事典接近的新的故事。如李涉遇豪客故事,其中所谓李涉遇豪客一诗,原题为《井栏砂宿遇夜客》,诗云:“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①本事据诗意敷衍,豪客剽掠、李涉赠诗一节乃附会衍生,与诗意不符。衍生的情节与《世说新语·自新》中陆机感化戴渊的故事相似,遣词造句也如出一辙,可见这一情节自《世说新语》故事化出,是模仿小说编造的一段故事^②。化用事典的还有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隋唐嘉话》卷中)

循堤步月入朝的叙述是贴近诗题及诗歌内容的意度之词,但所谓“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等描写,则是与诗歌内容无直接关联的想象之词。魏晋南北朝小说在描写人物时常有“望若神仙”之类的刻画,或寓赞美,或寓企羡,本事在情节构成和人物心理刻画上均受此类小说的启发和

^① 《全唐诗》卷四七七。

^② 详见《考证篇》“22 李涉”条。

影响,一些描写则直接出自这些小说的情节^①。与上官仪诗事相近的还有崔湜诗本事:“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②此一本事的内容或偏离诗歌,或有违史实^③,同上官仪诗事一样,也是由魏晋南北朝小说演化而来的故事。

第二,依事典编造故事

中国古典诗文的用典是人们熟悉的,小说的用典则较为生疏。其实,小说不仅采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唐人传奇还依照事典编造故事。如李玫《纂异记》中《许生》记“甘露之变”被害四相鬼魂相聚的故事,全篇构思源出西晋石崇、潘岳同刑东市的故事。唐诗本事有时也借用这一故事的生成手法,故事的主体和构想源于前代旧事、典故,是前代事典的移植和再造。故事内容与诗歌内容无关,因而故事是外在的,是独立于诗歌的自觉创造。这些特征与上述第一种情形有所不同。如钱起诗得神助的故事:

(钱)起能五言诗。初从乡荐,寄家江湖,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見,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摄衣视之,无所見矣,以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试之年,李崱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崱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旧唐书·钱徽传》)

此一本事的主旨是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普遍存在的文才神授观念,《唐才子传》的记载将此一观念表露无遗:“主文李崱深嘉美,击节吟味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魏晋南北朝有很多文才神授的故事,如罗含梦得文才和江淹梦失文才的传说,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佳句的故事,都无一例外地宣扬文才神授。谢灵运所谓“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④,即才思神授之

① 详见《考证篇》“1 上官仪”条。

② 《太平广记》卷四九四引《翰林盛事》。

③ 详见《考证篇》“2 崔湜”条。

④ 钟嵘《诗品》卷中。

意。钱起诗本事表现“曲终”两句的精警传神与谢灵运梦得佳句故事类似,无疑自此衍生复制。此一本事在内容上与诗歌本身无关联,完全是一种文学观念的产物。

上述本事与前代故事的关系较为明显,易于追寻。也有一些本事虽化用前代事典,但隐晦曲折,不着痕迹,其承继关系不易发现。《云溪友议》卷中“衡阳遁”讲述玄宗时期徐安贞遁隐于淄流的故事:徐安贞久在中书,恐李林甫罪累,逃隐衡山岳寺,为行者数年,喑哑不言。后李邕游岳过寺,见徐安贞题字,知其在山寺,因与相见,诵安贞诗中佳句“岷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等,后同载北归,止于潭州,湖南观察使水亭相迎,徐安贞云:“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徐安贞逃隐衡山一事有违史实,是杜撰的故事^①。文末徐安贞语化用南朝诗人柳恽的《江南曲》诗句:“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且言行路远。”^②所谓李邕携徐安贞北归的故事不过由柳恽诗歌化生敷衍,而徐安贞逃隐山寺的故事乃因此而预设铺排。整个故事是以柳恽诗歌为想象平台,并由此生发而来。此一本事对旧典的借用主要表现为于故事的构思,这种“夺胎换骨”式的化用比其他事典套用更为隐蔽,更加难于觉察。

三、追求故事

一些诗歌,或本无本事,或诗事简单。因为闲谈和传播的需要,本事作者将无“事”之诗纳入已有的或虚构的故事框架,或将原本简单的诗事故事化,使之成为叙事更为曲折、情节更为完整、趣味更为浓厚的小说故事。如下面的本事:

朱滔括兵,不择士族,悉令赴军,自阅于毬场。有士子容止可观,进趋淹雅。滔召问之曰:“所业者何?”曰:“学为诗。”问:“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诗,援笔立成。词曰:“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

^① 详见《考证篇》“3 徐安贞”条。

^② 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

难。惯从鸳被暖，怯向雁门寒。瘦尽宽衣带，啼多渍枕檀。试留青黛着，回日画眉看。”又令代妻作诗答，曰：“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滔遗以束帛，放归。（《本事诗·情感第一》）

故事贴近情理，题诗也颇为巧妙，整个叙述似乎天衣无缝。但是，文中第二首诗，《又玄集》卷下、《才调集》卷一〇均作葛鸦儿诗，题为《怀良人》。此诗当属葛鸦儿，为思妇怨别之词。此一本事前半或为实事，后半则出于虚构，这是本事作者为使故事更为曲折动人而编造的一段情节，这种对故事情节的追求正是后一首诗成为有“事”之诗的原因。《云溪友议》中的此类本事，可以举出“巫咏难”和“钱塘论”。“巫咏难”条记载，白居易将过巫山，秭归县令繁知一于神女祠署诗候其清词，白居易谓和州刺史刘禹锡为夔州刺史时欲在此题诗，然怯而不为。后罢郡经过，去诗千余首，但留沈佺期、王无竞、李端、皇甫冉诗各一首，终无所作。然本事所记白居易过巫山事，当在元和十三年（818）至十五年（820）为忠州刺史时期，刘禹锡为夔州刺史及此后为和州刺史，则是长庆元年（821）至宝历二年（826）的事，所谓白居易谓和州刺史刘禹锡云云，于史不符。本事所述刘禹锡事出于虚构，有关白居易的故事自繁知一诗附会而来。此一本事意在称赏沈佺期等四人巫山神女诗，刘禹锡、白居易敛手无作的故事不过是立足繁知一诗的虚构而已。“钱塘论”中张祜、徐凝就白居易较量文词的故事不可信^①，所记杜牧与白居易辇下较文一事颇乖情理事实^②，而杜牧为张祜诗翻案事亦出穿凿。这些故事均无事实依据，作者本意，不过借事论诗衡文，并以娱听众读者耳目。以上两则本事均有诗评性质。唐人论诗，见于文集的单篇零札，多是直接发表议论，与此不同，本事则借助虚拟的故事臧否抑扬。

① 此事仅有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全唐文》卷七九七）一文为证，然此文为伪文（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卷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4～295页）。

② 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长庆二年，时年已50，而杜牧年仅29。又，所谓李林宗与白辇下较文一事乃虚构。《新唐书·宗室世系》记载，李林宗乃李林甫之弟，为玄宗至代宗时人，与白居易时代不相及。详见《考证篇》“20 徐凝”条。

本事故事化的进一步发展是本事的戏剧化,即在本事中安排出乎意料的情节,以追求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在本事中,戏剧化往往通过巧合来实现。对于一些具有叙事性质的诗歌来说,这种借助巧合的戏剧化手法是本事生成的重要形式。如下引本事:

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本事诗·征异第五》)

此一本事有两个戏剧性情节:第一,白居易等游慈恩寺院为诗寄元稹时,计其已达梁州,时元稹果及梁州。第二,白居易等游慈恩寺院时,元稹于梁州梦见诸人游历情形。但是,据元、白诗歌原文,可以确定的不过是两个极为平常的偶合:一是元稹诗中梦与同游者乃怀己之人;二是白居易等忆元稹之时,推测元已过梁州,而元稹梦游又偏偏发生在抵达梁州时。至于本事中的第一个情节其实于诗无据,第二个情节则是歪曲诗意附会而来的^①。此一本事在自然偶合之外更生戏剧性巧合,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事件幻化为诡异怪奇的神秘故事。具有这种戏剧性巧合的还有前引卢储催妆诗故事。故事中的叙事有矛盾,依据本事有关记载,并考之史实,其诗作者不为卢储,亦非其他状元及第者^②。以诗属卢储,乃是依据所谓“来年果状头及第”的叙述,而所谓“状头及第”云云,又是坐实附会诗中“第一仙人许状头”一句,这一坐实附会正是巧合的具体运用。本事的生成,诗歌的归属,都缘于此。

以上两首本事诗原本具有叙事性,但诗歌提供的事件尚不足以构成本事,本事的中心情节并不来自诗歌,而是来自刻意安排的情节巧合。因此,我们不妨说,这些本事是诗事戏剧化的结果。

① 详见《考证篇》“17 元稹”条。

② 详见《考证篇》“15 卢储”条。

四、附会鬼神

志怪性本事的生成有两种情况：一是诗、事共生，即诗歌作为小说的一部分与小说同时产生。此类本事本为志怪小说，诗、事俱幻，只是唐人以鬼神怪异为实有，相信奇闻异说的真实性，所以将此类小说多归入本事。二是先有诗而后有事，诗为实而事为虚，即本事诗本为诗人独立创作的诗歌，后好事者以之附会鬼神，演为志怪性本事。这第二种本事的生成有下面两种具体形式：

第一，引入神灵

一些唐诗，或为警句，或内容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神仙灵异等有关联，好事者常以之附会神灵，造为本事怪奇之说。警句附会者，如前述钱起诗得神助的故事，还有郭元振以诗书于灵怪的故事：

郭代公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公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公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数日，公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

“久戍”两句出自郭元振诗《塞上》^①，为全篇之警策。本事附会灵异，造此荒诞不经之说，意在神其警句。

内容附会者，多涉及神灵感应。如《北梦琐言》卷九记载的刘山甫题天王庙的故事：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于岭外，侍从北归，泊船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毗沙门天王，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灯不续。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随张处权请郎君咏之，乃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汝何相侮？”俄而惊觉，而风浪斗起，倒橈绝缆，沈溺在即。遽起悔过，令撤诗牌然后已。

^① 见《全唐诗》卷六六。

本事前半记刘山甫题天王庙诗缘起,交代诗歌背景,属于记实。后半记天王的呵斥,乃是基于神灵感应观念而虚构的故事。此外,还有《云溪友议》中的王轩遇西施、李群玉遇二妃的故事。王轩遇西施的故事缘于王轩的题诗,诗有“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两句,遇艳情节即由此化出。王轩题诗一节当为实事,遇艳情节乃此后据实事附会。李群玉遇二妃的故事也是缘于李群玉题《黄陵庙》诗中“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两句,诗中“行云”用《高唐赋》中巫山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故事,二妃所谓“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云云,亦本巫山神女事,遇妃故事及“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井”一节均自诗句化出。本事中李群玉诗题为《题二妃庙》,收入李群玉诗集,为其诗作,本事是后来附会的。

第二,鼓吹诗谶

唐诗本事中的诗谶多为好事者附会诗人已有诗歌,附会形式各别,有的附会比兴,穿凿诗句喻意。如下列本事:

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转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朝野佥载》卷一)

(章)孝标及第,正字东归,《题杭州樟亭驿》云:“樟亭驿上题诗客,一半寻为山下尘。世事日随流水去,红花还似白头人。”初成落句云:“红花真笑白头人”,改为“还似白头人”。言我将老成名,似花芳艳,讵能久乎。及还乡而逝。(《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

范摅处士有子七岁,……作《夏景》诗云:“闲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方)干曰:“必不寿。”隔岁而卒。后有欧阳彬之子稚齿作《田父》诗云:“桑柘残阳里,儿孙落叶中。”廖凝见之曰:“可惜天才,同范氏之子。”寻亦卒。(《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四引《郡阁雅谈》)

以上谶诗均为咏物写景,只有骆宾王诗句隐含喻意,但其意也仅指豪贵的命运升沉,并非自喻。其他诗句并无隐喻之意,喻意乃比附所得。此类诗谶占整个诗谶的绝大部分。

此外,有的诗讖基于对诗句词语的曲解。如《本事诗》中崔曙《明堂火珠》诗讖即利用“曙后一星孤”句中“曙”字和“星”字与人名的偶合,肆意穿凿。又如下列本事:

唐高相国崇文……太尉骈,即其曾孙也^①。镇蜀日,以蛮僭侵暴,乃筑罗城,城四十里,朝廷虽加恩赏,亦疑其固护。或一日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题《风筝》寄意曰:“夜静弦声响碧空,官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旬日报到,移镇渚官。(《北梦琐言》卷七“高崇文相国咏雪”)

《风筝》诗写静夜风中闻箏之事。风的顺逆影响声音的传送,因而箏声在飘忽不定的风中起伏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音调,诗中“又被移将别调中”意即此。所谓“别调”,指因风吹送而发生改变的音调。本事所谓“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自“别调”二字而来,这是将音调之“调”变成调任之“调”,是偷换语意。高骈晚年信道求仙,此诗本事当是借用“别调”二字,附会高骈生平事迹而成。这两则本事均从诗句字面附会,脱离诗歌原义,这种仅从字面穿凿的诗讖在形式上最为粗糙,也最无诗意。

诗讖生成的起因各不相同,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因诗附会,即诗讖的生成是以诗为起点的,由诗句附会出诗事,因此本事并非实事。这类诗讖有前文涉及的章孝标《题杭州樟亭驿》诗讖^②,还有杜牧《题汴河》诗讖^③。第二,因事附会,即先有某事,后以诗句附会之,诗讖的生成是以事

① 《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王。”则骈为崇文之孙,非曾孙。

② 章孝标于元和十四年登第,后曾官秘书省正字、大理评事,开成、会昌间犹在世,但如本事所谓“及还乡而逝”。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卷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6页。

③ 《太平广记》卷一四四引《感定录》:“(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杜牧诗句出自《隋堤柳》(见《樊川诗集》卷三)。大中五年秋杜牧自湖州刺史入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此诗作于入京途中。大中六年杜牧迁中书舍人,该年十一月方病卒于长安。详见缪钺《杜牧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202页。

为起点的。如前引骆宾王诗讖、崔曙诗讖、高骈诗讖,还有沈询诗讖^①,等等。一般来说,其中故事多为实事。

五、牵合生平

唐人小说多具纪实性,即使是那些并不完全记实的小说,虽然一些情节出于虚构,但就整体而言,故事的叙述总是与人物生平尽量贴近。这一特征直接影响到本事的生成。一些本事虽是虚构的故事,但其中一些情节可以从人物生平中找到依据。事实上,一些本事正是依据诗人的有关生平附会编造而来的。此类本事对诗人生平的援引是多方面的,包括平生遭际,仕宦履历,性格气质,诗歌创作等等。

牵合诗人生平而生成的本事大致有两种情况:

第一,以其人生平附会其人诗事。如孟浩然黜于明皇的故事: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忤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唐摭言》卷一一)

孟浩然长期隐居襄阳,在唐人心目中,他是一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隐逸诗人。其实,孟浩然是怀有用世之志的,他曾两度入京应试求官,但均无结果。因此,他又是一位被埋没、被抛弃的诗人,是一个命运多乖的人物。孟浩然一生,既养高忘机,又不忘功名,虽进取用世,却蹭蹬失意,这种人格心态及平生遭际正是本事得以生成的内在原因。当然,本事中的一些细节,如孟浩然与王维的交往,可以从两人的诗文中找到依据。以上本事,诗与事在内容上有直接关联。也有此类本事,诗、事本无关联,本事是因牵合诗人生平而曲解诗意附会而成。前文述及,齐己《中秋》诗本事

^① 见《南部新书》庚。

记齐己与高辇等人依附太子李从荣,其《中秋》诗隐喻太子得势,这一记载是不真实的^①。齐己诗集中确有与高辇往还的诗篇,如《寄还阙下高辇先辈卷》^②、《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③、《寄谢高先辈见寄三首》^④等,共7篇,但也只是因两人皆著诗名,彼此倾慕而以诗往还,其实两人从未谋面,更不用说一同依附李从荣。本事中的有关记载是自齐己与高辇往还的诗篇附会而来,所谓《中秋》诗句的喻意又自齐己依附李从荣的臆说附会而来。可见,此一本事生成的背景是齐己与高辇的交往。这种牵合生平、附会诗意的情况也同样表现在杜牧《叹花》一诗本事中。杜牧生性倜傥,少检束,有青楼薄倖之名,所谓杜牧待娶民女的故事无疑是由此展开的想象。

第二,以其人生平附会他人诗事。本事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诗歌作者及事主失落不明的情况,于是传播者援引其生平事迹与本事内容有所吻合的另一诗人,以为本事的诗作者及事主,由此出现与原有本事形态有所不同的新的本事。下面的本事属于这种情况: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窶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饭后钟。”盖为此也。(《北梦琐言》卷三“段相踏金莲”)

《北梦琐言》此条之末孙光宪注云:“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题扬州佛寺诗。’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两存之。”本事的另一说法今见《唐摭言》卷七,文云: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

① 详见《考证篇》“48 齐己”条。

② 见《白莲集》卷三。

③ 见《白莲集》卷四。

④ 见《白莲集》卷四。

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闍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据今人考证，本事及诗应属王播^①，但异说的出现也并非无因。段文昌与本事中王播的生平经历颇为相似，《旧唐书·段文昌传》记载：“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泊二十年。”《鉴诫录》卷八“衣锦归”条也记载：“段相国本广都县人，父以油柞为业，生而有致，长亦多才，物业荡空，文章迴振。泊跨卫行卷，乡里笑之。历三十年间，衣锦还蜀，蜀人有诗赠曰：‘昔日骑驴学忍饥，今朝忽著锦衣归。等闲画虎驱红旆，可畏登龙入紫微。富贵不由翁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飞。广都再去应惆怅，犹有江边旧钓矶。’”可见，段文昌早年也曾历经贫寒。这种相似的生平经历正是本事异说产生的根源。以上本事属于传闻异词，真实的诗作者尚可考见。也有一些作者及事主失落无考，后来的本事作者牵合其生平与诗事偶合者，附会成事。《本事诗·情感第一》及《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均记载刘禹锡感妓诗本事，两处记载细节不尽一致，但均与刘禹锡事迹不符。一般认为，本事中的诗作者不是刘禹锡。《本事诗》该诗末句作“断尽江南刺史肠”，《云溪友议》作“断尽苏州刺史肠”，刘禹锡曾为苏州刺史，苏州又地处江南，本事以诗及事属刘禹锡，皆因诗之末句。后来，《唐宋遗史》又以诗事属韦应物^②，这大约是后世读者已经发觉唐人记载不确，又因韦应物也曾为苏州刺史，于是搬用老例，移之以属韦应物，岂知欲益反损，愈说愈离。其实，真正的诗作者早已淹没无闻了。

六、同类演化

唐诗本事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同一诗人竟然出现两个内容相似、类型相同的故事，如贾岛因研炼诗句而冲撞大尹的故事。除众所周知的“推敲”故事外，《唐摭言》卷一一“无官受黜”条还记载了情节略同的另

① 详见赵守俨《“饭后钟”和“碧纱笼”本事辨疑》，文载《文史》第二十六辑，第362～365页。

② 《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六引。

一故事：

（岛）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足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

虽具体细节有异，但同为研炼诗句入神，同是冲撞大尹，应该说，这种巧合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两种传说中，一种说法当自另一种说法演化而来。这种同类演化的情况还有齐己投诗郑谷的故事。《郡阁雅谈》记载，齐己以诗投献郑谷，郑谷请改一字，齐己遂改“别下着僧床”为“别扫着僧床”，郑谷嘉赏，与齐己结为诗友^①。而据《五代史补》记载，齐己以《早梅》诗投献郑谷，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两句，郑谷请改“数枝”为“一枝”，齐己拜伏。前一故事记载不实，当自后一故事演化而来^②。

本事的同类演化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传闻异词，即本事曾以较为模糊的形式流传，在流传中不断添加不同细节，于是形成不同流传“版本”。二是刻意模仿，即一种本事有较为确定的故事文本，另一本事以此为蓝本，另行模仿编造。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由本事向本事的演化有所不同但性质相似的还有谣讖向本事的演化，这种演化形式可以《郡斋读书志》记载的武元衡诗本事为例：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被于管弦。尝夏夜作诗曰：“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翌日遇害。

这是一则据诗意附会的诗讖，不足为凭^③。本事的来源当是《旧唐书·武元衡传》中的一则记载：“至是，元衡为盗所害，年五十八。……先是长安

① 《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

② 详见《考证篇》“48 齐己”条。

③ 详见《考证篇》“11 武元衡”条。

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谓：‘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谓元衡之卒也。”毫无疑问，诗讖受到谣讖的影响，由此附会衍生。我们虽然将谣讖置于本事文体之外，但谣讖与本事中的诗讖形式相同，性质相似。因此，我们仍可将谣讖向诗讖的演化归入本事同类演化一类。

第二章 本事的故事类型

在第一编里,我们曾经论及唐诗本事的类型化倾向。本事的类型化,一方面是唐前及唐代言小说类型的纵向延续和横向伸展,另一方面则是唐人诗歌创作观念的投射。这种类型化倾向不仅与唐诗本事的虚实发生关联,而且对唐诗本事及宋代诗话的分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本事类型举要

本事的类型化表现在多个方面,有的题材接近,有的主题相似,有的文学观念相同,有的叙述对象一致。唐诗本事的类型涵盖了唐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各个层面,反映了唐代诗歌艺术创造的不同方面。正像唐诗本事的内容丰富多彩一样,唐诗本事的类型也是丰富多样的。自然,这些类型在唐诗本事中的涵盖范围及重要程度不尽相同,倘取其大端,则有如下18种:

一、嘲戏

唐诗本事中的大量故事以戏谑、调笑为内容,风格幽默诙谐。这些故事虽然出于一时取笑,内容琐屑,无关宏旨,却能见出事主豁达的胸怀、幽默的品格、敏捷的才思和优越的智慧。唐人重才性,尚机敏,插科打诨乃当时习尚,因此,嘲戏故事层出不穷,此类诗歌本事也大量涌现,成为唐诗本事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以嘲戏为本事形式多样,收入《本事诗》及《云溪友议》中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嘲身形体貌。一些本事诗嘲笑他人身形体貌、生理缺陷。如《本事诗·嘲戏第七》记载长孙无忌与欧阳询互嘲形貌的丑陋,《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记崔涯嘲妓诗事,“澧阳宴”记李宣古《赠崔云娘》诗事、杜

牧《赠肥录事》诗事及陆岩梦《赠胡子女》诗事,均为嘲妓故事。此类嘲戏诗常运用漫画手法,以极度的夸张绘形写意,具有鲜明的喜剧色彩。

二是嘲人品行事。一些本事诗讥诮他人平行事,多隐含讽刺。如《本事诗》中有张元一嘲武懿宗短陋怯懦故事,优人唱《回波词》讥诮中宗惧内故事。《云溪友议》中有进士朱泽嘲笑郭凝素题诗希艳故事,郭圆讥诮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的故事,还有卢肇(字子发)嘲游符邀客看花而不饮的故事及张祜讥刺朱坛轻佻的故事等。此类本事颇能见出人物的心性品格。也有一些本事虽然嘲事及人,但纯为笑谈,并无讽意,如陆畅与云安公主互嘲的故事,黎瓘嘲漳州崔使君诗事。

三是嘲诗句文字。与前两类故事以诗嘲人嘲事有所不同,此类本事以诗歌本身为笑谈对象。如《本事诗·嘲戏第七》记载张昌龄与苏味道各以对方诗句互嘲^①,白居易讥诮张祜诗为“款头诗”,张祜讥白居易诗为“目连变”。这些本事均以游戏态度说诗,其体制风格与唐时戏弄艺术相近,而与传统说诗完全不同。

以上将嘲戏一类本事分为三种,虽仅限于《本事诗》及《云溪友议》之所及,却也大致反映了唐诗本事中此类本事的形势特点。

二、怨愤

唐诗多抒写愤懑不平,与此相应,唐代有许多怨愤诗本事。《本事诗·怨愤第四》专录此类本事,可见此类本事实为唐诗本事中的重要一类。这些本事虽然都是讲述怨愤不平的故事,但致怨之由各有不同:第一,因政治斗争或权力倾轧而受害。如《本事诗·怨愤第四》记载李适之因受李林甫排挤而借诗泄愤,张九龄因遭李林甫嫉恨而致意求免,《金华子》记载孟迟因被谗落职而寄诗自雪^②,等等。第二,科场失意。如贾岛因科举下第,迁怒于执政,题诗园亭以泄愤;张曙因科场不利而以篇什讥刺崔昭伟^③;章碣因邵安石擢第而赋《东都望幸》以刺高湘^④;李山甫因科场不遇

① 按:本事所谓张昌龄诗“今同丁令威”句,实出自崔融诗《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见《全唐诗》卷六八及《旧唐书·张昌宗传》。

② 《唐诗纪事》卷五四“孟迟”引,《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见《唐摭言》卷一一。

④ 见《唐摭言》卷九。

而怨恨执政^①。第三,人生失意。多为仕途冷落,功业无成,而无人援之以手。如宋之问因不得为北门学士作《明河篇》以见怨望之意;薛能因官况萧条借诗发泄牢骚^②;李商隐因受令狐绹冷落,题诗厅阁,以示不满。这种因人生失意而产生的怨愤不平在本事中较为普遍。第四,遭逢不遇。如进士周匡物因不得渡江,怨而题诗^③;文士刘鲁风因投谒受阻,愤而题诗^④。以上四种致怨之由可大致反映此类本事的不同内容,因此可以成为此类本事进一步划分的依据。

三、企羨

一些本事反映唐人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对理想的实现者和追求的成功者表现出难以掩抑的仰慕之情企羨情形大致有四:第一,企羨才华风调。如上官仪入朝驱马吟诗的故事,崔湜马上吟诗而为张说叹慕的故事。唐人重诗才,仰慕文词清丽、品貌风流者乃世之风习。第二,企羨富贵声华。《唐阙史》卷下记载,卢渥轩冕之盛,并世无比,兄弟四人,位居显列。乾符初,母忧服阕,卢渥拜陕府观察使,诸弟各有所拜。及赴任,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以下,互设祖筵,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耸观,亘十余里。卢渥因作《题嘉祥驿诗》记其盛。《因话录》卷三记载,胡证为河中人,赵宗儒镇河中时,胡证为振武节度使,途经河中,备桑梓之礼入谒,持刺称百姓,献诗云:“诗书入京国,旌旆过乡关。”州里以为荣。第三,企羨品位仕禄。《本事诗·嘲戏第七》记载,沈佺期因罪谪,虽复官秩,而朱绂未复,作《回波乐》以求绯鱼。《大唐传载》记载,于良史为张建封从事,每日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张建封于是为奏章服。唐代散官的品级决定班位、俸给和章服,紫绯绿青乃不同品级章服之色,服色不同,则品级不同,禄位不同,以上本事反映诗人对禄位的追求。第四,企羨仪表品貌。《北梦琐言》卷一三记载,侍郎沈询清粹端美,如神仙中人。制除山北节旄,京城诵曹唐《游仙诗》云:“玉诏新除沈

① 见《南部新书》丁。

② 见《唐摭言》卷一五。

③ 见《太平广记》卷一九九引《闽川名士传》。

④ 见《唐摭言》卷一〇。

侍郎,便分茅土领东方。不知今夜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同书卷三又记路岩风貌之美,为世所闻,镇成都日,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羨。后移镇渚宫,离筵上所作赠官妓行云等《感恩多》词播于倡楼。以上不同内容有时相互关联,如崔湜马上吟诗故事涵盖了第一、第四两方面的内容,第二、第三两条均与富贵有关,只是前者重在声名,而后者重在实利。

四、佞媚

本事中的一些故事记载文士官僚应接投献等事,反映事主应世接物时逢迎谄佞的心态,其情形约略有二,一是以文士为主体的士人在交游往还中以甘言美语取悦他人,以逢迎态度待人应世。《云溪友议》卷上“冯生佞”记载,进士冯道明求见诗人雍陶,以巧语得雍陶欢心。《尚书故实》记载,陆畅在蜀时为西川节度使韦皋作《蜀道易》,反《蜀道难》之意,因获韦皋赏赐。《唐摭言》卷一三记载,李绅镇扬州时,请章孝标赋《春雪》诗,章孝标以谀词颂美。这些本事记佞媚之事多无讽意,颇见唐时士风。二是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士人在仕途官场依附权势,以固位求达。他们有的歪曲事实,一味吹捧,如杜荀鹤谒见梁王朱温,题无云雨诗以结欢心^①。有的罔顾道义,趋炎附势,如李峤献咏天枢诗,称颂武后革命之功^②,郑愔进《桑条乐词》,趋奉韦后^③。有的寡廉鲜耻,以身投靠,如郾城徐令欲求彭州刺史,以诗讽其女方便求取^④。取容冒进乃仕途常态,这些本事多寓有明确的是非态度和鲜明的批判色彩。

五、高逸

唐人崇尚隐逸,未仕的隐士隐居山林,或养高忘机,自励风节,或养望待时,求终南捷径。居官的士大夫虽身在庙堂而心慕隐逸,崇尚无为、超然物外,这种心态在唐诗和唐诗本事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一些本事记载隐士的隐居生活,显示鄙弃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和息影山林的高蹈情怀。《茅亭客话》卷三记载,陶沙子以淘沙自给,隐姓与名,有诗云:“九重城里

① 见(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

② 见《大唐新语》卷八。

③ 见《朝野僉载》卷一。

④ 见《鉴诫录》卷八。

人中贵,五等诸侯阃外尊。争似布衣云水客,不将名字挂乾坤。”《尚书故实》记载,兵部员外郎李约与主客员外郎张谔一同弃官隐居,不婚娶,不治生业。《剧谈录》卷下记载,隐士韦楚老曾官谏署,后弃官隐于平泉别墅,宰相李德裕造门寻访,楚老避于山谷^①。一些士大夫虽然居官,却能脱略世物,超然物外。《幽闲鼓吹》记载,诗人李远诗有“长日唯销一局棋”一句,宣宗疑其难以临郡。虽然“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但只要不拘泥于诗句字面,“长日”一句实不失为其居官生活的真实写照^②。此一本事揭示了入世士人的出世情怀。

六、伤悼

伤悼意指悲悼亡人。唐人重情,或率性任情,伤悼因此成为唐诗和唐诗本事的一大主题。此类诗及其本事涉及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第二,父子之情。《北梦琐言》卷八记载,顾况暮年有一子,即顾非熊前身,不幸暴亡,顾况为诗悲悼。冥官闻之哀怜,令顾非熊再生于顾况家。第四,朋友之情。《因话录》卷三记载,韩愈少时为萧颖士知赏,后因游庐山,过萧颖士旧居,访知诸子并歿,惟有二女,于是赋诗追悼。第三,夫情之情。《唐阙史》卷下记载,进士韦某以妓亡故,悲咽痛悼。因术士任处士致其魂魄。韦赋诗言,后逾年而没。第一,君臣之情。《唐摭言》卷一五记载,白居易去世,宣宗为诗伤悼。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伤悼诗及其本事有时寓有社会批判的意义。《唐摭言》卷一〇记载,进士刘得仁出入举场30年,竟无所成。歿后供奉僧栖白以诗吊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又《南部新书》已记载,僖宗幸蜀时,拾遗孟昭图上疏极谏,蹈于非罪,宰相裴彻为诗伤悼。这两则本事,前者揭示科举制度的弊端,后者反映政治的黑暗,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社会意义。

七、狂简

唐代士人崇尚自然,强调个性,他们不拘礼法,任性放纵,或倨傲不

① 按:此载人名有误。详见《考证篇》“21 李德裕”条。

② 《全唐诗》卷五二一载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为寄李远之作,可见李远性闲雅,善棋爱酒。

恭,愤世嫉俗,这种心态在唐诗及唐诗本事中有鲜明的表现。《本事诗·高逸第三》记载,杜牧分司洛阳时赴豪贵宴席,席间忽发狂言,诸妓皆回首破颜,杜牧因为诗自言席间狂态。《云溪友议》卷中记载,进士柳棠上第后归东川,不谒府主杨汝士,只于狭斜旧游之处纵酒。后汝士召饮,棠于席上狂纵凌忽,以诗干忤汝士。《新唐书·崔信明传》记载,荥阳人郑世翼遇崔信明于江中,对崔信明说:“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出示诗卷,世翼览之未终,十分不屑,说“听见不逮所闻”,投诗水中,引舟离去。此类本事甚众,又如薛能讥刘得仁诗“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①方干讥徐凝,谓:“把得新诗草里论”^②,卢延让贬文赋,谓:“因知文赋易,为下者之乎”^③。在此类本事中,崇己抑人,并不完全出于以其所长轻人所短的文人相轻,有时纯粹表现为凌人傲物的慢世态度。

八、诗累

唐人以诗歌进身,但也有因诗而得咎获罪者,本事中就有为诗所累的故事。《国史补》卷上记载,崔颢有美名,李邕欲得一见。颢以诗投献,首章云:“十五嫁王昌。”李邕叱其无礼,于是改变初衷,不与相见。这是属于诗语不合,更多的故事是诗触忌讳,得罪君王。《唐摭言》卷一一记载,孟浩然偶遇玄宗,因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为玄宗所弃,以致终身沦落。《唐诗纪事》卷六九记载,罗隐有文名,昭宗欲处以甲科,岂料大臣上奏,言罗隐为人轻浮,有《华清宫》诗讥谤玄宗。昭宗信以为真,于是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更有甚者,有的诗人因诗招来杀身之祸,如《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一引《古今诗话》记南唐徐融因作《夜宿金山寺诗》而遭沉杀。在此类本事中,诗累有时出于他人的构陷,如上述罗隐、徐融被谗遭谤的故事,还有刘禹锡因诗被贬和李益因诗左迁的故事。《本事诗·事感第二》记载,刘禹锡自朗州召还长安,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有人嫉其才名,诬其诗有怨愤,刘禹锡因此出为连州刺史。又《旧唐书·李益传》记载,李益为幽州节度使刘济从事时,赠刘济诗有“不上望京楼”句。后召为秘

① 见《北梦琐言》卷六。

② 见《唐摭言》卷四。

③ 见《唐摭言》卷十二。

书监,谏官举其幽州诗句,因此降居散秩。这些故事反映官场倾轧及权力斗争,寓有丰富的政治内容。

九、幼敏

唐人重天分,崇尚天才,故小说中颇多少年诗才杰出的故事。苏颋是盛唐文豪,与张说齐名,时称“燕许大手笔”。《明皇杂录》卷上记载,苏颋少聪悟过人,京兆尹命咏“尹”字,苏颋咏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又《开天传信记》记载,苏颋父苏瓌召颋咏兔,其诗立成,曰:“兔子死阑弹,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可见杰出文才在少年时即已显露。李贺是一位才华惊世的诗人,短暂的人生,却留下大量天才的诗作,因此当时流传其少年早慧的故事。《唐摭言》卷一〇记载,李贺七岁时,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韩愈、皇甫湜登门造访,请试一篇,李贺欣然承命,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作《高轩过》。少年英才的传说还有刘晏咏王大娘戴竿^①、崔铉咏鹰^②及林杰天才杰出^③等,这些故事均表现少年聪悟,才思敏捷。需要指出的是,此类本事诗多为咏物诗,如苏颋咏“尹”字、咏兔,崔铉咏鹰,还有杨收咏蛙、咏笔^④,廖凝咏棋^⑤,薛元超咏竹^⑥,等等。咏物诗为唐人作诗的初阶,唐时童蒙学诗多以咏物为题材,这是此类本事诗多咏物的原因。

十、敏捷

唐人重才性,尚领悟,本事中多有诗思敏捷、应对巧妙的故事。《本事诗·高逸第三》记载,玄宗命李白为宫中行乐诗,时李白已醉,然“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跖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唐摭言》卷一三记载,武宗尝怒一宫嫔,久不召见,后乃复召,命柳公权赋诗开释。公权略不伫思,立成一绝,诗思巧妙。同卷又记载,湖南王璘与李群玉相遇于岳麓寺,群玉请与联句,因破题以授王璘,璘略

① 见《明皇杂录》卷上。

② 见《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引《南楚新闻》。

③ 见《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引《闽川名士传》。

④ 见《旧唐书·杨收传》。

⑤ 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三引《郡阁雅谈》。

⑥ 见廖彩樑《乾陵稽古》录《薛公墓志铭》,黄山书社,1986年版。

不伧思,对曰:“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野叉头。”这些诗人无不诗思敏捷,吟诗作对,均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此类本事常设定一个高难的情势,包括短暂的时间,限定的诗韵,特定的命意、用词,冷僻的上联,或难堪的局面。《国史补》卷上记载,驸马郭暧集文士即席赋诗,李端诗有“荀公”、“何郎”两句,众称妙绝。人疑其宿构,李端另赋一篇,复有“金埒”、“铜山”警句。又《唐摭言》卷一三记载,裴虔余从府主李蔚游江,舟事误以竹篙溅水湿近座之衣,李蔚面有怒色,虔余遽请彩笺纪一绝句云:“满额鹅黄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衣湿,知道巫山行雨归。”因难见巧,由险出奇,正是艺术的能事。

十一、苦吟

唐人崇尚才思敏捷,但并不因此轻视含毫苦吟者。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潘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夜赋《潇湘》”^①。苦吟之作与挥洒之作可以各领风骚。因此,唐人对迟与速并无轩轻抑扬,苦吟的故事也常为唐人所乐道。一般来说,此类故事在内容上有两种。一是描述苦吟的情状。贾岛沉迷吟诗而冲撞大尹的故事已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唐诗纪事》卷七一记载,唐末诗人周朴因得诗句而忽持樵夫,又因订正误字而追赶士人。这些故事中的情节未必都真实,但故事中诗人苦吟的沉迷状态和执着情形无疑具有典型性。另有一些本事记载诗人锤炼字句改动一字的故事,如郑谷改齐己诗句“昨夜数枝开”为“昨夜一枝开”^②,齐己自改诗句“别下着僧床”为“别扫着僧床”^③,又改张迥诗句“虬髯白也无”为“虬髯黑在无”^④等,诗句虽仅更易一二字,然诗意顿改,境界一新。以上诗句显示,一字改动实具有脱胎换骨重整文意的艺术功效,一些苦吟故事的产生即缘于唐人对这种艺术功效的崇尚与追求。

十二、称赏

品评和欣赏诗歌是唐诗本事的重要内容,品评欣赏往往伴随赞美和

① 《唐摭言》卷一〇。

② 《五代史补》卷三。

③ 《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郡阁雅谈》。

④ 《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郡阁雅谈》。

推崇,因此,唐诗本事中有大量称赏的故事。称赏的对象,依性质和范围大小又有所不同。《鉴诫录》卷八记载,韩愈与贾岛为布衣之交,赠贾岛诗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天恐文章声断绝,再生贾岛向人间。”贾岛因此知名于世。《南部新书》甲记载,杨敬之深爱项斯为文,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不久诗达长安,明年登上第。以上皆称颂文学成就。《北梦琐言》卷七记载,卢延让诗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两句,为张潜称赏,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句,为成中讷见赏,还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蜀主王建称许。卢延让自谓“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此标举诗歌风格。以上本事称赏诗人的文学成就和诗歌风格,并不局限于一篇一联,是对诗人创作整体的把握,但多数唐诗本事是有关名篇佳什的故事。唐人说诗,多以单篇为对象,所以此类本事最多,其中著名者,如贺知章称叹《蜀道难》,武后以《古剑》篇为奇作^①,德宗属意于《寒食》^②,顾况嗟赏咏草诗^③,等等,除欣赏名篇外,还有一些摘举名联佳句的本事,如张说以王湾诗“海日”两句题于堂壁,宋之问惊异于骆宾王诗句之遒丽,韩愈欣赏李贺诗《雁门太守行》首联^④,杜牧吟赏赵嘏《早秋》诗中警句^⑤。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后两类诗歌本事的大量存在,所以欣赏名篇佳句成为唐人诗评的重要方式。

十三、品评

一些本事记载唐人对诗歌的品评,内容包括对诗歌的鉴赏和评价。《鉴诫录》卷五记载,蜀太祖王建亲见卢延让诗“栗爆烧毡破,猫儿触鼎翻”两句情景,认为“先辈裁诗,信无虚境”。《唐摭言》卷一〇记载,吴融才力浩大,以八韵著称,曾以诗百篇示于李洞,李洞仅称许其中一联。这些是正面评价,另有一些本事记载时人对诗歌的讥评。《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引《零陵总记》记载,开元中有儒士登终南山,得诗句“野迴云根

① 见《唐摭言》卷四。

② 见《本事诗·情感第一》。

③ 见《幽闲鼓吹》。

④ 见《幽闲鼓吹》。

⑤ 见《唐摭言》卷七。

阔,山高树影长”,私心自负,忽闻空中语云:“未若天河虽有浪,月桂不闻香。”儒士喜而据为己有,为僧讥诮,谓“臭气可掬,何足多也”。褒贬抑扬,品评高下,正是此类本事的特征。此类本事故事形态各异,有以游戏、调侃态度说诗的故事,如罗隐以曹唐诗“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两句为“鬼诗”,曹唐称罗隐诗“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两句为“女子障诗”^①;时人称卢延让哭边将诗为“打脊诗”^②,沈彬谓孙鲂《夜坐》诗为“田舍翁火炉头之语”^③。这些本事多以形象说诗,风格幽默诙谐。此外,还有一些诗人较艺的故事。《唐诗纪事》卷三引《景龙文馆记》记载,沈佺期、宋之问应制诗工力悉敌,然沈诗落句词气已竭,而宋诗犹陟健举,诗评以宋诗为优。《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该闻录》记载,崔颢有题武昌黄鹤楼诗,李白“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还有徐凝、张祜至杭州就白居易较艺论文的故事。此类本事中还有诸人赋诗作会,其中一人诗作杰出,余者因此搁笔一类故事,如孟浩然作“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诗事^④,刘禹锡作《西塞山怀古》诗事^⑤。这些本事虽多称赏之词,但故事类型与品评更为接近。

十四、诗谶

诗谶是以诗为未来预言、后事征兆的一类故事。唐诗本事中的诗谶,内容不一,形态各异。就内容性质而言,诗谶有凶吉之分。含有凶兆的谶诗预示败落和死亡,如《本事诗·征咎第六》中的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谶、崔曙《明堂火珠》诗谶及卢献卿梦中诗谶,《云溪友议》卷上“宗兄悼”、卷中“买山谶”、卷下章孝标《题杭州樟亭驿》诗谶,均属凶兆。此类诗谶数量极多,为诗谶的主体。含有吉兆的谶诗一般预示职官的迁升改易。《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载,马植夜闻白衣人吟诗,有“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等语,后果为宰相。《中朝故事》记载,段文昌自西川归

① 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九引卢瓌《抒情》。

② 见《北梦琐言》卷七。

③ 见《江南野史》卷七。

④ 见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见《鉴诫录》卷七“四公会”。

长安,经兴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树称:“君去日既逢梅脸绽,来时应见杏花开。”数年后拜益州节度使赴任途中再经僧院,庭中杏花方盛开。同类诗讖还有高骈《风筝》诗讖,陈抟赠张乖崖诗讖^①。

就诗讖的生成而言,诗讖又可分为先诗后事和诗、事共生。所谓“先诗后事”,意指讖诗本为诗人独立创作的诗歌,事后经人附会,成为诗讖。如前已提及的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讖。所谓“诗、事共生”,意指诗歌作为诗讖的一部分,与征兆故事同时产生,即诗歌不是独立的创作,而是纯粹的讖诗;或虽是独立创作,但征兆意识产生于事件发生以前,而非事后追加。前者如兴元老僧预见段文昌迁升一事,后者如“宗兄悼”中滕迈见滕倪留别诗而知永无再见的故事。

十五、比兴

作为唐诗写作的常用手法和唐人说诗的重要方式,比兴在本事中频繁出现,以至此类本事成为唐诗本事之一大类。因诗歌取譬对象不同,比兴类本事可分为咏物诗本事、咏事诗本事和咏史诗本事。咏物诗本事揭示或穿凿诗歌隐含的喻意,显示或赋予诗歌托物言志的功能。《本事诗》记张九龄因李林甫嫉恨而作《海燕》诗,认为诗人借海燕的归飞表明不与物竞的坦荡胸怀。又记张又新咏牡丹诗事,谓诗寓忏悔之意。同类本事还有孔绍安咏石榴诗事、李义府咏乌诗事、白居易杨柳诗事、韩愈咏桃诗事,等等。这些咏物诗大多托讽禽鸟,寄情草树,寓意委婉。咏事诗本事意不限于所咏之事,通常另有所指,本事即揭示隐藏于诗之表层的本意。如《唐摭言》卷三记载卢肇《竞渡》诗事,认为诗喻科场得意。《云溪友议》卷下“闰妇歌”记朱庆馀《闰意》诗事,认为诗喻诗人科考之前的紧张心理和求知于人的急迫心情,有自明进退之意。在咏史诗本事中,诗歌以咏史形式出现,但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借古寓今,以史论事。本事通常揭示作为咏史背景的现实事件,如王维《息夫人》诗借息夫人羁身楚王的故事抒写饼师之妇的哀怨心情,而《唐摭言》卷一〇记载的罗隐题新榜诗虽咏汉代李广蓝田夜猎故事,实则自叙从事科场的经历,表现人生失意的悲哀。不管是咏物咏事还是咏史诗本事,均以交代诗歌写作背景的方式说明诗

^① 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三引《古今诗话》。

歌的隐喻之义,从而揭示诗歌本旨。

十六、神授

文才神授故事起于汉代,盛于六朝,而蔓延于唐代。传说李峤为儿童时,梦有神人赠以双笔,由此渐有学业^①。张鹭少时,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降于庭前,后以文章名世^②。尹知章少小勤学,曾梦神人以大凿开其心,以药纳之,自此尽通经义^③。这些故事反映出文才神授观念在唐代的盛行。影响所及,唐诗本事中也出现了同类故事。《云溪友议》卷下“祝坟应”记载。有胡生家贫业贱,常以酒果祭于列子祠垆,以求聪慧,尝梦见一人,以刀画其腹开,置以书卷。此后善吟咏,诗多绮美之词。《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郡阁雅谈》记载:“张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梦五色云自天而下,取一团吞之,遂精雅道。”《旧唐书·钱徽传》记载钱起因夜吟而得鬼谣。这些神授故事有较为固定的形式:一是梦境神授,梦成为沟通人、神的中间环节,如前述胡生和张迥的故事,此一形式是文才神授故事的主要形式。另一形式是幻境呈现,如钱起所得鬼谣出自神秘的幻听。不管是梦境还是幻境,都是非逻辑的语境,对于相信鬼神的唐人来说,人与神的沟通通常借助这样的语境。

十七、题叶

叶上题诗大约是唐时风习,唐诗中有很多题叶、题花的记载^④。这些诗歌及记载多寓浪漫情调,本事中的题叶故事是这一风习浸润的结果。唐人题叶故事共有四则:一是顾况题叶故事,二是卢渥得红叶诗故事,三是李茵巧遇题叶宫人故事,四是侯继图得桐叶故事。四则故事在艺术上有共同之处,如以书叶题诗为事件关目,运用巧合的叙事手法,充满戏剧

① 见《旧唐书·李峤传》。

② 见《朝野僉载》卷三。

③ 见《旧唐书·尹知章传》。

④ 白居易有《和杜录事题红叶》(见《全唐诗》卷四五〇),韦应物、杜牧有《题桐叶》(见《全唐诗》卷一九三及卷五二一),孟郊《赠转运陆中丞》云:“衣花野茜茜,书叶山梧桐”(《全唐诗》卷三七七),邵谒《览孟东野集》云:“题花花已无,玩月月犹在”(《全唐诗》卷六〇五),齐己《寄南雅上人》云:“清吟何处题红叶,旧社空怀堕白莲”(《全唐诗》卷八四四),《寄怀东林寺匡白监寺》云:“闲搜好句题红叶,静敛霜眉对白莲”(《全唐诗》卷八四四),李商隐有《牡丹》诗谓:“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全唐诗》卷五三九)。

色彩,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则有明显不同。顾况题叶故事表现宫女的幽怨生活及对这种生活的同情,而其他三则故事则以爱情婚姻为主题。这三则故事中,卢渥、侯继图的故事均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作结,充满喜剧色彩;而李茵与云芳子的爱情故事则贯穿人世的离别与苦难,以人鬼异途终结,充满悲剧色彩。四则本事中,顾况、卢渥的故事较早,侯继图和李茵的故事则稍晚。前者记事简略,以实录为本;后者之中,李茵的故事运用虚构,情节曲折,形象丰满,接近传奇小说。可见,这四则本事表现出由纪事之文向传奇之文的转变,为宋代同类故事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十八、感妓

感妓故事是指本事中的诗人与官妓、家妓相遇相离、相恋相思的故事。此类故事在唐诗本事中数量较多,其成因及形式较为复杂,且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学蕴含,本篇将另辟专门章节讨论此类故事,兹不赘述。

第二节 本事类型的形成和影响

本事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对唐诗本事及相关文体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考察这些问题对正确把握本事类型的性质,理解本事文本以及认识唐诗本事和宋人诗话的编排特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本事类型的形成

唐诗本事类型的形成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文言小说的类型,二是唐人诗歌创作观念及习尚。一些本事所受影响分别来自这两个方面,而另一些本事则受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

本事中的很多故事类型源出唐前及唐时文言小说,特别是唐前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和唐时杂事小说,这些类型包括本事中的企羡、狂简、伤悼、称赏、品评、幼敏、诗累、高逸、谀佞九类。企羡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企羡”、“容止”两种类型。《世说新语》中的“企羡”一类故事,多表现对他人德望、才情和风貌的仰慕,本事中企羡他人才华风调及富贵荣华一类故事实本于此。《世说新语》中的“容止”类故事赞美士大夫的仪容仪表、举止风度,成为本事中企羡仪表品貌一类故事的来源。“企

羨”和“容止”这两种旧有的故事形态有时又杂糅在本事故事中,如《翰林盛事》谓“崔(湜)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云云,反映原有两种故事类型在本事故事中的融合。狂简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任诞”、“简傲”两种类型。“任诞”故事记载名士任性放纵、不拘礼法的行为,“简傲”故事则记载士人倨傲慢世的言行,本事中的狂简类故事与这两类故事性质相同。伤悼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伤逝”一类。伤逝意指悲悼亡人,《世说新语》中的此类故事多是名士痛悼亡人以至灭性的故事,充满感伤色彩,伤悼类本事在题材内容和感情色彩上均与此类故事十分相近。称赏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的“赏誉”一类。“赏誉”故事多称赏赞誉人物品性、才情,而称赏类本事称赏标举优秀诗人及名篇佳作,主题大致相同。品评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品藻”一类。“品藻”类故事内容多为品评人物的才貌、风格、气质、风度,品评类本事将人物品评变为诗歌品评。“品藻”故事不仅要对人物特质作出判断,还要鉴别优劣,品第甲乙,这种品评方式后来成为本事中诗人较艺故事的先导。幼敏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夙惠”一类。魏晋时人崇尚天赋,《世说新语》多记载儿童聪慧的故事。唐承魏晋之风,也崇拜天才,特别推崇诗思敏捷和诗歌早熟的少年,少年咏诗的故事也常为唐人所乐道。诗累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尤悔”一类。“尤悔”故事记载人物言行的过失,显示生活的坎坷、仕途的偃蹇,表现对人生失误的悔恨之情。“诗累”一类本事多记载诗人因诗得罪的故事,思想主题与“尤悔”一类故事相同。唐诗本事中也有“尤悔”一类故事。如《北梦琐言》卷二记载,令狐绹曾以故事访于温庭筠,温庭筠谓事出《南华》,且劝告令狐绹暇时览古。令狐绹十分恼怒,奏其有才无行,不宜与第。温庭筠后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此外还有进士孙定因戏谑孙储而终身不遇的故事^①及贯休因拒绝传授书法而得罪荆南节度使成汭的故事^②。此类本事虽然也是诗、事结合,但其中“尤悔”并不在于诗歌,而是其他言行;这些故事可视为由“尤悔”故事向“诗累”故事过渡的中间环

① 见《唐摭言》卷一〇。

② 见《北梦琐言》卷二〇。

节。高逸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栖逸”一类。“栖逸”故事记载魏晋时期士大夫和隐士的隐居生活,表现清高旷放的隐逸情怀。高逸类本事表现唐人的隐逸生活,或心向隐逸的情怀,与“栖逸”故事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以上八种本事类型主要来自《世说新语》。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化倾向对唐诗本事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更为直接。上文列举的佞媚类本事来自唐代杂事小说中的“谀佞”一类。《大唐新语》卷九列“谀佞”类,专收阿谀逢迎、谄佞害政一类故事,佞媚类本事与此类故事主题相同。

以上九种本事类型均可在《世说新语》和唐人杂事小说中找到依据,这些类型也基本上是由这些小说中的故事类型脱胎而来。

此外,神授类本事是唐前同类故事的延续。汉代以后出现了很多文才神授的故事。传说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①;罗含少时梦五色鸟入怀,因有文章^②;江淹梦一美大夫索走五色笔,因此才尽^③;谢灵运寤寐间忽见谢惠连,因得佳句。此类小说虽未能作为一类故事收入唐前小说集,但毫无疑问,这种故事类型是存在的,并对后来的神授类本事产生了直接影响。

本事中也有些类型主要是在唐人诗歌创作观念及习尚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类型包括苦吟、比兴、题叶、感妓、诗讖五类。苦吟作为一种诗歌创作倾向,是中唐开始出现的,杜甫、孟郊、李贺等人的创作即显露这一倾向,但作为一种创作风气的开创者则是中晚唐时期的贾岛、姚合。两人的创作在晚唐五代得到了有力的响应,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贾、姚诗风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苦吟一时成为主导诗坛的创作风气。唐诗本事中的苦吟故事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毫无疑问,此类故事正是这一时期创作观念和创作习尚的反映。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起于《诗经》创作的时代,经汉儒鼓吹,后来成为诗歌创作中最主要的表现手法。唐人在诗歌创作上虽然接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对儒家诗学也有所扬弃,但仍奉比兴为

① 见《西京杂记》卷二。

② 见《太平御览》卷三九八

③ 见钟嵘《诗品》卷中。

诗歌创作的大法。孔颖达的《诗经正义》对比兴之义有专门探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论标举风雅比兴,强调比兴的感兴功能,唐代出现的各种诗格著作也多涉及比兴问题,唐人的诗歌创作也多用比兴之体。比兴类本事的产生以此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为背景,并与之互为表里。诗讖的前身是谣讖,谣讖是预示未来凶吉的童谣、民谣,其产生年代较早,汉人称为“诗妖”^①。诗讖的出现大约始于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仇隙》记载了潘岳《金谷集诗》成为诗讖的故事,《南史·侯景传》也记载了梁简文帝《寒夕诗》、《咏月诗》演为诗讖的故事。但是,诗讖的大量产生是在唐代。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唐人延续了汉代以来的讖纬思想,二是秉承了汉代以来的神理为文的文学观念。其中,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直接。

题叶故事起于唐人题叶寄情的浪漫风习,前已述及。感妓故事则源于唐人的才子佳人情结,此一问题下文将作专门探讨,兹不赘述。

本事中的另外一些类型是受文言小说类型和唐人创作观念及习尚的共同影响的,这就是嘲戏、敏捷、怨愤三类。唐代以前有很多谐谑故事,编成专书的就有三国时期邯郸淳的《笑林》,西晋陆云的《笑林》,隋时侯白的《启颜录》,等等。《世说新语》中有“排调”一类,专记戏谑、调笑故事。《世说新语》中的故事通常显示人的才华、学识,幽默诙谐,给人轻松之感。此类故事在唐代继续产生,这时出现了刘纳言的《俳谐集》^②、何自然的《笑林》^③、皮光业的《启颜录》^④等专书,有的小说,如《大唐新语》,还专列“谐谑”一类。这些小说作为一种故事类型无疑对唐诗本事产生了影响。本事中的嘲戏故事即源于此。但是,嘲戏一类本事在思想倾向上与谐谑故事又有所不同。一些本事或针砭社会的丑恶,或谴责官僚的无能,或揭露政治的黑暗,如光业嘲道门、杨德辉嘲僧门^⑤,景龙时人讥宰相^⑥,

① 旧题汉伏胜著《尚书大传》提到诗妖,《洪范五行志》言及诗妖概念,《汉书·五行志》对诗妖的出现作出了理论的说明。

②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五卷。

③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三卷。

④ 《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六卷。

⑤ 见《鉴诫录》卷六。

⑥ 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七引《朝野僉载》。

晚唐时人讥曹确等四相^①,这些本事寓庄于谐,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诗歌的创作倾向有关。孔子论《诗》,认为《诗》“可以怨”。所谓“怨”,据伪孔传解释,是“怨刺上政”。唐人秉承这一儒家诗学传统,注重诗歌对社会及政治的批判意义,创作了大量伤时怨世的诗篇,上述嘲戏类本事的产生也是这一诗学精神的产物。

敏捷一类本事与《世说新语》中的“捷悟”故事相近,都是表现思维敏捷,领悟迅速,《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可以视为此类本事的类型来源。但是,此类本事的产生还与唐人对文才敏捷的崇尚有关。李白天才发越,才思敏捷,杜甫诗称“李白一斗诗百篇”,又说“敏捷诗千首”,推崇备至。此外,唐代还有很多文才敏捷的故事:

(杨)师道善草隶、工诗。……帝(太宗)见其诗,为撻讽嗟赏。后赐宴,帝曰:“闻公每酣赏,捉笔赋诗,如宿构者,试为朕为之。”师道再拜,少选辄成,无所窜定,一坐嗟伏。(《新唐书·杨师道传》)

王勃每为碑颂,先墨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

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唐摭言》卷一三)

此类故事的大量出现其实反映了唐人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也是此类本事产生的原因。

本事中有“怨愤”一类,多为诗人以诗抒发怨愤的故事。这些本事与《世说新语》中的“忿狷”故事主题相近,本事类型也由此延伸而来。但是,怨愤类本事与忿狷故事主题又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忿狷”故事将人物的愤怒归结为性情褊躁粗强,而在怨愤类本事中,人物的怨愤虽与个人性情有关,但主要还是对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平的反应,前者只见个人性情,后者多具社会意义。以《本事诗·怨愤第四》为例,只有吴武陵题诗路左佛堂一事强调人物性情的“强悍激讦”,与忿狷故事相同,其他故事

^① 见《南部新书》甲。

则有关社会政治。《本事诗·怨愤第四》虽收录数量有限,但基本体现了此类本事的面貌。本事与《世说新语》故事的不同其实是唐人的诗歌创作观念引起的,因为抒写对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平的怨愤正是“诗可以怨”这一诗学精神的真正体现。

二、本事类型的影响

本事类型的影响首先表现于本事的文本结构和编辑分类。很多本事并非一事一篇,而是数事依类连缀成篇,事与事联系较为紧密,成为难以分割的有机整体。《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条记有与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有关的崔郊感妓故事和戎昱感妓故事,两个故事本各自独立,但该条一体编写,并穿插云溪子所谓“临财莫贪,于色不吝”等议论,成为联系紧密的整体。同书卷中“澧阳宴”条记有李宣古赠崔云娘诗事、杜牧赠肥录事诗事及陆岩梦赠胡子女诗事,以类相从,先记诸事,后引众诗,前后一贯,俨然整体。《云溪友议》中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巢燕词”、“题红怨”等条目。其他笔记也有同类情况。本事类型除影响本事的文本结构之外,还影响本事的编辑分类。《本事诗》将本事分为7类,其中“高逸”、“怨愤”、“征咎”和“嘲戏”4类属于前文指出的本事类型。《唐摭言》卷一三“敏捷”类收事15条,其中有9条本事,也是同类集中编排。《大唐新语》卷一三“谐谑”类也多收嘲戏一类诗歌本事。可见同类编排情况并不少见。

本事类型的影响不限于唐诗本事,还由此延伸到宋代诗话,宋代诗话总集的编辑分类也同样受本事类型的影响。

北宋时期出现过三部重要的诗话总集,这就是《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和《诗总》。这三部诗话总集,《古今诗话》原书已佚,今仅有曾慥《类说》所存节编本及郭绍虞辑佚本^①,远非原貌,因此,原本究用何种编辑体例,今已无从考知。《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前代目录有著录,《宋史·艺文志》文史类作《唐宋名贤诗话》二十卷,《遂初堂书目》文史类作《唐宋诗话》。又其他著作引作《名贤诗话》、《分门诗话》,乃同书异名。该书为第一部诗话总集,国内久佚,但流传海外,韩国今存十卷,张

^① 见《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

伯伟有整理本,收入《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该书分类编排,虽仅存残本,但正文之前有目录,备列分类条目,尚可全面考察诗话的分类情况。《诗总》今存,今《诗话总龟·前集》大致保存该书原貌,也是分类编排。

北宋诗话继承唐诗本事的传统,多以记事为主,收入这两部诗话总集的诗话多为记事一体。由于这两部诗话总集主要收录唐诗本事和承其体制的北宋诗话,所以它们在编辑分类上必然与唐诗本事的类型发生联系,甚至以本事类型作为分类标准。

《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将诗话分为34门,其中,与唐诗本事类型相同或直接相关的有12门,这些门类包括:品藻、讥讽、嘲谑、不遇、激赏、聪悟、轻狂、隐逸、幽怨、伤悼、讖兆、诗卜。“品藻”门诗话一般品评诗歌,且多较量高下,或褒贬抑扬,与“品评”类本事相近^①。“讥讽”门诗话涉及怨愤讥讽,其中收入《本事诗·怨愤第四》中吴武陵题路左佛堂诗事及张九龄《海燕》诗事,与“怨愤”类本事相近。“嘲谑”门诗话记戏谑调笑等诗事,源出“嘲戏”类本事。“不遇”门诗话仅存一条,且多残缺,但所记李白进《清平调》词一事见于《松窗杂录》,故可得见全貌。此一故事谓李白进《清平调》词以后,高力士终以脱靴为耻,于是向杨贵妃进谗,认为李白词以赵飞燕比贵妃,含轻贱之意。后玄宗欲命李白官职,因贵妃阻挠而罢。此一故事在唐诗本事中属于“诗累”一类。“激赏”门诗话多欣赏标举名篇佳句,与“称赏”类本事相同。“聪悟”门诗话仅存三条,均记少年才思敏捷者,与“幼敏”类本事相同。“轻狂”门诗话多记狂放傲纵之事,与“狂简”类本事相近。“隐逸”门诗话记隐逸之事,与“高逸”类本事相同。“幽怨”门以下佚其正文,仅存名目,但从名目尚可推知其诗话类型。“幽怨”门当与“怨愤”类本事相近,“伤悼”门诗话与“伤悼”类本事相同,“讖兆”、“诗卜”门诗话当出于“诗讖”类本事。

《诗总》对本事类型的沿用更为广泛。在整个46门中,有16门与本事类型对应或直接相关,这些门类包括:幼敏、狂放、称赏、评论、苦吟、寓

^① 按:《诗话总龟·前集》的编排分类多沿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的分类方法,《总龟·前集》四三至卷四五分别录“送别”、“怨嗟”、“伤悼”三类诗话,与《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卷一二、一三所录“离别”、“幽怨”、“伤悼”类目相应,顺序相同,因此,“幽怨”门诗话当与“怨嗟”门诗话相近。“怨嗟”门诗话多记哀怨故事或诗歌,与“怨愤”类本事相近,“幽怨”门诗话当亦复如是。

情、诗累、诗讖、讥诮、诙谐、怨嗟、伤悼、隐逸、佞媚、雅什、警句。“幼敏”门与本事“幼敏”类对应,“狂放”门与本事“狂简”类对应,“称赏”门与本事“称赏”类对应,“评论”门与本事“品评”类相近,“苦吟”门与本事“苦吟”类对应。“寓情”门多收录“感妓”类本事,与“感妓”类相近。“诗累”门与本事“诗累”类对应,“诗讖”门与本事“诗讖”类对应。“讥诮”门收录嘲戏、怨愤两类诗事,其中包括隐含讥讽的诗事。“诙谐”门与本事“嘲戏”相近,“怨嗟”门与本事“怨愤”类相近,“伤悼”门与本事“伤悼”类对应,“隐逸”门与本事“高逸”类对应,“佞媚”门与本事“佞媚”类对应。此外,“雅什”、“警句”两门多标举名篇佳句,乃自本事“称赏”类分化扩展而来。

兹将本事类型与诗话门类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本事类型	《唐宋分门名贤诗话》门类	《诗总》门类
嘲戏	嘲谑(卷三)	讥诮(卷三七—三九)诙谐(卷四〇—四一)
称赏	激赏(卷六)	称赏(卷四)雅什(卷一〇—一一)警句(卷一二—一四)
品评	品藻(卷一)	评论(卷六一—九)
怨愤	讥讽(卷二)幽怨(卷一二)	讥诮(卷三七—三九)怨嗟(卷四四)
幼敏	聪悟(卷六)	幼敏(卷二)
狂简	轻狂(卷七)	狂放(卷三)
佞媚		佞媚(卷五〇)
伤悼	伤悼(卷一三)	伤悼(卷四五)
高逸	隐逸(卷九)	隐逸(卷四六)
苦吟		苦吟(卷一一)
感妓		寓情(卷二三)
诗讖	讖兆(卷一四)诗卜(卷一五)	诗讖(卷三三—三四)
诗累	不遇(卷五)	诗累(卷三一)

以上我们将《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和《诗总》的编辑分类与唐诗本事的类型作了分别对照,这些对照表明,诗话分类确实受本事类型的影响。虽然从本事类型到诗话门类,其间有分合、交叉,但对应关系还是十分明确的。

第三章 本事中的感妓故事

唐代盛行狭游之风,当时的士人,特别是贵族子弟、新科举子,多与妓女往还。长安城内有平康里,北门东回三曲是妓女聚居之地,也是风流薮泽,士人与妓女之间的风流故事大多发生在这里。孙棨的《北里志》是专记此类故事的。本章虽以文士与妓女之间的故事为研究对象,但并不涉及此类狭游故事。本文所谓感妓故事是本事中诗人与官妓、家妓相遇相离、相恋相思的故事。此类故事成因复杂,作为唐诗本事之一大类,它们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士人特有的文化心理,揭示这一现象对我们更好理解有关诗歌和小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此类本事作一专门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 感妓故事的形态

感妓故事内容不尽相同,形态也各异。一般来说,有下面几种形式:

一、失妓故事

失妓故事是一些爱妓为上司或权门势要依势巧夺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典型是《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记载的一则本事:

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时太尉李逢吉留守,闻之,请一见,特说延之。不敢辞,盛妆而往。李见之,命与众姬相面。李妓且四十余人,皆处其下。既入,不复出。顷之,李以疾辞,遂罢坐,信宿绝不复知。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诗曰:“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

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只应偏照两人心。”

《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本事诗》亦记此事，但文字较详，情节颇有出入，引诗增至四首，且以分司御史为刘禹锡。从刘禹锡、李逢吉的生平经历看，两人并无同在东都为官的可能，可见这一记载并不准确。此一本事叙写失妓的愤懑和无奈，全诗充满分离的忧伤和痛苦。同类本事还有武周时乔知之赋《绿珠篇》的故事：

补阙乔知之有宠婢，为武承嗣所夺。知之为《绿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宠者结于衣带上，投井而死。承嗣惊惋，不知其故。既见诗，大恨。知之竟坐此见构陷亡。（《隋唐嘉话》卷下）

此之宠婢，据《朝野僉载》卷二，名为碧玉，而据《本事诗·情感第一》，则名为窈娘。故事虽称女主人公为婢，但《朝野僉载》称其“姝艳能歌舞，有文华”，《本事诗》亦谓“艺色为当时第一”，可见，此之“宠婢”实即家妓。此一本事与前一本事均为失妓故事，女主人作为家妓的身份相同，故事类型也相同。

二、得妓故事

此类故事情节大致相同，通常是本事中的文士于权门势要宅第席上，或方伯连帅官署席上，爱慕一妓，并以诗披露款曲衷情。主人慷慨，成其美意，文士因此得一夕之欢，或者竟然获赠妓人。此类故事除刘禹锡因诗得妓故事外，还有如下两则：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与张宴饮，必极欢尽醉。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悵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

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夕就张郎中。（《本事诗·情感第一》）

（袁）皓初登第，过岳阳，悦妓蕊珠，以诗寄严使君曰：“得意东归过岳阳，桂枝香惹蕊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峡，争奈朝云属楚王。万恨只凭期克手，寸心唯系别离肠。南亭宴罢笙歌散，回首烟波路渺茫。”严君以妓赠之。（《唐诗纪事》卷六七“袁皓”）

唐时王公大臣或豪富多蓄养家妓，家妓以色艺事人，其地位类似婢妾，属个人私有，因此家妓常互相赠送，上引第一则本事就是官僚势要以妓赠人的故事。除家妓外，唐时各级官府都有在籍的歌妓舞女乐师，这就是官妓。官妓的职责就是在官府举行各种仪式、宴会，或有其他应酬时，奉调遣出来应差。有时表演歌舞，有时入席陪酒。官妓一般称为“酒妓”、“饮妓”、“营妓”，又称“酒纠”、“录事”等。就制度而言，官妓隶属乐籍，不能随意流动，不属长官个人所有。但实际上，长官不仅可以随意支配官妓，而且可以据为己有，甚至用以赠人。由于职责的关系，官妓经常出现在官僚交往的场合，与文人士子多有接触，这就为男女恋情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唐时文士与妓女之间相恋相慕的故事因此不断产生，甚至广为流传。上引两则本事属于此种情况。同类故事还有郑还古得妓故事^①，洛中举人得妓故事^②，郑史得妓故事^③，等等。

三、妓人失而复得故事

在感妓故事中，失妓的诗人总是以诗抒写失妓的忧伤或痛苦。倚势夺妓者见诗，或不为所动，则妓人一去不返，但如果激于大义，或为情所感，则往往以妓奉还，此即妓人失而复得的故事。此类故事，除前文提及的戎昱感妓故事及崔郊得婢故事之外，还有下列诗歌本事：

（赵）嘏尝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计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会中元为鹤林之游，浙帅窥之，遂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

① 见《太平广记》卷一六八引《卢氏杂说》。

② 见《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卢氏杂说》。

③ 见《唐诗纪事》卷五六“郑史”，《四部丛刊·初编》本。

第,因以一绝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浙帅不自安,遣一介归之于暇。暇时方出关,途次横水驿,见兜舁人马甚盛,偶讯其左右,对曰:“浙西尚书差送新及第赵先辈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认暇,暇下马揭帘视之,姬抱暇恸哭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唐摭言》卷一五)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贫,求尺题于交广间,游索去万,计支持五年粮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归,任尔改适。”士子去后,五年未归,姬遂为前刺史所纳,在高丽坡底。及明年,其夫归,已失姬之所在。寻访知处,遂为诗,求媒标寄之。诗云:“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诗,遂给一百千及资装,便遣还士子。(《太平广记》卷一六八引《卢氏杂说》)

上引本事多为哀艳动人的爱情故事。本事中的诗一般抒写失偶和离别的忧伤,故事因此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气氛,但结尾多以大团圆收煞,因而又具有喜剧色彩。只有赵暇感妓故事以人物死别作结,悲剧的气氛贯穿了故事的始终。此类本事还包括韩翃、柳氏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此一故事在情节上比上述感妓故事更为复杂,因为其中不仅有妓人失而复得,此前还有得妓故事,不妨说此一故事是感妓故事各种形态的集大成作品。

四、泛咏妓人故事

还有一类感妓故事,并无得妓、失妓情节,通常是方伯连帅或豪门贵族在官署或私第宴饮宾客,席间或美女奉酒,或歌舞娱兴,文士因赋诗咏妓,宾主尽欢。此类咏妓本事可举出如下数条:

奇章公纳妓曰真珠,有殊色。卢肇至,奇重其文,延于中寝,会真珠沐发,方以手捧其髻,插钗于两鬓间。丞相曰:“何妨一咏。”肇曰:“知道相公怜玉腕,故将纤手整金钗。”(《吟窗杂录》卷四一“真珠”)

杜公(杜惊)镇荆渚日,夜宴,出歌姬送酒,李群玉校书于烛下飞笔献杜诗曰:“裙拖六幅潇湘水,鬓耸巫山一尺云。态貌只应天上有,

歌声岂合世间闻。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怜赋客,肯教容易见文君。”(《鉴诫录》卷八“屈名儒”)

郑详纵情诗酒,至庐江谒郡守,留连吟醉,因赠妓曰:“台盘阔狭才三尺,似隔中当有阻艰。若不骑龙与骑凤,乐营门是望夫山。”(《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南部新书》)

据《唐诗纪事》卷五五,卢肇诗原文为:“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又据《全唐诗》卷三一一所录范元凯《章仇公席上真珠姬》诗,后两句为“应知子建怜罗袜,顾步裴回拾翠钗”。该诗为卢肇所作。诗题中“章仇公”应作“奇章公”,乃丞相牛僧孺。此一本事为席上咏妓故事^①。第二则本事中,李群玉诗题作《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②,又作《同郑相并歌妓小饮因以赠献》^③,可见非杜棕席上作。此一本事在《鉴诫录》中紧承李宣古于杜棕席上赋诗一事,或因此连类而误。上引三则本事,诗以咏妓为题材,或描写妓人貌态,或表现男女风情;诗歌情调,或隐含赞美,或杂以戏谑。唐人咏妓诗的内容和情调大抵如此。咏妓故事中,还有《本事诗》记载的杜牧席上狂吟的故事,故事叙写诗人对妓人倾慕之情,只是其中诗歌并不着力描写妓人的神情,而是自咏为妓注目的潇洒情态。咏妓故事,不仅表现对妓人的爱慕,也表现对妓人的吸引,二者因果相连,见出此类故事中文人特有的完整的心理结构。

第二节 感妓故事的原型及形式转换

感妓故事虽形态不一,但共性也十分明显。首先,这些故事大抵涉及三方面人物:一是作为故事中心的妓人,二是作为诗歌作者的文士,三是作为妓人予夺者,在故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连帅方伯,或豪门势要,三者

① 详见《考证篇》“32 卢肇”条。

② 见《全唐诗》卷五六九。

③ 见《才调集》卷九。

构成三角归属关系。其次,很多本事诗用巫山神女的故事,或与此类似的曹植遇洛神的故事。这些本事包括张又新感妓故事,戎昱感妓故事,刘禹锡失妓故事^①,袁皓得妓故事,江陵寓居士子感妓故事,郑史得妓故事^②,赵嘏感妓故事和卢肇咏真珠事。

中国古代诗歌用典极为普遍,一些典故因不断运用而成为耳熟能详的文学原型。事实上,感妓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巫山神女故事及曹植遇洛神的故事正是感妓故事的远源和先导,其中的人物关系也导源于此。

巫山神女故事出自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高唐赋》讲述楚怀王梦遇巫山神女的故事,《神女赋》是《高唐赋》的续篇,讲述再遇神女的故事。这两篇赋收入萧统编《文选》,成为历代文人阅读的名篇。但是,后人在解读《神女赋》时曾出现重大分歧——究竟是襄王梦遇神女,还是宋玉梦遇神女呢?这一分歧后来演变为一段著名的文字公案。

《文选》注本及版本不同,《神女赋》文字也有所不同。《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一九《神女赋序》云:“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据此,遇神女者乃楚襄王。宋代以后,一些学者发现这一叙说存在问题,首先提出质疑的是沈括,《梦溪补笔谈》卷上对上引赋序文字进行了深入考订,认为:

“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互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

后来,姚宽在《西溪丛语》卷上也辨“玉”、“王”二字差误,并引简文帝的《行雨》诗,进一步证明遇神女者并非襄王。沈括等人的考订后来被认为是此一公案的权威性意见。这一论断是合乎情理的,“玉”、“王”之误始于“其夜,王寝”一句,所谓“王寝”云云,当自《高唐赋》中“王将欲往见之”、“往自会”等语附会而来。此一错误一经发生,正如多米诺骨牌倒下

① 按:《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本事诗》,刘禹锡诗四首,其中有“云藏巫峡音容断”一句。

② 按:故事谓妓名“行云”,取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之意。

第一块,后文中“玉”、“王”因此依次错位,至“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数句,“王”字因句中有“寡人”一词,不可再误,这种“玉”、“王”互易的连锁反应才嘎然而止。

由此可见,与《高唐赋》叙说楚怀王梦遇神女故事不同,《神女赋》是叙说宋玉梦遇神女故事的。这样,《高唐赋》与《神女赋》构成了一组颇为奇特的人物关系:神女先是与怀王相会,并委身怀王,后是与宋玉相会,虽欢情未接,然精神交感。以神女为中心,形成怀王、宋玉与神女的三角归属关系。

这种隐含在《高唐赋》和《神女赋》中的人物关系首先对曹植《洛神赋》的解读产生了重大影响。《文选》卷一九《洛神赋》李善注引《记》云: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被辘轳,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这段文字后名为《感甄记》。关于此一本事的真实性,后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大公案,至今仍聚讼不已。但信其有者,仅以情理推测,并无实证;定其无者,则有实际考察。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五说:“按《魏志》,(甄)后三岁失父,后袁绍纳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下。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又说:“示枕赉枕,里老之所不为,况帝(丕)又方猜忌诸弟,留宴从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赋,其为不恭,夫岂特酗酒悖慢、劫胁使者之可比耶?”近人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卷一九按语中申说何焯的观点,并指出:“邺下初平,甄姬掩面事在建安九年,子建年才十三,若求婚未遂,当在未嫁袁熙之前,此岂数岁小儿所能为之事?不辨而知其诬。”

这些辩驳是有力的,可见,所谓感甄为赋一事实为虚构的故事。

此一故事的产生显然受《高唐赋》和《神女赋》中怀王、宋玉梦遇神女故事的影响。《洛神赋序》在交代写作缘起时说:“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全篇叙写作者归藩经洛川时与洛神相遇的情形,其情节构思和人物描写与《神女赋》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洛神赋》自《神女赋》脱胎而来。这种相似性是极易引起读者的类比性联想的。《洛神赋》中曹植路遇洛神的故事正如《神女赋》中宋玉梦遇神女的故事,由人物在各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曹植同于宋玉,洛神同于神女。由上述故事情节及人物身份的类同又势必产生关于洛神身份的联想。在《高唐赋》中,神女曾委身怀王,成为王者的偶类,在《感甄记》中,洛神一变而为甄后,这一演变正是此一联想的结果。《感甄记》的出现正是上述类比性联想的结果,这一推论可以从《感甄记》的有关叙说中得到证实。该《记》叙甄后来见曹植时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此之“与枕”实是《高唐赋》中神女“自荐枕席”的同义语,所谓“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正是神女先向怀王自荐枕席、后与宋玉相会故事的翻版。由此可见,《感甄记》以《高唐赋》、《神女赋》为想象平台和构思背景,并套用神女与怀王、宋玉之间的三角归属关系,从而虚构所谓甄后与曹丕、曹植之间的婚姻情感纠葛。故事中的其他情节,如曹植汉末求甄逸女等,均由此附会衍生而来。可以这样说,《感甄记》中甄后与曹丕、曹植的故事是《高唐赋》、《神女赋》中神女与怀王、宋玉故事的曹魏版。

《高唐赋》、《神女赋》中的巫山神女故事及由此产生并作为《洛神赋》本事的《感甄记》对唐代感妓故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首先,《感甄记》确定了失妓故事的模式,并对感妓故事产生影响。前已述及,《感甄记》在虚构曹植、甄后洛川相会的故事时,附会衍生出曹植求甄逸女不遂,甄氏为曹丕所得而“植殊不平”等情节,这些情节奠定了失妓故事的模式。《感甄记》起于何时,历来认识不一,此《记》最早见于南宋尤袤于淳熙八年(1181)刊刻的《文选》李善注。胡克家《文选考异》谓“此因世传小说有《感甄记》,或以载入简中,而尤延之误取之耳”,认为“实非善注”。胡克家是相信尤刻《文选》从六臣注析出这一传统说

法的,他说《感甄记》先是载入六臣注中,后尤袤误取为李善注,认为《感甄记》作为李善注自尤刻始。胡氏的观点其实是不确切的。首先,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引有《感甄记》,并明谓出自李善注。《西溪丛语》完成于1153年^①,早于尤刻《文选》,这说明《感甄记》作为李善注并非始于尤刻。其次,《洛神赋》“怨盛年之不当”句有李善注:“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得当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此一注语见于现存《文选》各本,其中包括早于尤刻本的北宋天圣七年刻李善注《文选》残卷、南宋初年明州刻六臣注。《西溪丛语》卷上亦引述此一注语,并标明出自李善注。这种情况不仅说明此一注语在尤刻本之前即已存在,而且说明注语不太可能出自他人编造假托。因为李善注本流传很广,编造假托难掩天下耳目,难为众人认可,也难以流传,谅不至于各本皆然。可见《感甄记》是李善注中本来就有的。李善注的完成在高宗显庆三年,则初唐以前即有感甄之说,对于中唐以后逐渐出现的感妓故事来说,《感甄记》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这种影响可以从元稹的诗歌中窥见一二。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有“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两句,用感甄故事。该诗借曲江老人的回忆,叙说玄宗一朝的兴衰际遇。前引第一句言玄宗宠遇杨贵妃事,第二句则隐指玄宗夺寿王妃事。杨玉环本为玄宗子寿王之妃,开元二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天宝四年册为贵妃^②。所谓“思王赋《感甄》”是表现寿王失妃的抑郁和苦闷。在这里,感甄故事化用为失妃故事,进一步向失妓故事演变。元稹的诗反映了中唐前后人们对感甄故事的理解和接受,无疑,这种理解和接受是感妓故事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

巫山神女故事对感妓故事的影响更为明显。感妓诗多用神女故事,感妓故事中,妓人与诗人、方伯连帅豪门势要的三角归属关系主要源于巫山神女故事。《神女赋》文本后来虽然“玉”、“王”错位,使宋玉梦遇神女故事一变而为襄王梦遇神女的故事,但原有的故事并未因此完全淹没。

① 《西溪丛语自叙》云:“绍兴昭阳作噩仲春望日,剡川姚宽令威识。”“昭阳作噩”即癸酉,绍兴癸酉即1153年。

② 详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例如,作为唐人重要阅读典籍的《玉台新咏》收有简文帝的《行雨》诗,该诗用宋玉梦遇神女之说。即使是李善注《文选》,也并未完全扫除原有故事的痕迹。如六臣注本中“王曰:‘茂矣美矣……’”李善注本作“玉曰:‘茂矣美矣……’”^①此后的大段对话讲述梦遇神女的情形,似乎遇神女的又不是襄王,而是宋玉。李善注本中梦遇神女的情节其实已经纠结缠绕,混沌不清。因此,中唐以后,一些感妓诗仍然明显保留宋玉梦遇神女的说法,如下列诗句:

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全唐诗》卷四七九张又新《赠广陵妓》)

宝钗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全唐诗》卷二七〇戎昱《送零陵妓》)

曾留宋玉旧衣裳,惹得巫山梦里香。云雨无情难管领,任他别嫁楚襄王。(《全唐诗》卷五七〇李群玉《赠人》)

碧桐阴尽隔帘栊,扇拂金鹅玉簟烘。扑粉更添香体滑,解衣唯见下裳红。烦襟乍触冰壶冷,倦枕徐欹宝髻松。何必苦劳云雨梦,王昌只在此墙东。(《全唐诗》卷六八三韩偓《昼寝》)

第一首诗出自《本事诗·情感第一》,本事谓“张(又新)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则所谓“云雨”、“求梦”者指酒妓与张又新之间的云情雨意。第二首诗出自《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据本事,诗中“襄王”指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使君”乃诗作者戎昱。第三首诗直接借用宋玉、神女梦里相会之事。第四首诗中所谓“王昌只在此墙东”实用宋玉之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云:“臣里之美者若臣之东家之子。……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可见“王昌”实指宋玉。上引诗歌的用事均以宋玉梦遇神女故事为背景,这说明这一故事直到晚唐仍为人们所熟知。

这一点十分重要,了解这一故事,则巫山神女故事成为楚王、宋玉与

^① 按:此用尤刻本文字。

神女之间的故事,而不是后来所说的仅为楚王与神女之间的故事,这一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正是感妓故事产生的基础。当然,巫山神女故事对感妓故事的影响后来主要表现为《神女赋》的影响,《高唐赋》则被人遗忘。这是因为在《神女赋》中原来并不存在的襄王梦遇神女故事已经取代了《高唐赋》中怀王梦幸神女的故事,用《神女赋》中的故事已经喻意自足,不必涉及《高唐赋》。

第三节 感妓故事的文学蕴含

感妓故事以性爱为主题,自然要体现唐人的性爱观念。一般来说,此类故事多记才子佳人的相恋相思,具有浓厚的才子佳人意识。

首先,故事中的女主人多是色艺双全的妓人,这一点在故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请看下面一些人物交代和人物描写: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本事诗·情感第一》)

酒酣,(李将)谓韩(翊)曰:“秀才当今名士,柳氏当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本事诗·情感第一》)

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本事诗·情感第一》)

(赵)嘏尝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唐摭言》卷一五)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太平广记》卷一六八引《卢氏杂说》)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本事诗·情感第一》)

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

相对于故事的描述来说,以上人物交代显得简单粗略,容易被读者忽略。但是,此类文字的反复出现显示这些描写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并非无关紧

要的闲笔。事实上,色和艺是作者赋予故事人物的重要特征,在感妓故事中,女性多以色、艺事人,所谓“艺”一般指歌舞、劝酒等娱人之技,非指文才。男性对女性的恋慕也大抵以此为前提和依归。这一点与后世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不同。后世的所谓“佳人”,其实兼具美女和才女的资质品格,“佳人”不仅有超人的美貌,而且具有杰出的文才,这后一点是感妓故事中的妓人所不具备的。唐代自然有才女,也有才女的故事,如薛媛写真为诗寄夫、慎氏为诗以诀灌夫、杨容华作《新妆诗》^①、如意中女子作送兄诗^②,还有武昌妓妙续诗句的故事^③,等等。但是,如果依照传统的故事分类观念,这些故事大抵归入“贤媛”一类,并不属于感妓故事。后世小说中的“佳人”其实兼具了感妓故事和“贤媛”故事中女性的资质品格,只是身份不同,地位各异。

其次,故事中的男主人多是能文的才士。感妓故事的中心情节多是文士赋诗言情,这些诗歌,或抒写对妓人的爱慕,或表达失妓的忧伤,大多情辞俱美,感动人心。在感妓故事中,男主人公总是以风流才士的面貌出现,一些本事还特意强调这种才士的身份,如刘禹锡得妓故事谓李司空“慕刘名”,崔郊感妓故事谓崔郊“蕴积文艺”,郑还古得妓故事谓柳当将军“怜郑文学”。除此之外,还有前文引述的李将称韩翃为“当今名士”,所谓“名士”,指文名著称于世者。许尧佐《柳氏传》谓“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又谓“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可相印证。

感妓故事将男主人公作为能文的才士,一般来说,这是符合史实的。在上述诸人中,刘禹锡、张又新、戎昱、韩翃、赵嘏都是名显一时的诗人。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诗酒唱和,白许以“诗豪”^④。张又新幼工文,科场得意,“进士状头,弘词敕头,京兆解头”,时称“张三头”^⑤,可见其文名。戎昱有诗名,据《云溪友议》卷下“和戎讽”,其诗为朝廷所知,《咏史》诗甚至得到宪宗欣赏。此一记载虽未必真实,但其诗名广播当是事实。韩翃自

① 见《朝野僉载》卷三。

② 见《类说》卷二七引《唐宋遗史》。

③ 见《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抒情诗》。

④ 见《旧唐书·刘禹锡传》。

⑤ 见《唐摭言》卷二。

不必说,据感妓故事文末记载,其《寒食诗》为德宗所欣赏,后来竟因此获得迁升。赵嘏也诗名甚著,据《北梦琐言》卷七记载,重文的宣宗曾经索其诗卷。《早秋》诗有“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尤为杜牧激赏,杜并赠以“赵倚楼”的雅号。总之,以上诗人无不才华横溢,名声远播,在时人心目中,他们都是独秉风骚的文人才士。

才子佳人,彼此仰慕,互为匹配,这在韩翃、柳氏的故事中已有明确表述,这一观点其实贯穿了所有感妓故事。当然,这一观念也是唐人小说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唐人小说多记才子佳人故事,对爱情的理解也是郎才女貌。除上引《柳氏传》中的表述外,《霍小玉传》也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重”,可见这一观念也是唐代士人的普遍观念。

但是,如果寻找这一观念的文学源头,我们发现,它们仍然是《神女赋》、《洛神赋》和《感甄记》,因为这些文学作品早已奠定了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神女赋》中的神女和《洛神赋》中的洛神都是光彩照人的文学形象,这两篇赋极尽铺张,着力表现这两位女神无与伦比的美丽,神女、洛神因此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美的化身。历史上的甄后以美色见知。《世说新语·惑溺》谓“魏甄后惠而有色”,刘孝标注引《魏略》、《世语》亦谓“其色非凡”,“姿貌绝伦”。《感甄记》选择甄后作为故事的女主人公,除其皇后身份外,就是其非凡的姿色符合故事人物的要求。作为故事的男主人公,毫无疑问,宋玉、曹植是以才子的身份出现的。在文学史上,宋玉是作为才人称名后世,曹植则以“才高八斗”受人推崇。对于这两位文学家在历史上所具有的身份和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唐人是明确认识的。如温庭筠《河中陪帅游亭》谓“倚阑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①,于湊《巫山高》云:“宋玉恃才者,凭虚构高唐。”^②至于曹植,在李商隐和罗虬诗中有集中的表述: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全唐诗》卷五三九李商隐《无题》)

① 《全唐诗》卷五八二。

② 《全唐诗》卷五九九。

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全唐诗》卷五三九李商隐《可叹》）

拔得芙蓉出水新，魏家公子信才人。若叫瞥见红儿貌，不肯留情付洛神。（《全唐诗》卷六六六罗虬《比红儿诗》其十四）

此外，裴铏的《传奇》中《萧旷》一篇记处士萧旷夜遇洛神故事，亦谓甄后“慕陈思王之才调”。可见，依照唐人的解读，《神女赋》《洛神赋》是才子佳人故事，《感甄记》更是才子佳人故事，感妓故事由此而来，其文学渊源自是不言而喻。

感妓故事在《本事诗》中一般收入“情感”一类。“情感”类多为爱情故事，作者的叙写，多为肯定和赞美，这一归类也大致体现了唐人对此类故事的态度。但是，作者对感妓故事中的人物行为并不总是给予赞美。这些本事大多没有超出男性溺于美色的故事模式，作者的态度因人物不同的遭遇和命运而有所不同。如果情缘相合，得妓成功，男女相恋成为风流韵事，受人艳羡，则自不必说；但如果情缘阻隔，或横遭挫折，情爱带来忧患和灾难，这时，作者的态度则较为暧昧。一些失妓故事通常采取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态度，在赵瑟感妓故事中，男女情爱被目为“溺惑”。《抒情集》记载曹生悦营妓丹霞，府主卢钰沮而不许，还为诗劝导，说什么“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对男女情爱持否定态度。

感妓故事给人的整体感觉通常是佳人才子溺于情爱而为情爱所累。这一叙写态度自然源于唐人的情爱观念，但文学传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世说新语》中有“惑溺”一类专记沉迷女色的故事，这些故事性质各不相同。一些故事写美色惑人害事，如曹操为图甄后美色而屠邴，贾充容忍妒妻以致自弊其子，王导放纵姬妾而任其干政等。也有一些单纯的情爱故事，如荀粲以身取冷为妻子退热，贾充女以身私许韩寿，王安丰夫妻卿卿我我等。但这些故事一概归入“惑溺”一类。贾充嫁女，先得隐秘私情；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认为于礼为不敬；荀粲关于“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的“高论”被斥为“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其溺于情爱的举动也获讥于世。同样叙说男女情爱，感妓故事在叙事倾向上无疑受《世说新语》“惑溺”故事的影响。

第四章 本事的文本构成

本事的文本是指本事的文字存在形式。唐诗本事的专门著作有《本事诗》、《云溪友议》、《抒情集》，前两种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可以见其文本原貌，后一种原书已佚，今存佚文已不能完全反映其文本原貌。除这三部本事专集外，《鉴诫录》和《唐摭言》是保存唐诗本事的最重要的著作。这两部笔记虽然不是本事专集，但收录的本事数量已超过《本事诗》等三部本事专集。因此，我们讨论唐诗本事的文本构成主要以《本事诗》、《云溪友议》和这两部笔记为参照。

唐诗本事的文本形式较为复杂。一些本事以片段形式存在，即一则叙述完整的本事作为个体独立存在，在文本上不与其他本事或诗歌发生联系。《本事诗》中的多数本事，散见于唐人笔记中的多数本事，均以此一文本形式存在。另一些本事则由若干本事片段连缀而成，其文本形式表现为内部结构紧密的本事群，如《云溪友议》、《鉴诫录》中的多数本事，此类本事的内部结构是复杂的，本事片段之间具有不同的结构逻辑和结构关系。就其大端而言，其构成方式有以人立目、以类相从、因词链接和因文衍生四种。本章拟就这四种构成方式作一具体说明。

第一节 以人立目

所谓“以人立目”，就是以某一人物为叙说中心，若干本事片段围绕此一人物展开，以人系事。居于叙说中心的人物在本事中具有不同的身份，本事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关系。一般来说，有下面三种情况：

一、人物既为事主又为诗作者，即本事群记载某一诗人的若干诗歌本事。这种情况最为常见，《本事诗》中有“韩翃少负才名”、“李相绅镇淮

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杜(牧)为御史”4条。第一条有韩翃、柳氏故事及韩翃《寒食诗》本事,第二条记张又新感妓故事及《牡丹》诗本事,第三条记李白《蜀道难》诗本事、《乌栖曲》诗本事、戏杜甫诗本事及宫中行乐诗本事,第四条记杜牧席间狂吟诗事及狎游饮酒诗事。《云溪友议》中的此类本事较多,“宗兄悼”记滕倪诗事,“吴门秀”记陆畅诗事,“辞雍氏”记崔涯诗事,“中山海”记刘禹锡诗事,“江客仁”记李涉诗事。《鉴诫录》中则有“轻薄鉴”(卷四)、“容易格”(卷五)、“禅月吟”(卷五)、“钱塘秀”(卷八)、“削古风”(卷九)、“归生刺”(卷一〇)。其他笔记中,也有不少此类本事文本。

此类本事文本在本事的收录编辑方面存在不同情况。一些本事中的本事片段在内容上缺乏有机联系,收录较为零碎,行文较为随意,编辑结构也不够明晰,甚至拉杂错乱,漫无统绪。如《本事诗》中“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一条,《云溪友议》中“吴门秀”、“中山海”,《鉴诫录》中“禅月吟”、“钱塘秀”,等等。唐诗本事的出现本来就是偶然无序的,对于单个诗人来说,诗事只是其全部生平及诗歌的极少一部分,难以构成系统,因而上述情况是难以避免的。也有一些文本,其本事片段在内容上联系较为紧密,这些文本通常有一个贯穿首尾的主题,或相同的题材,或相同的诗风。如《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一条,主体部分均为嘲戏诗事;《鉴诫录》卷四“轻薄鉴”录冯涓比讽箴规一类诗事,卷五“容易格”记卢延让“寻常容易”诗,卷九“削古风”收录诗事涉及杜荀鹤诗风转变,卷一〇“归生刺”则专录讥刺一类诗事。这些本事文本常常间以议论文字,显得结构紧凑,首尾一贯,无散漫凌乱之弊。

此类文本多采自传闻和有关文献,有时编撰者采录不精,疏于考订,因此出现真伪混杂的情况。《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条多采择《刘宾客嘉话录》中的条目。如“中山公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度词,同舍郎莫之会也。’”又:“杨危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均出自该书^①。其中还载有“每吟张博士籍诗”等语。考张籍生平,长庆元年为国子博士,次年迁水部员外郎,四年擢主客

^① 参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及《唐语林》卷二。

郎中。据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序,长庆元年绚至夔州投奔刘禹锡,因得求学左右,该书记当时言谈之事。既称张籍为“博士”,则为长庆元年至二年事,据此,“每吟张博士籍诗”等语当出自韦绚所记。这些出自《刘宾客嘉话录》言谈片段当是可信的。但另有一些收录,或诗、事不符,或出于讹误,所载刘禹锡因席上为诗致令杜鸿渐遣使侍寝一事则采自附会之谈。类似这种真伪杂存的情况在此类本事中为数不少。

二、人物仅为事主,而非诗作者。此类文本有《云溪友议》中的“襄阳杰”、“严黄门”,《北梦琐言》卷二“宰相怙权”,还有《抒情诗》中“唐丞相李蔚镇江南日”一条^①。“襄阳杰”主体部分记崔郊、戎昱感妓故事,作者以于頔为两事中的夺妓者,故收入于頔事迹中。“严黄门”主体部分本来记严武事迹,但文末记载李白作《蜀道难》诗,认为该诗因严武欲加害房琯、杜甫而作,又引杜甫《阆中行》为证。“宰相怙权”记载宰相令狐绹事迹,后半为诗歌本事,其文云:

或云(令狐绹)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又李商隐,绹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江东罗隐亦受知于绹,毕竟无成。又诗哭相国云:“深恩无以报,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绹之遗贤也。

三则本事均涉及令狐绹,故作为令狐绹事迹,一体编辑。“唐丞相李蔚镇淮南日”一条记布衣处士及诗人李嵘献诗李蔚的事,李蔚仅为事主。

辑录事主的事迹当然应该根据明文记载的文献,做到人物、事实明确,但在“襄阳杰”中,事主有出于附会者。此条载录的戎昱感妓故事与《本事诗》中同一故事的人物、情节不尽相同。“襄阳杰”以夺妓者为于

^① 见《太平广记》卷二〇〇。

頔,而《本事诗》作韩滉,但是,“襄阳杰”以夺妓者为于頔是有问题的。据本事,戎昱爱姬为官妓。就制度而言,官妓有乐籍,不能随便流动,也不属于某一长官。当然,州郡官妓,所在节度观察是有权调遣的,如《本事诗》所述韩滉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浙西乐将郡中酒妓召置观察使乐籍中。但据“襄阳杰”记载,戎昱时为永州刺史,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永州隶属湖南观察使,在山南东道节度使职权范围之外,本事所谓于頔命召,戎昱不敢违命云云,当不可信。本事以事属于頔,当自诗句附会而来。感妓诗有“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两句,“襄王”、“使君”等语用巫山神女故事。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本事当以诗中“襄王”坐实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再进而附会为于頔。

三、人物有时为诗作者,有时仅为事主。如《云溪友议》卷上“冯生佞”条,主体部分记进士冯道明谒见雍陶并诵雍陶诗句之事,而此事之前又叙雍陶“薄于亲党”、其舅寄诗责让一节。同卷“江都事”条本记李绅诗事,但又首叙章氏郎君于李绅处改窜白居易诗一事。卷中“买山讖”条主要记蔡京讥责四皓诗事及浯溪买山诗事,但中间穿插野人张顶垂钓诗事。《鉴诫录》卷八“贾忤旨”主要记载贾岛“推敲”诗事、病蝉诗事及责授长江时献府主诗事,中间又穿插韩愈赠诗一节,文末收载张蠙、方干诗事及贾岛死后崔铉、李允恭为诗相悼等事。如此等等,其例甚多。此类本事文本一般以某一诗人为叙述中心,附载与此一诗人相关的其他诗人的诗事,可以视为前述第一种情况的变化形式。

第二节 以类相从

所谓“以类相从”,就是若干本事片断依照同类编排的原则组成一个本事群,本事文本是具有相似性的若干本事片断的连缀或辑录。这种具有连接作用的相似性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同一题材

一些本事文本把诗歌题材相同的若干本事片段组织在一起,形成同一题材的本事群。《云溪友议》中的此类本事有“巫咏难”(卷上)、“琅琊忤”(卷下)、“巢燕词”(卷下)及“题红怨”(卷下)。“巫咏难”专收吟咏

巫山神女故事的诗事,包括沈佺期等人诗事和李德裕《巫山神女》诗事,“琅琊忤”收录王建、元稹、长孙翱、朱庆餘宫词诗事,“巢燕词”收录章孝标《归燕诗》本事及欧阳澥《燕诗》本事,“题红怨”则收录顾况题诗红叶的故事和卢渥得红叶诗的故事。另有《大唐新语》卷八“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一条: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为诗曰:“朝升照日槛,夕次下乌台。风竿一眇邈,月树几徘徊。翼向高标敛,声随下调哀。怀燕首自白,非是为年催。”郑繇少工五言,开元初,山範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範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白昼文章乱,丹青羽翮齐。云间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鹭,陈仓拂野鸡。不知辽廓外,何处别依栖。”甚为时所咏咏。

魏求己诗《全唐诗》卷四四诗题作《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乃据本事拟定。其实,这一诗题是不确的。据诗意,此诗乃咏燕诗,与郑繇《失白鹰》诗属同一题材。

同一题材的本事文本通常以单个本事片段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但也有更复杂的联系形式,如下引《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一条:

近日常举为诗清切,而鄙元和风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章正字孝标《对月》落句云:“长安一夜千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有类乎秦交云:“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官歌吹北官愁。”章君章题之中,颇得声称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君为《归燕诗》,留献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诗,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兼礼曹,孝标来年擢第。……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孝标及第,正字东归,《题杭州樟亭驿》云:“樟亭驿上题诗客,一半寻为山下尘。世事日随流水去,红花还似白头人。”初成落句云“红花真笑白头人”,改为“还似白头人”。言我将老成名,似花芳艳,讵能久乎。及还乡而逝。……后五十年来,有闽川欧阳澥者,四门詹

之孙也。灊娶妇经旬,而辞赴举。抗节不还。诗云:“黄菊离家十四年。”又云:“离家已是梦松年。”又云:“落日望乡处,何人知客情。”自怜十八年之帝乡,未遇知己也。亦为《燕诗》以献主司郑愚侍郎,其词虽为朝贤称叹,尚未第焉。灊诗曰:“翩翩双燕画堂开,送古迎今几万回。长向春秋社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

标题显示,此一本事是按同一题材组编的,但文本不仅包括章孝标《归燕诗》和欧阳灊《燕诗》本事,还涉及两人其他诗事。可以看出,此一文本并非单纯的两首咏燕诗事的简单排比,而是将原本各自独立且内容完备的诗人专题介绍性本事拼接在一起,两首咏燕诗成为二者相互连接的纽带。

二、同一主题

一些本事文本依据一定的观念、认知、兴趣对若干本事片段进行编辑,因而具有相同的主题。首先,这一主题表现为一定的观念,一种理性的认识。《北梦琐言》卷六“以歌词自娱”条记事三条:李远诗有“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两句,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韦庄《秦妇吟》诗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一联,后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后晋宰相和凝少时为曲子词,后为艳词所累,时人号“曲子相公”。本事文末云:“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数句乃贯穿全文的主题。又《鉴诫录》卷九“分命录”记载,王建吟诗寒碎,竟不显荣。李洞出意穷愁,不登名第。韦庄诗云:“大道不将炉冶去,有心重筑太平基。”后果为台辅。何瓚诗云:“到头须卜林泉隐,自愧无能继卧龙。”后得疾而卒。本事主题即文中所谓“诗者,陶人情性,定乎穷通”,这是一个具有文学理论色彩的命题。

其次,文本的主题有时表现为一种认知。《北梦琐言》卷七“孟浩然赵嘏以诗失意”条记孟浩然诵“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而玄宗不悦一事及赵嘏《题秦皇诗》谓“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而宣宗不悦一事,以诗累为全篇主题。《鉴诫录》卷八“衣锦归”条先记段文昌衣锦还蜀为蜀人艳羡的故事,后记庐州人罗向先前寄食僧寺,后持节归郡,经历旧游的故事,均为发迹荣显之事。以上主题与思想观念有关,也有一些本事文本,其主题涉及一些诗学观念。《鉴诫录》卷九“卓绝篇”云:

陈羽秀才题破吴王夫差庙,汪遵先辈咏绝万里长城,程贺员外因咏君山得名,时人呼为“程君山”,刘象郎中因咏仙掌得名,时人呼为“刘仙掌”。已上名公,称为卓绝,千百集中,无以加此。陈秀才题夫差庙云:“姑苏台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庙里神。幢盖寂寥尘土满,不知箫鼓乐何人。”汪先辈咏史诗曰:“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不及尧阶三尺高。”程员外咏君山曰:“曾游方外见麻姑,说到君山此本无。云是昆仑山顶石,海风飘落洞庭湖。”刘郎中咏仙掌曰:“万古亭亭倚碧霄,不成奇克不成招。何如掬取莲池水,洒向人间救旱苗。”

此一本事记载时人对四人诗篇的推崇,乃是建立在一定的审美时尚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审美时尚构成此一本事文本的文学主题。此外,《北梦琐言》卷七“洞庭湖诗”条收载李洞、包贺、卢延让、顾况等人诗事,诗涉雅俗,而雅俗之辨为唐末五代备受关注的诗学问题。

第三,一些本事的主题还表现为特定的趣味。最常见的是一些本事文本专收嘲戏一类诗事。嘲戏本来是本事的一种类型,在唐宋笔记中,常常成为独立的故事和本事的分类。但也有一些嘲戏类本事并不以独立文本集中编排,而是以片段形式组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如《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收诸人嘲戏诗事十余则,作者将这些题材各异的本事片段整合成为一个内容庞杂、篇幅冗长的统一文本。又《鉴诫录》卷四“蜀门讽”条收录蒋贻恭、郑云从、向瓚、令狐峤嘲戏讥讽诗事,同“杂嘲戏”散缓冗长的结构形式相比,该条显得叙述明晰,结构紧凑,是成熟的本事文本。

第三节 因词链接

所谓“因词链接”,是指若干本事片段通过特定的关键词连为一体,组成一个完整的本事群。通过关键词链接的本事片段在内容上无必然联系,因而此一本事的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因词链接的本事又有下面两种情况:

一、主体之间的链接。关键词链接的本事片段在内容上无主次轻重

之分,前后各自独立,链接的后续部分与前文不存在依附关系,如《云溪友议》卷中的“云中命”一条: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鬻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殓殓。经四日乃苏,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兰若唱袂褻毕,放还。”且言主人即复长安,而有中兴之主也,谓龟年:“有何忧乎?”后李校书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潯阳。经湘中,乘舟题二妃庙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共俨然。野庙向江空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嚔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君乃悉具所陈,俄而影灭,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浔阳太守段成式郎中,素为诗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井。段乃为诗,哭李四校书也:“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男女累,谁哭到泉台?”

此一文本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以李龟年为中心,记杜甫、王维诗事;后一部分以李群玉为中心,记李群玉、段成式诗事。前一部分文末引李龟

年语,有“我遇二妃”云云,后一部分即叙李群玉题二妃庙诗事。可见前后部分是通过“二妃”这一关键词连接的,在内容上并无必然联系。这两部分篇幅相当,无主次之分,在内容上是并列的。

二、主体与附带内容的链接。关键词链接的本事片段在内容上有主次轻重之分,或本事片段通过关键词与其他叙事本文链接。本事的片段与片段之间,或本事片段与其他叙事文本之间存在依附关系。如下引本事文本:

王后主咸康年,昼作鬼神,夜为狼虎,潜入诸宫内,惊动嫔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或狂游玉垒,书王于一倡楼;或醉幸青城,溺内家于灌口。数涂脂粉,频作戎装。又内臣严凝月等竟唱《后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艳丽绝句,隐为《柳枝词》。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昼连宵,弦管喉舌相应,酒酣则嫔御执卮,后妃填辞,合手相招,醉眼相盼,以至履舄交错,狼藉杯盘。是时淫风大行,遂亡其国。《后庭花》者,亡陈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诗曰:“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傍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又胡曾《咏史》诗曰:“邻国机权未可涯,如何后主恣骄奢。不知即入官前井,犹自听歌《玉树花》。”《思越人》者,亡吴之曲,故胡曾《咏史》诗曰:“吴王恃霸并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咏史》诗曰:“万里长江一旦开,岸边杨柳几千栽。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又韩舍人《咏柳》诗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又贺秘监知章、罗给事隐《咏柳》,轻巧风艳,无以加焉。贺君诗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又诗曰:“袅袅和烟映玉楼,半垂桥上半垂流。今年渐见枝条密,恼乱春风卒未休。”又李博士涉有《题锦浦垂柳》曰:“锦池江口柳垂桥,风引蝉声送寂寥。不必如丝千万树,只禁离恨两三条。”(《鉴诫录》卷七“亡国音”)

此一文本的主体部分记载“玉树后庭花”等所谓“亡国之音”诗事,自韩翃《咏柳》诗以下渐次离开原有的咏史怀古内容,过渡为纯粹的咏柳诗。后续的咏柳诗是通过《柳枝》曲和胡曾的咏柳诗与主体部分发生关联的。因而“柳”成为连接上下文的关键词。上引“亡国音”条的附属部分居于文末,有时附属部分还可以居于文中。如下引本事片段:

岳牧李员外膺^①,群玉校书者,即岳牧从孙也。昔来覲謁,曾与宴席。李公曰:“吾征士也,识古知今。视汝侪流,只如粟粒。”群玉兢惶,几不脱于櫜辱。其高概如此,有天下名称。群玉后过岳阳,题诗曰:“昔年曾接李膺欢,远泛仙舟醉碧澜。诗句乱题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冥梦一般。今日片帆城下过,春风回首涕栏干。”(《云溪友议》卷下“金仙指”)

“金仙指”条记僧人破戒守戒之事及地方长官以戒律僧之事。文中载有李虞为岳州刺史时惩戒诸僧屠牛捕鱼一事,上引李群玉诗事即置于此事之前。此一诗事与叙事主体在内容上并无关联,只是事涉李虞,因而连带叙及。此事是硬性楔入,造成叙事的中断,因而文意不够连贯,结构也不够严谨。这反映出一些本事文本行文随意,在文体上尚未臻成熟。

第四节 因文衍生

所谓“因文衍生”,是指本事文本由主体部分和附属部分构成,附属部分一般引录诗歌,缺乏叙事与情节,或与主体部分比较,叙事简单,附属部分自主体部分蔓衍生成,居于从属地位。一般来说,附属部分有很大随意性,是行文所及的枝蔓,并无预先的设想、安排,所以,严格地说,因文衍生不是一种编辑构成方式,而是一种行文方式。

根据主体部分和附属部分的不同联系,因文衍生又具有下面两种

^① 按:“膺”当作“虞”(详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0~2401页),下文李群玉诗有“昔年曾接李膺欢”,涉此而误。

形式:

一、以人衍生

文本附属部分中的诗和事仍属于主体部分中的人物,是对此一人物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的补充,人物成为关联主次的纽带,这就是以人衍生。《本事诗·高逸第三》“杜为御史”一条,在记载杜牧席间狂吟故事之后,又谓“杜登科后,狎游饮酒”,后引杜牧《遣怀》及《题禅院》诗。附属文字以录诗为主,本事性质较为模糊。因为不具备独立叙说的功能,所以只能依附主体部分。此一文本的主体部分记杜牧诗事,附属部分录杜牧其他诗歌,乃以人衍生。上述本事中,作为联系环节的人物是诗作者,但有时,这一人物仅为事主。《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条主体部分记载韦皋、玉箫的爱情故事,文末是一段衍生文字:

议者以韦中书脱布衣不五秋而拥旌钺,皇朝之盛,罕有其伦。然镇蜀近二纪,云南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礼乐,易衽归仁,彼我以盐铲货赂,悉无怨焉。后司空林公,弛其规准,别诱言往,复通其盐运而不贍金帛,遂令部落怀贰,猾悍邦君,蠹蛭为群,侵逼城垒,俘掠士庶妻子,不啻万人。雍陶先辈感乱后诗曰:“锦城南面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

在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中,韦皋仅为事主。文本衍生部分补叙韦皋生平及其功业,虽藤牵蔓绕,及于杜元颖^①,但也不过是对韦皋功业的侧面说明。

二、以类衍生

文本附属部分中的诗和事已不属于主体部分中的人物,只是与主体

^① 按:《新唐书·南蛮中》记载:“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障候弛查相蒙,时大和三年也。崐巖乃悉众掩邛、戎、嵩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救兵逐,崐巖身自殿,至大度河。谓华人曰:‘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众号恸,赴水死者十三。”《全唐诗》卷五一八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其一《初出成都闻哭声》云:“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锦江南度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乃记其事。本事所谓“司空林公”,“林”应作“杜”。

部分的诗和事同类,乃连类而及,此为以类衍生。同类表现在不同方面:有的是诗歌题材相同。《鉴诫录》卷八“屈名儒”主体部分记载晚唐诗人方干生平事迹及诗歌创作情况,末记方干于杭州刺史于郎中处宴饮赋诗情形,其文云:

(方)干与杭州于郎中为砚席之知,因求举粮,远游郡所。杭牧疑干为诗无卒才,因夜宴,与“飞”字韵,请赋一章。干半酣书成,合筵惊骇。于赠二百千,充润五十六字,于可谓奖士矣。诗曰:“闲世星郎夜宴时,丁丁寒漏滴声微。琵琶弦促千般调,鸚鵡杯深四散飞。遍请玉容歌白雪,高烧红蜡照朱衣。人间有此荣华事,争遣渔翁恋钓矶?”

此诗之后,又引其他各家之诗:“李先辈(宣古)于澧阳陪杜棕司空宅宴席上赋得桃字。”“杜公(棕)镇荆渚日,夜宴,出歌姬送酒,李群玉校书于烛下飞笔献杜诗”,“卢延让冬夜宴柳驸马(陟)宅,得更字”,“章先辈(孝标)于李使君筵赠歌人刘小小,得娘字”,“施肩吾夜宴曲”。上引方干诗及其他各家诗均为文人才士吟咏权豪势要宴饮歌舞及富贵声华等事,题材相同,其他各家诗事以此附于方干诗事之后。

以类衍生,有时也表现为诗歌主题相同。《云溪友议》卷下“和戎讽”主体部分记载戎昱咏史诗事,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本事还借宪宗之口,批评历史上的和亲政策。衍生部分引项斯《长安退将诗》及苏郁咏史诗,前者诗有“翠娥红脸和回鹘,惆怅中原不用兵”两句,后者诗有“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两句,都是讽刺和亲政策之失,与戎昱《咏史》诗及其本事乃同一主题。

以类衍生,有时还表现为诗歌风格相同。《云溪友议》卷中“澧阳宴”条主体部分记李宣古陪杜棕游宴时戏谑嘲弄等事,末引李宣古于席上赠酒纠崔云娘诗事,颇涉嘲戏。衍生部分则载录杜牧赠肥录事诗事及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事,亦多调笑。同卷“白马吟”记诗人平曾屡以诗赋投谒官僚权贵,言多讽刺。文末顺及温庭筠及举子纪唐夫诗事,

文云：

后温庭筠为赋，亦警刺，少类于平、贾，而谪方城，乃诗曰：“侯印不能封李广，别人丘陇似天山。”举子纪唐夫有诗送之。时温庭筠作尉，纪唐夫得名，盖因文而致也。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醪醑消积恨，莫言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不管是平曾诗赋，还是温庭筠、纪唐夫诗，均以怨刺为其风格，因文衍生者以此。

以人衍生与以类衍生有时可以二而为一。如《鉴诫录》卷七“四公会”条主要记载元稹、刘禹锡、韦楚客、白居易诸人会集赋诗较艺之事，文末所记元稹、白居易于慈恩寺悉去诸家之诗而独留章八元诗一事，亦以论诗较艺为主题。这种情况说明因文衍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结构方式也是多重的。

第五章 本事对诗歌的影响

本事是诗与事的结合,本事一经产生,作为叙说对象的诗歌即被纳入本事所给定的语境,本事故事因此对诗歌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诗歌文本、诗歌意旨、诗歌归属及诗题这四个方面。

第一节 本事与诗歌文本

从理论上讲,本事是对诗歌有关情况的说明和描述,二者在内容上应该是一致的,这是本事和诗歌得以相互影响的前提。前文在考察本事的生成形式时已经指出,唐诗本事中有一些虚构的故事。这些虚构的故事一方面以诗歌内容为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体现本事的故事性或戏剧性,又突破原有诗歌的内容。这样,在本事与诗歌之间就会出现内容的不一致,甚至矛盾。为了弥合这一矛盾,本事作者常常改动诗歌文字,试图将虚构的故事建立在诗歌文本的基础上,给人真实可信的印象,这种因为牵合本事故事而对诗歌文字所作的改动有时对诗歌文本产生重要影响。《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讲述诗人李涉赠诗豪客的故事,文末引其诗云:“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此诗《唐百家诗选》卷一四、《万首唐人绝句》及《全唐诗》卷四七七题作《井栏砂宿遇夜客》,其中第三句均作“他时不用逃名姓”,与本事所引有所不同。本事引文中的“相回避”三字其实是本事作者为牵合有关故事情节而对原文的有意改动^①。《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载元稹于元和四年出使东川时与白居易等人梦中神遇的故事,文引元稹梦游诗云:“梦

^① 详见《考证篇》“22 李涉”条。

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此诗《元稹集》卷一七题为《梁州梦》,第一句作“梦君同绕曲江头”,诗后自注云:“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可见元稹诗不过记叙己身梦与白居易等游历慈恩寺院,与白居易等游慈恩为诗相忆本不相关,也并无神秘色彩。本事作者将原文“梦君同绕”改为“梦君兄弟”,无非是想撇开元稹本人的梦中活动,试图将元稹之梦与白居易等人的实际游历情形完全吻合起来,从而给人神秘之感,异文的产生完全是为了故事叙说的需要。此类改动诗歌文字的情况还有很多,如:《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郡阁雅谈》所载齐己献诗郑谷的故事^①、《本事诗·高逸第三》所载杜牧城南游览的故事^②、《吟窗杂录》卷四一及《唐诗纪事》卷五五所载卢肇咏真珠故事^③,等等。

以上本事中的故事大致以诗歌内容为基础,是由诗歌本身附会而来。也有一些本事,诗歌与故事本来毫无关联,这些故事,或出于史实,或出于其他虚构与附会,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或实证的需要,本事作者常常引用已有诗歌,又因为故事叙述的要求,引用时对诗歌文字加以改动。如下引诗事:

初,中国长公主为尼,掖庭嫔御随出家三十余人,诏两禁送于寺,赐斋饌。传宣各令作诗送,惟陈文僖公彭年诗尚有记者,云:“尽出花钿散宝津,云鬟初翦向残春。因惊风烛难留世,遂作池莲不染身。贝叶乍翻疑轴锦,梵声才学误梁尘。从兹艳质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湘山野录》卷下)

本事所引诗,《唐诗纪事》卷二九作阳郇伯诗,题为《妓人出家》,首句作“尽出花钿与四邻”,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辨误妓人出家诗”条云:“陈彭年作诗八句,今考其诗与阳郇伯所作一同,首句‘尽出花钿散玉津’

① 详见《考证篇》“48 齐己”条。

② 详见《考证篇》“30 杜牧”条。

③ 详见《考证篇》“32 卢肇”条。

一句不同,岂后人改郇伯诗托以彭年之名,而文莹又不考之邪?”吴兴张氏刊《湘山野录》再跋引何焯校语云:“此唐阳郇伯《妓人出家》诗也,《能改斋漫录》云唐顾陶大中丙子编《唐诗类选》中载之,若公主入道,何敢用解佩事也?”可见,所谓陈彭年送公主为尼诗实为阳郇伯《妓人出家》诗,好事者对原诗文字作了若干改动,以掩人耳目,只是因为留下难以掩藏的尾巴,让人一眼识破。这种借用诗歌并改动文字的情况也见于《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条^①、《唐诗纪事》卷七五所载齐己中秋诗事^②及《青琐高议》前集卷八《希夷先生传》^③,等等。此类本事中的诗与事本来并无关联,修改诗歌文字,对诗歌内容进行改造,企图做到诗、事如一,是很困难的。有时本事作者需要对诗歌原文作大量改动,甚至抛弃诗歌的基本原义,使诗歌内容尽量符合故事叙述的要求。就此而言,借用诗歌的本事比自诗歌附会的本事,其诗、事关系相去更远。

本事改动诗歌文字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

首先,改动造成文意不通。改动诗歌文字是为牵合故事的内容,通常并不顾及诗歌内容的完整表达。因为故事与诗歌在内容上存在距离,甚至毫无关联,所以这种文字改动会损害原有的诗歌内容,使原本语意明确、表达完整的诗歌变得支离破碎,语意不通。《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条所引许浑诗见于许浑诗集,题作《途经敷水》,诗云:“修蛾颦翠倚柔桑,遥谢春风白面郎。五夜有情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更认罗裙碧草长。何处野花何处水,下峰流出一渠香。”^④原诗是其途经华阴敷水时所作。敷水本与汉代乐府民歌《日出东南隅行》中的罗敷之事无关,但唐人经敷水时常常吟咏罗敷故事。许浑此诗袭用惯例,首联和颔联吟咏罗敷采桑之事,隐括乐府民歌的故事内容,颈联是由文学故事而产生的怀想,将故事与现实物景融为一体,转换自然,尾联写景,关合诗题,这是一首叙事明确、写景自然、表达完整圆融的诗。但在本事中,此诗首联改为“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采桑”,尾联改为“为报西游减离

① 详见《考证篇》“28 房千里、许浑”条。

② 详见《考证篇》“48 齐己”条。

③ 详见《考证篇》“51 陈抟”条。

④ 《全唐诗》卷五三四。

恨,阮郎才去嫁刘郎”。首联已淡化了罗敷故事的情节,颌联和颈联虽然保留,但诗歌语境既已转换,原有的诗意已难以捕捉。尾联经过改换,完全变成与原诗毫无关系的故事的内容,这使原有诗意损失殆尽。这些文字改动虽然抛弃了原有的诗歌,但也并未由此建立另外一套语意系统,创造出与故事吻合、语意明晰、表达圆融的新诗。改动以后,前面三联与故事内容仍然格格不入,置于故事的语境中,这三联诗句语意不明。尾联虽然直接取材于故事,表达明确,但与前面诗句内容脱节,形成硬接,因此未能激活全篇诗意,完全是诗中败笔。可见,改动以后的诗属于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不确定物,是被支解的难以辨认的诗歌残片。

这种情况也同样体现在卢肇咏真珠的故事中。《全唐诗》卷三一—范元凯《章仇公席上咏真珠姬》云:“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应知子建怜罗袜,顾步裴回拾翠钗。”此诗《唐诗纪事》卷五五及《全唐诗》卷五五一作卢肇诗,后两句作“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此诗应属卢肇^①。两种文本,前一文本借用宋玉赋中巫山神女故事及曹植《洛神赋》中洛神故事咏席中妓人,属于唐诗中常见的感妓诗,诗歌情节也完全套用《洛神赋》中“罗袜生尘”这一唐诗中习见的事典,全诗用典贴切,表达完整明晰,此一文本为诗之原文。后一文本的文字改动乃牵合本事,改换的诗句因承接突兀而与前文语意断裂,造成文意阻隔,表达混乱。

李涉赠诗豪首的故事及齐己中秋月诗事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前已述及,《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条将李涉原诗“他时不用逃名姓”改为“他时不用相回避”,以切相期淮阳一节,但此一改动在诗中并无着落,徒然造成诗意表达的混乱。齐己中秋诗事仅引用其《中秋月》诗两句,孤立地看,虽经改动,尚无大碍。但如果将改动文字置于全篇,并与原文对照比较,则立见改动后的扞格难通。一般来说,本事对诗歌文字的改动都会影响诗意的表达,只是在不同本事中,这种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

改动诗歌文字的另一个影响是造成不同诗歌文本及文字的流传。本事对诗歌原文的改动并未因为违背原意而到此为止,相反,改动后的文字以异文形式出现在后来的唐诗总集、诗人别集等文献中,成为具有负面影

^① 详见《考证篇》“32 卢肇”条。

响的校勘材料。不仅如此,一些改动后的诗歌还以独立的文本继续流传。如“南海非”中所谓许浑诗又见于《才调集》卷一〇,作无名氏诗,题作《客有新丰馆题怨别之词因诘传吏尽得其实偶作四韵嘲之》。《全唐诗》卷八〇〇又收于赵氏名下,题作《寄情》。卢肇咏妓诗,《全唐诗》卷三一一作范元凯诗,改动后的文本又作为卢肇诗收入《唐诗纪事》卷五五及《全唐诗》卷五五一。不同文本的流传带来更多混乱,因为这些文本在后来的流传中有时脱离了原有的本事,使人一时难以追寻改动的踪迹,因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第二节 本事与诗歌意旨

本事作为一种说诗形式自然对诗歌意旨产生影响。真实的本事能帮助读者正确把握诗歌本义,而虚假的本事则对理解诗意产生误导。唐诗本事中有不少虚假的本事,它们或虚构故事,或误解诗意,或牵强比附。此类本事对诗歌意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

一、颠覆原意

一些本事在叙述故事时,对诗歌进行了完全错误的解说和引用,致使原有诗意荡然无存,如果不作辨证,则原有诗意从此晦暗不明。《本事诗·情感第一》载述戎昱感妓故事,感妓诗云:“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细读本事,颇觉事自事,诗自诗,二者难以吻合。《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载录同一故事,而感妓诗为:“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诗意与故事吻合,为其原诗。《本事诗》所引诗歌又见于《全唐诗》卷二七〇,题作《移家别湖上亭》,有此诗题,则诗意豁然贯通,了无疑义。此诗与感妓故事毫不相干,引诗入事,只能掩蔽诗歌本义。同样的情况,还有《本事诗·怨愤第四》载录的吴武陵怨愤诗事。此一本事所引吴武陵诗其实应归于于邺名下^①,此诗《全唐诗》卷七二五作于邺诗,题作《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是抒写科举下第的怨愤,与吴武陵因脏推问一

^① 详见《考证篇》“24 吴武陵”条。

事本不相干。以此解彼，完全扭曲诗意。

以上对诗意的颠覆出自诗歌运用的错误，也有一些本事出自本事作者对诗意的肆意穿凿。《尚书故实》记载兵部员外郎李约与主客员外郎张谔一同弃官归隐，两人感情笃厚，李约“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寐，人莫得知”，赠张谔诗云：“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本事自诗意附会而来^①，即自诗歌解读而来，所谓赠张谔诗其实是一首月夜怀人的诗，诗中人物并无本事所说的怪诞举动。如果相信本事记载的故事，则此诗无疑变成一首刻画名士一类形象的人物诗，这就远离了原有诗意。这种肆意穿凿的作法有时近乎“戏说”。《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抒情诗》记载李曜、吴圆歙州交代时以官妓相托的故事，故事以诗中“媚川”、“韶光”两语为官妓名字，并将故事建立在这一认定的基础上，这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奇谈^②。两首原本接对自然、寓意委婉的诗一经“戏说”，即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令读者难以解读。

二、偏离原意

一些本事在叙说故事、引证诗歌时，常常曲解诗歌中的部分文句，这种曲解仅对诗意的把握造成一定程度的偏离，并不构成对整个诗意的颠覆。《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记载，徐凝、张祜就白居易较量诗文，白抑张伸徐，“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之。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依本事所言，则杜牧诗“谁人”两句是评价张祜诗作，替张祜翻案的。其实，这两句表达诗人对张祜洒脱傲世的人生态度的赞美和向往，意在论人，而非论诗，与所谓钱塘之论更是毫无关联^③。这一附会曲解自然对把握诗意造成混乱，但这种影响也仅限于所引两句，并不危及全篇，而且，只要阅读全篇，这种因附会而强加于诗句的翻案之说也容易得到纠正。穿凿诗句的情况在《云溪友议》卷下“琅琊忤”条中同样存在。据记载，王建作《宫词》，事涉宫禁，因担心宦官王守澄告发，

① 详见《考证篇》“9 李约、张谔”条。

② 详见《考证篇》“44 李曜、吴圆”条。

③ 详见《考证篇》“20 徐凝”条。

赠诗反制。诗有“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两句，归罪王守澄。但是，综观全诗，这两句其实是对王守澄的恭维，并无反噬脱祸之意^①。一般来说，用以穿凿故事的诗句一经穿凿附会，意义即发生改变，从而偏离原有诗意，与前文难以衔接，在文意上会出现明显断裂。只要忠于诗歌原文，从诗歌整体把握诗意，在全诗语境中把握句意，一些因附会故事而造成的诗意偏离现象是可以纠正的。

三、附益本义

一些本事以交代诗歌创作缘起和诗歌本义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是虚构之词，或附会之谈。一般来说，这些本事中的诗歌并无作为创作缘起的特定故事，诗歌创作仅为一时思索或情感触发，别无深意，但本事作者务求深解，虚构或移植故事，从而强加诗歌本不具有的所谓本义。《鉴诫录》卷八“钱塘秀”有下面一则本事：

（罗）隐以讽刺颇深，连年不第。举子刘赞赠之诗曰：“人皆言子屈，我独谓君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年虚侵雪鬓，尘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隐睹之，因起式微之思，遂有《归五湖》诗曰：“江东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思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罗隐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及《全唐诗》卷六五五，诗题均作《曲江春感》，可见，这是一首触景生情的诗。文引刘赞诗非赠罗隐之诗，所赠乃别是一人^②，证明此诗的写作并无他人赠诗的背景，穿凿的本事及由此产生的本义也不存在。

李白《蜀道难》诗本事当属附益本义的著名案例，这是一段聚讼不已的著名公案，《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记此诗乃李白因惧房琯、杜甫遭

① 详见《考证篇》“8 王建”条。

② 详见《考证篇》“39 罗隐”条。

严武之祸而作,此后,宋人或认为此诗讽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①,或认为讽玄宗幸蜀^②,种种说法均不足信^③。较为可信的应是明代胡震亨的解析:“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诂必尽有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④。又说:“《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白则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载,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苞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第取一时一人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诸解者恶足语此?”^⑤解说较为通达,为可取之论。

附益本义的现象集中表现于一些穿凿比兴的本事,如白居易《杨柳枝词》本事、杜牧湖州叹花诗事、韩愈咏桃诗事,等等。这些本事中的诗歌都不过咏一时之景,比兴之事及比兴之义乃说诗者妄拟。

妄拟的本事及本义虽然外于诗歌原意,对诗歌文本的解读影响较为微弱,但要剥离这一层本不存在的本义并不容易。辨别此类诗事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倘无切实的考证,附益的本义则如影随形,难以消除。

第三节 本事与诗之归属

本事在生成和流传过程中出现大量讹误,其中包括诗歌作者的认定,由此产生了诗歌的归属问题。首先,诗歌归属歧异,同一首诗在不同本事中分属不同诗人。其次,诗歌归属错误。即本事中的诗歌原有确切归属,本事误置,或本事虽将诗歌归属某一诗人,但诗歌内容与诗人生平不相吻合。归属问题的产生极为复杂,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原因:

① 见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洪刍《洪驹父诗话》、洪迈《容斋随笔》卷六。

②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三,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贇删补,《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详见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文载《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60页。

④ 《李太白全集》卷三引胡震亨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8页。

⑤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一、传闻异词

本事在流传过程中经常出现歧异,这包括同一诗事分属不同诗人。前已引述,王播少孤贫,尝寄食僧院,后官宦显达,重游僧院,题诗以志前事。此事见于《唐摭言》卷七,而《北梦琐言》卷三又以此诗事归属段文昌。《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五引卢瓌《抒情》记载:“僖宗幸蜀,拾遗孟昭门上疏切直^①,蹈于非罪。时狄常侍归蜀,以诗悼之曰:‘一何罪死一何名,独向湘江吊屈平。从此蜀川春夜月,杜鹃啼作两般声。’”《南部新书》己部亦载此事,但诗归裴彻。《鉴诫录》卷四“蜀门讽”条所载向玢嘲蒋炼师诗,《南唐近事》又作处士陈沆嘲庐山道士诗,文本大同小异。又《云溪友议》卷中“澧阳宴”收录杜牧赠肥录事诗,而《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九引《南部新书》又作崔立言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一诗二属的情况在唐诗本事中较为普遍。上述诗歌归属的不同记载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因此,这些不同自属传闻异词。此类诗歌的归属通常难以断定,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有多少证据证明诗歌属于某一诗人,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诗歌不属于另一诗人,但是,要找到这样的反证通常是困难的。

二、引用和运用之误

一些本事在叙说故事时,通常引用相关诗歌,但在引用过程中出现诗歌归属的错误。如《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黜”条在叙述妓人周德华演唱《杨柳枝》词时,引述各家同题诗歌,其中“春江一曲柳千条”四句,本事作刘禹锡诗,其实,诗乃改篡白居易《板桥路》诗而成^②。这一错误是引录中发生的,与本事故事无直接关联,其性质与诗集中的误收类似。也有一些本事是虚构的故事,事既不实,诗亦假托,如下面的本事: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

① 按:“门”当作“图”。《新唐书·僖宗纪》:“(中和元年七月)辛未,田令孜杀左拾遗孟昭图。”《新唐书·田令孜传》记载同。

② 见陶敏《〈全唐诗〉中重出的刘禹锡诗甄辨》,《文史》第二十一辑,第270~271页。

共为乐焉。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

此事又见于《明皇杂录》卷下，但记载并不属实。《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云：“此诗非子美作，岐王开元十四年薨，崔涤亦卒于开元中，是时子美方十五岁，天宝后子美未尝至江南。”吴企明《唐音质疑录》引而申之，以为此诗前两句所言时间、地望与杜甫身世不合，安史乱后，杜甫与李龟年也无江潭相会的可能。可见此载不实。《杜诗详注》卷二三“江南逢李龟年”注引黄生之言云：“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云溪友议》本文有“伶官：张野狐箏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等语，则此一本事或因杜甫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记公孙氏及其弟子舞剑之事，连类附会而成，其诗其事与杜甫无涉。这种虚构故事、借用诗歌的情况也出现在《本事诗·情感第一》“朱滔括兵”一条中。本事所引士人代妻所作诗，《才调集》卷一〇作葛鸦儿诗，可见代妻作答一节不足信，其诗非士人所作。

三、解读之误

一些归属错误是本事作者的解读附会。解读之误首先表现于对诗歌内容的误读。《本事诗·情感第一》及《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均记刘禹锡“司空见惯”诗本事，前文已述及，这些记载与刘禹锡生平不符，是据诗末“江南刺史”或“苏州刺史”等语附会出来的故事。除此之外，《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六引《唐宋遗史》移之以属韦应物：

韦应物为苏州太守，尝有诗赠米嘉荣曰：“吹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有米嘉荣。近来年少欺前辈，好染髭须学后生。”又尝赴扬州司马杜鸿渐宴，醉宿驿亭，醒见二佳人在侧，惊而问之，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令乐妓侍寝。”问：“记其诗否？”一妓强记，乃诵之曰：“高髻云鬟官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在感妓诗事之前尚有赠米嘉荣诗事，整个本事文本与《云溪友议》中的相

关记载基本相同。《唐宋遗史》晚出,此一记载当本于《云溪友议》。后世大约发现《本事诗》及《云溪友议》中的记载与刘禹锡事迹不符,又因韦应物也曾为苏州刺史,于是移之以属韦应物。但感妓诗事与韦应物生平亦有未合,此一附会并不能找到真正的诗作者,只能造成新的错误。不仅如此,《唐宋遗史》在纠正《云溪友议》的错误时,连同正确的记载也一并更改。赠米嘉荣诗见于刘禹锡集,乃刘之作。因为引述的粗疏,《唐宋遗史》将本属刘禹锡的诗归于韦应物名下,从而造成更多的错误。

造成归属问题的解读之误还包括对本故事的解读。《南部新书》丁部记大和中裴潏作牡丹诗,为六宫传诵。此事本于《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但据《酉阳杂俎》,此诗非裴潏所作^①。《酉阳杂俎》记开元天宝时名公作《裴给事宅看牡丹》诗,其下又引别一首诗。《南部新书》误以别一首诗为《裴给事宅看牡丹》诗,又以裴潏曾官给事中,遂以诗题中“裴给事”为裴潏,并进而误为裴潏作牡丹诗。这一错误的因果链条无一不是误读造成的。

四、文字讹误

本事在流传过程中曾出现大量的文字讹误,如果讹误涉及诗作者的名字,则势必影响诗歌的归属。《本事诗·事感第二》记许浑梦入昆仑咏诗改诗的故事,这一故事出自卢肇《逸史》,但在《逸史》中,“许浑”作“许瀍”^②,《本事诗》中“许浑”当为“许瀍”之讹。许瀍仅存此诗,其知名度小,许浑乃中晚唐著名诗人,人知许浑而不知许瀍,去生就熟,因近而误,自然不足为奇。又如《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三引卢瓌《抒情》,以刘得仁《送人下第归觐》为刘梦得(即刘禹锡)诗^③,亦属涉作者名字而误。

第四节 本事与诗题

唐诗本事涉及大量唐代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人通常没有诗集流传,因

① 详见《考证篇》“26 裴潏”条。

② 见《太平广记》卷七〇引《逸史》。

③ 详见《考证篇》“13 刘禹锡”。

此,多数本事诗的原题后世无从见到。后世在收录诗作、编定诗集时,对于缺题的诗歌总要另拟诗题,诗作取于本事者,通常依本事内容拟定诗题,因此,本事与诗题关系非常密切。

这种依事拟题的情况,可以《大唐新语》卷八“文章”中的部分本事为例作一考察。为便于对照,兹将这些本事中的有关表述与《全唐诗》中诗题列如下表:

诗人	本事表述	《全唐诗》中诗题	卷数
上官仪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为宰相,尝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	《入朝洛堤步月》	四〇
刘怀一	刘怀一有才藻,自瀛州司法拜右台殿中。时右台监察邓茂迁左台殿中,怀一赠之诗曰:……	《赠右台监察邓茂迁左台殿中》	四四
吕太一 张 沈 ^①	吕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自负才华而不即真,因咏院中竹叶以寄意焉。其诗曰……同列张沈和之曰:……	吕太一《咏院中丛竹》 张沈《和吕御史咏院中丛竹》	一〇〇 一〇〇
贺遂亮 韩思彦	贺遂亮与韩思彦同在宪台,钦思彦之风韵,赠诗曰……思彦酬之曰:……	贺遂亮《赠韩思彦》 韩思彦《酬贺遂亮》	四四 四四
张宣明	张宣明有胆气,富词翰,尝山行见孤松,赏玩久之,乃赋诗曰:……宣明为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面,因赋诗曰:……	《山行见孤松成咏》 《使至三姓咽面》	一一三 一一三
陆 海	陆余庆孙海,长于五言诗,甚为诗人所重。……题奉国寺诗曰:……题龙门寺诗曰:……	《题奉国寺》 《题龙门寺》	一二四 一二四
郑蜀宾	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	《别亲朋》	四四
魏求己 郑 繇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为诗曰:……郑繇少工五言,开元初,山范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范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 郑繇《失白鹰》	四四 二〇

① 《全唐诗》卷一〇〇作“张法”。

《全唐诗》卷一〇〇吕太一《咏院中丛竹》序云：“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自负才华而不即真，因咏院中竹叶以寄意焉。”序本《大唐新语》，文字略异，诗题乃据序文拟定。表中所引诗题均依据本事，有时甚至亦步亦趋，忽略诗歌内容。如魏求己诗，其实是一首咏燕诗，所拟诗题与诗歌内容存在距离，是不够确切的。

唐诗本事有出于虚构者，有记事不实者，因此，依事拟题有时也造成一些歧异和错误。《北梦琐言》卷九记鱼玄机咸通中事李亿，后爱衰，出为女道士，有怨李亿诗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才调集》卷一〇录此诗，题作《寄李亿员外》，然《鱼玄机诗集》此诗题作《赠邻女》，《才调集》中诗题乃据本事所拟，当误。因记载不实而造成诗题的错误也见于《云溪友议》卷中“白马吟”一条：

平曾以凭人傲物，多犯讳忌，竟没于县曹，知己叹其运蹇也。薛平仆射出镇浙西，投谒，主礼稍薄，曾留诗以讽之曰……薛闻之，曾将出境，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繫白马诗》曰……河东公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以殊礼相待，厚送筐赂伐行。

平曾这两首诗收入《全唐诗》卷五〇八，诗题分别为《留别薛仆射》、《繫白马诗上薛仆射》。毫无疑问，诗题据本事拟定，但是，本事中的有关记载其实存在问题。文中薛平，新、旧《唐书》有传。据《旧唐书》本传，薛平为薛嵩之子，元和中为平卢军节度使，长庆元年，以功加右仆射，进封魏国公。宝历元年归朝，进加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所谓“薛平仆射”，当本于此。新、旧《唐书》载薛平生平颇详，然无出镇浙西之事。此之“薛平”当为“薛苹”，乃别是一人。《旧唐书·薛苹传》载：“薛苹，河东宝鼎人也。少以吏事进，累官至长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以尤课擢为湖南观察使，又迁浙江东道观察使，以理行迁浙江西道观察使。”其为浙西观察使的时间，《旧唐书·宪宗纪》系于元和五年。又《全唐文》卷四九七权德舆《大唐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河东郡公薛公先庙碑铭并序》云：“元和五年，岁直庚寅……润州刺史大夫河东郡薛公苹建先庙于长安县永安里。”则薛苹时例兼御史大夫，与平曾诗“来谒金陵薛大夫”句

吻合。本事因音近将“薛莘”误为“薛平”，《全唐诗》诗题也因此将“薛大夫”误为“薛仆射”。

依事拟题的错误最典型地表现于诗题中官称的错误。

唐诗本事一般不是事情发生时形成的文字记载，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然后见诸文字，因此，本事叙事通常采用追述的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有时给人物的官称带来某种不确定，甚至混乱。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对人物的官称应依据事情发生时或发生前人物的实际官职，但是，追述的叙事方式则一概称其终官或所历最高职官，而并不顾及事情发生时或发生前人物的实际官职，因此，本事中的官称与事情发生时或发生前人物的实际官职有时不一致。依据这种名实不符的官称拟定诗题是违背诗歌中官称的惯例的。

诗题中官称的惯例有三：第一，诗题官称反映现任官职，此例最为普遍。第二，诗题官称反映此前最高官职。如曾为宰相，则此后一律可称“相公”。第三，诗题官称反映此前清显之职。唐人重京官，轻外任。京官之中，郎官位居清要，中外要职，多由是迁。又中书舍人执掌制诰，为荣显之职，因此，唐人如曾为郎官、中书舍人，则虽外任刺史，品阶更高，但诗中仍以“员外”、“郎中”或“舍人”称呼。但是，依据本事名实不符的官称拟定的诗题均不符合上述三种惯例。

《全唐诗》卷五五二录李宣古《杜司空席上赋》诗，此诗首载于《云溪友议》卷中“澧阳宴”条：“故荆州杜司空惊，自忠武军节度使出澧阳。宏词李宣古者数陪游宴，每谑戏于其座。”诗题据此拟定。然《新唐书·杜惊传》记载：“大和初，由澧州刺史召京兆尹。”则杜惊为澧州刺史在大和初以前。杜惊为司空，据《新唐书·宰相表》，在咸通三年，即为澧州刺史30余年之后，为澧州刺史时不能称为“司空”。《全唐诗》卷五〇八又录平曾《谒李相不遇》诗，此诗及其本事见于《唐摭言》卷一〇：“平曾谒华州李相不遇，因吟一绝而去，曰……”诗题据此拟定。题中“李相”乃李固言。据《旧唐书·李固言传》，大和八年，李固言出为华州刺史，其年又召拜吏部侍郎，九年方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可见为华州刺史时尚未入相，不当称“李相”。又《全唐诗》卷五六三所录崔元范、杨知至、卢澥诗，卷五六六所录卢邺、封彦卿诗，卷五九七所录高湘诗，诗题有《李尚书命妓歌钱有作

奉酬》、《和李尚书命妓歌饯崔侍御》。诸人诗均录自《云溪友议》卷上“饯歌序”，诗题中“李尚书”乃据本事“李尚书夜登越城楼”等语。此“李尚书”指浙东观察使李讷。据《嘉泰会稽志》卷二，李讷授浙东观察使在大中六年（852）。李讷虽曾为兵部尚书，但据《新唐书》本传，那是晚年以后的事，此时尚未为尚书^①，所以诗题不当称“李尚书”。这种官称的错误还可举出《全唐诗》卷五三六据《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所拟许浑《寄房千里博士》，卷七八三据《抒情集》所拟曹生《献卢常侍》。诗题官称常常成为人物生平考订的依据，其错误容易造成考证的错误，因此，专门指出此类错误并举一反三是完全必要的。

^① 《全唐文》卷七四八杜牧有《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制》，所兼官职为御史中丞，亦未为检校尚书。

第三编 诗艺篇

《四库全书总目》在集部创设“诗文评类”，专收文学批评著作。类序谓此一门类著作体有五例，而《本事诗》以“旁采故实”列为五例之一，这一图书分类及体例划分确立了以《本事诗》为代表的唐诗本事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地位。古代目录学家和文体学家对《本事诗》的文体归属颇有不同。《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和《宋书·艺文志》均列入总集类，以《本事诗》为诗选。但宋人所编小说集《太平广记》、《类说》收录其书，明代胡应麟谓“究其体例，实小说家者流也”^①。不管是视为诗选还是小说，都忽略了《本事诗》的文学批评功能及其意义。《本事诗》的文学批评性质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才得到确认的。近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收入《本事诗》，进一步明确其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地位。当然，这一认定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对《本事诗》本身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将《云溪友议》归入小说类，但毫无疑问，它对《本事诗》的文学批评性质的认定也完全适用于《云溪友议》，乃至整个唐诗本事。

本事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在现代又有所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部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门讨论了《本事诗》，其中明确指出后来的诗话源出本事。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辟专节讨论《本事诗》，已注意到一些本事所表述的文学理论及蕴含的文学思想。这一部分虽然篇幅不大，但探讨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不过，相对

^① 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

于本事的文献学研究而言,本事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相对沉寂,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也没有真正展开。其实,唐诗本事作为唐人说诗最重要的形式,涉及文学批评的理念和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全面把握和深入开掘本事在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方面的内容是本事研究的又一重要环节。本文拟从本事的诗歌解评方式、本事诗评的思维方式、本事中的文学习尚及本事中的文学观念四个方面对此作一全面考察。

第一章 本事的诗歌解评方式

本事是说诗的,说诗包括解诗和评诗。唐诗本事作为唐人说诗的主要形式必然提供解诗和评诗的基本方法。唐诗本事对诗歌的解评是全方位的,其解评方式也是全面的、丰富的。如果我们将这种解评视为一种文学研究,则本事的解评方式包括了诗歌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和创作过程研究。总之,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唐诗本事均已有所涉及。

第一节 交代诗作背景

从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去解读、研究文学作品是一种古老的文学研究方法。孟子说“知人论世”,后世奉为文学批评的圭臬,所谓“知人论世”,实是包含了追踪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的要求的。汉人说《诗》,秉承这一文学批评的法则,一部《诗序》,言说诗歌本事,正是从创作背景的角度去探求诗歌本义。唐诗本事不仅继承了《诗序》的说《诗》体例,也继承了《诗序》的文学批评方法,将叙说诗歌创作背景作为说诗、解诗的主要形式正是源出《诗序》。唐诗本事对诗作背景的交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交代诗事要素,说明创作心理。

一、交代诗事要素

这里所说的诗事,是指诗歌中所叙说的生活事件。对于以叙事为主的诗歌来说,解读的关键莫过于明确诗中叙述的事件,全面把握诗事要

素。但是,中国古代诗歌就其体制而言是以抒情言志为主的,叙事功能先天不足。诗歌叙事通常只是摘其事件片段,相关的内容有时略而不书,因此,诗中的事件要素常常是残缺不全的。本事的产生弥补了这一缺憾,本事一般要对诗事作完整的说明和全面的交代,由此补足诗歌叙事的残缺,便于读者完整地把握诗事。《云溪友议》记载崔郊、戎昱感妓诗本事,崔郊诗云:“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戎昱诗云:“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这两首诗内容是叙事的,抒情以叙事为前提,但是诗歌本身并未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的经过和结果,也未明确故事人物,戎昱诗甚至忽略了事件起因。因此,仅从诗歌本身难以确切把握事件全貌。有了本事,读者才得以了解诗未交代的事件要素,从而对这两则感妓故事有明晰而完整的把握。

诗歌叙事不仅会出现事件要素的残缺,而且有时表达曲折深隐,甚至并不直接描写现实,而是借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倘无本事说明,则诗中叙说的事件永远处于朦胧状态。此类诗歌的显例莫过于李商隐的《无题》诗。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有很强的叙事性,但诗多用典,情事隐约,难以确指,因此,古往今来解者纷纷,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本事诗中,如前引崔郊、戎昱感妓诗,前者以晋代石崇宠妓绿珠的故事隐喻失婢一事,后者则用巫山神女故事隐指诗中人物之间的角色关系,又以“萧郎”、“襄王”指代故事人物,叙述隐约,事件模糊。除这两首感妓诗外,《本事诗》中还可举出下列诗歌:

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高逸第三“杜牧舍人”)

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情感第一“李相绅镇淮南”)

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只应偏照两人心。(情感第一“太和初”)

第一首诗叙事尚属明晰,但要真正理解诗意,还需明确“两枝仙桂”的确切含义。“仙桂”一词出于《晋书·郗诜传》,郗诜曾对晋武帝说:“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以“桂林一枝”、“昆山片玉”等隐喻科举得第,诗中“仙桂”取义于此。所谓“两枝仙桂一时芳”,指大和二年杜牧进士登第,同年又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登科。本事中“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即交代此句诗意。倘无本事的说明,“两枝”一句极易引起误解,由此,紧随其后的“禅师都未知名姓”一句便失去着落,难以解读,全篇意旨也会因此晦暗不明。第二首诗全篇借用巫山神女故事,第三首诗中“三山”、“青鸟”、“嫦娥”,均是借用神话故事,意象更为朦胧。这两首诗只有通过本事才能获得确切的意旨。事实上,故事的叙述对诗歌中一些深隐的表述具有注释、说明的作用。以上仅以《本事诗》为例,实际上,此类本事极多。

二、说明创作心理

诗歌通常是抒情言志的,自此角度而言,诗歌在创作前和创作中,诗人处在特定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状态之中,了解这种状态是解读诗歌、把握诗意的基础和前提,而诗歌本事正是了解这种状态的凭借和钥匙。《本事诗序》所谓“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就是在此意义上强调本事的解读功能的。《本事诗》中,“情感”、“事感”、“怨愤”三类本事大多叙说诗歌创作时的诗人心态,以此揭示诗歌本旨。“情感”一类故事通常叙写男女主人公的相恋相思,表现相聚的欢欣和分离的痛苦,其情感表述与诗歌本旨吻合。“事感”一类本事叙写政治的抗争,故旧的欢聚,还有感春惜年等,事与诗的因果关系极为鲜明。“怨愤”一类本事专记怨愤诗事,对诗人或怨望或愤激的情感有追根溯源的叙说。无疑,这样的表述和叙说具有直接的诗歌解读功能。上述本事,有的诗与事之间关系较为隐晦曲折。如贾岛题兴化池诗,批判权贵对平民的侵夺,仅就文本而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但据本事交代,此诗实因科举不第而作,是一首发泄怨愤的诗。因为本事的记载,读者才得以一窥诗之本义。有的诗歌在传播中曾引起误解,本事则起到正误的作用。刘禹锡《赠看花诸君子》诗当时传为寓有怨愤,但据刘禹锡后来所作的重游玄都观诗自序,此诗不过“以记一时之事”,别无深意。这篇自序在《本事诗》中以本事形式

出现,为正确理解看花诗提供了最权威的材料。不管是贾岛诗还是刘禹锡诗,其解读均有赖于本事的叙说,须以本事描述的诗人特定的创作心理为参照。

在以交代诗作背景为主的诗歌本事中,一些运用比兴的咏物诗、咏事诗和咏史诗常寓有深意,或被本事赋予深意。此类诗歌,《本事诗》中有王维《息夫人》、张又新《牡丹》、白居易《杨柳枝词》、宋之问《明河篇》、吴武陵《题路左佛堂》、张九龄《海燕》。据本事,《息夫人》隐喻饼师之妻的悲哀身世,《牡丹》以牡丹喻女色,《杨柳枝词》以杨柳喻指妓人,《明河篇》以明河喻北门,以寄怨望,《题路左佛堂》以鸟雀喻幕吏,以泄忿恨,《海燕》以海燕自喻,自明无争竞之心。《云溪友议》中的此类诗歌有章孝标《归燕诗》、欧阳漣《燕诗》及朱庆馀、张籍闺意诗,其他小说笔记中的此类诗歌有孔绍安《咏石榴》、卢肇《竞渡诗》、韩愈《咏桃诗》、章碣《东都望幸》诗、薛涛《十离》诗,等等。以上诗歌有的本无喻意,喻意是本事赋予的;有的寓有深意,其喻意有待本事的揭示。无论哪一种诗歌的本事,均以交代诗作背景,特别是说明创作心理来揭示诗歌本旨。咏物、咏事、咏史诗的吟咏对象与其喻意之间本无必然联系,喻意是诗作者外在赋予的,诗歌本身未必提供喻意,喻意需要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字形式来揭示,本事正是担当这一功能的常用形式。没有本事的叙述说明,这些诗歌只能作为纯粹的咏物、咏事、咏史诗,诗之本义也会因此湮没无闻。

唐诗本事通过交代诗作背景来揭示诗歌本旨,这是“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式的合理延伸,也是这一文学批评方式在诗歌解读中的具体运用。“知人论世”本是孟子提出的尚友方式,《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种尚友方式后来成为文学批评的法则和方式,即在探求文学作品的本义时,必须考察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这一文学批评的法则后来影响到汉人说《诗》,王国维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

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汉人传《诗》，皆用此法，故四家诗皆有序。序者，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毛序》今存，《鲁诗说》之见于刘向所述者，于《诗》事尤为详尽。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故其书虽宗毛公，而亦兼采三家，则以论世所得者然也。（《观堂集林》卷二三《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据王国维看来，汉代四家诗序，郑玄的《诗》谱、《诗》笺，无一不是“知人论世”的成果。唐诗本事承汉人说《诗》衣钵，不仅继承《诗序》“以事证诗”的说《诗》体例，而且继承了贯穿其中的文学批评的法则。本事的内容通常包括诗人的生平行事，思想情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与时代精神，论人论世，乃本事应有之义。本事虽然多属当时人记当时事，与《诗序》尚想古人、考察历史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其以事解诗、探求本义的解读精神与《诗序》是一脉相承的，是“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传统的体现。

“知人论世”虽被后世尊为确定不易的文学批评法则，但知易行难。“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辅而行，倘知人不深，论世不确，则所谓“以意逆志”不免陷入穿凿附会的误区，文学作品的本义反而因此晦而不明。唐诗本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鉴诫录》卷二“逸士谏”记载，天复中，昭宗播迁凤翔，何皇后恃其深宠，不顾阝危，肆行畋游。有成州同谷山逸人，直诣行在，上书论十代兴亡之事，叙四方理乱之源，又吟太康失政之诗，说褒姒惑君之事，以为鉴戒。所谓“太康失政之诗”，即本事所引《五子之歌》。此一组诗乃据《尚书·五子之歌》改作，诗意相仍，为咏古之作。昭宗奔播岐、梁间，何皇后随侍左右，并无须臾离去，实无荒于畋游之事。本事以同谷子《五子之歌》为讽谕何皇后，于史无据，也与诗意不符，乃曲解附会之词^①。又《旧唐书·刘禹锡传》谓“刘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云云，《新唐书·刘禹锡传》并谓诗人

^① 详见《考证篇》“45 同谷子”条。

“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这些记载不确，刘禹锡《读张曲江集作》作于元和十年被贬连州之后^①，该诗并非仅抒写身遭贬谪的郁悒不平，也主要不是“感讽权近”，而是批判政敌武元衡。诗人谴责执政者“忤心失恕”，也并非泛泛的议论，而是谴责武元衡对包括刘禹锡自己在内的王叔文集团成员的排斥打击。以上本事对诗歌的误读均源于论人论世的失误。

另有一些诗歌本纯为咏物、咏事诗，别无喻意，或无确指，但本事附会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事实，穿凿喻意，以致成为无中生有的虚谈，如下面的本事：

杜淹为天策府兵曹，杨文幹之乱，流越雋。太宗勘内难，以为御史大夫。因咏鸡以致意焉。其诗曰：“寒食东郊道，阳沟竞草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距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云百战胜，会自不论功。”（《大唐新语》卷八）

此一本事又见于《唐语林》卷二，文有“杜淹，国初为掾吏^②，尝业诗，文皇勘定内难，咏斗鸡寄意”等语。据本事之意，诗因玄武门之变太宗勘定内难而作。但是，《文苑英华》卷一七九、《岁时杂咏》卷一一及《全唐诗》卷三〇，诗题均作《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则此诗作时，李世民尚为秦王，诗与后来发生的勘定内难一事无关，是纯粹的咏物咏事诗，别无深意。前文已述及，李白《蜀道难》的主题，曾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危房、杜，罪严武；二是刺章仇兼琼；三是讽玄宗入蜀；四是蜀人自为蜀咏，别无寓意。前三种说法与史实不符，是附会之谈，只有第四种说法通达可取。其实，此诗并不牵于一时一事，硬要附会某一史实，只能支解全文，歪曲本义。

“知人论世”本是一种探求本义的有效批评法则，但被滥用以后，容易造成一种偏执的文学批评心理：以为一切诗歌皆具深意，皆须探求本

^① 详见《考证篇》“13 刘禹锡”条。

^② 《唐语林校证》卷二以事主为杜淹国，乃一时偶误。所谓“为掾吏”，指杜淹为天策府兵曹，据《旧唐书·杜淹传》，淹为天策府兵曹在武德中，故称“国初”。

事,于是务求深解、穿凿附会现象层出不穷,从《诗序》到唐诗本事,再到宋人、清人“以史证诗”一类诗歌笺注,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成为文学批评的一大负面遗产。

第二节 表现诗歌意境

本事解诗并不停留于交代诗作背景,有时还把解读的目光投向文本自身。如果说前者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当然,唐诗本事虽为唐人说诗的主要形式,但在文体上依然与小说混而为一,作为文学批评的形式,唐诗本事尚未达到完全的自觉,因此,文学的内部研究在唐诗本事中并不发达,还只是一些零星的、偶然的现象。但是,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批评实例也为后来的文学批评,特别是诗歌批评提供了宝贵经验。唐诗本事对诗歌文本的解读主要表现为对诗歌意境的表现,包括对诗事诗意的描述领悟和对诗境之风神气象的把握。

一、描述诗事诗意

一些本事诗具有明显的叙事性、情节性,其本事乃据诗意敷演而成。诗歌中的叙事总是简略的,通常只是一些情节片段,片段之间留下若干空白。解读的任务在于运用想象填补情节的空白,将若断若续的情节片段组织成为一个叙述连贯、首尾完整的故事。本事对诗事诗意的描述正是这样一种诗歌解读。前文在考察本事的生成时,曾将敷演诗意作为本事生成的形式之一,其实,此类本事的生成是以诗歌解读为基础的,本事生成的过程也是描述诗事诗意的过程,敷演诗事既是本事的生成形式,也是诗歌的解读方式。在考察本事的生成形式时,我们曾以《本事诗》中“杜舍人牧”条、“杜为御史”条及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本事为例,实际上,这三则本事都是对诗事诗意的描述。崔护诗本事叙写崔护三游都城南庄的故事,前两次游历的描述均本于诗意,其中,游庄遇女、应接传情的情节是对诗歌前两句的描述,再游南庄的心理描写及游后题诗的情节则是对后两句的描述。经过本事作者的想象,一首情节简单的诗歌变成一篇叙述明晰、情节丰满的动人故事。《本事诗》中,李适之的《罢相》诗本事同样属于对诗意的描述。这一点可从不同文本的对照中看出:

李适之性简率,不务荷细,人吏便之。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延接宾朋,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及为左相,每事不让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颇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适之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举朝伏其度量。(《大唐新语》卷七)

开元末,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酎,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本事诗·怨愤第四》)

两种文本中,《大唐新语》的记载仅限于交代诗作背景,《本事诗》的记载则明显侧重于诗事诗意的描述。

描述诗事诗意对于诗歌解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通过描述,诗事更为明晰。本事在描述诗事时,往往经过“合理想象”,补充诗歌省略的,或隐而未彰的情节,这样,原本空灵飘忽的意象变得更为明晰,缺乏联系的情节也因此更为连贯,这对读者把握诗事脉络无疑是有帮助的。其次,通过描述,诗意更为鲜明。本事对诗事的描述往往伴随本事作者对诗意的表达,如《本事诗》“杜为御史”条表现杜牧的倜傥风流与狂放不羁,李适之《罢相》诗事表现诗人的牢骚怨愤及世态炎凉,崔护题诗故事表现诗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本事作者对诗歌意旨的解悟和开掘,这对读者理解诗歌内容是富有启发性的。

本事对诗事诗意的描述是对诗歌的解读,这种解读是能动的。虽然本事要遵从诗歌原有的故事情节,尊重诗歌本义,但本事对诗事诗意的描述不是亦步亦趋的机械复述,本事作者要对诗事进行再创造,对诗意的把握也要受个人思想情感、性格趣味及学识的影响,因此,本事的描述已不再是诗歌本身,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诗歌读本”。

有的本事故事融入了本事作者的理解、想象,一些情节超越了诗歌原有的内容,如崔护题诗故事中男女应接及女子死而复生的情节完全出于虚构,“杜为御史”条中杜牧狂言问妓的情节虽出于“忽发狂言”一句,但已包含本事作者的想象,不完全是诗歌的内容。本事作者的理解、想象有

时会使本事完全偏离诗歌内容,成为独立于诗歌之外的另一故事。如《尚书故实》中李约赠张谔诗本事实自诗意敷演而来,但因支离曲解,本事已背离原有诗意^①。《云溪友议》中,李涉夜遇豪客诗本事虽据诗意敷演,但其实也是模仿旧有小说的独立故事,基本情节已远离诗歌^②。这些本事偏离诗歌内容,成为一种负面的解读。

由于受到本事作者思想情感、性格趣味及学识的影响,有的本事在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上有明显的主观性,如下引本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特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隋唐嘉话》卷中)

本事的主体是自诗意敷演的上官仪入朝咏诗的故事,但本事作者并不满足于故事的一般性描述,在叙说故事的同时,还着力表现诗人从容不迫的意态,潇洒风流的神情,因此本事已不再是简单的诗歌故事,而成为一种极富主观色彩的人物品评。在李涉诗本事中,这种主观色彩表现为赋予人物的豪爽性格和贯穿于故事的侠义之气。这种主观的色彩与诗歌内容的关系深浅不一,对诗歌解读的价值也因此各有不同。

二、摄取风神气韵

中国古代诗歌向来重视气韵风神,诗歌创作以传神写物为工,咏物写景讲求形神兼备,重神传神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这些特点和要求必然反映到诗歌解读和品评中来,对于一些写景抒情、咏物言志的诗歌来说,解评者不仅要把握诗歌意象的外在形貌,还要洞彻深察,摄取诗歌的气韵风神,达到对诗歌意境的透彻领悟。唐诗本事中有相关故事:

秣归郡草圣僧怀濬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

① 详见《考证篇》“9 李约、张谔”条。

② 详见《考证篇》“22 李涉”条。

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太平广记》卷九八引《北梦琐言》）

“洞庭春水绿于云，日日征帆送远人。曾向木兰舟上过，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说：唐末，馆阁数公泛舟，以木兰舟为题。忽一贫士，登舟作此，诸公览诗大惊，物色之，乃李义山之魄，时义山下世久矣。（《西溪丛语》卷上）

第一则本事记僧怀濬诗之特异。两首诗均写景，着墨省净，但境界深远，气象氤氲。首句一云“家在闽川西复西”，一云“家住闽川东复东”，有远离人世的奇异缥缈之感。诗中写景，唯曰莺啼花红，摈落凡俗，散尽人间烟火。末句一云“莺在旧时啼处啼”，一云“花在旧时红处红”，隐含知来藏往的得道者对大千世界的了悟与洞察。诗中描写的境界是人们想象中的灵山仙境，本事所谓“详其诗意，似在海中”，正是对这一神仙世界的想象和体悟。第二则本事中的诗歌的后两句原作“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意谓几度于木兰舟上眺望远方，见湖岸木兰，忽悟此身原是木兰幻化之身。两句写奇异的想象和幻觉，充满虚实变幻的灵动之感。本事谓李商隐魂灵现身而咏此诗，正是对灵动变幻的诗境的直观把握。此一本事虽是志怪故事，却隐含对李商隐诗的领悟。这两则本事对诗歌境界的把握均是略其形貌而取其风神，有勾魂摄魄之妙。

诗歌中的“神”有时表现为一种神韵、意味，或格调、气势等。唐诗本事有时比照诗歌异同，较量高下，这些比较大多以诗歌的风神气象或格调意味为参照，建立在对诗歌境界透彻领悟的基础上。如下列本事：

裴说、裴谐俱有诗名。说官至补阙，谐终于桂岭假官宰。同作《湘江吟》，说诗云：“吟余潮入浦，坐久烧移山。”谐诗云：“风回山火

断，潮落岸冰高。”《经杜甫坟》，说云：“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谐曰：“名终埋不得，骨且朽何妨！”景同而语意俱别。（《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三）

周贺，少从浮图，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诗格清雅，与贾长江、无可上人齐名。岛《哭柏岩禅师》诗籍甚，及贺赋一篇，与岛不相上下。岛曰：“苔覆石床新，师曾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塔院关松雪，房廊露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贺曰：“林径西风急，松枝讲法余。冻须亡夜剃，遗偈病时书。地燥焚身后，堂空著影初。此时频下泪，曾省到吾庐。”（《唐摭言》卷一〇）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唐摭言》卷一三）

第一则本事列举同一题材的两组不同诗句。《湘江吟》诗同写江潮野烧，裴说诗有汹涌漫延之势，而裴谐诗见消歇止息之意，此气象不同。同经杜甫墓，同言杜甫的文学业绩，裴说欲其再生，而裴谐任其腐朽，则意趣各异。本事谓“景同而语意俱别”者以此。第二则本事并录贾岛、周贺哭僧诗，对象原本不同^①，但写物记事多有暗合，且意度格调相同，颇有神似之处。第三则本事谓所录诗句“语意相合”，此所谓“意”，主要指诗句造境命意的方式及蕴藏于诗的意味情调，而不是指诗句的表层意思，“语意相合”实指神似。同类本事还可举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记载的李白作《金陵登凤凰台》拟与崔颢《黄鹤楼》诗一较高下的故事。方回《瀛奎律髓》卷一谓：“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此一本事未必真实^②，或是出于对格律气势的欣赏而虚构的故事。

描述诗事诗意属于对诗歌的具体阐释，而摄取风神气韵是对诗歌的

① 《全唐诗》卷五〇三周贺诗题作《哭闲霄上人》。

② 详见《唐诗纪事》卷二一“崔颢”，《四部丛刊·初编》本。

整体把握。这两种解评方式有时统一于具体的诗歌批评,但更多的则是各自独立运用,并独立发展。前者为后世的诗注诗解所继承,如明代唐汝询《唐诗解》中的“评解”,清代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中的“解评”,等等,属于描述诗事诗意。后者为诗话所继承,后来成为诗话评诗的主要形式。

第三节 叙说写作状态

文学作品是在一定的创作状态下完成的,创作以何种状态进行取决于作家的禀赋才性,而不同的创作状态对文学作品的个性风格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创作状态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在探讨文学作品的构思特点时曾对不同的创作状态作过专门考察,其文云: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沉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

《文心雕龙》将文学创作状态归纳为文思敏捷和文思迟缓两种,这一归纳体现了文学创作的普遍特征,也完全切合唐诗本事所表现的诗歌创作状态。唐诗本事强调的正是构思敏捷和深思苦吟两种创作状态,所谓“潘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夜赋潇湘”^①,是对这两种创作状态的形象表述。才思敏捷见于“幼敏”、“敏捷”两类本事,深思苦吟见于“苦吟”一类本事。关于构思敏捷,本事中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表述:

^① 见《唐摭言》卷一〇。

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刘)晏应声曰……(《明皇杂录》卷上)

杨(牢)登时叉手咏曰……(《唐语林》卷三)

(韩)滉乃指驾上鹰令咏焉,遂命笺笔,(崔铉)略无伫思,于是进曰……(《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引《南楚新闻》)

徐锴字楚金,年十余岁,群从宴集,分题赋诗,令为《秋词》,援笔立成。(《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引《诗史》)

(李)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本事诗·高逸第三》)

短李镇扬州,请章孝标赋《春雪》诗,命题于台盘上。孝标唯然,索笔一挥云……(《唐摭言》卷一三)

或应声而咏,或援笔立成,或一挥而就,均不假思索,不加修饰。引文中的表述都强调构思的敏捷和行文的迅疾连续,与《文心雕龙》中的相关描述一样,它们是对才思敏捷一类创作状态的典型描述。对深思苦吟的描述,除众所周知的贾岛的“推敲”故事外,还可举出下列本事:

方于暑夜正浴,时有微雨,忽闻蝉声,因而得句。急叩友人门,其家已寝,惊起问故。曰:“吾三年前未成之句,今已获之,喜而相告耳。”乃“蝉曳余声过别枝”也。(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

贾岛尝为僧,洛阳令不许僧午后出寺,贾有诗云:“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诗思迟涩,杼轴方得。如“鸟从井口出,人自岳阳来”,乃经年方遂偶句。(《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引《北梦琐言》)

这些本事反映诗人对字句的研炼,表现吟咏的凝神专注及艰辛劳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苦吟的精神状态。唐诗本事乃至整个唐人苦吟故事中,以上描述具有典型性。

诗歌的创作状态与诗歌的艺术特点、艺术风格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晚唐多苦吟诗人,晚唐诗风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艺术共性。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在论及唐人苦吟与其诗风关系时曾有一段颇为中肯的说明,

文云：

陈去非尝为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诗，所谓‘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之类是也。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高，故不能参少陵逸步。后之学诗者，倘或能取唐人语而掇入少陵绳墨步骤中，此连胸之术也。”

此之“唐人”实专指晚唐诗人。葛立方认为，晚唐诗歌虽然没有杜诗那样的高格逸韵，但用思极苦，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同样的论述还见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苦吟与诗风的关系在苦吟一类本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类本事中的诗句，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鸟从井口出，人自岳阳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蝉鬓凋将尽，虬髯黑在无”，经苦吟锤炼，无不语工句奇，出以精意。

创作活动与诗歌艺术的关系也反映在才思敏捷一类本事中。此类本事虽然强调诗歌创作不假思索，但其中诗歌，构思命意无不臻于巧妙。如《明皇杂录》卷上记苏颋咏“尹”字：“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开天传信记》记苏颋咏兔，“兔子在阑弹，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皆构思巧妙，命意新奇。又《国史补》卷上记载，驸马郭暧召集文士即席赋诗，李端先后赋诗两篇，前有“荀令”、“何郎”两句，众称妙绝，后有“金埒”、“铜山”两句，仍推警策。《唐摭言》卷一三记裴虔余为诗解怒的故事，诗思尤为巧妙。文云：

裴虔余，咸通末佐北门李公淮南幕，尝游江，舟子刺船，误为竹篙溅水湿近座之衣，公为之色变。虔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衣湿，知道巫山行雨归。”公览之极欢，命讴者传之矣。

虽是遽请为诗,不暇思索,但构思措意能委曲人意,实为不可多得的佳构。此类诗歌除构思命意巧妙外,还因走笔而成,故运笔行文,如行云流水,文气贯注,一气呵成。

正是因为创作活动与诗歌艺术之间存在上述关联,所以唐人言说创作故事并非一味闲谈,常常寓有诗歌批评的深意。这种诗歌批评有时直接见于议论性文字,如《本事诗》谓李白走笔而成的宫中行乐词“律度对属,无不精绝”,而一些虚构的故事,如刘晏咏王大娘戴竿诗事,贾岛吟“落叶满长安”故事及齐己投诗郑谷自改诗中一字的故事等,是自觉地将本事作为诗歌批评的手段。毫无疑问,这种自觉意识标志着这种诗歌批评形式的真正确立。

第四节 欣赏名篇佳句

欣赏名篇佳句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常用形式,此一形式可以追溯到六朝时盛行的寻章摘句的批评方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曾指出:“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眎摘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所谓“摘句褒贬”就是以摘句作为文学批评的手段。这一时期摘句批评的实例很多,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阮孚欣赏郭璞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两句,王恭欣赏古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梁书·柳恽传》记载琅琊王元长欣赏柳恽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两句,还有《颜氏家训·文章》记载时人欣赏王籍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两句。同样的诗评方式也体现在钟嵘《诗品序》中:“‘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诂出经史?”《诗品》正文谓郭璞诗“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两句“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谓陶渊明诗“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两句“风华清靡”,非“直为田家语”,也是摘句批评。钟嵘之外,诸人对诗句的欣赏还是偶然的,并未上升到文学批评的高度,《诗品》的诗句摘评则具有自觉的文学批评意义。

摘句批评兴起的同时,对名篇的欣赏也开始流行。《世说新语·文

学》中有皇甫谧欣赏左思《三都赋》及谢尚欣赏袁宏《咏史》诗的故事,《诗品序》在叙及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时,还一一列举名家名篇: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鳧”,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邨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除《序》之外,《诗品》正文品诗也多标举诸人名篇。此外,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厉赏,子建函谷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怀,非傍经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可见,欣赏名篇也是一时文学批评的风气。

六朝标举名篇佳句的诗评风气对唐人诗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是摘句在唐代进一步发展。唐代曾编纂过几部采摘古今文章英词丽句的总集,如编于龙朔元年(661)的《瑶山玉彩》五百卷,编于龙朔二年的《芳林要览》三百卷,还有元兢等人编纂的《古今诗人秀句》等。晚唐五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句图著作,如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李洞集贾岛警句五十联及唐人警句五十联,为诗句图,等等。晚唐五代的诗歌创作讲求一联一句的苦心经营,偏重警策,甚至有句无篇,也助长了摘句诗评的风气。唐人对名篇的重视甚于六朝,有唐一代曾编纂过不少诗歌选集,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顾陶《唐诗类选》等,这些诗集虽然选诗标准不一,但都具有采摘名篇的意义。

这样的诗评传统和诗评风气必然要向唐诗本事延伸、渗透。唐诗本事继承前代的诗评传统,并受时代诗评风气的浸染,重视对名篇佳句的欣赏与评价,而且在诗评的具体形式上有所创造和发展,这些创造和发展使此一诗评方式渐趋完善。

唐诗本事对名篇佳句的欣赏批评除引录篇句外,还采用下列四种形式。

一、径下评语

唐诗本事在标举名篇佳句时,常常对篇句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作出简要概括和评价,或下一赞语,这种评语由于高度概括、凝练,富有启发性,因而在本事诗评中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大唐新语》卷八记载,陆海长于五言诗,甚为时人所重,有《题奉国寺》诗及《题龙门寺》诗,“人推其警策”。《本事诗·高逸第三》记载,贺知章见李白《蜀道难》,“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载,骆宾王吟“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两句,宋之问“讶其迢丽”。《唐诗纪事》卷六三记载,武瓘投卷于知举萧仿,萧仿见其《感事》诗,“赏其有存故之志”。“赏其有存故之志”是对思想内容的评价,“讶其迢丽”是对艺术风格的评价,“推其警策”、“号为‘谪仙’”、“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则是直接的赞语。这种直接见诸议论性文字的诗评在唐诗本事中较为普遍,这是唐人在诗、文、诗序及其他笔记中常用的诗评形式向唐诗本事的延伸。

二、较量高下

唐诗本事中有一些较量高下、品评优劣的故事,多出于对名篇佳句的欣赏。较量品评的形式各异,有的出以直接的议论、对比,如下列本事片段:

张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比,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母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祜《观猎》四句及《宫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白公又以《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

中山公谓诸宾友曰:“……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壤洞庭宽。’又《石头城下作》云:‘山连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苏州韦十九郎中应物诗曰:‘春潮带’

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蘋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

本事所引篇句虽品定甲乙，优劣不同，但其实均为名篇佳句，未易遽定甲乙。除直接的议论文字外，还有对照不同诗歌的故事，如李白作《金陵登凤凰台》拟与崔颢《黄鹤楼》诗一较高下的故事。

这种较量品评有时还以唐人特有的方式出现。唐人宴集常各各即席赋诗，又推举诗之出类拔萃者，是为擅场，如下引本事所载：

郭暖，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暖大喜，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之巡江淮》，钱起擅场。（《唐国史补》卷上）

此外，还有科试擅场，如《唐摭言》卷一〇记载，咸通末，李频为京兆参军主试，试《月中桂》诗，张乔擅场。在宴集赋诗故事中，还有一种一人诗作杰出、诸人搁笔罢唱的故事。《孟浩然集序》记载，孟浩然游秘省，诗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两句，诸人叹为清绝，搁笔不复为继。《鉴诫录》卷七记载，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同会白居易宅，请各赋一诗，刘禹锡诗先成，三人览诗赞叹，于是罢唱。“擅场”、“搁笔”、“罢唱”等，含有对佳什秀句的推崇和赞美，是唐人欣赏名篇佳句的典型形式。

唐人常于风景名胜或往来要地题诗，各处设有专供题诗的诗板等，因此本事中还有一种去留诗板的故事。《鉴诫录》卷七记载，元、白曾游慈恩寺塔，见章八元题留之诗，吟味不已，于是悉去诸家之诗，唯留章八元一首。《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条记载，白居易于巫山神女祠去诗千余首，仅留沈佺期等四人之作。此类故事自然寓有称赏之意。

当然，唐人在同类诗作中并不总是分出高下，对于成就相当的诗作有时怀有同样的尊重，如《鉴诫录》卷八“作者同”条录诸人同类题材诗作，

连称并引,并无轩轻。中国古代常以同类题材的两篇杰作为双璧,用意与本事相同。

三、赠以雅号

唐代诗人常因某一诗作杰出,或一联一句精警,为人喜爱,而获得某一雅号、外号。唐诗本事多记此类美谈:

杜紫微览赵渭南卷《早秋诗》云:“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吟味不已,因目赅为“赵倚楼”。(《唐摭言》卷七)

陈羽秀才题破吴王夫差庙,汪遵先辈咏绝万里长城。程贺员外因《咏君山》得名,时人呼为程君山,刘象郎中因《咏仙掌》得名,时人呼为刘仙掌。已上名公称为卓绝。(《鉴诫录》卷九“卓绝篇”)

许棠有《洞庭》诗尤工,诗人谓之“许洞庭”。(《北梦琐言》卷二“放孤寒三人及第”)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时人号“秦妇吟秀才”。(《北梦琐言》卷六“以歌词自娱”)

夏宝松,庐陵人,与刘洞唱和,为节度使陈德诚所知。德诚赠诗曰:“建水旧传刘夜坐(刘洞有《夜坐》诗),螺川新有夏江城。”宝松有《江城》诗曰:“雁飞南浦钟初动,月满西楼酒半醒。”又云:“晓来羸骝依前去,雨后遥山数点青。”皆佳句。(《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二引《江南野录》)

此外,《云溪友议》卷上“四背篇”谓卢纶作拟僧诗,僧清江作七夕咏,刘长卿“有眼作无眼之句”,宋雍“无眼作有眼之诗”,诗流以为“四背”,或云“四倒”,这是变相的外号。这些雅号、外号或出自名篇的篇名,或出自名句中最富特征的词语,或是与名篇佳句相关的名目。总之,雅号、外号是名篇佳句的标志,是人们欣赏的着力点。因喜爱诗歌而赠以雅号、外号,这是唐人的一大发明,此后,在文学批评中,雅号、外号成为名篇佳句的标记。

四、记述流播

一些唐诗本事记载诗歌的流传,特别是名篇佳句的流播,如《大唐新语》卷八记载,张文成作《咏燕》诗,“时人无不讽咏”,郑繇作《失白鹰》诗,“甚为时所讽咏”。此外,又有下列本事:

罗虬辞藻富赡……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属意。会贰车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增彩。孝恭以副车所贮,不令受所赋。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唐摭言》卷一〇)

(许)棠《洞庭》诗,有“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之句,人以题扇。(《唐诗纪事》卷七〇)

李度显德中举进士,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人多诵之。(《玉壶清话》卷七)

这些流播人口、风行一时的诗歌多为名篇佳句。名篇佳句的流传反映时人对这些诗歌的普遍欣赏,这种欣赏已超出个人的审美偏好,成为一种时代的共感。因此,一般来说,此类本事最能见出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习尚和文学批评的风气。

唐诗本事标举名篇佳句的批评方式对宋人诗话产生了直接影响,宋人诗话赏析名篇、品评佳句的诗评方式即出自唐诗本事。首先,既标名篇又举佳句的形式虽始于《诗品》,但宋人诗话则是近承唐诗本事。其次,本事中诗歌批评的具体形式,如前文论及的四种标举方式均为宋人诗话袭用,其中同类并举、品定高下、赠以雅号外号等方式承袭最为直接^①。宋人诗话本自唐诗本事发展而来,批评方式的袭用是很自然的。

^① 宋人诗话中多有赠以雅号、外号的记载,如《六一诗话》:“惟天圣二年省试《采侯诗》,宋尚书祁最擅场,其句有‘色映珊瑚烂,声迎羽月迟’,尤为京师传诵,当时举子目公为‘宋采侯’。”《温公续诗话》:“鲍当善为诗,景德二年进士及第,为河南府法曹。薛尚书映知府,当失其意,初甚怒之,当献《孤雁诗》云:‘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薛大嗟赏,自是游宴无不预焉,不复以掾属待之。时人谓之‘鲍孤雁’。”又《后山诗话》称张先为“张三影”,《竹坡诗话》称贺铸为“贺梅子”。

第二章 本事诗评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说是直观的。儒家经典的《周易》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此“圣人立相以尽意”。（《易传·系辞》）不仅“尽意”需要“立象”，观物也要取象，思想的获得与表达都离不开“象”，也就是离不开直观的方式。《庄子》视语言为糟粕，认为对“道”的体认要以“心斋”（《人间世》）、“坐忘”（《大宗师》）为前提，“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养生主》），也是强调直观的必要性。佛教禅宗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讲求“以心印心”，妙契忘言，仍然没有离开直观的方式。这种直观的方式排斥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是综合的、整体的，而非分析的，是形象的，而非抽象的。直观原是把握事物的方式，但后来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诗本事中形象说诗评诗的方式固然是受到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上述以直观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唐诗本事中的说诗评诗采用直观的思维方式，其具体形式有三，即运用直感语言，借助个性形象，采用寓言故事。

第一节 运用直感语言

唐诗本事评诗有时径下评语，如果是品评诗歌的艺术风格，则此一诗评形式往往采用直观感性的语言。从下列诗评片段可概见这种直感语言运用的情况：

（上官仪）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隋唐嘉话》卷中）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官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大唐新语》卷八)

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佺期)诗落句云:‘微臣凋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之问)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唐诗纪事》卷三“上官昭容”)

近日举场为诗清切,而鄙元和风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

李洞……时人但诮其奇峭,唯吴子华深知之。(《唐摭言》卷一〇)

崔櫓慕杜紫微为诗,而櫓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物。如《梅花》诗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复曰:“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山寺》诗曰:“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如此数篇,可谓丽矣。(《唐摭言》卷一〇)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复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唐摭言》卷一〇)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李远员外每吟其诗而思其人。(《北梦琐言》卷五“李远讥曹唐”)

李延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太平广记》卷二七二引《抒情集》)

此外,还有前文所引《本事诗》称骆宾王诗“迢丽”等。以上诗评片段均出自本事,有的是对篇句的品评,有的是对包括具体篇句在内的整个诗歌创作的评价。作为诗歌评语的所谓“清亮”、“悲苦”、“健举”、“清切”、“僻涩”、“奇峭”、“丽而近荡”、“清雅”、“缥缈”、“靡丽”等,无一不是直观感性的语言。

用直感语言评诗在唐代其他文体中也普遍存在,诗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①,文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

① 《杜诗镜铉》卷一《春日忆李白》,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①，“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②。其他诗学著作如李峤《评诗格》中十体、皎然《诗式》中十九体的一些名目以及司空图《二十四品》中的名目。唐人笔记中此类诗评极多，如《唐国史补》卷下云：“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可见，以直感语言评诗乃唐时风习，本事不过其中一体。

一般来说，直感语言具有以下特性：第一，直感语言本身具有形象性，因而常与具体可感的形象相联系。如《世说新语·赏誉》云：“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注引《李氏家传》云：“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颀颀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若千里马。南阳朱公叔，颀颀如行松柏之下。’”又云：“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又引王戎语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容止》云：“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上引“谡谡”、“高彻”、“岩岩清峙”、“濯濯”等直感语言均有具体形象比拟形容，语言与形象互为表里。这种人物品评式的语言后来影响到文学批评的语言，如下列文学批评：

（张）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大唐新语》卷八）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李义

①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二《与李生论诗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瓌妍,要非适用;本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敖陶孙《敖器之诗话》文引涵芬楼本《说郛》)

在上述诗文评中,具体形象通过对直感语言的形容拟喻诗文风格,直感语言是形象喻诗拟文的中介,这种中介性正好说明直感语言的形象特性。

直感语言的另一特性是其形象的概括性,一个词语可以概括某一类形象的特质,用于诗文评,则可以表示某一类文学风格。《文心雕龙·体性》将文学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其中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即为直感语言。在唐诗本事诗评中,一些直感语言,如“遁丽”、“悲苦”、“清切”、“僻涩”、“奇峭”、“清雅”、“靡丽”等,也可作为风格类型的标示。

以直感语言评诗,首先是受传统的“人文合一”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性”的表现,文学风格与作家的个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有其人必有其文,因其文可见其人,文如其人。《文心雕龙·体性》论其事说:“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此谓文学反映作家的气质性情,故文品即人品。这种观念也反映到唐诗本事中来,一些本事由诗风推原诗人的风神气质。如《隋唐嘉话》卷中记上官仪入朝时巡洛水堤步月咏诗,“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由清雅的诗风想到诗人从容的意态和潇洒的风姿,论人论诗实二而为一。如果说上述故事中的文、人关系尚隐而未彰,那么,下列本事对此一关系则有明确的揭示:

张宣明有胆气,富词翰,尝山行见孤松,赏玩久之,乃赋诗曰……
凤阁舍人梁载言赏之曰:“文之气质,不减于长松也。”(《大唐新语》

卷八)

孟浩然字浩然,襄阳人也。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本事所谓“有胆气”,指人之气质,见于咏松诗的“文之气质”正是这种人之气质的表现。在这里,人之气质、文之气质与长松之特质实具内在的同构关系。本事所谓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并非闲笔,这一隐含人物气质的形象刻画实为“清绝”诗风的确切注脚。

唐诗本事以直感语言评诗,受人物品评的影响。魏晋时期盛行人物品评,而人物品评多用直感语言,除前文所引之外,还有所谓“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荀子秀出,阿兴清和”等等^①。

人物品评采用直感、形象的语言,而“人文合一”又是传统的文学观念,因此,直感语言用于文学批评乃势所必然,《文心雕龙》如此,唐诗本事也是如此。

第二节 借助个性形象

唐诗本事论诗评诗常常借助富有个性的形象,如下列本事:

曹唐、罗隐同时,才情不殊。罗曰:“唐有鬼诗。”或曰:“何也?”曰:“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唐曰:“罗有女子诗^②。”或曰:“何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此盖罗《牡丹》

^① 《世说新语·赏誉》。

^② 《诗话总龟·前集》周本淳校云:“‘子’下当脱‘障’字。”(《诗话总龟·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抒情诗》记同一故事云:“阁下有女障子诗极好。”“女障子”当为“女子障”。据此,所校不误。

诗也。（《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九引卢瓌《抒情》）

卢延让哭边将诗曰：“自是硃砂发，非干炮石伤。牒多身上职，盛大背边疮。”人谓此是“打脊诗”也。世传逸诗云：“窗下有时留客宿，室中无事伴僧眠。”号曰“自落便宜”诗。（《北梦琐言》卷七“洞庭湖诗”）

高英秀者，吴越国人，与赞宁为诗友，口给，好骂滑稽，每见眉目有异者，必嘲短于其后，人号“恶喙薄徒”。尝讥名人诗病云：“李山甫《览汉史》：‘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诗。李群玉《咏鸬鹚》：‘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定是梵语诗。罗隐曰‘云中鸡犬刘安过，月里笙歌炀帝归’定是见鬼诗。杜荀鹤曰‘今日偶题题似著，不知题后更谁题’，此卫子诗也，不然，安有四蹄？”赞宁笑谢而已。（《西清诗话》卷中）

孙鲂世为南昌人。……与沈彬尝游于李建勋，为诗社。彬为人口辩，每好较人诗句。时鲂有“夜坐”句，美于时辈，建勋因试之。先匿鲂于斋中，候彬至，乃问鲂之为诗何如。彬答曰：“人言鲂非有国风雅颂之体，实得田舍翁火炉头之作，何足称哉？”鲂闻之大怒，突然而出，乃让彬曰：“君何谤之甚，而比之田舍翁，言无乃太过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划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炉上坐而何？”合座大笑，善彬能近取譬也。（龙衮《江南野史》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此外，前文已引，《本事诗·嘲戏第七》还记载白居易讥张祜诗为“款头诗”、张祜称白居易诗为“目连变”的故事。以上本事均用形象比拟的方式解诗评诗，此一诗评方式可称之为象喻式批评。象喻式批评涉及诗评的重要方面：一是表现诗境，即选择某一形象比拟诗歌形象，使读者由此领悟诗境。如“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两句，谐谈以为“女子障”诗。诗中“倾国”、“动人”等语分明是女子形象，“若教解语”又令人联想默然无语的屏风人物，以屏风上不能言语的女子形象再现两句意境，极确切，又极富情趣。二是传达诗意。如“窗下有时留客宿，室中无事伴僧眠”两句，人讥为“自落便宜诗”，意谓诗人“留客”、“伴僧”本是利他之

举,但由此也自得闲逸与适意。这一比拟不仅浅近生动,而且准确传神,颇能见出诗句意趣。三是评说诗艺。如谓李群玉诗“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两句为“梵语诗”,杜荀鹤诗“今日偶题题似著,不知题后更谁题”两句为“卫子诗”,前者指出诗句的语音特点,后者指出诗句的用词特点,都是评价诗歌艺术。前文所引其他说诗在内容上均未超出以上三个方面。

本事中的象喻式批评在内容上有其适用范围,在形式上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拟喻的意象出自批评家对诗歌的理解与想象,是诗歌意象之外的独立创造。就是说,批评家在对诗歌内容有了透彻领悟之后,借助想象,创造出与诗歌意象完全不同的别一意象,用以解诗评诗。上引本事中拟喻的意象无不如此^①。第二,拟喻的意象虽具文学批评意义,但并不具备观念形态。一般来说,这些意象还只是一种感性的触摸,并不包含理性的思考。上引本事中拟喻的意象,不管是“目连变”、“打脊”、“自落便宜”、“田舍翁炉上坐”,还是“女子障”、“破船”,都是对诗歌意象的感性把握。至于所谓“梵语诗”、“卫子诗”,虽涉及诗歌音调、用词问题,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背景,但并无观念的判断与表达,仍然停留于感性。当然,这些感性的把握含有本事作者对诗歌意象的认知、理解和感悟,有时融入本事作者的情感、兴趣。如“唐有鬼诗”一语是对“水底”两句所渲染的凄迷冷寂氛围的感知和领悟,“女子障诗”一语渗透了本事作者对品评对象的喜爱和欣赏,其他拟喻多杂有诙谐幽默的情趣。第三,拟喻的意象既包括形象,也包括事象。如“款头”、“鬼”、“女子障”、“破船”、“梵语”等,为形象,“目连变”、“打脊”、“自落便宜”、“见鬼”、“田舍翁坐炉上”等,则为事象。“形象”通常是某一具体事物,而“事象”主要表现为一种情境。在本事中,“形象”通常是对诗歌内容的直接比喻和象征,“事象”

^① 曹唐、罗隐互嘲诗句的故事有异文。《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卢瓌《抒情》云:“唐曰:‘隐有牡丹诗。’或曰:‘何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将“女子障诗”改为“牡丹诗”。这两句诗见于罗隐诗《牡丹》(《全唐诗》卷六五五),可见,诗句本是摹写牡丹的。相对于“罗有女子障诗”而言,“隐有牡丹诗”一语不仅了无趣味,而且不能成为诗歌批评,这正如“花是美人”是饶有情趣的品评,而“花是花”则是毫无意义的饶舌。所谓“隐有牡丹诗”是流传中产生的讹误。

则是通过比喻设置一种阅读情境,由此情境可以体会领悟诗歌内容,“事象”对诗歌内容的表达通常比“形象”更为隐晦曲折。第四,拟喻的意象只是品评诗中一联或数句,并不针对全篇。这一联或数句,或意象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或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共同特征,因而可用较为单纯的形象和事象比拟。

唐诗本事中的象喻式批评来自“意象批评”^①。自六朝至唐代,“意象批评”非常流行。钟嵘《诗品》引谢混语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②,引汤惠休语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③,又谓“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④,均用“意象批评”形式。“意象批评”在唐代首先用于文评,如《大唐新语》卷八所记张说与徐坚论文,皇甫湜《谕业》评张说以下文章大家。皎然的《诗式》开始将“意象批评”用于诗评,卷一“品藻”云:“其华艳,如百叶芙蓉,菡萏照水;其体裁,如龙行虎步,气逸情高;脱若思来景遏,其势中断,亦有如寒松病枝,风摆半折。”此后重要的“意象批评”,有杜牧对李贺诗风的评论:“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⑤还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各类诗风的表述。唐人笔记中也偶然涉及“意象批评”,如《唐语林》卷二引《刘宾客嘉话录》云:“杜工部诗爽鹘摩霄,骏马绝地。”应该说,“意象批评”在唐代诗文评中较为普遍,是本事中象喻式批评的来源。

象喻式批评与“意象批评”类似,但也有很多不同。首先,“意象批评”是说明文学风格和创作个性的,批评对象是诗人或作家的全部作品,或某一风格类型。象喻式批评则通常再现诗歌境界,传达诗意,评说具体的诗歌艺术特征,并不涉及艺术风格问题。与此相应,批评对象也只限于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称为“比喻的品题”,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称为“象征的批评”,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称为“意象批评”,今取张说。

② 钟嵘《诗品》卷上。

③ 钟嵘《诗品》卷中。

④ 同上。

⑤ 《全唐文》卷七五三杜牧《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

一联或数句,并不言及全篇,更不说明作家的全部创作。其次,“意象批评”说明某一文学风格是用具体可感的“意象”表达文学观念,“意象”是形象与观念的统一体。象喻式批评解评具体作品,并不涉及风格问题,没有由具象到观念、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拟喻的意象仍然停留在具象和感性阶段。第三,“意象批评”中的“意象”通常表现为“形象”,而象喻式批评中的“意象”既有“形象”,也有“事象”。此外,“意象批评”中的“意象”多为自然形象,而象喻式批评中的“意象”既有自然形象,又有入物形象。

当然,象喻式批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它的批评对象仅限于诗句,范围有限,这就降低了此一批评形式的功能。其次,象喻式批评多为幽默的笑谈,风格的固定化限制了这一批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使它未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成熟的文学批评形式。

第三节 采用寓言故事

唐诗本事诗论诗是借助故事的形式,本事中具有诗评性质的故事有纪实和虚拟两大类。纪实一类记载时人对诗歌的品评,真实客观,一般并不直接反映本事作者的观点,因此,对于本事作者来说,此类本事还不是一种用以表达观点的诗评形式。能用以表达观点的是那些虚拟的本事故事,此类本事是自觉的创作,创作的目的在于品诗评诗,即因事寓意,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寓言故事。

此类虚拟的意在品诗评诗的寓言故事在唐诗本事中数量可观,为人熟知的就有十余条:郭元振题诗怪异面颊,骆宾王接对宋之问诗^①,上官仪作入朝洛堤步月诗,崔湜马上吟诗,唐玄宗评孟浩然诗^②,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钱起夜吟得鬼谣,“四公会”^③,“钱塘论”,杨汝士压倒元、

① 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64页。

② 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6~368页。

③ 详见卞孝萱《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97~499页。

白^①，“巫咏难”^②，韩愈评贾岛诗^③，元稹阻格令狐楚表荐张祜^④，长安僧评张籍诗句^⑤，李贺作《高轩过》^⑥。

本事中因事寓意的表达方式有所本，若推求远源，可溯及《周易》和先秦诸子散文。

《周易》本经立象以尽意，《易传·系辞》谓“《易》者象也”，以“象”概括整部《易经》。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易》卦者，写万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易》卦及卦、爻辞写万物之象，其目的是表明义理。《周易正义》又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若《乾》之‘潜龙’、‘见龙’，《坤》之‘履霜’、‘坚冰’、‘龙战’之属是也；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马班如’之属是也。如此之类，《易》中多矣。”可见，不管是《易》卦还是卦、爻辞都是“以物象而明人事”。《易传·系辞》之所谓“象”虽然解释为“万物之形象”，其实也包括了以叙述为本的“事象”。《易传·系辞》言《周易》“立象以尽意”的特点之一是“其事肆而隐”，韩康伯注：“事显而理微。”孔颖达解释说：“其《易》之所载之事，其辞放肆显露而所论义理深而幽隐也。”都表明《易》理或通过“事”来表现。前文所引《周易正义》中的《乾》、《坤》二卦及《屯》卦爻辞即多具叙事性质，其中《屯》卦各爻辞多叙远古时代的抢婚风俗，是完全的叙事。除此之外，爻辞叙事之例极多，为人熟知的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非寇婚媾”（《睽》上九），“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困》六三）。这些爻辞的故事性是极为明显的。可见，自《易经》开始，因事寓意的表达方式即已确立。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易经》“立象以尽意”是说先有对于宇宙万物的认识，即“意”，然后观物取象，以“象”表“意”。《易传·系辞》谓“圣人有以

① 详见《考证篇》“25 杨汝士”条。

② 详见《考证篇》“19 繁知一”条。

③ 详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解》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88～1289页。

④ 详见《考证篇》“27 张祜”条。

⑤ 详见《考证篇》“16 张籍”条。

⑥ 详见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载《梦苕盦专著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8页。

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即明此意。这种先立意而后取象的思维表达过程正是寓言的基本特征。

本事中品诗评诗的寓言故事，就其生成过程来说，也是先有“意”而后有“事”，即本事作者先有对于诗歌的品评认识，然后借人拟事，因事寓意。如郭元振题诗怪异面颊的故事，是先以郭元振诗有警策之句，然后以怪异神其诗句。骆宾王接对宋之问诗的故事是以本事作者对两人不同诗风的认识为基础的。故事中，“楼观”两句风格迥丽壮伟，与人们印象中的宋之问诗风迥异，而与骆宾王诗风相近。有此认识，然后才有以此警策属骆宾王的传奇故事。同样，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以与崔颢《黄鹤楼》诗相较的故事是因为有了诸如二诗格律气势相埒、工力悉敌一类认识之后才杜撰出来的。《易经》作为儒家经典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因事寓意的表达方式不仅成为先秦诸子寓言的直接源头，对后来的寓言，包括唐诗本事中品评诗歌的寓言故事，也都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同《易经》因事寓意的潜在影响相比，先秦诸子寓言对本事寓言故事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先秦诸子言事论理好用比喻，常常连类引譬，借事喻理，因此，先秦诸子散文，如《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有善说事理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大多情节完整，文体相对独立，为后来的寓言确立了基本的表达形式。比较而言，在先秦诸子寓言中，对本事寓言故事影响最大的是《庄子》寓言。《庄子》一书多用寓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谓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隐》云：“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寓，寄也。”《庄子·寓言》称其书“寓言十九”，郭象注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成玄英疏云：“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已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故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言耳。”可见，《庄子》寓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寓言乃寄之他人之言，作者的意见并不直接以己意形式发表，而是假托他人言说。这种“寄之他人之言”的寓言与其他诸子“寄之他事”的寓言有所不同，后者连类引譬，用比体；前者则以他人直接言说，摆脱了比喻的形式。二是寓言乃虚构之辞。意见是自己的，但为见信于人而寄之他人之言，则寓言属虚构之辞。上引成玄英疏所谓“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人、事俱幻。也有寄之真实的历史人物，

如老子、孔子、颜回等,但所言之事仍为杜撰。《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谓“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索隐正义》谓“畏累”、“亢桑”(庚桑)为老子弟子,实有其人。《庄子》有《庚桑楚》篇,《正义》谓“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则人虽实有,而事为假托。所言老子、孔子等人事亦然。《庄子》寓言的虚拟性与其他诸子寓言多引现实事例的纪实性完全不同。

以上《庄子》寓言的两大特点为本事寓言故事所继承。首先,本事寓言故事品评诗歌多假托他人,或借助他人,本事作者并不直接发表议论。如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诗本事,推崇崔颢《黄鹤楼》诗,而借重李白。“四公会”称赏刘禹锡、章八元诗,而托之元稹、白居易。“钱塘论”品评徐凝、张祜诗优劣,而借助白居易。《唐摭言》赞美李贺《高轩过》,而借重韩愈、萧颖士。如此甚多。《庄子》寓言寄之他人之言,意在取信于人,本事寓言故事假托他人,用意略同。本事中或假托或借助的人物多为当时的著名诗人,或文学大家,正如《庄子》中的思想家、道德家、名人等,这样的假托无疑具有取重当世、见信于人的用意。其次,本事寓言故事出于虚构。这些寓言故事虽援引真实人物,采用写实手法,但事出虚构。前文列举的本事寓言故事均不可信,前人或今人已有考证,本文《考证篇》亦有论及。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寓言故事虽出于虚构,但人物真实,一些情节又时有依据,真伪杂存,若不追踪蹊迹,见其违误,是很容易轻信记载,据以为实的。

既然本事寓言故事出于虚构,人物亦出假托,那么,故事人物所表现的诗评倾向和诗学观点并不真正属于其真实人物,只能反映本事作者的思想观点。如果误以故事人物的言论为其真实人物的诗评材料,据以考察其文学思想观念,则往往作出似是而非或穿凿附会的解释。

《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条记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表彰徐凝而贬黜张祜一事,这是一篇虚构的故事。过去的学者并不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常为故事中白居易伸徐黜张找出种种看来与真实的白居易的诗学观点相吻合的解释,宋人计有功曾就白居易伸徐黜张及元稹阻格张祜一事发表议论,其文云:

乐天荐徐凝，屈张祜，论者至今郁郁，或归白之妒才也。余读皮日休论祜云：“祜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讲讽怨谏，时与六义相左右，此为才之最也。”祜初得名，乃作乐府艳发之词，其不羁之状，往往间见。凝之操履，不见于史。然方干学诗于凝，赠之诗曰“吟得新诗草里论”，戏反其辞谓“村里老”也。方干，世所谓简古者，且能讥凝，则凝之朴略稚鲁从可知矣。乐天方以实行求才，荐凝而抑祜，其在当时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诗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虫小技，或奖激之，恐害风教。……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辨，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①。

计有功相信白居易伸徐抑张和元稹阻格张祜故事，认为张祜诗风艳发，而徐凝诗风朴略稚鲁，元、白之所以黜张祜，乃“以实求才”，“本乎立教”。这些议论虽与白居易诗论吻合，如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提倡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讽谕诗，但是，这其实是无关乎白居易伸徐抑张故事的。“钱塘论”中有关徐凝、张祜诗之高下得失者有两处，一是所谓州试《余霞散成绮》诗，二是白居易以徐凝《庐山瀑布》诗与张祜《宫词》相较^②。前者未载其文，无可置评。后者所举张祜诗虽可归入“艳发”一格，但本事仅就其中“数对”立论，并不涉及全诗风格。徐凝《庐山瀑布》诗两句也不能作为所谓“朴略稚鲁”诗风的代表，倒是刻画精细逼真的巧句。因此，用所谓张祜诗“艳发”、徐凝诗“朴略稚鲁”说明白居易伸徐抑张的理由，已经远离了本故事，是一种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空论，是自说自话。

本事伸徐抑张的原因其实在本事中已有清楚说明，就是张祜因以得名的《宫词》四句皆“数对”，虽不失为巧妙，但也不足为奇，不如徐凝“今

① 《唐诗纪事》卷四一“徐凝”，《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唐摭言》卷二以张祜《甘露寺》、《金山寺》诗句与徐凝《庐山瀑布》诗句相较，乃节录擅改“钱塘论”所致。

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两句刻画精细逼真,构思巧妙。程千帆先生曾在《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一文中对徐、张二人诗歌进行了解读,认为“徐诗朴拙,近乎‘清苦’;张诗工巧,邻于‘艳发’”,并认为“对两家的抑扬,实质上是在提倡一种有如后来北宋陈师道在其《后山诗话》中所提倡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诗歌风格”^①。此一解读似未尽本事之意。徐凝两句诗实源出孙绰《游天台山赋》中“瀑布飞流以界道”一句,此句《文选》李善注云:“水从南岩悬注,望之如曳布。”所谓“白练飞”,正是“飞流”、“望之如曳布”之意。所谓“界破”云云,是受“界道”一语的启发。应该说,这两句是刻画逼真、体物精细的巧句。本事作者的原意不过是以巧句比巧句,以见巧妙之高下,而无关乎不同诗风的臧否抑扬。晚唐诗歌长于写景状物,摹写细致逼真,往往能尽体物之工。但另一方面,一些写景状物诗丢弃诗歌的风雅比兴传统,唯求体物之工,缺乏风神气象,难见兴寄胸怀,因此,有的诗歌不免流于纤巧刻露,甚至堕入僻陋一格。即如徐凝诗“一条界破青山色”句,不但了无意兴,而且将本来奇伟壮观的自然美景变成被支离宰割的陋象,将美化为不美,因而被苏轼斥为“尘陋”^②。刻画精工而乏气象胸怀,这是多数晚唐写景状物诗的特点,此一本事对徐凝诗句的赞美体现了晚唐人的审美趣味,与白居易的诗歌理想其实并无瓜葛。应当指出的是,陈师道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正是为了纠正晚唐以来或纤巧或浮华的不良诗风的。

这种体现晚唐审美趣味的诗歌本事还有元、白称赏章八元《登慈恩寺塔》一诗的故事。《鉴诫录》卷七“四公会”记载:

长安慈恩寺浮图,起开元,至大和之岁,举子前名登游题纪者众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唱和千百首,传于京师,诵者称美。……会元、白因传香于慈恩寺塔下,忽睹章先辈八元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尘,二公移时吟味,尽日不厌,悉令除去诸家之诗,唯留章公一

① 莫砺锋编《程千帆选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92页。

② 苏轼《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见《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首而已。乐天曰：“不谓严维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为之。诗流自慈恩息笔矣。章公诗曰：“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濛濛。”

卞孝萱《元稹年谱》已考知，元、白两人大和中未曾同在长安。慈恩寺塔乃举子习游题记之所，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曾于慈恩寺塔下题名，有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①章八元于元、白为先辈，若于慈恩寺塔题诗，白居易于进士及第前后应有所见。元、白相交约在两人同应吏部科目试的贞元十八年（802）冬，已在白居易进士及第以后，因而不大可能出现两人同时始见章八元诗的情况。可见本事所记非实。章八元《登慈恩寺塔》诗以写景状物为本，刻画精切，颇得体物之工。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曾标举章八元诗“雪晴山脊见，沙浅浪痕深”两句，谓“此得江山之状貌极矣”，也是欣赏其诗中体物精工的警句。当然，《登慈恩寺塔诗》语近意浅，难见风神气象，又有后世所批评的晚唐五代咏物写景诗所共有的缺点，因而不免遭到后世的讥评，如推崇风雅、力主诗以言志的宋代诗话家张戒在其《岁寒堂诗话》中就讥其诗为“乞儿口中语”^②。章八元虽为大历、贞元间人，但其诗风引领晚唐五代，这是晚唐五代人推重其诗并以本事流传的原因。

① 见《唐摭言》卷三。

② 宋人常以语意浅露、缺乏风神气象的诗句为“乞儿口中语”。《诗人玉屑》卷一〇“乞儿相”引《漫叟诗话》云：“江为有诗云：‘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谓作此诗者，决非贵族。或人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纪花名玉篆牌’乃乞儿口中语。……晏元献云：此诗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故云：言富贵不及金玉锦绣，惟说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又“无神气”引东坡语云：“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

第三章 本事中的文学习尚

唐五代诗歌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诗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具有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特征,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或同一诗人群落中,诗歌又往往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风格,具有相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特征,这种情况反映了唐五代诗坛的文学习尚。作为唐诗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唐人说诗的主要形式,唐诗本事全面反映了这种与时推移的文学习尚。一方面,本事对一些名篇佳作的载录与欣赏反映了时人对一些文学风格的普遍接受和推崇,这些诗歌是一时文学习尚的标志;另一方面,一些本事所表现的文学倾向具有普遍性,这不仅因为具有同一文学倾向的本事反复出现,而且因为一些本事可以成为一些重要的诗歌现象的注脚。因此,由对本事的解析,我们可以把握唐五代诗坛的风习,并进而探讨一些文学风格和文学现象的内涵及其意义。

通观唐诗本事,其彰显的文学习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即崇尚气象,专注境界,追求兴趣和推尊学问。

第一节 崇尚气象

盛唐诗评家殷璠在评论盛唐诗歌时曾标举兴象、风骨,《河岳英灵集》谓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孟浩然诗“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两句,“无论兴象,兼复故实”。殷璠是一位对时代诗风深有所悟且见解独到的诗评家,所谓“兴象”、“风骨”,正是盛唐诗歌的特质。《河岳英灵集》选诗限于开元、天宝时期,所评诗人均为盛唐诗人,然诗中追求“兴象”、“风骨”实不限于盛唐,初唐诗歌中也有具备“兴象”、“风骨”的佳作。事实

上,“兴象”、“风骨”也是一些初唐诗人的审美追求。初唐和盛唐出现的诗歌本事体现了这一时期对“兴象”、“风骨”的崇尚,为我们准确理解“兴象”、“风骨”的内涵并进而深入把握初、盛唐诗歌的特质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一、兴象的创造

在殷璠诗评中,“兴象”是一个与意境相似的概念,“兴”是指由外物触发的观感兴致,“象”是指外在的事物形象,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外在的事物形象交融一体的诗歌境界。通过唐诗本事,我们可以对这一全新的诗学概念进行多层次的把握。

首先,“兴象”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诗歌境界。写景状物,用以表现内在的情思和主体感受,或咏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或表现物我冥一的人生境界。在初盛唐,这种情景交融的诗歌和诗句总为时人欣赏和传诵:

李义府侨居于蜀……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日里颺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大唐新语》卷七)

(崔)信明蹇亢,以门望自负,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议者不许。扬州录事参军郑世翼者,亦骜倨,数忤轻忤物,遇信明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水,引舟去。(《新唐书·崔信明传》)

如意中女子,年七岁能吟诗,则天试之,皆应声而就。其兄辞去,则天令作诗送兄,遂赋云:“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唐诗纪事》卷七八引《唐宋遗史》)

李义府咏乌,意在求官问职,虽借物用典,语义委婉含蓄,但太宗一闻即知。崔信明诗众篇虽见弃于郑世翼,但毫无疑问,其“枫落吴江冷”一句曾传诵一时,并为郑世翼所欣赏。此句首先是景语,枫叶零落,吴江凄冷,是一幅萧瑟凄清的秋色图景。然而,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秋声秋色又常常寓有人生的悲感。自宋玉以来,在文人笔下,萧瑟的秋色或寄寓失志的

不平,或流露离别的感伤,或表现摧败零落的悲慨,绘秋状秋,亦悲秋伤秋,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枫落”一句虽为断句,今已无法由其语境见其境界情思,但置于悲秋的文学传统中,仍能感受到凄清寥落的感情色彩和浓厚的抒情意味,则所谓景语亦情语。此句的好处在于这种融情于景而产生的丰富联想和无穷韵味,为人欣赏传诵者以此。如果说“枫落”一句因失去具体语境而情思朦胧,那么如意中女子的送兄诗则具有明确的抒情指向。这是一首寓意婉曲、感情深挚的离别诗。这位小女子来京应试时,其兄一路陪护,现在,兄长要离京回乡,自己却滞留宫廷,不能如来时一样,与兄长结伴,同归故里。离别时分,兄长别去的远路孤云初起,离亭木叶飘飞,无尽的长空掠过北归的雁群,于是,离别的伤感和思乡的愁绪一齐涌上心头。为表现这种深挚的离愁别恨,诗人选择了具有明显的抒情写意特征的物象:初起的孤云隐寓游子的飘泊,离亭落叶显示离别的冷落凄清,而北归的雁群反衬分离的哀怨和思乡的愁绪。写景抒情达到高度统一。

情景交融原是中国诗歌意境创造的基本特征。初唐诗坛一方面承袭了南朝、隋代内容贫弱、无病呻吟的委靡诗风,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清除这种诗风,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不断得到强调,情感的抒发逐渐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调。及至盛唐,感情浓烈气势壮大的诗风已告形成。因此,自创作角度而言,融情于景乃时代的基本要求。“兴象”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诗歌创作实践,因而情景交融实为兴象的首要特征,这一点可从初盛唐大量的诗歌本事中得到证实。

兴象创造的另一方面是对诗境的风神韵调的追求。初盛唐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写景状物,叙事言怀,不惟摹写形貌声色,而且传其神韵。《河岳英灵集》在叙及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时说:“景云中,颇通远调。”评诸人诗作,谓王维诗“词秀调雅”,李颀诗“发调既清”,孟浩然诗“半遵雅调”,储光羲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又谓常建诗“其旨远,其兴僻”,刘昫虚诗“情幽兴远”。所谓“调雅”、“调清”、“调逸”、“趣远”、“旨远”、“兴远”等,均是就诗歌的风神韵调而言的。初盛唐本事中,为人传诵的诗作即多具风神韵调,如以下本事诗:

(王)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河岳英灵集》卷下)

王湾《江南意》诗,据《河岳英灵集》所载文本,是写诗人晓行江上见到的江南早春景象。“海日”两句在描写中融入浓烈的情思和新异的想象:红日不待夜尽,已从海上升起;新春也不等旧岁除去,便急不可待地来到人间。以拟人笔法写出新春除旧布新的匆匆之态,沉默的自然因此被赋予积极的生命运动,显示蓬勃的生机。两句境界阔大,气象峥嵘,为传神之笔。此外,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记载,孟浩然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两句,时人“嗟其清绝”。两句描写雨后初霁的秋夜景象,上句表现夜空的皎洁明净,着一“淡”字境界全出;下句表现夜的沉静清幽,着一“滴”字境界全出。两句运笔从容,笔墨省净,极清幽明洁、恬淡闲适之致,也是传神写物的警句。此外,《旧唐书·钱徽传》还记载钱起省试诗《湘灵鼓瑟》中落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得之鬼谣的故事。湘灵鼓瑟原是神话传说,诗中叙写也纯为想象,两句以现实的山水描写映照虚幻的神灵形象,使缥缈虚无的形象幻化为真实的存在,给人无尽的想象和无尽的情思,有绕梁三日、不绝如缕之效。钱起夜闻鬼谣故事当然出于虚构,故事的本意不过赞美诗末两句神来遐远,具有勾魂摄魄的艺术魔力。

如果说以上诗句的好处主要在于其象外风神,那么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之为人欣赏则因其兴致韵调。此一故事细节多有虚构,其中上官仪且行且咏的描述当是表现诗歌的“音韵清亮”及由此诗歌想见的诗人从容不迫的仪态和潇洒风流的神情。本事中“音韵清亮”一语,与其说是描述上官仪的吟咏,不如说是表现诗歌的韵调,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谓“鹄飞”两句“音响清越,韵度飘扬”,以此语为诗之注脚,这是深味诗歌神韵、洞悉本事寓意的中肯之论。

对于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特有的风神韵调及其特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过一段近于权威性的说明:“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明代胡应麟接过严羽的话头,说“盛

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①。此之“兴象玲珑”虽就盛唐绝句而言,但也正是对蕴含风神韵调的唐诗诗境的确切说明。

兴象的创造还包括对理致理趣的追求。诗中理致是殷璠诗评的又一着力点,《河岳英灵集》谓王维诗“意新理惬”,李颀诗“玄理最长”,《丹阳集》谓蔡希寂诗“情理绵密”,樊光诗“诗理周旋”,申堂构诗“长于情理”,都是就理致而言的。诗重理致是初盛唐诗的显著特点,这一时期的诗歌,抒情言志往往融入对宇宙人生、自然社会、历史现实的哲理思索与深沉感慨。卢照邻《长安古意》、《行路难》两首感慨豪华代改,富贵不长,骆宾王《帝京篇》感慨“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于春江望月中体认人生世代的无穷与宇宙万物的永恒,孟浩然《与诸子登岷山》以“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哲理思索笼罩全篇,具有理性的沉着。即如《丹阳集》所论诸人诗句,如蔡希寂诗“象筵列虚白,幽偈清心胸”,樊光诗“巧裁蝉鬓畏风吹,尽作峨眉恐人妒”,申堂构诗“霜添柏树冷,气拂桂林寒”等,也多含思致。

这一时期的本事反映了时人对诗中理致理趣的追求与欣赏。《本事诗·事感第二》记载,玄宗闻唱李峤诗句“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因凄然泣下”。所引诗句出自李峤《汾阴行》,诗叙汉武帝幸河东祠汾阴后土这一历史盛事,诗句中自然的永恒反衬一代豪华的消逝,现实描写融入深沉的哲理思索,具有浓厚的落寞感伤情调,玄宗“凄然泣下”者以此。又《本事诗·征咎第六》记载:

诗人刘希夷尝为诗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欤。”复遽思逾时,又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恶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两留之,果以来春之初下世。

刘希夷诗句成为谶语自然出于附会,这一附会体现时人对诗句的欣赏,而

^① 胡应麟《诗数·内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诗句足以动人者也是万物长存、人生短暂的悲感,一种不可移易的永恒哲理。

唐前诗歌多以富贵声华为题材,诗风浮艳华靡。初唐诗歌虽也承袭了此一题材,但已不再一味沉迷富贵声华,在描写中开始注入思辨与反省的精神,一些诗歌因而具有浓厚的理性色彩。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理性的思考并不限于此一题材,思考的主题也不止于富贵声华、宇宙人生,思索与反省逐渐进入其他诗歌题材,理性与思致也逐步贴近现实生活。因此,既有情词之美又具思理之美的诗风逐渐普及,文理兼美成为诗歌成就的最终标志。此一情形由以下本事可得见一斑: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隋唐嘉话》卷下)

宋之问诗题为《龙门应制》^①。此诗吟咏武后群臣游历龙门的盛况,清丽两句,有文之美。诗末四句:“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立言得体,有思理之美。此之所谓“理”已属儒家的政治伦理。又《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记载郭元振诗中“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两句题于灵怪的故事。两句虽写戍边征战的艰辛劳苦,但并无衰败颓丧之意。《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珏论此诗语云:“忠心报国,不避死生辛苦;人衰马敝,常怀边思连绵。非深谙大体、蕴蓄大略者,不能言此廓清功业,所以为当时张燕公辈所推重也。”^②则两句寓建功立业之志,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和非凡的理性气度,其为警策者以此。

《新唐书·文艺传》谈到玄宗对于诗风转变的作用,文云:“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这是就盛唐诗风而言。然初唐诗风乃盛唐诗风变革之渐,上引本事说明诗重理致实始于初唐。

^① 见《宋之问集》卷一,《四部丛刊·续编》本。

^② 明周敬、周挺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盛唐以后,崇尚理致成为普遍的风气,人习以为常,因此,已不再在本事中津津乐道。

初盛唐诗歌的兴象具有不同的美学风格,以气之刚柔,境界之大小审视,诗境实有壮美和优美之分。初盛唐诗人善于创造优美的诗境,这一时期的本事诗,物景多细小明丽,动感轻微,如长空秋雁,落花明月,寒江落叶,微云疏雨,鹊飞蝉噪,竹林花塔,窗灯炉烟,等等。情感也是细微的、平静的,或从容闲适,或落寞清冷,或悲愁感伤。这些景与情都可归入优美范畴。初盛唐诗人善为优美之境,但也未始不能为壮美之境。“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两句,登高临远,写自然伟观,壮丽雄阔,气势不凡,故本事谓宋之问“讶其迻丽”。其实,全诗自属宋之问,本事以两句属骆宾王,不过借重其奇伟慷慨的诗名而已。《北梦琐言》卷七记载,孟浩然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句曾为玄宗欣赏,故事未必属实,但诗句确为警策。上句言湖上水气的蒸腾,有凌云干霄之势;下句言水面波涛的动荡,有移山倒海之力。两句境界阔大,气势壮伟,后世的诗评家因以作为唐诗壮美的范例。

初盛唐诗兼具优美和壮美两种诗境,比较而言,唐人似更推崇壮美之境。或许壮美的诗境更能表现唐人的壮阔胸怀,更能体现其伟大的时代精神。

二、气骨的追求

气骨亦即风骨,是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昂扬的情感和充沛的气势。就诗歌而言,气骨表现为境界的阔大壮伟,气势的健举飞动,语言的刚健有力,表现为壮逸或慷慨的艺术格调。对气骨的追求实始于初唐,下引本事可为例证: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凋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唐诗纪事》卷三“上官昭容”)

在本事中, 衡量沈、宋诗歌艺术水平高下的是所谓“词气”, 此之“词气”指诗歌的文气, 即贯穿诗歌首尾的气势。“词气已竭”是说沈佺期诗落句文气委靡, 势随文尽。《文心雕龙·定势》引刘桢的话说: “文之体势实有强弱, 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 天下一人耳, 不可得也。”所谓“辞已尽而势有余”, 是指文辞虽尽而仍气势充沛。以此衡量, 沈佺期诗还难称上品, 相反, 宋之问诗落句能另辟诗境, “犹陟健举”。此之“健举”指飞举的气势,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赞美东方虬的诗“骨气端翔”, “翔”即气势的飞举, 亦即刘勰所谓“意气俊爽”^①。沈、宋诗之高下即在其气势是否充沛, 可见文气在诗评中居于重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 上引《唐诗纪事》中的本事采自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 本事所谓“词气”、“健举”云云, 当是出自《景龙文馆记》本文, 属于时人的诗评观念。

沈、宋诗为应制诗, 以咏物咏事为主, 不重抒情言志。宋之问诗落句能“犹陟健举”, 主要凭借诗境的拓展及诗意的转换, 而不表现为高昂壮大的感情力量。下引本事诗则偏重抒情言志, 具有慷慨磊落的感情基调, 更能体现气骨的特征:

张宣明有胆气, 富词翰。尝山行见孤松, 赏玩久之, 乃赋诗曰: “孤松郁山椒, 肃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干, 亦生百尺条。青青恒一色, 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构, 惜哉无人招。寒霜十二月, 枝叶独不凋。”凤阁舍人梁载言赏之曰: “文之气质, 不减于长松也。”(《大唐新语》卷八)

张宣明孤松诗为咏物抒怀之作, 松之伟岸身躯及傲霜风姿喻人之美质与坚贞, 松之被弃隐含不为世用的命运, 这种礼赞与不平赋予全诗慷慨刚健的气势格调。本事引用梁载言语云: “文之气质, 不减于长松。”此之“气质”意即气骨、风骨。《河岳英灵集》卷下评綦毋潜云: “借假若人加气质, 减雕饰, 则高视三百年之外也。”^②殷璠所谓“气质”即风骨, 梁载言所言

① 《文心雕龙·风骨》。

② 据《唐诗纪事》卷二〇“綦毋潜”引殷璠语,《四部丛刊·初编》本。

“气质”与此意同。所谓“文之气质，不减于长松”，是说全诗表现的慷慨磊落的风神气骨有如蕴含坚贞之质的长松，这一形象的赞语其实揭示了“文之气质”与文之对象的同构关系。建安诗人刘桢《赠从弟》三首其二亦咏松寄怀，命意结体与此相同。钟嵘《诗品》谓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若以此语为刘桢咏松诗评语^①，则与梁载言评张宣明诗意同，移之以赞张诗，庶几近之。

对气骨的追求必然要落实到对兴寄的强调，因为气骨是一种劲健昂扬的感情力量，非有所感发，有所寄托，则无以见之。事实上，风骨凛然的诗作都寓有诗人的品格心性和思想情怀。张宣明孤松诗表现孤傲的心性和坚贞的品格，乃借物咏怀。同样为咏物诗，郭震《宝剑篇》寓托意味更为浓厚：

郭震……十八举进士，为通泉尉。任侠使气，拔去小节，尝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餉遗宾客，百姓厌苦。武后知所为，召欲诘，既与语，奇之，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诏示学士李峤等，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新唐书·郭元振传》）

《宝剑篇》一作《古剑篇》，诗叙宝剑非凡的冶炼过程，精美的装饰和奇异的色彩，叙述宝剑曾为游侠、英雄所用的非凡经历以及虽飘零沦落犹宝气冲天的奇异故事。全诗以物自喻，表现诗人优异的材质、奇伟的抱负、豪侠的性格以及不甘沦落的用世情怀。张说曾说郭震“文章有逸气，为世所重”，《宝剑篇》诗风豪放，气势逼人，如其所评。应该说，此诗之有“逸气”，源于诗人豪放不羁的磊落情怀。

既然气骨在诗中表现为劲健昂扬的感情力量，而诗中的感情又常常折射出诗人的气质品格、胸怀抱负等，那么，具有气骨的诗作常能见出诗人的个性，即所谓文如其人。另一方面，以磊落的胸怀发而为诗，必也慷

^① 何焯评刘桢《赠从弟》诗云：“此教以修身俟时。首章致其洁也；次章厉其节也；三章择其几也。‘峻骨凌霜，高风跨俗’，要惟此等足当之。”见《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慨磊落,奇伟不凡。这种文、人如一的文学现象常为本事所强调。张宣明诗本事谓“张宣明有胆气”,自然是用以说明其人气质与其诗风的关系。郭震《宝剑篇》诗本事谓郭震“任侠使气,拨去小节”,不仅作为本事故事的缘起,也是诗歌内容和诗风的直接注脚。这种由诗风溯及人品的批评方式在评价以气骨著称的诗歌及诗人时常常用到,如《河岳英灵集》卷上谓高适“性磊落,不拘小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卷下谓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都是论其文而兼及其人。可见,对于具备气骨的诗歌,唐人认为诗品与人品是一致的,慷慨磊落的诗风无非是慷慨磊落的人格的表现。

追求气骨,强调兴寄,文、人如一,这是唐人普遍的创作观念。在这一点上,明人与唐人形成鲜明对照。明代前七子的巨擘李梦阳倡言诗必盛唐,其诗模仿盛唐诗歌的气象格调,出之以豪。然而气象格调不可径求,只能“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以至“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①,因而其诗只得盛唐诗之形貌而无其精神。因为得其形而遗其神,诗中之情不能植根其心,因而所得亦不过盛唐诗歌的驱壳而已。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诗至盛唐风骨始备。就唐诗发展的大体而言,这是不错的。但盛唐诗歌变化有自,追根溯源,崇尚气骨实始于武后和中宗时期。前引郭震、张宣明诗均作于武后时期,宋之问《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诗及《灵隐寺》诗作于中宗时期。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对气骨的重视为风清骨峻的盛唐诗歌的创作作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第二节 专注境界

唐诗发展到晚唐五代,其美学追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诗歌注重咏物写景,以体物为工,以精意巧思相高,而尤显者,追求一联一句的精工奇警,诗歌创作的重点乃一变而为专注境界。

一、意境、境界与晚唐五代诗境

如果我们把“意境”看作是诗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的统一体,那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么,这一界定抽象而又宽泛的“意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在诗歌中又具有极为复杂的表现形态。不同的意境,诗人所表现的主观意识形态不同,对外物所采取的审美态度不同,审美追求也各有不同。从创作主体的隐显和物我关系的角度考察,意境可以分为以物寓情、物我冥一和虚我观物三种类型。

以物寓情即诗歌创造的艺术形象寓有诗人的情感。此类诗歌的创作源于情感的抒发,诗人在叙写事件或刻画物象、场景时,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寄寓其中,诗中物景附著诗人的感情色彩,诗人的情感借物事的刻画叙写而得以抒发,此即所谓情景交融。作为这一创作倾向和诗歌意境的理论依据的是“感物说”,“感物说”的来源是儒家乐论。《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种感于物而又形于声的“人心”,又分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六者,即音乐蕴含并表现这六种不同的情感。儒家乐论中的“感物说”为后世文论和诗论者所继承,钟嵘《诗品序》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文心雕龙·物色》谓“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都是对这种“感物说”的继承。自创作角度而言,这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在物我关系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借用刘勰的话说,就是“情往似赠,兴来如答”^①。诗人怀着特有的情感注视周围的景物,如有投赠;景物则感发诗人的创作兴致与冲动,有如酬答。这种意境的产生和创造始终伴随着情感的活动,并以情感的抒发为目的。盛唐诗歌多具有这种情景交融的意境,而且在这种诗境的创造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严羽推崇盛唐诗歌,《沧浪诗话》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一段话其实是就盛唐诗歌而言的,所谓“好诗”即是那些创造了情景交融诗境因而能“感动激发人意”的诗歌。这里,不妨举出杜甫和王昌龄的两首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

^① 《文心雕龙·物色》。

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诗镜铨》卷三《春望》)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全唐诗》卷一四三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二)

杜甫诗表现安史叛军占领两都以后诗人困于长安时的生活景况,抒写国家破灭的悲伤和亲人离别的哀愁。草木花鸟,平时本为可娱之物,然诗人见之而泣,闻之而悲,乃亡国之悲、离别之愁郁结于心,择其景其物以抒发。草木无情,人寓以情。王昌龄的边塞诗在写景寓情方面与杜甫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明人唐汝询解此诗说:“奏乐所以娱心,今我起舞而琵琶更奏新声以相乐也,然总之为离别之情。边声已不堪闻,其奈月照长城乎!入耳目者皆边愁也。末句景中含情,更惨。”^①此诗将征人思妇的离别愁思寓于边塞生活的图景,情与景浑融无迹,兴味悠长。

总之,以物寓情一类诗境是借物象、场景等表现现实的喜怒哀乐,具有鲜明的抒情色彩。

物我冥一的诗境是指主体化入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诗歌境界。此一诗境中的主体已摆脱世俗的牵累,回归自然,以自然为精神的归宿和观照的对象,投身自然,亲近自然,沉浸自然,心凝形释,与天地万物精神相通,与万化冥合。唐代隐逸诗及山水诗多具有此类诗境,如下面这两首诗:

设置守麋兔,垂钓伺游鳞。此是安口腹,非关慕隐沦。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今子方豪荡,思为鼎食人。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云霞成伴侣,虚白侍衣巾。何事须夫子,邀予谷口真。(《王右丞集笺注》卷二《戏赠张五弟迥三首》其三)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太白全集》卷二三《独坐敬亭山》)

^① 据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引唐汝询《唐诗解》,巴蜀书社,2000年,第46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唐诗解》卷二六无“末句景中含情,更惨”两句。

王维诗表现诗人摆脱世情、归依自然的隐逸情怀。“入鸟”两句借用《庄子·山木》中“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两语，全篇无我忘世、与物为一的思想情怀亦如庄生。李白诗写诗人观赏山水时凝神注目而产生的人看山、山看人的幻觉，也是充满“万物与我为一”^①的庄子精神。此类诗歌中有一个鲜明的作为主体的“我”的存在，也有明显的情感和思绪的流露，这种情思可以概括为心向自然，反朴归真，任运随缘，怡然自得，情感是恬淡平和的，超然物外，不为外物所牵，与置身现世、为物所感的喜怒哀乐之情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此一诗境的思想基础是庄子哲学。首先，庄子宣扬齐物逍遥，认为“至人无己”（《逍遥游》），主张通过“虚而待物”的“心斋”（《人间世》）和“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大宗师》）达到“吾丧我”（《齐物论》）的虚无虚静境界。此一境界庄子称为“物化”，或“物忘”，即与物相忘，物我两忘，亦即郭象所谓“体与物冥”（《齐物论注》）。物我冥一诗境中的物我关系是庄子思想在诗歌中的映现。其次，庄子主张弃绝由欲望心知而来的是非好恶之情，认为“人故无情”（《德充符》），另一方面，又认为离知去欲之心能与天地万物相通，而“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乃是“自适其适”（《大宗师》），还说“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道》）。此之“自适”、“天乐”实乃艺术的共感^②，物我冥一诗境中所流露的恬淡平和的情思正是这种艺术的共感。

虚我观物的诗境是诗人以诗歌形式对外物及人的活动的静默观照。首先，作为观照的主体，诗人处于“无意识”状态。这种“无意识”包括排除理智与逻辑，不受情绪的干扰，对外界及观照对象采取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态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直觉状态。排除理智、逻辑，不受情绪的干扰，是为了摆脱成见，扫除认识活动中知与欲的蔽障，获得用以观照外物的空明澄澈之心，从而避免对外物作出歪曲的反映，这正如澄潭印月，明镜照物，略无沉渣，映现自然的本真。当然，所谓“无意识”并非完全没有意识

① 《庄子·齐物论》。

② 徐复观认为庄子所谓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大情”实即艺术精神中的共感。详见《中国艺术精神》第二章《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庄子的再发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22页。

的活动,事实上,静默观照中有潜意识的参与,有主体的经验、记忆、心理定势等发生作用,正是这些潜意识和潜在心理构成观照万物的主观平面。其次,诗之呈现为活泼泼的自然万物和人的活动。观物主体内心的沉静并不意味着进入观照领域的万物也是一片静寂,相反,这里的自然万物总是充满生机,有不息的生命运动,有自然的灵动。诗人空明澄澈之心有如心镜,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由此得以呈现其原初本真的生机活力。这种虚我观物的诗境,可以在王维的《辋川集》中找到典型的例证: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右丞集笺注》卷一三《辋川集·鹿柴》)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王右丞集笺注》卷一三《辋川集·栾家濑》)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右丞集笺注》卷一三《辋川集·辛夷坞》)

这三首诗都写无人的境界。诗中描写的景物远离尘嚣,一切都自在自为,与人的活动了无干涉。作为诗歌的主体,诗人已淡出诗境,其思虑欲念在静默观照中消解。既无思虑的指导,亦无情感的参与,自然以其客观本真状态呈现出来。这三首诗虽然都以沉静之心观照自然,表现的也是静美的境界,但诗中不管是纷纷开落的花萼,乍起复下的白鹭,还是偶尔出现的回声,无不呈现自然的生机与灵动。

虚我观物诗境的创造既无情感的参与,也不以抒情言志为旨归,这并不意味着审美主体无所作为,也不意味着其审美旨趣的缺失。事实上,后世一些诗人不仅执着追求此一诗境,而且推为艺术的极境。应该说,此一诗境的审美旨趣是在观照万物中体认万物之情和自然之理。苏轼曾说:“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①“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②这虽是就认识论意义上的观物而言,其实可以用以说明虚

① 《苏轼文集》卷三六《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② 《苏轼文集》卷四八《上曾丞相书》。

我观物诗境的审美旨趣。前引王维诗就是这种得“万物之情”、尽“自然之理”的诗作。《鹿柴》一首前两句以人语的回响表现深山的空静,实乃吸收佛教中的意象。《维摩诘经·方便品》云:“是身如响,属诸因缘。”《弟子品》云:“所闻声与响等。”后一语僧肇注云:“未有因山响而致喜怒也。”可见,在佛教义理中,“响”即是空。诗写山中“人语响”,即表现这种佛教意味的“空”。《栾家濑》和《辛夷坞》的表达重点都在诗末一句。前一首末句写白鹭惊起高飞,继而复下,归落本处。依然飒飒秋雨,浅浅石榴,依然跳波相溅,白鹭孤栖。这里原本沉静,白鹭的惊飞打破了这一沉静,随着白鹭的归落,一切又归于沉静,正如寺院钟声,从静寂中响起,又消逝在静寂中。这种对永恒的空静的体认实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怀。《辛夷坞》末句写花的开落,开也纷纷,落也纷纷,变动不居,无住无常。清人王士禛谓“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①,正是深得旨趣的确评。

虚我观物无疑源于佛教禅宗思想,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从刘禹锡的诗论中得到说明:

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象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葩萼,而诚河之珠玑耳。(《刘禹锡集》卷二九《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引》)

这一段话讨论僧诗问题,反映诗与禅的关系。刘禹锡认为,僧人摒弃世俗欲念,常以修持入定,心地虚静,故能体察万物,创造出“翛然以清”的诗境。这实际上是将诗歌创作中的虚我观物方式与佛教禅宗作为修行的禅定方式统一起来。文中“因定而得境”、“由慧而遣词”,乃互文见义,“得境”、“遣词”皆“因定”、“由慧”。佛教讲究定、慧双修,东晋禅学大师慧远在阐述他的禅智论时曾说:“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其相济也,照不离

^① 《蚕尾续集》卷二《书西溪堂诗序》,《王渔洋遗书》本。

寂,寂不离照,感则俱游,应必同趣,功玄于在用,交养于方法。”^①将禅智落实为寂照。又谓:“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专思,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②所谓“寂照”、“专思寂想”,就是在虚静的禅定状态下观照大千世界。唐代北宗禅以“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为禅法要领,^③与慧远禅学精神相通。这一禅学观念对诗歌创作中的虚我观物方式影响最为直接。

佛教禅宗的禅定并非心灵的死寂,而是虚静状态下生命的勃发与能动。宗白华《美学散步》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能观之心如此,所观之境亦复如此。早期佛教要人求空求静,然空静不能于空静中求,大乘佛教因创非空非有的中道观,认为空寓于有。如此,则空静只能于有动中求,故佛禅所观之境乃生动活泼之境界。这种生动活泼的境界后来成为虚我观物诗境的重要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佛教所谓“观照”,就是以智慧照见事理。元沙门文才述《肇论新疏》卷中说:“观照般若,照理照事故。”^④所谓止观、定慧、寂照,就是止息妄念,契会真如,断除烦恼,深达实相。这种证悟事理的目的性对虚我观物诗境的审美旨趣也有直接影响。五代徐夔的《雅道机要》谓:“夫诗者,儒中之禅也。一言契道,万古咸知。”此一揭示是对这一影响的间接说明。

以上是对三种不同类型意境及其思想文化基础的粗略探讨。这三种不同的意境近似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我们不妨作一对照: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

①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九慧远《庐山出修竹方便禅经统序》。

② 道宣《广弘明集》卷三〇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

③ 《神会和尚禅话录》独孤沛《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页。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诸宗部二《肇论新疏》。

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

王氏所谓“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近于本文所谓“以物寓情”之境,“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中,“采菊”两句近于“物我冥一”之境,“寒波”两句则近于“虚我观物”之境。王国维的境界说虽然受康德、叔本华的美学理论的影响,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

晚唐五代诗歌多虚我观物之境。一般认为,作为此一时期诗风标志的是大量涌现的咏物写景诗,这些诗歌或诗句不以抒情言志为旨归,而以穷情写物为目的,以精意巧思相高相尚,因此,一些诗歌或诗句能极体物之工。另一方面,这些诗歌或诗句多为苦思所得。晚唐五代以苦吟为时尚,很多诗人留下了自述苦吟情状的诗句,如:“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①“平生五字句,一夕满头丝。”^②又谓“百骸同草木,万象入心灵。”^③所谓苦吟,是在凝神观照中对吟咏对象的深切体察和把握,是在体察和把握中对诗歌意象的刻意搜求,苦吟研炼是在虚静忘我的状态中进行的。不管是体物还是苦吟,都是虚我观物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晚唐五代人对基于苦吟而产生的体物精切的诗歌或诗句总是赞赏有加,甚至津津乐道。请看下引本事:

(方)干为诗炼句,字字无失。如《寄友人》云:“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齐梁以来未有此句。《咏击瓿》则体绝物理,诗人罢唱。诗曰:“白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细自轻清。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春漏丁当相次发,寒蝉计会一时鸣。从今已得佳声出,众乐无由更得名。”(《鉴诫录》卷八“屈名儒”)

方干是一位“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苦吟诗人,上引“鹤盘”两句的

① 《全唐诗》卷六四八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

② 《全唐诗》卷七一六曹松《崇义里言怀》。

③ 《全唐诗》卷七四一刘洞《夜坐》。

研炼在于频繁使用的动词。上句“盘”字写飞鹤的凌空盘旋,颇得从容悠游的风姿仪态;“投”字状飞鹤的滑翔降落,颇见自上而下的动感飞势。下句“曳”字谓鸣蝉飞动时身去声随,声逐身飞,正是感觉中应有的错觉。“过”字状鸣蝉飞动的迅疾、轻敏,正如杜诗“身轻一鸟过”中的“过”字,为传神之笔。两句四用动词,极体物之妙。这两句是方干《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中的颌联。此诗描写旅居生活,首尾微露羁旅愁绪,但“鹤盘”两句纯为体物写景,不以抒情言志为依归。后引《咏击瓿》一首,也以体物为宗,略无兴寄。宋人蔡居厚谓“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①,即此之谓。

其实,前引方干诗歌和诗句的好处也并不在于抒情言志,而是在于“体绝物理”。晚唐五代诗歌,特别是咏物写景诗,以体物精切为时尚,穷自然之理,尽万物之情,以切理为工,以理致取胜。此一特点前人多有论及,如谓唐末诗“理致可宗”^②，“五代诗格卑弱,然体物命意亦有工夫”^③,又谓“诗至晚唐,思致新颖,务极精巧”^④。这种理致、思致,有时又称为“精意”、“细意”、“巧思”等。诗重“切理”的倾向或肇自初唐,《朝野佥载》卷二记载:

国子进士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

诗歌用“始”还是用“转”,是对事理的体察研讨,而无关乎情感的抒发,即所谓“切理”。此之“切理”与以兴象创造为目的的初盛唐诗歌中的“惬理”有所不同。初盛唐一些兴象玲珑的诗歌也讲求理致、思致,但那主要

① 《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引《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②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

③ 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丁仪《诗学渊源》卷八,《民国诗话丛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表现为一种情思,一种人文情怀。如果说初盛唐诗之“惬理”是惬合“情理”,那么,晚唐五代诗之“切理”则是切合“物理”。

此外,晚唐五代诗中的理致与王维虚我观物诗中的理致也有所不同。王维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极深,一些诗歌着力表现自然的空寂,明显受佛教“空”观的影响,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晚唐五代诗歌则更多形而下的关注,所谓穷理尽情,多表现为对具体的事物情态的体察和认识,并不上升为形而上的、抽象的认识,属于“个别的理”。

晚唐五代诗境多属虚我观物一类,虚我观物诗境又受佛教思想影响,佛教谓心之游履攀援者为境界,因此,晚唐五代诗中虚我观物一类诗境本文称之为“境界”。

二、切理与反常

一般来说,诗歌的“切理”是指符合通常的感觉经验和心理预期,不违背常情常理。前文所引方干诗多是,这样的本事诗尚可撮要引述如下:

范摅处士有子七岁,作隐者诗云:“扫叶随风便,浇花趁日阴。”方干闻之曰:“此可入室。”(《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四引《郡阁雅谈》)

潘天锡员外与沈郎中,宅相邻,同游古观分题。天锡云:“风便磬声远,日斜楼影长。”沈彬云:“松欹晚影离坛草,钟撼秋声入殿风。”(《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三引《郡阁雅谈》)

初,(孟)宾于入江南,生子名曰归唐,少亦能诗,就庐山国学,遂得《瀑布》诗云:“练色有穷处,寒声无尽时”。邻房儒生亦得此联,遂互诵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以全篇意势定之,而归唐较胜。(龙衮《江南野史》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宜春王从谦,嗣主第九子……嗣主尝于苑中与宰相弈,而从谦侍侧,嗣主命之赋观棋诗,乃援笔立赋曰:“竹林二君子,终日意沉吟。相对终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终有失,守分固无侵。若算机谋处,沧溟犹未深。”嗣主览之惊叹,令颁示百寮以为规诫。士流争写,纸价涌于建康。(龙衮《江南野史》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引本事中的诗歌或诗句均以境界胜，都体物工巧，思致深婉。“扫叶”两句是说隐者扫叶浇花顺随自然条件，得便而为。这虽是写隐者闲适的隐居生活，但也隐含着另一层深意：其实，人类的一切活动又何尝不是顺应自然、凭借自然条件的。只是两句就事论事，并未由个别及于一般，因此此一深意隐而未彰，只能由读者体悟，不像宋诗，写过之后常继以议论，说出一番大道理。试将宋人诗句，如“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②，“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③等，与此两句作一对照，即可明了唐诗与宋诗虽都追求理致，但诗风究有不同。潘天锡诗“风便”两句写景有幽致遐思，所写现象之间具有因果相续的联系——磬声远播乃因风的吹送，伸展的楼影出于斜阳的残照。在景象描写中不难见出这种似不经意的思致。孟归唐《瀑布》诗一联亦得体物之妙。以“练色”喻瀑流，以“寒声”状喧响，精工贴切。而且谓瀑布之音出自瀑流下落激起的巨大声响，体察亲切，非身历者不能道。不仅如此，诗曰“有穷”、“无尽”，谓“有穷”生出“无尽”，似有一层尚未明言的思理。李从谦《观棋》诗以体物深切、诗思巧妙取胜，虽为咏物诗，却能由事悟道，颇得人情物理。此诗在描写中杂有议论，如“恃强终有失，守分固无侵”两句，说理较为直露，与前引宋诗无异，则其诗虽曰唐音，已染宋调。

唐人在感受和表现外在世界时，并不满足于通常的浅层的感觉经验和平面式照像，而是将感觉引入更深的心理层次，对事物作曲折的，甚至变形的反映。唐诗本事中有一些表现错觉和幻觉的诗例：

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又“扫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唐摭言》卷一〇）

李洞，唐诸王孙也，尝游两川，慕贾阉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

①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四《登飞来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苏轼《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七《题西林壁》，《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观书有感》，《四部丛刊·初编》本。

神。洞为《终南山》诗二十韵，句有：“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泾。”复曰：“鬬竹烟岚冻，偷秋雨雹腥。远平丹凤阙，冷射五侯厅。”大约全篇得唱。……复曰：“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时人但谓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惟吴子华深知之。（《唐摭言》卷一〇）

李涛诗“扫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两句写错觉。扫地本为扫除落叶残枝等，而曰“树留影”，则似欲连树影一并扫之，这是由树影的斑驳凌乱生出的错觉。琴因拂拭七弦而得奏，今谓“拂床”而“琴有声”，乃出幻觉。李涛的诗风，除僻涩外，还有奇峭的一面。奇峭的诗风有时是通过错觉、幻觉表现的，如上引“鬬竹烟岚冻”、“冷射五侯厅”两句，“冻”字以喻云烟的凝聚不动，“射”字以喻寒冷的侵入，均以幻觉表现另类感受，表现事物的变异形态，有力透纸背的艺术力量。“药杵”两句写迷离仿佛的感受，交织着错觉和幻觉。此外，《唐摭言》卷一〇所引贾岛与周贺的吊僧诗，诗风相近，意象亦多近似者，其中“焚却坐忘身”与“地燥焚身后”两句，造语命意如出一辙。对于前一句宋人多有误解，《六一诗话》谓“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所谓“烧杀活和尚”，正是诗句着意表现的错觉。宋人拘于字面，未明就里，所评未免失于轻率。

这种凝神观照中稍纵即逝的错觉、幻觉有时表现为通感现象，如下列本事中的诗句：

合肥李郎中群，始与杨衡、符载等同隐庐山，号“山中四友”。……杨衡后因中表盗衡文章及第，诣阙寻其人，遂举，亦及第。或曰：见衡业古调诗，其自负者，有“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颇愤怒，既而问曰：“且‘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唐摭言》卷二）

“鹤声”本诉诸听觉，“飞”本诉诸视觉，谓“鹤声”能“飞”，这是听觉与视觉的互用。当日送飞鹤、唳声传来之际，你会感到声逐鹤影一齐向着远处的天空，声音飞动的错觉是不难体察的。此外，前引方干诗“蝉曳残声过

别枝”一句,“曳”本诉诸视觉,而以诉诸听觉的“残声”为其动作对象,也是运用通感的显例。

通感在道家和佛教典籍中多有论及。如《列子·黄帝篇》说:“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成唯识论》卷四云:“如诸佛等,于境自在,诸根互用。”由此论述可以看出通感的产生乃是凝神专注的结果。其实,其他错觉与幻觉又何尝不是凝神专注的产物。

苏轼在品评柳宗元《渔翁》诗时曾有一句颇具理论意味的评语,他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①反常而能合道,这也正是上述表现错觉、幻觉以至通感的诗歌所具有的美学特质。

三、推敲一字

晚唐五代崇尚苦吟,注重字句的锤炼,其中推敲一字以求境界的创作倾向尤为突出。唐人诗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②,“一个字未稳,数宵心不闲”^③,“道出千途外,功争一字新”^④,“千篇未听常徒口,一字须防作者心”^⑤,可见唐人推敲一字现象极为普遍。经推敲锤炼而能振起一简的关键字通常称为“字眼”,宋初僧暹所撰《处囊诀》就已注意到唐人诗中“字眼”:

诗有眼。贾生《逢僧》诗:“天上中秋月,人间半世灯。”“灯”字乃是眼也。又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敲”字乃是眼也。又诗:“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分”字乃是眼也。杜甫诗:“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移”字乃是眼也^⑥。

文多例举贾岛诗句。至于杜甫诗句,后来黄庭坚说“拾遗句中有眼”^⑦,与

① 惠洪《冷斋夜话》卷五。

② 《全唐诗》卷七一五卢延让《苦吟》。

③ 《全唐诗》卷七九六录自徐寅《雅道机要》。

④ 《全唐诗》卷八四一齐己《赠孙生》。

⑤ 《全唐诗》卷八四五齐己《送吴先辈赴京》。

⑥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

⑦ 《山谷诗集注》卷一六《赠高子勉四首》其四。

此一脉相承。这种推敲一字追求“字眼”的风气必然反映到本事中来,因此,唐诗本事中多有此类故事。除“推敲”故事外,还有下列“改字”和“一字师”的故事:

僧齐己往袁州谒郑谷,献诗曰:“高名喧省闕,雅颂出吾唐。叠嶂供秋望,飞云到夕阳。自封修药院,别下着僧床。几话中朝事,久离鸳鹭行。”谷览之云:“请改一字,方得相见。”经数日再谒,称已改得诗,云:“别扫着僧床。”谷嘉赏,结为诗友。(《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郡阁雅谈》)

张迺少年苦吟,未有所得;梦五色云自天而下,取一团吞之,遂精雅道。有《寄远》诗曰:“锦字凭谁达,闲庭草又枯。夜长灯影灭,天远雁声孤。蝉鬓凋将尽,虬髯白也无?几回愁不语,因看《朔方图》。”携卷谒齐己,点头吟讽无敎,为改“虬髯黑在无”,迺遂拜作一字师。(《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郡阁雅谈》)

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陶岳《五代史补》卷三“僧齐己”)

僧岛云过盱江麻姑山,题绝句云:“万叠峰峦入太清,麻姑曾此会方平。一从燕罢归何处,宝殿瑶台空月明。”先作“自从”,后于同辈举似,同辈云:“诗固清矣,然‘自’字未稳,当作‘一’字。”云服其言。暨再入山,已为人改作“一从”矣。亦可谓一字师。(赵与峕《娱书堂诗话》卷下)

《唐音遗响》所载任翻《题台州寺壁》诗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有观者取笔改“一”字为“半”字。翻行数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则见所改字,因叹曰:“台州有人。”予闻之王古直云。(李东阳《麓堂诗话》)

李建州频,与方处士干为吟友。频有《题四皓庙》诗,自言奇绝,云:“东西南北人,高迹此相亲。天下已归汉,山中犹避秦。龙楼曾作客,鹤氅不为臣。独有千年后,青山庙木春”。示于干,笑而言:“善

则善矣,然内有一字未稳。‘作’字太粗而难换,‘为’字甚不当。千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请改作‘称’字。”频降伏,而且惭愧前言之失。乃曰:“圣人以一字褒贬,此其明矣。”遂拜为一字之师。(《永乐大典》卷九二二引陈纂《葆光录》)

以上本事不仅反映了唐人在推敲一字时对诗歌境界的追求,而且表现了这一追求的审美特征,即追求蕴含,追求切理,追求新异。

所谓追求蕴含,就是用字讲求动作性,就是追求叙事的丰富与充实,追求戏剧效果。贾岛诗句“僧敲月下门”,据《鉴诫录》等记载,“敲”字初欲作“推”,贾岛踌躇未定,遇韩愈而定为“敲”。此一公案古今论者多矣,然似未深得“敲”之优长。今据诗意推究起来,“推”字所表现的动作较为单纯,“推”谓推门而入,仅此而已,很难想象由此动作可能产生的其他行为,因而缺乏想象的空间。“敲”字则具有丰富的潜台词。既有敲门,则必有应门,应门询之以声,又继之以开门,然后主客相见晤谈。这一系列行为、场景由一“敲”字不难想见。“敲”的好处在于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在于丰富的蕴含。同样,齐己诗句“别下着僧床”中“下”字易为“扫”字,也是出于此一追求。“下”字在句中动作性不强,因为下床待客是一个简单而平常的动作,“下”字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易以“扫”字,则诗境一新。有扫床必先有“下”床,由“扫”字可想见客人来访、主人盛情相待这一活动过程及具体情景,“扫”字更有动作性,对于生活场景更具表现力。

宋人为诗,下字多用动词,以动词为健字,或突出意象的动作性。如:“潘邠老云:‘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①以动词为“响”字。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一记载:“公(王安石)尝读杜荀鹤雪诗云:‘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惟闻拆竹声。’改云宜作‘禽飞影’、‘竹拆声’。又王仲至试馆职诗云:‘日

^① 《诗人玉屑》卷六引《童蒙诗训》。

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公又改为‘奏赋《长杨》罢’，云：‘如此语健。’”强调意象的动作性。这一创作倾向当是受唐人用字讲求动作性的影响。德国完形心理学家阿恩海姆说：“不管对象本身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只有当它们的视觉式样向我们传导出‘具有倾向性的张力’或‘运动’时，才能知觉到它的表现性。”^①所谓“具有倾向性的张力”即“方向性张力”(directed tensions)，指向一定方向发展运动的空间活动。静者出之以动，动者更赋予持续的“方向性张力”或“运动”，这或许正是艺术的本质。

切理作为境界创造的重要内容，在一字推敲中表现尤为显著。推敲一字往往着眼于是否切合事理。齐己《早梅》诗原作“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两句当为纪实，但就“早梅”立意，则意有不足，因为“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易“数”为“一”，更切事理。方干谓李频诗“鹤氅不为臣”中“为”字不当，乃是基于传统的君臣观念。根据《诗经》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四皓无论怎样高蹈远避、不尽臣仪，都不能摆脱为臣的名份，因而“不为臣”于理有失。作“称”字则既可见其高蹈情怀，亦不违理。任翻题台州寺壁诗题作《宿巾子山禅寺》^②，“前峰”一句写月下水景象。既曰“前峰月照”，则其时月自前峰升起。月光下临，一部为山峰遮蔽，另一部映照江上，月夜所见乃“半江水”。任翻《三游巾子山寺感述》谓“惟有前峰明月在，夜深犹过半江来”^③，为同一景象。作“一江水”既与事实不合，也不切理。由以上本事可见，唐人在推敲一字时常以切理为得。在唐人看来，研求一字实与体察外物、探究事理密不可分，一字得则理合，一字失则理乖。晚唐五代诗既以体物为工，讲求理致，则精研一字以切事理必然成为此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

追求新异主要表现为语言及意象的求新求异。韩愈所谓“六字常语一字难”^④，齐己所谓“功争一字新”，其意在此。以前文列举的本事诗为

① (美)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6页。

② 见《全唐诗》卷七二七。

③ 《全唐诗》卷七二七。

④ 《全唐诗》卷三四二。

例,僧岛云(繆岛云)诗句“一从燕罢归何处”中“一从”原作“自从”,“自从”乃寻常语,本事谓“‘自’字未稳”非谓用“自”字不准确,而是“自”字过于平常。相反,“一从”则生新异样,不落俗套。张迥《寄远》诗中“虬髯白也无”句也是表现常人心理的寻常语言,“虬髯黑在无”句虽仅有个别改动,但将鬓发衰凋时人对衰老的叹息一变而为对少壮盛年的留念与珍惜,具有反常的心理指向,因而奇警不凡,感觉一新。此外,《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青琐后集》记载,王贞白作《御沟》诗,句有“此波涵帝泽”,后与齐己改为“此中涵帝泽”。“此中”一语或许并不新异。但“此波”却是过于寻常拙实的词语,此一改动无疑显示诗歌创作力避常俗语言的倾向。中唐时期,韩孟诗派诗风怪奇,诗歌在意象构成和语言运用上力求生新怪异,晚唐五代诗歌追求一字新异的倾向或许受此影响。但不同的是,韩、孟等人的诗歌语言有时不免生涩冷僻,而晚唐五代诗歌的一字新异则止于异乎常语,并未滑入生涩冷僻一路。

推敲一字除具有上述创作追求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唐诗就境界的创造方式而言,可分为写境和造境两类,二者的区分,择其要者,一为即景写实,一为想象虚构。关于造境,唐人已有言及。皎然说:“如何万象自心出,而心澹然无所营。……吟眺方知造境难,象忘神遇非笔端。”^①在唐人那里,所谓“造境”乃心造之境,万境的产生出于心的作用,即“万象自心出”。因为境由心生,唐人将能生之心称为“心源”,如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②,“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之本,雕砻群形”^③,“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绁”^④,于是,诗歌创作视为心源的涌动和汲引。另一方面,造境被理解为虚构之境,与即景写真有所不同。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对玄真子张乐作画有过一段极生动的描述,文云:“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大历九年秋八月,讯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崕以缣帛请焉,俄挥洒,横拖而纤纤霏拂,乱抢而攒毫雷驰。须臾之间,千

① 《全唐诗》卷八二—《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

②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〇。

③ 《刘禹锡集》卷一九《董氏武陵集纪》。

④ 《全唐诗》卷五七一贾岛《戏赠友人》。

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眙。”^①则玄真子所画由闭目遐想而来,非即景即真所得,皎然所谓“造境”即此。当然,造境中的虚构并非完全脱离现实,而是以过去的印象、经验为基础。

晚唐五代诗中的推敲一字多为写境,但也不乏造境,如“僧敲月下门”、“别下着僧床”、“昨夜一枝开”等,并不是写真实的景象,而是遵从其所树立的艺术法则,写心造之境。当然,此类造境遵循现实的原则,与韩、孟诸人驱遣鬼神,着意表现虚荒诞幻的超现实境界有所不同。对于贾岛作“僧敲月下门”一句,清代王夫之曾不以为然,《薑斋诗话》卷二云: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王夫之认为,诗歌创作应“即景会心”,“因景因情”,在对现实的直接观照中摄取诗歌意象,反对妄想揣摩,即离开当时情景的虚构遐想。王夫之将以上创作原则称为“禅家所谓现量”,根据王夫之对“现量”的解释,“‘现’者有‘现在’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②。“不缘过去作影”是说诗歌意象不是建立在过去印象、经验的基础上。但是,在晚唐五代诗人看来,“缘过去作影”正是诗歌造境的基本法则。

第三节 追求趣味

此之“趣味”即昔人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所谓“趣”。旧题王昌龄所撰《诗中密旨》说:“诗有三得,一曰得趣,二曰得理,三曰得势。得趣一。谓理得其趣,咏物如合砌,为之上也。诗曰‘五里徘徊鹤,三声断续猿。如

① 《全唐文》卷三四〇。

② 《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相宗络索·三量》,岳麓书社,1992年版。

何俱失路,相对泣离罇’是也。”明人高启谓“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①,谢榛谓“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②。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〇有“诗趣”一目,下列“天趣”、“奇趣”、“野人趣”、“登高临远之趣”四条。可见,“趣”是诗歌重要的审美范畴,唐时已经成为自觉的审美意识。这一自觉源于唐人对诗趣的普遍追求。唐诗重趣味,表现形态各异,其中追求谐趣和奇趣最为普遍,也最为重要,这一点可以唐诗本事进行说明。

一、俳谐戏谑的诗风

唐诗中有“戏题”、“戏赠”一类诗,《全唐诗》收有约三、四百首。又有嘲戏一类诗,《全唐诗》卷八六九至卷八七二所收谐谑诗 170 余首属于这一类。这两类诗体现了唐诗俳谐戏谑的诗风,而后一类多出于唐诗本事。前文已述,唐诗本事中有嘲戏一类故事,乃本事之大宗,嘲戏类诗实多出于此类故事。此类诗歌,就其内容和风格而言又有诙谐与讥诮之分。

诙谐一类诗虽意在嘲戏,但内容不是揭露对象的缺点,示其丑陋与恶劣,而是并无恶意的玩笑,风格近于幽默。此类诗歌常以机智的语言、巧妙的构想和幽默的谈吐取胜。

诗歌最重语言的表达,语言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机智的语言及巧妙的表达往往令人解颐启颜。如下列本事诗:

则天朝,诸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则天尝问张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对曰:“朱前宜着绿,录仁杰着朱。闻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扬吾。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授别敕。(《大唐新语》卷一三)

先柳子厚在柳州,吕衡州温嘲谑之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云溪友议》卷

① 《高太史凫藻集·独庵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

中“南黔南”)

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于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驰骑迎之。诗曰:“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

大中元年,魏扶知礼闱,入贡院,题诗曰:“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及榜出,为无名子削为五言以讥之。(《南部新书》戊)

上引本事诗,或利用字词的音同音近,或利用一字多义,或颠倒字词翻韵,或删削词语改诗,总之,借助语言本身的表达特点及表现能力,构成一种既机智巧妙又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这些诗歌所独有的幽默风格主要不是取决于其中的思想内容,而在于异乎寻常的语言运用所产生的机趣,因而此类诗歌具有明显的以文字为诗的倾向。

巧妙的构想是说此类诗歌的创作有一个明显的由此及彼的联想过程,此一联想通常是同类联想,具有类比性质,因此,比喻成为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如下列本事诗:

李汤题名于昭应县楼,韦蟾睹之,走笔留谑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唐摭言》卷三)

(杨收)十三,略通诸经义,善于文咏,吴人呼为“神童”。……每良辰美景,吴人造门观神童,请为诗什,观者压败其藩。收嘲曰:“尔幸无羸角,何用触吾藩。若是升堂者,还应自得门。”(《旧唐书·杨收传》)

朱贞白^①,江南人,不仕,号处士,善嘲咏,曲尽其妙。……建师晦之子得诚罢管沿江水军,掌禁卫,颇患拘束,方宴客,贞白在坐,食蟹,得诚顾贞白曰:“请咏之。”贞白曰:“蝉眼龟形脚似蛛,未曾正面

^① 朱贞白,原作“李贞白”,误。朱贞白事迹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三引《杨文公谈苑》。

向人趋。如今钉上盘筵上,得似江湖乱走无?”众客皆笑。(《诗话总龟·前集》卷二〇引《谈苑》)

第一首诗由李汤仅有题名而无题诗的事想到项羽发出的“书足以记名姓而已”那样的鄙薄读书的怪论,第二首诗由观者压败篱藩想到《周易》所记“羝羊触藩”的情景,第三首诗由盘中之蟹想到建得诚罢管水军以后拘束难耐的情形。这些联想均为拟喻性的同类联想,但是,事件的主体完全异质,即人与动物完全不同,饱学的才士和不学的武夫完全不同。这些不同通过巧妙的联想和贴切的比喻构成巨大的不协调,从而产生滑稽之感。这种审美感受不是借助直接呈现的观感,而是通过巧妙的构想形成的。这些巧妙的构想当然出于机智与学养,机智、学养正是此类幽默的底蕴与品格。

生活中有很多幽默的谈吐,内容涉及世俗生活,语言多是俚语俗语。唐人将此类幽默的谈吐引入诗歌,以俗为雅,形成一种世俗化、平民化的幽默诗风。如下列本事诗:

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内宴,中宗命群臣撰词。日用曰:“台中鼠子直须谄,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啗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若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中宗亦以绯鱼赐之。(《本事诗·嘲戏第七》)

晋宋以还,尚书始置员外郎分判曹事。国朝弥重其迁。旧例:郎中不历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有似长征兵士,便得边远果毅也。景龙中,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贺遂涉时为员外,戏咏之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谁言粉署里,翻作土山头。”(《大唐新语》卷一三)

开成中,户部杨侍郎汝士检校尚书镇东川,白乐天即尚书妹婿。时乐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戏代内子贺兄嫂曰:“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又曰:“金花银碗饶兄用,罨画罗裙尽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唐摭言》卷一五)

上引本事诗都是以言谈为主体的调笑语。崔日用《乞金鱼词》依酒令格式而作,却完全是一篇乞官邀赏的说辞。辞令援引俚俗语言,滑稽幽默,无非以动人主之心。贺遂涉咏赵谦光迁郎中诗因化用民间俗语而具有调笑性质,也是本于言谈。白居易戏代内子贺兄嫂诗完全模仿人物的言谈口吻,诗歌虽频繁用典,有文人诗的特点,但所言多为俗事,语言不避俚俗,且口吻毕肖,令人忘其为诗。幽默的谈吐植根于世俗生活和世俗心理,以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为背景,因而此类诗歌的诙谐风格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与诙谐一类诗有所不同,讥诮一类诗意在揭示对象的丑陋、缺失、弱点,以至荒唐、恶劣等,或出以讥笑贬损,或寓有讽刺批判,具有鲜明的否定意义。

一些诗歌讥嘲他人身形体貌及生理缺陷,或以此互嘲。如《大唐新语》卷一三及《本事诗》记载长孙无忌与欧阳询互嘲形貌丑陋,《云溪友议》记载的崔涯、李宣古、杜牧等人的嘲妓诗,都是讥诮妓人身形的丑陋和面貌的丑恶。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后世多以为忌讳,唐人却能坦然以对,并引为笑谈。如下列本事诗: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举,放进士二十九人。时崔嘏舍人与施肩吾同榜。肩吾寒进。为嘏瞽一目,曲江宴赋诗,肩吾云:“去古成段,著虫为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唐语林》卷六)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鲙。只见手臂着襦,未见口唇开袴。”一座大笑。(《唐摭言》卷一三)

两则笑谈以人之痛苦与不堪为笑柄,属于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此类诗歌多于宴集时作。唐人宴集,或作酒令,或赋诗篇,常以谑戏为内容,此类诗歌今已存世不多,但依时风推测,其创作是十分普遍的。

还有一些诗歌讥诮他人的失误或弱点,前者是一些偶然的缺失,或一

时的迷误。《唐摭言》卷八记载,郑薰主文时,误以颜标为颜真卿之后而放其及第,时人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南部新书》庚记载,御史阎敬爱宿濠州高塘馆,而题诗用高唐神女故事,时人诗有“高唐不是这高塘”、“差参笑杀楚襄王”等语讥诮。此类失误的滑稽感不仅在于其有悖常识常理,而且在于由此产生具有戏剧性的后果,此一后果使先前失误放大,从而产生一种鲜明的倒错和巨大的不协调。

诗中讥诮的弱点通常是人性的弱点。如《本事诗》记优人作《回波词》以讥唐中宗惧内,《云溪友议》卷上记朱泽作诗嘲笑郭凝素步王轩后尘,题诗希艳,乃东施效颦之举。同类诗歌还见于下列本事:

王团儿,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为假母,有女数人。长曰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变化年溺惑之,所费甚广。尝题记于小润髀上,为山所见。赠诗曰:“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北里志》)

唐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岁卷轴怠于装修。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浹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奶姬辈怪骂腾沸,尽要掴其面。(《北梦琐言》卷一〇“李昌符咏婢仆”)

诗中所讥诮的行为在诗人看来是荒唐的,悖于常情的,或虽司空见惯,却是可鄙可笑的。这些行为植根于普遍存在的人的心理,因此,诗歌讥诮的对象其实极为普遍,也超越了具体时代的限制,由此而言,此类诗歌中的人物具有明显的典型性。

以上讥诮多为一时笑谈,内容无关宏旨,所谓讥诮,也多是善意的调侃,并无恶意的攻击。如果讥诮的内容属于政教道德,则讥诮之中多隐含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具有社会批判性质的讽刺诗即由此产生。讽刺诗大多抨击弊政,揭露官僚的贪酷腐朽和昏庸愚陋,如下列本事诗: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鹭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朝野僉载》卷四)

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掠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掠几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獭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镗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朝野僉载》卷二)

唐景龙中,洛下霖雨百余日,宰相不能调阴阳,乃闭坊市北门,卒无效,谤溢至甚。人歌曰:“礼贤不解开东阁,燮理惟能闭北门。”(《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七引《朝野僉载》)

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确确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南部新书》甲)

第一首本事诗讥讽则天朝任官之滥,第二首指斥地方官贪暴不法,第三首讥议执政者不能选贤任能,临事悖谬,第四首嘲讽晚唐四相贪赃纳贿,不问朝政。此类针砭时政的讽刺诗在晚唐五代似更为流行。《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所录郑愚诗,《鉴诫录》卷四“蜀门讽”、卷一〇“归生刺”所录蒋贻恭、归处讷等人诗多属此类政治讽刺诗。此外,晚唐诗人郑綮还以善为讥刺时政的“歇后体”诗而为世所知。《旧唐书·郑綮传》记载:“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光化初,昭宗还宫,庶政未愜。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中人或诵其语于上前。”由此记载可知,所谓“郑五歇后体”,一是怨刺时政,二是诗风诙谐。“歇后体”常用以嘲戏,《启颜录》中有两则这样的“千字文嘲”:

唐封抱一任栎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作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

何劳罔谈彼。”(《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

一人患眼侧睛及翳,一人患鼯鼻,俱以《千字文》作诗相咏。鼯鼻人先咏侧眼人云:“眼能日月盈,为有陈根委。”患眼人续下句:“不别似兰斯,都由雁门紫。”(《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引)

这两则“千字文嘲”套用《千字文》中的成语,采用歇后格的修辞手法。如第一首诗用《千字文》中四句“天地玄黄”、“雁门紫塞”、“左达承明”、“罔谈彼短”,四句诗用歇后格分别隐含“黄”、“塞”、“明”、“短”四字,诗嘲过客面黄鼻塞,眼无明而身材短。冯梦龙《古今谭概·文戏部》称为“千字文歇后诗”。后一首的艺术手法与第一首相同。这种诙谐嘲戏的风格也是“郑五歇后体”的特点。郑紫的讽刺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不仅因为诗风诙谐,更在于其指陈时弊。郑紫后来因诗位至宰相,可以说明此类诗歌在当时的政教意义。

讽刺诗的另一个内容是揭露道德的缺失和人格的分裂,如下列本事诗:

朱贞白……尝谒一贵公子,不甚礼,厅有一格子屏风,题其上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浑身总是眼,还解识人无。”(《诗话总龟·前集》卷二〇引《谈苑》)

任谷富有经术,隐居于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轮,乃躬到京访知己,有朝官戏赠曰:“云间应讶雁书迟,自到京中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后至补袞。(《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八引《幽闲鼓吹》)

又《鉴诫录》卷六“旌论衡”记载,“武成中,东川昌明县玄士李怀杲,聚盗构逆,寻亦受诛。普通山青州长老录二尼道姑、道媪,亲事巾瓶,时左街使集王宗翰奏闻收勘,决递遐方”。僧光业、道杨德辉各为诗互嘲,“非独取笑,理在其中”。此外,《刘宾客嘉话录》还记载刘师老因落职失据而为无名氏所嘲的故事。这些诗歌对人物的讽刺主要基于社会普遍遵从的道德原则,表现为一种道德评判。此之道德,有儒家的伦理道德,有佛道的清

规戒律,有社会树立的品格节操等,意义较为广泛。

嘲戏一类诗由单纯取笑向讽刺文学发展有以下原因:一是引入政教、道德的内容。这一内容的变化使嘲戏讥诮不再是单纯的笑谈,而成为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社会批评。所谓“非独取笑,理在其中”,引而申之,是指讥诮之中寓有鲜明的政治是非和道德善恶,有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此类诗歌不贵取笑于一时,务求教化于当代,对社会生活取严肃的干预态度。讽刺文学得以成立的另一原因是对怨刺的诗歌传统的继承。孔子论《诗》,认为“诗可以怨”,所谓“怨”,据伪孔传解释,是“怨刺上政”。唐人诗歌创作秉承这一儒家诗学传统,注重诗歌对社会及政治的批判意义。嘲戏中原本含有近于怨刺的讥诮成份,随着政教、道德内容的引入,“诗可以怨”的文学传统得以继承延伸,单纯的讥诮演变而为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怨刺,善意的嘲笑也为批判的锋芒所取代。由此可见,正是戏谑与怨刺这两大文学传统相遇与整合,讽刺文学才得以产生,也正是这一整合,讽刺文学得以形成寓庄于谐的艺术风格。抨击社会,批判现实,并不一味剑拔弩张,锋芒毕露。怒骂寓于嘻笑之中,绵里藏针,攻守自如。中国古代臣谏君时讲究“主文而谲谏”,以求委婉动听。其实寓庄于谐的讽刺手法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又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批评的“谲”术。

包括讽刺诗在内的讥诮一类诗表现手法多样,富有特点,其中漫画的笔法和写实的手法最为引人注目。

漫画的笔法是用一种变形的形式描述对象,揭示对象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作者常常选取对象的某一方面着意刻画,以突出对象的特点,给人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这种描述采用变形的形式,诗中描述的形象与人们观念中普遍认同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由此构成的不协调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滑稽感。《朝野僉载》卷二记泽州百姓嘲其都督王熊贪酷愚暗,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癩獬。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卷四记军中嘲儒将李敬玄、王杲、曹怀舜云:“姚河李阿婆,鄆州王伯母。见贼不能斗,总由曹新妇。”两则讽刺歌谣中,人物形象均以变异形式出现。前者以动物拟人,后者以情性相反形象为喻。这种具有讽刺批判意味的漫画笔法又可称为“丑化”。

讽刺文学中的“丑化”常借用夸张的手法,讽刺诗也不例外。唐本事诗中,这种夸张常用以嘲笑人的身形体貌。如《云溪友议》卷中记崔涯嘲妓李端端云:“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李宣古《赠崔云娘》诗云:“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怕肩侵鬓,唯愁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杜牧《赠肥录事》诗云:“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裈。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报乐坤。”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云:“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这些诗中,人物身形体貌的缺点被有意夸大,所谓夸张,是将人物的某一特征放大,这种近乎极端的夸张是漫画笔法最典型的形式。

与漫画的笔法相比,写实的手法显得客观、含蓄,甚至不动声色。这种手法只是将人物的言行、心理如实写出,要求叙事的真实性和细节的准确性。如前引李昌符嘲婢仆诗,对婢仆的言行有精到具体、富有特征的描述,细节描写准确传神。前引《鉴诫录》中光业嘲道门、杨德辉嘲僧门诗,大抵本于事实,为实录。《诗话总龟》所引《幽闲鼓吹》中,朝官戏赠任谷诗也只是对讽刺对象的行事与心理作如实的描写和刻画。这种写实的手法并不妨碍讽刺意味的表达。有时作者选择对象富有特征的某一方面细致刻画,传神的刻画能勾魂摄魄,往往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有时作者运用对照的方法。这种对照,有的表现讽刺对象自身现象与本质的悖离,如光业嘲道门、杨德辉嘲僧门诗,揭示佛道理想、规范与对象恶行恶德之间的矛盾,赠任谷诗表现隐居山林的清高与热衷功名的世俗之间的矛盾。有的表现此一现象与彼一现象的反差,如景龙中人嘲宰相诗,将前人的选贤任能与时宰的昏聩无能加以对照,《刘宾客嘉话录》所引无名氏讥消诗,将穆寂的迁升与刘师老的落选加以对照。这种对照所产生的不协调也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

写实手法所讽刺的对象多为习见但又常为人们所忽略的人和事。讽刺之得以成立,在于作家洞彻肺腑的独到眼光和勾魂摄魄的笔力。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

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①这一段话可用以说明写实性的讽刺诗具有讽刺意味的根本原因。

讽刺诗在内容上常是尖锐深刻的,但在艺术表现上又讲究委婉含蓄,一些修辞手法,如谐音、隐喻、双关、反语、歇后语等,在此类诗中广泛运用。举例来说,《南部新书》所记时人讥嘲曹确等四相诗,用人名谐音;《大唐新语》卷一三所记裴略嘲丛竹及屏墙以讥温彦博狭隘妨贤二诗,采用隐喻;《诗话总龟·前集》所录朱贞白咏格子屏风以责贵公子傲慢少礼的诗,语出双关。又《唐摭言》记载:“光启中,蒋蟠以丹砂授善和韦中令。张鹄,吴人,有文而贫^②。或刺之曰:‘张鹄只消千驮绢,蒋蟠唯用一丸丹。’”乃用反语。此外,前文所述郑紫歇后体诗用歇后语。运用这些修辞手法的讽刺诗,虽语含讥刺,但不显言直斥,形成多讽而婉的艺术风格。上述修辞格在讽刺诗中运用最为普遍,其中一些修辞格不仅作为讽刺诗的表现手法,而且成为此类诗歌形式的艺术标志。

二、奇僻怪异的诗风

中唐诗坛曾出现过以韩愈、孟郊为代表,包括李贺、卢仝、刘叉等人在内的险怪诗派,《唐国史补》卷下说“元和之风尚怪”。其实,这一诗派的险怪诗风肇自贞元时期孟郊的诗作,至元和时期,诸人推波助澜,险怪诗风一时形成高潮。元和以后,险怪之风虽渐次退潮,但余波激荡,影响了其他诗人的创作。唐诗本事虽未能全面记载险怪诗派的创作情况,但也留下了其中一些诗人的创作逸事,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把握险怪诗风的若干特征,而且可以一窥时人对此一诗风的认识。概括地说,由唐诗本事认识险怪诗风,可从诗歌意象、诗歌语言和诗歌的审美方式三个方面着眼。

本事所关注或推崇的偏于险怪的诗歌多以意象的奇崛怪异为特征,如下面的本事诗: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② 本文所引文字依据《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七所引《古今诗话》。今本《唐摭言》卷一三中,“有文而贫”作“有文而不贫”,乃误解“张鹄只消千驮绢”一句而误。

韩吏部作《轩辕弥明传》，言尝与文友数人会宿，有老道士形貌瑰异，自通姓名求宿，言论甚奇。既及饮酒，众度其必不留情于诗，因联句咏鲈中石罌，将以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剗中事调烹。”至弥明，自云：“不善俗书，书则人多不识。”遣人执笔，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涨膨脝。”座客无不叹异。会人思竭，不能复续，弥明连足成之。有微吟者，其声凄苦，弥明咏中讥侮之，曰：“仍于蚯蚓窍，更作苍蝇声。”状罌之声，既已酷似，讥微吟者，亦复著题，皆大惊伏。须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声如雷。座人异且畏之，咸避就寝。既明，失之，莫知所在。（《本事诗·征异第五》）

韩愈有《石鼎联句诗》并序，本事中石罌联句即此诗，所谓“轩辕弥明传”即此诗序文。本事收录此一故事虽有搜奇记异的一面，但毫无疑问，正像韩愈诗序意在渲染弥明诗风之异一样，此一本事寓有推崇怪异诗风之意。本事引用的诗句，形象怪异，刻画酷肖，颇能体现此诗的风格特征。《石鼎联句诗》云：

巧匠斫山骨，剗中事煎烹。直柄未当权，塞口且吞声。喜。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外苞干藓文，中有暗浪惊。师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喜。谬当鼎鼐间，妄使水火争。明。大似烈士胆，圆如战马缨。师服。上比香炉尖，下与镜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明。一块元气闭，细泉幽窦倾。师服。……皖皖无刃迹，团团类天成。师服。遥疑龟负图，出曝晓正晴。喜。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明。或讶短尾铍，又似无足铛。师服。可惜寒食毬，掷此傍路坑。喜。……傍似废毂仰，侧见折轴横。喜。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鸣。明。……^①

引文所录乃诗中诸人赋物模形的诗句。诗状石鼎形貌声容，极尽铺写刻画，或以赋体，或用比体，意象层出不穷，愈出愈奇，变怪百出。若分别言之，其赋物之奇，要似有三：其一，意象奇僻。此诗状物多选择僻于耳目或

①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1页。

在日常经验以外的形象,如“大似烈士胆,圆如战马缨”,“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遥疑龟负图,出曝晓正晴”等句,无不以物象之僻得奇。其二,拟喻新奇。诗句多用比体,一些比喻将通常感受相去甚远的本体和喻体加以联系比照。如上引诗句中奇僻的意象,又如“中有暗浪惊”、“下与镜面平”、“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鸣”等句中的喻体形象,这些形象本与石鼎形貌声容绝不相类,今牵合比拟,给人奇崛生新之感。其三,以不美之物入诗。传统诗歌以美的事物为描写对象,或将对象美化,此诗赋物拟喻,则多用不美甚或丑陋的物象。如“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傍似废毂仰,侧见折轴横”等。诗人或许过于专注意象的搜求,无暇顾及美与不美,或许惟求刻画酷似,而不问美与不美,但以不美之物入诗,则给人以丑为美的怪异之感。

如果说《石鼎联句诗》所竭力搜求的是现实世界的物象,那么,另一些风格险怪的诗则表现超离现实的虚幻世界,意象是虚幻荒诞的。卢仝、李贺的诗作或可成为此类诗歌的代表。《新唐书·卢仝传》记载:“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韩)愈称其工。”韩愈集中有《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诗,一般认为,这是韩愈深服卢仝诗之豪怪奇挺,慕而拟作的。若此,则《新唐书》所载为可信。卢仝《月蚀诗》由月蚀时天象的变化展开想象,其所叙写,有的吸收神话故事,如采用和改写蟾蜍食月、后羿射日、羲和御日、灵兔捣药、牛郎织女等神话。有的依据天文星象编织故事,如谓东南西北星宿慢于职守,见蛤蟆蚀月,或坐视不救,或“虚眨鬼眼”,或“见似不见”,或“藏头入壳”。其他星辰,如荧惑太白、天狼蚩尤、枉矢天狗、三台文昌、二十八宿,无不随机编入故事。有的叙写还借用历史传说及其人物,如黄帝二目、帝舜重瞳、尧忧舜怒等。诗中表现的多是神仙生活和天国景象,是一个基于想象的奇幻世界。

意象的虚幻荒诞在李贺诗中更为普遍,也更为突出。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谓“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即指出此一特征。此一特征在唐诗本事中也能窥其一二。《唐摭言》卷一〇记载,李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韩愈、皇甫湜因连骑造访,李贺为赋《高轩过》,文采斐然,二人大为惊异。诗云:“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轡摇冬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

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①。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这首诗或许不能算作李贺虚幻荒诞诗风的代表作,但毫无疑问,其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正是诗中非凡的意象。很多诗句,如“入门下马气如虹”、“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炯炯贯当中”、“我今垂翅负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等,均为超现实的形象,带有李贺诗歌特有的虚幻荒诞色彩。

意象的虚幻荒诞是险怪诗风的显著特征,相对于初盛唐诗风而言,此类诗歌虽属变格,但从中国诗歌传统考察,却是渊源有自。《李长吉歌诗叙》谓李贺诗“盖《骚》之苗裔”,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上亦谓:“李长吉诗每近《天问》、《招魂》、《楚骚》之苗裔也。”^②朱彝尊谓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警世骇俗,大势亦本《天问》、《招魂》等脱胎来”^③,可移之以评卢仝《月蚀诗》。卢仝、李贺诗驱遣日月星辰,拘囚蛟螭虎豹,捕逐鬼神,驱使灵异,其意象的创造确实近乎楚辞。

唐诗本事涉及的偏于险怪的诗歌还以语言的生新怪异见称。险怪诗派追求诗歌语言的戛戛独造,要求言必己出,此一创作倾向可在本事中得到印证。如《石鼎联句诗》中“巧匠斫山骨,剡中事煎烹”及“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四句,造语生新僻涩。其他诗句,如“中有暗浪惊”、“妄使水火争”、“冻芋强抽萌”、“上有孤髻撑”等,选用动词,无不狠重奇险。近人蒋抱玄《评注韩昌黎诗集》谓此诗“造句摘字属弥明者,酷类韩公家法”,正是看到韩愈诗歌语言的怪怪奇奇。这种怪异的语言创造或与志怪小说抱有同一趣味。陶穀《清异录》卷下记有下面一则诗事:

商山馆中窗颊上有八句诗云:“净君扫浮尘,凉友招清风。炎炎火云节,萧然一堂中。谁知鹿冠叟,心地如虚空。虚空亦莫问,睡起照青铜。”不知何人作。“净君”、“凉友”是帚与扇明矣。

① “元精”句原在“笔补”句后,现据《李长吉歌诗》移正。

② 《说诗碎语》与《原诗》、《一瓢诗话》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③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61页。

韩愈的传奇文《毛颖传》以毛笔为传主,化物为人;牛僧孺的志怪小说《元无有》虚构故杵、烛台、水桶、破铛四物月夜吟诗自咏的怪异故事,也是化物为人。此诗称帚为“净君”,扇为“凉友”,乃用同一手法,其怪异色彩亦与之近。

以上例证还仅限于字词的独特运用,而另一些怪异的语言则几近颠覆传统的诗歌语言形式。卢仝《与马异结交诗》有“昨日仝不全,异自异,是谓大全而小异;今日仝自仝,异不异,是谓仝不往兮异不至”等句,怪异诙谐。韩愈《寄卢仝》说:“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词惊众谤不已。”诗语之怪在于完全抛弃了句法整齐、节奏鲜明的传统诗歌语言的美感,将非诗语言纳入诗行,以不整齐、不和谐为美。在这一点上,刘叉诗歌或许走得更远。李商隐《纪事·齐鲁二生》记刘叉事迹云:“(叉)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既至,赋《冰柱》、《雪车》二诗,一旦居卢仝、孟郊之上。樊宗师以文自任,见叉(叉)拜之。”^①刘叉《冰柱》、《雪车》诗语言极为险怪,从素以文句怪异著称的樊宗师膜拜一事看,刘叉之得诗名正以诗语怪异。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李长吉诗有奇句,卢仝诗有怪句,好处自别。若刘叉《冰柱》、《雪车》诗,殆不成语,不足言奇怪也。”这一评论虽未必公允,却也正确指出了刘叉诗歌对传统诗歌语言的颠覆。

怪异的语言有时出于语言的创造,有时则出于语言的选择、句法的安排,如下列本事中的诗句:

缪岛云,少从浮图,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风。其诗尤重奇险,至如:“四五片霞生绝壁,两三行雁过疏松。”复曰:“抛芥子降颠獬狔,折杨枝洒醉猩猩。”……皆复出前辈。(《唐摭言》卷一〇)

湖南日试万言王璘,与李群玉校书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许人?”璘曰:“日试万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浅,曰:“请与公联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群玉因破题而授之,璘览之略不伫思,而继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野叉头。”群玉知之,讯之他

^① 《全唐文》卷七八〇。

事矣。^①（《唐摭言》卷一三）

（罗）隐又与顾云先辈谒淮南高相公骈。顾为人风雅，时渤海公辟留，隐遂辞归钱塘，高与宾幕小酌，赆隐于海风亭。是时盛暑，有青蝇入座，渤海公命扇驱之。顾谑隐曰：“青蝇被扇扇离座。”隐立酬之曰：“白泽遭钉钉在门。”议者以才调相讥，两俱全美。^②（《鉴诫录》卷八“钱塘秀”）

上引本事中的诗句无不因怪异的语言选择和独特的句法安排而收奇险之效。钱鍾书《谈艺录》说：“作者殊列，诗律弥苛，故曲折其句法以自困，密叠其字眼以自缚，而终之困难见巧，由险出奇，牵合以成的对。”又认为：“因窄见工，固小道恐泥，每同字戏；然初意或欲陈样翻新，不肯袭常蹈故，用心自可取也。古名家集中，几无不有此。如太白《子规》：‘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元微之《送岭南崔侍御》：‘火布垢尘须火浣，木棉温软当棉衣。桃榔面砢槟榔涩，海气常昏海日微’；又《三兄以白角布寄遗》：‘白发过于冠色白，银钉少校颌中银’；周太朴《赠李裕先辈》：‘马疑金马门前马，香认芸香阁上香。’殆难备举。”^③可见，此类奇险的诗语选择在唐人诗中具有普遍性，是摆脱凡庸、推陈出新的必然结果。

险怪诗歌的审美方式并不完全相同，概而言之，有重感觉与尚理致之分。

诗重感觉当首推李贺的创作，《幽闲鼓吹》载有下面一则本事：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

① 本文在“群玉因破题而授之”下有注云：“不记其词。”《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四亦载此本事云：“湖南日试万言王璘，与李群玉校书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许人，日试万言？’璘曰：‘然。’群玉曰：‘与公联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群玉破题授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璘继之曰：‘棕榈叶散夜叉头。’”文末注明出自《唐摭言》。此以“芍药”两句分属李群玉与和王璘。联句初无定式，或一人一句一韵，或一人两句一韵，唐人联句多一人两句一韵。“芍药”两句不押韵，为两句一韵，当出自一人。《诗话总龟》所引当因原文缺李群玉联句，而将“芍药”句误置于李群玉名下。

② 《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引《郡阁雅谈》谓两句为寇豹、谢观作。

③ 钱鍾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6～187页。

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雁门太守行》之成为李贺名作当因此本事,本事所举“黑云”两句也足以体现此诗的艺术特点。云本轻悠飘忽,而曰“压”,曰“摧”,似有千钧之力,泰山压顶之势。云为“黑”、甲为“金”,浓墨重彩。这种充满力感和色感的描写及于全篇,如“霜重鼓寒声不起”句,以鼓声不振喻严寒,赋予寒冷以严酷的威力。其他描述及遣词造语,如“燕脂”、“夜紫”、“半卷红旗”、“黄金台”,大红大紫,色彩明艳瑰丽。充满力感和色感的描写正是重感觉的表现。因为重感觉直观,不重意理,全篇也不以意统摄,所以此诗意象有时若断若续,具有跳跃性,甚至前后难以衔接,意脉不畅。王得臣《麈史》卷二引王安石评诗语云:“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即本于诗歌的内在理路,指出其意象的支离和意脉的断裂。

这种重感觉而略意理的倾向在《李长吉歌诗叙》中有较为明确的揭示:“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因为杜牧将李贺诗看作“《骚》之苗裔”,此之所谓“理”具体指为“感怨刺怫”、“君臣理乱”,但这位主张“文以意为主”的杰出作家之所谓“理”实指“意”,所谓“理虽不及”是指出李贺诗意之不足^①。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谓“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持论与杜牧略同。

与李贺创作倾向相近的有晚唐诗人高蟾。《北梦琐言》卷七记其诗事云:

进士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许州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

^① 《全唐文》卷七五—杜牧《答庄充书》:“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闾阖,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或于奇章公集中,见杜紫薇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合符,不相远也。

高蟾诗之“奇险”似与李贺诗有相似处。本事所引落第诗虽以意取胜,然首两句想象奇特,气象峥嵘,有李贺诗之趣味。此一本事虽肯定落第诗命意守正,但又认为高蟾诗务奇险而少理致,其利弊得失与李贺诗相似。

务奇险而少意理似成为诗歌创作中较为普遍的倾向,但另一方面,险怪诗风中还有虽奇险却尚理致的倾向。这一倾向除表现于上引高蟾诗外,还有卢仝、刘叉诗。

卢仝《月蚀诗》以日月星辰、鬼神蛟螭撰构成篇,可谓险怪之极,然全诗叙写并不一味求奇求怪,漫无所归。此诗借月蚀景象及天国世界的描写隐喻谗邪蔽明、众官失职的政治现实,并喻诗人忠贞为国之心,用意极深。诗中叙及元和五年宪宗遣宦官吐突承璀进讨河北藩镇王承宗而损兵折将、劳师无功一事,前人多认为此诗或是讥刺宦官,或是谴责藩镇。可见,此诗以现实政治为背景,具有鲜明的政治寓意。明人周履靖谓卢仝诗“外险怪内主理”^①,乃中肯之论。刘叉诗风与卢仝相近,其《冰柱》、《雪车》诗以险怪名显一时,前者以檐间冰柱喻高洁坚贞之士,后者记官府驱民运雪以备夏日御暑。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说:“《冰柱》、《雪车》二诗,虽作语奇怪,然议论亦皆出于正也。《冰柱诗》云:‘不为四时雨,徒于道路成泥阻。不为九江浪,徒能汨没天之涯。’《雪车诗》谓‘官家不知民馁寒,尽驱牛车盈道载屑玉。载载欲何之?秘藏深宫,以御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补于时,与玉川《月蚀诗》稍相类。”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二六也说:“卢仝、刘叉杂言,极其变怪,虽仿于任华,而意多归于正。”这些诗评都指出刘叉诗尚意重理,有补察时政的用意,乃知诗之言。

韩愈、孟郊等为代表的险怪诗风后来发生了变异,至晚唐五代流为奇

① 周履靖《骚坛秘语》卷中,《丛书集成·初编》本。

僻一格。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境界的创造和语言的运用方面继续求新立异,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逐渐脱去韩、孟等诗中的虚幻色彩,转而写实。一些诗歌选择细小而不为人所注意的事物,刻画常见但鲜有纳入诗行的景象,诗思入僻,因而诗境虽实,却别开生面,形成与险怪有别的奇僻诗风。

中晚唐著名诗人贾岛早年曾追随韩、孟,早期诗歌也多具险怪色彩。后来另辟蹊径,刻意锻炼,诗风清奇僻苦,自成一格。前人论贾岛诗谓:“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①“岛五言律气味清苦,声韵峭急,在唐体尚为小偏,而句多奇僻,在元和则为大变。”^②“浪仙诗无七古,其五古、五七言律以及绝句皆生峭险僻,锻炼之功不遗余力。”^③都指出贾岛诗风奇僻的特点。贾岛诗风至晚唐五代为后学发扬光大,其私淑弟子李洞也以诗风奇僻著称。《北梦琐言》卷七谓“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顶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唐摭言》卷一〇论李洞诗,所引“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涇”、“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越讲迎骑象,蕃斋忤射雕”等句,无不僻涩奇峭。文谓“时人但消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惟吴子华深知。……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联绝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麋。”’子华不怨所鄙,而喜所许”。“暖漾”两句亦奇亦僻。以奇僻为准衡文论诗是因为以固有诗风为本位。

这种奇僻的诗风在唐末五代表现为对细事的描写,对动物的偏好和刻画,具有明显的尚俗倾向。如下列本事诗: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濬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汭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主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

① 《唐摭言》卷一一。

②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二五。

③ 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清道光二年钞本。

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北梦琐言》卷七“卢诗三遇”）

颍川尝以诗道自负……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北梦琐言》卷七“郑准讥陈咏”）

进士黄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于雅道。诗句中多用“驴”字，如《献高侍郎》诗云：“天上传将舞马赋，门前迎得跨驴宾”之类。（《南唐近事》）

《诗话总龟·前集》卷八还引《谈苑》之文，标举卢延让诗句，其中有“云间闻铎骝驮去，雪里残骸虎拽来”，“树上谿讴批颊鸟，窗间壁驳叩头虫”等句。这些诗句多描写琐屑的物事，或少见而新异，或平凡细小而不足为人道。自传统的诗歌观念看来，这些物事是难以纳入诗行，成为诗歌意象的，但是，唐末五代诗人刻意搜求此类意象，专引此类物事入诗，因僻得奇，这既为诗歌开辟一新境界，又赋予诗歌异于传统的奇趣。

唐诗中的谐趣和奇趣在后来的诗评中褒贬不一。唐五代笔记收录戏谑一类诗，说明时人对此类诗歌并不排斥。特别是有关社会、政治的讽刺诗，一般认为理义所存，关乎教化，因此多持肯定态度。至于险怪诗风，后世也不乏肯定。如《沧浪诗话》谓“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朱熹认为，卢仝诗“句语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但是批评也随之而来，后来甚至成为诗评的主流。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集中表现了这种批评。其二十三云：“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此诗反对以俳谐怒骂为诗。元好问之前，黄庭坚等人有类似主张。黄庭坚《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云：“诗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戴复古《论诗十绝》云：“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沧浪诗话》论宋诗云“其末流甚者，叫燥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一般认为，元好问此诗是继承了黄庭坚等人的诗歌主张。这一认识大致不误，但准确地说，元氏此论主要还是针对唐五代笔记中的讥诮一类诗而发的。元氏认为，出自笔记、小说的讥诮一类诗与雅正之言不合，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

说家言,是虚荒的曲学,以俳谐怒骂为诗,是为小说所误。唐诗中有一些“戏题”、“戏赠”一类诗,如杜甫、李商隐等人的俳谐体诗,但此类诗歌多无讥贬意味,或形贬实褒,诗风虽属戏谑,但与讥诮不同。也有一些诗歌充满横眉立目式的怒骂,但与诗风诙谐的讽刺诗也有所不同。元氏所批评的是唐人笔记中的融俳谐、怒骂于一体的讥诮诗,特别是其中的政治讽刺诗。《论诗》二十五云:“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此诗论刘禹锡的两首游玄都观绝句。刘诗其一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大和二年,又作《再游玄都观》,追述前事。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本事诗·事感第二》曾记载刘禹锡因作看花诗而遭贬的故事,后来的诗评家因此认为二诗隐含怨愤,《论诗》绝句显然承袭了这一认识。“刘郎也是人间客”是说刘禹锡虽长期遭贬,远离政治中心,但究竟不能忘怀现实,未能超越政治的是非恩怨,感物赋诗,隐含怨愤。这种怨愤的表达,在元好问看来,是徒劳无益的。末句用一“枉”字,即表达了此一观点。刘禹锡诗题有“戏赠”,一般认为意含讥刺,属于政治讽刺诗,元氏此评其实反映了他对讽刺诗的态度。

元好问反对俳谐怒骂之为诗,一般认为含有批评苏轼诗歌之意。苏轼早年,好以嘻笑怒骂为诗,黄庭坚认为,苏轼文章“其短处在好骂”^①,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苏诗学刘诗之怨刺,或受《本事诗》中有关记载的影响。若此,元氏所谓“曲学虚荒小说欺”一语或确实针对苏轼而发。

元好问论诗提倡“雅言”,尚雅正,所谓“雅言”指符合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诗歌。孔子论《诗》,谓“思无邪”,《礼记·乐记》谓“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序》要求诗“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套儒家诗教后来成为一些诗歌创作和诗评的标准。元好问认为古人之诗是符合这些诗教的“雅言”,他抬出古人之诗,以批评今人俳谐怒骂之为诗。其实,古人之诗未必尽合温柔敦厚之旨,即如孔子奉为“思无邪”的“诗三百”,其中就有

①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答洪驹父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伐檀》、《新台》等嘻笑怒骂的文字。以儒家诗教规范创作,其实是否定了诗歌的社会批评功能,抛弃针砭现实的诗歌传统。应该说,这一批评的意义是消极的。

元好问还以卢仝诗为例,对险怪诗风提出批评。《论诗》一三云:“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查慎行《初白庵诗评》谓此诗“扫尽鬼怪一派”,所言不误。卢仝诗风的险怪主要表现于意象的构成和语言的运用。卢仝诗歌打破句法整齐、节奏鲜明的语言形式,有意追求语言的参差错落。元好问如果站在雅正的立场反对这一倾向,以示他对传统诗歌美学的坚守,自然不失为一种诗歌主张。但若就诗歌意象而言,元氏之所谓“真书”还需加辨析。卢仝的《月蚀》诗,韩愈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意象均有取于《楚辞》。其他诗作意象亦有所本,樊汝霖论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一诗说:“从公学文者多矣,惟李习之得公之正,持正得公之奇。持正尝语人曰:《书》之文不奇,《易》可谓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途,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何等语也?公此诗‘黑螭’、‘五龙’、‘九鯤’等语,其与《易》‘龙战于野’何异?”^①《楚辞》和儒家经传历来被奉为文学的正统,就此而言,卢仝等人风格怪异的诗歌其实并未脱离文学的传统。若尊重这一传统,则似未可将其诗作打入“鬼画符”之列。元氏之所谓“真书”,所谓“正体”,主要是指汉魏以后的诗歌形式,这不仅抛弃了此前的一些文学传统,而且拒绝其他文体特质对诗歌的渗透,他对诗歌的理解要比严羽等人狭隘得多。

第四节 推尊学问

诗歌的写作,除写景叙事、直抒胸臆之外,还有用事一途。《唐音癸签》卷四引胡应麟语云:“诗自模景述情外,则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诗正体,然景物有限,格调易穷,一律千篇,只供厌吐。欲观人笔力材诣,全在

^①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四《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助汝五龙从九鯤”句引樊汝霖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阿堵中。”因此,自魏晋以来诗多用事。用事原是诗歌的表现手法之一,但此途一开,逐渐变成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创作追求。一些诗人因此着意援事以为诗,常常斗奇炫博,倾其所学。诗歌创作成为学养的展示,学问深浅也成为诗歌成就高下的尺度。

唐代诗歌,特别是晚唐诗歌,具有明显的推崇学问的倾向,李商隐诗歌最能体现这一倾向。《文献通考》卷二三三《经籍考》卷六〇引《谈苑》云:“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这一记载大约是实情,李商隐诗歌用事的繁密是前所未有的,《诗人玉屑》卷七“作诗须饱材料”条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如《喜雪》诗:‘班扇慵裁素,曹衣讵比麻?鹅归逸少宅,鹤满令威家。’又‘洛水妃虚妒,姑山客漫夸。联辞虽许谢,和曲本惭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者须饱材料。”除用事繁密外,李商隐诗还用事奥僻,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谓“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用事的繁密、奥僻也反映在其他一些唐诗中,如下列本事诗: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武后恶之也。仪应诏诗中用“影娥池”,学士时无解其事。祭酒令狐德棻召张柬之等十余人示此诗,柬之对云:“《洞冥记》:汉武帝于望鹤台西起俯月台,台下穿影娥池,每登台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令狐德棻叹其博识。(《唐诗纪事》卷六“上官仪”)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彧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终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嵯峨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彧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彧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彧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彧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

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或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或:“嵎嵎之山,当在何处?”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太平广记》卷二〇〇引《北梦琐言》)

这两则本事中的诗歌用典有共同特点,这表现在用事范围和用事形式上。

首先,用事偏好汉魏六朝小说故事。上官仪咏雪诗有“花明栖凤阁,珠散影娥池”两句,据本事所载,“影娥池”出自旧题汉代郭宪所作小说《洞冥记》,今本《洞冥记》载其事。韩定辞酬马彧诗句句用事,“崇霞台”句用王嘉《拾遗记》卷四所载燕昭王登崇霞台召善舞者二人为舞一事,“学辨”句中“痴龙”一语及本事所载相关故事,据《法苑珠林》卷四一所录,出自刘义庆的《幽明录》,《类说》卷四九“九观痴龙”引殷云小说,亦录其事。“银笔”事属梁元帝,自当出于六朝小说家言。“雪儿”既为李密爱姬,其事当在唐初,为当时小说家言。马彧赠韩定辞诗后两句用王乔于嵎嵎山得道事,据徐文靖《管城硕记》所考,其事载于《神仙传》。此事又载于《颜氏家训·书证》,《颜氏家训》得之遗文故事,亦属小说者流。以上诗歌中的事典多为汉魏六朝小说家言,诗人对小说故事的偏好十分明显。

《唐音癸籤》卷四引王敬美语云:“今人作诗,必入故事。有持清虚之说者,谓盛唐诗即景造意,何尝有此。是则然矣,然亦一家言,未尽古今之变也。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语,然不能入经语。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为宗,又一变也。中间何、庾加工,沈、宋增丽,而变态未极,七言犹以闲雅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马淳牛溲,咸

成郁致,于是诗之变极矣。”这一段话说明了魏晋以后至杜甫时诗歌用事的范围及其变化,由史乘到经传,到诸子百家、稗官小说,范围越来越广。但就事典内容而言,这又是一个由常入僻的演进变化过程。唐诗用事也大致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中唐以前,诗歌多用经史中的名言、故事,诗文特别是《文选》中的名篇佳句,兼采诸子百家之言,也旁及稗官小说。小说的采摭主要集中于《世说新语》,而且多是其中的名言著事。至晚唐五代,一些诗歌则刻意搜求小说事典,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取材也越来越冷僻,内容已与中唐迥异。

晚唐五代诗的用事倾向反映时人以学问为诗的观念,前引马彧、韩定辞赠答诗可为印证。据本事,韩定辞在成德军节度使王镕幕供职,成德军五代时领镇、冀、深、赵四州,以镇州为治所,王乔得道的嵯嵯山在赵州所辖之柏仁县。马彧赠韩定辞诗中“嵯嵯山”、“王乔”等语,指所在辖地故事,马彧援其辖地故事以为诗,“意在征其学问”。韩定辞自然心领神会^①,以马彧所在燕地的崇霞台故事回应,又用“痴龙”、“银笔”、“雪儿”等事相难。马、韩二人赠答诗各含语意密码,在这场以诗往还的知识竞赛中,韩定辞以用事繁密僻奥而最终获胜。这两首赠答诗,搜奇探奥,矜博逞才,虽为诗中特例,但也可见诗尚学问之一斑。

这两则本事不仅反映唐诗特别是晚唐五代诗的用事范围,而且反映其用事形式,即用事已由“用事”向“用辞”转变。所谓“用事”,是运用旧有文献中的故事;所谓“用辞”,是运用旧有文献中的语词。前者以故事的叙述为中心,后者以语词的选用为侧重。诗歌“用辞”原是引用前代诗文名篇佳句中的语词。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中“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两句,用柳恽《江南曲》中“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数句,是引用诗句中的语词。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有“芳草”、“寒林”两句,施补华《岷佣说诗》谓“刘长卿《过贾谊宅》诗,‘汉文有道’一联可谓工矣。上联‘芳草独寻人去后,寒林

^① 本事记马彧答韩定辞“嵯嵯之山当在何处”一问时说:“隋君(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引东坡所录马彧、韩定辞赠答诗事,‘隋君’作‘隋郡’,但据《颜氏家训》所记,原文当作‘赵郡’。)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可见韩已知其事,明知故问。

空见日斜时’，疑为空写，不知‘人去’句即用《鹏赋》‘主人将去’，‘日斜’句即用‘庚子日斜’。可悟运典之妙，水中着盐，如是如是。”^①这是引用文章中的语词。此类“用辞”或许可以唐人用江淹《拟休上人》诗中的语词为典型例证，《唐音癸籤》卷二四“诂笺九”下“僧用碧云”条云：

《野客丛书》云：《文选》有江淹拟汤惠休诗曰：“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今人遂以为真休上人诗，用之僧家。此误自唐已然。如韦庄诗曰“千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许浑送僧南归诗曰：“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秋思长。”曰：“汤师不可问，江上碧云深。”权德舆赠惠上人诗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云。”孟郊送清远上人诗曰：“诗夸碧云句，道证青莲心。”张祜赠高闲上人诗曰：“道心黄蘗长，诗思碧云秋。”惟韦苏州赠皎上人诗曰：“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辞。”似不失本意。

上引唐人诗句中的“碧云”均为“用辞”，这种“用辞”形式后来由诗文转向史传、小说。蔡條《西清诗话》卷上说：“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氏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气，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挝渔阳掺，声悲壮。’《汉武帝故事》：‘星辰影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杜诗两句是用史传、小说中的语词，属“用辞”之体。

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用辞”形式的特点：首先，所用之事有的并非叙述性的故事，所谓用事，纯粹表现为用其语词。其次，所用之事有的虽具叙事性，但诗人引用时不是明确表述事之全体，或主要情节，而是摘取故事中的一二词语，显露故事的一鳞半爪，通过暗示、提醒，使读者追踪所用之事。这样，特定的语词就成为作者创作时搜寻的重点，对语言的选择超过对事件的叙述。有时，作者所用之词为人们不经意处，运事又能宛转清空，了无痕迹，即所谓“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因此，读者常常忘其

^① 《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93页。

用事,忽略其中的语意密码,非有注解,不能了悟。

前引本事中的诗歌用事具有上述“用辞”的特点。上官仪咏雪诗用《洞冥记》中“影娥池”一语以求对仗,用其词而略其事。马彧赠韩定辞诗用王乔得道故事,略其情节,而以冷僻的地名提示,以收奇险之效。韩定辞诗中“痴龙”、“银笔”、“雪儿”等语,提示故事的功能较弱,在原有文献中也并不醒目,但在诗歌中却奇僻新颖,是刻意选择的关键词。其中“银笔”、“雪儿”是对句中的对应词,所含两事在同类故事中并非绝无仅有的必选项,诗人的选择多半在于可为对应的两个词语,“用辞”多于“用事”。“用辞”原比“用事”更为深隐,不易觉察,但马、韩两诗为要显露学问,刻意出奇,因而用事不能做到溶盐于水,了无痕迹。

唐诗本事所显示的唐诗特别是晚唐五代诗的用事特征对宋诗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人才能以才学为诗,正是此一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可从西昆体和苏轼、黄庭坚诗中得见一二。

西昆体是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 17 人的唱和诗集《西昆酬唱集》为标志的一个诗歌流派。杨亿等人诗宗李商隐,不仅承袭了李商隐诗的词藻体貌,也学习李商隐诗用典的博洽奥僻。《六一诗话》云: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西昆诗派虽有“语僻难晓”的弊端,但在欧阳修看来,杨亿诸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学问淹博并非缺点,相反,学问正是诸人诗歌艺术的一大支撑和优势。与欧阳修观点相同并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其《西昆酬唱集》提要说:“要其取材博赡,练句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博赡乃其特色,学问乃其根底。西昆诗派诗宗学问的倾向虽直接出自李商隐,但其背景却是晚唐五代诗宗学问的风气。

苏轼是一位主张以才学为诗的诗人,他说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①,即以才学为诗之意。诗重材料不仅是其诗学主张,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显著特点。苏轼诗歌用事广博深密,晚唐五代诗歌的用事特征同样体现在苏轼诗中,下列诗话、故事可为例证:

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冷斋夜话》卷一)

政和初,蔡京禁苏氏学,蕲春一士独杜门注其诗,不与人往还。钱仲仲为黄冈尉,因考校上舍,往来其乡,三进谒然后得见。首请借阅其书,士人指案侧巨编数十,使随意抽读,适得《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齐东昏侯潘妃小字。临春、结绮者,陈后主三阁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于此耳?”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纪》,记入薄太后庙,见古后妃辈,所谓月地云阶见洞仙,东昏以玉儿故,身死国除,不拟负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为没而不书?”士人恍然失色,不复一语,顾其子然纸炬悉焚之。仲仲劝使姑留之,竟不可。(《容斋随笔·续笔》卷一五)

苏轼《海棠》诗所用事典,今本乐史《杨太真外传》未见,或诗话所引为其轶文,或所言《太真外传》为另一部小说。《海棠》诗用玄宗笑谈,为“用辞”之体。《和杨公济梅花》中“月地”两句出自唐人小说《周秦行纪》,“月地云阶拜洞仙”乃小说中牛僧孺诗语,“东昏以玉儿故”云云,是小说中齐东昏侯潘淑妃的对话。两处皆用其语,亦为“用辞”之体。唐人好用唐前小说故事,苏轼在唐人之后,用事也与时俱进,然究其用事手法,实与唐人无异。

^① 见《后山诗话》。

黄庭坚是宋代诗文大家,他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①,及其自作,造语命意也必求来处。其诗用事广博,花样翻新,为宋诗别开生面。这一创作倾向,前人多有论及:

其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雋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后生晚学此秘未睹者,往往苦其难知。(《山谷诗集注》许尹《黄陈诗集注序》)

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魏野《临汉隐居诗话》)

黄(庭坚)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紧要字,融液为诗。(方回《桐江集·刘元晖诗评》)

黄文节公手录杂事墨迹凡一百六十五题,皆汉晋间事……或为诗文用而书。(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

这些评论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黄庭坚诗的用事情况。除运用经史雅言外,还杂以儒、道、佛诸子之说,小说家言,其中,“南朝人语”、“晋宋清谈”、“汉晋间事”为其用事着力之处。就其用事方式而言,其诗“用事深密”,“专求古人未使之事”,“专用……不紧要字”,以奇僻为好尚。“用辞”的特点也至为明显,所谓“一二奇字”、“不紧要字”,即揭示此一特点。黄庭坚诗用事的广博和深密都远过晚唐五代诗,他虽鄙薄晚唐五代诗风,但其用事方式实与晚唐五代诗一脉相通。

^①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答洪驹父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第四章 本事中的诗学观念

提起本事中的文学观念,我们自然会想到《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记载的李白鄙薄声律、以复古自命的著名诗论。但是,在唐诗本事中,这种直接表述的诗学观点很少,多数诗学观念是隐含在故事之中的。一方面,那些记载诗歌创作情况的本事往往表现诗人的创作倾向及其背后的诗学观念,而那些记载诗歌解读、欣赏、流传情况的本事又往往表现读者、传播者的诗学观念。另一方面,本事的作者和编者在采写本事时也往往基于一定的诗学观念,甚至表现自己的诗学观点。因此,唐诗本事中的诗学观念来自不同方面,其思想是丰富复杂的。与唐代专门的诗论著作有所不同,唐诗本事中的诗学观念较少个人色彩,通常是普遍存在的诗学观念。不仅如此,一些诗学观点对宋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成为宋人诗话等著作中的常谈。因此,发掘唐诗本事中的诗学观念,对于了解唐人诗学观念、研究宋人诗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唐诗本事研究的必要环节。

本文认为,唐诗本事涉及唐人对于诗歌本质、诗歌功能、诗歌法则、诗歌创作和诗歌解读的认识,本章拟从以上五个方面对本事中的诗学观念展开讨论。

第一节 诗歌的本质

唐诗本事反映唐人对文学的本质,特别是诗歌本质的认识,其中,神理为文和情志为文的观念最为突出。

一、诗是神理的表现

唐诗本事中有一些梦得文才诗思的故事,如下列本事: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藪，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鍍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壘，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画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云溪友议》卷下“祝坟应”）

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其处，飞琼曰：“子何故显余姓名于人间？”座上即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本事诗·事感第二》）

（郑）颢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时，恩泽无对。及宣宗弃代，追感恩遇，尝为诗，序曰：“去年寿昌节，赴麟德殿上寿，回憩于长兴里第。昏然昼寝，梦与十数人纳凉于别馆。馆宇萧洒，相与联句。予为数联，同游甚称赏。既寤，不全记诸联，唯省十字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乃书之于楹。私怪语不祥，不敢言于人。不数日，宣宗不豫，废朝会，及官车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顾遇，续石门之句为十韵云：‘间岁流虹节，归轩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萧洒梦殊庭。境象非曾到，崇严昔未经。日车乌敛翼，风动鹤飘翎。异苑人争集，凉台笔不停。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灾先兆，何当思入冥。御炉虚仗马，华盖负云亭。白日成千古，金滕闷九龄。小臣哀绝笔，湖上泣青萍。’”未几，颢亦卒。（《旧唐书·郑颢传》）

《旧唐书·钱徽传》记载的钱起夜吟而得鬼谣的故事与上引故事同类。除本事中的梦得文才故事外，还有其他一些同类故事。如《旧唐书》卷一

四九谓张鹭儿时梦见紫色大鸟,因有文章;卷九四记李峤儿时梦有神人遗之双笔,从此渐有学业;卷一八九记尹知章少梦神人凿开其心,以药纳之,于是尽通经义。又《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谓王勃“少梦人遗以丸墨盈袖”,《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谓李白少时梦笔生花,《太平广记》卷一八〇引《闽川名士传》记林藻应举试珠还合浦赋,因假寐梦人告语,叙珠来去之意,主考谓有神助,等等。

梦得文才故事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即已大量产生,其中一些为著名故事:传说罗含梦五色鸟入怀,而有文章^①;江淹梦郭璞索还五色笔,因失文才^②;王珣梦人授以如椽巨笔,后作烈宗哀册谥议^③;谢灵运寤寐之间因见惠连,而成佳句。这一时期是梦得文才故事出现最多的时期。

这些故事都无一例外地宣扬文才神授,都认为文才的得失出于神灵的予夺。故事中,飞鸟入怀是神灵意志的体现,所梦之人也不过是神灵的化身。人之有文才,完全是上天的赐予,神灵的垂示^④。

与文才神授观念相应的还有诗为预言的说法。唐诗本事中有诗讖一类故事,这类故事宣扬诗歌预示凶吉的神秘功能,认为诗歌可以预言人的败落、死亡,或职官的迁升改易。这种神秘主义的宿命思想无疑源于古老的天命论,是对主宰人类的超自然的神灵的信仰。在信仰者看来,讖诗是神灵对人的未来命运的暗中垂示或昭告。

不管是文才神授故事,还是诗为预言故事,都反映了人们对于文学起源和文学本质的认识,即文学源于神灵的启示,文学是神理的表现。

文学是神理的表现,这是战国后期至汉代以来的普遍观念。这种观念源出《易传》。《易传》中《文言》是对乾、坤两卦的解说,后世循名责实,以“文言”为言之文者。清代阮元相信汉人关于孔子作《易传》的说法,甚至认为“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言说》)。

① 见《太平御览》卷三九八。

② 见钟嵘《诗品》卷中。

③ 见《太平御览》卷三九九。

④ 《旧唐书》所载郑颢梦中得诗故事乃实事,但梦中得句并不意味着诗句具有神秘的预示作用,也不意味着诗句来自神灵的启示。但是所谓“及宫车上仙,方悟其事”及全诗所咏宣晏驾事,说明诗人是把诗句作为神灵的预言看待的,也是文出神授的观念。

那么,《文言》即是时人观念中的文学。后世对此虽无异议,但对其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解说不一。《经典释文·周易音义》云:“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周易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文言。”都以“文”指文饰、辞采。但晋人姚信为《文言》作注时则从义理立论,他说:“乾坤为门户,文说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后《周易正义》引而申之,认为“今谓夫子但赞明易道,申说易理,非是文饰华饰,当谓释二卦之经文,故称文言。”把“文”归结为深奥的义理。清末章炳麟承袭此说,《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说:“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亦谓孔子只是释乾、坤两卦经文,阐明《易》道,申说义理,并非文饰华采。此外,阮元《文言说》以“文”为声偶,但遭到章炳麟的有力辩驳。在对《文言》的诸多解说中,以“文为义理”说更能揭示《易传》的文学观念。《文言》虽只解说乾、坤两卦,但据姚信所注,其义理实统摄六十四卦,那么《文言》应该是阐明整个《易》道的。《周易》历来被视为谈天之书,是阐明天道神理的。《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卦》亦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文言》既是阐明易道,那么其中义理即是神理,《文言》之为言之文者,以其通于神理之故。《易传》实非孔子所作,各篇成书年代不一。一般认为《文言》成于战国后期,那么,神理为文的观念当在战国后期即已产生。

由《文言》引出的这一神理为文观念对后世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勰对神理为文曾给予明确的理论表述。《文心雕龙·原道》在探讨文学的产生及其本质时说: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刘勰认为,《文言》之为文,是因为它体现了“天地之心”。在这里,“天地之心”喻指宇宙精神,即下文所谓“神理”。在《易传》中,“神”有不同意指,但是,作为神明作用的“神理”显然是指上天的意旨,即天命,《文心雕龙》正是在此意义上运用“神理”这一概念的。不仅如此,刘勰还把神理看成是神灵的授予。他认为“《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相信“玉版金镂”、“丹文绿牒”之说,肯定天命神授,把文学看作神灵的启示,将神理为文的观念建立在神授观念的基础上。刘勰的文才神授观受《易传》和谶纬之学的影响,是战国后期以来普遍存在的观念。

从前引神授故事看,文才神授观在唐五代仍普遍存在,这一普遍存在的观念对唐代诗人和诗论家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文才神授观具体表现为将人之难得诗才和诗之难得佳句视为神灵的赐予,唐代诗人和诗论家论诗多涉及后者,与前者较少关联。

受此观念影响的诗人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诗圣”杜甫。杜甫诗论明显受文才神授观念的影响,由下列诗句可见出这一影响: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诗镜铨》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但觉高歌有鬼神。(《杜诗镜铨》卷二《醉时歌》)

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诗镜铨》卷四《独酌成诗》)

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杜诗镜铨》卷八《游修觉寺》)

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杜诗镜铨》卷一四《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璵》)

所谓“有神”、“有鬼神”,与“有神助”意同。“神助”一语出自谢灵运寤寐间而得佳句的故事。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记载:“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谢灵运梦得文思故事是时人文才神授观念的产物,杜甫诗屡屡言及“有神”、“神助”等,表达的也是同一文学观念。

杜甫之后,受此观念影响的是诗人兼诗论家皎然。皎然《诗式》序

云：“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①卷一“取境”云：“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皎然认为，诗歌创作中佳句的获得并不单纯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意识活动，也不完全受意识的控制。他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只好援引了传统的文才神授观念。皎然自称是谢灵运的后裔，论诗也以谢氏为法，他不仅称赞谢诗“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②，还特别欣赏谢诗中“池塘生春草”一句，并引梦得文思故事，谓诗有“神助”。由此不难看出《诗式》所谓“神授”、“神助”等语与六朝文才神授观念的关系。

除杜甫、皎然诗论外，类似的观念还出现在白居易的诗论中。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论刘禹锡诗说：“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③仍是推崇诗中佳句。所谓“神妙”，指诗句极妙参神，达到人力难以企及的出神入化的境界，而所谓“灵物护之”亦即“神助”之意。

文才神授观其实反映了前人对作家天赋及创作灵感的认识。因为不能真正了解天赋、灵感获得的原因，在解释天赋、灵感现象时，梦得文才故事将其归结为上天的赐予，并且采用了粗糙的神灵感应的形式。唐代诗人及诗论家虽承袭了“神授”的观念，但逐渐扬弃了神灵感应的原始形式，观念的把握趋于理性。在他们看来，天赋和灵感既超越人力，也基于人力。后者或得力于读书万卷的勤学，或出于冥思苦想，或由于逐渐磨练的艺术敏感。应该说，这些基于创作实践所获得的认识是接近真实的。

二、诗是情志的表现

唐诗本事专集《本事诗》和《抒情集》的编者是倾向于“诗以抒情”的。《抒情集》以“抒情”名其集，标明所集诗歌的抒情性质。《本事诗》对此则有明确的表述，《序》云：“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

① 李壮鹰《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诗式》卷一“文章宗旨”。

③ 《全唐文》卷六七七。

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这一段话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源出《毛诗序》。《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序》接过“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同时基于诗、乐一体的观念,吸收乐论中乐生于人情的论述,形成情动言发、诗以言志抒情的观念。《本事诗》序重申《毛诗序》关于诗歌本质的观点,显然是强调诗歌的抒情性质,是将抒情作为本事诗最重要的特征。

这一观念也反映在《本事诗》的编纂中。《本事诗》将所选本事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其中“情感”、“事感”、“怨愤”中的本事诗均为“触事兴咏”的抒情诗。“情感”类本事为男女情事,其中诗歌为爱情诗,或吟咏男女情爱,“情感”之“情”专指男女之情。这一类目的确立当是受南朝文学观念的影响。梁萧纲和萧绎论诗主情,其所谓“情”已专指男女之情。萧统《文选》卷一九“赋癸”专设“情”类,收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曹植《洛神赋》,所选赋篇均是描写男女情事。“情”下李善注引《易》云:“情者,外染也,色之别名。”《本事诗》中“情感”一类的设置当本于此,这一名目中的“情”与序中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诗情有广狭之分,并非同一概念。“事感”类本事诗所涉及的情感形式较为复杂。有人世兴衰,如明皇听唱李峤诗;有政治恩怨,如刘禹锡游玄都观诗;有朋辈聚散,如元稹题黄明府诗;有感物伤春,如白居易杨柳诗。等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均可入此类。“怨愤”类本事记宋之问《明河篇》故事、李适之《罢相》故事、贾岛题兴化池诗事等,多寓怨愤之情。其他几类本事中也有“触事兴咏”的抒情诗。《抒情集》今已散佚,现存佚文中的诗歌多抒情言志之作,叙男女情爱的“情感”一类本事也为数不少,编辑取舍与《本事诗》相近。

本事诗的抒情性质首先源于其“触事兴咏”的特点。中国古代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中有所谓“感物”之说,《乐记》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一理论影响到诗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都认为人之感物生情,情形于言而为诗。唐以前的“感物”说又包含“感事”之义。《诗品序》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

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序中“春风春鸟”等,乃物之感;“楚臣去境”等,乃事之感。钟嵘之前,班固认为诗歌的创作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诗歌与诗事、诗歌与诗情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感物理论以情之感发为其枢机,物感事感必表现为情之感,《本事诗》序所谓“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即明此意。本事诗多是感于事而深于情的诗歌,因而最能体现诗歌的抒情性质。

“诗言志”与“诗缘情”内涵有所不同。一般认为,“诗言志”是言其心胸怀抱,所言情志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其情多为世情,其诗关乎政教。“诗缘情”则多抒写一己私情,其情不受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诗言志”与“诗缘情”曾经判然为二,但在唐人那里,二者并不泾渭分明,有时甚至混而为一。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诗大序正义》云:“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懣,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文选》卷一七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李周翰注云:“诗言志,故缘情。”前者以“情”疏“志”,后者以“志”注“情”,“情”与“志”已统合为一。

这种“情”、“志”不分的情况在《本事诗》和《抒情集》中也有所反映。如《本事诗》所载李章武赠僧诗,对僧尼试经敕令提出委婉的批评;张九龄《海燕》诗以物自喻,明其与世无争的胸怀;贾岛题兴化池诗也借物兴咏,批判豪贵对百姓的侵夺。这些本事诗,或明心迹,或寓讽谕,乃“志意之所之适”的言志之作。《抒情集》中收有于渍、唐备“颇干教化”、“咸多比讽”、“皆协骚雅”的诗歌^①,郑还古受谤被贬时所作《望思台》等诗^②,还

① 《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卢瓌《抒情》。

② 《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四引卢瓌《抒情》。

有狄常侍因“拾遗孟昭图上疏切直，蹈于非罪”所作的伤悼诗^①。这些诗歌涉及世道人心、伦理道德，关乎政教，可归入言志一类。这种“缘情”、“言志”互相参杂的情况正反映了唐人对“情”与“志”的理解。

唐人对情志的理解较前人也有所深化。他们注意到诗中情志所反映的诗人所独有的禀赋气质、心胸抱负及其对人生穷达升沉的深刻影响，一些本事表达了这一认识：

咸通中，王建侍御吟诗寒碎，竟不显荣。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穷愁，不登名第。是知诗者陶人情性，定乎穷通。故韦庄补阙有《长安感怀》云：“大道不将炉冶去，有心重筑太平基。”此则苞括生成，果为台辅。长兴末，何仆射瓚有《蜀城书事》云：“到头须卜林泉隐，自愧无能继卧龙。”诗后十句，得疾而卒。（《鉴诫录》卷九“分命录”）

杜荀鹤曾得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筇筇。”时韦相国说右司员外郎，寄寓荆州，或语于韦公，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即京兆大拜气概，诗中已见之矣。或有述李频诗于钱尚父曰：“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于诗句，苦哉！”（《北梦琐言》卷七“韦杜气概”）

朱勰，仕江南为县令，甚疏逸，有诗云：“好是晚来香雨里，担簦亲送绮罗人。”李璟闻之，处以闲曹。又有僧庭实献诗云：“吟中双鬓白，笑里一生贫。”璟闻云：“诗以言志，终是寒薄。”以束帛遣之。（《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引《诗史》）

这些本事都力图说明诗情与性分的关系。诗能陶冶人之性情，但诗之情志又是诗人情性的表现。人之性情各异，在本事作者看来，有的胸怀广阔，气概非凡，如韦庄、韦说等；有的生性寒薄，气度狭小，如王建、李洞、杜荀鹤、李频、僧庭实之流，或性情疏逸，如朱勰。性情不同，诗之情感志意亦有所不同。前者志向远大，可为“大器”，后者寒碎穷愁，毕竟为“小器”。由诗情诗意可推知人之情性，由此情性可定人之穷通。《鉴诫录》

^① 《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五引卢瓌《抒情》。

将此归入“分命”，认为这是性分决定命运。文学理论中有“性格即命运”的重要命题，其实，这一命题在唐诗本事中已有生动的表现。

诗是情志的表现，与此相关，诗还是欲望的替代性满足。感物感事，往往激发诗人潜在的本能欲求，这些欲求在现实中或难以实现，于是借助诗歌，在虚幻的想象中得到满足。这一创作倾向在有关男女情爱的诗中表现尤为明显。《云溪友议》卷中“谭生刺”记载：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铎者，吴门秀逸之士也，因书绝句以贻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经游之者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此一本事揭示世人题诗真娘墓的隐微心理。所谓“感其华丽”，就是感怀佳人的美艳，即谭生所谓“重色”。在谭生看来，武丘山下荒冢累累，在在处处萧条愁人，世人独于真娘墓树题诗，而不及其他，岂非重色心理作怪。唐人题真娘墓诗，本事未引，但从沈亚之《虎丘山真娘墓》诗中或可见其神貌风情之一斑。其诗云：

金钗沦剑壑，兹地似花台。油壁何人值？钱塘度曲哀。翠余长染柳，香重欲薰梅。但道行云去，应随魂梦来。（《全唐诗》卷四九三）

由真娘生前的风尘生涯生出即今神魂来去、为雨为云的想象，“翠余”两句将想象幻化为现实的景象，偏于感官感受。如果说诗以尽欲倾向在此诗中尚隐约朦胧，那么，在王轩遇艳故事中此一倾向显露无遗。王轩《题西施石》诗云：“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已露希艳之意。本事中的西施现身酬诗、共为鸳鸯之会的香艳故事是王轩诗歌内容的延伸，是对诗中隐含的娱情意图的揭示。当然，本事作者读其诗而心往神驰，因而造为此一艳想故事，通过自居作用，同样获得想象的

满足。应该说,此一故事也是这一心理活动的外化。类似的故事还有李群玉《黄陵庙》诗事。《黄陵庙》诗本无希艳之意,但本事据诗中一些描写附会段成式诗“曾话黄陵事,今为白发催”两句,虚构娥皇、女英二妃现身、与李群玉约为云雨之游的艳遇故事。此一艳想完全出自本事造者创造性的诗歌解读,正像诗人通过想象与创作获得欲望的替代性满足一样,读者通过阅读和想象也能获得同样的满足,《黄陵庙》诗事也正是这种自我满足的产物。后来,《青琐高议》取此事为因由,恣意铺张,附会诗人李远收藏贵妃罗袜、心怀艳想的故事,其中人物具有明显的恋物癖及色情狂倾向,故事对性爱心理的表现较唐诗本事走得更远。

钱鍾书在《诗可以怨》中论及文学的慰藉和补偿功能,曾引李渔《笠翁偶寄》中的一段话:“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未有真境之所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原配。”^①这末一幻想可为上引诗歌及本事的注脚。唐人诗歌及小说好以后妃、神女及历代名姬为情爱的想象对象,原因也在此。西方文学理论将文学创作视为“白日梦”,视为受压抑的欲望的满足。弗洛伊德更把这一观点建立在一套深度心理学的基础上,认为文学艺术创作是对本能的情欲的疏解,是“本我”的升华。本事中的幻想故事正是这样的“白日梦”,正是受压抑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

与西方较为开放的创作态度不同,中国古代对此一创作倾向常常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如那些描写男女情爱的宫体诗因其香艳绮靡一直作为诗歌创作中引以为戒的厉禁。在当时的儒者观念中,为诗重色,非大雅之思,是不宜公行和倡导的。写男女之情,须寓教训,有寄托,非此则无益。下引本事即表现此一文学观念:

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官,尝谓宾侣曰:“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下句云‘自从一梦高唐后,可是无人胜楚王’。昼梦宵征巫山,似

^① 钱鍾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欲降者,如何?”段记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兰友而不争,卒葬江鱼之腹,为旷代之悲。宋玉则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祸及身,遂假高唐之梦以惑襄王,非真梦也。我公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亦恐非真。”李公退惭,其文不编集于卷也。(《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

段成式认为,宋玉著《高唐》、《神女》赋,并非是写男女情爱,而是隐含政治的深意。李德裕“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则背离这一隐寓传统。其语虽以“亦恐非真”委婉回护,但批评之意是明显的。李德裕自然是接受了这一批评,“李公退惭”等语与《谭生刺》中“经游之者稍息笔矣”乃出于同一心态,这就是对“重色”心理的避讳,对鉴诫、寓托观念的认同。

第二节 诗歌的功能

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人为诗之最大功利诉求即在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王定保的《唐摭言》全面表现了系于诗歌得失的唐代士人的进退荣辱。这种形而下的具有直接工具性的诗歌创作现象作为唐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理应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专题,因此,本文不拟涉及。本文考察的是唐诗本事中涉及的具有形而上性质,能体现诗歌的审美特质且与诗歌传统密切相关的诗歌功能。概而言之,这些诗歌功能包括:诗是政教的工具,诗是沟通的纽带,诗是调适的手段。

一、诗是政教的工具

诗作为政教的工具是儒家的诗学观念。《毛诗序》在论及《诗》的功能时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汉儒认为,《诗》之作关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活动,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功能。

这一观念后来反映到诗歌创作中,要求诗歌表现政教,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这一诗学观念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对唐诗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唐诗本事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景龙中,中宗尝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于是宴罢。(《大唐新语》卷三)

安乐公主恃宠,奏请昆明池以为汤沐。中宗曰:“自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安乐于是大役人夫,掘其侧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韦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后睿宗登位,谓日知曰:“朕当时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大唐新语》卷三)

孟昶广政十九年,赐诗僧可朋钱十万,帛五十匹。孟蜀欧阳炯与可朋为友,是岁酷暑中,欧阳命同僚纳凉于净众寺,依林亭列樽俎,众方欢适。寺之外皆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击腰鼓以适倦。可朋遂作《耘田鼓》诗以贻欧阳,众宾阅已,遽命撤饮。诗曰:“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今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言虽浅近,而极于理。君子谓可朋善谏而欧阳善听焉。(《唐诗纪事》卷七四“僧可朋”)

三则本事叙臣下对君王或平民对官僚的劝谏,诗歌指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均以规谏为目的。据《新唐书·李景伯传》记载,李景伯其时为谏议大夫,规谏乃其本职,故诗有“微臣职在箴规”一语。诗“主文而谏”,实与奏章无异。

这种“下以风刺上”的政治诗虽在理论上为统治者所提倡,并居于正统地位,但其政教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统治者的贤愚和时世的治乱顺逆。那些具有远见的、明智的统治者往往能从天下安定的大局出发,虚心纳

谏,对政治讽谕诗尚能接纳。但一般来说,对于此类逆耳之言,统治者多半怀有抵触心理,或采取抵制的态度,甚至对讽谏者施以迫害。《新唐书·李景伯传》记载:“至景伯,独为箴规语以讽帝,帝不悦。”可见“罢宴”实出勉强。李日知规谏中宗时,睿宗虽有昆弟之尊、相王之重,竟“不敢言”,可见规谏之难。张唐英《蜀桡机》卷上记载,蜀主王衍宴饮无度,自唱韩琮《柳枝词》,内侍宋光溥因吟胡曾《咏史》诗以讽,王衍怒而罢宴。《鉴诫录》卷二记载,昭宗何皇后于帝播迁时畋游为害,同谷山逸人咏五子之歌讽谏,后“潜令秦王诛之”。此事虽有不实^①,却也反映了统治者对讽谏的态度。君王后妃如此,官僚贵戚又何尝不如此。《蜀桡机》卷上记载,前蜀永平二年二月,王建“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坐,赐茶药彩缎,仍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赐坐。贯休欲讽之,因咏《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鹖,闲行气貌多轻忽。艰难稼穡总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称善,贵倖皆怨之。”^②讽刺权贵而为权贵所恶,这种情形或许更为普遍。中唐时期,白居易曾因写作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讽谕诗而为权贵忌恨,并遭受贬斥,可与本事相印证。

时世的治乱顺逆也决定了统治者对政治讽谕诗的态度。一般来说,王朝上升时期,升平的治世,至少是尚未乱到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时候,按照既定的统治秩序,统治尚有可为,这时,统治者较为愿意纳谏,讽谕诗也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一旦天下大乱,世以攻伐为事,“王道”弃绝,“霸道”盛行,则统治者多半徇私利己,一意孤行,纳谏的基础既不复存在,政治讽谕诗也难有市场,其补察时政之功无由发挥。这一点可从下引本事窥见一二:

梁朝杜舍人荀鹤为诗愁苦,悉干教化,每于吟讽得其至理。……杜在梁朝,献朱太祖《时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赋敛。是时方当征伐,不洽上意,遂不见遇,旅寄寺中。敬相公翔谓杜曰:“希先辈稍削古风,即可进身。不然者,虚老矣。”杜遂课《颂德诗》三十章

① 详见《考证篇》“45 同谷子”。

② 张唐英《蜀桡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以悦太祖。议者以杜虽有玉堂之拜，顿移教化之词，壮志清名，中道而废。（《鉴诫录》卷九“削古风”）

天下方乱时，原有的统治者溺于弊乱，无力振起，因而并不留意讽谕一类诗歌。继起的统治者大多急于眼前事功，不顾苍生，不恤民力，自然也不理会那些要求轻徭薄赋的唠叨诗文。《孟子·离娄下》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焦循《正义》释云：“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守述职。巡守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史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以此证彼，虽时代悬隔，而事理如一。

儒者献诗，意在拨乱反正，但是，天下愈乱，统治者愈昏庸，纳谏愈难，政治讽谕诗的补察功能也愈弱，这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悖论。这是儒者的悲哀，还是儒家诗论的悲哀呢？

政教类诗歌中的优秀作品多是批判现实而并不直接用以规谏的诗歌。这些诗歌揭露政治的缺失、现实的黑暗，表现民生疾苦和社会的不平。唐诗本事多记此类诗歌：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僚，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斗则退，武者兵益黷。军容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疮，分为猛士禄。雄雄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为一川肉。时有践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閤里，怨气成山谷。谁能听鼓声，不忍看金镞。念此堪泪流，悠悠颍川绿。”吟此诗，有以见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北梦琐言》卷二“授任致寇”）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億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

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北梦琐言》卷二“放孤寒三人及第”）

蒋贻恭，本江淮人，无媚世之谄，有咏人之才，全蜀士流，莫不畏惮。……《咏蚕》诗曰：“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缫丝怨恨长。著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衣上绣鸳鸯。”……又《咏安仁宰捣蒜》：“安仁县令好诛求，百姓脂膏满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肠肚作馒头。长生岁取餐三顿，乡老盘庚犯五瓿。半醉半醒齐出县，共伤涂炭不胜愁。”（《鉴诫录》卷四“蜀门讽”）

此外，还有本事中的政治讽刺诗。此类诗歌前文已有论及。

这些诗歌除揭露为政的失误、官场的腐败和官吏的苛酷外，主要表现赋税徭役的苛繁沉重。一些诗歌或揭露沉重的徭役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灾难，或表现苛繁的赋税造成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赋税问题是封建时代最基本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在王朝末期愈加严重，常常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和王朝更替的原因。这些社会黑暗、社会矛盾表现在诗歌中，诗人的用意自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发挥诗歌补察时政的功能。对于统治者来说，若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态度，善采其言，修明政治，缓和社会矛盾，则诗歌补察之功，信无虚言。

除讽谏之外，诗歌还有教化功能。诗重教化在晚唐五代大约已成共识，教化之有无时或成为衡量诗歌高下的尺度。《北梦琐言》卷五“李远讥曹唐”条注云：“世谓（许）浑诗（李）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此种文学习尚也见于本事：

于濇为诗，颇于教化，《对花》诗云：“花开蝶满枝，花谢蝶还希。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又有唐备者，与濇同声，咸多比讽。有诗曰：“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题道傍木》云：“狂风拔倒树，树倒根已露。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又

曰：“一日天无风，四溟波尽息。人心风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别家》曰：“蝉鸣槐穗落。”又有《离家》诗曰：“兄弟惜分离，拣日皆言恶。”皆协《骚》、《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卢瓌《抒情》）

罗邺工诗，《春游郁然有怀》云：“芳草如烟处处青，闲门要地一时生。年来检点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同上）

其他如前引聂夷中《公子家》，前文论及的有关道德、人格批判的讽刺诗，均反映晚唐五代诗之教化意识的觉醒。这些诗歌多以道德伦理为主题，表现世道人心。或言是非好恶的颠倒，如聂夷中《公子家》；或言世情的淡薄，如于湊《对花》，罗邺《春游郁然有怀》；或言人心的险恶，如唐备“一日天无风”诗；或言道德失范，如一些讽刺诗，等等。这些诗歌大多伤时骂世，寓讽世警世之意。除此之外，也有褒美旌善一类诗，寓劝世之意，如唐备《离家》诗。唐中期以后，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世风浇薄，道德缺失，人心不古，教化一类诗歌具有校正末俗的意义。

政教一类诗也包括颂美之词，这是继承《诗经》颂诗的传统。《鉴诫录》卷五“知机对”记孟蜀高祖削平东川董璋一事，文末所录举子勾龙逢献贺捷诗即为颂美诗。但政教诗既以“化下”、“刺上”为其旨归，功比药石，意重针砭，则颂美之诗只能僻处一隅，数量极少，不能为人所关注。

二、诗是沟通的纽带

孔子论《诗》，谓“诗……可以群”（《论语·阳货》），伪孔传曰：“群居相切磋。”（《论语集解》）朱熹注曰：“和而不流。”（《论语集注》）但实际上，“诗可以群”是指《诗》可以成为志意表达和情感交流的手段，学《诗》诵《诗》能够协调人际关系。这一观点虽就学《诗》而发，但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重要影响。《诗品序》所谓“嘉会寄诗以亲”即“诗可以群”的诗论观念在创作中的表现。魏晋以来，应制、宴游、赠答、唱和、送别等诗歌大量涌现，这些诗歌，或协调君臣关系，或活跃社交气氛，或增进友情，或交流思想，总之，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已经成为人际交流的工具，是沟通的纽带。

这一诗歌功用在唐诗中普遍存在。唐人写有大量的应制、游宴、赠答、唱和、送别诗，这些诗歌不仅为单篇，也以结集形式出现，如《景龙文馆

记》、《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吴兴集》、《汝洛集》、《洛中集》、《洛下游赏宴集》、《汉上题襟集》等,就是一些文学群体游宴往还之诗的结集。此类结集的出现说明诗歌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这种工具性的、应酬性的诗歌并不在意情志的表达,诗人注重的乃是创作本身,因此,此类诗歌一般形式重于内容。但是,也有一些诗歌具有确定的交际目的和写作动机,注重志意的表达和情感的交流,这些诗歌更能体现“诗可以群”的社会功能,是诗歌作为人际沟通纽带的完全形式。

从唐诗本事中的载述看,此类诗歌涉及两大主题。其一是渴慕迁擢,企求援引。《本事诗·嘲戏第七》记载,沈佺期以罪贬,后遇恩复其官秩,但朱绂未复。曾侍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多求迁擢,沈佺期因撰《回波乐》词,曰:“回波尔似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赐之。御史中丞崔日用亦撰词,中宗亦以绯鱼赐之。《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引《诗史》记载,褚载家贫,以诗投襄阳节度使邢君牙,有“一卷新书满怀泪,频来门馆诉饥寒”之句,君牙赠绢十匹,荐于方镇。第二年,褚载试举,君牙又荐于有司,因以擢第。又《唐诗纪事》卷四八记载,陆希声善书法,曾以笔法授沙门谥光。后谥光入长安,为翰林供奉,而陆希声犹未显达,遂以诗寄谥光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泝滸人。”谥光感其言,荐于贵倖,后位至宰相。以上三则本事,第一则记朝中官僚撰词以冀帝王恩赐,求得迁擢。类似的还有宋之问因求为北门学士未成而作《明河篇》的故事。后两则记落魄的士人投寄权贵,企求援引。前者为应制一类诗,后者为投寄一类诗。唐人对功名富贵怀有强烈的进取之心,干谒权门,寄诗权贵,乃士人常态。这一类诗对权门势要的预期,对功名富贵的渴求,常常见于言表。应该说,此类诗歌的内容风格及写作目的与唐人用以求仕的书信并无二致。

此类诗歌的另一主题是自明心迹,消除矛盾隔阂。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隔阂因沟通而消除,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能传达幽微曲折的内心世界,曲尽人意,因而成为此一沟通的常用形式。《明皇杂录》卷下记载,张九龄为相时,与李林甫同列。林甫屡于玄宗前中伤张九龄,九龄因作《归燕》诗以贻林甫,自明“无心与物竞”之意。“林甫览之,

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记载，牛僧孺早年投贄于刘禹锡，刘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后二十余年，牛僧孺历宰相，为淮南节度使^①，刘禹锡为汝州刺史，途经淮南，与牛僧孺相会。僧孺诗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之句，言及前事。刘禹锡作《奉和牛尚书》，诗有“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等语。僧孺吟其诗，“前意稍解”。又《鉴诫录》卷一〇“蜀才妇”记载，薛涛“容姿既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韦皋镇成都时，欲奏为校书，宠遇一时。然薛涛性狂逸，“所有见遗金帛，往往上纳”。后韦皋知觉，怒而不许从官。“涛献《五离诗》，情意感人，遂复宠召”。以上三则本事中的事主，或因猜忌而产生矛盾，或因接物不周而出现隔阂，或行为犯规而遭厌弃，诗歌能自明心迹，求得对方的谅解。一般来说，诗歌是一种良性互动的交流形式，这种沟通易于见效。

诗歌作为人际交流的形式具有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首先表现于诗歌的抒情言志性质。人际的沟通需要志意的传达，更需要情感的交流，而诗歌最能体现这种需要。孔子说：“兴于诗。”朱熹注曰“感发志意”（《论语集注》），实为情感的激发。唐人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见则感易交”^②，而以情感人又非诗莫属。正是了悟其中的奥妙，一些寄赠诗以情感的抒发为主，如下面的本事诗：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颖。岁久，颖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颖牧之眷深，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等，似无返旧之心也。……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别倚丝萝之势，对镜自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范，遽有隼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云溪友议》卷

① 按：原作“汉南”，应为“淮南”。

② 见《全唐文》卷六七五白居易《与元九书》。

上“真诗解”)

薛媛寄夫诗抒写容颜衰老的感伤和夫妻分离的幽怨,写真寄诗意在打动夫婿,令其回心转意。毫无疑问,楚才的转变正因为情所感。同类故事还有《云溪友议》卷上“毗陵出”中三史严灌夫与妻慎氏的故事。

诗歌的感发作用有时需要借助特定的情境,需要某种触媒。为使诗歌足以感动人心,诗人往往刻意捕捉这样的情境和触媒。请看下面的本事: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相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僚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謬谗,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明皇杂录》卷下)

另外,《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引《诗史》记载:“伍乔张洎,少相友善。张为翰林学士,眷宠优异。伍为歙州通判,作诗寄张,戒去仆曰:‘张游宴时投之。’一日,张与僚友近郊会燕,欢甚,仆投诗。诗曰:‘不知何处好消忧,公退携壶即上楼。职事久参侯伯幕,梦魂长绕帝王州。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绕郡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时谁伴出城游?’得诗动容久之,为言于上,召还,为考功员外郎。”投赠时机的选择无非是为了强化诗歌的感发作用。这一举动虽出自机谋,却也说明人际沟通中诗歌用为情感交流的重要意义。

诗歌作为人际交流形式的另一优势是其深婉含蓄的表达方式。诗歌表情达意一般委婉含蓄,避免直露,此类诗歌因此多用比兴、寓托方式。宋之问《明河篇》以“明河可望不可亲”喻职位的可望不可求,言浅意深。张九龄《海燕》诗以海燕自喻,以禽鸟的委时无心寓己之与世无争,比喻

贴切,措辞得体。薛涛的《十离诗》虽为咏物诗^①,但借物喻人,自明心迹,表明诗人对府主的依附与眷恋,其情可感。如果说以上诗歌用意心切,意味较为显露,那么下面的本事诗则寓意更为深婉:

朱庆馀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焉。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朱君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公。张公明其进退,寻亦和焉。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云溪友议》卷下“闺妇歌”)

朱庆馀诗以女子的画眉喻诗歌写作,张籍和诗以越女的明艳喻朱诗的华美动人。两人诗歌虽有确定的文意指向,但全诗出以生动的形象和浓郁的生活情趣,表层意旨自足,读其诗能令人忘其本旨。

一般来说,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具有心理暗示作用,便于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沟通更为容易。同时,这一表达方式易于产生联想,蕴含丰富,沟通也更为充分。

三、诗是调适的手段

诗歌不仅满足政教和人际交流的需要,也满足内在的心理需求,是心理调适的手段。就唐诗本事所及,这种心理调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宣泄与满足,二是自持与自适。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

^① 据《鉴诫录》卷一〇“蜀才妇”,《五离诗》包括《犬离主》、《鱼离池》、《鹦鹉离笼》、《竹离丛》、《珠离掌》。又《唐摭言》卷一二作《十离诗》,还包括《笔离手》、《马离厩》、《燕离巢》、《鹰离主》、《镜离台》。《唐摭言》以《十离诗》属元稹在浙东时僚佐“薛书记”,记载有误。今推其致误之由,当是薛涛曾被称为“女校书”,一误而为“书记”。又《云溪友议》记载,薛涛曾委身元稹,于是再误为元稹之僚佐。《唐摭言》引白居易诗《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中“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惟无薛秀才”两句,误为元稹诗,坐实“薛书记”为元稹之僚佐。

自然。”所谓“自然”，是说无论“感物”还是“咏志”，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过程。“应物斯感”出于自然，感而生情，情有不得已者，借诗以发抒，也
是出于自然。后之所谓自然，正是作为人之天性的宣泄与满足的心理
需要。

与情感宣泄密切相关的是孔子提出的“诗可以怨”的著名命题。这
一命题原本言《诗》，但后来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诗歌中因此出
现怨刺和怨愤两大主题。一般来说，“怨刺”指怨刺上政，近于讽谏，其发
挥的是政教功能。“怨愤”则偏指个人情感的宣泄，多属忧思积郁，愤懑
不平。唐诗本事中有很多以“怨愤”为主题的诗歌。《本事诗·怨愤第
四》专选怨愤一类本事，其中吴武陵题路左佛堂诗、李适之罢相诗及贾岛
题兴化池庭诗均表现诗人的怨愤不平^①，是泄愤之作。这些本事在记载
诗歌创作的原因时都强调诗人难以抑制的愤怒情绪。题路左佛堂诗事谓
“武陵不胜其愤”，罢相诗事谓“适之意愤”，题兴化池庭诗事谓贾岛“怨愤
尤极”，这些强调意在说明诗歌之作是为了宣泄心中的怨愤不平。《本事
诗》中，怨愤类本事的选编受《世说新语》“忿狷”类故事的影响。忿狷故
事多记魏晋时人性情褊急发泄愤怒的种种举动，如王蓝田食鸡子不得而
迁怒于鸡子，袁彦道因博齿不合而怒掷五木，等等。发泄愤怒是怨愤类本
事与忿狷类故事的共同主题，也是怨愤类本事诗的主旨。前文已论及，怨
愤类本事乃唐诗本事之一大类。除《本事诗》所录及《玉泉子》中高湘“愤
(高)湜不佑己”而赋“唯有高州是富家”一事外，怒而为诗的显例还可举
出以下两条：

崔珣佐大魏公幕，与副车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荐之于朝。崔拜芸
阁雠校，纵舟江浒。会有客以丝桐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
马迎珣，共赏绝艺。珣应召而至，公从容为客请一篇，珣方怀怫郁，因
以发泄所蓄。诗曰：“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唯有河南
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公大惭恚。（《唐摭言》卷一一）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

^① 吴武陵诗事为附会，参见《考证篇》“24 吴武陵”条。

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南部新书》丁）

时人论诗人性情，或谓褊躁激讦，这种负面形象多半得自怨愤一类诗歌。所谓褊躁激讦是说诗人易感易怒，遇有怨愤不平，往往不能已于言，必于诗焉发之，亦即所谓“愤怒出诗人”。这种性情在诗人中普遍存在，唯其如此，抒写怨愤，宣泄不平，成为诗人普遍的心理诉求。

除怨愤外，伤悼也是唐诗及唐诗本事的重要主题。伤悼诗起于悲悼亡人。亲爱亡故，悲不自胜，哀哭之外，继之以诗。顾况丧子诗即因此而作：

唐著作郎顾况，字逋翁……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间闻之，甚悲忆，遂以情告冥官，皆悯之，遂商量却令生于况家。（《北梦琐言》卷八“顾非熊再生”）

哀痛已极，长歌当哭。伤悼诗既是哀痛的歌哭，那么，其对痛苦的宣泄实与恸哭无异。

伤悼诗对悲哀情绪的宣泄与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有关。以悲为美大约始于汉代，魏晋诗歌多以悲伤为主题，以悲为美乃一时审美习尚。《晋书·袁山松列传》记载：

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

以悲为美，以歌哭为行乐。羊昙唱乐的故事见于《晋书·谢安列传》：

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由前文所谓“三绝”推测,羊昙所唱之乐当为悲哀的乐曲。不管是唱乐还是诵诗,都是宣泄难以自己的悲感。这种以悲为美的倾向正是文学艺术自觉的标志,也是文学以抒情为本位,从而发挥心理调节功能的标志。这一审美风尚及文学功能为唐诗中的伤悼诗提供了注脚。

怨愤诗和伤悼诗的心理调节功能可以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和音乐对观众和听众具有“净化”作用。“‘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①。“净化”说虽是探讨艺术的接受心理,但也能用以说明艺术的创作心理。

诗歌不仅有助于激烈情绪的宣泄,而且可以成为欲望的替代性满足。这一点在“诗歌的本质”部分已有论及,兹不赘述。

怨愤悲愁固然可以借助艺术的宣泄,使内心达于平静,但此一过程本身有时也是一种心理考验。苏轼评孟郊诗云:“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②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感情激荡过程。这一过程因为容易造成心理乖张而为诗人视为畏途,因此,对穷愁、寒苦、失意、悲哀,对人生忧患,一些诗人常常采取与宣泄有所不同的排解方式,或压抑,或转移,或消解,因以自守,获得心境的平和,这就是所谓自持。唐诗本事对此一创作心态也有所涉及:

戴衢久不第,尝夜吟曰:“扰扰东西南北情,何人于此悟浮生?还缘无月春风夜,暂得独闻流水声。”又云:“坐落千门日,吟残午夜灯。”(《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四引卢瓌《抒情》)

①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② 《苏轼诗集》卷一六《读孟郊诗二首》。

(韦澳)入为户部侍郎,转吏部,綰综平允,不受请托。为执政所恶,出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宰相杜审权素不悦于澳,会吏部发澳时簿籍,吏缘为奸,坐罢镇,以秘书监分司东都。尝戏吟云:“若将韦鉴同殷鉴,错认容身作保身。”此句闻于京师,权幸尤怒之。(《旧唐书·韦澳传》)

戴衢虽久试不第,但其诗歌并不表现科场失意的悲哀。夜吟诗抒写诗人夜中收视凝听时的感受,其境唯春风流水,其情则恬淡闲适。在诗人那里,纷扰的世情已不再介怀,人生失意的悲哀在自然山水的观照中消解。这一创作心态与孟郊出愁肺腑的创作心态形成鲜明对照。孟郊《落第》诗云:“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独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鸛鹤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①同样的境遇,前者恬淡以自持,后者悲愁以自伤,心理调节方式判然两样。相对于科场失意而言,官场的贬谪或许更是人生的不幸。韦澳身遭贬斥,但并无恨恨不已的怨愤和悲天悯人的忧伤。他的诗句虽不无怨望之心,但感情并不强烈,诗中幽默轻松的笔调倒是显示了诗人身处忧患的旷达与平和。这一创作倾向与感慨愤郁的楚骚传统有所不同。

诗歌不仅是抒情的工具,也是娱心的手段。中晚唐至于五代,诗重苦吟,讲求诗歌艺术的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诗话总龟·前集》卷一〇引《郡阁雅谈》记载:

刘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师林宽,为诗刻苦,不惮风雪。诗云:“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言不虚耳。……尝与人论诗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乱着一字,屠沽辈也。觅句者若掘得玉匣,有底有盖,但精求,必得其宝。”

这种刻苦锤炼、精益求精的诗风在晚唐五代已十分普遍。林嵩《周朴诗集序》记载:“先生为诗思迟,盈月方得一联一句,得必惊人,未暇全篇,已布

^① 《孟东野诗集》卷三。

人口。”而下开晚唐五代苦吟诗风的一代宗师贾岛更是苦吟精求的代表人物。贾岛吟成“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后，以诗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诗注及“推敲”的传说后来成为贾岛苦吟的经典故事。

这种苦吟自然是艺术创造的需要，但同时也是一种心理需求，因为苦吟不只是艰辛与劳苦，还伴随着搜寻的欣喜、创造的满足和审美的愉悦。因此，一些潦倒落魄或耿介自守的诗人往往寄情于诗歌，以诗歌创作为其人生执守，吟诗成为生活的必需，人生的寄托。《诗话总龟·前集》卷一〇引《郡阁雅谈》记载：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苦吟风月，终于贫病。妻黄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然烛，供具纸笔，元甚重之。有《听琴》诗曰：“拂琴开素匣，何事独擎眉？古调俗不乐，正声公自知。寒泉出涧涩，老衲倚风悲。纵有来听者，谁堪继子期？”好事者画为图。

王元夫妇共持雅操出于共同的好尚，其执着忘我的苦吟乃是两人生活的一部分。此一记载正是艺术化人生的生动写照。

这种以艰辛为逸乐的创作心态及审美情趣反映了诗歌的自适功能。苦吟自适的心理机制及其功能或可从贾岛《戏赠友人》诗中得到解释，诗云：“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绁。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泠。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①心源如井，吟咏如汲，这是形象贴切的比喻。汲引是朝朝之事，吟咏也是日日之事，正如生活离不开汲引一样，生活也离不开吟咏。心源的涌动意味着生命的勃动与充实，因而吟诗为文，虽词多苦辛，却也不无人生之适。

从对诗歌艺术的精求而言，苦吟似乎属于“为艺术而艺术”一路，但作为一种人生寄托，苦吟又具有“为人生”的意义。

^① 《全唐诗》卷五七一。

第三节 诗歌的法则

唐人对诗歌创作法则的讨论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诗歌创作的方法技巧,二是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前者是诗格一类著作讨论的对象,后者则主要见于唐人诗文和唐诗本事。唐诗本事所涉及的诗歌法则是多方面的,就其大者而言,一是虚实问题,二是雅俗问题。本文拟从以上两方面对诗歌法则作一探讨。

一、诗之虚实

诗之虚实首先是一个内容表达的问题。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对外部世界的描写和对内心世界的表现需以现实为依据。但是,文学反映现实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学描写也有尚实和尚意之分,因此,不同的文学作品,其真实性要求并不一律。

对于直接表现现实的诗歌,唐人有较为严格的真实性要求,诗歌中的描写必须与现实吻合,不违背事理。一些本事反映了这样的要求: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援笔为赞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朝野金载》卷四)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北梦琐言》卷六“以歌词自娱”)

权龙襄夏日诗不顾时令气候、日月阴阳,竟然夏行冬令,月作日貌,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悖事理,因此成为一时笑柄。唐诗中的景色描写常常具有纪实性,脱离实际的景物描写视为异常。《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记李群玉《黄陵庙》诗云:“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脚

踏欲改之。”也是遵循纪实原则。因此,后世考订唐诗的创作时间,常以诗中的景物描写为依据。韦庄讳言《秦妇吟》的原因,今人解说不一,但据《北梦琐言》的记载,则是诗中“内库”两句描写受到公卿的质疑。公卿们对诗中与实际不尽相符的夸张描写不以为然,这种近乎吹毛求疵的“垂讶”可能只是借故生事,并不属于文学批评,但这一行为也隐含了一种文学观念,即文学描写,特别是诗中的纪实性描写,要求细节真实,不无中生有,不夸大其词。这种对纪实性作品的真实性要求同样体现在唐人对王建《宫词》的认知上。王建《宫词》100首,内容涉及朝廷政务,宫中执掌,天子游猎,宫廷行乐,还有宫中节令,宫女生活,多为时事。《云溪友议》卷下记载,王建与宦官王守澄先是互通款曲,后因发生过节,王守澄以王建“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为辞,欲行奏劾。王建于是赠王守澄诗,以“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两句归罪守澄,以塞其口。前已论及,这篇故事为附会之谈,并不确切。不过,这篇虚构的故事倒是反映了唐人对《宫词》一类记事诗的写实要求:凡记事,多采用第一手材料,有目击者,见证人,或事件的当事人,有可靠的消息来源,非道听途说,亦如今之新闻报道——这些要求均符合今之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

唐人对虚实的要求有时延伸到诗歌境界。中唐诗歌中的险怪一派常以虚幻荒诞的意象构筑诗境,晚唐五代诗则校之以实,一些诗歌虽取境奇僻,但仍以实为贵。《鉴诫录》卷五“容易格”记载:

卢(延让)曾献太祖,卷中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后太祖冬夜与潘枢密峭在内殿平章边事,旋令宫人于火炉中煨栗子,俄有数栗爆出,烧损绣褥子。时太祖多疑,常于炉中烧金鼎子,命徐妃二姊妹亲侍茶汤而已。是夜官猫相戏,误触鼎翻。太祖良久曰:“‘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忆得卢延让卷有此一联。”乃知先辈裁诗信无虚境。

又《北梦琐言》卷七记载:“唐卢延让业诗……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潜亲见此事,每称赏之。”诗歌中的意象本不必曾

有,也难以坐实。上引本事中的求实倾向未免过于拘泥,不能成为文学的法则,但在当时却是普遍存在的文学观念。

在诗歌的虚实问题上,求真求实并非唐人创作规范和审美观念的全部,“虚而不实”现象在唐诗中也普遍存在。请看下列本事:

江西韦大夫丹,与东林灵澈上人,鹭忘形之契。篇诗唱和,月居四五焉。序曰:“澈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味之,皆丽绝于文圃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卜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尔而游,不假东门之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羽翼,松径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霄,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谭玄,幸先达其深趣矣。”予谓韦亚台归意未坚,果为高僧所诮。历览前代散发海隅者,其几人乎?寄庐山上人澈公诗曰:亚相丹:“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澈奉酬诗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云溪友议》卷中“思归隐”)

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宣宗曰:“比闻李远诗云:‘长日惟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幽闲鼓吹》)

韦丹虽声言“归休”,但并非真的要实行。不过,从他与灵澈深交及上引诗序看,向往隐逸之心还是有的,只是“归意未坚”,因而他的诗作与“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①的伪文学有所不同。灵澈的讥诮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诗应写实,其人不可信;二是诗不足有实,其诗不可信。灵澈是著名诗人,对“诗人之言,不足有实”的内情应是了解的,他对韦丹的讥诮应是基于后一种理解。不管是韦丹诗还是李远诗,都

① 《文心雕龙·情采》。

可成为“诗人之言,不足有实”的证据。但是,这并不妨碍诗人对情志的表达,也不妨碍读者对诗歌的接受。诗歌或叙事写物,或抒情言志,常用夸张、假借、变形等表现方式,不必尽实。常有论家忽略这一点,对诗歌作出胶柱鼓瑟的解读。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云:

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

对杜甫诗的评价后来引出一段公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诗话》、《遯斋闲览》、《学林新编》及《诗眼》等书进行辩驳,《诗眼》云:

形似之意,盖出于诗人之赋,“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语,盖出于诗人之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是也。古人形似之语,如镜取形,灯取影也。故老杜所题诗,往往亲到其处,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见一时之意。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两体耳。

论谓诗有“形似之语”和“激昂之语”,“形似之语,如镜取形,灯取影”,此尚实之意;“激昂之言,……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见一时之意”,此尚意之旨。虚与实表现为尚意与尚实的区别。以此衡彼,则前引韦丹、李远诗均为尚意之作。

正像宣宗对李远诗句心存疑虑一样,这种尚神意而略形迹的诗歌易为后人误解。除上引白居易、杜牧诗外,还可举出以下两例:

杜牧《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诗人玉屑》卷七引《邈斋闲览》）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开元十二年，宁王宪、邠王守礼以二十九年，弟岐王范以十四年，薛王业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宝时已无存者。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而元稹《连昌宫词》云：“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李商隐诗云：“夜半宴归官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皆失之也。（《容斋随笔》续笔卷二“开元五王”）

杜牧、元稹、李商隐诗都涉及史实的真实性问题，上引诗论认为失实而不可取。此一论调后来遭到针锋相对的反驳，如下引诗论：

按史云：“睿宗六年，王德妃生业，初王赵，降封中山王，进王薛，开元二十二年薨，子琬嗣。”此诗与微之词岂俱指嗣王欤？昔之作者，微文刺讥，不必一一核实。（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卷二“龙池”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夜半宴归官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句意愈精，筋骨愈露。然此但假借立言耳。泥者谓二王迥不同时，则痴人说梦，难以口舌争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

朱鹤龄、胡应麟关于虚实问题的观点与“诗人之言，不足有实”的说法相呼应，是符合文学创作的要求的。

尚意略形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在绘画中。《梦溪笔谈》卷一七云：“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又《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八一引《寓意编》云：“右唐王维画济南伏生像，……但古人之坐以两膝着

地,未尝箕股,而秦汉之书当用竹简,今像乃箕股而坐,冯几伸卷,此则余所未晓,抑余闻维尝画雪中之蕉,毋乃类是,而不必拘拘于形似者邪?”^①与沈括持论相同。沈括论画如此通达,然其论诗又何其固陋。仰面自唾,竟浑然不觉。其实,诗、画一理,尚意略形正是时代的艺术精神,或普遍存在的艺术规律。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诗忌”云:“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墨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皈欵寄此生。’坡在僭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予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吾论。予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余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驎略玄黄。’”王安石方大拜时作方外之想,与韦丹居官而思归无异;苏轼诗有潇洒情怀而语意不无夸张,与李远“长日”句无异。惠洪谓王安石、苏轼诗句正如王维之画雪里芭蕉,取其神理而不问寒暑,又如九方皋相马,得其神骏而略其玄黄。这实在是深知诗、画的确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八论王维诗云:“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明乎此,就不会苛责白居易《长恨歌》诗假借峨嵋,而杜牧《华清宫》诗移易寒暑了。

虚与实不仅是内容表达的问题,也是一个语言表达的问题。

唐人诗歌中存在一种避实就虚的语言表达方式。《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黜”云:

湖州崔郎中刍言,初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华。德华者,乃刘采春女也。虽《罗唢》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滕迈郎中一首:“三条陌上拂金羁,万里桥边映酒旗。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中吹。”贺知章秘监一首:“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①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月春风是剪刀。”杨巨源员外一首：“江边杨柳曲尘丝，立马凭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应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刘禹锡尚书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至今朝。”韩琮舍人二首：“枝斗芳腰叶斗眉，春来无处不如丝。灞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又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云溪子曰：……杜牧舍人云：“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带风。”滕郎中又云：“陶令门前胃接离，亚夫营里拂朱旗。”但不言“杨柳”二字，最为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傍亭子》诗云：“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道者杖藜归。”不谓“亭”，称奇矣。

虽咏杨柳，但诗中不言“杨柳”两字；虽咏亭，但句中并无“亭”字。对于所写对象，诗句或径行刻画，或用事连带，或以人事关联，但不直接说破。旁敲侧击，如庾词隐语，有想象的余韵。“云溪子曰”以上所引杨柳诗中，滕迈一首，贺知章一首，韩琮二首，都用这种避实就虚的表达方式。同样的诗例宋人诗话也时有涉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五《宋朝杂记下》记载：

苕溪渔隐曰：“刘义^①《落叶》诗云：‘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满廊僧不厌，一片俗嫌多。’^②郑谷《柳》诗云：‘半烟半雨溪桥畔，间杏间桃山路中。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絮惹春风。’或戏谓此二诗乃落叶及柳谜子，观者试一思之，方知其善谑也。”

这种避实就虚的描写在韩愈诗中也能找到例证。《梦溪笔谈》卷一四云：“退之《城南联句》首句曰：‘竹影金锁碎。’所谓金锁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题中有日字，则曰‘竹影金锁碎’可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邈斋闲览》云：“（沈括）又破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云

① 按：“义”当作“叉”。

② 《诗人玉屑》卷三引《冷斋夜话》、《诗林广记》卷二引《古今诗话》均作郑谷诗。

金锁碎者乃日光,题中无日字,不当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无日,影从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又《韩昌黎全集》五百家注引洪庆善语云:“谓日光在其中不必道破。若曰日影金锁碎,则不可也。”应该说,这一论析是对韩愈诗歌表达方式的一个发现。

诗歌中避实就虚的表达方式在宋诗创作中发扬光大,并因此成为宋人诗评的重要话题。《冷斋夜话》卷四“诗言其用不言其名”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东坡《别子由》诗:‘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后汉》注云:‘常置人于险处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避实就虚的表达方式演变而为“言其用不言其名”的诗歌法则。与“言其用不言其名”本同末异的是“言用勿言体”的说法。《诗人玉屑》卷一〇引《漫叟诗话》云:“尝见陈本明论诗云:前辈谓作诗当言用,勿言体,则意深矣。若言冷,则云‘可咽不可漱’,言静,则云‘不闻人声闻履声’之类。本明何从得此。”

不管是唐人的“不言‘杨柳’”等,还是宋人的“言其用不言其名”、“言用勿言体”,都是避免正面直说,用迂回侧面的描述——旁敲侧击,烘云托月,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藏头露尾,欲说还休,以至出以廋词隐语、典故歇后。这种避实就虚的手法具有重要的文学表现功能。首先,这种手法强调文学描写的形象性。所谓“言其用”即着眼于事物的具体形态和外在表现,使对象不停留于一般性概念,而获得鲜明具体的形象。前引杨柳诗或刻画杨柳的动态风姿,或表现与之关联的人情事象,无不形象可感,生动逼真。王安石诗以“鸭绿”指水,“鹅黄”指柳,色彩鲜明,其他诗句如“可咽不可漱”、“不闻人声闻履声”,将内在的感觉化为可视可听的外在形象。形象的描写赋予诗歌具象之美。其次,避实就虚的手法隐去对象的名称,在意象与所指之间留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如廋词隐语诗句,谜语式诗歌等,因而此类诗歌多具空灵蕴藉之美。

诗歌中避实就虚的表达方式与禅宗的语言表达方式颇有近似之处。

禅宗思想的传承据说原是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的。佛教认为真谛不可言说,斥言说为“戏论”,禅宗也视教籍为“魔说”、“粗言”、“死语”,认为“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①。但是,晚唐五代时期,禅宗弃绝言路的禅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禅门盛行呈公案,斗机锋,说公案,谈“话头”,“不立文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这一时期,禅门对语言的表达方式进行探索,在言与不言之间寻找表达的新路径。“五家七宗”之一的曹洞宗即以“不犯正位,语忌十成”^②为其禅门家风。这一表达方式对诗歌创作发生了影响。任渊《后山诗注目录序》评陈师道诗云:“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记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对曹洞家风深有所悟的惠洪提出诗歌创作需“言其用不言其名”,或许正是得此启发。“不犯正位”一类表达方式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并不始于宋代,晚唐五代即已见其端倪:

王贞白,唐末大播诗名,尝作《御沟》诗云:“一派御沟水,绿槐相荫青。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鸟道来虽险,龙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愿向急流倾。”示贯休,休曰:“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书一“中”字于掌。逡巡,贞白回曰:“此中涵帝泽。”休以掌中示之,不异所改。(《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青琐后集》)

前辈许棠《过洞庭》诗,最为首出,尔后无继斯作。诗僧齐己驻锡巴陵,欲吟一诗,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戏谓己公曰:“题洞庭者,某诗绝矣,诸人幸勿措词。”己公坚请口札,押衙抑扬朗吟曰:“可怜洞庭湖,恰到三冬无髭须。”以其不成湖也。诸僧大笑之。(《北梦琐言》卷七“洞庭湖诗”)

贯休所谓“剩一字”,即多余一字,需要割弃。言“此波”即所谓“言其名”,是“犯正位”,去之则“不犯正位”。就语言的表达效果而言,“此波”板滞直露,“此中”则空灵蕴藉,显示“不言其名”的好处。洞庭湖诗句借髭须

① 《五灯会元》卷一二《金山昙颖禅师》。

② 惠洪《林间录》卷上。

之“胡”谐洞庭之“湖”，以“髭须”两字代替“湖”字，这是运用度词隐语，避免直说点破，也是“不言其名”的诗法。贯休、齐己为唐末五代高僧，前一本事谓贯休有去实就虚的独得之秘，后一本事以齐己为语言公案的破解者，大约是因为两人的禅学背景，就是说，诗歌中避实就虚的表达方式源出禅门，以僧人的解悟最为透彻。《云溪友议》的作者以诗中“不言‘杨柳’”、“不谓‘亭’”为奇妙，大约也是受了禅门习气的影响。

二、诗之雅俗

雅与俗是相对于文学传统而言的。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话语系统和意象系统，也逐步确立了对于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的要求。遵循已有的传统，遵循惯例和共识，就成为“雅”。偏离传统和要求，引入世俗生活中不见于经传、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和意象，就是“俗”。唐代诗歌先是以《文选》为传统，继以儒家经传为渊薮，采摘史传诸子，旁及佛道经典，小说家言。唐人尚雅鄙俗，其诗歌语言、意象多以此为畛域。

尚雅倾向首先表现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

唐人诗歌用字造语讲究出处，回避不见于经典文献的方言俗语。《刘宾客嘉话录》载有一则刘禹锡读书为文故事，从中不难窥见唐人诗语规范。其文云：

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飏。”^①尝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箫处注云：即今卖飏人家物。六经唯此注中有“飏”字。吾缘明日是重阳，欲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

这里所谓“有来处”、“有据”，指儒家经传、史籍，这是唐代士人攻读的最

^① 按：《沈佺期诗集》卷二《岭表寒食》云：“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飏。”《宋之问集》卷二《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云：“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本事引文乃刘禹锡误记。

基本的文献,也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语言的基本来源。刘禹锡自谓为诗用字不出六经,可见尚雅的要求是严格的。

因为尚雅,唐人轻视方言俗语,以诗用方言俗语为另类。请看下引本事:

唐高相国崇文,本蓟州将校也,因讨刘辟有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渤海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虽武人,亦有一诗。”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髀儿射落雁,白毛空里落纷纷。”其诗著题,皆谓北齐敖曹之比也。(《北梦琐言》卷七“高崇文相国咏雪”)

文中有注云:“渤海鄙言多呼人为‘髀儿’。”高崇文乃武人,无文华,自称“鄙夫”,诗用方言俗语,自无足怪。敖曹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二五八引《启颜录》,文云:“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用字遣词,皆鄙陋粗俗,高崇文诗即其类。

唐人不仅轻视不见于经典文献的方言俗语,还鄙弃一切粗俗的语言,诗语粗俗不仅视为为诗之病,还会成为一时笑柄: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娘。”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鷁子檐前飞,直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便转,集得野泽蛭娘。”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援笔为赞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朝野僉载》卷四)

权龙襄诗措辞不雅,语近滑稽,未免落入打油一格,故为谈者嗤笑。即如《夏日》诗两句,胡应麟也认为“自是其语可笑,非以不切故”^①。这些粗鄙滑稽的诗作成为戏谑的雅谈,后来竟流为一家诗体。《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录郑愚《拟权龙襄(按:应为:“襄”)体赠鄂县李令及寄朝右》云:“鄂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诗中“弄”、“手子动”等语,粗俗鄙陋,诚龙襄诗体。当然,郑愚以俗语为诗,意在借用权龙襄体滑稽幽默的风格,以收讽刺之效,并非无文而鄙俗。

尚雅言而鄙俗语一直是唐诗的主流,这一倾向在唐末五代诗本事中仍清晰可见。《北梦琐言》卷七“郑准集军书”记载:“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陈、阮,自集其所作为三卷,号《刘表军书》。虽有胸襟,而辞体不雅……应举日,诗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按本事之意,不惟文笔“辞体不雅”,诗语所谓“横身立”、“揭尾跳”,亦粗俗鄙陋,措辞不雅。朝士的讥笑见出时代的尚雅风气。

尚雅倾向还表现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

诗歌虽然是生活的反映,但并非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能进入诗歌。意象的选择既受已有诗歌意象系统的限制,又受传统审美趣味的规范。一般来说,诗歌中的意象要求摆脱凡近,能给人美感,鄙事俗物,人不以为美者,则不堪入诗。唐诗中有越此规范者,常常为人讥贬,或引以为戒。《北梦琐言》卷七“洞庭湖诗”记载:

有包贺者,多为粗鄙之句,至于“苦竹笋抽青橛子,石榴树挂小瓶儿”。又云“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鞞鞋”。又云“棹摇船掠鬓,风动竹捶胸”。虽好事托以成之,亦空穴来风之义也。卢延让哭边将诗曰:“自是晒沙发,非干炮石伤。牒多身上职,盎大背边疮。”人谓此是“打脊诗”也。……顾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驻马上山阿。”久思不得,顾曰:“何不道‘风来屎气多’?”秀才云:“贤莫无礼。”顾曰:“是况。”其人惭惕而退。仆早岁尝和南越诗云:“晓厨烹

^① 胡应麟《诗数·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淡菜，春杼织橈花。”牛翰林览而绝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后方晓之。学吟之流，得不以斯为戒也。

包贺诗句中，“青橈子”、“小瓶儿”、“巾子”、“鞞鞋”，乃家用鄙物。“掠鬓”、“捶胸”，乃日常俗事。钱鍾书《管锥编》引高敖曹诗之后，又论云：“《北梦琐言》卷七载包贺断句：‘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鞞鞋’；‘棹摇船掠鬓，风动竹捶胸’；《类说》卷五三引《杨文公谈苑》载朱贞白咏月：‘八月十五夜，一似没柄扇’；皆此体。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高远者狎言之，洪大者纤言之，初非独游戏文章为尔。刻画而骛尖新，亦每游彀中而不悟。”^①已指出包贺诗取象鄙俗、刻画尖新的特点。卢延让诗及顾况对句中的取象，不仅鄙琐，而且丑陋恶浊，只是前者出于以丑为美、以俗为雅的审美趣味，而后者不过借机调笑。孙光宪诗句出自和南越诗，当叙写南越风土，其中“淡菜”当为南越所产。“淡菜非雅物”，光宪知其名而不知其物，因而误用于诗。“淡菜”不能入诗，正如“糕”字不见于六经而不能入诗一样，缘于唐人的尚雅倾向及由此产生的清规戒律。

尚雅之风在唐末五代也并非一律。写俗物鄙事的诗句有时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北梦琐言》卷七记载，进士陈咏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写俗物鄙事，虽不为诗人杜光庭认可，却为朝贵欣赏。朝贵的欣赏虽大半因其审美趣味，而非一定的诗歌主张，但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尚雅之风在悄然改变。这一改变可视为宋人以俗为雅诗风的先导。

宋人以俗语入诗，以俗为雅，殆为风气，其推波助澜且发扬光大者当首推苏轼。《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引《缙素杂记》云：

《西清诗话》言王君玉谓人曰：“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谓之‘待伴’，尝有雪诗：‘待伴不禁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待伴、羞明，皆俗语，而采拾入句，了无痕颣，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余谓非特此为然，东坡亦有之：“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

① 钱鍾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8页。

务。”又云：“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寻医、入务、风饱、水肥，皆俗语也。又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寝为“黑甜”，故东坡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亦用俗语也。

又《竹坡诗话》“东坡在黄州时”一条记苏轼小诗“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中“错著水”、“为甚酥”两语故事，并引东坡语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融化耳。”因此，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可见苏轼不仅是诗歌大家，也是运用俗语俚言的高手。

苏轼诗中以俗为雅的倾向还表现在意象的选择上。《新城道中》云：“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以絮帽喻晴云，铜钲喻初日。《游金山寺》云：“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以靴纹喻波纹，以鱼尾之色喻云霞之色。此亦所谓“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高远者狎言之，洪大者纤言之”，重蹈包贺、卢延让诗故辙。

苏轼的这些诗句并非单纯出于一己的审美趣味，而是以其明确的诗论主张为支撑的。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苏轼《题柳子厚诗》也说：“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所谓“以俗为雅”，即“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①。上引诗作是其诗论主张的自觉实践。

自唐至宋，诗歌经历了由尚雅鄙俗到以俗为雅的转变。唐诗本事中虽无以俗为雅的诗论主张，但其中诗作无意中预示和引导着逐渐到来的以俗为雅的诗风。

^① 钱鍾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1页。

第四节 诗歌的创作

一般来说,唐诗创作的中心任务是意境的创造。前文已论及,意境可分为以物寓情、物我冥一和虚我观物三种类型。其中,以物寓情旨在情志的表达,虚我观物重在境界的创造。情志的表达和境界的创造在唐诗本事中多有涉及,前者还具体表现为比兴的运用。本文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对二者作一探讨。

一、比兴的运用

比、兴出自《诗》之“六义”,比、兴之义最早见于汉人传注。《周礼·春官·大师》郑注云: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

郑众认为,比、兴是连类取比,托事喻意,二者均含比喻之义,属于诗歌的表现方法。郑玄的解释则有所不同,他虽也认为比、兴含比喻之义,但内容已限于美刺。汉人说《诗》都牵扯政教,此之美刺即言政教善恶,体现汉人说《诗》的特点。汉人对比、兴的解释后为唐人所阐发,并有所修正。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云:“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太宗令学者研习,《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经汉人传注和唐人义疏对唐诗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唐诗好用比、兴,唐诗本事对此多有记载。前文已述,比兴一类本事乃唐诗本事之一大类,此类本事记载诗歌创作过程,推原因由,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人运用比、兴的情形。

首先,唐诗运用比、兴,多是取譬引类,喻意于物。此类诗歌虽旨在抒

情言志,但不直书其事,而是借其他事物曲达其意。如孔绍安咏石榴,李义府咏乌,吕太一咏院中竹叶,张宣明咏孤松,张九龄作《燕》诗,章孝标作《归燕》诗,武瓘作《感事》诗,薛涛作《十离诗》,朱庆馀《闺妇歌》,章碣《东都望幸》,等等,莫不因物喻义,借事咏怀。比兴一类诗歌,意象构成颇为近似。孔颖达《毛诗正义》谓:“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词也。”兴多兼比,“举草木鸟兽以见意”不独兴体,比类也如此。孔疏所谓“草木鸟兽”虽多半指《诗经》中的意象,但移之以言唐诗中的比兴一类诗歌意象,也无不切合,上文所举即多为“举草木鸟兽以见意”的诗歌。此类诗歌因为喻意于物,所以含思婉转,寓意深微。《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白语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四言”即《诗经》,“四言”之“兴寄深微”,得之其普遍运用的比、兴手法。唐人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凡需含蓄婉转、言近意深者均用比、兴之法。前文已论及,唐人用以进行人际沟通的一些诗作多用比、兴手法,可为佐证。

其次,唐诗中的比、兴多表现一己之情感,与政教并无直接关联。唐人在诗歌创作中逐渐扬弃了比兴美刺主于政教的诗歌理论,将比、兴作为抒写一己情感的手段,政教色彩较为淡薄。比兴一类诗歌中也有美与刺,但此之美刺与主于政教的美刺意有不同。唐诗中的“美”主要表现为对个体人格、心胸怀抱及美质修能的称颂与赞美,如以下本事诗:

吕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自负才华而不即真,因咏院中竹叶以寄意焉。其诗曰:“濯濯当轩竹,青青重岁寒。心贞徒见赏,箨小未成竿。”(《大唐新语》卷八)

张文成以词学知名,应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转洛阳尉。故有《咏燕》诗,其末章云:“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时人无不讽咏。(同上)

吕太一咏院中竹叶诗以竹自喻,明其非凡的才华和忠贞的品性,颂竹而自颂。张文成《咏燕》诗今难见全貌,但从本事所叙所录看,此诗以燕之飞赴甲第喻其三登上第,也是一首自赞才质修能的颂诗。此外,还有《大唐

新语》卷八所载杜淹咏鸡诗赋予对象威武雄壮的气质、骁勇善战的品格和知分守节的心性,张宣明《咏孤松》诗、郭元振《古剑篇》赞美孤高的心性和耿介的怀抱。此类颂美诗已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颂》诗有所不同,其精神渊源是楚辞《橘颂》中的礼赞精神。

比兴诗中的“刺”诗与主于政教的讽刺诗也有所不同。唐诗中的比兴之“刺”多为一己怨愤的宣泄,社会政治的内容较为淡薄,如下列本事诗:

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诗刺之:“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唐摭言》卷九)

卢肇,袁州宜春人,与同郡黄颇齐名。颇富于产,肇幼贫乏。与颇赴举,同日遵路,郡牧于离亭饯颇而已。时乐作酒酣,肇策蹇邮亭侧而过,出郭十余里,驻程俟颇为侣。明年,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已下接之,大惭恚。会延肇看竞渡,于席上赋诗曰:“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衔得锦标归。”(《唐摭言》卷三)

章碣诗以女子的失意喻科举的失意,对科场竞争中机会的不平等愤愤不平。卢肇竞渡诗以龙舟竞渡得标喻其状元及第,“向道”两句隐含怨意。这些诗和诗句意在抒写一己怨愤,并无裨于政教的目的。《本事诗》中还录有所谓吴武陵咏雀题路左佛堂诗及贾岛咏蔷薇题兴化池庭诗,认为诗因“不胜其愤”、“怨愤尤极”而作,仍是表现一己怨愤。这些诗歌多抒写因遭受压抑、弃置而产生的愤懑不平,其艺术精神与楚辞相近。此类诗歌在唐诗中较为普遍。刘禹锡《读张曲江集作》引谓张九龄遭贬以后的诗作“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情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①,也是有取于《诗经》的比兴手法与楚骚的哀怨精神。

一般来说,比兴是用以抒写主观的情思,但在唐诗本事中,比兴之所

^① 《刘禹锡集》卷二一。

表达还包括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与感悟,其认识多富于人生哲理:

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五引《明皇杂录》)

僧可隆善诗,高从海阅其卷,有《观棋》句云:“万般思后得,一失废前功。”从海谓可隆曰:“吾师此诗,必因事而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与桑维翰同学。少负志气,多忤维翰。维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犹在场屋。频年败衄,皆维翰所挫也。因削发为僧,其句实感前事而露意焉。”从海识鉴多此类也。(《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五引《大定录》)

此外,还有南唐宜春王李从谦所作《观棋》诗:“竹林二君子,尽日意沉吟。相对虽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知易失,守分固难侵。若算机筹处,沧溟想未深。”^①比兴言理未闻于汉代,惟《文心雕龙·比兴》谓:“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文中“情”、“理”可为互文,无论比与兴,皆可言情、理。刘勰的话大约反映了南北朝时的创作情况,应该说,这种情况在唐诗创作中也普遍存在。

唐诗本事还反映了比、兴运用的具体形式。就取譬对象、诗之题材而言,比兴可分为因物喻志、托事喻义和以古喻今三种形式。

因物喻志即“比方于物”、“托事于物”,即“举草木鸟兽以见意”,“托讽禽鸟,寄情草树”,在唐诗中为自喻情志的咏物诗。如孔绍安咏石榴,李义府咏乌,杜淹咏鸡,张鹭咏燕,张九龄《海燕》诗,张宣明《咏孤松》,郭元振《古剑篇》,薛涛《十离诗》,等等。如果说因物喻志取譬为物象,那么,托事喻义取譬则为事象。托事喻义即引他事喻本事,郑玄所谓“取善事以喻劝之”即是。唐诗本事中此类诗歌包括卢肇《竞渡》诗,朱庆馀《闺妇歌》,章碣《东都望幸》及僧可隆、李从谦《观棋》诗。郑注笺《诗》,认为“比”是“取比类”,“兴”是“取善事”,乃以托物为“比”、托事为“兴”。但

^① 《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江南野录》。

唐诗中并无这样的分别,因物喻志与托事喻义皆可用比兴。宋代胡寅《斐然集》卷一八《致李叔易》引李仲蒙语云:“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区分比、兴,最为明晰。就因物喻志而言:张九龄畏避,为《海燕》以致意;武瓘感事,因蝶、燕而托讽;薛涛陈情,借《十离》以明心迹;高越拒纳,作《鹰》诗以自绝^①;此四例乃用“比”之体。孔绍安侍宴,见石榴而寄“来晚”之意;李义府遵命,咏乌以求位;崔铉访韩滉,因鹰以寓怀^②;张宣明见孤松,乃寓其志。此四例乃用“兴”之体。就托事喻义而言:朱庆馀自明进退之意,以闺妇临妆画眉为喻;章碣怨愤,借女子失意寓其不平;此用“比”体。卢肇因观竞渡而发其怨意,僧可隆、李从谦因观棋而悟人世深险,此用“兴”体。以上比、兴之分仍然是相对的,从唐诗本事记载看,比不兼兴,而兴多兼比。

以古喻今即以古例今,借古讽今。焦循《毛诗补疏》卷一论比、兴,以“陈古即以例今”为“比”之一体。就《诗经》而言,此释未必妥当,但在唐诗本事中可以找到这种以古例今的比兴诗例。《本事诗》记载,王维《息夫人》诗以春秋时息国夫人不甘事二主事喻卖饼者妻不忘故夫,借古讽今。《唐摭言》卷一〇记载:“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矢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诗中“灞陵老将”指汉代“飞将军”李广,诗用李广蓝田夜猎故事^③,以李广夜猎自喻当年科场奋斗,又以李广老而功业无成喻己之科场失意,落魄潦倒。此诗用“比”体,乃以古例今之例。

诗歌中原有“咏史”一体,《文选》立“咏史”一类,首篇王粲《咏史》诗吕向注云:“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此一注语实可概括《文选》所选《咏史》诗的内容及其特征。这些咏史诗与咏史类比兴诗有所不同:首先,咏史诗是诗人“览史书”之所作,其触媒是史书史事。如诗涉现实,其构思是由古而及于今。咏史类比兴诗是诗人有感时事之所作,

① 《说郛》卷三九《南唐近事》。

② 见《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引《南楚新闻》。

③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军败,家居数年。“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其触媒是时事,其构思为由今而及于古。其次,咏史诗重在吟咏历史的行事得失,多发思古之幽情。而咏史类比兴诗重在喻今,抒写现实情怀。第三,咏史诗虽“或自寄情焉”,但多为泛咏情怀,无确定的现实指事。咏史类比兴诗所咏乃具体史事,所喻为具体时事,喻依与喻旨之间关系明确。虽然如此,咏史类比兴自咏史诗而来,得之比、兴中“比”之一体在咏史诗中的运用。

二、境界的创造

唐人在诗歌创作中注重境界的创造,由此对境界创造的过程及其特征有深入的体察和独到的认识。一些唐诗本事记载或反映了唐人在境界创造时所呈现的精神状态及对此一精神状态的认识与思考。

如果将境界的创造看成诗歌构思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可分为静观和领悟两个阶段。在唐诗本事中,唐人对境界创造的认识正是对这两个阶段的认识。

此之静观即虚我观物,“虚我”是指创作主体处于离知去欲的虚静状态,只有处于虚静状态,客观的体察和主观的冥想才能细致、活跃。这种虚静状态唐人多有言及: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旧题王昌龄《诗格》卷上)

刘洞同前(按:即《夜坐》诗):“百骸同草木,万象入心灵。”此只见静极之意。(王玄《诗中旨格》)

道自闲机长,诗从静境生。(《全唐诗》卷八四二齐己《寄酬高辇推官》)

刘昭禹……少师林宽,为诗刻苦,不憚风雪,诗云:“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言不虚耳。(《诗话总龟·前集》卷一〇引《郡阁雅谈》)

诗歌创作中的虚静状态在唐诗本事中演绎为苦思忘我的具有戏剧色彩的故事。《鉴诫录》卷八记载,贾岛曾于驴上吟诗,推敲未定,而冲撞京兆尹

韩愈。《唐摭言》卷一一又记载,贾岛一日忽吟“落叶满长安”,求之一联未得,而唐突京兆尹刘栖楚。诗人处于安神静虑的创作状态时,皆收视反听,心不外用,“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达到忘我忘身的境界。贾岛吟诗故事是对这一境界的形象注解。

在虚静状态下,诗人的想象活动是异常活跃的。贾岛冲撞韩愈以后,自诉其时“神游诗府^①”,“神游”即神思,想象,是对诗歌意象的刻意搜求。《唐才子传》卷五“贾岛”条谓贾岛“当冥搜之际,前有王公贵人皆不觉。游心万仞,虑入无穷”,即言本事所记情形。这种搜求意象的想象活动,《唐才子传》称为“冥搜”,这是袭用了唐人的说法。请看下列诗句:

夜夜冥搜苦,那能鬓不衰。(《全唐诗》卷六七四郑谷《寄膳部李郎中昌符》)

冥搜不可得,一句至公知。(《全唐诗》卷七二〇裴说《寄曹松》)

决狱多余暇,冥搜万象空。(《全唐诗》卷七五〇李中《和毗陵尉曹昭用见寄》)

积思游沧海,冥搜入洞天。(《全唐诗》卷七六二廖融《谢翁宏以诗百篇见示》)

冥搜入仙窟,半夜水堂前。(《全唐诗》卷八二九贯休《怀方干张为》)

冥搜清绝句,恰似有神功。(《全唐诗》卷八五〇尚能《中秋旅怀》)

冥搜太苦神应乏,心在虚无更那边。(《全唐诗》卷六五一方干《宋从事》)

还怜我有冥搜癖,时把新诗过竹寻。(《全唐诗》卷八四四齐己《酬尚颜上人》)

我亦当年爱吟咏,将谓冥搜乱神定。(《全唐诗》卷八二五修雅《闻诵法华经歌》)

① 《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唐宋遗史》作“神游象外”。

“冥搜”原本是指对山水景物的寻访搜求,是身之所履的活动。晚唐五代时,“冥搜”语义发生了变化,多指想象活动中对诗歌意象的搜求,是精之所骛、心之所游的精神活动,亦即“神游诗府”、“神游象外”。据记载,贾岛吟“僧敲月下门”时,“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作‘推’字手势,又作‘敲’字手势”。这一描述是对“冥搜”一语的形象表述。晚唐诗人李允恭言贾岛为诗曰:“海底也应搜得净,月轮常被玩教倾。”^①二语可与“推敲”故事互为表里。

道家 and 佛家都讲虚而观物,但境界创造中的静观与佛家观物方式接近。道家观物是要使人成为万物之一体,即与万物冥合;而佛家观物是要映照万物,认识万物和把握万物。佛教讲“寂照”、“止观”,境界创造中的“冥搜”正是“寂”中之“照”、“止”中之“观”。佛禅观物,意在悟道。正像“禅道惟在妙悟”一样,“诗道亦在妙悟”。在境界创造中,精思冥想也必以妙悟为其旨归。

唐诗本事对诗人在创作中由思而悟的精神状态有生动的描述。与沉思冥想故事一样,此类故事也具有鲜明的戏剧色彩:

(周)朴,唐末诗人,寓于闽中,于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饮酒茹荤,块然独处。……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其句云:“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唐诗纪事》卷七一“周朴”条)

李昇受禅之初,忽半夜寺僧撞钟,满城皆惊,召将斩之。对曰:“夜来偶得《月》诗。”乃曰:“徐徐东海出,渐渐上天衢。此夕一轮满,清光何处无。”喜而释之。(《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江南野录》)

^① 《鉴诫录》卷八“贾生忤”。

本事记载的诗句都是诗人心有所悟的得意之笔,诗事即描写诗人的领悟过程及一时悟罢的精神状态,由此描述可窥见诗人由思而悟这一过程的一二特征。首先,领悟有待于灵感的获得。周朴意欲表现豪门贵族的衰败零落及身后寂寞,因偶遇樵夫负薪,忽而想到豪贵子孙沦落飘零,逝者冢墓弃置,以至樵子伐木为薪的荒凉景象,于是诗思豁然贯通,而得“子孙”两句。这一联想过程是在瞬间完成的。周朴得句以后,“忽持”樵夫,“忽”字说明这一过程的瞬时性。可见,这一联想是灵感的迸发,是沉思冥想之后的突然领悟。灵感的产生又有待于积思冥想和外物触发。周朴得句以后,连呼“我得之矣”,这是积思多时一朝悟罢时的精神反应,是郁结之思豁然贯通后的状态。本事谓周朴常“块然独处。……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正是对积思冥想这一精神状态的说明。然而,积思冥想并不必然产生灵感,“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①,灵感的产生还需借助外物的触发,周朴是偶遇樵夫负薪而诗思迸发,豁然顿悟的。外物的触发正如神思之“关键”的开启,滞塞冲破,一通百通。又如智炬点燃,光芒斥破迷暗,森罗万象,一时毕现。

其次,领悟多处于精神的迷狂。在两则本事中,不管是周朴还是寺僧,得句以后,都行为乖张,举止失常,一时处于迷狂的精神状态。周朴忽持樵夫,厉声高叫,寺僧半夜撞钟,都是这种精神状态的表现。这种精神状态可以理解为创作活动中搜寻的欣喜、创造的满足和审美的愉悦,即所谓“得一联一句”,“忻然自快”。如前所述,诗人在创作时内心处于虚静状态,头脑为诗思所占据,现实的常识、理性已退出,对环境的反应也是无意识的。灵感获得时,这种无意识状态仍然延续,常识、理性尚未恢复,但高度亢奋的情绪又需要本能宣泄,于是通过一种近乎疯狂的形式表现出来。

诗歌创作中的悟在唐人看来与佛教禅宗之悟相通,或者简直就是禅悟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寺僧既为僧人,则其诗悟自与禅悟相通。周朴寄居僧寺,行住坐卧亦如寺僧,其思想及思维方式自然不免要沾染衲气,因此,周朴诗思所借之悟与禅悟也脱不开干系。隐藏在本事中的诗悟

^① 《文心雕龙·神思》。

与禅悟的关系在宋人那里有明确的表述。宋代王庭珪《卢溪文集》卷二四《赠羲上人二绝句》其一云：“学诗真似学参禅，水在瓶中月在天。夜半鸣钟惊大众，斩新得句忽成篇。”^①据《景德传灯录》卷一四记载，李翱为朗州刺史时曾向药山惟严问道，惟严“以手指上下曰：‘会么。’翱曰：‘不会。’师曰：‘云在天，水在瓶。’”于是李翱作一偈云：“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王庭珪诗“水在”一句乃兼用此事及寺僧月诗事，直以为诗通于参禅学道，诗悟与禅悟已无分别。

在唐人那里，境界的创造通常经历由苦吟冥搜到一朝领悟这一过程，借用佛教的话说，就是由渐修达于顿悟。唐人在诗歌创作中注重苦吟冥搜，讲究渐修的功夫，同时追求领悟，将顿悟之法引入境界创造。后一倾向特别表现于锤炼字句中的一字推敲。唐诗本事中有很多因一字更改而境界一新的诗例。贾岛诗句“僧敲月下门”，“敲”字与“推”字境界不同；齐己诗句“昨夜一枝开”，“一枝”与“数枝”境界不同；张迥诗句“虬髯黑在无”，“黑在无”与“白也无”境界不同；任翻诗句“前峰月照一江水”，易“一”为“半”，境界不同。从以上诗例看，诗歌境界的创造往往取决于一字安排。一字妥帖则境界不凡，一字未稳则境界平庸，因此，得一字则得其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论宋祁、张先词谓：“‘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词如此，诗亦如此。这一字之得使诗境刹那间完成，通于佛教的顿悟。一字之得与禅悟的关系宋人已有所揭示。范温《潜溪诗眼》说：“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为禅语，原意是学人经禅师一言点化而豁然顿悟。《古尊宿语录》卷八《次住广教语录》云：“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转凡成圣。”所谓“至理一言”即一字之妙。禅宗认为，由一言可悟至理，由此转凡成圣。范温言诗，正是借用了禅宗的这一观念。

禅宗发展到慧能，南宗创立，讲求顿悟。此后衣钵相传，教内虽开示方式各异，然均以顿悟为宗。禅门中曾流行一字禅，五宗之一的云门宗师

^① 王庭珪《卢溪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祖文偃惯以一字接引学人。如人问：“如何是云门剑？”文偃答云：“祖。”又答云：“揭。”问：“如何是云门一路？”答云：“亲。”问：“如何是禅？”答云：“是。”问：“如何是道？”答云：“得。”^①此所谓“云门一字关”。此一接引方式是使学人由领悟一字而参透禅机，境界创造中的一字推求与此参悟方式相通。一字推敲虽不始于晚唐五代，但晚唐五代以一字推求相标榜，并成为一时风气，应该说，这与禅门宗风不无关系。

第五节 诗歌的解读

《文心雕龙·知音》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话虽如此，文之解读究竟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有读者知识、经验的限制，有观念、兴趣的影响，还有主观意图的参与，因而文之解读，有深契妙悟，也有附会曲解。唐诗本事记录唐人的解诗故事，反映上述解读中的复杂情形及唐人解读观念。要而言之，一是对亲证的强调，二是比兴的滥用。

一、亲证的强调

从根本上说，人只能在自己生活经验的范围内理解大千世界。人们自然可以从书本获得知识和经验，但对书本的理解归根结底仍以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认识论的这一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作为审美活动的诗歌解读。读者对诗歌的解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的，涉世愈深，思想情感愈丰厚，对诗歌的解读就愈全面、深入，所感也愈深切。反之则难以解读作品，或对诗意虽有所知觉，但察之不深，见之不切，与透彻之悟终隔一层。因此，唐人已经注意到读者的身世经历、所处境遇对诗歌解读的能动作用，唐诗本事中就有读者因身处特定情境而与诗歌产生共鸣的故事：

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

^① 《古尊宿语录》卷一五《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上》。

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不胜感叹。时高力士在侧，亦挥涕久之。（《本事诗·事感第二》）

陈乔、张俄，重阳日登高于北山湖亭，不奏声乐，因吟杜工部《九日宴蓝田崔氏庄》诗，其末句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员外郎赵宣父时亦在集，感慨流涕者数四，举坐异之。未几，赵卒。（《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四引《南唐近事》）

李峤诗句出自《汾阴行》，此诗吟咏汉武帝于汾阴祀后土事。《文选》卷四五汉武帝《秋风辞并序》云：“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舫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本事所录“不见”两句乃用《秋风辞》诗意。和武帝一样，玄宗是一位胸怀大略的帝王，平生好以武帝自比，也曾封禅泰山，祀后土于汾阴。然而武帝的功业及其富贵荣华已随历史消逝，岁月移易，人世代改，惟有秋雁南飞，年复一年。诗句中富于哲理意味的兴衰之感显然触动了玄宗。天宝末年，玄宗已届暮年，平生功业及富贵荣华即将消逝，兴衰之感已存之于心，只是隐而未发，及闻李峤诗句而心生共鸣，悲慨之情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则本事记述同样的情感共鸣故事。赵宣父重阳聚会时年已衰迈，这从未几而卒的记载中可以推知。杜甫重阳诗表现年老衰败的悲感以及努力挣脱这一悲感的放达情怀，同样是重阳，同样是年老衰颓，心怀悲感，闻者之心与诗人之心契如合符，能不“感慨流涕者数四”？

由以上本事可知，读者只有实际身处诗之情境，或与诗人创作时的境遇吻合，才能透彻解悟诗意，并由此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读者身处诗歌所写之境的情形，宋人称为“亲证”。惠洪《冷斋夜话》卷六云：

智觉禅师，住雪窦之中岩，尝作诗曰：“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诗语未工，而其气

韵无一点尘埃。予尝客新吴车轮峰之下，晓起临高阁，窥残月，闻猿声，诵此句，大笑，栖鸟惊飞。又尝自朱崖还琼山，渡藤桥，千万峰之间，闻其声类车轮峰下时，而一笑不可得也，但觉此诗字字是愁耳。老杜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良然，真佳句也。亲证其事，然后知其工也。

惠洪对智觉诗的解读，经历了由一知半解之悟到透彻之悟的转变。初客车轮峰下，但得诗之物境，而未得其情境，所感也不深切。后自朱崖还琼山，身之所履、耳之所闻及情之所感与诗境契合，于是顿改前会，领悟一新。惠洪认为，只有真正亲身体验诗之情境，才能透彻领悟诗之本意，知诗之妙。

对亲证的认识在明人那里也可找到例证。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云：“实境诗于实境读之，哀乐便自百倍。东阳既废，夷然而已，送甥至江口，诵曹颜远‘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泣数行下。余每览刘司空‘岂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未尝不掩卷酸鼻也。”文之所举东晋殷浩事^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论云：“浩有感于曹颜远之诗，以素爱之不忍别，因而自伤，非怨之也。”揭示殷浩咏诗时的心理。《艺苑卮言》引此事，意在说明身处诗歌所写之境，读其诗而情感激荡，哀乐倍增。所谓“实境诗”，指描写实际生活，表现现实人情物理的诗歌。“于实境读之”即身处诗歌所写之境而咏其诗，即惠洪所谓“亲证其事”。如果说惠洪所谓“亲证”是强调对诗歌情境的领悟，那么，《艺苑卮言》所关注的则是体悟诗境基础上的情感共鸣。就此而言，后者之所揭示较唐诗本事之所表达更为接近。

就其发生机制而言，诗歌解读中的亲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闻诗而感，二是感而吟诗。前述玄宗感李峤诗、赵宣父感杜甫诗，乃闻诗而感。读者怀易感之心，闻诗而感兴。殷浩诵曹摅诗，乃感而吟诗之例。所谓“感而吟诗”，指读者有已感之心，盖心有所感，不觉自吟自诵。隋唐诗本

^① 《世说新语·黜免》“殷中军废后”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云：“浩虽废黜，夷神委命，雅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韩伯始随至徙所，周年还都，浩素爱之，送至水侧，乃咏曹颜远诗曰：‘富贵它人合，贫贱亲戚离。’因泣下。”

事中也有这样的亲证故事：

唐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明皇杂录》补遗）

中山刘公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而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海”）

玄宗歌卢思道诗，乃因烟云满目而念及征夫久戍。刘禹锡所咏“巴人”两句为其《松滋渡望峡中》诗句，此诗作于赴任夔州刺史途中。刘禹锡在夔州时，官况萧条，身处寂寞，不觉自吟旧作诗句。此类故事还有玄宗在南内时身受挟制、抑郁孤独而吟《傀儡》诗的故事。闻诗而感和感而吟诗，虽然发生机制有异，但是诗意的证悟与情感的共鸣并无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亲证不仅包括情境的证悟，也包括物境的证实。前者偏于情感的共鸣，后者重在意象的认知。《鉴诫录》卷五、《北梦琐言》卷七均记载卢延让诗中意象多为人所亲见，因得称赏，属亲证之一体。此一“亲证”观念已开宋人“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①诗论之先河，后来还成为《红楼梦》中香菱证诗的因由。

二、比兴的滥用

自《诗经》、《楚辞》确立比、兴的创作手法以后，历代诗人多以比、兴入诗。比、兴的广泛运用自然影响到诗歌解读，作者以比、兴为诗，读者也以比、兴解诗。这种因果关系有时也给解诗造成负面影响，这就是解诗者越来越产生一种解读疑心病，凡物皆疑为比、兴，遇事必推求至隐，于是穿凿附会，失诗本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是以解嗣宗之诗，则首首致讥禅代；笺杜陵之作，则篇篇系念朝廷。”并说：“近世有人解李商隐诗‘虎过遥知窞’，以为刺时政。解温庭筠《菩萨蛮》词，以为与《感

^① 《竹坡诗话》“余顷年游蒋山”条。

士不遇赋》同旨。解《咏怀诗·天马出西北》，以为马乃晋姓。解《洛神赋》君王，以为即文帝。此皆所谓强作解事，离其本真者已。”所论深切其弊。

唐诗运用比、兴，或甚于前代。唐人撰写的诗格一类著作常专门讨论比、兴问题，如《金针诗格》中“诗有物象比”条，《二南密旨》中“论篇目正理用”、“论总例物象”部分，《流类手鉴》中“物象流类”、“举诗类例”部分，《诗中旨格》中“物象例附”部分，《雅道机要》中“明物象”条。这些部分大多列举诗中常用为比兴的物象，并说明其所隐含的喻意。从诸篇列举情况看，此类物象已趋于定型，隐喻之义也相对固定。诗格一类著作在唐代是作为学诗者的教科书的，比兴问题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不仅影响诗作者，对解诗者也必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强化了解诗中的比兴疑心病，导致大量穿凿附会的解诗。这些诗格中的“举诗类例”、“物象例附”等部分对诗句的解说多为穿凿附会之谈，也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这种穿凿比兴的情况也体现在唐诗本事中，其表现形式有三：

一是附会实事。比兴指涉之事为实事，但诗与事其实并无关联，比兴之义出于附会穿凿。《唐诗纪事》卷七五记载，后唐明宗太子李从荣好作歌诗，高辇等人多党附。齐己与之唱和，《中秋》诗有“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两句，影射诸人在朝得势。其实，《中秋》诗全篇不过写一时风物，乃流连光景之作，两句并无喻意^①。高辇等人依附李从荣及李从荣在朝得势、显赫一时等事见于史载，为实事，本事所谓隐喻之义乃据史实附会。此外，《本事诗》谓白居易《杨柳枝词》为赠妓人小蛮而作，以杨柳喻小蛮。其实，此诗咏洛阳永丰柳，纯为咏物之诗，并无喻意。比兴之义乃据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句附会^②。除以上两例外，《大唐新语》卷八《唐语林》卷二谓杜淹咏鸡诗乃因太宗戡定内乱而作，别有寓意。前文已辨析，这一说法并不确切。此类附会多以诗歌内容牵合实事，似是而非。因为有若干事实依据，真伪杂陈，所以有时难于觉察，也不易证伪。

① 详见《考证篇》“48 齐己”条。

② 详见《考证篇》“18 白居易”条。

二是附会生平。比兴指涉之事不实,乃解诗者自诗意及诗人生平行事附会而来。《唐阙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记杜牧风流韵事,谓杜牧恃才名,纵情声色,闻湖州多奇色,专往游观。湖州刺史素知其名,接待甚厚,然官妓私选,未惬所望。后为具彩舟讴乐,使人纵观,终无所得。及暮将散,见里妇携幼女以为奇色,约云:“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后14载,出刺湖州,到郡三日,即命搜访,然女已适人13载,有子二人。杜牧因为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需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这则故事,缪钺《杜牧年谱》疑其非实,因其与杜牧行迹及史实颇有舛忤,于情理亦有未合。《年谱》推测故事乃好事者因诗附会而成。此诗《樊川外集》题曰《叹花》,不过写诗人晚春寻芳,见红英落尽,子结满枝,因寓伤春之意。上述故事乃据诗中“去较迟”、“子满枝”等语附会而成。除附会诗语外,此一故事还以杜牧生平行事为背景。杜牧生前有才名,早年疏荡少检,在淮南幕府时,饮酒狎妓,纵情声色。《遣怀》诗自述生平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当年既有风流倜傥之名,则好事者因其名而造为上述艳异故事自无足怪。这篇故事属于自觉的文学创作,不完全是诗歌解读,但其附会比兴的倾向及方式与诗歌解读无异。

三是凿空附会。比兴指涉之事不实,也无相关依据,诗事完全自诗意杜撰。本文讨论本事生成时已述及《唐语林》卷六所记韩愈诗本事。此一本事纯自《镇州初归》诗附会,人物、事件均系编造,别无依据。除此之外,《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南部新书》记有下面一则诗事:

大中年,有江淮郡守名郎,登楼纵饮,见二游女,罗衣飘飘,目送久之,因咏曰:“两朵红英值万金,教人不负看花心。高楼日晚东风急,吹落千家何处寻。”

所引诗乃咏花之作,诗谓两朵红花美艳珍贵,令人欣赏流连。傍晚时分,高楼东风劲吹,千家万户,凋零的花朵随风吹散,无处寻觅。此诗在赏花中寓伤春之意,语言浅近,语意甚明。本事据诗意附会。唐诗本事多取咏花之诗比附人物,穿凿事件,以上两则故事即其显例。

这三种穿凿比兴的方式,前两种为后世比附说诗方法的一大来源。清人吴乔《西昆发微》发掘李商隐诗意旨,多以比附说诗,其序云:“无题诗于六义为比,自有次第。《阿侯》,望绡之速化也;《紫府仙人》,羨之也;《老女》,自伤也;《心有灵犀》,谓绡必相引也;《闻道阊门》,幸绡之不念旧隙也;《白道萦回》,讶绡舍我而擢人也。然犹未怨。《相见时难》,《来是空言》,怨矣,而未绝望;《凤尾香罗》、《重帷深下》,绝望矣,而犹未怒。至《九日》,而怒焉。无题自此绝矣。”穿凿生平,妄推至隐,乃胶柱鼓瑟之谈。序又云:“比兴意在言外,意不可以言求。所以《三百篇》有序,唐诗有纪事,令后世因之以知意,关系非浅小也。”^①则其比附说诗方法有取于唐诗本事,包括其中附会比兴的故事^②。即此一例,足见本事对附会说诗的影响。

前文已述,汉人言比兴之义,已赋予政教、美刺的内容,对《诗》的解说有时不免穿凿附会,歪曲本义。后来的解诗者有意无意之间继承了汉人以比兴附会政教、美刺的解《诗》传统,动以政教、美刺解诗。这种解诗对于诗作者有时隐含一种危险,一些并无政教、美刺的诗歌经此解说,往往涉及敏感的政治、道德问题,触及统治者的忌讳,成为罪状,作者因此身陷不利,甚至招来不测之祸。《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引《江南野录》云:“周世宗幸广陵,孟贯能诗,以一集献之。世宗见首卷《贻栖隐洞谭先生》诗云:‘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谓贯曰:‘伐叛吊民,何有巢无主之有?献朕则可,他人卿将不免。’遂释褐授官。”孟贯诗今存^③,全篇写隐者的隐居生活,“不伐”两句乃其隐居生活的写照,毫不涉及政治。世宗多疑,以为“不伐”一句讽其征战残民,“多移”一句谓天下无主。这是马上打天下而天下尚未一统的封建帝王的脆弱心理的反映。孟贯献诗本为求官,决不会想到诗句有语含讥刺的嫌疑,幸而世宗故作宽大姿态,不然“不免”矣!

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后来被人利用,成为政治斗争、官场

① 吴乔《西昆发微》,《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所谓“至九日,而怒焉”,指《唐摭言》卷一所载李商隐《九日》诗本事,此一本事为附会之谈。

③ 见《全唐诗》卷七五八。

倾轧和恩怨复报的手段。《大唐新语》卷一〇记载,开元二十四年,李昂为考功主试。进士李权因人请托,李昂数其过失,李权心怀怨愤,因摭李昂诗“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两句,深文巧说,词云:“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因为报复动机过于明显,手段拙劣,未能达到目的。这种免于构陷之罪的记载较少,因诗获罪的案例则较多:

(李)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常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宪宗雅闻其名,自河北召还,用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其幽州诗句,降居散秩。(《旧唐书·李益传》)

南唐徐融《夜宿金山》诗云:“维舟分蚁照,江市聚蛙声。”烈祖性严忌,宋齐丘谮之,以竹笼沉于京口。^①(《诗话总龟》卷三一引《古今诗话》)

谏官举李益幽州诗句,乃以“不上望京楼”句用兴体,非但无忠君恋阙之心,且有背叛朝廷之嫌。李益赠刘济诗末两句即“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不过表达感恩之意,谓有背叛朝廷之心,则为已甚之词。徐融《夜宿金山》诗两句写景状物,宋齐丘进谗,自然是以此两句隐含比兴,有讥讽或攻击之意。仅就字面而言,就诗论诗,不管是李益诗句还是徐融诗句,均无讽意,或不臣之心,谏官的摘举和大臣的谗言都是深文周纳,罗织罪状。遇有此类情况,君王若偏听,或“性严忌”,必“疑罪从有”,于是进谗者奸谋得售,作者不免无妄之灾。

穿凿比兴、深文周纳的方法若涉及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情形有时更为诡谲深险。一方面,造事者利用政治、权力斗争中的矛盾,深文罗织,制造口实,挑起事端,借统治者之手打击对手,以逞其私;另一方面,统治者

^① 按:《五代史补》卷三存异说:初,李昇蓄异志,欲有江南。雪天会群僚,酒酣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时宋齐丘、徐融在坐。惟齐丘叶旨;融意欲挫昇,昇大怒,收而投之江。令云:雪下纷纷,便是白起。(烈祖)着履过街,必须雍齿。(宋齐丘)来朝日出,争奈萧何。(徐融)

为清除政治异己,不惜利用不实之词,因文治罪。元和十年刘禹锡因诗获罪一事即属此一情况:

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本事诗·事感第二》)

需要说明的是,刘禹锡此次被贬,先是为播州刺史,后改连州。因诗获罪而贬是指贬在播州恶地^①。刘禹锡诗写远贬十年之后的世事变化,内容不过叙观游,“记一时之事”,就文字本身而言,感慨者有之,讥讽之意则无。所谓“诬其有怨愤”,大约认为此诗以桃树隐喻朝中新贵,语含讥刺,这是典型的穿凿比兴、深文周纳的解诗方法。其实,这样的解读其意不在解诗,而是隐含了某种动机。刘禹锡后来追忆其事云:“缘有虚称,恐居清班。务进者争先,上封者潜毁。巧言易信,孤愤难申。”^②“上封者潜毁”即“诬其有怨愤”,可见诬陷潜毁乃是一班务进者为了避免刘禹锡等居于清班妨碍己身进取而生出的打击手段。自宪宗一方而言,刘禹锡等为其政治上的宿敌,虽贬斥十年,对诸人仍怨愤难消,怀有恶感,因诗治罪,不过借题发挥而已。

唐人既开以文治罪的恶例,宋人遂起而效尤,以至文祸屡起。“乌台诗案”、“政和文忌”及“江湖诗祸”乃其尤显者。到了清代,统治者更是大兴文字狱,为文为诗者屡遭无妄之灾,文祸愈演愈烈,这大约是倡导比兴的汉儒始料未及的。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引《考异》云:“旧禹锡传:‘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禹锡集载其诗曰:‘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按当时叔文之党,一切除远州刺史,不止禹锡一人,岂缘此诗,盖以此得播州恶处耳。”

② 《刘禹锡集》卷一六《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

第四编 考证篇

在传统学术中,唐诗本事的意义主要在于其文献价值。《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本事诗提要》说:“唐人轶事颇赖以存,亦谈艺者所不废也。”卷一四〇《云溪友议提要》也说:“六十五条中,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棻《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存。又以唐人说唐诗,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故考唐诗者如计有功《纪事》诸书,往往据之以为证焉。”这虽然是对《本事诗》和《云溪友议》的看法,但其实也是对整个唐诗本事的估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唐人记载诗歌本事和记载其他文献一样,有补史的目的,新旧《唐书》等史书即采择唐诗本事以为史料,因此,后世通常将唐诗本事作为史料文献。宋代以后,诗话、笔记等著作据唐诗本事解读诗歌,或考订诗人生平,《唐诗纪事》和《唐才子传》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著作。在援引本事以为史料的同时,一些著作对唐诗本事的真伪等也有所考证,如《苕溪渔隐丛话》等著作,这为唐诗本事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现代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诗本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献考察,一些作品笺注、人物年谱、诗人生平考订等多涉及唐诗本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有下面一些重要成果:一是吴企明的《读孟棻〈本事诗〉书后》^①,二是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笺》,三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吴先生文章是一篇对《本事诗》作全面考订的专题论文,《唐诗纪事校笺》和《唐才子传校笺》是唐诗文献研究专著,前者重点清理了《唐诗纪事》中唐诗本事的文

^① 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198页。

献来源,后者在文献探源的基础上,对《唐才子传》中的唐诗本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证,其中的研究成果标志着本事的文献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尽管如此,唐诗本事的文献研究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本编拟对唐诗本事作专门的文献考察,以期推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凡 例

一、本篇对唐诗本事作较为全面地考证,虽置于文末,实全文立论的基础,前三篇之阐发多以本篇考证为前提。作为文献考证,本篇有独立的学术意义;作为立论的基础,本篇又是全文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及《诗证》组成,前四篇为理论阐发,后一篇为事实考订。《沧浪诗话》虽或出自后人编辑,然后世仍视为首尾一体的著作。今取其例,以考证独立成篇。

三、考证对象,以唐代文献中的本事为主,包括《本事诗》、《云溪友议》及《抒情集》中的各种文体。此外,宋代文献,如《南部新书》、《郡阁雅谈》、《唐诗纪事》及《郡斋读书志》等均有唐诗本事记载,亦在考证之列。

四、考证内容包括考订真伪,备录异说,校勘文字,钩沉索隐,文字校勘主要涉及与诗之作者、本事真伪及诗之归属等相关的文字。

五、唐诗本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文本,本篇选择现存最早的文本。如后世文本记载不实,则以后世文本为考证对象。有不同文本同一出处者,谨择其一,而以同一出处的其他文本参证。文末注明出处。

六、前贤时彦对唐诗本事多有考证,硕果累累。本篇以现有研究为起点,考证此前尚未涉及或虽经考证而尚有可考可议者。

七、本篇以本事中诗有本事的诗作者为目,按《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编排顺序编排。本事如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诗作者,其编排顺序以其在《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中编排在前者为准。

正文

1. 上官仪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鹤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隋唐嘉话》卷中）

《全唐诗》卷四〇收录此诗，题作《入朝洛堤步月》，当据本事所拟。本事谓此诗作时，上官仪独持国政，《大唐新语》卷八径谓“上官仪独为宰相”。据史载，上官仪为相在龙朔二年（662）十月，《旧唐书·高宗纪》载：“二年……冬十月……庚戌，西台侍郎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至麟德元年（664）被杀，《旧唐书·高宗纪》载：“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杀西台侍郎上官。”上官仪为相时间约两年，此间高宗在长安。《旧唐书·高宗纪》载：“龙朔……二年……三月甲申，（高宗）自东都还京。……夏四月庚申朔，至自东都。”至麟德二年方幸东都，《旧唐书·高宗纪》载：“麟德……二年春正月壬午，幸东都。”可见上官仪为相时，与高宗及百官俱在西京。据本事及诗意，诗乃上官仪在东都上朝途中循洛堤步月时所作，则其诗作于龙朔二年三月以前，其时上官仪尚未为相。

此一本事当非实录。文中“群公望之，犹神仙焉”，乃人物品评熟套。《世说新语·容止》载：“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又《企羡》云：“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颜氏家训·勉学》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

仙。”魏晋盛行人物品评，重人物的意度风神，南朝袭其余风，流风浸润，及于初唐。上官仪诗清丽娴雅，颇能见其从容不迫的仪态和潇洒风流的神情。此诗写上朝途中见闻，但未必咏于上朝途中，本事中的一些情节当据诗意及前代故事附会。

2. 崔湜

唐崔湜，弱冠进士登科，不十年，掌贡举，迁兵部。父揖，亦尝为礼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为侍郎。后三登宰辅，年始三十六。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太平广记》卷四九四引《翰林盛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崔湜年不可及”条载：“《新唐书·崔湜传》：湜执政时，年三十八。尝暮出端门，缓辔赋诗，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予按，《翰林盛事》云：……今湜传不载此诗，是矣。第以执政时三十八，则失之，盖湜之赋诗时，是始为执政，年方二十七耳，故张说叹慕之。今湜传乃以其后执政时，年三十六，为说所叹慕，其失甚明。以三十六而后为执政，何足羡慕哉？”

吴氏所引《翰林盛事》与《太平广记》所载略同。考《旧唐书·崔湜传》及《旧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713）崔湜赐死，时年四十三。据此，崔湜生于咸亨二年（671）。《旧唐书·中宗纪》载，景龙三年（709）二月崔湜以中书侍郎、检校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崔湜之初执政。同年五月贬襄州刺史，则崔湜初执政时年三十九，《新唐书》本传谓“三十八”，近似。《翰林盛事》及《能改斋漫录》以为“二十七”，实误。

本事所引崔湜诗及本事所叙之事均以东都洛阳为背景。《旧唐书·中宗纪》载，神龙二年（706）“冬十月己卯，车驾还京师。戊戌，至自东都”，可见，神龙二年中宗即已还长安，崔湜之初执政在此后三年。自此后至崔湜赐死，皇帝及百官未至东都，崔湜亦无东都之任。可见，崔湜在东都时并无执政之事。其诗既咏洛阳风物，自当作于神龙二年十月以前，时未执政。又崔湜诗两句出自《酬杜麟台春思》，此诗见于敦煌遗书斯二七

一七《珠英学士集》残卷,《珠英学士集》成于大足元年(701),则诗作于大足元年或此前。又崔湜诗右署“左补阙清河崔湜”,可为佐证。此外,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四,张说初为工部侍郎在景龙元年(707),即崔湜作此诗后数年,为相以前,本事末尾记载失实。《全唐诗》卷五四崔湜《酬杜麟台春思》云:“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鸳衾夜凝思,龙镜晓含情。忆梦残灯落,离魂暗马惊。可怜朝与暮,楼上独盈盈。”又《全唐诗》卷九五载沈佺期《和杜麟台元志春情》诗云:“嘉树满中园,氛氲罗秀色。不见仙山云,倚琴空太息。沉思若在梦,缄怨似无忆。青春坐南移,白日忽西匿。蛾眉返清镜,闺中不相识。”二诗当作于同时,为酬和之作。崔、沈二人之诗俱写春情,非泛咏春色,本事所叙情景与此诗旨相去甚远。此本事当出附会,与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本事如出一辙,乃同一模式。

3. 徐安贞

徐侍郎安贞,久居中书省。常参李右丞议,恐其罪累,乃逃隐衡山岳寺,为东林掇蔬行者,而喑哑不言者数年。后值修建佛殿,僧中选善书者题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过。掌事怒,以杖连击其背。行者乃画地曰:“某口虽不言,昔年曾学大书也,乞试之。”及试,乃题数行,群僧皆悦服,因遣尽书之。时李北海邕,游岳过寺,观其题处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于公,已息论矣。”遂解其布褐,饰以簪裳。僧尝杖击者,潜匿无地。徐谓邕曰:“吾恐逢非罪,遁迹深山。凡庸僧辈,安能识我?汝无疑也。”江夏公因戏之云:“徐郎曾吟:‘岷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又‘暮雨夜犹湿,春风帆正开。’”徐曰:“喑哑之日,时亦默而诵之。”因同载北归,止潭州,察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云溪友议》卷中“衡阳遁”)

《旧唐书·徐安贞传》记载:“徐安贞者,信安龙丘人。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上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累迁中书侍郎。天宝初卒。”《新唐书·徐安贞传》载:“徐楚璧,初应制举,三登甲科,开元时为中

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帝属文多令视草。终中书侍郎，东海县子。在中书省久，是时李林甫用事，或言计议多所参助。后更名安贞。”新传所谓“在中书省久”云云，当据此本事。徐安贞生平尚有可考者。《全唐文》卷三〇五有徐安贞所做《除裴耀卿黄门侍郎张九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据《新唐书·宰相表中》，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及张九龄为相在开元二十一年，则本年徐安贞已为中书舍人。《全唐文》卷三〇八有孙逖《授徐安贞中书侍郎制》，又《全唐文》卷三八玄宗《册建平公主文》云：“维开元二十五年岁次丁丑九月十一日……今遣使……李林甫、副使中书侍郎徐安贞持节册尔。”据《旧唐书·孙逖传》，孙逖为中书舍人在开元二十四年，则开元二十五年或二十四年徐安贞已为中书侍郎。又《全唐文》卷三八玄宗《册永王侯莫陈妃文》、《册兴信公主文》及《册信王卢妃文》，开元二十六、二十九年及天宝二载，徐安贞均在朝。据《唐会要》卷三六及《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二〇，开元十九年徐安贞为礼部员外郎，其后当即为中书舍人，故其“居中书省”当即为中书舍人以后事。李邕约天宝元年至三载为卫州刺史，约四载移青州刺史，六载为李林甫所害^①。则天宝以后李邕无南游之可能。既然徐安贞自开元二十一年至天宝二载在中书省，并未离朝，而天宝中李邕无南游之事，则本事所叙之事不实。

本事引徐安贞语云：“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云云，乃用梁代柳恹《江南曲》诗意。《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此诗为唐人传颂，为诗中常用典故。本事所叙故事当自此诗意敷衍而来，徐安贞遁迹衡阳市亦当由此衍生。

柳恹为梁代著名诗人，《南史·柳恹传》载：“恹立性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玕王融见而叹赏，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团扇。”可见其以名篇佳句见称于世。徐安贞才华发越，据本事记载，其“岷山”、“暮雨”数句当时为人传颂，本事或以柳恹比于徐安贞。李贺《追和柳恹》谓“汀州白蘋草，柳恹乘马归。”^②以柳

① 见《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9～1080页、第1421页。

② 《全唐诗》卷三九〇。

恽之诗事附会为柳恽之事。此本事亦当因此生出徐安贞隐遁衡岳、遭逢故人及同载北归的一段故事。

4. 萧颖士 邹象先

(邹)象先尉临涣,萧颖士自京邑无成东归,以象先同年生也,作诗赠之。来年,萧补正字,象先寄诗重述前事云:“六月度关云,三峰玩山翠。尔时黄绶屈,别后青云致。”萧答云:“桂枝常共擢,茅茨冀同荐。一命何阻修,载驰各州县。壮图悲岁月,明代耻贫贱。回首无津梁,祇令二毛变。”(《唐诗纪事》卷二二“邹象先”)

本事叙述欠明晰,对照两人诗作,颇有牴牾之处。本事谓“象先寄诗重述前事”,所谓“前事”,指“象先尉临涣,萧颖士自京邑无成东归”,则似谓象先授临涣尉时,颖士求宦无成,被迫东归。然象先诗明谓“尔时黄绶屈”,已有所授。颖士释褐金坛尉,则彼时屈为县尉。颖士亦谓“一命何阻修,载驰各州县”,谓二人一授临涣尉,一授金坛尉,各赴任所。可见本事所叙有误。本事又谓“来年,萧补正字”,似谓象先尉临涣之明年,颖士补正字,这一记叙也不确。

关于萧颖士的官历,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有明确记载,《序》云:“历金坛尉、桂州参军^①、秘书正字、河南参军。辞官避地江左,……淮南节度使表君为扬州功曹参军。……君为金坛尉也,会官不成;为扬州参军也,丁家艰去官;为正字也,亲故请君著书,未终篇,御史中丞以君为慢官离局,奏谪罢职;为河南参军也,僚属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责君,君拂衣渡江。”^②萧颖士释褐金坛尉的时间,陈铁民《萧颖士系年考证》^③及《唐五代文学史编年》均定于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后不久。然唐代惯例,进士登第以后,如果不通过制举或吏部主持的科目试,则需守选三年,然后入仕。《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一》载玄宗开元三年六月的诏文:“其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

① 按:桂州,《文苑英华》卷七〇一作“扬州”。

② 《全唐文》卷三一五。

③ 见《文史》第三十七辑,第187~211页。

判可观者，三选听集。”所谓“三选听集”，就是守选三年，然后参加冬集，授予官职。据《唐摭言》卷三、《旧唐书·韦述传》及《旧唐书·文苑传》，萧颖士于开元二十三年进士登第，则授官时间当在开元二十六年。萧颖士《滞舟赋》云：“摄提岁，拂衣海岳，应调函洛。……于时丙丁守位，恢台肇节，朱云四腾，瑶草半歇，景虫虫而炽旱，风翳翳以歊热。”^①文中“摄提岁”指戊寅年，即开元二十六年。“应调函洛”当指守选期满，参调入长安、洛阳求仕。“于时丙丁守位”下六句写夏景，则应调时间在这年夏天。大约入京以后，不久得官，这年六月即东行赴任，故邹象先诗云：“六月度关云，三峰玩山翠。”李华《序》谓颖士“为金坛尉也，会官不成”，其中原因，《萧颖士系年考证》已有所考。文引李华《三贤论》：“茂挺（颖士）父为莒丞得罪，清河张惟一时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车，发词哀乞，惟一泣下，即日舍之，且曰：萧赞府生一贤才，资天下风教，吾由是得罪亦无憾。”^②并谓萧旻（颖士之父）“为莒丞得罪”，在颖士初登科时，可见颖士是因至莒救父，未能如期到任，所以做不成金坛尉^③。但前已考述，颖士释褐在登第三年后，颖士至莒救父一事应发生在登科以后的守选期间。颖士《赠韦司业书》谓：“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东京，……顷在洛中，闻足下初出南宫，仆惕然不乐，寻知足下载司东观，又翻然以喜。”^④前句自谓开元二十九年自洛阳赴长安谋职（参下文），后数句谓开元二十七年韦述自吏部郎中转入国子司业（说见下），开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为颖士丁父艰时期，可见颖士在洛阳有居业，李华《三贤论》谓颖士“自洛至莒”，也证明其时颖士守选在家。

既然颖士因救父延误赴任的说法不能成立，则“会官不成”当另有缘故。颖士《为扬州李长史贺立皇太子表》云：“臣某言，伏奉制书，皇太子以今月嘉辰，肃膺典册，……臣忝贰藩条，局守官次，不获预陪大礼，称庆阙庭。”^⑤《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忠王

① 《全唐文》卷三二二。

② 《全唐文》卷三一七。

③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所述略同，当出自《萧颖士系年考证》。

④ 《全唐文》卷三二三。

⑤ 《全唐文》卷三二二。

玕为皇太子。秋七月己巳，册皇太子，大赦天下。”则表中所言指“秋七月己巳，册皇太子”一事。《表》作于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可见开元二十六年七月颖士在扬州。前已述及，颖士授金坛尉后之官职为扬州参军，据此，开元二十六年七月颖士在扬州参军任，所谓“会官不成”当是赴任途中改授扬州参军，这一推测与颖士六月出关赴任的载述相吻合。

颖士官秘书正字的时间亦有可考。颖士《登临河城赋》序曰：“既而射策桂林，校书芸阁，……天宝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遗书于人间”^①。“校书芸阁”即为秘书正字，可见天宝元年在秘书正字任。颖士《赠韦司业》云：“尝愿得秘书省一官，登蓬莱，阅典籍，冀三四年内，绝笔之秋，使孟浪之谈，一朝见信。”则上书时尚未为秘书正字。颖士上书韦述的时间，《萧颖士系年考证》定于开元二十九年，根据有三：“（一）《书》称述为‘韦司业’，据《旧唐书·韦述传》载，本年述正官国子司业：‘（开元）二十七年，转国子司业。……天宝初，历左右庶子。’（二）《书》云：‘近日见苗侍郎，乃云……’苗侍郎即苗晋卿，《旧唐书·苗晋卿传》：‘（开元）二十七年，以本官（中书舍人）权知吏部选事。……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天宝二年春……贬为安康郡太守。’（三）《书》云：‘仆……射策甲科，见称朝右，……何言日损一日，年贬一年，蹉跎半纪，乃殊方一下吏耳！’古以十二年为一纪，颖士开元二十三年登第，至二十九年恰为半纪。”据此，颖士为秘书正字不能早于开元二十九年。既然萧颖士授金坛尉在开元二十六年，为秘书正字不能早于二十九年，则本事所谓“来年，萧补正字”之说是 inaccurate 的。

萧颖士赠诗为五律，所录邹象先诗只四句，骤起骤落，当是原作中间两联，首尾两联已缺失。

5. 孟浩然

孟浩然曾谒华山李相不遇，因留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朱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内，譬如闲看华山来。”（《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一）

^① 《全唐文》卷三二二。

《唐摭言》卷一〇“海叙不遇”条记载：“平曾谒华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来。’”以此诗为平曾作。《旧唐书·文宗纪》：大和八年三月“丙子，以右丞李固言为华州刺史，代崔戎”。新、旧《唐书》李固言本传所载略同。又《云溪友议》卷中“白马吟”载：“曾后游蜀川，谒少师李固言相公。”孟浩然与李固言年代不相及，无由交谒，此诗当为平曾所作。

6. 李栖筠

李相公吉甫，其先初修进之日，献卷于维扬护军宋甄大夫。甄寡于博识，不哀王孙，连上数启，都不动念。李于馆舍栖旅之甚，去住无依。遂吟一绝句贻之。宋以微茫礼遗而已。李后上第，生吉甫，吉甫继历台省，自信州刺史节判青州，待士稍薄。举子吴武陵诣府投掷，相国似无见重之意。吴不存忌讳，遂书相国先君旧谒宋大夫陈情一章，密献相国，相国大惭，追悔。俟暝，召吴，执手惆怅，厚赂于吴，请为寝默。诗曰：“十处投人九处违，家乡万里又空归。严霜昨夜侵人骨，谁念尊堂未授衣。”（《鉴诫录》卷七“贻旧诗”）

《云溪友议》卷下“因嫌进”条记载此事的别一说法：“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遗五布三帛矣。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礼。正郎微诮焉。赞皇母氏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亦谓吴武陵投谒时，吉甫在外任。《旧唐书·李吉甫传》载：“及陆贽为相，出为明州员外长史，久之遇赦，起为忠州刺史。……六年不徙官，以疾罢免。寻授郴州刺史，迁饶州。……宪宗嗣位，征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既至阙下，旋召入翰林为学士，转中书舍人，赐紫。”据此，李吉甫未为信州、青州刺史。《旧唐书·地理志三》“信州”云：“乾元元年，割衢州之常山、饶州之弋阳、建州之三乡、抚州之一乡，置信州，……贵溪，永泰元年十一月，分弋阳西界置。”贵溪乃信州建置以后自弋阳西界划出，而弋阳在信州建置前属饶州，可见贵溪原属饶州。疑吴武陵谒吉甫时吉甫方为饶州刺史，本事最初流传时，当以贵溪原属饶州，遂以吴武陵谒见为州人求告。后在流传中又独取州人求告一节，而贵溪时属信

州，遂再误以吉甫曾为信州刺史。

两则本事当同出一事，而传闻异词，其中必有附会。岑仲勉《金石论丛·贞石证史》谓“此殆牛、李党争故为诽谤者”。又谓“吴湘为武陵兄子，德裕即以湘狱贬死崖州。《旧唐书》传言武陵坐赃时，德裕为相，故挟怨附李宗闵，同作谤言。”可备一说。

7. 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许与定分，一志不为，某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二举，坐王侍郎杂文落第。某当是时，年已蹭蹬，常于江激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将出关。因献座主六韵律诗曰：“寥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炉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座主览焉。问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实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某遂出关。秋月，江东求荐，名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闈故事，亦许诗赎。”某致词后，纷纷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诗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座主还阙之日，独揖前曰：“春间遗才，所投六韵，不敢惭忘，聊副素约耳。”（《太平广记》卷一七九引温庭筠《乾骊子》）

徐松《登科记考》卷一〇系阎济美大历九年登第，引《乾骊子》为证，并按：“《唐诗纪事》亦载此事，言济美于大历九年春下第，将出关，献座主张谓诗，是年张谓知上都举，《乾骊子》作王侍郎，非也。第东都十年知举

为蒋涣,《纪事》以为张谓,亦非。《乾膺子》又言刘单侍郎,考大历中上都知举无刘单。”《唐诗纪事》言济美于大历九年下第,来年东都试登第,且座主均为张谓。徐氏认为大历十年东都知举者为蒋涣,而非张谓,故系济美于大历九年登第。《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亦以济美于是年登第,否定大历十年之说,其反证是大历十年张谓未知举,且《乾膺子》及《唐诗纪事》均谓济美及第年试题为《蜡日祁天宗赋》,而该年非此试题。《登科记考》及《编年史》否定《唐诗纪事》大历十年之说的理由是确凿无误的,但系济美于大历九年登第却缺乏足够证据。大历九年东都知举者为蒋涣,《登科记考》亦已标明。徐氏以张谓未知大历十年东都举,故不系济美于该年及第,然已知张谓亦未知大历九年东都举,又系济美该年登第,所持前后不一,何其陋也!《编年史》指出大历十年张谓未知举,然忽略了大历九年张谓也未知东都举这一细节。

《乾膺子》此节叙事用第一人称,乃阎济美自叙平生,所叙赴试登第情形必不误,因而文中情事是确定其登第时间的最重要的材料。

文谓“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一六以刘单知大历六年春贡举,发榜,其说可信。第一、《元和姓纂》卷五记载:“礼部侍郎刘单,岐山人。”是刘单官终礼部侍郎。第二、《旧唐书·杨炎传》载:“元载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刘单^①;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贬,又引炎。”薛邕以大历八年五月由吏侍贬出,则单为礼侍卒,必在稍前。又邕自大历元年为礼侍至五年迁吏侍,单为礼侍应在邕后,即单为礼侍应在大历五年至八年之间。第三、《唐语林》卷八“累为主司”条谓:“张谓三,大历六年、七年、八年。”而《唐诗纪事》卷二五谓张谓“典七年、八年、九年贡举”。薛邕大历五年由礼侍迁吏侍,是年春仍知贡举,若张谓知举始于大历六年,则将无以置单,故张谓知举时间以《唐诗纪事》为准。严氏的解释是:唐制本年春贡举例以前一年冬派遣知举人,故史籍往往以知二年举为第一年,谓盖以六年冬始迁礼侍知七年春贡举。

可见,阎济美初举在大历六年。据《唐摭言》卷一“两都贡举”条载:

① 严氏以为“郎中”为“侍郎”之误,甚确。

“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册府元龟》所载略同。又大历九年、十年知东都贡举者为蒋涣,《登科记考》卷一〇以大历八年蒋涣知东都贡举,不确。《旧唐书·代宗纪》载:“(大历七年五月)癸亥,以检校礼部尚书蒋涣充东都留守,……(八年九月)甲午,东都留守蒋琰兼知东都贡举。”^①则涣大历八年九月始任贡职,其发榜时间是大历九年。《唐语林》卷八载:“蒋涣再,大历九年,十年。”不误。则济美后两次应试必在大历七年、八年,八年东都试及第。涣已于大历七年为东都留守,八年又未知贡举,则该年知贡举者非东都留守,《乾膺子》记“座主还阙”云云,可见该年东都知举者乃西京官。前已述及,张谓知大历七年、八年、九年贡举,则八年东都知举者应为张谓。《唐摭言》卷一“两都贡举”条载:“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则其时礼部侍郎固可知两都贡举,张谓该年亦知东都举当无疑义。

8. 王建

王建校书为渭南尉,作官词。……渭南先与内官王枢密,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官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元公亲承圣旨,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何其慎静乎!二君将遭奏劾,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云溪友议》卷下“琅琊忤”)

本事所引王建诗,《全唐诗》卷三〇〇题作《赠王枢密》。《旧唐书·王守澄传》记载,元和末守澄为宦者,宪宗暴崩,守澄与中官定册立穆宗。长庆中,知枢密事。文宗即位,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大和九年,为文宗鸩杀。王守澄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诗称“先朝”云云,必在宪宗以后,而文宗即位前未为太子,未在“春宫”,则必不作于宪

^① 按:“琰”为“涣”之误。

宗、文宗朝。又敬宗长庆二年十二月立为太子，四年正月即位，在“春宫”仅一年，亦不得谓“春宫见长时”。穆宗于元和七年立为太子，十五年即位，“今上”应指穆宗。据此，王建此诗当作于穆宗时。

王建《宫词》100首，内容丰富。有朝廷政务，宫中执掌；有天子游猎，宫廷行乐；还有宫中节令，宫女生活。本事意谓王守澄泄漏宫中之事，王建因以写入《宫词》，守澄以王建传播宫闱密事而欲行告发，王建遂借此诗归罪守澄，予以反制。然前引王建诗不能证实这一说法。此诗首联点明王守澄与宪宗、穆宗的亲密关系，颌联和颈联叙述王守澄在宫中的职责行事，意在说明其独荷荣宠，深得信任。尾联承前两联之意，流露企羡颂美之情。所谓“频向说”，是指守澄自炫其在宫中的职事及荣宠，非指守澄泛言宫中琐事。可见，诗意与本事不合，疑此事据王建诗尾联附会而来。

9. 李约

兵部李员外约，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分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谔同弃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尤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尚书故实》）

《南部新书》丁载此诗本事云：“李约为兵部员外，勉子也。与主客员外郎张谔同官，二人每单床静言，达旦不寐。故约《赠韦征君况诗》曰：……”以李约诗为赠韦况而作。考李约诗，称“韦二”、“张八”，乃第三人称口吻，不类赠人之作，疑非赠韦况、张谔之诗。诗谓诗人有满腹心事，却不便向韦况言说。于时秋夜，皓月当空，诗人想起洛阳城里的友好张谔，似欲有所诉说，但人在两地，无由接谈。据诗意，此诗为月下怀人之作。本事所谓李、张二人静言终夜一事，叙说怪异，疑据诗意附会而成。

10. 韦皋

西川韦相公皋，昔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恭事之礼，如父叔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祇候，侍于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君入

关求官，而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君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察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泪，乃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从往，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五年既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暨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耳。”遂绝食而殒。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殒焉。后韦公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情，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得姜家荆宝否？”韦公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羁縲？”答曰：“某辞违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清城县令。家人误蕪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便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留连宾幕。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经莫英数凋，方谓：“玉箫何在？”姜牧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逾时不至，乃绝食而殒。”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难解赠佳人。长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公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供佛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二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诀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公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同平章事。天下向附，泸棘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

《全唐诗》卷三三四录韦皋《忆玉箫》^①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序云：“玉箫者，江夏姜使君家青衣也。皋微时，客于姜，与之有情，以玉指环及一诗遗之，订后约。久之，玉箫郁念成疾死，姜以环着中指葬焉。后皋镇蜀，生日，东川献歌姬，亦名玉箫，而貌正同，中指肉隐起如所着玉环，时以为感皋意再生云。”此诗据《云溪友议》辑录，序亦据以缩写。序中“以玉指环及一诗遗之”指韦皋离别玉箫时留环赠诗一事。《云溪友议》云：“宝命青衣从往，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可见辑录者以此诗为韦皋别玉箫时所赠之诗。但是，在《云溪友议》中，此诗并未置于韦皋与玉箫离别这一情节之中，诗与事并无直接关联。此诗出自下面的情节：韦皋后镇蜀，巧遇荆宝，因问玉箫所在。“姜牧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逾时不至，乃绝食而殒。’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韦公闻之，益增凄叹。”显然，辑录者以此所吟留赠玉环诗为韦赠玉箫之诗。这一解读具有明显的失误。首先，韦皋的留别诗完全可能是一首泛言离情的诗，未必即吟玉环。其二，诗的内容与离别情景不符。诗首两句言离别赠环之事，“已数春”说明其事早在数年以前。后两句言别后相思，乃纪实之词，自然只能作于离别之后。可见此诗不可能作于离别之时。其三，荆宝因韦皋询问，方叙玉箫之事，何故遽然插入韦皋之诗，意有未通。其实，此诗乃玉箫所作，写作时间在两人离别以后数年。首两句以黄雀衔环故事喻当时韦皋留赠玉环一事，后两句谓别后杳无音信，因而希望结思成梦，赴秦地与韦皋相会。荆宝吟其诗，乃告以玉箫相思之苦，故“韦公闻之，益增凄叹”。可见，此诗乃玉箫咏韦皋所赠玉环，为睹物伤情之作。《云溪友议》文字过于简略，叙述含糊不清，因而造成误解。

11. 武元衡

唐武元衡伯苍也。河南人。建中四年进士。元和二年，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剑南节度。八年，复秉政。明年，早朝遇盗，为所害。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被于管弦。尝夏夜作诗曰：“夜久喧

^① 忆，《全唐诗》校云：“一作寄”。

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翌日遇害。（《郡斋读书志》卷一七）

《全唐诗》卷三一七录此诗，题作《夏夜作》。《旧唐书·武元衡传》载：“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河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梃击元衡左股。其徒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又《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年）六月辛丑朔。癸卯，镇州节度使王承宗遣盗夜伏于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由“辛丑朔”推算，“癸卯”为六月三日。可见，两处记载元衡遇害时间完全相同。六月二日，月亮初出，“夜久”则无月。《夏夜作》所写月夜景象与此时间不符，必不作于此时。本事乃据诗中“日出事还生”一句附会而来。

12. 韩愈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顶，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国史补》卷中）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〇“韩退之”引《历代确论》载沈颜《登华旨》云：“尝读李肇《国史补》云：‘韩文公登华岳之巅，顾视其险绝，恐慄，度不可下，乃发狂恸哭而欲缢遗书为诀。且讥好奇之过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论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丝，泣不在丝也。且阮籍纵车于途，途穷辄恸，岂始虑不至邪？盖假事讽时，致意如此耳。前贤后贤，道岂相远？文公愤趣荣贪位者，若陟悬崖，险不能止，俾至身危蹈蹶，然后叹不知税驾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几晦乎？”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以沈氏为妄辨，云：“唐小说载韩退之尝登华山，攀缘极峻，而不能下，发狂大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始得下。沈颜作《肇书》辨之，以为无此事，岂有贤者而轻命如此。予见退之《答张彻》诗，叙及游华山事，句有‘磴藓沾拳跼，梯飈颒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则知小说为信，而沈颜为妄辨也。”魏泰引韩愈诗为证，以其事为实有，所辨沈氏之妄者，以为沈氏以其事为无也。其实，这是误解了沈氏的意思。沈氏反驳李肇，原因在于李肇认为诗中所

叙韩愈登华山一事乃无谓之举,好奇之过。他认为李肇误解了诗事的意义,认为韩愈如古之先贤,诗中寓有微言大义。观沈氏引仲尼悲麟、墨翟泣丝及阮籍穷途恸哭三事以拟诗事,则知其信“发狂恸哭”为实有,非辨李肇所记为无。

此后,宋代学者有力辨其无者,反复辩难,各执一端。诸人所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诗事的有无,二是诗事的意义。

李肇《国史补》中的记载,实出韩愈《答张彻》中的有关叙述,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轳,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藓汰拳跼,梯飍飍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①本事记载的韩愈作遗书、县令援救的情节,于诗无据,而“发狂恸哭”一节乃据“悔狂已咋指”一句。但是该句有重要异文。《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云:“祝本、魏本、廖本注曰:‘狂’一作‘往’。”^②按,作“往”是,两句为对句,“悔往”对“垂诫”,作“狂”则非对句。两句是说,因山路险峻,跋涉艰难,故后悔当初轻率前往。诗本作“往”,“狂”乃形近而误。本事作者未能详察,因此异文附会“发狂恸哭”的怪异举动,又进而敷衍韩愈作遗书、县令援救等情节。可见,《国史补》中记载的故事情节是对韩愈诗的误读和增饰,不足为据。

《答张彻》作于元和元年。贞元十九年,韩愈在朝为监察御史,因触怒权要,贬为阳山令,至永贞元年,徙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授国子博士,此诗反映了当时的落寞心境。诗之后半追叙被贬以后的人生经历,着力表现贬谪生活的险恶与屈辱,以及内心的忧伤与惶恐,为全篇主旨所在。“洛邑”下12句处在诗之后半之前,其实是借用登山一事隐喻后面诗歌的内容,并起到开启下文的作用。这12句极力铺写山路的险峻难行,其实是在暗示仕途的艰险难测,登临绝顶时的悔悟与垂诫是诗人历经贬谪以后对官场深怀戒惧心理的曲折反映。这一心态在韩愈作于永贞元年的《赴江陵途中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一诗中可以得到印证。该诗写到经历贬谪以后的失意与绝望,诗云:“自

① 《全唐诗》卷三三七。

②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因疾鼻又塞，渐能等熏莸。深思罢官去，毕命依松楸。”^①对官场的畏惧逃避心态可以成为“洛邑”下数句的有力注解。唐人诗多以“行路难”喻仕途的艰险和人世的苦难，“洛邑”下数句其实也未脱离这一思维的模式和文学表现的模式。

13. 刘禹锡

（刘）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维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仗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社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旧唐书·刘禹锡传》）

本事所录原文乃刘禹锡诗《读张曲江集作》小引，其诗云：“圣言贵忠恕，至道重观身。法在何所恨，色伤斯为仁。良时难久恃，阴谪岂无因。寂寞韶阳庙，魂归不见人。”^②

永贞元年，顺宗即位，王叔文等发起了旨在变革朝政的“永贞革新”，刘禹锡、柳宗元为王叔文集团的骨干成员。不久，革新运动失败，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途中再贬为朗州司马。直到元和十年召还长安，但不久又出为连州刺史。本事明谓《读张曲江集作》作于湘、澧间，即贬于朗州时期。《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③、《谪九年》等赋数篇。又叙：‘张九龄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五溪不毛处。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罢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

① 《全唐诗》卷三三六。

② 《全唐诗》卷三五四。

③ 据《问大钧赋》序，此赋作于元和十五年。

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为开元良臣,而卒无嗣,岂忮心失恕,阴责最大,虽它美莫赎邪!’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久之,召还。”也以此诗作于朗州。

但是,这首诗的思想倾向与被贬朗州一事不甚吻合。此诗虽因读《张九龄文集》有感而作,但意有所指,决非泛泛议论。此诗借张九龄建言放臣不与善地一事谴责宰臣忮心失恕,谴责对象是执政的宰臣。永贞元年,刘禹锡等人初贬主要出于宪宗的意旨。顺宗即位以后,王叔文擢用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形成了一个以变革朝政为主导的政治集团。时宪宗为太子,对王叔文集团持抵制态度,王叔文等也因此曾拟另立嗣君。因为政治上的对立,宪宗对王叔文集团成员深怀嫉恨,即位以后,立即给予王叔文等以严厉打击。王叔文赐死,刘禹锡等人一贬再贬。宪宗还下诏,废锢诸人,纵逢恩令,不在量移之列。可见,刘禹锡等人初贬是宪宗主导的。

此诗的写作应在元和十年再贬连州以后,谴责的对象当是宰相武元衡。永贞革新时,武元衡在御史台为御史中丞,因抵制改革运动,被王叔文集团贬为右庶子。宪宗即位以后,得到信任,此后两度为相,成为宪宗集团的代表人物。元和十年刘禹锡等人召还长安时,武元衡正执掌朝政。刘禹锡把此后再度遭贬的原因归结为武元衡的排斥打击,作于元和十年的政治寓言诗《飞鸢操》对此有所透露^①。诗中飞鸢争食疑忌鸳雏的描写源出《庄子·秋水》,是借庄子讽刺惠施的故事隐喻武元衡对王叔文集团成员的猜忌。该诗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了元和十年武元衡对刘禹锡等人的排斥打击,体现了刘禹锡对这一政治事件的反思^②。元和八年,刘禹锡在朗州时曾上书再度为相的武元衡,希望武元衡能援之以手,其文云:“伏遇相公秉钧,辄已自贺。悦重言一发,清议攸同。使圣朝无锢人,大冶无废物。自新之路既广,好生之德远彰。群蛰应南山之雷,穷鳞得西江之水。指顾之内,生成可期。伏惟发肤寸之阴,成弥天之泽;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诚无补于多事之时,庶有助于阴施之德。”^③但是,武元衡非但不援之以

① 详见高志忠《〈飞鸢操〉考论》,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六辑。

② 详见拙文《刘禹锡、柳宗元与武元衡关系论略》,文载《唐都学刊》,1999年第2期。

③ 《刘禹锡集》卷一八《上门下武相公启》。

手,相反,打击排斥不遗余力。在刘禹锡看来,这是有违忠恕之道、阴施之德的。《读张曲江集作》谴责宰臣忤心失恕,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元和十年,武元衡遭藩镇刺客刺杀,死于非命,所谓“阴谪”似指此。不仅如此,作者谴责张九龄“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使“华人士族”至于“丑地”,这一批判态度与作者被贬连州时“官虽进而地益远”的处境最为吻合^①。

可见,此诗并不作于朗州,作于元和十年武元衡遇刺以后,时在连州。

刘梦得送人下第诗云:“今此卜行日,高堂应梦归。莫将和氏泪,滴向老莱衣。”又有诗云:“新诗一联出,白发数茎生。”(《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三引卢瓌《抒情》)

刘禹锡字梦得,此诗刘禹锡诗集不载。《全唐诗》卷五四四录刘得仁《送友人下第归觐》一诗,诗云:“君此卜行日,高堂应梦归。莫将和氏泪,滴著老莱衣。岳雨连河细,田禽出麦飞。到家调膳后,吟苦落蝉晖。”《全唐诗》卷一一四重收,作殷遥诗。据此,《抒情》所录乃诗之前半,而作者乃由刘得仁而误。《抒情集》作于晚唐五代,可见晚唐五代以此为刘得仁所作。又《文苑英华》卷二八四作刘得仁,此诗当属刘得仁。作殷遥诗乃误。

14. 陈通方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顾少连下进士及第。时属公道大开,采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轻薄自负。与王播同年。王时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贮之。通方寻值家艰还归。王果累捷高科,官渐达矣。通方后履人事入关,王已丞郎判监铁。通方穷悴寡坐,不知王素衔其言,投之求救。同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

李虚中时为副使，通方亦有诗扣之，求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职未及其所，又改为浙东院。仅至半程，又改与南陵院。如是往复数四，困蹶日甚。退省其咎，谓甥侄曰：“吾偶戏谑，不知王生遽为深憾。人之于言，岂合容易哉。”寻值王真拜，礼分悬绝，追谢无地，怅望病终。（《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引《闽川名士传》）

《旧唐书·王播传》记载：“（大和）四年正月，（王播）患喉肿暴卒，时年七十一。”《旧唐书·文宗纪》亦载：“（大和四年正月）甲午，守左仆射、同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播卒。”以此推之，贞元十年，王播年三十六^①，非“五十六”，正当盛年。所谓陈通方戏称“王老”、王播怀恨一事或出误传。

本事称王播为丞郎判盐铁时，陈通方投之求救，时李虚中为副使，通方投以诗，王不得已，署以官职。似谓王播为盐铁使时，虚中为其副使，并因通方投献虚中，王乃署以官。《旧唐书·王播传》：“（元和）六年三月，转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是为王播始为盐铁转运使。李虚中事迹详载韩愈《殷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其文云：“（虚中）进士及第，试书判入等，补秘书正字，母丧去官。卒丧，选补太子校书。河南尹奏疏授伊阙尉，佐水陆运事，故宰相郑公余庆继尹河南，以公为运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剑南，奏夺为观察推官，授监察御史。”^②据此载，虚中为水陆转运副使，非盐铁转运副使。五百家注韩集注谓“贞元十六年九月，以张式为河南尹，水陆转运使”，《旧唐书·德宗纪》所载略同。又《旧唐书·宪宗纪》记载，郑余庆继尹河南在元和元年十一月。张式奏虚中为伊阙尉、水陆转运副使当在此间。《旧唐书·宪宗纪》又载：“（元和二年十月）丁卯，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成

① 《登科记考》卷一三以王播卒于大和五年，乃误读李宗闵《故丞相尚书左仆射赠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并序》中“上即位五年正月，丞相左仆射太原王公以癸巳发疾，其明日遂薨于位”数句。其实，“上即位五年”指大和四年，因文宗宝历二年即位，又“甲午”为“癸巳”后一日，《神道碑铭序》与《旧唐书·文宗纪》所记完全吻合。

② 《韩昌黎全集》卷二九。

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则元和二年十月虚中离水陆转运副使之任,其时王播尚未为丞郎、盐铁转运使。通方投诗虚中,乃别为一事,与乞求王播事无涉。

15. 卢储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抒情诗》)

本事载卢储投卷、登第事在李翱江淮典郡时。《登科记考》卷一八载卢储元和十五年状元及第,此载实本于《唐才子传》卷六施肩吾为“元和十五年卢储榜进士”的记载。辛文房著《唐才子传》时,唐《登科记》尚有存者,辛氏此载必有所本。李翱江淮典郡事有可考者。长庆元年十一月,李翱自朗州刺史改授舒州刺史(详见下),长庆三年十月入为礼部郎中^①,宝历元年二月出为庐州刺史^②,大和元年征为谏议大夫^③。“江淮典郡”指为舒州、庐州刺史事,时间分别是长庆元年(821)至三年(823)及宝历元年(825)至大和元年(827)。卢储登第在元和十五年(820),李翱江淮典郡在长庆元年以后,可见《抒情诗》关于卢储投卷登第的记载有误。李翱在任舒州刺史以前曾为朗州刺史,但出任时间在元和十五年七月,也在本

① 《全唐文》卷六四〇李翱《送灊山神文》:“维长庆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议郎守尚书礼部郎中上轻车都尉李翱,谨遣舒州摄要籍司衙前军虞候吴潭,以清酒鹿脯告辞于灊山大神之灵。翱自去岁来临此邦。……将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来辞,神鉴予衷。”

② 《旧唐书·敬宗纪》:“(宝历元年二月)辛卯,以前礼部郎中李翱为庐州刺史。”

③ 《全唐文》卷六三八李翱《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柏公神道碑》:“太和元年,翱自庐以谏议大夫征。”

年正月进士放榜之后。此前李翱未有外任,也不可能有本事所载卢储投卷之事。《催妆》诗有“昔年将去玉京游”句,谓赴京应举,若此诗为李翱之婿所作,则必作于李翱外任期间,即元和十五年以后。如前所述,卢储已于元和十五年登第,则非但本事所载卢储之事不能成立,并所引之诗亦非其所作。

以上乃就卢储元和十五年登第立论。取消这一前提,情况如何呢?李翱《朗州别女足娘墓文》云:“维长庆元年十二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授舒州刺史。”^①此文为李翱自朗州赴舒州时所作,则始江淮典郡在长庆元年十二月。钱易《南部新书》丙记载:“每岁十一月,天下贡举人于含元殿前,见四方馆舍人当直者。”据此,举人早在十一月已至京城。则卢储投卷事不能在长庆元年,当然也就不能有第二年春登第之事。前已述及,李翱江淮典郡时间在长庆元年(821)至大和元年(827)之间,据《登科记考》,长庆三年(823)状元为郑冠,四年(824)为李群,宝历元年(825)为柳璟,二年(826)为裴俦,大和元年(827)为李郃,二年(828)为韦筹。可见,李翱江淮典郡期间,并不存在卢储投卷及状元及第之可能。

《唐摭言》卷八载李翱之婿卢求登第事,与《抒情诗》所载颇有关合之处: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婿。先是翱典合肥郡,有一道人诣翱,自言能使鬼神。……后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杨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亲表,由是颇以求为嫌。因访于道人,道人……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递中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辞云:“裴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嗣复已有所贮,颇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俦为状元,黄价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

道人先知事荒诞无稽,不足为凭,然李翱女预知状头事亦颇与类似。据

^① 《全唐文》卷六四〇。

《登科记考》卷二〇，杨嗣复于宝历元年和二年连知贡举，卢求登第当在宝历二年。《唐诗纪事》卷五三及《登科记考》即据此记载卢求宝历二年进士登第。《旧唐书·卢携传》谓卢求宝历中登第，亦相吻合。

可见，李翱江淮典郡时，其婿登第者为卢求。《催妆》或为卢求所作，疑《抒情诗》所载本事因诗意虚构投卷、招婿之事，又附会坐实诗中“第一仙人许状头”句，以为诗作者状元及第，进而将作者误为卢储。

16. 张籍

乐天分司东洛，朝贤悉会兴化亭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王起《赋花》诗云：“花，点缀，分葩。露初裊，月未斜。一枝曲水，千树山家。戏蝶未成梦，娇莺语更夸。既见东园成径，何殊西子同车。渐觉风飘轻似雪，能令醉者乱如麻。”李绅《赋月》诗云：“月，光辉，皎洁。耀乾坤，静空阔。圆满中秋，玩争诗哲。玉兔难穿，桂枝人共折。万象照乃无私，琼台岂遮君谒。抱琴对弹别鹤声，不得知音声不切。”令狐楚赋《山》诗云：“山，耸峻，回环。沧海上，白云间。商老深寻，谢公远攀。古岩泉滴滴，幽谷鸟关关。树岛西连陇塞，猿声南彻荆蛮。世人只向簪裾老，芳草空余麋鹿闲。”元稹赋《茶》诗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挑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乱岂堪夸。”魏扶赋《愁》诗云：“愁。迥野，深秋。生枕上，起眉头。闺阁危坐，风尘远游。巴猿啼不住，谷水咽还流。送客泊舸入浦，思乡望月登楼。烟波早晚长羁旅，弦管终年乐五侯。”韦式郎中赋《竹》诗云：“竹，临池，似玉。裊露静，和烟绿。抱节宁改，贞心自束。渭曲偏种多，王家看不足。仙杖正惊龙化，美实当随凤熟。唯愁吹作别离声，回首驾骖舞阵速。”张籍司业赋《花》诗云：“花，落早，开赊。对酒客，兴诗家。能回游骑，每驻行车。宛宛清风起，茸茸丽日斜。且愿相留欢洽，惟愁虚弃光华。明年攀折知不远，对此谁能更叹嗟。”范尧佐道士赋《书字》诗云：“书，凭雁，寄鱼。出王屋，入匡庐。文生益智，道著清虚。葛洪一万卷，惠子五车余。银钩屈曲索靖，题桥司马相如。别后莫睽千里信，数封缄送到闲居。”居易赋《诗》字诗云：“诗，绮美，瓌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

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唐诗纪事》卷三九“韦式”）

大和三年三月，白居易罢刑部侍郎，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①。《刘禹锡集》外集卷二载《宴兴化池亭送白二十二舍人东归联句》，即裴度、刘禹锡、张籍等送白居易东归洛阳时所作。《刘禹锡集》外集卷一又载《叹水别白二十二》，诗云：“水，至清，尽美。从一勺，至千里。利人利物，时行时止。道性净皆然，交情淡如此。君游金谷堤上，我在石渠署里。两心相忆似流波，潺湲日夜无穷已。”大和三年，刘禹锡为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诗中“君游”两句，一指白居易，一自指。此诗为刘禹锡送白居易赴东都时所作。可见，白居易赴东都时诸人有一韵至七韵送别诗，张籍赋花诗当为同时所作。白居易诗有“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两句，“司空”指裴度。诸人在裴度兴化亭赋诗送别，故裴度亦有诗，可见白居易此诗亦同时所作。《纪事》并载韦式赋竹诗。《新唐书·宰相世系四上》载韦式为韦应物曾孙。白居易与韦应物时代相去不远，《唐会要》卷七六载应物之子庆复于元和元年与白居易、元稹等同制举登科，当年辈相若。若此，韦式与白居易等年辈不相及，当不至有此交游。《刘禹锡集》外集卷二载《西池落泉联句》、《首夏犹清和联句》及《蔷薇花联句》，为大和二年裴度、白居易、刘禹锡及行式、张籍诸人作。又《刘禹锡集》外集卷二载《西池送白二十二东归兼寄令狐相公联句》，为大和三年裴度、刘禹锡、张籍、行式送别白居易时所作。可见，当时与刘、白等交游者中尚有名“行式”者。《旧唐书·韦皋传》载韦皋之侄有韦行式，并谓韦行式娶卢文若之妹。元和初，刘辟曾与卢文若据西川叛，则韦行式与刘、白等年辈相及，与刘、白交游者当即其人。据此，《纪事》所载韦式之诗当为韦行式之诗，人名因脱字而误。《纪事》并载李绅、令狐楚、元稹同体裁诗，但大和三年李绅方为滁州刺史^②，令狐楚本年三月已先于白居易赴东都任^③，元稹时

① 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② 见《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2页。

③ 《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三年）三月辛巳朔，以户部尚书令狐楚为东都留守。”令狐楚赴任洛阳，白居易、刘禹锡置酒相送。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第205页。

在浙东观察使任^①。三人俱不在京,无由送别,诸诗非其时所作。《刘禹锡集》卷三四载《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一首,“王仆射”即王起,《旧唐书·王起传》载:“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卤簿使,寻检校左仆射,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会昌元年,征拜吏部尚书,判太常卿事。”则王起赋花诗作于会昌元年,非送别白居易之诗。范尧佐赋书诗有“书。凭雁,寄鱼。出王屋,入匡庐”数句,谓书信寄自王屋山,达于庐山,所咏之事与白居易东都赴任事不相及,非送别居易之诗。魏扶赋愁诗写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情,且谓“深秋”,亦与诸人送别事不合,疑非其时作。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患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唐摭言》卷一三)

本事所谓“张水部”指张籍,所引张籍诗句出自《蓟北旅思》。诗云:“日日望乡国,空歌白苧词。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②张籍集中尚有《蓟北春怀》^③、《渔阳将》^④,可见张籍曾游历蓟北,时间当在贞元十五登第以前。此诗作于早年,非元和中张籍在朝为官时。本事乃据诗句附会而成。

17. 元稹

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

① 《旧唐书·元稹传》记载:“乃出稹为同州刺史……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凡在越八年。太和初,就加检校礼部尚书。三年九月,入为尚书左丞。”

② 《全唐诗》卷三八四。

③ 见《全唐诗》卷三八四。

④ 见《全唐诗》卷三八四。

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本事诗·征异第五》）

陶宗仪《说郛》卷四载白行简《三梦记》，第二梦即叙其事：“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为监察御史，奉使剑外。去踰旬，予与仲兄乐天、陇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诣慈恩佛舍，遍历僧院，淹留移时。日已晚，同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对酬，甚欢畅。兄停杯久之，曰：‘微之当达梁矣。’命题一篇于屋壁。其词曰：‘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实二十一日也。十许日，会梁州使适至，获微之书一函，后寄《纪梦诗》一篇，其词云：‘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入慈恩院里游。属吏唤人排马去，觉来身在古梁州。’日月与游寺题诗日月率同。盖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

本事及《三梦记》所引元稹诗，《元稹集》卷一七题作《梁州梦》，是元和四年元稹出使东川时所作组诗《使东川》中的一首。诗云：“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本事及《三梦记》所引文字与本集文字有异，本集谓“梦君同绕”，本事及《三梦记》作“梦君兄弟”。本集该诗后有自注云：“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本集文字与注合。据此，诗首两句乃诗人自谓梦中与白居易、李杓直游曲江及慈恩寺院。按本事及《三梦记》所引文字，诗首两句所叙游曲江及慈恩寺者乃白氏兄弟二人，与元稹无关。但是，诗末“忽惊身在古梁州”句显然意指梦时身在彼而醒后身在此，若梦游曲江及慈恩寺院者中没有元稹，不仅与诗注不合，即于诗意表达也有欠圆融。据此，诗首句应是“梦君同绕曲江头”，“兄弟”两字为讹误之异文。

《三梦记》中的故事用讹误文字，所列出游者也没有元稹，（当然，文集诗中的情形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实中，一个人不可能既在做梦，又在出游。）此梦结语云：“盖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以白居易等为“此”，以元稹为“彼”，也是将出游仅视为白居易等人的活动，而将元稹排除在外。

但是，此诗的不同文本意义大有不同，文集文本强调诗人与诸人的梦

中同游,抽去诗人在梦中的活动,此诗意兴全无。凡见过这一文本的读者是不会无视这一情节及其意义的。《使东川》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可见,白行简对这一组诗是非常熟悉的,不至将与己无关的事错误地拉到自己身上,当然也不会在其作品中出现如此歧异的讹误文字。《三梦记》中,诸人出游的描写及文末的结语都是受这一异文的支持的。既然白行简不至有此讹误,那么,此则故事当不是出自白行简之手。

这一结论还可从另一侧面得到证实。《三梦记》记诸人游寺在“二十一日”,元稹感梦在同时,这是不准确的。《使东川》中有《汉江上笛》一诗,自注:“二月十五日夜^①,于西县白马驿南楼闻笛怅然。”^②元稹出使东川走南栈道,即自骆谷、悦谷走洋州,至兴元(梁州),又过褒城、西县,至利州、剑州,抵梓潼。自京使蜀,必先经过梁州,然后到达西县,则抵梁州在三月十五日以前,不得谓“二十一日”。若故事为白行简作,其在特意标明这一时间时,不至出现如此疏忽。

《唐诗纪事》卷三七《元稹》下亦载其事,文字略同,且云:“自有《感梦记》,备叙其事。”可见,此一故事宋时传为元稹所作。如前所考,故事不可能为白行简所作,所述理由也完全适合元稹,《感梦记》亦当非元稹作。

故事中的异文及基本情节当出自《本事诗》。其实,本事中元、白诗原作所叙说的事件情节原本平淡无奇。白诗题为《同李十一醉忆元九》^③,题中“李十一”即李建杓直。元、白原作不过说白、李二人饮酒破愁之时,想起出使在外的元稹,元稹出使途中曾梦与二人同游。诗作所叙,如此而已。具有戏剧性的情节,一是元诗中梦里同游之人乃怀己之人,即白诗中怀人者乃元诗中梦中同游者。二是白、李忆元稹之时推测元已过梁州,而元稹梦游又偏偏发生在抵达梁州时。至于本事中白居易等游慈恩寺以及白、李忆元之时元果达梁州二事,则不能在两首诗中得到证实,是本事独有的。此二事尚有可疑之处。《白居易集》卷一四有《酬和元九

① 按:“二”当作“三”。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

② 《元稹集》卷一〇《黄明府诗》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东数里。”未知孰是,然也已过梁州。

③ 见《全唐诗》卷四三七。

东川路诗十二首》，为元稹《使东川》的酬和组诗。其中《江楼月》乃和元稹同题之作。元诗追忆从前与白居易等夜中曲江步月的情形，白诗谓“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所叙情事与本事所记“千里神交”事相类，如果本事所叙属实，那么白居易对元诗中更有戏剧性的《梁州梦》就应有和作，但白诗和作中并无如此诗作。此外，本事谓元、白互寄诗作，颇为可疑。白居易《江楼月》云：“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从“不解多情先寄诗”一节可推测此前应未有寄诗。

本事不仅留下以上疑问，还有细节失实。如本事以元稹《梦游》诗作于褒城，其实作于梁州^①，这些疑点和错误令人怀疑本事的真实性。唐诗本事在流传中多有戏剧化倾向，不能排除此一本事作者因元、白诗原有的巧合而进一步将事件戏剧化，从而附会穿凿，旁生枝节。对此本事的真实性当取谨慎存疑的态度。

元、白交道臻至，酬和盈编。微之为御史，奉使往蜀，路旁见山花，吟寄乐天曰：“深红山木艳彤云，路远无由摘寄君。恰似牡丹如许大，浅深看取石榴裙。”又曰：“向前已说深红木，更有轻红说向君。深叶浅花何所似，薄妆愁坐碧罗裙。”（《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七引《唐贤抒情》）

《白居易集》卷一四《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有《山枇杷花》二首，其一云：“万重青嶂蜀门口，一树红花山顶头。春尽忆家归未得，低红如解

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引《三梦记》之二按云：“‘梁’作‘褒城’或‘褒’。检《新唐书》肆拾《地理志》‘山南西道’云：‘兴元府汉中郡，赤，本梁州汉川郡。开元十三年以梁凉声近，更名褒州。二十年复曰梁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兴元元年为府。’故‘梁’‘褒’可互称。微之赋诗在元和四年，遂有‘古梁州’之句也。”（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9页）以褒城即梁州。然梁州仅更名褒州，非褒城。《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兴元府褒城县载：“本汉褒中县，……古褒国也。……隋开皇元年，以避庙讳改为褒内县，仁寿元年改为褒城。”《旧唐书·地理志二》“山南道”“梁州”下“褒城：汉褒中县，属汉中郡。义宁二年，改为褒中，贞观三年，复为褒城。”本事所谓“褒城”当指此。

替君愁。”其二云：“叶如裙色碧绡浅，花似芙蓉红粉轻。若使此花兼解语，推囚御史定违程。”查元稹《使东川》组诗，并无相应原作。《元稹集》卷二六有《山枇杷》诗，有云：“山枇杷，花似牡丹殷泼血。往年乘传过青山，正值山花好时节。压枝凝艳已全开，映叶香苞才半裂。紧搏红袖欲支颐，慢解绛囊初破结。金线丛飘繁蕊乱，珊瑚朵重纤茎折。因风旋落裙片飞，带日斜看目精热。亚水依岩半倾侧，笼云隐雾多愁绝。”所谓“往年乘传过青山”，指元稹于元和四年为监察御史出使东川一事，即本事所谓“微之为御史，奉使往蜀”。《唐贤抒情》所引元稹两首诗与此描写相近，又与白居易和诗内容相应，为元稹原作。《山枇杷》诗又云：“说向闲人人不听，曾向乐天时一说。”可为佐证。元稹《使东川》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今所录者，但七言绝句长句耳。起《骆口驿》，尽《望驿台》二十二首云。”可见《使东川》所录并非元稹奉使往蜀时的全部诗作，《唐贤抒情》所引元稹诗为收录时刊落，然竟以其他途径流传下来！白居易和《使东川》诗多用元稹诗原题，元诗诗题亦当作《山枇杷花二首》。元稹诗虽采用对话口吻，但为纪行之诗，非寄赠之作，本事以为寄乐天，不确。

18. 白居易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酉阳杂俎·前集》卷八）

《元稹集》卷一六《菊花》诗云：“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则“不是此花偏爱菊”原作“不是花中偏爱菊”，乃元稹诗句。“黄夹”句为白居易《泛太湖书事寄微之》中诗句。诗云：“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玉杯浅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终。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净无风。避旗飞鹭翩翻白，惊鼓跳鱼拨刺红。涧雪压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珑。书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

诗寄浙东。军府威容从道盛，江山气色定知同。报君一事君应羨，五宿澄波皓月中。”^①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本事诗·事感第二》）

《全唐诗》卷四六〇白居易《杨柳枝词》云：“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此谓柳树在永丰之西角，而非本事所引的“东南角”。《唐两京城坊考》卷六东京外城郭永丰坊下载：“西南隅柳树。”并引卢贞《和白尚书赋永丰柳》诗序云：“永丰坊西南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则柳在永丰西南，本事引文有误。

《全唐诗》卷四六〇白居易《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云：“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此诗与《杨柳枝词》置于《斋居春久感事遣怀》之前。《斋居春久感事遣怀》云：“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作于会昌五年，那么前两首亦作于本年^②。

又《全唐诗》卷四六三卢贞《和白尚书赋永丰柳》序云：“永丰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言也。因此偶成绝句，非敢继和前篇。”诗云：“一树依依在永丰，两枝飞去杳无踪。玉皇曾采人间曲，应逐歌声入九重。”据《唐刺史考全编》卷五〇，会昌四年至五年，卢贞为河南尹。《全唐诗》卷四六〇有《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

① 《全唐诗》卷四四七。

② 按：《杨柳枝词》作于会昌五年，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页。

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诗，自注云：“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七老会”在会昌五年三月^①，可证会昌五年，卢贞在洛阳。又据《唐刺史考全编》卷二五七，会昌五年，卢贞又为岭南节度使。卢诗序谓“永丰坊西南角”云云，乃身在洛阳口吻，则卢诗必作于会昌五年。据此，本事所叙之事在会昌五年，乃武宗之事，非在宣宗朝。

白居易《杨柳枝词》乃咏洛阳永丰柳，纯为咏物之诗，诗云“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谓柳树无人观赏，空有婀娜之姿，并非写人。本事谓小蛮方艳，白居易因以此诗寄意，乃附会比兴，并不符合诗之原意。

19. 繁知一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奇状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雾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

此节叙白居易行止，而未言及确切时间。据本事所引繁知一诗“苏州刺史今才子”句，似为白居易为苏州刺史赴任途中之事。《唐诗纪事》卷五一“繁知一”下云：“乐天除苏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

^① 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闻居易将过巫山”云云，乃为此意。考白居易生平，宝历元年，由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这年三月，除苏州刺史。自洛阳至苏州，一般取道汴州、徐州、楚州、扬州，白居易亦循此途赴任。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于宝历元年下云：“三月四日，除苏州刺史，二十九日，发东都，过汴州，与令狐楚相会，渡淮水，经常州，五月五日，到苏州任。”《白居易集》卷二四中《奉和汴州令狐楚公二十二韵》、《渡淮》等诗可证。宝历二年苏州离任以后，又取道扬州，在扬州与已离和州刺史任的刘禹锡相遇，此后两人一起经楚州、汴州，回到洛阳。因而，白居易为苏州刺史前后并无“过巫山”之事。元和十三年冬，白居易自江州司马转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长安，其间经过巫山，诗中“苏州”或为“忠州”之误。《唐诗纪事》卷五一、《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六引《古今诗话》俱作“忠州刺史今才子”，信然。据此，繁知一诗实有，为白居易赴任忠州时所作。

虽然繁知一题诗一节大致可信，但白居易接对一节有违史实。文引白居易语：“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云云。考刘禹锡生平，长庆元年冬方授夔州刺史，二年正月到任^①，四年转和州刺史^②，俱在白居易离开忠州以后，白居易为忠州刺史前后，再无“过巫山”之可能，因此此节所叙不实，乃牵合刘、白事迹而成。

20. 徐凝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

① 《刘禹锡集》卷一四《夔州谢上表》：“长庆二年正月五日。”

② 《刘禹锡集》卷三八《历阳书事七十韵并引》：“长庆四年八月，余自夔州转历阳。”

《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谕解送，以凝为元，祐其次耳。……祐《观猎》四句及《官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王维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戍，还归细柳营。回看失雁处，千里暮云平。”张祐诗曰：“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临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官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祐《官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之。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君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此歌官娥讽念思乡，而起长门之思也。祐复游甘露寺，观前卢肇先辈题处曰：“不谓三吴，经此诗人也。”祐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势尽来。”卢曰：“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回。”因而仰伏，愿交于此士矣。（《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

此谓徐凝来杭州时“未识白公”，不确。《全唐诗》卷四七四徐凝《寄白司马》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争遣江州白司马，五年风景忆长安。”^①则此前已与白居易往还。又谓“时春景方深”云云，则白居易访牡丹、徐凝题诗在春天，然唐时州府举送在每年十月^②，州府试当在此前不久。此谓徐凝、张祐“各希首荐”，“试谕解送”云云，不能为一时之事。

本事所引张祐《观猎》诗，《全唐诗》卷五一〇题作《观徐州李司空猎》。按：元和六年至十三年李愿为徐州武宁军节度使，仅检校尚书左仆射^③，十三年至十五年李愬继任，李愬离任时亦仅检校尚书左仆射^④，均与

① 按：“五年”当误，白居易于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十三年冬转忠州刺史，在江州司马任不足五年。

② 详见《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条。

③ 见《金石萃编》卷一〇七《使院新修石幢记》。

④ 见《旧唐书·穆宗纪》。

诗题不合。韦庄《又玄集》卷中收录此诗，题作《观魏博何相公猎》。何相公乃何进滔，《旧唐书·何进滔传》载：“太和三年，……朝廷因授进滔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据此，张祜诗作于大和三年以后。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长庆二年至四年，时张祜无此诗，此后来本事作者随意窜入，实误。

本事所引“谁人”两句出自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全诗云：“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①全诗表现诗人羁于仕宦的失意苦闷。首联紧承诗题，谓登楼遐思，百感交集。颔联表现对摆脱仕宦、归于自然的热切向往，“碧山”、“芳草”代表与仕宦相对的永恒的自然，是自由、高尚的象征。颈联表现诗人对仕宦生涯的悔悟，所谓“道”，指人生的真谛。诗人认为道在眼前，道非身外，因而不必远求，也不必外求。禅宗认为，道不外求，当求之本心，此即其意。“睫在”句表现的正是对执于功名而投身宦海的苦闷人生的反思和懊悔。尾联是说张祜摆脱功名富贵，寄情诗文，对其洒脱傲世的人生态度流露向往之情。两句意在论人，而非论诗。本事脱离两句语境，妄生穿凿，不可信据。杜牧本事所引“如何”两句出自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全诗云：“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推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②此诗首联表彰张祜杰出的诗歌成就，颔联谓昔日曾蒙知赏者举荐，但如今已无再荐之人了。颈联谓张祜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对功名充满向往之情。尾联谓张祜虽有杰出诗才，诗名播于宫廷，但依然落魄潦倒，不遇于时。本事所引“如何”两句即此诗尾联，这两句讲述张祜怀才不遇，代鸣不平，实就张祜平生遭际而言，并不针对一时一事。此一故事以为两句针对白居易对张祜《宫词》的贬斥，欲行翻案，实为牵强。

21. 李德裕

隐士张楚居洛阳平康之南，与李卫公别第为邻，山水奇秀。楚风

^① 《樊川诗集》卷三。

^② 《樊川诗集》卷四。

韵高洁，卫公当轴，荐为左拾遗，不起。后出镇，过平康往访之，楚避于山谷。卫公叹恨久之，题其门曰：“昔日趣黄诏，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引《诗史》）

《剧谈录》卷下“李相国宅”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庄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致，雅好山水。相国居廊庙日，以白衣累擢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国题诗曰：‘昔日征黄诏，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两处记载为同一事，《诗话总龟》中“平康”应为“平泉”，平泉庄为李德裕在洛阳的别墅。开成元年（836）七月，李德裕自滁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一月，复为浙西观察使^①，其间居平泉别墅，李德裕有《初归平泉过龙门南岭遥望山居即事》即作于此时。《诗话总龟》及《剧谈录》所谓“后出镇，过平康往访之”、“后归平泉”云云，即在此时。记中事主，一曰张楚，一曰韦楚老。楚老事迹，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记载：“韦楚老少有诗名，相国李公宗闵之门生也。自左拾遗辞官东归，寄居金陵。”杜牧有《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诗^②，又《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云：“大和九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今谏议大夫李中敏、左拾遗韦楚老、前监察御史卢简求，咸言于某。”^③《李府君墓志铭》及《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均作于开成二年春^④，可证开成二年韦楚老为左拾遗。又《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开成二年五月，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代牛僧孺。……补阙王绩、魏谟、崔党、韦有翼，拾遗令狐绶、韦楚老、樊宗仁等，连章论德裕妄奏钱帛以倾僧孺，上竟不问。”也可为佐证。此韦楚老不似李德裕所寻之平泉“隐士”。《全

① 见《旧唐书·李德裕传》。

② 见《全唐诗》卷五二一。

③ 《全唐文》卷七五五。

④ 《全唐文》卷七五五《李府君墓志铭》云：“开成元年春二月，……明年春，平卢府改，西归，病于路，卒于洛阳友人王广思恭里第。”开成二年春，杜牧弟顓患眼疾，杜牧往扬州探视（详见缪钺《杜牧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页），假满百日，依例去官，诗题中“病假满”即此。诗谓“洛桥风暖细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为春天情景。又谓“九牛新落一毛时”、“卧病神祇祷我知”，即病假百日去官。则诗作于开成二年春。

唐文》卷六六九白居易《伊阙山平泉处士韦楚》云：“右件人隐居乐道，独行善身，敛迹市朝，息机名利。况家传簪组，兄在班行；而楚独栖山卧云，练气绝粒，滋味不接于口，尘埃不染于心；二十余年，不改其乐，……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状奏。”则居平泉者有处士韦楚。又《册府元龟》卷七七九记载：“韦楚，京兆尹韦长之兄，文宗太和八年，以楚为左拾遗内供奉，竟以自乐闲澹不起。”白居易《题赠平泉韦征君拾遗》谓“位留丹陛上，身入白云中”^①，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系于大和八年，此韦征君拾遗当即韦楚^②，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大和七年二月，德裕拜相，至八年十月罢相，出为浙西节度使，则朝廷征韦楚时，德裕正在相位，与“昔日趣黄诏，余惭在凤池”两句吻合。据以上所考，本事中“张楚”为“韦楚”之讹。

22. 李涉

李博士涉，谏议渤海之兄^③。尝适九江看牧弟。临袂，凡有囊装，悉分匡庐隐士，唯书籍薪米存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风，鼓其征帆，数十人皆驰兵仗，而问是何人。从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间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须剽他金帛。自闻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乃赠一绝句。豪首钱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睹斯人神情复异，而气义备焉。因与淮阳佛寺之期，而怀陆机之荐也。李君及至扬州，遍历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谓宋态也。宋态者，故吴兴刘员外爱姬也刘全白也。刘、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诗赠曰：“长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陵阳夜宴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自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姮娥二十年。”李君叹曰：“不见豪首，而逢宋态。成终身之喜，恨无言于

① 《白居易集》卷三二。

② 吴企明《韦楚老和韦楚》（见《学林漫录》第八期，第109～113页）以“拾遗”为衍文，其实诗题不误。唐费冠卿进士及第不仕，以右拾遗征，不起，然当时及后世既称其为“征君”，又称其为“拾遗”。如顾非熊《寄九华山费拾遗》（《全唐诗》卷五〇九）、李群玉《经费拾遗所居呈封员外》（《全唐诗》卷五六九）、胡骈《经费拾遗旧隐》（《全唐诗》卷七一九）、罗邺《费拾遗书堂》（《全唐诗》卷六五四）。

③ 按：“海”为衍文。

知旧欤。”李博士奇义且多，注不尽录尔。后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于闽越，驰车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韦氏之庄居。韦氏乃杖屦迎宾，年已八十有余，自称曰：“野人韦思明，幸获祇奉。”与李生谈论，或文或史，淹留累夕。汇征善谈而不能屈也。对酒征古今及诗语……次第及李涉绝句，主人似酷称善矣。……李生重咏赠豪客诗，韦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徒，为不平之事。后遇李涉博士，蒙简此诗，因而跼迹。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共主晋室，中心藏焉。远隐罗浮山，经于一纪。李既云亡，不复再游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觞而酌，反袂而歌云：“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云溪子以刘向所谓“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也。乾符己丑岁，客于雪川，值李生细述其事。汇征于韦叟之居，观李博士手翰，冀余导于文林。且思明感知从善，岂谢古人乎？（《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

这则故事一直作为李涉的传奇经历，因为富有戏剧性，历来为人所乐道。但令人扫兴的是，故事其实并不真实。首先，诗与本事多牴牾不合。本事中李涉赠豪客诗，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一四及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一四均有收录，诗题均作《井栏砂宿遇夜客》。此诗首两句谓“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参照诗题，知此诗不过写诗人旅中夜宿遇绿林豪客之事，时间在夜晚，地点在一个叫井栏砂的江村。但本事写行船遇客事，将时间改为白天，地点移至江上，这样，诗与本事基本情节明显不合。由此一些细节更是自相矛盾。如：诗首句描写当时景象，谓“春雨潇潇”，而本事交代当时天气，称“大风鼓其征帆”。诗中“五陵豪客夜知闻”句是说诗人旅中遇客，知其人为绿林中人，而本事谓豪客闻诗人之名，并因而求诗。如果将此诗看作文章题目，那么，作为正文，本事实文不对题。

有趣的是，此诗本事虽与诗意相去甚远，但主要情节与《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有惊人相似。《世说新语·自新》记载：“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

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小说写陆机感化戴渊事，诗本事写李涉感化豪首事，情节相同。一些细节，如江上行船、遇客掠劫、拟荐豪首、豪首自新等，颇为相近。此外，本事与小说对豪首神情的描写如出一辙。小说谓戴渊“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本事称豪首“神情复异，而义气备焉”，不惟刻画相似，而且语言雷同。从上面的对照比较可以看出，诗本事是从小说故事脱胎而来，其模拟类比的痕迹至为明显。本事谓李涉“怀陆机之荐”，豪首称“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侧面说明了这种模拟倾向。既然本事有意模仿小说，其情节必然因接近小说而远离诗歌，那么，诗与本事情节不符、时地错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本事中李涉遇客掠劫、感化豪首之事其实并不存在，是模拟的一段故事。作者虚构这个故事，当然是因为诗中遇客一事本来具有传奇色彩，不过，李涉本人的诡激性格和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史载，元和六年，宦官吐突承璀坐事出为淮南监军，李涉时为试太子通事舍人，知宪宗待承璀之意未衰，遂投匭上疏，论承璀有功，不宜遽弃。谏议大夫孔戣拒其疏章，极论其与宦官交结。李涉因此贬为陕州司仓参军^①。宝历时期，李涉在朝为太学博士，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自许，后卷入权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坐事流康州^②。这两件事当时大约闻于朝野，李涉或因此而得侠义之名。本事原注谓“李博士奇义且多，注不尽录尔”，将此事作为李涉仗义行侠的逸闻趣事，从中不难窥见历史事件与诗歌本事之间的因果联系。

为了展开故事情节，本事作者对诗歌文字作了若干改动，企图自圆其说，给人真实可信的印象。在《唐百家诗选》和《万首唐人绝句》中，诗第三句均作“他时不用逃名姓”，据此，全诗大意应该是：诗人雨中投宿江村，夜有绿林豪客造访，其人公开其绿林身份而未暴露其姓名。这时，诗人想道，现如今绿林好汉遍及天下，将来必成气候，到那时，他们就不必这

① 见《旧唐书·孔戣传》、《旧唐书·吐突承璀传》。

② 见《旧唐书·李逢吉传》。

样隐姓埋名了。此句承接第二句,语意连贯,脉络清晰,当是此诗原文。但在本事中,“逃名姓”三字易为“相回避”,显然,异文与本事中李涉与豪首定淮阳佛寺之期而豪首爽约之事构成照应关系。但是,异文在诗中并无着落,且李涉作诗之时岂能预知豪首后来爽约,于情理亦有不合。作者改动文字,原本是为故事情节设定依据,以增加可信度,却不料因此露出马脚,最终暴露其虚构作伪的真面目。

不仅如此,本事还对诗歌作了某些曲解。如“五陵豪客夜知闻”句误解为豪客闻知诗人之名,并由此附会出求诗赠诗一节。此外,李涉赠诗一事在诗中难以证实。前文已述,此诗在《唐百家诗选》及《万首唐人绝句》中题作《井栏砂宿遇夜客》,诗题所叙事件及其时间、地点与诗意吻合,为此诗原题。但诗题只是自叙所历,并非赠答诗诗题。此诗后两句采用了对话的口吻,孤立地看,也可理解为诗人与豪客的对话。显然,本事作者正是这样坐实,并由此附会赠诗一事,但这样一来,三四句就变成第二人称的叙述,偏离了一二句第一人称独白的叙述方式,造成文气不连贯,语意不完整。其实,这两句不过是诗人的揣想之词,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完全是虚拟的。

本事又有李涉至扬州遇宋态一节。《全唐诗》卷四七七载李涉《遇湖州妓宋态宜二首》,其一云:“曾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玉知。”其二云:“陵阳夜会使君筵,解语花枝出眼前。一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嫦娥二十年。”则“宋态”应作“宋态宜”。本事谓“宋态者,故吴兴刘员外爱姬也”,注谓刘员外“刘全白也”,诗云“陵阳夜会使君筵”云云,似李涉与宋态宜初逢在刘全白为湖州刺史时。《嘉泰吴兴志》载:“刘全白,贞元十年自池州刺史授;迁秘书监致仕。”则刘全白贞元十年(794)为湖州刺史。李涉为谏议大夫李渤之兄,据本事,李涉在扬州遇宋态宜事在其“尝适九江,看牧弟”后不久。《旧唐书·李渤传》载:“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权幸,皆行升黜。……乃出为虔州刺史。……未岁,迁江州刺史。……长庆二年,入为职方郎中。”则李渤为江州刺史在长庆元年(821)至二年(822),李涉看访李渤即在此时。又据《吴兴志》,贞元十一年(795)王浦为湖州刺史,则刘全白为湖州刺史至晚在贞元十一年。长庆元年上距贞元十一年凡二十

七年,几三十年矣,但李涉诗谓“一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嫦娥二十年”,诗与事不能吻合。李涉诗“陵阳夜会使君筵,解语花枝出眼前”两句,乃叙初见宋态宜时情景,“陵阳”当即陵阳山,原属宣州泾县,永泰元年以后划归池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池州石埭县:“陵阳山,在县北三十里。窦子明于此得仙。”则李涉与宋态宜初逢在池州,诗题所谓“遇湖州妓宋态宜”指二人再遇乃在湖州,而非本事所云扬州。本事以宋态宜为刘全白爱姬,然无佐证。本事作者或因诗题中“遇湖州妓宋态宜”等语,误以李涉与宋态宜初逢在湖州,又因刘全白曾为湖州刺史,遂以宋态宜为其爱姬。如此,则本故事情节多出误读附会。

23. 陆畅

陆郎中畅,早耀才名,辇毂不改于乡音。……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终日长吟,不亲公牍。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辞曰:“不可偶为大夫参佐,而妨志业耶。”王乃固留不已,请举自代,然后登舟,曰:“洵子侄得耳,渠曾数辟不就,畅召必来。”而乃采药西山,饮泉漱水。朝客闻之,以为仕隐也,美誉益彰。及登兰省,遇云阳公主下降刘都尉,百僚举为傒相。诗题之者,顷刻而成,其诗亦丽也。……诏作《催妆》五言诗一首曰:“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柏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云溪有议》卷中“吴门秀”)

本事中“刘都尉”指刘士泾,“云阳公主”,陆畅《催妆》诗及新、旧《唐书》俱作“云安公主”,唯《唐会要》卷六有“云阳公主”。云安公主为顺宗女,顺宗女尚有“汉阳”、“东阳”、“襄阳”、“浔阳”等,《唐会要》所谓“云阳”当涉上下文而误。《新唐书》卷八三及《唐会要》卷六俱载云安公主下嫁刘士泾。《旧唐书·刘士泾传》载士泾于德宗朝尚主,宪宗朝迁太府卿^①,《新唐书》本传因之。然陆畅《催妆》诗谓“日兄怜赐花”,云安公主既为顺宗之女,“日兄”即指宪宗,则云安下嫁在宪宗朝。据《旧唐书·穆宗纪》,士泾为太仆卿在长庆元年正月。《旧唐书·韦弘景传》亦记于穆

① 按:《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记载作“太仆卿”。

宗朝。则《旧唐书·刘士泾传》出现朝代错位,误以穆宗朝为宪宗朝,又误以宪宗朝为德宗朝。

本事谓陆畅“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云云,《旧唐书·穆宗纪》载: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书舍人王仲舒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观察使。”又《旧唐书·王仲舒传》载:“穆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其年出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观察使。……长庆三年冬,卒于镇。”《新唐书》本传略同。则“西江”应为“江西”,陆畅为江西观察使从事在元和十五年六月后,是在穆宗即位以后。本事以陆畅为江西从事在云安公主下嫁以前,不确。

24. 吴武陵

吴武陵虽有才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藉,敕令广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鹞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本事诗·怨愤第四》)

此以吴武陵获罪在容州部内史任内,所记有误。《旧唐书·吴汝纳传》载:“吴汝纳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进士登第,有史学,……自尚书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赃贬潘州司户卒。”《新唐书·吴武陵传》载:“后出为韶州刺史,以赃贬潘州司户参军,卒。”均记在韶州获罪,非容州。又韶州属岭南节度使部内,故其事由广州幕吏推问。

本事所引吴武陵诗,《全唐诗》卷七二五又作于邺诗,题作《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此诗内容与吴武陵事并不吻合,而与《全唐诗》中于邺诗诗题颇相吻合。前面三句自谓来京应试,自视甚高,有俯视群才、志在必得的气概。末一句谓应试落第,回归旧处,表现应举落第时巨大的失落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意和愤懑,“不胜其忿”即此。可见此诗并非吴武陵因推问而作,亦非其诗作。本事所谓“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云云,不过是牵合附会《全唐诗》中所录于邺诗诗题。《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于武陵”下,陈尚君谓“今存《于邺诗集》一卷,有明朱警《唐百家诗》、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但其中所收诗,大多与影宋书棚本《于武陵诗集》重出,疑《于邺诗集》一卷,为南宋以后人据《于武陵诗

集》所改题。今存诗,大多或全部皆应为于武陵作”。则此诗或为于武陵诗,误作吴武陵,又附会其事。

25. 杨汝士

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惟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傅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醪醕。”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唐摭言》卷三)

文中“先仆射”指杨於陵。本事谓杨於陵致仕时,元、白俱在长安,且于席上赋诗。《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元年……四月……癸巳,以太子少傅杨於陵守右仆射致仕。”^①但是,元稹自长庆二年罢相,出为同州刺史^②,次年,授浙东观察使,在越八年,至大和三年入为尚书右丞。可见,大和元年元稹不在长安,未与此宴。《白氏长庆集》卷三三有《和杨郎中贺杨仆射致仕后杨侍郎门生合宴席上作》一诗,白诗既为和诗,则汝士诗作在前,非“汝士诗后成”。许浑有《和人贺杨仆射致政》诗,序云:“祠部杨员外以仆射杨公拜官致仕,旧府宾僚及门生合宴申贺,饮后书事,因和呈。”^③当与汝士诗作于同时。诸杨在长安,於陵居新昌里,汝士居静恭坊,新昌在南,静恭在北。许浑诗有“锦帐丽词推北巷”句,其中“北巷”用晋代诸阮居巷南北之典,暗指汝士,则许浑诗为和汝士而作。《旧唐书·杨汝士传》载:“长庆元年为右补阙。坐弟殷士贡举覆落,贬开江令。入为户部员外,再迁职方郎中。太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诰。”《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六及卷一二载汝士为司封员外郎和户部员外郎,则白诗所谓

① 《全唐文》卷六三九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宏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谓以左仆射致仕。

② 见《旧唐书·穆宗纪》。

③ 《丁卯集》卷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杨郎中”指汝士为职方郎中,许诗所谓“杨员外”指汝士为司封员外,“祠部”当为“司封”之误。《白氏长庆集》卷三三有《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一首,作于大和元年,“杨郎中”即杨汝士,诗有“暑月贫家何所有”句,则这年夏天汝士已官职方郎中。在白诗集中,和杨汝士诗前后分别有《秘省后厅》、《松斋偶兴》、《松下琴赠客》、《秋斋》四首,句有“槐花雨润新秋池”^①、“眼醒见秋山”^②、“秋泉应寒指”^③、“晨起秋斋冷”^④数句,诸诗作于大和元年,按时间先后编排,则和诗作于这年秋天,为追和之作。据许浑诗,杨於陵大和元年四月致仕时杨汝士尚为司封员外郎,而白诗作时汝士已为职方郎中,时间在这年秋天。则不但元稹未与宴会,白居易亦未曾与宴,压倒元、白之论实为虚谈。

26. 裴潏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潏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大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因令官婢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官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南部新书》丁)

此节叙述本于《酉阳杂俎》而颇有违误。《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载:“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南部新书》对《酉阳杂俎》的沿用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到证明:其一、《南部新书》谓“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大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

① 《白氏长庆集》卷三三《秘省后厅》。

② 《白氏长庆集》卷三三《松斋偶兴》。

③ 《白氏长庆集》卷三三《松下琴赠客》。

④ 《白氏长庆集》卷三三《秋斋》。

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以裴氏所咏为慈恩寺牡丹，这是源于《酉阳杂俎》所引诗中“争认慈恩紫牡丹”一句。其二《南部新书》所谓“兵部时任给事”源出《酉阳杂俎》中“裴给事宅看牡丹”一语，其中“裴给事”在《酉阳杂俎》中原指裴士淹，但《南部新书》因裴潏宝历初拜给事中^①，而将裴士淹误为裴潏。因此，《南部新书》所谓“裴兵部潏白牡丹诗”乃误读《酉阳杂俎》而来。

《酉阳杂俎》此一段落专记牡丹。前文所引部分之后又谓“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云云，“又得红紫二色”针对前文所述白牡丹而言，知“长安年少惜春残”一诗同《裴给事宅看牡丹》诗一样，咏白牡丹，“别有”两句也是针对“慈恩紫牡丹”而言，“玉盘”云云，即指白牡丹。慈恩寺牡丹既为紫牡丹，则“长安年少惜春残”诗所咏非慈恩寺牡丹，因此亦非题慈恩寺之诗。《南部新书》谓文宗“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乃附会之谈。

《酉阳杂俎》称“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则段成式未见其诗，已明言矣。“一本有诗云”指别一首诗，非“当时名公”裴给事宅看牡丹诗。因此诗亦咏白牡丹，以类相从，故编于此诗之后。据《酉阳杂俎》，此诗乃“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为别一事。《文苑英华》卷三二一录《裴给事宅看牡丹》诗，题作卢纶作，《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九又作开元名公作，将两事两诗混为一谈，殊不足据。

《南部新书》引此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既曰“惜春残”，则春事将尽；既曰“先开”，则春事方来。两句前后矛盾，文意难通。此改“争认慈恩”为“争赏先开”，不足为训。

27. 张祜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包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

^① 《旧唐书·裴潏传》记载：“宝历初，拜给事中。”

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颌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唐摭言》卷一一）

此节记载有违史实之处。卞孝萱《元稹年谱》于大和五年《辨证》中引此节所记令狐楚镇天平日表荐张祜事，参合文末所引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诗句及《全唐诗》诗下小注“时以天平公荐罢归”，认为“从令狐楚为天平军节度使，刘禹锡为苏州刺史的时间来考察，令狐楚荐张祜应是大和五年末。此时元稹已卒，怎能进谗”？令狐楚是否在为天平军节度使时表荐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是否为令狐楚表荐时所作，这些虽难以遽定，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颇能道出此节记载的乖谬。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主元稹进谗之说，对卞谱的《辨证》又有所辩驳，认为《全唐诗》诗下小注并非自注，宋本《张承吉文集》并无此注，此注乃后人妄加，难以信据。吴文提出令狐楚表荐张祜的时间在元和十五年（820）秋。文谓张祜《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及《寄献萧相公》诗表明张祜于元和十五年秋由扬州西入长安，又谓张祜《京城寓怀》中“三十年持一钓竿，偶随书荐入长安”两句与令狐楚表荐事吻合，张祜时年约30，又生于贞元八年（792），30岁时恰是长庆元年（821），可见张祜元和十五年秋西入长安与令狐楚表荐有关^①。

吴文疑《全唐诗》小注一节颇中肯，然据张祜诗定令狐楚于元和十五年表荐张祜则似可商榷。首先，《京城寓怀》诗中两句难以证明令狐楚于长庆元年表荐张祜。两句原意应是，诗人在经历了长期的隐逸生活以后，因人表荐而来到长安。所谓“三十年持一钓竿”，意即持钓竿30年，自谓隐逸弃世、不求功名已30年，乃成年之事。“三十年”言隐居时间之长，非谓行年30。其次，张祜蒙人表荐时在老大以后。陆龟蒙《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序云：“张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谏讽怨谲，时与六义相左右；善题目佳境，

① 《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30页。

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由是贤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与之游,谓有鹄鹭之野,孔翠之鲜,竹柏之贞,琴磬之韵。或荐之于天子,书奏不下。”^①寻绎语意,乃谓张祜年及老大,诗风一变,“贤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与之游”,因此,“或荐之于天子”。可见,蒙人表荐的时间是“及老大”,表荐之人乃“贤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此一记载可在张祜诗集中得到证实。南宋本《张承吉文集》卷一〇中有《戊午年感事书怀二百韵谨寄献太原裴令公淮南李相公汉南李仆射宣武李尚书》一诗,其中“坏屋荐来偏”句下注云“祜累蒙方镇论荐”。诗题“戊午年”即开成三年(838)。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诗中“刘郎中”乃刘禹锡,刘禹锡为苏州刺史时间在大和五年(831)至八年(834),诗谓“诸侯力荐命尤奇”,可见张祜蒙人表荐时间在大和、开成之间。张祜另有《忆江东旧游四十韵寄宣武李尚书》诗,诗谓“伯玉年将尽,宣尼易未弘”,又谓“酒徒穷不破,诗债老相仍”。诗中“李尚书”即李绅,绅于开成元年(836)至五年(840)为宣武军节度使、汴州刺史。开成中张祜年已老大,这与陆龟蒙诗序所载吻合。张祜《京城寓怀》所谓“三十年持一钓竿,偶随书荐入长安”时间当在大和、开成之间。至于元和时期,据陆龟蒙诗序,张祜之得声誉乃因宫体小诗,能其才者不过“当时轻薄之流”,这一时期是不会有贤俊之士及位高名重如令狐楚者表荐的。

可见,元稹“偃仰内庭”的元和、长庆之交,当无令狐楚表荐张祜之事,此事应在文宗在位的大和、开成时期,其时元稹已逝。需要指出的是,元稹阻格令狐楚表荐张祜一事仅见于《唐摭言》,并无其他佐证。《全唐文》卷七九七所收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一文亦言及此事,然此文实出《唐诗纪事》,非皮日休作,不足为据^②。

最早记载令狐楚表荐张祜的是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中的自注。杜牧诗云:“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原注:令狐相公曾表荐处士。乞火无人作爨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

① 《全唐诗》卷六二六。

② 见张安祖《〈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非皮日休所作》,文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卷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4~295页。

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原注：处士诗：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①元稹阻隔张祜的故事实肇因于诗中第一处自注，并与同诗末两句及自注相关的白居易黜张祜的故事相关联。

《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记载了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的故事，已有学者考其非实^②，本编“徐凝”条亦有辨证，看来，这是一篇虚构的故事。此一虚构的原因及线索亦有可考者。全篇后半是李林宗、杜牧与白居易论文、杜牧为诗代为张祜鸣不平的故事。后一情节出于附会穿凿，本编已有辨证。其实，前一情节亦属乌有。考《新唐书·宗室世系上》，有玄宗时宰相李林甫弟李林宗，表载“林宗字直木”，即其人^③。可知李林宗为玄宗至代宗时人，与白居易时代不相及，决无“辇下较文”之事。所谓“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辇下较文”云云，当自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一文附会虚构而来。杜牧文记墓主李戡语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媿语，冬寒夏热。人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以法治之。”^④则李戡曾痛诋元、白之诗，杜牧既录其言，自有心许之意，李、杜与白辇下较文一节当自此化出。又据杜牧文，李戡曾居洛中，杜牧与之往还，得其痛诋元、白之语，是在分司东都时。本事所谓“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云云，亦当由此化出。甚至托名李姓者，莫不与李戡之事相关。可见李、杜与白较文一事是受杜牧之文记事影响而虚构出来的一段故事。不仅如此，本事作者还由此虚构了杜牧与白居易评议张祜《宫词》而意见相左的故事。据本事作者之意，杜与白诗论旨趣相左，其论具体诗作，意见必定相反，杜既赞美，白必贬低，白居易贬低张祜《宫词》、抬高徐凝《瀑布》诗句由此构思而来。由此情节上推，本故事中的张、徐各希首荐、白伸徐屈张等情节，无不由

① 《樊川诗集》卷四。

② 见程千帆《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程千帆选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4～999页）及张安祖《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真伪考》（《唐代文学散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1～110页）。

③ 按：《云溪友议》谓李林宗字“直水”，乃形近而误。

④ 《全唐文》卷七五五。

此衍生,只是因为叙述的需要而以因为果罢了。

本事作者选择张祜《宫词》作为杜牧、白居易较文的话题,正是出于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诗末两句及其自注。本事引用此诗两句,又引注中张祜《宫词》,可见本事作者熟知此诗及其自注,是可能由此展开想象、虚构故事的。可以推测,本事作者正是借用了杜牧文中杜牧与元、白诗歌主张不同这一既有事实,由杜牧对张祜《宫词》的赞美虚构出白居易伸徐屈张的故事。应该说,杜牧所撰李戡墓志铭及《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及其自注是“钱塘论”故事的肇因、线索及想象平台,而李戡、杜牧与元、白论诗意趣相左及杜牧推许张祜诗歌正是构成故事的两大关节。以上构成“钱塘论”故事的基本因素其实也是所谓元稹阻格令狐楚表荐张祜故事产生的原因。同样的原因,在“钱塘论”中黜张祜者为白居易,而在《唐摭言》所录故事中则为元稹,只是前一故事自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诗的后一自注中化出,而后一故事则自此诗前一自注中化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事末尾引用的两句诗不一定作于令狐楚表荐无果之时,因为张祜诗自注已说“祜累蒙方镇论荐”,可见屡荐屡遭不遇,赠刘禹锡诗也完全可能是他人论荐无果时写的。

28. 房千里 许浑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微诗序》云:“有进士韦滂者,自南海邀赵氏而来,十九岁,为余妾。余以鬓发苍黄,倦于游从,将为天水之别。止素秋之期,纵京洛风尘,亦其志也。赵屡对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轻舟,暂为南北之梦。歌陈所契,诗以寄情。”曰:“鸾凤分飞海树秋,忍听钟鼓越王楼。只应霜月明君意,缓抚瑶琴送我愁。山远莫教双泪尽,雁来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临邛市,画舸朱轩万里游。”房君至襄州,逢许浑侍御赴弘农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托,许具诺焉。才到府邸,遣人访之,拟持薪粟给之,曰:“赵氏却从韦秀才矣。”许与房、韦,俱有布衣之分。欲陈之,虑伤韦义;不述之,似负房言。素款难名,为诗代报。房君既闻,几有欧阳四门詹太原之丧。浑寄房秀才诗曰:“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采桑。五夜有心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却认罗裙碧草长。为

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

据本事，房千里与赵氏违离且以赵氏托于许浑之事，在上第以后不久。据《新唐书·艺文志》，房千里“大和初进士第”。《登科记考》卷二〇据此记房千里于大和元年登第，则本事所记之事当在大和元年以后不久。

许浑确曾赴南海幕，其时间在开成元年（836）^①，集中《将为南行陪浙西尚书崔公宴海榴堂》乃此前所作，据《全唐文》卷五一四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赞》，此“海榴堂”在润州^②，可见许浑自润州赴南海幕府。诗有“风传鼓角霜侵戟”句，则奉命时间在这年秋天。许浑此次赴南海，有《别表兄军倅》诗，其序云：“余祇命南海，至庐陵，逢表兄军倅奉使淮海。”诗云：“客路晚依红树宿，乡关朝望白云归。”^③时在秋天。又有《留别赵端公》，序云：“余行次钟陵，府中诸公宴钱赵端公，……因留别。”诗云：“箫鼓散时逢夜雨，绮罗分处下秋江。”^④又有《舟行早发庐陵郡郭寄滕郎中》云：“楚客停桡太守知，露凝丹叶自秋悲。”^⑤又有《韶州韶阳楼夜宴》云：“帘前碧树穷秋密。”^⑥《韶州送窦司直北归》云：“客散他乡夜，人归故国秋。”^⑦诗中俱写秋景，可证。据以上所引诗句，许浑赴南海乃自润州出发，取道洪州、吉州、韶州，并不经过襄州。或以为许浑其时至襄州稍事盘桓后转而取道洪州^⑧，恐未确。许浑若至襄州盘桓，其赴南海，必取道江陵、岳州、潭州、衡州、连州等处，不至舍近求远，取道洪州、吉州。可见，本

①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系于会昌四年（依谭优学《许浑行年考》），文引许浑《舟行早发庐陵郡郭寄滕郎中》，且谓滕近会昌中为吉州刺史。然《咸淳毗陵志》卷二六载：“滕刺史迈墓在新桥门外半里荒莽间，有二石兽，刻云：唐尚书刑部郎官睦州刺史滕公之墓。”则睦州刺史为其终官。《唐刺史考全编》系迈为睦州刺史约于开成五年，则不至会昌中仍为吉州刺史。罗时进《许浑年谱稿》系于开成元年（见《唐诗演进论》第244～245页），今取罗说。

② 《壁书飞白萧字赞》云：“韩晋公鉴古擅书，闻之嗟异。迁之于南徐，置于海榴堂座右之壁。”“南徐”即唐时润州。

③ 《全唐诗》卷五三四。

④ 《全唐诗》卷五三五。

⑤ 《全唐诗》卷五三六。

⑥ 《全唐诗》卷五三四。

⑦ 《全唐诗》卷五三一。

⑧ 见《许浑年谱稿》（《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事所叙房千里以赵氏托于许浑一事,在时间、地点上均有未合,当是摘取许浑事迹附会而成。此外,本事谓许浑“赴弘农公番禺之命”,然“弘农公”指弘农杨氏,此载不确^①。

本事所引许浑诗与其《途经敷水》文字颇为雷同。《途经敷水》云:“修蛾颦翠倚柔桑,遥谢春风白面郎。五夜有情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更认罗裙碧草长。何处野花何处水,下峰流出一渠香。”^②两首诗中间两联相同。《途经敷水》写景叙事用汉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中罗敷采桑故事。唐人有关敷水的诗歌,多附会罗敷之事。如岑参《敷水歌送窦渐入京》,白居易《过敷水》、《罗敷水》、《与裴华州同过敷水戏赠》,罗隐《罗敷水》等,许浑此诗乃沿袭唐诗惯例,为其原作。本事所引许浑诗乃改动原诗而成,改动首联以掩原题,改动尾联以牵合本事,然语意牵强,莫可解读。此好事者所为,非许浑之诗。

29. 李远

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宣宗曰:“比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幽闲鼓吹》)

本事中“令狐相”指令狐绹,宣宗时曾为相10年。宣宗因李远诗有“长日唯销一局棋”一句,以为玩物害事,不宜临郡理民。观其语气,李远此前未为州郡长官,令狐绹所荐为其州郡刺史初任。据《唐刺史考全编》,大中时,李远曾为岳州、江州、忠州、建州、明州、杭州刺史,其时间有可考者。杜牧《樊川文集》卷二有《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一诗,又温庭筠《寄岳州李外郎远》云:“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来迟。”^③如前所述,李远善棋,则二人诗中之岳州刺史当即李远。杜牧卒

^① 元和三年(808)至五年(810)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大中十二(858)年杨发为岭南节度使,其间岭南节度使无杨姓者。详见《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0~3176页。

^② 《全唐诗》卷五三四。

^③ 《全唐诗》卷五八二。

于大中六年(852)十二月^①,题作“早春”,则诗作于大中六年初以前,可知此前李远已为岳州刺史。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九,李远为杭州刺史在大中十二年(858)十月,则杭州刺史非其初任。本事以李远为杭州刺史乃因令狐绹之荐,不确。

李远所任州刺史,据《旧唐书·地理志》,岳州为下州,江州、忠州、建州为中州,明州、杭州为上州。按照唐代惯例,州郡刺史之任一般自下州迁至上州,李远任岳州刺史以前也不太可能有中州或上州刺史之任。而且,据《旧唐书·宣宗纪》,令狐绹为相在大中四年(850)十一月,自令狐绹为相至大中六年初以前李远已为岳州刺史仅一年时间,其间也不可能遽然插入他州刺史一职。本事所谓李远首为州郡刺史当为岳州刺史,绹之荐远,当属可信。

《资治通鉴》记李远为杭州刺史一事于大中十二年十月,但又相信《幽闲鼓吹》的记载,以为李远为杭州刺史乃因令狐绹之荐,亦未确。

30. 杜牧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旁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本事诗·高逸第三》)

本事所引杜牧诗,《樊川外集》及《全唐诗》五二四题作《赠终南兰若僧》,诗云:“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休公都知名姓,始觉禅门气味长。”据此诗题及首句,杜牧遇僧在终南山,而非本事所说的城南文公寺。《樊川外集》及《全唐诗》所引文本,其遣词更近书面语言,本事所引则语言通俗,如易“休公”^②为“禅师”,更近口耳流传,当以《樊川外集》及《全唐诗》所引为原文。杜牧为京兆万年人,裴延翰《樊川文集序》

① 详见吴在庆《杜牧卒年再考》,文载《人文杂志》,1983年第5期。

② “休公”本为南朝诗僧汤惠休,后泛指诗僧。

云：“长安南下杜樊乡，酈元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万年县”下载：“樊川，一名后宽川，在县南 35 里，本杜陵之樊乡，汉高祖赐樊哙食邑于此。”则樊川在长安城南，杜佑有别墅于此。此诗在流传中文字当有改动，本事中“家在”一句或据此而来。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本事诗·高逸第三》）

《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杜牧》篇及《唐诗纪事》卷五十六均记此事，作“李司徒愿”。然《旧唐书·李愿传》谓愿卒于宝历元年，而杜牧始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在大和九年，史载与此载有矛盾。以上矛盾，吴企明《樊川诗甄辨柿札》^②及缪钺《杜牧年谱》俱已指出，但吴文以此李司徒实为李愿，并据以推测本事乃好事者所为。《杜牧年谱》则据《旧唐书·李听传》中“大和九年，改陈许节度，未至镇，复除太子太保分司。开成元年，出为河中尹，河中晋慈隰节度使，卒后赠司徒”的记载，推定此“李司徒”为李听。唐诗本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改易增饰，难免穿凿附会，张冠李戴，个别人名的疏误会影响本事的真实性，自当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拘泥，重要的是诗与事的真实程度及其关系问题。首先，事与诗是否完全出于臆造。对于上述本事，吴文持此观点。然《本事诗》未言李司徒即李愿，《太平广

① 《全唐文》卷七五九。

② 文载《文史》第八辑，第 213～219 页。

记》及《唐诗纪事》坐实李愿，乃本事在流传中为后人所加，是不足为据的。而且，即使本事中有关人物有误，也并不足以否定事之全体。不仅如此，唐诗本事多有据诗意附会穿凿者，事虽不实，诗则有之。因此，不能因本事细节的不真实而否定整个事件，并进而否定诗的真实性。当然，也不能因为本事中有若干细节能在史实中找到依据，便完全肯定整个事件。亦真亦假、真假混杂的情况在唐诗本事中大量存在。

撇开此诗本事的若干情节，独立阅读此诗，可以发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在本事中，“谁唤分司御史来”一句通常解读为杜牧始以持宪被弃，终则见招。但是，这一解读造成诗之上半与下半语意不相衔接，起落无端。其实，“谁唤”一句具有领起下文的作用。全诗大意是：今日华堂张筵，怎么把分司御史也请来了呢？结果口出狂言，弄得四座惊诧，红粉莫名。“谁唤”一句出于戏谑口吻，意谓邀请御史赴席乃不智之举。此诗以反讽的笔法，表现诗人为时人所惊异的狂放不羁之态，诗情豪迈，风调俊逸磊落，与杜牧诗风吻合。本事中杜牧被弃被邀的情节是对“谁唤”一句的误读与附会。此诗虽属杜牧，但本事中的细节多出附会增饰。

31. 赵嘏

赵嘏颇有诗名，不拘小节。饮中赠歌者曰：“倚风无处过梁尘，雅唱清歌日日新。来值汉亭花欲尽，一声留得万家春。”后因酒失，悔过以诗上歙州守曰：“叶覆清溪滟滟红，路横秋色马嘶风。犹携一榼郡斋酒，倾对青山忆谢公。”（《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唐贤抒情》）

本事所引前一首诗，《全唐诗》卷五五〇题作《淮南丞相座赠歌者虞姁》，后一首题作《寄卢中丞》。同书卷五四九有《重寄卢中丞》、《抒怀上歙州卢中丞宣州杜侍郎》两首，诗中“卢中丞”即卢弘止。《南部新书》乙载：“滑州卢弘正（止）尚书题柳泉驿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可见本事所引两首诗非同时所作。《寄卢中丞》诗乃寄怀之作，全篇想象卢弘止出游宴饮情形，“犹携一榼郡斋酒”句语意尤明。诗中所言之事与酒失悔过事无关。疑有脱文。

32. 卢肇

卢肇初计偕至襄阳，奇章公方有真珠之惑，肇赋诗曰：“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唐诗纪事》卷五五“卢肇”）

《全唐诗》卷五五一据此收为卢肇诗，题作《戏题》。《全唐诗》卷三一又作范元凯诗，题作《章仇公席上真珠姬》，文字多有不同，诗云：“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应知子建怜罗袜，顾步裴回拾翠钗。”此外，杨慎《升庵诗话》卷五又作何兆诗，诗题及正文文字与《全唐诗》所收范元凯诗相同。

《全唐诗》范诗下注云：“章仇公，大历中蜀州刺史。”案：所谓“章仇公”实为本事中“奇章公”，为牛僧孺，僧孺有侍妾名真珠。《全唐诗》卷四八一李绅《忆被牛相留醉州中时无他宾牛公夜出真珠辈数人》诗云：“严城画角三声闭，清宴金樽一夕同。银烛坐隅听子夜，宝箏筵上起春风。酒徵旧对惭衰质，曲换新词感上宫。淮海一从云雨散，杳然俱是梦魂中。”此诗所记之事为大和七年闰七月李绅赴浙东观察使任途经扬州会晤牛僧孺一事。《唐摭言》卷一〇载：“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瑋瑋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此外，罗虬《比红儿》其五七有“昔年黄阁识奇章，爱说真珠似窈娘”两句^①，可见，诗题“章仇公”乃“奇章公”之误。

卢肇袁州人，至京赴举经襄阳。卢肇登进士第在会昌三年^②，牛僧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在开成四年至会昌二年，正是卢肇赴举之时。据此，此诗当属卢肇。

宋陈应行编《吟窗杂录》卷四一亦载此诗本事云：“奇章公纳妓曰真珠，有殊色。卢肇至，奇重其文，延于中寝，会真珠沐发，方以手捧发髻插钗于两鬓间。丞相曰：‘何妨一咏。’肇曰：‘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

^① 《全唐诗》卷六六六。

^② 见《登科记考》卷二二。

金钗。’”《全唐诗》所载范元凯诗前两句用宋玉赋中巫山神女故事,后两句用曹植《洛神赋》中洛神故事。宋玉、曹植赋原本前后相接,题旨相同,本诗杂用其事,首尾承接自然,全篇浑然一体。又诗中“子建”乃诗人自指。唐人多于席上咏才子佳人之事,且才子多以自谓,此诗即属此类。因此,本诗乃诗之原文。本事所载卢肇诗,后两句承接突兀,与前文迥不相及,且造句稚拙,当为牵合本事,改动原文所致。据所录范元凯诗诗题,吟咏事在席上,前两句描写与诗题吻合。本事所谓中寝沐发一节,不惟情理难通,于事亦有不合。

33. 王铎

唐王中令铎,重德名家,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之才,镇渚官为都统,以御黄巢。……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差人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辱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时议曰:“黄巢过江,高太尉不能拒捍,岂王中令儒儒所能应变乎?”落都统后有诗,其要云:“敕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亦志在其中也。(《北梦琐言》卷三“王中令铎拒黄巢”)

此谓王铎荆州失守后曾把守潼关,并再次退败,有违史实。《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考异”引《北梦琐言》本文,按云:“铎自荆南丧师贬官,未尝将兵潼关。”《新唐书·王铎传》载:“铎退营襄阳。于是以高骈代之,贬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未几,召拜太子少师,从天子入蜀,拜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复以太子太保平章事。……铎感慨王室,每入对,必噫鸣流涕,固请行。时中和二年也。乃以检校司徒、中书令为义成节度使,诸道行营都统,判延资、户部、租庸等使。”则王铎未尝守潼关。据《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880)十一月,以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节潼关制置使,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为制置关塞量料使,左军兵马使赵珂为句当寨栅使,把守潼关。十二月,潼关失守,师会自杀,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此潼关失守原委,非王铎之事。

王铎诗载于《全唐诗》卷五五七,题作《罢都统守镇滑州作》,诗云:“用军何事敢迁延,恩重才轻分使然。黜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

腰间尽解苏秦印，波上虚迎范蠡船。正会星辰扶北极，却驱戈甲镇南燕。三尘上相逢明主，九合诸侯愧昔贤。看却中兴扶大业，杀身无路好归田。”据《资治通鉴》及《新唐书·王铎传》，王铎再为诸道行营都统在中和二年。《旧唐书·王铎传》记其此后行事云：“其年(中和二年)秋，贼将朱温降，收同州。十一月，贼华州戍卒七千来奔。三年二月，沙陀军至，收华州。四月，败贼于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铎晋国公。铎加中书令，以收城诸将，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赏以闻。”据此，王铎督师收复京城，并承制分赏诸将。至于王铎再落都统的原因，《旧唐书》本传云：“巢贼出关东，与蔡帅秦宗权合纵。时溥举兵徐方，请身先讨贼，乃授溥都统之命。十军军容使田令孜以内官杨复光有监护用师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时溥之授。”《旧唐书·僖宗纪》亦记王铎罢都统时间在其年五月，但《新唐书·王铎传》及《资治通鉴》与上述记载有所不同。《新传》记载：“先是，诸将虽环贼，莫肯先。及铎檄至，号令殷然，士气皆起，争欲破贼，故巢战数蹙。宦人田令孜策贼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搆铎于帝，罢为检校司徒，以义成节度还屯。铎功危就，而谗见夺，然卒因其势困贼。后数月，复京师，策勋居关东诸镇第一。”《资治通鉴》卷二五五所载略同，且记罢都统事于中和三年正月，是王铎罢都统在收复京师之前。考《旧唐书·僖宗纪》，收复京师后上章告捷者乃与田令孜相交接之杨复光，《旧纪》且录其文，非如《旧传》所云王铎，则其时王铎已罢都统。又《全唐文》卷八六《授王铎义成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制》云：“宸命登坛，俾之仗钺。及之白马，叠降紫泥。虽嘉将就之勋，尚滞进军之策，而诸军观望，相顾迁延。将谋荡定之期，因有改更之制。”所言与《新传》及《资治通鉴》吻合，则王铎罢都统在收复京师以前。王铎诗中所言情形亦与上述史实吻合。

34. 薛能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唐摭言》卷一五）

薛能此诗见《全唐诗》卷五五九，题作《闲题》，诗云：“八年藩翰似侨居，只此谁知报玉除。旧将已成三仆射，老身犹是六尚书。时丁厚讷终无

咎,道致中兴尚有余。为问春风谁是主,空催弱柳拟何如。”薛能“镇彭门”指出镇徐州,为感化军节度使。据《唐刺史考全编》卷六四,薛能为感化军节度使在咸通十四年(871)至乾符二年(875),后入为工部尚书,乾符三年(876)至五年(878)再镇徐州,又继镇许州,为忠武军节度使,广明元年(880)为部将周岌所逐。《旧唐书·僖宗纪》载其事云:“(广明元年)九月,徐州兵三千人赴澠水,途经许。许州节度使薛能前为徐帅,得军民情。徐军吏至,请馆,能以徐军怀惠,令馆于州内。许军惧徐人见袭,许州大将周岌自澠水以其戍卒还,逐薛能,自据其城。”《新唐书·僖宗纪》更谓能为周岌所杀。郑谷诗有《读故许昌薛尚书诗集》及《故许昌薛尚书能尝为都官郎中……》,则忠武节度使为薛能之终官。诗谓“老身犹是六尚书”,可见再镇徐州及镇许州时仍检校尚书,薛能既称“犹是六尚书”,则诗作于广明元年(880)被逐以前。薛能于咸通十四年(873)始出镇徐州,诗谓“八年藩翰”,则此诗似作于广明元年。

本事以“旧将已为三仆射”分别指“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以史考之,殊为不确。周岌以逐薛能并取而代之,其为忠武节度使自在薛能之后,亦即此诗写作之后,则自非“三仆射”之所指。时溥镇徐时间,《旧唐书·时溥传》载云:“中和二年(882),武宁军节度使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行至河阴,军乱,剽河阴县回。溥招合抚谕,其众复集,惧罪,屯于境上。详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军向徐州。既入,军人大呼,推溥为留后,送详于大彭馆。溥大出资装,遣陈璠援详归京。”^①可见时溥镇徐更在此后。《新唐书·刘巨容传》载:“(黄)巢据荆南,(巨容)俄迁山南东道节度使以扞巢,屯团林。江西招讨使曹全晟与巨容守荆门关,与贼战,巨容伪北,巢追之,伏兴林樾间,贼大败,执贼将十三人,转斗一舍,虏获不可计。……以功迁检校礼部尚书。……及(黄巢)陷两京,巨容合诸道兵讨之,授南面行营招讨使,累兼天下兵马先锋开道供军粮料使、检校司

^① 《资治通鉴》记此事于中和元年八月。《旧唐书·僖宗纪》记此事于广明元年九月,与周岌逐薛能事相并。但据《旧唐书·时溥传》,所谓“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一事在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进讨之后,系于广明元年九月显误。

空,封彭城县侯。”巨容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击破黄巢事在乾符六年(879)十一月^①,“以功迁检校礼部尚书”事在此时。又《新唐书·僖宗纪》载:“(中和元年五月)刘巨容为南面行营招讨使。”其检校司空在此时。据《旧唐书·职官志》,礼部尚书属正三品,尚书左右仆射属从二品,司空属正一品。巨容在检校礼部尚书与检校司空之间宜有检校仆射之授,时间在乾符六年(879)十一月至中和元年(881)五月之间。

薛能诗“老身犹是六尚书”之“六尚书”指工部尚书,因于尚书省六部中班行最后,为第六。“六尚书”既为官称,“三仆射”亦当为官称,不应指三人为仆射。尚书省有左、右仆射,“三仆射”或即指检校仆射^②。薛能诗有“为问春风谁是主,空催弱柳拟何如”两句,乃春天景象,诗当作于广明元年(880)春天,“旧将”句当指刘巨容。

35. 韦蟾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亭,见李汤给事题名,索笔纪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笑人何事寡诗情。祇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唐摭言》卷一三)

此诗本事《唐摭言》卷三重复记载,但有异文:“李汤题名于昭应县楼,韦蟾睹之,走笔留谑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全唐诗》卷五六六收录韦蟾此诗,对两处记载文字均有采录,诗题为《长乐驿谑李汤给事题名》,诗云:“渭水秦川拂一作照眼明,希仁一作笑人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新唐书·宗室世系》下“小郑王房”载:“给事中汤,字希仁。”则诗句文字作“希仁”是,作“笑人”非。至于题诗地点,一作“长乐驿亭”,一作“昭应县楼”。从“渭水”句看,作“昭应县楼”是。渭水流经昭应县北,昭

① 《旧唐书·僖宗纪》记黄巢陷潭州事于广明元年二月,记刘巨容等击破黄巢事于广明元年三月。但《资治通鉴》卷二五三据《实录》系黄巢陷潭州事于乾符六年十月,系击破黄巢事于乾符六年十一月。今取《通鉴》之说。

②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七“员外检校等名”:“太宗定官额,其后复有员外置,又有特置、同正员、检校、兼守、判知之类。……其名类颇多。节使幕僚至检校中丞,往往而是。末叶镇帅无不检校台司,如薛能诗‘旧将已为三仆射’之类,逾滥至此。”所言或不误。

应县官舍前临渭水,唐人诗中留下了很多描写,如:王建《昭应官舍书事》:“县在华清宫北面,晓看楼殿正相当。……腊月近汤泉不冻,夏天临渭屋多凉。”^①白居易《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夏闰秋候早,七月风骚骚。渭川烟景晚,骊山宫殿高。”^②沈亚之《宿后自华阳行次昭应寄王直方》:“暖色先骊岫,寒声别雁群。川光如戏剑,帆态似翔云。”^③赵嘏《题昭应王明府溪亭》:“晓渭度檐帆的的,晚原含雨树重重。”^④旅次昭应题诗而咏渭水在唐人诗中习见,而长乐驿则临近浐水,离渭水较远。唐人诗中旅次长乐驿的题诗也是吟咏浐水及与浐水连接的灞水。如白居易《长乐亭留别》:“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⑤祖咏《长乐驿留别卢象裴总》:“灞水行人渡,商山驿路深。”^⑥可见韦蟾题诗必于昭应县楼,而非长乐驿亭。《唐摭言》卷三所记本事文本及诗歌文本均不误。

36. 李群玉

李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太平广记》卷二六五)

《南部新书》丙亦载其事,文字有异:“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养白鹅。及授校书郎东归,故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太平广记》所谓“性喜食鹅”,《南部新书》作“性善养白鹅”,“喜食”与“善养”形近,二者正误难以遽定。此一事实据本事而来。“妙吹”句用王子晋吹笙一事。据《列仙传》,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所谓“好吹笙”,由此而来。“工书”句用王羲之事,据《晋书·王羲之传》,羲之好鹅,山阴有道士养好鹅,羲

① 《全唐诗》卷三〇〇。

② 《全唐诗》卷四三二。

③ 《全唐诗》卷四九三。

④ 《全唐诗》卷五四九。

⑤ 《全唐诗》卷四五〇。

⑥ 《全唐诗》卷一三一。

之书《黄庭经》以换道士之鹅。诗句原意是说李群玉擅长书法，非谓有“得鹅”之事。本事坐实事典，又附会“食鹅”、“养鹅”之事。

37. 温庭筠

后温庭筠为赋，亦警刺，少类于平、贾，而谪方城，乃诗曰：“侯印不能封李广，别人丘陇似天山。”举子纪唐夫有诗送之。时温庭筠作尉，纪唐夫得名，盖因文而致也。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醪消积恨，莫言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云溪友议》卷中“白马吟”）

本事所引“侯印”两句出自温庭筠诗《伤温德彝》，全诗云：“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①。”《全唐诗》校云：“一作《伤边将》。”此诗与诗人谪方城并无关联。据《旧唐书·温造传》，大和四年（830）温德彝为河中都将，又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记载，开成五年（840）又为天德军使。温庭筠贬方城在咸通七年（866），相去20余年^②，此诗是否贬方城时作，殊为可疑。

关于纪唐夫诗本事，《唐摭言》卷一一记载有所不同：“开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黜随州县尉。……庭筠之任，文士诗人争为辞送，唯纪唐夫得其尤。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皇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醪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温庭筠因搅扰场屋而黜为随州县尉事，《唐摭言》卷一三记载尤详：“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飞卿于帘前试之，为飞卿爱救人故也。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此沈侍郎即沈询，据《因话录》卷六，沈询知举在大中九年（855），则温庭筠黜为随州县尉在此后不久，而非“开成中”。至于温庭筠贬方城尉，乃别为一事。《旧唐书·温庭筠传》载：“杨收怒之，贬为方城

① 《全唐诗》卷五七九。

② 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43页。

尉。”据《旧唐书·宰相表下》及《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杨收于咸通七年十月罢相，出为宣歙观察使^①，而《全唐文》卷七八六载温庭筠为国子助教主试时榜邵谒等诗文之榜文，文尾有“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试官温庭筠榜”，可见同年同月，温庭筠尚在国子助教任上，则杨收之怒贬庭筠必于是年十月，且其事必因榜文而起。纪唐夫诗有“方城若比长沙远”句，则此诗作于温庭筠贬方城尉时。又诗谓“长安不见杏园春”，在时间上与温庭筠此次被贬吻合。

38. 方干

（方）干与杭州于郎中为砚席之知，因求举粮，远游郡所。杭牧疑干为诗无卒才，因夜醺与“飞”字韵，请赋一章。干半酣书成，合筵惊骇。于赠二百千，充润五十六字，于可谓奖士矣。诗曰：“间世星郎夜醺时，丁丁寒漏滴声微。琵琶弦促千般调，鹦鹉杯深四散飞。遍请玉容歌白雪，高烧红蜡照朱衣。人间有此荣华事，争遣渔翁恋钓矶。”（《鉴诫录》卷八“屈名儒”）

《全唐诗》卷六五二收录方干此诗，题作《陪李郎中夜宴》。首句“间世星郎夜宴时”，称李郎中为“星郎”，则此李郎中时在京居郎官之职，非在外任。本事以此诗为方干在杭州于郎中夜宴席上所作，殊误。方干另有《寄杭州于郎中》，诗云：“虽云圣代识贤明，自是山河应数生。大雅篇章无弟子，高门世业有公卿。入楼早月中秋色，绕郭寒潮半夜声。白屋青云至悬阔，愚儒肝胆若为倾。”^②诗末微露希求汲引之意。此诗本事乃牵合二诗并附会诗意而成。

39. 罗隐

邺王罗绍威学（罗）隐为诗，自号其文为《偷江东集》。青州王师范遣使赍礼币，求一篇，隐以诗寄之曰：“盛业传家有宝刀，况闻余力更挥毫。腰间印绶黄金贵，卷内文章白雪高。宴罢嘉宾吟凤藻，猎回

① 《旧唐书·懿宗纪》及《旧唐书·杨收传》系于咸通八年，然记事多抵牾不合，难以信据。

② 《全唐诗》卷六五〇。

诸将问龙韬。登坛甲子才三十，犹拟回头夺锦标。”王得诗大喜。（《唐诗纪事》卷六九“罗隐”）

罗隐此诗《甲乙集》卷一题作《秋日有酬》，《文苑英华》卷二六五载罗隐《感德叙怀寄上罗邛王三首》，此为第一首。题中“罗邛王”指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旧唐书·罗绍威传》载：“天祐初，授检校太尉、守侍中，进封邛王。”罗绍威曾遣使吴越，尊罗隐为叔父。《旧唐书·罗绍威传》记载：“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使赂遗，叙其宗姓，推为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为曰《偷江东集》，凡五卷。”罗隐《甲乙集》卷七有《寄酬邛王罗令公五首》，其三云：“珍重珠玑兼秀段，草玄堂下寄扬雄。”其五云：“锦笈珠囊连复连，紫鸾飞下浙江边。”可证“遣使赂遗”之事，本事所引诗当是罗隐赠绍威之作。诗中所言情形与绍威之事吻合。首句“盛业家传”云云，指绍威承其父罗弘信之业为魏博节度使。《旧唐书·罗绍威传》记载：“威性明敏，达于吏道。伏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咏，甚有情致。”可证诗中所言绍威吟咏之事。罗隐《寄酬邛王罗令公五首》当与此诗先后作。《旧五代史》卷一四《罗绍威传》载：“开平中，加守太师，兼中书令，邑万户。”又《资治通鉴》卷二六七载绍威卒于开平四年（910），则罗隐诗作于开平中。《旧唐书·罗绍威传》记载，绍威卒年34，则罗隐作此诗时绍威年约30，与“登坛甲子才三十”句吻合^①。据以上考述，诗为赠绍威之作，当无疑义。王师范与罗绍威生平颇有相似之处。据《新唐书·王敬武传》及《新唐书·王师范传》，龙纪元年（889），平卢节度使王敬武卒，其子王师范自称留后，时年16。据《资治通鉴》，师范于开平二年（908）被朱温灭族，以前事推之，死年35。又《旧唐书·王师范传》谓师范“喜儒学”。以上皆师范与绍威近似者，疑本事因此而误。

（罗）隐又与顾云先辈谒淮南高相公骈，顾为人风雅，时渤海公辟留，隐遂辞归钱塘。高与宾幕小酌，赆隐于海风亭。是时盛暑，有青

^① 按：“登坛甲子”《文苑英华》卷二六五作“分茅列土”。

蝇入座，渤海公命扇驱之。顾谠隐曰：“青蝇被扇扇离座，”隐立酬之曰：“白泽遭钉钉在门。”议者以才调相讥，两俱全美。隐度高公欲继淮王求仙，所为妖乱，潜题后土庙刺之。连夕挂帆而迈。巫者告公，公既悔且怒，急棹追之，已出境矣。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又于汾水建仪形。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野云侵鬓绿，两条官柳入眉青。韦郎年少知何事，端坐唯看太白经。”高后失政，因吕用之等幻惑，为毕师铎所害。隐自钱塘著《妖乱志》以非之，故有《题延和阁》云：“延和高阁势凌云，轻语犹疑太一闻。烧尽降香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鉴诚录》卷八“钱塘秀”）

《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七节引《鉴诚录》此文，文末注云：“《郡阁雅谈》谓青蝇、白泽对句是寇弱、谢观作。”又卷四六云：“寇豹，不知何许人，与谢观同在唐崔裔孙相公门下，以词藻相尚。……豹寻辞省别，观犹依托。时祖席多蝇，触目为令。观曰：‘青蝇被扇扇离座。’豹举目见户上白泽，曰：‘白泽遭钉钉在门。’不唯敏捷，俱有讥讽。豹后不仕，隐南岳。”“寇弱”作“寇豹”。今姑存二说。

顾云尝入高骈幕，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一四载：“乾符间，高骈节度镇海兼江南行营招讨使，（顾）云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行营都招讨判官。”高骈节度镇海事，《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乾符五年（878）六月记载：“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党多郢人，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同卷乾符六年（879）冬十月载：“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则顾云从事高骈幕在乾符五年至六年。

据此本事，罗隐作《后土庙》似在与顾云初谒高骈时，然后土庙在扬州江阳县。《广陵妖乱志》载：“江阳县前有一地祇小庙，（吕）用之贫贱时，常与妻寓止巫舍。凡所动静，祷而后行。及得志，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饰，尽江南之选。”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用之微时，依止江阳后土庙”胡三省注云：“贞观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阳县，与江都俱在扬州郭下。后土庙，今扬州城东南隅蕃釐观是

① 《全唐文》卷八九七。

也。”又《广陵妖乱志》记吕用之祀庙事于中和元年(882),则此诗作于中和元年高骈移镇扬州之后,本事记事不确。题延和阁诗最早载于《广陵妖乱志》,罗隐集不载。《妖乱志》载云:“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此近诗妖也。”按:《新唐书·艺文志二》收《广陵妖乱志》三卷,谓郭廷海作,《直斋书录解題》卷五作“郑延晦”,乃“郭廷海”之误,可见非罗隐之作。《鉴诫录》误以《广陵妖乱志》为罗隐作,又误以延和阁诗属罗隐。

(罗)隐以讽刺颇深,连年不第。举子刘赞赠之诗曰:“人皆言子屈,我独谓君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年虚侵雪鬓,尘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隐睹之,因起式微之思,遂有归五湖诗曰:“江东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思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鉴诫录》卷八“钱塘秀”)

本事所引刘赞诗见于《全唐诗》卷七二七,题作《赠罗隐》。罗隐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题作《曲江春感》。《全唐诗》卷六五五录此诗,亦作《曲江春感》,校云:“一题作归五湖。”此诗末句谓“家住五湖归去来”,本事所谓“有归五湖诗”当本于该诗末句,而校语所引诗题则出于本事。

罗隐《湘南应用集序》云:“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①己卯为大中十三年(859),庚寅为咸通十一年(870),此诗当作于咸通十一年春决计放弃科举归隐江东时。《全唐诗》卷七二七刘赞小传按云:“唐末刘赞有三:一魏州人,举进士,为罗绍威判官,仕唐明宗中书舍人;一桂阳人,宰相瞻之子,擢进士,仕梁,充崇政殿学士;一仕闽王曦,为御史中丞。三人皆与罗隐同时,未知孰是。”魏州人刘赞,新旧《五代史》有传,《旧五代史》卷六八载:“刘赞,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为令录,诲以诗书,夏月令服青襦单衫。……由是赞及冠

① 《全唐文》卷八九五。

有文辞,年三十余登进士第。……清泰二年春,诏归田里。妻纣干氏途中卒,赞比羸瘠,恸哭殆绝,因之亦病,行及石会关而卒,时年六十余。”由清泰二年(935)上推60年,即乾符二年(875),则此刘赞生年在咸通七年(866)至乾符二年之间。前文已考,此诗作于咸通十一年,则此刘赞不可能此时有诗赠罗隐。桂阳人刘赞事迹见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天祐二年”“刘赞”条下引《北梦琐言》^①,文云:“唐刘瞻相公有清德大名,与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传。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刘赞也。相国薨后,赞且孤幼,甚懵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一旦不告他适,无以访寻,圣善忆念,泪如纆縻,莫审其存亡。数年方归,子母团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谓曰:‘与汝开心,将来必保聪明。’’自是日诵一卷,兼有文藻,擢进士第。梁时登朝,充崇政院学士,预时俊之流。”《新唐书·宰相表下》载:“(乾符元年)五月乙未,……刑部尚书刘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辛未,瞻薨。”乾符在咸通之后,《北梦琐言》既谓“相国薨后,赞且孤幼,甚懵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则咸通中自不能有赠罗隐诗。据《全唐诗》小传所叙,“御史中丞”刘赞“仕闽王曦”,闽王曦于永隆(939-944)中在位。自咸通十一年(870)至永隆已七十余年,此刘赞生年不能早于咸通,可见,此刘赞咸通中也不可能有赠罗隐之诗。

据以上所考,本事所引刘赞诗非赠罗隐之诗,所赠当别是一人。

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矢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唐摭言》卷一〇)

“沈嵩”当作“沈崧”,崧字吉甫,闽人,登进士第。登第后归闽,途经

① 《登科记考》卷二四“天祐二年”“刘赞”条下引魏州刘赞及刘瞻之子刘赞事迹,将两人混为一人。按:刘瞻之子刘赞即桂阳刘赞。《新唐书·刘瞻传》载:“刘瞻字几之,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北梦琐言》卷三“河中钱刘相瞻”条载:“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连州”:“秦为长沙郡之南境,汉置桂阳郡,至陈为桂阳县。隋文帝开皇十年置连州,……大业初改为熙平郡,武德四年复为连州。”则桂阳、连州同地异名。康熙《连州志》卷二《选举》:“天祐乙丑:陈用拙、刘赞、张鸿。”《粤诗搜逸》卷一、乾隆《广东通志》卷三一同。天祐乙丑即天祐二年,则本年登科者乃桂阳刘赞,非魏州刘赞。

杭州，钱缪留为静海军掌书记。有《罗氏宗谱》，收《罗给事墓志铭》。《十国春秋》卷八六有传，本事中“沈嵩”即其人。

本事谓“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云云，似以诗事在光化（898—901）中。然《登科记考》系沈崧于乾宁二年（895）登科。《登科记考》卷二四“乾宁二年”“沈崧”引《吴越备史》云：“乾宁二年，崔凝主礼闱，二十五人登进士第，淪滥尤众。昭宗命覆试，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又《唐摭言》卷一四记载：“乾宁二年，崔凝榜放，贬合州刺史。”《全唐文》卷九一录昭宗《覆试进士敕》云：“朕自君临寰海，八载于兹，梦寐英贤，物色岩野，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俾于理。……昨者崔凝所考定进士张贻宪等二十五人，观其所进文书，虽合程度，必虑或容请托，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轩，观其实艺。……其卢贍、韦说、封渭、韦希震、张贻、黄滔、卢鼎、王贞白、沈崧、陈晓、李龟祯等十一人，所试诗赋，义理精通，用振儒风，且躋异级。”《登科记考》于乾宁二年二月己亥下引录该文。据此，沈崧登第必于乾宁二年。本事既云崧“得新榜”，则诗必作于崧登第后不久，本事所谓“光化”应为“乾宁”。《吴越备史·罗隐传》记载，钱缪初授镇海节度使时，命沈崧草谢表，崧表言辞未妥，罗隐请更之。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二年（893）九月丁卯，以钱缪为镇海军节度使。则景福二年罗隐已在钱缪幕为掌书记，乾宁二年正佐其幕。

40. 李廷璧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倅。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咏《愁诗》曰：“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粘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太平广记》卷二七二引《抒情集》）

据本事，李廷璧《愁诗》乃因其妻猜妒而作。然以诗证事，意有未安。此诗首联谓愁思刻骨铭心，难以排遣，乃泛咏愁绪，并无确指。颌联借用了潘岳、班婕妤怀愁故事。潘岳《秋兴赋》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

毛。……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①班婕妤《怨歌行》云：“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②二人诗赋皆悲秋之作，颌联借用，亦以悲秋。颈联中“远雁声初”乃初秋物候，据此，颌联和颈联俱写悲秋情怀。尾联承接悲秋之意，抒写相思离别之情。据此，此诗不过沿用传统的悲秋伤别主题，情属泛泛，事无特指。本事与诗了不相涉。尾联有“酒醒灯背”、“相思”、“相见”等语，仅在字面与本事略有关联，本事或据以牵合诗事。

41. 胡令能

湖州长兴县啄木岭金沙泉，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其上有境会亭。每茶节，二牧毕至。……胡生者，即其居以钉铰为业，居雪溪而近白蘋洲。去其居十余步，有古坟，胡生每因茶饭，必奠酹之。尝梦人谓之曰：“吾姓柳氏，平生善诗而嗜茗，及死葬此室，乃子今居之侧也。常衔子之惠，无以为报，欲教子为诗。”胡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意言之，当有致矣。”生既寤，试留思，果有冥助者，其后遂工焉。诗曰：“胡风似剑镞人骨，汉月如钩钓胃肠。魂梦不知身在路，夜来犹自到昭阳。”人谓之胡钉铰诗。（《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六）

《云溪友议》卷下“祝坟应”条亦载胡钉铰事，然记载有异。其文云：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藪。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镞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画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

① 《文选》卷一三。

② 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

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

《南部新书》壬并载二说，而未录诗什。《唐诗纪事》卷二八“胡令能”下收录《云溪友议》此条所载三首，《云溪友议》中《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唐诗纪事》题作《咏绣障》。《唐诗纪事》以“胡生”为胡令能，且改动诗题，当源出《鉴诫录》卷八“作者同”：“王右丞维有《题云母障子》，胡令能有《题绣障子》，虽异代殊名，而才调相继。……胡生诗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全唐诗》卷七二七“胡令能”下收诗四首，乃据《诗话总龟》及《云溪友议》。考《云溪友议》，胡生诗题有“郑州”、“圃田”两语，圃田为唐时中牟县，属郑州。《元和郡县志》卷八（“郑州中牟县”）开皇十八年，改为圃田县，……武德三年，……复改为中牟。”胡生诗有《喜圃田韩少府见访》，句云：“笑着荷衣出草堂。”则此胡生家在郑州中牟。湖州“胡生”则别是一位民间诗人。《全唐诗》并录两人诗于“胡令能”名下，显误。

42. 孟宾于

及江南攻下湖湘，（孟）宾于随马氏归朝嗣主，授以丰城簿，寻迁淦阳令。因黷货以脏罪当死，会（李）昉迁翰林学士，闻其縲绁，以诗寄宾于云：“幼携书剑别湘潭，金榜标名第十三。昔日声名喧洛下，近年诗价满江南。长为邑吏情终屈，纵处曹郎志未甘。莫学冯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为惭。”后主见诗贷之，复其官。（《江南野史》卷八）

此诗本事与诗颇有不符。首先，全诗无一语涉及宾于因罪縲绁事。据诗尾联，其时宾于已无意仕宦，拟将归休，故李昉劝其仕进，这与本事所叙情事完全不符。其二，据《宋史·李昉传》，昉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和宋开宝六年（972）拜翰林学士。《资治通鉴》卷二九〇记载，南唐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十月平湖南，而《江南野史》谓宾于迁淦阳令在归南唐

后不久。据本事,李昉此诗当作于显德四年初授翰林学士后不久。但是,此诗“近年”句中“江南”指南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南唐改称江南在开宝四年(971)十一月。此诗之作不能晚于此时,这与本事所叙相矛盾。其三,据《宋史·李昉传》,昉初仕后汉,又仕后周,后仕宋,未仕南唐,诗末句中“明君”不当指南唐君主。

此诗当作于宋灭南唐以后孟宾于将归老连州时。《江南野史》卷八载:“金陵陷,宾于遂归老连上。”又王禹偁《小畜集》卷二〇《孟水部诗集序》云:“老求致仕,得本曹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太祖平吴,以老病不任朝谒,听还故里。后以令终。”宾于为诗人李中所作《碧云集序》结云:“癸酉年八月五日序。”又署云:“朝议郎守尚书水部郎中武骑尉赐紫金鱼袋孟宾于。”^①癸酉年为宋开宝六年(973),其时宾于正在水部郎中任上。史载,宋平南唐在开宝八年(975),其时宾于当仍在水部郎中任上,这与诗中“纵处曹郎志未甘”句吻合。又诗以冯唐拟宾于。据《史记》及《汉书》冯唐本传,文帝曾问冯唐何以年已老大仍为郎吏,故荀悦《汉纪》卷八谓“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唐诗多以冯唐为老而为郎官者。宋平南唐时,宾于年及80,且位滞郎中,诗以冯唐拟之,正取“老而为郎”之意。据《江南野史》及《孟水部诗集序》所载,宋平南唐以后,宾于求致仕归老,不愿事宋主,故李昉诗尾联劝其继事新朝,此之“明君”即指宋主。

可见李昉此诗与所载本事并无关联,本事乃附会之谈。

43. 丁元和

丁元和,未详其何人。广政时投后主诗曰:“九重天子人中贵,五等诸侯阃外尊。争似布衣云水客,不将名姓挂乾坤。”(《十国春秋》卷五七)

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三“淘沙子”记此诗及本事云:“伪蜀大东市有养病院,凡乞丐贫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携畚鍤,日循街坊沟渠内淘泥沙,时获碎铜铁及诸物以给口食,人呼为淘沙子焉。辛酉岁,有隐迹于淘沙者,不知所从来及名氏。常戴故帽,携铁把竹畚,多于寺观阒静处坐卧。

^① 《全唐文》卷八七二。

进士文谷因下第往圣兴寺,访相识僧,见淘沙子披褐于佛殿上坐,谷见其状貌古峭,辞韵清越,以礼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诗数首,谷愕然。又讽其自作者数篇,其诗或讥讽时态,或警励流俗,或说神仙之事,谷莫之测。……谷后得伪通奏使王昭远礼于宾席,因话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诗曰:‘九重城里人中贵,五等诸侯阕外尊。争似布衣云水客,不将名字挂乾坤。’王公曰:‘有此异人。’遂闻于蜀主,因令内园子于诸街坊寻访之。”^①《十国春秋》是清康熙时吴任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提要谓任臣“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汇成是书”。则前诗本事对《茅亭客话》或有所采摭。然《茅亭客话》称淘沙子“不知所从来及名氏”,《十国春秋》谓丁元和,未知所本。《十国春秋》记淘沙子以其诗投后主,然《茅亭客话》未言其事,仅谓王昭远后以其事闻于蜀主,则非投后主诗可知。寻绎诗意,亦不似投献君王之诗。《十国春秋》谓诗事在广政(938—965)时,或有所本。《十国春秋》卷五六载:“文谷,成都温江人。……事后主,历官员外郎、侍御史、山南道节度判官。广政末随王昭远巡边。”则文谷为蜀后主时人,其遇淘沙子当在广政时。《茅亭客话》谓文谷遇淘沙子在辛酉岁,“辛酉岁”为公元961年,即后蜀广政二十四年。据《茅亭客话》,文谷遇淘沙子时,尚为进士,并未居官,而《十国春秋》谓文谷后蜀时官历员外郎、侍御史、节度判官。后蜀亡于广政二十八年(965),自辛酉岁至后蜀亡仅四年,文谷在此期间不应历官如此。“辛酉岁”当误。

44. 李曜 吴圆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恤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汰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蠙珠掌内看。”(《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抒情诗》)

^①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此本事以“媚川”、“韶光”为人名,然本事与诗颇有不合之处。吴圆诗中“韶光今已输先手”句谓李擢在交割政务的同时,将“韶光”一并移交,“输先手”即“输于先手”,“输”指移交,“先手”指李擢。据此一句,则“韶光”亦“托于替人”矣。但本事仅谓“媚川”“托于替人”,李擢诗谓“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亦此意。这种诗事不一的情况是将“媚川”、“韶光”视为人名造成的。其实,诗中“媚川”、“韶光”指良辰美景。陆机《文赋》谓“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李善《文选注》引《孙卿子》云:“玉在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则此“媚川珠”、“螾珠”借指川光水色^①。歙州山川秀美,为唐时形胜之地。徐铉《寄歙州吕判官》诗云:“任公郡占好山川,溪水萦回路屈盘。南国自来推胜境,故人此地作郎官。风光适意须留恋,禄秩资贫且喜欢。莫忆班行重回首,是非多处是长安。”^②《和歙州陈使君见寄》谓“新安风景好”,又谓“临窗山色秀,绕郭水声喧”^③,可见唐时歙州以其山川秀美而成为为官者的向往之地。李擢、吴圆诗不过是说,吴圆一经从李擢手中接受郡职,也就同时拥有了歙州的山川美景,此后尽可领略其川光山色了。依此解读,吴圆诗中“韶光”、“螾珠”皆指山川风物,而“韶光”两句与李擢诗中“今日”两句恰成衔接和对应,诗意完满。

此则本事是因误读两诗附会而来。以“媚川”、“韶光”为人名,不仅诗事不符,而且愈读愈离,诗意暗昧难通。解诗如此,徒令一笑。

45. 同谷子

天复中,昭宗播岐时,梁太祖与秦王茂贞羽檄交驰,欲迎车驾。何皇后恃其深宠,不顾阝危,酷好畋游,放弄于两舍之外,践踏苗稼,百里飞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壶,俱在牛上,因称同谷子,不显姓名。直诣行朝,上书两卷,论十代兴亡之事,叙四方理乱之源,帝览其书,数日减膳。宣王骠骑赐之酒食,审彼

① 《宋诗纪事》卷一九李颀《望海亭席上作》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到落晖。谁在画帘沽酒处,几多鸣橹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首句“七闽山水掌中窥”语意与此相同。

② 《全唐诗》卷七五二。

③ 《全唐诗》卷七五五。

贤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诗,又说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虑失恩旨,潜令秦王诛之。其事未行,预已奔去。后梁太祖举四镇之众,迫胁岐城,大驾无依,遂迁东洛。议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上书,采而不用,时将尽矣,天使其然。同谷子咏五子之歌诗曰:“邦惟固本自安宁,临下常须驭朽惊。何事十旬游不返,祸胎从此构殷兵。”又曰:“酒色声禽号四荒,那堪峻宇又雕墙。静思今古为君者,未或因兹不灭亡。”又曰:“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当时事,首为盘游乱纪纲。”又曰:“明明我祖万邦君,典则贻将示子孙。惆怅太康荒坠后,覆宗绝祀灭其门。”又曰:“仇雠万姓遂无依,颜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场前事悔难追。”(《鉴诚录》卷二“逸士谏”)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提要云:“《逸士谏》一条,称昭宗何后荒于从禽。考《新唐书·后妃列传》,昭宗奔播岐、梁间,后侍膳,无须臾去。《旧唐书》亦云:后于蒙尘薄狩之中,尝侍膳御,不离左右,安得有畋游之事。且昭宗寄命强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纵后畋游,恒至六十里外。殊为诬诞。”《旧唐书·后妃列传》载:“景福之际,奸臣内侮,后于蒙尘薄狩之中,尝膳御侮,不离左右。左关、右辅之幸,时事危迫,后消息抚御,终获保全。”《提要》所谓“尝侍膳御”实作“尝膳御侮”。昭宗播迁之际,处境险恶,何后虑奸臣谋害昭宗,移夺国柄,故昭宗每食必先尝其膳,以防奸谋。《旧唐书》所谓“不离左右”者以此。据此,昭宗奔播时,何后实未离左右。

何后纵畋一事当自同谷子《五子之歌》诗附会而来。此诗据《尚书·五子之歌》改作,内容一如旧篇,为咏古之作。《尚书·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僂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同谷子《五子之歌》诗因仍古意,何后纵畋事自此而来。本事附会该诗,尚有未切。昭宗播迁,唐运衰微,乃四海鼎沸,强藩自擅所致,非昭宗“酒色声禽”、“峻宇”“雕墙”所致。且同谷子诗乃责人君之行,非帝后之事。

46. 王缙秀

元丞相载妻王氏，字缙秀。王绪相公之女，维右丞之侄。初，王相公镇北京，以缙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缙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或知之。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元乃游秦，为诗别缙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零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姨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明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元公，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洎元公贪吝为心，竟招罪戾，台阁弹奏而亡。其家缙秀，少有识量，节概固高。丞相已谢，上令入宫备彤笔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曰上宥连罪。或云京兆笞而毙矣。（《云溪友议》卷下“窥衣帔”）

本事文中注称王缙秀为王缙之女^①，王维之侄，又引王缙秀诗曰“家风第一右丞诗”，以元载为王缙之婿。《旧唐书·元载传》载：“并载妻王氏并赐死。……王氏，开元中河西节度使忠嗣之女也。”《新唐书·元载传》所载略同。本事又云：“其家缙秀，少有识量，节概固高。丞相已谢，上令入宫备彤笔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此一记载与《刘宾客嘉话录》记载略同：“元载将败之时，妻王氏曰：‘某四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舂婢，不如死也。’”《云溪友议》后出，所记当出自《嘉话录》。《旧唐书·王忠嗣传》记载：“（开元）五年正月，河陇以皇甫惟明败衄之后，因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则所谓

^① 王缙，原文误作“王绪”。

“四节度使”与王忠嗣事迹相吻合。据此,元载乃王忠嗣之婿。

以元载为王缙之婿与史实多有不合。其一,据《登科记考》卷八引《册府元龟》,元载于开元二十九年进士登第,此时王缙尚未显达,这与本事所引元载诗“虽在侯门似不容”句不符。其二,王缙领幽州、卢龙节度在大历三年,时元载已位至宰相。本事谓“王相公镇北京,以韞秀嫁元载”,与王缙生平不符。其三,“二十年节度使”、“四节度使”云云,乃举其最盛时,以高其家声,然王缙在元载败前两度为相,则所指显非王缙。其四,《旧唐书·王缙传》载:“时元载用事,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傲忽。”若王缙、元载为翁婿,断不至此。

王缙与元载既无翁婿关系,王蕴秀自非王缙之女,则蕴秀与王维亦无关系。本事所载王蕴秀寄诸姨妹诗乃本事作者所作,非王蕴秀之诗。

47. 贯休

昭宗之代,张拾遗道古因贡五危二乱表,叙兴废之事,遂黜于蜀,时王太祖辟为安抚判官,张所为古僻,不循时情,逐在导江卖卜遣日,及太祖登极,每思其贤,遣使诏之,屡征不起,复上章疏,词旨是非,帝遂诛之。瘞于五墓之地,郑云叟在华山闻之,吟诗哭曰:“曾陈章疏忤昭皇,扑落西南事可伤。岂使谏臣终屈辱,直疑天道恶忠良。生前卖卜居三蜀,死后驰名遍大唐。谁是乱来修史者,说君须到笔头忙。”又西岳僧贯休哭之曰:“清河逝水太匆匆,东观无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载隔,镜中鸾影一时空。妻亦寻卒。尘生苦雾苍茫外,门掩诸孤寂寞中。惆怅斯人又如此,一声羌笛满江风。”(《鉴诫录》卷四“危乱黜”)

《鉴诫录》此节文末注云:“据《禅月诗集》中,此诗自哭涪州张侍郎,非张拾遗。何光远错举证也。”不以贯休此诗为哭张道古之作。按今所传《鉴诫录》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提要云:“此本析为十卷,有朱彝尊跋,称从项元汴家宋本影写,则犹宋人所分也。”则文中之注出自宋人。宋本《禅月集》有收录贯休此诗者,今本《禅月集》未收此诗,则当别是一本。考贯休此诗,有与张道古生平不符者。诗有“天上君恩三载隔”一句,谓其人卒时被贬离朝已三年。《资治通鉴》卷二六一载:“(昭宗乾

宁四年)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称:‘国家有五危、二乱,……’上怒,贬道古施州司户。”则道古之“黜于蜀”在乾宁四年(897),《蜀梼杌》卷上载:“武成二年(909)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张道古卒。”道古被贬以后再未还朝,则离朝已12年矣。道古卒时,朱温已篡唐,尤不得谓“天上君恩”。据《蜀梼杌》卷上,王建开国,诏道古为武部郎中,后“复贬茂州,卒于路”,即卒于灌州^①,亦不得谓“天上君恩三载隔”。可见贯休此诗非吊道古之作。

贯休《禅月集》卷一一有《秋末寄张侍郎》,卷一三有《晚春寄张侍郎》。《晚春寄张侍郎》云:“遐想涪陵岸,山花半已残。人心何以遣,天步正艰难。时昭宗在岐下。鸟听黄袍小,城临白帝寒。应知窗下梦,日日到江干。”诗中“涪陵”即涪州,此“张侍郎”即贯休诗所哭之张侍郎。《秋末寄张侍郎》云:“静坐黔城北,离仁半岁强。雾中红黍熟,烧后白云香。多病如何好,无心去始长。寂寥还得句,溪上寄三张。”谓此诗作时身在“黔城北”。《北梦琐言》卷二〇“休公真率”条云:“风骚之外,精于笔札,举止真率,诚高人也。然不晓时事,往往诋訾朝贤,它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问其笔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须登坛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衔之,乃递(按原作“遽”,据《唐诗纪事》改)于黔中,因病以《鹤诗》寄意,曰:‘见说气清邪不入,不知尔病自何来?’以诗见意也。”可见此诗作于因得罪成汭而黜于黔中时。“黔中”即黔州,西与涪州邻接,则此之“张侍郎”与前篇之“张侍郎”当同为一入,因邻郡相接,能以诗往还。二诗写作时间当接近。《晚春寄张侍郎》自注:“时昭宗在岐下。”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及卷二六三,昭宗天复元年十一月,朱全忠进逼京师,中尉韩全海劫昭宗赴凤翔,至天复三年正月还京,诗题“晚春”,当作于天复二年(902)暮春。如前所考,《晚春寄张侍郎》与《秋末寄张侍郎》中“张侍郎”同为一入,二诗作于贯休黜于黔中时。据《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九五,成汭为荆南留后、荆南节度使在文德元年(888)至天复三年(903),另据《资治通鉴》卷二六〇记载,成汭于乾宁三年(896)攻取黔、渝、涪等州,则贯休之黜黔中在乾宁三年(896)至天复三年之间,前文所考《晚春寄张侍郎》的写作时间与此吻合。《晚春寄张侍郎》作于天复二年,《哭涪州张侍郎》

① 按:自成都至茂州经灌州。

郎》云：“天上君恩三年隔。”则后一首作于天复二年至天复四年（904）之间。

唐末寇乱，（贯）休避地渚宫，荆帅高氏优待之，馆于龙兴寺。会有谒宿，话时政不治。乃作《酷吏词》以刺之云：“霰雨霏霏，风吼如斲。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叹自语，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韩娥唱一曲，锦段鲜照屋。宁知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惟哭，亦白其头饥其族。所以祥风不来，和气不复。蝗乎蟹乎，东西南北。”遂离荆门，立趋井络，上蜀主陈情之诗。（《唐诗纪事》卷七五“僧贯休”）

贯休自楚入蜀，其时间有可考者。《鉴诫录》卷五载：“上人天复中自楚游蜀，”休作《蜀王入天慈寺听讲》，题下自注云：“天复三年作。”^①则天复三年（903）贯休已在蜀。按《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宣帝天祐三年（906）十月，高季昌始为荆南节度使，可见季昌据荆南时，休已离楚入蜀。所谓高氏馆休于龙兴寺，实误。《宋高僧传·齐己传》载：“梁革唐命，天下纷纭。于是高季昌禀梁帝之命，攻逐雷满出渚宫，己便为荆南留后，寻正受节度。……高氏遂割据一方，搜聚四远名节之士，得齐之义丰、南岳之己，以为筑金之始验也。龙德元年辛巳中礼己于龙兴寺净院安置，给其月俸，命作僧正，非所好也。”据此，高氏所礼者为齐己，非贯休，《唐诗纪事》误记。

贯休避居荆南以前长期居于吴越，诗有“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两句，写吴地之事，则诗作于吴越，非作于荆南。

方干师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曰：“村里老。”李频师方干，后频及第。诗僧清越赠干诗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唐摭言》卷四）

^① 见《禅月集》卷一九。

《全唐文》卷八二〇孙郃《方玄英先生传》云：“先生一举不得志，遂遁于会稽，渔于鉴湖，与郑仁规、李频、陶详为三益友，弟子弘农杨弇、释子居远。”仅云方干与李频为益友，且与弟子杨弇等分叙，可见李频未师事方干，本事记载不确，或为读此传涉下文而误。

《鉴诫录》卷八“屈名儒”记载：“李频上第后，干寄诗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犹卧云。’此恨之深矣。”但《唐诗纪事》卷六三“方干”载：“僧贯休赠诗云：‘盛名与高隐，合近谢敷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投纶侵海分，得句觅云根。白日升天路，知君别有门。’弟子，谓李频也。”此处小注，当沿《唐摭言》及《鉴诫录》之误，为编者所加。《禅月集》卷八载此诗，题作《赠方干》。卷七又载《怀方干张为》，可见贯休与方干有交往。诗为贯休作，非方干诗。《唐摭言》所载本事谓诗为清越作，亦误。

48. 齐己

僧齐己往袁州谒郑谷，献诗曰：“高名喧省闕，雅颂出吾唐。叠嶂供秋望，飞云到夕阳。自封修药院，别下着僧床。几话中朝事，久离鸳鹭行。”谷览之云：“请改一字，方得相见。”经数日再谒，称已改得诗，云：“别扫着僧床。”谷嘉赏，结为诗友。（《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郡阁雅谈》）

齐己诗见《白莲集》卷二，题作《寄郑谷郎中》，则诗为寄怀之作，而非谒献之作。本事实误。“几话中朝事”句《白莲集》本作“几梦中朝事”，当为本事牵合谒见晤谈事而改动原文。《白莲集》卷三同题诗云：“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觅句如探虎，逢知似得仙。神清太古在，字好雅风全。曾沐星郎许，终惭是斐然。”卷七《谢人寄新诗集》又云：“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求。”又《五代史补·僧齐己》载其类似的另一逸事：“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前所引本事或据上引齐己诗及《五代史补》齐己诗本事附会而来。

后唐明宗太子从荣，好作歌诗，高辇辈多依附之。《观棋》诗云：

“看他终一局，白却少年头。”齐己《中秋》诗云：“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从荣果谋不轨，唱和者言涉嫌疑，皆就诛，惟齐己得荆帅高令公匿而获免。（《唐诗纪事》卷七五“僧齐己”）

李从荣好为歌诗事，《五代史补》卷二“秦王掇祸”条云：“秦王从荣，明宗之爱子，好为诗。判河南府，辟高辇为推官，辇尤能为事，宾主相得甚欢。自是出入门下者，当时名士有若张杭、高文蔚^①、何仲举之徒，莫不分庭抗礼，更唱迭和。”又《资治通鉴》卷二七八记载：“秦王从荣喜为诗，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矜伐。每置酒，辄令僚属赋诗，有不如意者面毁袞抵弃。”此事系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十月。长兴四年（933），李从荣因被控谋逆被诛，王府僚属或贬或杀，高辇也因参与谋议被诛。齐己约于后梁贞明五年（919）至江陵，依高季昌，后居龙兴寺，至后晋天福三年（938）离世^②，其间并无身至洛阳之事。由“从荣果谋不轨”一句看，本事是认为齐己诗句隐喻李从荣在朝得势，如日中天。本事所引齐己诗，《白莲集》卷九题作《中秋月》，诗云：“空碧无云露湿衣，群星光外涌清规。东楼莫碍渐高势，四海待看当午时。还许分明吟皓魄，肯教幽暗取丹枝。可怜半夜婵娟影，正对五侯残酒池。”此诗泛咏秋月，写一时之境，并无影指。本事引诗有“当路时”一语，意谓李从荣正处得势之时。然原诗三字作“当午时”，即午夜时分，其时月在中天，乃赏月之时。原文语意明确，异文则晦涩难通。据此，异文为本事作者牵合本事改动原文所致。

《白莲集》收录齐己与高辇往还诗数篇，有《寄还阙下高辇先辈卷》（卷三）、《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卷四）、《寄谢高先辈见寄二首》（卷四）、《寄酬高辇推官》（卷五）、《谢秦府推官寄丹台集》（卷七）、《寄酬秦府高推官辇》（卷七）、《叙怀寄高推官》（卷七）。从这些诗看，当时高辇在洛阳，又在秦王府为推官，而此时齐己远在江陵，仅以诗篇寄赠，未有齐

① 按：当为“江文蔚”。

② 详见拙文《齐己生卒年辨疑》，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262页。

己身至洛阳唱和之事。本事或因上述二人诗歌往还之事附会而来。

49. 崔暇妻^①

中书舍人崔暇，娶李续女，为曹州刺史。令周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在厅中，女立床西，暇立床东，女持红笺题诗一首笑投暇，因高吟之云：“莫以真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住，知得几多年。”一岁而暇妻卒。（《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五）

《诗话总龟》谓该条出自《酉阳杂俎》续集卷三，然今本《酉阳杂俎》文字有所不同，文云：“中书舍人崔暇弟暇，娶李氏。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暇在床东。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诗言：……梦后才一岁，崔暇妻卒。”又《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崔暇》引《酉阳杂俎》云：“中书舍人崔暇弟暇，娶李续女。李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暇在床东。女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梦后才一岁，崔暇妻卒。”据《酉阳杂俎》，“周邵南”当作“国邵南”，据《太平广记》所引，为曹州刺史者乃李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上》载赵郡李氏东祖房：“续，曹州刺史。”则《太平广记》所引为是。娶李续之女者，诸载或“暇”或“暇”，至为混乱。《新唐书·李德裕传》载：“德裕之斥，中书舍人崔暇，字乾锡，谊士也。坐书制不深切，贬端州刺史。”《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崔暇《制诰集》十卷，注云：“字乾锡，刑州辞时，会刘稹反，归朝，授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全唐文》卷七二六存其文，皆为制文，则为中书舍人者为崔暇，非崔暇。故今本《酉阳杂俎》文字不误，《太平广记》所引因“暇”、“暇”形近而颠倒误置。可见，娶李续女者为崔暇，《诗话总龟》以娶李续女者为崔暇，乃据《太平广记》引文而误。《全唐诗》卷八六八“国邵南”下录此诗，题作《梦崔暇妻诗》，注谓“崔暇娶曹州刺史李续女”云云，诗题及注沿《太平广记》引文及《诗话总龟》之误。

^① 崔暇妻诗，《全唐诗》卷八六八作国邵南诗。

50. 讖记

唐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应进士举，甚有名称。岁暮，自京西客游回，诣南省，访知己郎官。适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尽出。顾言竦轡而东，见省东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乌纱蒙首北去，徐吟诗曰：“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又稍朗吟，若令顾言闻。顾言策马逼之，于省北有惊尘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顾言元和元年及第。（《太平广记》卷一五四“李顾言”引《续定命录》）

《登科记考》卷一五谓贞元二十年停贡举，引《续命定录》、皇甫湜文、权德舆诗为证。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云：“汝南周子桑，治《书》通《春秋》，非仁义不动止。年23，贞元十九年如京师，将举五经，秋及陕，见无举诏，东还。”^①据此，贞元二十年确曾停贡举。权德舆《过张监阁老宅对酒奉酬见赠诗》有云：“荆玉难收尽，齐竽喜暂闲。”自言掌贡举事，原注：“其年停贡举。”权德舆贞元十九年、二十一年知贡举，诗云“暂闲”，则无疑指贞元二十年停贡举事。

唐时礼部进士试通常在正月举行，同月发榜，贞元二十一年乃特例。据《旧唐书·顺宗纪》，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则是年正月贡举不能如期举行。权德舆《上巳日贡院考杂文不遂赴九华观袞袞之会以二绝句申赠》诗云：“三月韶光处处新。”可见该年三月礼部尚在进行贡举，权德舆因知贡举，上巳日未能赴九华观袞袞之会。据此，《续定命录》谓该年三月下旬放进士榜当属可信。

惟小说谓李顾言元和元年及第未知何据。依小说所记，李顾言应试而乌纱蒙首人吟诗为讖事在贞元十九年，顾言本欲参加贞元二十年的科试，但该年停贡举，只能等到贞元二十一年应试，所谓“登科又校一年迟”当指此。此外，三月发榜惟贞元二十一年。如果诗句与李顾言登科时间相关联，那么，李顾言应于贞元二十一年登第，而非元和元年。诗句的意

^① 《全唐文》卷六八七。

思其实是说不仅登科推迟一年,而且发榜时间延至三月,表明士人获取功名时按耐不住的急切心情。这两句诗当是李顾言自言科第的诗句,后经人附会,成为诗谶。

51. 陈抟

先生姓陈名抟,字图南,西洛人,生于唐德宗时。……僖宗待之愈谨,封先生为清虚处士,仍以宫女三人赐先生。先生为奏谢书云:“赵国名姬,后庭淑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宫,各安高贵。昔居天上,今落人间。臣不敢纳于私家,谨用贮之别馆。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飘然从风之云,泛若无缆之舸。臣遣女复归清禁。”及有诗上浼听览。诗曰:“雪为肌体玉为腮,多谢君王送到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以奏赴官使,即时遁去。(《青琐高议·前集》卷八《希夷先生传》)

《谈苑》记载:“陈抟长兴末举进士不第,去隐五当山九室岩,辟谷练气,二十余年。”^①《东轩笔录》卷一记载:“陈抟,字图南,有经世才,生唐末。”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八记载:“少时尝举进士不第,遂不乐仕。”后唐明宗长兴凡四年(930—933),《东都事略》谓抟举进士为少时事,《东轩笔录》又谓其生于唐末,则抟当生于唐昭宗时。《青琐高议》谓其生于德宗时,殊谬。至谓僖宗封为清虚处士,赐以宫女,亦妄。

《类说》卷二九《丽情集·莲花妓》云:“严子牧豫章,陈陶隐西山,操行清洁。守欲挠之,遣小妓莲花往侍焉。陶殊不采。妓乃献诗求去云:‘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神女下阳台。’陶答曰:‘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锦衾深愧卓文君。’”《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六引《艺苑雌黄》及《唐诗纪事》卷六〇亦载其事。则原诗为妓人莲花所作。《青琐高议》所引诗文字与此多有不同,乃作者因牵合本事而改动原文。

^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〇,《四部丛刊·初编》本。

附表一 《唐诗纪事》诗歌类编情况一览表

卷数	作 品	作 者
卷三	七夕赋咏成篇 七夕	何仲誼 沈叔安 凌敬
卷五	和太子纳妃	裴守真 胡元范
	奉和过温汤	王德真 杨思玄 郑义真
卷七	晦日林亭	高正臣 崔知贤 韩仲宣 周彦昭 高球 弓嗣初 高瑾 王茂时 徐皓 长孙正隐 高绍 郎余令 陈嘉言 周彦晖 高峤 周思钧 刘友贤
卷一二	慈恩寺九日应制	毕乾泰 辛替否 王景 韦安石 窦希玠 李咸 陆景初 郑南金 于经野 解琬 麴瞻 樊忱 孙佺 李从远 周利用 杨廉 张景源 李恒
卷一四	奉和明皇答张说南出雀鼠谷	宋璟 王丘 崔翹 王光庭 席豫 梁升卿
	奉和御制送张尚书巡边	源乾曜 张嘉贞 卢从愿 韩休 徐知仁 崔禹锡
	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	裴濯 韦抗 程行湛 李曷 萧嵩 刘升 陆坚
	奉和御制三相同日上官	裴光庭 宇文融
	恩赐乐游园宴	崔沔 崔尚
	酬韦嗣立龙门北溪作	崔泰之 崔日知 魏奉古
卷二五	宴城东庄	崔惠童 崔敏童
卷二七	送萧颖士赴东府诗	贾邕 刘舟 长孙铸 房白 元晟 刘太冲 姚发 郑愕 殷少野 邬载
卷三一	和权载之离合诗	张荐 崔邠 杨於陵 许孟容 冯伉 潘孟阳 武少仪
	清明赐新火	郑轅 韩濬 王濯
卷三二	长至上公献寿	崔琮 李竦
	南至日太史登台书云物	裴达 于尹躬
	吴宫教美人战	颜粲 叶季良
卷四三	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炉香	崔立之 郭遵 韦纾

卷数	作 品	作 者
卷四五	和锦楼玩月	王良会 柳公绰 张正壹 徐放 崔备
	玉水记方流	郑俞 杜元颖 吴丹
卷四七	忆长安十二咏	谢良辅 鲍防 杜甫 丘丹 严维 郑槩 陈允初 吕渭 范灯 樊珣 刘蕃 贾弇 沈仲昌
卷四九	九老会	胡杲 吉皎 刘真 郑据 卢贞 张浑 白居易
卷五〇	和登武担寺西台	段文昌 姚向 温会 李敬伯 姚康
卷五三	和绵州于中丞诗	于兴宗 李朋 杨牢 李汶儒 薛蒙 李邺 于瓌 王严 刘暌 李渥 刘璐 卢栢 李续 卢求 田章
卷五五	和周墀贺王起再举文柄	周墀 王起 卢肇 丁稜 姚鹄 高退之 孟球 刘耕 裴翻 樊纘 崔轩 蒯希逸 林滋 李宣古 黄颇 张道符 丘上卿 石贯 李潜 孟宁 唐思 言 左牢 金厚载 王甚夷
卷五九	听盛小丛歌送崔侍御	李讷 崔元范 杨知至 封彦卿 卢邺 高湘 卢 澥
	奉和山亭书怀	张弘靖 崔公信 崔恭 韩察 陆澹 胡证 高铢 张贾 李德裕
卷六七	三乡诗	王柷 刘谷 李昌邺 王涤 王硕 陆贞洞 李缙 高衢 张绮 韦冰
卷八一	毛仙翁赠行诗	裴度 牛僧孺 李翱 令狐楚 李程 李宗闵 韩 愈 崔郾 王起 李益 郑澣 杨於陵 杨嗣复 元稹 沈传师 崔元略 柳公绰 白居易 李绅 刘禹锡 张仲方

附表二 《唐才子传》以诗考事情况一览表

附表二 《唐才子传》以诗考事情况一览表^①

卷数	诗家	事 迹	出 处
卷一	王 湾	与学士綦毋潜契切。	王湾《哭补阙亡友綦毋学士》
	祖 咏	后移家归汝坟间别业，以渔樵自终。	祖咏《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汝坟别业》
卷二	王昌龄	与文士王之涣、辛渐交友至深。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
	常 建	尝采药仙谷中，遇女子遍体毛绿，自言是秦时宫人，亡入山来食松叶，遂不饥寒。因授建微旨，所养非常。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	常建《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时宫人》、《鄂渚招王昌龄、张偾》
	崔 署	高栖少室山中，与薛据友善。	崔署《早发交崖山还太室作》、《送薛据之宋州》
	薛 据	初好栖遁，居高炼药，晚岁置别业终南山下老焉。	薛据《出青门往南山下别业》
	刘长卿	少居嵩山读书，……灞陵、碧涧有别业。	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初至洞庭怀灞陵旧业》、《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
	李 颀	慕神仙，服饵丹砂。	王维《赠李颀》
	张 垚	天宝中谢官，归故山偃仰。	王维《送张五归山》、《戏赠张五弟垚三首》
	沈千运	当时士流皆敬慕之，号为“沈四山人”。	高适《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
	孟云卿	与薛据相友善。尝流寓荆州。杜工部多有与云卿赠答之作，甚爱重之。	杜甫《酬孟云卿》、《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颙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别崔湜因寄薛据孟云卿》

① 此表依据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所考。

卷数	诗家	事 迹	出 处
卷三	岑 参	别业在杜陵山中。	岑参《宿蒲关东店忆杜陵别业》、《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包 佶	与刘长卿、窦叔向诸公皆莫逆之爱。晚岁沾风痺之疾。	包佶《岭下卧疾寄刘长卿员外》、《答窦拾遗卧病见寄》、《近获风痺之疾题寄所怀》,刘长卿《酬包谏议佶见寄之什》、《宿严维宅送包佶》
	张 彪	颖上人……适遭丧乱,奉老母避地隐居嵩阳,供养至谨。与孟云卿为中表,……性高简,善草书,……时与杜甫往还。	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
	李嘉祐	以罪谪南荒,未几何有诏量移为鄱阳宰,又为江阴令。	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鄱阳》、李嘉祐《登湓城浦望庐山初晴直省斋敕催赴江阴》
	殷 遥	与王维结交,……而苦家贫,死不能葬,一女才十岁,日哀号于亲,爱怜之者赠贖,埋骨石楼山中。	王维《哭殷遥》、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哭殷遥》
	郎士元	有别业在半月吴村,王季友、钱起等皆见题咏,每夸胜绝。	钱起《题郎士元半月吴村别业兼呈李长官》
	道人灵一	后白业精进,居若耶溪云门寺。	皇甫冉《赴无锡寄别灵一、净虚二上人云门所居》、刘长卿《云门寺访灵一上人》
	皇甫冉	耕山钓湖,放适闲淡。	皇甫冉《赋长道一绝送陆遂潜夫》
	刘方平	白皙美容仪,二十工词赋。	李颀《送刘方平》
	灵 澈	尝与灵一上人约老天台,未得遂志。	灵一《赠灵澈禅师》
	古之奇	尝为安西幕府书记。	李端《送古之奇赴安西幕》

附表二 《唐才子传》以诗考事情况一览表

卷数	诗家	事 迹	出 处
卷四	吉中孚	来长安,谒宰相,有荐于天子,日与王侯高会,名动京师。	李端《送吉中孚拜官归楚州》
	耿 伟	初为大理司法,充括图书使来江淮,穷山水之胜。	卢纶《送耿拾遗伟充括图书使往江淮》
	司空曙	尝病中不给,遣其爱姬。	司空曙《病中嫁女妓》
	夏侯审	初于华山下多买田园为别墅,水木幽阒,云烟浩渺。	卢纶《送夏侯校书归华阴别墅》
	李 端	少时居庐山。	李端《长安书事寄卢纶》
	康 洽	洽,酒泉人,黄须美丈夫也。盛时携琴剑来长安,谒当道,气度豪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贵主之宅,从游与宴。虽骏马苍头,如其己有。……后遭天宝乱离,飘蓬江表。至大历间,年已七十余,龙钟衰老。谈及开元繁盛,流涕无从。往来两京,故侯馆谷空,咸阳一布衣耳。	李端《赠康洽》,戴叔伦《赠康老人洽》,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
	畅 当	时山东有寇,以子弟被召参军。	韦应物《寄畅当》
	王季友	暗诵书万卷,论必引经,家贫卖屐,好事者多携酒就之。其妻柳氏,疾季友穷丑,遣去。来客鄆城,洪州刺史李公,一见倾敬,即引佐幕府。	杜甫《可叹》
	张 谓	自矜奇骨,必谈笑封侯。二十四受辟,从戎营、朔十载,亭障间稍立功勋;以将军得罪,流滞蓟门。	张谓《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
	于 鹄	初买山于汉阳高隐,三十犹未成名。	于鹄《买山吟》、《山中自述》
	王 建	调昭应县丞,诸司历荐,迁太府寺丞、秘书丞、侍御史。	王建《初到昭应呈同僚》、《初授太府丞言怀》、张籍《酬秘书王丞见寄》、《赠别王侍御赴任陕州司马》
	皎 然	初入道,肄业杼山,与灵澈、陆羽同居妙善寺。	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善寺三癸亭》

卷数	诗家	事 迹	出 处
卷五	卢 全	家甚贫,惟图书堆积。后卜居洛城,破屋数间而已。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终日苦哦,邻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	韩愈《寄卢全》、卢全《冬行三首》
	马 异	卢全闻之,颇合己志,愿与结交,遂立同异之论,以诗赠答。	卢全《与马异结交诗》
	李 涉	挂席浮潇、湘、岳阳,逢张祜话故。因盘桓归洛下,营草堂,隐少室。身自耕耘,妾能织纴,稚子供渔樵,……妻亦入道。	李涉《寄河阳从事杨潜》、《岳阳别张祜》、《送妻入道》
	朱 昼	贞元间慕孟郊之名,为诗格范相似,曾不远千里而访之。不厌勤苦,体尚奇涩。与李涉友善,相酬唱。	朱昼《喜陈懿老示新制》,李涉《京口送朱昼之淮南》
	朱 放	尝著白摆襌,鹿裘笋屐,盘桓酒家。	严维《赠送朱放》
	羊士谔	早岁尝游女儿山,有卜隐之志,勋名相迫,不遂初心。	羊士谔《过三乡望女儿山早岁有卜隐之志》
卷六	鲍 溶	与李端公益少同袍,为尔汝交。	鲍溶《秋暮山中怀李端公益》
	熊孺登	钟陵人,有诗名,元和中,为西川从事,与白舍人、刘宾客善,多赠答。	白居易《洪州逢孺登》、刘禹锡《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
卷七	雍 陶	竟辞荣,闲居庐岳,养疴傲世,与尘事日冥矣。	雍陶《庐岳闲居十韵》
	项 斯	初筑草庐于朝阳峰前,交结净者。槃礴宇宙,戴薜花冠,披鹤氅,就松阴,枕白石,饮清泉,长哦细酌,凡如此三十余年。	项斯《忆朝阳峰前居》、《山友赠薜花冠》
	李群玉	好吹笙,善翰墨。	卢肇诗“妙吹”两句

附表二 《唐才子传》以诗考事情况一览表

卷数	诗家	事 迹	出 处
卷八	周 繇	调福昌县尉。	杜荀鹤《送福昌周繇少府归宁兼谋隐》
卷九	周 朴	贯休尤与往还,深为怜才。	贯休《途中逢周朴》、《怀张为周朴》
	李 洞	初,岛任长江,乃东蜀,冢在其处。郑谷哭洞诗云:“得近长江死,想君胜在生。”言死生不相远也。	郑谷《哭进士李洞二首》
卷十	韦 庄	庄早尝寇乱,间关顿蹶,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诸郡。江西湖南,所在曾游,举目有山河之异。	韦庄《避地越中作》、《寄湖州诸弟》、《夏口行寄婺州诸弟》、《湘中作》
	曹 松	早未达,尝避乱来栖洪都西山。初在建州依李频,频卒后,往来一无所遇。	曹松《乱后入洪州西山》、《哭李频员外》

参考文献及征引书目

周易 《十三经注疏》本

诗经 《十三经注疏》本

韩诗外传笺疏 (西汉)韩婴著 屈守元笺疏 巴蜀书社 1996 年

春秋左传 (西晋)杜预注 《十三经注疏》本

经学通论 (清)皮锡瑞著 中华书局 1982 年

史记 (西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
守节正义 中华书局点校本

汉书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

后汉书 (南朝宋)范曄撰 (唐)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

三国志 (西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

晋书 (唐)房玄龄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书 (南朝梁)沈约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梁书 (唐)姚思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陈书 (唐)姚思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魏书 (北齐)魏收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南史 (唐)李延寿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北史 (唐)李延寿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隋书 (唐)魏征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六朝事迹编类 (南宋)张敦颐撰 中华书局 1985 年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唐书 (北宋)欧阳修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唐会要 (北宋)王溥撰 中华书局 1955 年

登科记考 (清)徐松撰 中华书局 1984 年

- 登科记考补正 (清)徐松撰 孟二冬补正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年
-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 (清)劳格、赵钺著 徐敏霞、王桂珍点校 中华书局 1992 年
-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 岑仲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 (清)赵钺、劳格撰 张忱石点校 中华书局 1997 年
- 唐仆尚丞郎表 严耕望撰 中华书局 1986 年
- 唐方镇年表 吴廷燮撰 中华书局 1980 年
- 五代十国方镇年表 朱玉龙编著 中华书局 1997 年
- 唐刺史考全编 郁贤皓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唐才子传校笺 (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 1987—1995 年
- 唐人行第录(外三种) 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 十国春秋 (清)吴任臣撰 中华书局 1983 年
- 蜀梲机 (北宋)张唐英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江南野史 (北宋)龙衮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南唐书 (北宋)马令撰 《四部丛刊·续编》本
- 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 (元)胡三省音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
- 宋史 (元)脱脱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 文献通考 (元)马端临撰 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 二十史朔闰表 陈垣著 中华书局 1962 年
- 元和郡县图志 (唐)李吉甫撰 中华书局 1983 年
- 太平寰宇记 (北宋)乐史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长安志 (北宋)宋敏求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吴郡志 (南宋)范成大撰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 河南通志 (清)王士俊等监修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唐两京城坊考 (清)徐松撰 张穆补校 中华书局 1985 年
- 两京城坊补考 阎文儒、阎万钧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 隋唐两京坊里谱 杨鸿年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 类编长安志 (元)骆天骧撰 黄永年点校 中华书局 1990 年
- 中国历代地图集 谭其骧主编 地图出版社 1982 年
- 元和姓纂 (唐)林宝撰 岑仲勉校记 郁贤皓、陶敏整理 孙望审定 中华书局 1994 年

补侍儿小名录 (南宋)王铎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姬侍类偶 (南宋)周守忠撰 齐鲁书社影印《四库丛书存目丛书》本

崇文总目 (北宋)王尧臣等撰 (清)钱东垣等辑释 《丛书集成·初编》本

郡斋读书志 (南宋)晁公武撰 《四部丛刊·三编》本

郡斋读书志校证 (南宋)晁公武撰 孙猛校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直斋书录解题 (南宋)陈振孙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四库全书总目 (清)纪昀等撰 中华书局 1965 年

四库提要辨证 余嘉锡著 中华书局 1980 年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袁行霈、侯忠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唐诗书录 陈伯海、朱易安编撰 齐鲁书社 1988 年

庄子 《诸子集成》本

论语 《诸子集成》本

孟子 《诸子集成》本

说苑 (西汉)刘向撰 《四部丛刊·初编》本

西京杂记 (东晋)葛洪辑 中华书局 1985 年

搜神记 (东晋)干宝撰 汪绍楹校注 中华书局 1979 年

异苑 (南朝宋)刘敬叔撰 中华书局 1996 年

世说新语笺疏 (南朝宋)刘义庆撰 (南朝梁)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世说新语译注 张万起 刘尚慈译注 中华书局 1998 年

朝野僉载 (唐)张鷟撰 赵守俨点校 中华书局 1979 年

隋唐嘉话 (唐)刘餗撰 程毅中点校 中华书局 1979 年

大唐新语 (唐)刘肃撰 许德楠、李鼎霞点校 中华书局 1984 年

国史补 (唐)李肇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大唐传载 (唐)阙名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

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撰 《顾氏文房小说》本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明皇杂录 (唐)郑处海撰 田廷柱点校 中华书局 1994 年

《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 唐兰辑《文史》第四期

传奇 (唐)裴铏撰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因话录 (唐)赵璘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唐阙史 (唐)高彦休撰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 幽闲鼓吹 (唐)张固撰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宣室志 (唐)张读撰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东观奏记 (唐)裴庭裕撰 中华书局 1994 年
剧谈录 (唐)康骕撰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云溪友议 (唐)范摅撰 《四部丛刊·续编》本
桂苑丛谈 (唐)严子休撰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北里志 (唐)孙棨撰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开天传信记 (唐)郑棨撰 说库本
玉泉子 (唐)阙名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
尚书故实 (唐)李綽撰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唐摭言 (后梁)王定保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年
开元天宝遗事 (后唐)王仁裕撰 曾贻芬点校 中华书局 2006 年
金华子杂编 (南唐)刘崇远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中朝故事 (南唐)尉迟偓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
鉴诫录 (后蜀)何光远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贾二强点校 中华书局 2002 年
清异录 (北宋)陶穀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洛阳缙绅旧闻记 (北宋)张齐贤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南部新书 (北宋)钱易撰 黄寿成点校 中华书局 2002 年
杨文公谈苑 (北宋)杨亿述 黄鉴整理 李裕民辑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
茅亭客话 (北宋)黄休复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嘉祐杂志 (北宋)江休复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湘山野录 续录 玉壶清话 (北宋)文莹撰 郑世刚、杨立扬点校 中华书局 1984 年
青琐高议 (北宋)刘斧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梦溪笔谈 (北宋)沈括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续世说 (北宋)孔平仲撰 《四部备要》本
唐语林校证 (北宋)王谠撰 周勋初校证 中华书局 1987 年
冷斋夜话 (北宋)惠洪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东轩笔录 (北宋)魏泰撰 李裕民点校 中华书局 1983 年
能改斋漫录 (南宋)吴曾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西溪丛语 (南宋)姚宽撰 孔凡礼点校 中华书局 1993 年
容斋随笔 (南宋)洪迈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杜臆（明）王嗣奭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少室山房笔丛（明）胡应麟撰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七修类稿（明）郎瑛撰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池北偶谈（清）王士禛撰 勒斯仁点校 中华书局 1982 年
香祖笔记（清）王士禛撰 湛之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十驾斋养新录（清）钱大昕撰 《四部备要》本
文史通义校注（清）章学诚著 叶瑛校注 中华书局 1994 年

云笈七签（北宋）张君房辑 《四部丛刊·初编》本

高僧传（南朝梁）释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 汤一玄整理 中华书局 1992 年

出三藏记集（南朝梁）僧祐撰 苏晋仁、萧炼子点校 中华书局 1995 年
坛经校释（唐）慧能著 郭朋校释 中华书局 1991 年
神会和尚禅话录 杨曾文编校 中华书局 1996 年
五灯会元（宋）普济著 苏渊雷点校 中华书局 1984 年
古尊宿语录（宋）赜藏主编集 萧蓬父、吕有祥点校 中华书局 1994 年
宋高僧传（北宋）赞宁撰 范祥雍点校 中华书局 1987 年
释氏疑年录 陈垣撰 中华书局 1964 年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吕澂著 中华书局 1979 年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唐五代禅宗史 杨曾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文心雕龙注（南朝梁）刘勰著 范文澜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诗品注（南朝梁）钟嵘著 陈延杰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
诗品集注（南朝梁）钟嵘著 曹旭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文镜秘府论校注（日）弘法大师原撰 王利器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本事诗（唐）孟棨撰 《历代诗话》续编本 中华书局 1986 年
诗式校注（唐）皎然著 李壮鹰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
本事诗 续本事诗 本事词（唐）孟棨等撰 李学颖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六一诗话（北宋）欧阳修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温公续诗话（北宋）司马光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中山诗话（北宋）刘攽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后山诗话（北宋）陈师道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 临汉隐居诗话 (北宋)魏泰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诗话总龟前后集 (北宋)阮阅编 周本淳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
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 (南宋)胡仔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吟窗杂录 (北宋)陈应行辑 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唐诗纪事 (南宋)计有功撰 《四部丛刊·初编》本
唐诗纪事校笺 (南宋)计有功撰 王仲镛校笺 巴蜀书社 1992 年
彦周诗话 (南宋)许顗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石林诗话 (南宋)叶少蕴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珊瑚钩诗话 (南宋)张表臣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韵语阳秋 (南宋)葛立方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影印宋刻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历代诗话本
沧浪诗话 (南宋)严羽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碧溪诗话 (南宋)黄彻撰 《历代诗话·续编》本 中华书局 1986 年
岁寒堂诗话 (南宋)张戒撰 《历代诗话·续编》本 中华书局 1986 年
竹庄诗话 (南宋)何汶撰 常振国、绛云点校 中华书局 1984 年
诗人玉屑 (南宋)魏庆之辑 王仲闻校勘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后村诗话 (南宋)刘克庄撰 王秀梅点校 中华书局 1983 年
全唐诗话 (南宋)尤袤撰 历代诗话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
诗林广记 (南宋)蔡正孙撰 常振国、降云点校 中华书局 1982 年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 郭绍虞笺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升庵诗话 (明)杨慎撰 《历代诗话·续编》本 中华书局 1986 年
唐音癸签 (明)胡震亨著 周本淳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诗薮 (明)胡应麟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年
诗源辨体 (明)许学夷著 杜维沫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薑斋诗话 (清)王夫之著 舒芜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五代诗话 (清)王士禛原编 郑方坤删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历代诗话 (清)何文焕辑 中华书局 1981 年
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辑 中华书局 1986 年
清诗话 丁福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清诗话续编 郭绍虞 富寿荪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宋诗话辑佚 郭绍虞著 中华书局 1980 年
六朝诗话钩沉 张明高 郁沅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年
宋诗话全编 吴文治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全唐五代诗格汇考 张伯伟撰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 张伯伟编校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初学记 (唐)徐坚编 中华书局 1980 年

太平广记 (北宋)李昉等编 中华书局 1981 年

太平御览 (北宋)李昉等编 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

册府元龟 (北宋)王钦若等编 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锦绣万花谷 (南宋)阙名编 明嘉靖十五年刻本

永乐大典 (明)解缙、姚广孝等编 中华书局 1959 年影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 (清)蒋廷锡等编 中华书局 1934 年影印本

东皋子集 (唐)王绩撰 《四部丛刊·续编》本

王子安集注 (唐)王勃撰 (清)蒋清翊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卢照邻集笺注 (唐)卢照邻撰 祝尚书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 (唐)沈佺期、宋之问撰 陶敏、易淑琼校注 中华书局 2001 年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唐)李白撰 (南宋)杨齐贤集注 (元)萧士赟补注
《四部丛刊·初编》本

李太白全集 (唐)李白撰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 1977 年

孟浩然诗集校注 (唐)孟浩然撰 李景白校注 巴蜀书社 1988 年

高常侍集 (唐)高适撰 《四部丛刊·初编》本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唐)高适撰 刘开扬笺注 中华书局 1984 年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唐)杜甫撰 (南宋)阙名集注 《四部丛刊·初编》本

杜诗详注 (唐)杜甫撰 (清)仇兆鳌注 中华书局 1985 年

杜诗镜铨 (唐)杜甫撰 (清)杨伦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读杜心解 (唐)杜甫撰 (清)浦起龙解 中华书局 1981 年

钱注杜诗 (唐)杜甫撰 (清)钱谦益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

王右丞集笺注 (唐)王维撰 (清)赵殿成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韦应物集校注 (唐)韦应物撰 陶敏、王友胜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刘长卿诗编年笺注 (唐)刘长卿撰 储仲君笺注 中华书局 1996 年

韩昌黎全集 (唐)韩愈著 中国书店 1994 年据 1935 年世界书局本影印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唐)韩愈著 钱仲联集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孟东野诗集 (唐)孟郊撰 华忱之校订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孟郊诗集笺注 (唐)孟郊撰 郝世峰笺注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刘禹锡集 (唐)刘禹锡撰 《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 卞孝萱校订 中华书局 1990 年

刘禹锡集笺证 (唐)刘禹锡撰 瞿蜕园笺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柳宗元集 (唐)柳宗元撰 《柳宗元集》整理组点校 中华书局 1979 年

柳河东全集 (唐)柳宗元撰 中国书店 1994 年据 1935 年世界书局本影印

柳宗元诗笺释 (唐)柳宗元撰 王国安笺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白居易集笺校 (唐)白居易撰 朱金城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元稹集 (唐)元稹撰 冀勤点校 中华书局 1982 年

李贺诗歌集注 (唐)李贺撰 (清)王琦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7 年

丁卯集 (唐)许浑撰 《丛书集成·初编》本

樊川诗集注 (唐)杜牧撰 (清)冯集梧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长江集新校 (唐)贾岛撰 李嘉言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贾岛集校注 (唐)贾岛撰 齐文榜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

玉溪生诗集笺注 (唐)李商隐撰 (清)冯浩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李商隐诗歌集解 (唐)李商隐撰 刘学锴、余恕诚集解 中华书局 1996 年

温飞卿诗集笺注 (唐)温庭筠撰 (明)曾益等笺注 王国安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郑谷诗集笺注 (唐)郑谷撰 严寿澂、黄明、赵昌平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甲乙集 (唐)罗隐撰 《四部丛刊·初编》本

罗隐集 (唐)罗隐撰 雍文华校辑 中华书局 1983 年

禅月集 (唐)贯休撰 《四部丛刊·初编》本

白莲集 (唐)齐己撰 《四部丛刊·初编》本

韦庄集笺注 (五代)韦庄撰 聂安福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苏轼诗集 (宋)苏轼撰 (清)王文诰辑注 孔凡礼点校 中华书局 1982 年

山谷诗集注 (宋)黄庭坚撰 (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 黄宝华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后山诗注补笺 (宋)陈师道撰 (宋)任渊注 冒广生补笺 冒怀辛整理 中华书局 1995 年

楚辞 (东汉)王逸章句 (南宋)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 1983 年

文选（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 1974 年中华书局影印淳熙八年尤袤刻本（清）胡克家考异 中华书局 1977 年影印本

六臣注文选（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四部丛刊·初编》本

文选旁证（清）梁章钜撰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玉台新咏（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 程琰删补 中华书局 1999 年

唐人选唐诗新编 傅璇琮编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河岳英灵集研究 李珍华、傅璇琮编撰 中华书局 1992 年

文苑英华（北宋）李昉等编（南宋）周必大校 彭叔夏辨证 中华书局 1966 年影印本

唐百家诗选（北宋）王安石编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乐府诗集（南宋）郭茂倩编 中华书局 1979 年

万首唐人绝句（南宋）洪迈编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唐诗解（明）唐汝询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唐诗鼓吹评注（金）元好问编（元）郝天挺注（清）钱谦益、何焯评注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全五代诗（清）李调元编 巴蜀书社 1992 年

唐音统签（明）胡震亨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影印本

全唐诗（清）彭定求等编 中华书局 1960 年

全唐诗补编 陈尚君辑校 中华书局 1992 年

增订注释全唐诗 陈贻焮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编 中华书局 1958 年影印本

全唐文（清）董诰等编 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编 中华书局 1983 年

全宋词 唐圭璋编 中华书局 1980 年

千唐志斋藏石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唐代墓志汇编 周绍良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周绍良、赵超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绀珠集 旧题（南宋）朱胜非编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类说（南宋）曾慥编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说郛（元）陶宗仪编 商务印书馆 1927 年版张宗祥校明钞本

顾氏文房小说（明）顾元庆编 商务印书馆 1925 年影印本

重编说郛（明）陶珽编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五朝小说（明）阙名编 清刻本 上海扫叶山房 1926 年石印本

- 唐人说荟 (清)莲塘居士 (陈世熙)编 上海扫叶山房 1913 年石印本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唐宋传奇选 张友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全唐五代小说 李时人编校 何满子审定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宋代传奇集 李剑国编 中华书局 2001 年
唐传奇笺证 周绍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孔一、傅成、徐时仪等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 唐史余渾 岑仲勉著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0 年
金石论丛 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岑仲勉史学论文集 岑仲勉著 中华书局 1990 年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唐代诗人丛考 傅璇琮著 中华书局 1981 年
李德裕年谱 傅璇琮著 齐鲁书社 1984 年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刘禹锡年谱 卞孝萱著 中华书局 1983 年
元稹年谱 卞孝萱著 齐鲁书社 1980 年
白居易年谱 朱金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杜牧年谱 缪钺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罗隐年谱 汪德振著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唐宋词人年谱 夏承焘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管锥编 钱锺书著 中华书局 1979 年
谈艺录 钱锺书著 中华书局 1984 年
七缀集(修订本) 钱锺书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蜗叟杂稿 孙望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鲁迅全集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 李剑国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李剑国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唐人传奇 李宗为著 中华书局 1985 年
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李剑国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中古文学文献学 刘跃进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史 陶敏、李一飞著 中华书局 2001 年
唐史史料学 黄永年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
全唐诗人名考 吴汝煜、胡可先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 吴汝煜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全唐诗人名考证 陶敏编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全唐诗重出误收考 佟培基编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傅璇琮主编 辽海出版社 1998 年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隋唐五代卷） 周祖谟主编 中华书局 1992 年
唐代文学丛考 陈尚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白居易综论 谢思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唐五代文史丛考 吴在庆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 戴伟华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唐代铨选与文学 王勋成著 中华书局 2001 年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朱光潜美学文集 朱光潜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美学散步 宗白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中国艺术精神 徐复观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中国美学史大纲 叶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叶嘉莹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艺术与视知觉（美）阿恩海姆著 滕守尧、朱疆源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文学概论 韦勒克、沃伦著 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 三联书店 1984 年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张隆溪著 三联书店 1987 年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文心雕龙讲疏 王元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程千帆选集 莫砺锋编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唐诗汇评 陈伯海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 罗根泽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杨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著 中华书局 1999 年
文坛佛影 孙昌武著 中华书局 2001 年

- 宋诗话考 郭绍虞著 中华书局 1979 年
唐音质疑录 吴企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中国诗话史 蔡镇楚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诗话概说 刘德重、张寅彭著 中华书局 1990 年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王运熙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张伯伟著 中华书局 2002 年
宋代诗学通论 周裕锴著 巴蜀书社 1997 年
中国禅宗与诗学 周裕锴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 周裕锴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贾晋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唐诗演进论 罗时进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程蔷、董乃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唐代文学散论 张安祖著 三联书店 2004 年
历代诗经论说述评 冯浩菲著 中华书局 2003 年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詹福瑞著 中华书局 2005 年

后 记

熊十力在《佛家名相通释》的“撰述大意”中曾向学人开示研佛之道，其中有读佛四要一节，他说：“读佛书，有四要，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惮繁琐。又必于千条万绪中，综会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分析与综会有待于踏实与凌空，他说：“分析必由踏实，于繁琐名相，欲一一而析穷其差别义，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此谓踏实。”又说：“凌空者，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熊十力被认为是“五四”以后老一代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佛教唯识论的领悟与阐发颇有独到处，上述读佛四要应该是其悟入以后的经验之谈。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自湖北负笈北上，来南开求学。先是师从郝世峰先生，攻读唐代文学硕士，后留校执教，又师从李剑国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小说史博士。因此机缘，读博期间将唐诗本事作为研究课题。唐诗本事向无专门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需要辛勤的耕耘和全新的创造。进入这一片待耕的处女地，对我来说，首先面临一个治学方法问题。在我受业的两位导师中，郝先生为学重领悟，李先生著述重材料。门墙之内，耳目所接，渐得熏染。大约因此之故，后来读到王元化先生记熊十力的回忆文章，对其中有关《佛家名相通释》所示读佛四要的研讨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王元化先生曾向十力先生请教佛学，得其《佛家名相通释》旧本，诵习精研，深感书中所揭示的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四者兼顾而不可偏废，诚为读书要诀。他还特别标举书中与此精神相通的“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两句，以为其中揭橥的治学原则最为精审，对此宗旨拳拳服膺。受这篇文章的感染，后溯及《佛家名相通释》原文。十力先生

是我乡先贤,读其文,有如聆乡音的亲切之感。后来进入唐诗本事研究,对十力先生揭示的读书要领及治学原则有更深领悟,常自励力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此后的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注重材料的搜集考辨,事象的分析归纳,也注重类例的建立和理论的阐发。每欲立一说,必先求其材料正反论证,然后确立论点。参酌众说,但不迷信盲从,必欲基于事实而出以己见。这些治学取向或许取法多方,但接受十力先生治学精神的沾溉最为自觉。

有五六年时间,笔者沉潜于唐诗本事中。参稽旧籍,或时有发现;掩卷长思,也偶有会心。这篇论文正是这些年里艺海拾贝的收获。今试一检视全文,似有两点可说:首先,是在这一研究领域提出了为数可观的具有文献学、小说学及诗学意义的问题,对其中一些问题,本文有较为切实的探讨,或全新的认识,一些具体结论容有可取,或具有启发性。其次,是对唐诗本事的研究体系有所探索,夸大点说,是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搭建一大致框架,虽未臻完善,却也略见眉目。

方今学术兴盛,人有其学,家有其书,该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吧,然而一些论文及出版物已被论家斥为学术垃圾。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酷评,但我听说上世纪的“大跃进”年代,全民大办钢铁,土法上马,遍地开花,然而炼出来的也不过一堆废铁。昔言书无价值,谓只配“覆瓿”,今言著述无可取,说是“评职称用的”。自然,职称晋升需有著作,为此著述或情有可原。但如果仅此一用,则虽是皇皇巨册,也不免“废铁”之憾。现在发表这样的议论似有苛求之嫌,但我在论文写作中时常以此自警,立论求证,不敢稍存轻忽之心。我的研究最终要由读者来评判,上述研究实绩的自我估价倘能得到读者印可,则“废铁”之讥庶几免矣。

这篇论文从立意到最后完成,断断续续,历时七年有余。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现在,论文要出版了,借此机会略述写作缘起及为学取径等,以对这一学术时段作一了结,是为记。

戊子年初冬黄冈余才林书于南开大学西南村